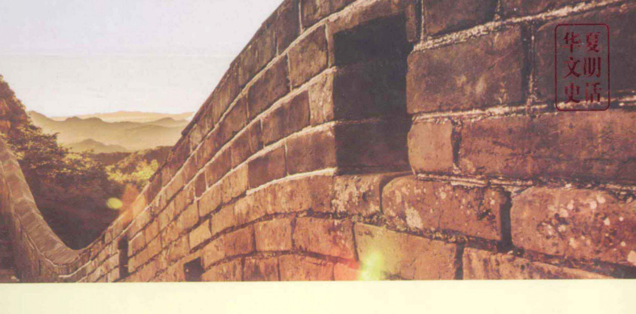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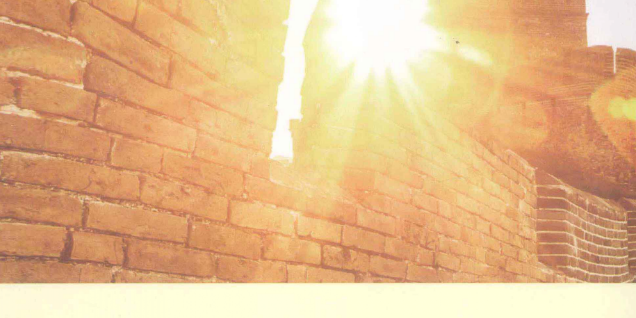


复兴王朝

——大明帝国盛衰三百年

马兆锋◎编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是继周朝、汉朝和唐朝之后的一个盛世，史称“治隆唐宋”、“远迈汉唐”。大明，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天子御国门，君主死社稷，为后世子孙所敬仰。

这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朝代。它的皇帝、后妃、宗室、内阁，它的将相、宦官，它的城市、宫苑和陵园，它的宫廷倾轧、民族争斗、思想文化……无不笼罩于迷雾之中，无不让人疑惑不解。本书激起了明史的历史烟尘，告诉你一个真实而波澜壮阔的大明王朝。

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生动形象的文笔，全景展示了明朝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深刻揭示了明朝历史的基本面貌和社会发展脉络，呈现给读者的是不一样的明朝历史。


ISBN 978-7-5639-3736-3
9 787563 937363 >
定价：40.00元

FUXING WANGCHAO



复兴王朝

——大明帝国盛衰三百年

马兆锋◎编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兴王朝：大明帝国盛衰三百年 / 马兆锋编著．—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1

（华夏文明史话）

ISBN 978-7-5639-3736-3

Ⅰ.①复…　Ⅱ.①马…　Ⅲ.①中国历史—明代—通俗读物　Ⅳ.①K248.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3851 号

复兴王朝——大明帝国盛衰三百年

编　　著：马兆锋
责任编辑：李　光
封面设计：许彦新
出版发行：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100124）
010-67391722（传真）　bgdcbs@sina.com
出 版 人：郝　勇
经销单位：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23.75
字　　数：399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639-3736-3
定　　价：40.00 元

总　序

知识改变命运，眼界决定未来。

孟子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登上东山之后觉得鲁国变小了，登上泰山之后觉得天下变小了。那些看过大海的人很难被别的水所吸引，在圣人门下学习过的人很难为普通言论所折服。可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有登泰山临大海的时间，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亲耳聆听圣人教训的机会，然而因为没有时间远行没有机会朝圣而放弃登高临小之志，是糊涂的行为。其实，想要领略高山大川的美景以游心，接触圣人的言论以明志，在风景绝佳的高处以游目骋怀，还有另外一种方法——读书，在文字里登山涉水，于书本中获取智慧。

这套"华夏文明史话"丛书，就是一套能够带你全面了解华夏文明史的轻松读物。丛书共8册，从原始社会远古传说时代到夏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明、清，时间跨度上百万年。放眼望去，这8册书里面几乎包含了华夏文明的所有方面，知识的跨度不可谓不宽泛，视野的广度不可谓不浩瀚。

在这套书里面登场的，有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康熙皇帝等充满传奇色彩的伟大君主，有如秦步军、汉骑兵、清八旗军这类令现代人充满兴趣的剽悍军队，有如老子、孔子、孙子这类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思想先哲，有众多如白起、王翦、项羽、韩信、霍去病、李靖、曾国藩那样为战争而生的天才统帅，有令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如西施、貂蝉、王昭君、杨玉环那般的美人，还有如屈原、司马相如、曹植、李白、蒲松龄那样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文人。他们创造了恢宏灿烂的华夏文明，历史正是由于有了他们而更加精彩。

而那些似真似幻令现代人着迷的古老传说，那些令人神往的秘密宝藏，

那些存留到今天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雕塑，那些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种种谜团，让离我们远去的古代华夏文明更显神奇。

不看这些飘落在时间长河中的，或神秘或惊艳或传奇的故事，就不知道华夏文明是如此的璀璨；不看这些风流早被雨打风吹去的断壁残垣上精美的雕刻沧桑的流年，就不知道古人的智慧是如此的令人难以捉摸；不看这些震惊世人的考古发掘，就不知道有些流传下来的传说竟然瞬间就被证明确是真的史实。

比如一向被认为是神话人物的女娲，历史上很有可能确有其人。女娲死后，她的长眠之处——“女娲陵”有多处，有确切史料记载的是山西洪洞县赵城镇侯村、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境内、河南淮阳三处，女娲陵到底在哪里？从历代官方的态度来看，女娲陵应在山西的侯村。这些真真假假的纪念性陵墓说明女娲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公认的一位始祖。

类似这样的种种疑问在这套丛书里面有不少，有些已经破解，有些至今无解。已经破解的固然能够满足我们的部分好奇心，无解也并不影响读书兴味，反而更能激发阅读过程中的思考和愉悦心情。就让历史留存些无法解释的疑惑也好，这些疑惑终将成为现代人斑斓的幻想。有幻想的阅读是令人心驰神往的阅读，有幻想的历史才会有令人不断探寻下去的欲望。而这套阅读起来既可以给人小小满足又能带来无尽幻想的“华夏文明史话”丛书，但愿也能为你登山涉水一览众山小略尽微薄绵力。

这不仅是一套历史读物，还是一次邀请，一次穿越回几百、数千年前，经历浩浩劫、渺渺愁的机会。

站在楼宇林立、车马喧嚣的现代都市里念想这些故事的主角，古香古色被阳光照得支离破碎。那么，脚下隆隆而过的车轮声或者可以想象成古代战场上的金戈铁马，眼前新起的一片片高楼下面也许就深埋着古代的村落、城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没有能力留住古老历史，却有能力用文字将历史凝固成永恒；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回古代，却有能力用思想让华夏文明伴随人类无限延续。

序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承元朝、下启清朝，是以汉族为主推翻蒙古族统治者而建立起来的汉族复兴王朝，因为明朝的皇帝姓朱，所以又称“朱明”，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元之后的统一王朝，被史家认为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再建。

明朝经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发达阶段，后世记载当时朝廷税收，明朝的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一。明朝早期君主集权强化，皇帝大权独揽。宣德以后，皇权开始削弱，权力在内阁与宦官之间争夺。从明朝晚期开始，伴随着西方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科技发展很快。中国也涌现了徐光启、宋应星、徐霞客、冯梦龙等一大批科学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

明朝无论是冶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在世界都享有盛誉。

明政府对海上的扩张由郑和带领，航行距离之长，在当时的世界无人能出其右。郑和带领的船队航行于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带给了诸国很大的冲击。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帝国，对从事海外事业可能获利这一点，并未能充分认识，逐渐将海洋贸易的主动权留给了阿拉伯人和欧洲人。

明初天下大治，国力强盛，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励精图治，至明宣宗的近百年间，明朝北进蒙古高原，南征安南，伐锡兰，羁縻马来诸岛族。仁宣之治一个接一个，一派盛世景象。

明末，宦官专政，明政府为填补应付对付女真族后金的外侵和镇压闯王李自成的起义，不断加税，“辽饷”“剿饷”“练饷”给百姓加深了负担，政治腐朽，为官贪污成风，是明末的一大痼疾。终于，明王朝在内忧外患之下走向灭亡。明朝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十七朝，国祚 276 年。

明朝是中国继周朝、汉朝和唐朝之后的盛世，史称“治隆唐宋”“远迈汉唐”。大明，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天子御国门，君主死社稷。当为后世子孙所敬仰。

这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朝代。它的皇帝、后妃、宗室、内阁，它的将相、宦官，它的城市和陵园，它的宫廷倾轧、民族争斗、思想文化……无不笼罩于迷雾之中，无不让人疑惑不解。

为弘扬传统文化，普及历史知识，本书用通俗的行文方式和独特的写作思路与选材视角，对明朝历史作了粗略勾勒。全景展示了明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社会生活。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明王朝。本书既可做明史普及读物，也可用于茶余饭后之消遣。

目　录

第一章　大明帝国建立

第一节　朱元璋起义

大明帝国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祖籍是江苏句容县通德乡的朱家巷，其祖先在元朝时世为淘金户，到他祖父朱初一时，淘金所得收入已不能养家糊口，于是朱初一举家逃到了淮河岸边的泗州盱眙（今安徽盱眙）垦荒种地。但因为他们的户籍是淘金之户，只得把所有收入变卖成金子上缴作为税收，如此恶性循环，连温饱也解决不了。到朱初一去世时，家里已是一贫如洗。

为了使自己从淘金户的名单中去除，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只好东迁西移，到其 50 岁时，才在濠州钟离县（今安徽凤阳）的东乡定居下来，并于 1328 年 10 月 21 日生下了一个男孩，按习惯取名为朱重八。

由于生活极端困苦，朱重八不得不在年龄很小时就给地主家放牛羊。在放牛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少年伙伴徐达、汤和、周德兴等人，这些人成了他日后建立明朝的开国元勋。

在朱重八 17 岁时，濠州发生了旱灾、蝗灾和瘟疫，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的父母、长兄、侄儿先后染上瘟疫而去世，只剩下朱重八和他的二哥。因为他们家没有地，不知将亲人埋葬于何处。邻居刘继祖同情他们，给了他们一块荒地，才将其家人安葬。

为了活命，朱重八与他的二哥、大嫂和侄儿被迫分开，各自逃生。朱重八幼时曾经许愿舍身皇觉寺，于是就去寺里剃度为僧，做了小行童。但不久，寺院因灾荒缺粮不得不遣散和尚，朱重八只好带上一个木鱼和一只瓦钵外出云游化缘。

朱重八边走边乞讨，他从濠州向南到了庐州（今合肥），然后向西进入河南的光州（今河南潢川）、固始、信阳，又往北走到汝州、陈州等地，东经鹿邑、亳州、颍州（今安徽阜阳），于 1347 年回到了皇觉寺。三年的流浪生活，他走遍了

豫皖两省的名都大邑，开阔了眼界，同时他也了解到民间疾苦，增长了社会见识。

朱重八在外云游的三年，正是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明王出世，普度众生”的说法，北方的白莲教也在进行同样的宣传。朱重八在流浪中接触到了这样的宣传，他目睹了当时的社会现状，意识到天下大乱的风暴很快就会降临。

元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从元初就采取了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把全国人分为四等：一等人是蒙古人，是最高贵的民族；二等人是色目人，即中亚细亚人，因他们归顺元朝较早，颇得信任；三等人是汉人，主要是金国时所属的汉族人；四等人是南人，主要是南宋所属的汉族人。对这四等人在政治、法律和经济上的地位，元朝政府都有不同的规定。第三等和第四等的汉人最受歧视，因为在蒙古人的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别无他用。

元朝政府在实行民族歧视、压迫政策的同时，又对各族上层进行了拉拢和联合，给予他们许多特权，以扩大蒙古贵族的统治基础。

另外，元朝实行职业、户籍分级制，把全国广大百姓分为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十级。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沦落到连娼妓都不如的地步。

元朝的贵族官僚、僧侣、地主依靠政治上的强势，强行占有土地，致使许多中小地主和普通农民丧失土地沦为佃户。每逢新帝即位，就对贵族大臣们肆意赏赐，金银钞币动辄数百万以上，田地逾千顷。如元顺帝赐丞相伯颜土地，一次就达五千顷。土地高度集中，佃户只能租种土地，但要交纳六成甚至八成以上的高额地租。元朝统治者只知穷奢极欲，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民间逃亡的、饿死的惨状触目惊心。此外，地主对佃户还可随意课派，若佃户生男便供奴役，生女则沦为奴婢或妻妾。

元朝以喇嘛教为国教，僧侣享有无上的特权，甚至还可以干预司法。元朝的许多皇帝都尊封有帝师，帝师的弟子被封为国师、国公等，他们都是当时社会的特权阶层。元朝的寺庙是一种享有特权的经济实体，它们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其土地的主要来源之一是皇帝“赐田”。元朝法律严格保护僧侣财产所有权，许多寺庙里有皇帝颁赐的“护持”诏书，僧尼凭此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正是享有这些特权，番僧们经常为所欲为。元朝第九任皇帝海山曾于

1308 年下诏：凡殴打喇嘛的人，就砍断他的手。凡咒骂喇嘛的人，就割掉他的舌头。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喇嘛、番僧们如此嚣张不法，主要是有皇帝在后面撑腰。

元朝统治者在政治、宗教和民族政策等方面的所作所为，使得毫无生活希望的绝大多数百姓举起了反抗的大旗。在元统治的不足百年间，各种反抗斗争不断，据记载，江南地区就有 200 多起。仅 1340 年，在山东、河北等省就先后发生了 300 多起农民反抗事件。至元朝末年，农民起义已经达到了风起云涌之势，最终掀起了中国历史上一场巨大的风暴。

直接敲响元帝国灭亡丧钟的是黄河水灾。

从至正五年（1345 年）4 月起，黄河就不断决口，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等大部分村庄、田地，农民流离失所。至正十一年（1351 年），元政府征发北方 13 路民夫 15 万人，在今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省的交界地带修复黄河故道，派遣了 2 万军队监工。

自北宋末白莲教在民间秘密结社以来，已成气候。元政府所征发的北方 13 路民夫中有很多是白莲教徒。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门徒刘福通等人乘机进行宣传鼓动，宣传“弥勒佛诞生，明王出世”，进行秘密串联，队伍迅速发展到上万人。他们准备在时机成熟时举行起义，并推韩山童为明王。

由于保密工作不到位，就在起义发动之际，元政府派兵搜捕，韩山童被俘杀，其妻杨氏、子韩林儿乘机逃走。在此危急关头，刘福通、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韩山童周围的起义领袖，于 1351 年 5 月在颍州（今安徽阜阳）起义，正式点燃了元末农民起义的烈火。各地白莲教众及其他农民军相继起兵响应，其中，徐寿辉、彭莹玉在蕲水（今湖北浠水）响应起义。

因信奉白莲教的起义军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以刘福通为首的一支称为北方红巾军，主要活动在江淮一带；以徐寿辉、彭莹玉为首的一支称南方红巾军，主要活动在江汉一带。

1351 年 10 月，南方红巾军推徐寿辉称帝，邹普胜为太师。建立国号天完，年号治平，并建莲台省，以蕲水为都城。徐寿辉建国称帝，影响巨大。

另有全国各地涌现出的不计其数的不信奉白莲教的起义军纷纷举起反抗大旗，主要有起兵于庆元（今浙江宁波）的方国珍起义军和起兵于高邮（今属江苏）的张士诚起义军。

1352 年 2 月，郭子兴、孙德崖、俞姓、鲁姓和潘姓五人响应刘福通的号令，

也在濠州(今安徽凤阳)发动起义。他们五人都被刘福通封为元帅,濠州农民踊跃相从者数万人。

在所有起义军中,红巾军声势最为浩大,迅速演变成抗元的有生力量。

这些起义军各自为战而又相互呼应,对元朝的统治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1352 年,还在皇觉寺的朱重八收到了儿时伙伴汤和的信,邀请他参加郭子兴的义军。汤和信中炫耀说自己已经做了郭子兴起义军的千户,希望朱重八也来共享荣华。朱重八看过后,不动声色,将信烧了,那时他还不打算参加起义。但不久,朱重八一个师兄私下提醒他说,有人知道此信,要去告密。这样一来,朱元璋走投无路。恰逢皇觉寺又被元军焚掠,于是朱重八放下钵盂,在这年的闰三月到濠州投奔了汤和,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当时,朱重八 25 岁。

第二节　统一江南

朱重八刚到郭子兴的军队,就被汤和推荐到郭子兴身边当亲兵。由于朱重八天资聪颖,勇武过人,有些文化,很快就显示出了很高的军事才能,得到了郭子兴的赏识,被提拔为亲兵九夫长,成为郭子兴的亲信,郭子兴如果有重要事情总是和他商量。当时郭子兴有一养女马氏,他就把马氏许配给朱重八为妻。从此军中改称朱重八为朱公子。朱重八有了身份后,另起了正式名字朱元璋,字国瑞。

当时,刘福通为了便于号召天下红巾军,就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称“小明王”,建立“大宋”政权,年号龙凤。郭子兴的濠州红巾军归其指挥。朱元璋因为是郭子兴的女婿,又英勇善战,没多长时间就升任为镇抚,后升任军队的总管之职,成为“大宋”政权赫赫有名的青年将领。

当时濠州红巾军一共立有五个元帅。郭子兴为一派,孙德崖与俞姓、鲁姓、潘姓三个元帅为另一派,彼此争权夺利,矛盾极深。

1354 年 9 月,徐州红巾军主将芝麻李被元军杀害,其部将彭大和赵均用便率兵投到了郭子兴门下。郭子兴一派实力大增,孙德崖心里不痛快,于是在孙德崖的挑拨离间之下,赵均用将郭子兴绑架到孙府暴打一顿,并准备杀掉郭子兴。朱元璋闻讯后,伙同彭大率兵救回了郭子兴。但从此两派便水火不容了。

朱元璋看到濠州城诸将之间内讧不断，不足以谋大事，于是决心独立发展自己的武装。于是，朱元璋向郭子兴请命回家乡招募兵勇，南略定远。朱元璋在他的家乡遇到了少年时的伙伴徐达、周德兴、郭英等 24 人，他们听说朱元璋做了红巾军的头目，便纷纷来投效。这些人都可以说是当时人杰。很快地，朱元璋在南略定远途中用计降服了 3800 人。朱元璋统率着这支队伍攻破定远，又夜袭元将张知院于横涧山。此后，连克怀远、安奉、含山、虹县。朱元璋从降军中挑选出壮汉 2 万多人，编入部队，并南下进攻滁州（今安徽滁县）。

滁州之战，是朱元璋人生的转折点。一是他开始自成一军，二是他得到了自己的重要谋士李善长。李善长劝他学习汉高祖刘邦，知人善任，在乱世要收买人心，要慎刑戒杀。朱元璋深以为然，从此调整策略。

1355 年 3 月，郭子兴病逝，小明王韩林儿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妻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不久，郭天叙和张天佑都在战斗中阵亡，朱元璋便成为濠州这支起义军的最高统帅。接着朱元璋又攻下了和州。朱元璋在和州驻守几个月后，粮食供应出现了问题。与和州相对，紧靠长江南岸的太平（今安徽当涂）、芜湖是盛产稻米的地方，但是没有船只，只能望江兴叹。恰在此时，隶属于红巾军的两支巢湖水军首领廖永安、俞通海，由于内部矛盾，率所部战船千艘前来归附，朱元璋遂建立起水师。

1355 年 7 月，朱元璋率巢湖水师南下，乘长江水势攻取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获得了大量粮食。将士想把粮食运回和州慢慢享用，朱元璋却果断地命人砍断船缆，任船顺流而下，以示破釜沉舟的决心。将士们见无路可退，鼓噪而前，攻克太平，生擒了元万户纳哈出。

至正十六年（1356 年）3 月，张士诚在长江三角洲地带进攻江南元军。朱元璋乘虚而入，统率水陆大军攻破集庆（今南京），改集庆为应天府。朱元璋以应天为根据地，发展成为一支强劲的军事力量，但在名义上仍尊韩林儿旗帜，奉宋龙凤年号，以令军中。

此后，朱元璋命令常遇春等将士相继攻取了常州、江阴、常熟、徽州、扬州等地；逼迫元朝水军元帅康茂才等人投降，招降康茂才等军民 50 余万。7 月，宋政权下令在应天设置江南行中书省和行枢密院，以朱元璋为行省平章兼枢密同佥。朱元璋自置官属，逐渐淡出韩林儿的红巾军系列，开始独立发展自己的势力。

此时，徽州老儒朱升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这

三条建议极具战略眼光，是朱元璋发展初期的指导思想。于是，朱元璋就在应天屯田，兴修水利，恢复农业生产。逐步壮大实力，并把军事进攻的矛头指向土地肥沃、盛产粮食和丝绸的浙江一带。

此时的朱元璋虽然拥有10万人马，但所占州郡极为有限，且在强敌环伺之中。其东面和南面是元军，在长江上游有徐寿辉、陈友谅，长江下游有张士诚，其东南方有方国珍，西南有陈友定。虽然反元的大目标一致，但是张、徐不属于红巾军系列，同小明王互为仇雠。此时张士诚、徐寿辉的力量还不足以对朱元璋构成太大的威胁。而在北方，小明王、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主力正与元军作殊死拼杀。朱元璋就在这种形势下，立足应天，开始有选择地对外用兵，他先后攻占了镇江、广德、长兴、江阴等地，消灭了周边的元朝小股兵力，使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展和巩固。然后，他将矛头指向了对自己威胁最大的两股势力：陈友谅和张士诚。

朱元璋与张士诚双方从至正十六年(1356年)开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交手上百次，双方互有胜负。先是朱元璋力量不支，提出和谈，张士诚不答应。后来朱元璋因善用人才，于1357年一举攻克常州，之后又攻下了宁国，张士诚势去，投靠了元朝江浙行省平章事达识帖木儿，张士诚被授予太尉官职。

朱元璋击败了张士诚后，便开始对付徐寿辉和陈友谅。当时陈友谅还在徐寿辉手下当差。1360年，陈友谅取得了太平、采石之战的胜利，便以为得天下易如反掌，就杀死了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汉，改元大义。

陈友谅知道张士诚对朱元璋有不共戴天之仇，便约张士诚东西夹击应天，企图平分朱元璋的领地。

陈友谅的舰队先后攻下了太平、采石两地，应天的大门向陈友谅敞开了。朱元璋十分紧张，虽有水师，但与陈友谅的艨艟斗舰相比，简直是不值一提。应天眼看不保，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朱元璋的部将胡大海招纳了一位能扭转乾坤的人物——刘基(字伯温)。

刘基向朱元璋建策，目前最危险的敌人就是陈友谅，因此必须集中力量消灭他。而后攻张士诚，只有这样才能统一江南，然后实现北上灭元、成就大业的宏图。

刘基分析说，陈友谅表面上看势力大，但是他是一个背信弃义、心狠手辣、唯我独尊，甚至自私至极点的人。陈友谅不顾后果地把自己置于被人唾骂的地步，众将早就对他心怀不满了，故而不难战胜，只要诱敌深入，击之以伏兵，

胜算必在握。

朱元璋深以为然，于是就设下了诱敌深入、伏兵围歼之策。降将康茂才与陈友谅是至交，于是修书一封，表示形势危殆，愿弃暗投明，约为内应，言辞至为恳切。派人送到陈友谅营中，并约定在江东木桥一带投降。陈友谅果然中计。

6 月 23 日早晨，陈友谅率舰队主力赶赴应天郊外的江东桥，发现都是石桥，遍寻不见木桥，方知上当，于是急令撤退。但为时已晚，被朱元璋伏兵夹击，陈友谅败走。此役俘敌 7000 余人，获百余艘巨舰，朱元璋乘胜收复了太平。此后，朱元璋一鼓作气连克安庆、信州（今江西上饶）。陈友谅败逃九江。次年，朱元璋率军直取陈友谅的老巢江州，陈友谅远遁武昌。接着，朱元璋又分兵克南康（今星子）、蕲州、黄州，陈友谅所辖之龙兴（今南昌）、吉安等地守将投降，朱元璋遂控制了江西和湖北东南部。

正在此时，中原红巾军发生了分裂，力量大为削弱。至正二十三年（1363 年）2 月，张士诚认为时机已到，就派部将吕珍围攻安丰（今安徽寿县）。朱元璋闻讯后赶忙率军到滁州解救小明王和刘福通，但刘福通已被吕珍杀死，朱元璋只救出了小明王韩林儿，把他安排在滁州居住。

这年 4 月，陈友谅认为报仇的时机到了，于是乘虚进围朱元璋的辖地洪都（今江西南昌），守将朱文正（朱元璋的侄子）以拖待变，率部苦守 85 天。到了 7 月，朱元璋亲率舟师 20 万前往救援，陈友谅得知后，撤出了围军，双方在鄱阳湖展开激战。

陈友谅联结大船为阵，士兵在船上行走如履平地。朱元璋则分军 11 队，充分发挥小船灵活的长处，双方激战三日，战况惨烈。陈友谅降将丁普郎驾轻船驭战，左冲右杀，始终无法接近陈友谅，结果被陈军团团围住，死得相当悲壮。后来有人献计，朱元璋遂用火攻陈军。陈军用铁链将大船相连，风助火势，重蹈三国时曹军覆辙。陈友谅弟友仁败死，陈友谅突围出湖口，朱元璋又以步军扼湖口，水陆伏击，全歼号称 60 万的陈军，陈友谅也被乱箭射死。只有张定边带着他的儿子陈理逃回武昌。鄱阳湖水战以朱元璋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奠定了朱元璋问鼎天下的基础。

至正二十四年（1364 年）元旦，朱元璋被韩林儿封为吴王（西吴），在应天即吴王位，置百官司属。仍以龙凤纪年，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发布命令。不久，朱元璋率军西征武昌，陈理出降。至此，朱元璋占领了长江中游广

大地区。朱元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

1363年，张士诚在帮助元朝消灭了刘福通后，自认为有功，就要挟元朝赐封王爵，未能如愿。9月，他再次叛元自立，在平江自称吴王（东吴）。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10月，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将分别进攻张士诚，一举攻下了通州、兴化、盐城、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等州县，将东吴的势力赶出了江北地区。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11月，东吴杭州、湖州守将先后投降，平江成为孤城。张士诚困守平江，孤立无援，只能作困兽斗。

1366年12月，刘基密禀朱元璋令，派大将廖永忠去滁州迎接小明王韩林儿南来应天，途经瓜步镇时，廖永忠暗中把船底凿穿，小明王沉江而死，朱元璋顺理成章地成为最高首领。于是，他不再以龙凤纪年，改1367年为吴元年。

朱元璋大军把平江团团围住，逼迫张士诚投降，因为平江城坚固，张士诚拒绝投降。徐达则在平江四周高筑炮楼，用弓弩、铳向城内射击，并用襄阳炮日夜攻城。城内一片恐慌，外无援兵，突围不成，弹尽粮绝，只能坐以待毙。

1367年9月8日，徐达的军队发动猛攻，进入平江城，张士诚及副枢密刘毅收余部3万与徐达军队展开巷战。张士诚的军队被打败，刘毅投降。张士诚退入室中自缢未果，被押往应天。张士诚见到朱元璋及李善长等人后破口大骂，朱元璋命令卫士用乱棍打死了他。张士诚死年47岁，东吴政权灭亡。

朱元璋随即分军南下，指向割据浙东沿海的方国珍和割据福建的陈友定。方、陈二部都降附元朝而又自行割据，势力孤弱。朱元璋指挥各部连续作战，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先后削平了浙东和福建。

至此，江南统一，朱元璋拥有了全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便开始显示出他的帝王野心了。他把“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作为他北伐的口号，这对深受压迫的北方人民具有巨大的号召力、感召力和煽动性。

第三节　恢复中华

就在元朝即将覆亡的时候，元朝的军事天才察罕贴木儿在战争中脱颖而出。他在短短十年时间就建立起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在北方全力对抗红巾军，

创造了几乎百战百胜的奇迹，维持了元朝摇摇欲坠的半壁江山。

如果察罕帖木儿挥师南下，首当其冲的就是朱元璋。以朱元璋当时的实力，与之相遇，无疑以卵击石。

就在形势对元极为有利之际，元军内部却发生了严重内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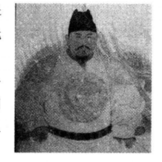
元朝悍将博罗帖木儿出身于贵族，对察罕帖木儿的布衣之身既藐视又嫉妒，担心他的实力和地位都将超过自己，竟然利令智昏，提兵向察罕帖木儿的军队进攻。双方军队在山西、河北不断发生摩擦，就连元顺帝也调停不了。而在朝廷内部，绰斯戬贵为丞相，竟然趁此天下大乱之际私自大量印制假钞，大发国难财。不仅如此，他还趁皇帝让他出面调解博罗帖木儿和察罕帖木儿矛盾之机，视南北两家赂遗厚薄而传密旨。如果博罗帖木儿送的钱多，就对他说：皇帝有密旨叫你去打察罕帖木儿；如果察罕帖木儿送的钱多，就对他说：皇帝有密旨叫你去打博罗帖木儿。结果使元朝陷于一片混乱，形势愈益纷乱险恶。

1362 年 6 月，察罕帖木儿被部将杀死。元军经过几年内战，主力遭受重创，其军事优势逐步丧失。而察罕帖木儿一死，朱元璋再无后顾之忧，于是倾全力和南方各支汉人武装大打出手。此后，元朝虽有脱脱这样的军事天才出现，但不被元顺帝信任，最终被谗言所毁，元军军心更加溃散。

因此，当 1367 年 10 月朱元璋回过头来专注于北方时，却发现北方的统治者已剩下一副空架子，不堪一击了。朱元璋采纳诸将建策，制定“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然后进兵元都”的方略，命徐达、常遇春率军 25 万渡淮北上。元军望风而逃，朱元璋军队一路几乎兵不血刃，仅用 8 个月的时间就全部占领了从陕西、河南到山东的广大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在南京告祀天地，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时年朱元璋 40 岁。

经过 16 年的征战，朱元璋终于圆了帝王梦，从一个横笛牛背的小牧童、遭人白眼的小行僧，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谱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位平民皇帝的人生传奇。



朱元璋

第四节 朱元璋军队常胜秘籍

朱元璋军队之所以能够在战争中常常获得胜利，最终取得天下，其中就有火器的功劳。

朱元璋最早与火器打交道是在南渡长江前夕，当时他还驻军于江北的和州，多方招揽人才，等待时机。在此期间，有一个名叫焦玉的匠人前来求见，并献上几十条“火龙枪”。朱元璋命得力助手徐达在军中试射，证实这种武器能够洞穿一层皮革。朱元璋非常高兴，认为拥有此枪取天下就更加容易了。

从元末明初保存至今的大批火器实物表明，朱元璋及他的对手装备得更多的枪铳类火器是“手铳”。

手铳的型号不一，一般长 42～45 厘米、口径 2 厘米左右、重 2.5～4.5 千克。手铳共分为三部分，即由发射弹丸的前膛、填充火药的药室以及尾銎这三部分组成。尾銎是供将士们在作战时插入长木柄的，这样，两手抓紧木柄就可以将手铳举起来射击了。如果在铳身加固四至五道横箍，还可以起到防止爆膛的作用。作战时只要点燃手铳药室外面的引信，弹丸就会迅速射出来。朱元璋军队南征北战，处处可以看到手铳的身影。

朱元璋首次使用火器作战是在与张士诚作战的时候，当时朱元璋已经攻下集庆，接下来便与盘踞在浙西的张士诚发生了摩擦。

至正十九年(1359 年)2 月，朱元璋的骁将胡大海向绍兴发动进攻。防守绍兴的是张士诚的手下吕珍，他率领守军冒着枪林弹雨，以火铳、火箭、炮石从城上往下射击。接着，他又出奇兵冲出城反击，下令手下将士以数十条火铳对着目标同时开火。胡大海的部将蔡元帅就在攻城时被守军用火铳击中而倒地不起。不久，胡大海也使用了火铳、铁弹丸、石炮等火器，在弓箭的配合下进攻。

胡大海屡攻不下绍兴，在反复较量的过程中付出了一定的伤亡代价，只好撤走。在此战中，双方都不约而同地在战争中动用了火器。但是火器还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参战将士也不懂连续射击的战术。

朱元璋的军队用火器攻城，也必定会用火器守城。至正二十二年(1362 年)3 月，张士诚令其弟张士信、吕珍率军万余反击朱元璋，包围了诸暨，守将谢

再兴抵抗了29天之后，援军胡德济终于赶到了，并参与守城。当时到处传闻朱元璋又派出了新的援军，正在日夜兼程赶来。张士信、吕珍所部害怕遭到守军与援军的内外夹击，从而军心不稳。胡德济、谢再兴两人决定乘隙出击，他们在深夜令将士们一齐出城高声呐喊，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射击铳炮，装作又有大批援军已经来到的样子。张士信、吕珍果然大惊失色，争路而逃，部属自相蹂躏，惨败而归。

历史记载，朱元璋的水师也装备了大量的火器，主要有火铳、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大小火枪、火箭、神机箭、火蒺藜以及燃烧性火器“没奈何”等。

大小将军筒，就是大小将军炮，因威力比较大，故冠以“将军”之名。根据保存至今的一种大将军炮，炮身长约80厘米、口径22厘米、重34.8千克；另一种小将军炮长约55厘米、口径7.3厘米、重约20千克。

大小铁炮的形状类似于将军炮，元代的炮多用铜来造，后来进一步发展为铁制。最先使用铁炮的是朱元璋军队，根据保存至今的文物，大铁炮的炮身长约100厘米、口径21厘米、尾长10厘米。这类炮为长条形的直筒状，比盏口炮及碗口炮的膛压要大，射程更远。为了防止爆膛，炮管外面有四五道箍，两侧还各有一根炮轴，方便运输。

火枪，是在长枪的枪头一侧绑上一两个火药喷筒，筒子外面有引信，点燃引信之后，筒子喷出火焰，可达几十米远。

火箭，是在箭镞的侧边绑上火药筒，筒后有引信，点燃引信，筒里的火药燃烧喷射，产生反作用力推动火箭射向目标。

神机箭，是多发性齐射型火箭，在一个大竹筒内装入两至三支箭，每支箭的箭杆上都绑着火药筒，筒外面有引信，点燃引信，射程可达几十米。

火蒺藜，一般为圆形，还有数个凸起的角形器，体内装有火药，体表开有一个小口子放置引信，点燃后即可爆炸。

燃烧性火器“没奈何”的制法是先把火药及各种武器放在芦席里面，将芦席卷成长约2米的圆状，再糊上一层纸或布，外面有引信。将它用绳子绑在竹竿中，悬挂于船的头桅之上，当碰到敌船时，便点燃引信，斩断悬索，让“没奈何”落入敌船中爆炸，引发熊熊烈火。

朱元璋的军队为了让各种火器长时间快速地连续射击，想尽了办法。他将各种枪炮与弓弩等远程冷兵器组成几层叠阵，轮番射击；又将舟师分为11队，每队均配备了枪炮与弓弩，排列为几层，作战时，先发射枪炮，再发射弓弩，

以此达到快速连续射击的效果。当靠近敌舟时，则用冷兵器展开白刃战。一支军队拥有这么多的火器及新颖的战术，肯定会在水战时占上风。

洪武四年(1371 年)的四川之战，明军也使用了大量的火器。

明初的明军究竟装备了多少火器呢？洪武十三年(1380 年)明朝政府规定，每一个 100 多人的“百户”，要有 10 人使用火铳、20 人使用刀牌、30 人使用弓箭、40 人使用长枪。火铳占了其武器装备总数的 1/10。到 1392 年时，“百户”装备的火器比例可能早已经超过了 1/10。因为明军在其间的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终于有能力用枪炮进行连续射击了。这件事将直接导致军队要不断增加枪炮的装备数量。

元末明初，拥有大量火器的朱元璋军队，其先进的装备、编制、战术，已经将亚欧各国的军队远远抛在了后面。那时的中国，是世界军事变革的中心。

第二章　另类皇帝朱元璋

第一节　朱元璋的传说

朱元璋靠自己的努力，成为赤手空拳打天下的最成功的榜样。他以自己的成功向所有人再次演绎了历史的辩证法："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关于朱元璋的出身，各种版本的传说已经让人目不暇接。自然而然地，关于朱家为什么会生出这样一个贵人来，又有下面的传说。

传说泗州有一个杨家墩，墩下有土窝。有一天，朱元璋的祖父在农作之余，躺在里面休息。这时，有两个道士经过这里，其中一个师傅指着朱元璋的祖父卧的地方说："如果一个人死后埋葬在这里，他的后代就会出天子。"这个道士的徒弟问道："为什么呢？"那道士回答说："此地气暖。不信你拿枯枝栽种在这里，十天之内一定会长出树叶来。"

这时，朱元璋的祖父突然从土窝里站起来，道士看见他很惊讶，于是问道："刚才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朱元璋的祖父假装耳聋，又是摆手，又是摇头，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于是，道士在那里插了一段枯枝就离开了。朱元璋的祖父把道士的话记在心里，一天天地等候着枯枝生叶。十天过去了，那枯枝果然长出叶来。但是朱元璋的祖父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这里是块风水宝地，就把长出树叶的树枝拔去，另外插了一段枯枝。

又过了十天之后，两个道士再次来到土窝处，徒弟发现了插在地上的枯枝，诧异地问道："为什么不生树叶呀？"师傅指着朱元璋的祖父说："一定是被这个人拔去了。"朱元璋的祖父看见瞒不住，就承认了。道士说："你有福气，死后应当埋葬于此，你家将会出天子。"于是，朱元璋的祖父死后就被埋葬在那里。朱元璋的祖父下葬时，让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扒开的土自己壅起，成为坟堆。

根据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朱元璋从小就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朱家在朱元璋出生后十年,迁到了钟离的西乡,后又迁到太平乡孤庄村。关于朱元璋少年时的事情,也有一些逸闻:

朱元璋小时候跟许多穷人家的孩子一样,靠替地主放牛过活。有一次,嘴实在太馋了,就把东家的牛犊杀了,然后大家一起把小牛煮熟吃了。吃完以后朱元璋想了个办法:他把吃剩下的牛尾巴插进地里,骗东家说:"地开裂了,小牛陷进去了!"东家跑过去拽住牛尾巴,结果牛尾巴真的往地里钻,东家见状,无可奈何地相信了朱元璋的话。

朱元璋和放牛的小伙伴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玩拜皇帝的游戏。他们拿车辐板做皇冠,拿破的木板做笏,拿篮子做龙椅。然后,大家轮流做"皇帝",坐上"龙椅"的人接受其他人的"朝拜"。奇怪的是,当其他人坐上篮子的时候,都坐不稳,没几下就摔下来了,而朱元璋坐上去的时候却稳稳当当的。大家见状,就服了朱元璋,就一起拿着"笏"参拜他。从此以后,朱元璋在放牛娃中俨然成了小首领。

虽然这些传说不免有附会或神化的地方,但还是可以看出朱元璋小时候要比一般孩子聪明、顽皮。

朱元璋作为一个封建皇帝,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掩饰自己卑微的身世,他在《御制皇陵碑》中毫不避讳地道出了自己的身世,这也是他留给子孙最宝贵的财富。尽管朱元璋的子孙中出了很多不肖之人,明朝国祚还是延续了276年。

第二节　朱元璋长相之谜

朱元璋流传在世的画像版本众多,他的画像主要集中于两类:一丑一俊。到底哪种版本才是朱元璋的真实面貌?这也是一个历史谜团。

民间有一个流传极广的朱元璋画像的故事:朱元璋称帝后遍召丹青高手给自己画像。第一个进宫的画师十分认真,把像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和真人一样。朱元璋看到自己丑陋的形象,顿时大怒,就把画师推出去斩了。

第二个画师吸取了教训,把朱元璋画成了美男,一表人才,五官端正,相貌堂堂。朱元璋一看这画得不像自己,明明是在欺骗他,自然画师难逃一死。

第三个画师揣摩出了朱元璋的心思,他追求"神似":脸型描摹得与真人差

不多，其他部位跟着感觉走，处理得模棱两可。结果朱元璋看到自己满脸仁慈、一副帝王之相后，不禁龙颜大悦。这个画师受到了朱元璋的奖赏，被放回了家。

这段“民间故事”的真伪无法考证。但里面透露出了一个信息：朱元璋的相貌确实异于常人，可能不合比例，五官失调。这个传说也说明一个问题：朱元璋对自己的画像要求极其严格，绝不允许不满意的作品流出宫廷。

既然如此，民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版本流传下来？

有一种原因是朱元璋杀人如麻，除了残害忠良，还得罪了不少文人，文人怀恨在心而借此泄恨，于是根据传说中的描述，故意夸张其面部缺点，丑化朱元璋，把本来相貌就一般的皇帝画得更加糟糕了。

但这理由并不充分，因为朱元璋是汉人，推翻了给汉人带来无尽痛苦的元朝，至少汉人老百姓应该很尊敬他，怎么可能允许这种丑化大救星式领导人的画像流传下来！再者说，明朝的典章很严厉，当年到朱元璋孝陵前割猪草都可能被逮起来的，如果把这种画放在家里，那该是什么罪？

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后人，特别是清人所为。

自从 1368 年，朱元璋在应天（南京）称帝，到 1644 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明思宗朱由检在煤山被逼自缢，历 276 年的大明王朝结束，清王朝开始。

1644 年，清世祖福临赶走李自成迁都北京后，清朝在好几个时期或轻或重，有步骤地开始“篡改运动”。为了统治的需要，甚至连《明太祖实录》这些书都安排文人“修饰”，从文字上丑化前朝，歌颂大清。

可以想见，在这种背景下，本来民间就传说相貌怪异丑陋的朱元璋，就很难逃脱被“恶搞”的结局了。

从目前来看，除了一两幅朱元璋的画像外，绝大部分版本都是明亡以后民间所绘，有的版本极不严谨，如把朱元璋的皇冠绘成了秦汉制式。还有将朱元璋的下巴画得大如馒头的画像，从生理角度上讲，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得了怪病。如果这种长着奇怪下巴的画像真是明朝时所作，那只有一种解释：当时确实把朱元璋的奇异相貌当成帝王奇相来理解了；或是朝廷有意授权画师，通过障眼法来愚弄臣民。

从历史上看，在出身、相貌上故弄玄虚，确是帝王美化自己的一个常用手法。

根据民间的说法，朱元璋患过天花而不死，留下了一张麻脸，加上他的下巴可能稍长，额骨稍凸，时人可能觉得太丑了，御用文人则正好附会说这是帝王奇相。

朱元璋到底长得怎么样，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第三节　朱元璋不认朱熹为宗的隐情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祖先观念十分浓厚，历史上很多血统并不高贵的皇帝在登上皇位之后，往往要请一个身世显赫的古人作为自己的祖宗，如唐高祖将祖先推到春秋时代的老子李耳那里。唯独贫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没有隐瞒自己的出身。

据历史记载，朱元璋登基后，有大臣建议将南宋大儒朱熹作为他的祖先，而且朱熹和朱元璋的出生地都为徽州。却遭到朱元璋的拒绝。

朱元璋不愿意给自己找一个显赫的祖宗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

一是朱元璋的性格所致。朱元璋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记恩情，特别从皇后马氏和太子身上可以看出。朱元璋在发迹的时候，曾遭到郭子兴的怀疑，并把朱元璋关了禁闭。对此，他的结发妻子马氏想到丈夫饿着肚子，就偷偷地从厨房拿些热饼藏在怀中送给朱元璋吃，当她把热饼拿给朱元璋时，胸前的皮都烫烂了。朱元璋对此很感动，以致后来当上皇帝之后，立马氏为皇后，一直到马氏逝世后，也没有重新立皇后。同时，朱元璋立大儿子为太子，太子死后将皇位传给长孙，也是朱元璋性格的体现。

二是朱元璋从小没有恶行，没有必要隐瞒儿时经历的真相。朱元璋在小时候当了和尚的行童，干的是清静无为的事情，没有作恶多端的事迹，因此就不会忌讳自己贫困的家世。

三是为了统治的需要。朱元璋非常讲究法制，他重典治国，用法制的猛药来治理那些不听话的人。《大明律》和《大浩》是朱元璋治国的“宪法”，他明确告诉人们，要忠于朝廷，不能有二心。朱元璋从自家身世的态度上告诉大臣和天下人，要实事求是，不能欺瞒皇帝任何事情。

第四节　朱元璋为何羞辱大儒

在中国古代，在自尊方面比较敏感的文人，哪怕直接面对高高在上的君王，自认为该争的也要争个至死方休。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他们倔强地认为，"治统"在皇帝手中，但"道统"却在自己手里。

宋濂是公认的大儒，又是明王朝的开国功臣，明代的典章制度都是经由宋濂之手建立的。朱元璋找人给自己的儿子当老师，首选仍然是宋濂。实际上朱元璋并不尊敬宋濂。宋濂在胡惟庸谋反案中，如果不是马皇后力保，就差点受牵连被杀。

《明史》中记载，朱元璋召见一个叫桂彦良的儒生，当面夸奖他说："江南大儒，惟卿一人"，桂彦良颇有自知之明，加上他也不懂朱元璋的心思，连忙答道："臣不如宋濂、刘基。"这时候，朱元璋说了句掏心窝的话："这两个人哪配称大儒啊？"

这段话表面抬举桂彦良，实际上是打击宋濂和刘基这两个公认的大儒，否定其道统传承者的资格。

朱元璋不仅要从精神上羞辱自认为是道统传承者的知识分子，而且还要仰仗强大的国家机器，胁迫以道统自命的人在他所代表的"治统"面前低下头来，诚惶诚恐。朱元璋坐上皇位不久，就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即逼迫病中的"衍圣公"到南京来朝见他。

"衍圣公"是一个封爵名，它是孔子嫡派后裔的世袭封号，各朝皆置。被朝廷封为"衍圣公"的人，即成为孔氏全家族的大宗主。很少有一个新成立的政权会逼"衍圣公"去朝见的，帝王登基后去孔庙祭拜倒是屡见不鲜。

《明史》记载，洪武元年(1368 年)三月，徐达攻占了山东济宁，这个时候虽然战事远未完全结束，但新皇帝既已登基，大势已定，衍圣公孔克坚不想让新政权对自己有不好的印象，赶忙派遣儿子孔希学去拜会徐达。徐达将孔希学送到南京，孔希学上奏，解释父亲因病不能前来朝贺新主，朱元璋很不高兴，给衍圣公下了一道"手谕"，其中明确要挟对方"称疾则不可"。圣人的后裔当然体会得到"不可"这二字的力量，孔克坚急忙日夜兼程到南京朝见朱元璋。事实证明孔克坚并没有说谎，洪武三年(1370 年)春，他再次以疾告归，结果在途

中就病死了。

一直号称以孔子思想为道统的古代，朱元璋逼迫病中的衍圣公来向他朝贺，是对斯文的严重侮辱。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圣人后裔对他所建立的新政权的表态，他用一种公开的粗鲁方式羞辱一切代表旧道统的符号，就是要让天下读书人知道，遵循旧传统是不行的了。

第五节 朱元璋为何删《孟子》

明朝开国之初，人才奇缺，朱元璋在登位的次年，即洪武二年(1369 年)诏全国府、州、县兴办学校，几年下来，颇见成效。即使是穷乡僻壤，也都有儿童入学，为唐宋以来所未有。朱元璋很重视教育工作，他多次申令全国的士子非四书、五经之书不读，孔、孟之书又必须以朱熹之注为准。

朱元璋夺取天下后，十分注重学习，在圣贤书中寻求治国之道。当他翻至《孟子》卷四《离娄章》时，龙颜大怒。因为这一章里记载了孟子时常从平民的角度告诫国君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在朱元璋看来，这有伤国君的尊严。特别是孟子的言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是让朱元璋怒不可遏。

朱元璋诏告天下，说孟子的不少言论不是作为臣子应该说的话，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不得配享(旧时中国的文庙多以颜渊、曾参、子思、孟轲配祀孔子，其中颜渊、子思居孔子的右边，曾参、孟轲居孔子的左边，统称四配)。并不准人们劝谏，否则以“大不敬”罪论处，乱箭射死。

孟子认为，要为民所想，不要把人民厌恶的东西强加给他们。孟子把“以德服人”的政治称之为“仁政”“王道”，把“以力服人”称之为“霸道”“暴君”。天子若“以德服人”，就是“仁者”，而仁者则是无敌的。孟子民本的思想，怎么能被正欲通过强权建立朱家千秋大业的朱元璋所容？所以厄运降落到孟子身上是必然的。

但也有不怕死的读书人，一个叫钱唐的士子毅然上疏，反对皇帝把孟子打入冷宫，他说：“臣为孟轲而死，死有余荣。”说罢，让人抬着事先准备好的棺材，袒着胸，抱着必死的决心向皇城奉天殿方向走去。

钱唐进入奉天后，朱元璋果然命御林军卫士引满弓，等着他的到来。见到钱唐视死如归的样子，朱元璋更加恼恨，便真的让卫士连射了好几箭。钱唐的

左臂、右肩、胸部都中了箭，被射倒在朝堂上，但他仍然挣扎着向皇帝座前爬去。

朱元璋毕竟是性情中人，他看钱唐情辞剀切，不禁为之感动，于是，不仅没有因此而治钱唐的罪，还命令太医仔细为钱唐治疗箭伤。加上朱元璋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的第二天，就有主管天文的官员奏报说文星黯淡无光，朱元璋心生疑虑，认为是上天在示警。不久，朱元璋又下了一道谕旨，极不情愿地把孟子的牌位又请了回去，恢复了孟子在文庙中的一切礼遇。

对多有"非臣子言"的孟子，朱元璋始终耿耿于怀，于是下令"删孟"，并且他自己亲自上阵，将上述光彩夺目的名言尽删去，共砍掉孟子原文 85 条，只剩下 170 多条，编就了一本《孟子节文》。又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朱元璋未曾料及的是，他的这本《孟子节文》并没有长久流传下去，甚至到他的儿孙当皇帝后，也不怎么强力提倡了。后来，也就渐渐湮没无闻了。

第六节　朱元璋改革科举制度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产生于隋朝，它此后就成为历代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每个举行科举考试的朝代都是在自己国家的疆域内举行公开、公正的考试，凭借考生的成绩高低来选拔人才。"公开""公平""公正"应该是科举考试的精神内涵，但朱元璋曾经做过违背这一考试精神的事。

朱元璋刚称帝时，为了安抚多年战乱下不安定的民心，于洪武三年(1370年)正式建立科举制度，规定以八股文取士，专取四书五经命题考试。几年后，朱元璋又颁布了明确的科举考试章程，规定了考官人数和评定举子成绩的标准。每隔三年举行最高等级的科举考试，然后根据考生的文章评出成绩，逐一颁给学位，这种做法符合公平原则。但是在洪武三十年的科举考试中，朱元璋一反常态搞了一个区分南北榜的考试，不以成绩为取士标准，而改以地区为取士的标准。

朱元璋为什么要破坏科举考试的公平原则呢？

洪武三十年(1397 年)的这次会试本来进行得很顺利，在发榜的那天却发生了骚乱。三月五日是三年一次"会试"放榜的日子。这一天，黄榜一开，人群

大哗。原来上榜的所有举子都是南方人，居然连一个北方人都没有，这种情况在历次的考试中是非常罕见的。在当时明王朝的都城——南京城里，落选的北方举子们成群结队地涌向负责科举考试的吏部衙门，要求吏部的官员对考试的结果做出解释。他们认为这次考试的主考官也是南方人，所以在考试成绩上弄虚作假，故意偏袒南方举子。

这一下，南京城里顿时乱作一团，街头巷尾贴满了指责考官偏袒同乡、必有隐情的传单；南方人和北方人即使素不相识，见了面后也好像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城里时常出现南方人和北方人打架斗殴的情况。负责维持京师治安的军队迅速开进城里，想方设法平息这场骚乱。他们虽然可以用武力制止暴力行为，却不能改变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反而加剧了双方的矛盾。

突然发生的考场骚乱竟发展成了南北对抗的政治运动，朱元璋得知消息后，马上派人前去安抚那些闹事的北方举子，向他们保证说皇帝正在调查此事，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情绪激动的北方举子们这才慢慢散去。然后，朱元璋就找来主考官刘三吾了解情况。

原来，刘三吾并没有在试卷上做手脚，南方举子的考试成绩确实都比北方举子的成绩好。朱元璋也知道刘三吾一向刚正，不会因私枉法，他相信刘三吾对考试成绩的判断。但是为了平息北方士子的愤怒情绪，朱元璋要求刘三吾从北方的举子中挑选出几个一并上榜。不料刘三吾拒绝更改考试成绩。朱元璋大发雷霆，认为刘三吾实在不识时务，将刘三吾赶出了宫城，还把其他几位考官都撤了职。北方举子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大声欢呼，要求皇帝为他们主持公道。会试复审成了人人关注的头等大事。

四月十三日，朱元璋亲临奉天殿，听取复审结果，六部九卿官员与原主考人一起进宫听旨。主持复审的翰林院侍讲张信当众评点几位北方举子的试卷。张信先说这些试卷的可取之处，然后话锋一转，说北方试卷确实不如南方卷，考官绝无偏袒之事……朱元璋闻言顿时勃然大怒，他指责官员们互相包庇，是有意将水平不高的卷子送交皇帝审阅以蒙蔽皇帝。他宣布，以前的结果一概无效，自己将亲自复审。

结果这些主考官被缉拿下狱，严加拷问，他们的家人也受到了酷刑。这些本来无辜的官员们最后定罪时竟然是被指称与十几年前的胡惟庸案、蓝玉案有牵连，全部被处以死刑。

五月初，朝廷宣布复审结果，新入选的61名举子全部是北方人，没有一个南方的举子。这与上次放榜名单截然相反的结果，是朱元璋为了平息北方人的不满情绪，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次事件史称“南北榜”。从此以后，为了避免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朱元璋立下规矩，以后的科举考试，南北分卷，南卷取六成，北卷取四成，通过这种方法来使南北士子入仕的官员人数大致相同。因此，后来的科举考试并不单以成绩取人了，加入了地区的因素，并且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制度。

这次“南北榜”事件，表面上看是朱元璋亲手制造的一起冤假错案，许多正直无辜的官员惨死在专制皇权之下，朱元璋可谓是个残暴的昏君了。但是，纵观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从大局出发，朱元璋此举是用心良苦的。

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一是维持国家政局的安定，二是笼络北方士人之心。朱元璋不以成绩取士，绝不是简单的科举制度的改革，而是血淋淋的政治斗争的需要。

第七节　朱元璋反腐的特殊政策

在历代帝王中，朱元璋是对贪污腐败最深恶痛绝的一个。他采取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措施来惩贪，在他眼里，连官员多用一张信纸都算贪污。官员犯了别的错误尚可饶恕，唯有贪污，绝不放过。

在反贪运动的开始，他规定凡贪污六十两银子的，就剥皮楦草，摆在衙门前示众。他后来公布的政策更为极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

对贪官，朱元璋宁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他规定，凡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

他这样做固然可以使贪吏无所遁形，但也易生流弊，往往累及无辜。从洪武四年（1371年）到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如洪武四年甄别天下官吏、洪武八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声势都极浩大。其中，尤以“空印案”与“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

由于过分诛戮，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届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

黜或杀头。

虽然惩贪措施如此严厉，腐败现象却从来没有绝迹。大的腐败案件消失了，小的腐败案件却仍然层出不穷。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朱元璋实施的低薪制。明代的官俸最薄，一个县令月收入不过五两银子，这五两银子不但要负担县令本人及家庭的生活支出，还要支付师爷们的工资。如果不贪污，官员们根本活不下去。

对于官员如此不怕死，甘蹈法网，朱元璋在震惊之余，把原因归结于前朝不良思想的污染。他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次强制性的深入的全民思想教育活动，为此他亲自制作了《大诰》，作为这次运动的学习材料。

所谓《大诰》，就是一本案例汇编。朱元璋把他惩办的大案要案编成一册，夹杂以大量的说教。因为以威胁恐吓官吏百姓为目的，所以他选取的都是血腥残忍的案例。

洪武十八年(1385 年)，朱元璋下令要让每户拥有一本大诰。整个洪武年间，《大诰》三编共印行数千万本。明王朝从城市到乡村，每家每户的正堂上都供着一套《大诰》。

为了彻底消灭腐败现象，建设一支清廉的官员队伍，朱元璋号召底层民众起来造官僚阶级的反。

一开始，朱元璋赋予百姓的是监督权。朱元璋告诉百姓，他们可以直接向他举报官员们的违法行为。并且许诺，他会根据普通民众的意见来奖励和惩罚官员。洪武十九年(1386 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进了一步，他宣称，任何一个百姓在他的帝国之内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意的官员，当官的如果敢阻挡，则全家族诛。

赋予百姓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纠拿官吏的权力，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在动员加恐吓之下，朱元璋发动的捉贪运动终于在各地兴起了。在通往南京的路上，经常出现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贪官逃回家里，被亲戚捉住而送到京师的。

从洪武十八年(1385 年)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皇帝与百姓密切配合，严厉打击贪污腐化。那个时候，几乎无日不杀人。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时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后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

原本天下最热爱做官的读书人，此时也视仕途为畏途。有的家里有好学之子，怕被郡县知道后拉去当官，反而叫他们休学种地。有的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以致自残肢体。连不少受过朱元璋多次表彰的清官，也因为牵连到"空印案"之类的大冤案而送了命。

虽然惩贪力度如此大，朱元璋所期望的清廉政治状况最终却没有出现。朱元璋晚年，曾经对自己的暴力惩贪有过困惑和动摇。然而，他始终认为自己亲手写订的《大诰》是一部"宝书"，不忍舍弃。在临死前一年，朱元璋命人将《大诰》内的精要条目挑出来并附在《大明律》内。他希望子孙后代依据《大明律》与《大诰》拟罪。

然而，就在朱元璋去世两个月后，建文帝就在《即位诏》中宣布废除《大诰》。从朱元璋死后直到明亡，《大诰》再也没有发挥过实际作用。到明代中叶，《大诰》已经鲜为人知。曾经发行数千万册的《大诰》，到明末时在民间几乎一本也没有了。这也许是朱元璋从来没有想到的。

更让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死后，腐败现象又迅速发展起来，并且愈演愈烈。到了明代中后期，腐败现象向政治肌体的一切环节蔓延扩散，并最终吞没了整个王朝。大明朝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被列入史书。

第八节　朱元璋为何不毁孙权墓

南京，是中国长江流域的第一古都。三国时期的东吴大帝孙权第一个把自己的都城建在了南京。

孙权死于神凤元年(公元 252 年)四月，时年 71 岁。孙权死后，葬在了城东的钟山附近，即今紫金山。孙权墓就在今天中山陵园内的梅花山，即明太祖朱元璋孝陵的正南方。

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孙权墓一直被称为西陵或蒋陵，而很少被称为孙陵。原来钟山(紫金山)在过去曾叫蒋山，汉末时秣陵尉蒋子文追盗贼时死在了这里，孙权为他立庙，封蒋侯。孙权因避讳祖父孙钟的"钟"字，于是改钟山为蒋山。孙权墓也因山名而被后人称为蒋陵。

到了明初，孙权墓险遭被掘。当时，明太祖朱元璋看中了孙权当年选的风水宝地，想将寿陵营建在这一带。在正式点穴独龙阜、破土动工前，手下已将

陵地周边的古冢古迹一律挖掉，南朝高僧梁僧宝志墓就是此时被移走的。

当时，陵工大臣李新准备将孙权墓掘毁。一天，朱元璋到现场视察，听了李新的汇报后表示不妥。朱元璋当时说："孙权也是好汉，就留他给我守门吧！"

朱元璋此举被不少人认为是"仁人孝君"之大善举。当初，朱元璋在安徽凤阳修建自己父母的陵墓——安徽凤阳皇陵时，围筑了一个很大的陵园，按规定有不少民坟要从陵园内迁出。朱元璋听到汇报后表示，这些坟都是我家以前的老邻居，不必拆迁。所以，当年清明祭扫时，当地老百姓可以随便出入作为禁卫之地的朱家皇陵。

朱元璋这么做是出于他的私心。邻居的坟不外迁，可以让他的母亲在地下有人陪着拉家常，不至于寂寞。而他不毁孙权墓，应该是风水上的考虑，而不仅仅因为孙权是好汉，才请他当"守门"的。

从风水堂局上来说，帝王陵都是风水宝地，后有祖山，前有案山、朝山。近为案，远来朝，孙权墓所在的梅花山正是孝陵风水堂局中的"案山"。如果朱元璋将孙权墓挖了，就破坏了案山的风水。所以，孝陵的神道在孙权墓这里有意拐了一个弯。而这一拐使得整个陵区暗合呈北斗星状，孙权墓正好在杓头内，而控制杓头的"柄子"正是朱元璋的孝陵地宫。

可见，朱元璋留下孙权墓的目的绝不是想让孙权给他守门，他的真正意图是让孙权给他看住风水！而最早想起这个点子的人，最有可能是风水大师刘基。

第九节　朱元璋的皇族政策

朱元璋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极为冷酷。他对百姓、大臣、故交、妻妾，都冷血无情。唯有在自己的子孙面前，他却满面慈祥，温柔体贴得无以复加。为了确保子孙们生活幸福，他绞尽了脑汁。

明朝开国不久，还没来得及大封功臣，他先急不可耐地把自己的所有儿子都封为亲王。他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低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他们都要"伏而拜谒"。

他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为自己的儿

孙们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7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为了让后代们充分享受清福，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的所有消费均由国家承担：10岁起就开始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时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朱元璋对子孙后代的这种无微不至，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朱元璋的皇族政策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他幻想可以通过藩王掌握军队来捍卫朱氏家天下的安全。结果自永乐年间起，亲王引兵作乱不断。这种状况导致历代皇帝不断致力弥补这个漏洞。皇帝们一方面保证皇族生活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则极力强化对皇族特别是藩王的控制。到了明代中后期，这种控制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为了怕王爷们联合地方势力作乱，后代皇帝规定，亲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如果想出城，须专门派人向皇帝递申请。如果没有皇帝的许可，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后代皇帝又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相互见面。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王爷们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自由，成了高级囚徒。他们徒有虚名，坐縻厚禄，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

第十节　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

朱元璋在投奔起义军以前，没机会和读书人打交道。朱元璋自领军以来，知识分子居然主动前来投奔他，朱元璋当然受宠若惊，对知识分子毕恭毕敬。冯国用刚见到朱元璋，就建议他取建康以为根本，再四出征伐，平定天下。李善长和朱元璋一见面，就说他像刘邦，劝他“法其所为，不嗜杀人，天下不足定也”。这些建议让朱元璋在通往皇位的道路上一下子清晰起来。

朱元璋尝到了甜头后，全力争取知识分子。他专门派出手下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四处打听哪里有读书人以为其所用。

听说朱升很有学问，朱元璋就学刘备三顾茅庐，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听说镇江的秦从龙学问很大，朱元璋特地派其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前去邀请，并特意远出南京城门迎接，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起，无论大小事都要请教秦从龙，只称其为先生而不称呼他的名。每年秦从龙生日，朱元璋都

有赠遗，或亲自到他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秦从龙感激得见人就流泪诉说朱元璋的知遇之恩。

知识分子瞧不起他，他也不会生气，而是愈加低声下气。刘基不肯出山，朱元璋叫处州总制孙炎派人力请，又叫刘的朋友陶安和宋濂分别赠诗劝说。软磨硬泡，终于把刘基请了出来。朱元璋大喜过望，专门修建了礼贤馆给刘基等人居住，跟刘基说话从来都称"老先生"。

朱元璋的谦虚、热情、耐心、豪爽、推心置腹倾倒了大批文化人，知识分子纷纷死心塌地为他卖命。朱元璋的投入获得了百倍回报，最终独步天下。

明朝建立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发生了变化。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各条战线急需人才。为充实官僚队伍，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访求知识分子的高潮。他继续采用以前的老办法，命人携带大量金钱分赴各地寻访人才。

不过，朱元璋这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已由一手变成了两手。天下未定之际，读书人如果不出山，他不会硬逼。因为逼急了，这些人有可能跑到他的对手那里去。他只能摆出宽怀大度的样子，置之不问。如今他已经取得了天下，读书人无处可逃，所以对那些太不给面子的知识分子，朱元璋不再介意偶尔显露一下自己的铁腕。

江西贵溪的夏伯启叔侄不愿在新朝当官，干脆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以示决心。朱元璋闻讯大怒，把夏伯启叔侄抓到南京，亲自审讯后，将二人枭首示众，全家籍没。苏州人姚润、王谟同样因为不愿当官，都遭到了杀害，全家籍没。

《明朝小史》记载，朱元璋痛恨那些托身寺庙的遗民，将他们埋入地中，只露其头，用大斧削去，称为"铲头会"。

在明朝以前，虽然君权严重，士大夫阶层还一定程度的独立人格。"山林隐逸"不但被宽容，甚至还被尊崇。朱元璋却认为，拒绝与他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这个前乞丐。他发布命令，天下是他朱元璋的天下，所有读书人都是仰他朱家的阳光雨露而活，不为他朱家服务，就是滔天大罪。

于是天下的知识分子再也不敢东躲西藏，都老老实实出来为新政权服务。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迅速建立，国家机器按计划有效运转起来了。

朱元璋原本识字不多，成为起义军首领后，才开始学习读书写作。随着读书的增多，他对知识分子的崇拜之心也渐渐淡去。朱元璋渐渐发现，知识分子

既有突出的长处，也有明显的短处。长处是知识广博，足智多谋，短处是多谋寡断，缺乏行动力。了解了这一点，朱元璋渐起对文人的轻视之心。

随着明朝政权越来越稳定，朱元璋不用像以前那样费心费力地去寻访和邀请多如牛毛的知识分子了。朱元璋广泛兴建的教育系统也已开始培养大量的文化人，一时间知识分子极大丰富。然而他们在朱元璋眼中的价值也越来越低，对他们的态度也越来越轻慢。

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的一位贵妃去世。按古礼，庶母死，子孙不需服丧。朱元璋十分喜欢这位妃子，要求儿孙给她服丧。文臣们纷纷上疏反对他更改古礼，朱元璋因此写了篇文章大骂这些知识分子为“迂儒”，说他们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审时度势，现实灵活地处理问题。又说，这些人其实不过是一群废物，做不出什么好事来，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更讽刺当朝的文臣们不如唐代的女人。唐代的宫女在皇帝面前敢说真话，今天的文人们却个个唯唯诺诺，毫无骨气。只是朱元璋没有想过，唐代宫女之所以敢说真话，是因为她们面对的不是朱元璋。

朱元璋不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顾，对于文人学士们的文字本行，他也越来越敢于评头论足。朱元璋还对中国文学史的显赫人物韩愈、柳宗元大加批驳，说这些文人只会讲究辞藻，不通人情物理。朱元璋俨然以帝王之尊指导天下文人如何写作，文章强词夺理，咄咄逼人。

到了晚年，朱元璋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于是洪武朝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人类史上罕见的浩劫，上流精英几乎被杀光。

朱元璋越来越看不起知识分子，但他对知识分子的防范戒备心理却丝毫没有放松。

洪武初年，因不满朱元璋的重文轻武政策，一位武将对朱元璋大讲知识分子的坏处。他说，这些人心胸狭窄，嘴巴又刻薄，经常变着法地骂人。还说张九四原为优礼文人，请他们给自己改名，哪承想他们竟给他取名“士诚”。

这个武将说，《孟子》上说了，士，诚小人也。这是骂张士诚小人啊！朱元璋听后，立即找《孟子》来查，发现果然有这句话。他不禁竦然而惊：张士诚也算半个君王，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无非是读书人欺负他盐贩子出身，瞧不起他，才敢这样捉弄他。而他朱元璋出身和尚乞丐，肯定更被他们瞧不起。从此朱元璋就开始对文臣们大起疑心。

朱元璋成天疑神疑鬼，防范过度，自己暗暗制定了一系列奏章的"敏感词"。但凡"光""秃""僧"等与和尚沾边的字眼，都会犯他禁忌。因为他是起义起家的，所以也讨厌别人提"贼"和"寇"二字。无数人因为这些敏感词而被杀。惨烈浩大的洪武文字狱，一方面反映了朱元璋的残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在知识分子面前无法消除的深刻的自卑心理。

朱元璋晚年身体很不好，多年超强度的脑力劳动又使他出现精神变态，嗜杀心理越来越难以控制。他通过毫无节制的屠戮来发泄自己的不良情绪。洪武晚年，稍有名气的文化人几乎都难逃一死。死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文字狱，另一种是牵连进各种大狱之中。



高启

高启是明初"吴中四杰"之首，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洪武三年，朱元璋想任用他为户部侍郎，高启却不愿意干。朱元璋当时不但没有强迫高启，反而赐予大量金帛放其归田里，一时传为佳话。

而到了洪武七年(1374 年)，高启因为创作《上梁文》，以"虎踞龙盘"一词形容魏观的府治。朱元璋以为此语只可用以形容帝王之居，非他人能用，就将高启腰斩。

除了高启以外，"吴中四杰"中的另外三位——杨基、张羽、徐贲，也都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杨基入明曾官山西按察使，后被谗削职，罚作劳役，死于工所。张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后获罪贬谪岭南，没到半道又被召回，自知没好的结果，于是投龙江而死。徐贲入明曾为给事中，后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边疆的明军路过河南，他因为没有及时提供给养，下狱而死。

除了"吴中四杰"之外，明初另外一批著名的文人学者都被召集参与《元史》的修撰。然而修完《元史》之后，他们大都没有好下场。此外，还有很多著名文化人因种种莫名其妙的原因死于非命。一时间有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

不但这些文人小臣没几个有好下场，就是那些一直追随朱元璋、功成名就的大知识分子，也很少有善终的。

朱元璋起兵后，第一批追随他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名的是李善长、陶凯和陶

安三人。除了陶安因死得早得了个善终以外，李善长被满门抄斩，陶凯因致仕后起了个号叫“耐久道人”，朱元璋听说后很生气，就找了个借口把他抓来杀了。第二批追随朱元璋的文人中，功劳最大的是刘基和宋濂，刘基因不被朱元璋信任而罢官回乡，后被胡惟庸毒死。宋濂则因其孙宋慎之事，被株连胡惟庸案中流放外地，途中自缢于夔州。

洪武一朝的著名文臣，善终者寥寥无几。以热情宴请开始，以摧残屠戮告终，这种专制君王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游戏，已经在中国历史上上演过很多次了。

第十一节　朱元璋的“文字狱”

朱元璋时期，“文字狱”被正式列入诏狱（锦衣卫设的监狱）的一种，罪状由朱元璋或者当权大臣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他们这些手握生杀大权的人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皇帝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

按照明朝初年的习惯，每逢正旦、万寿节及册立东宫等重要时刻，内外文武大臣都要献上表笺庆贺。当时以表笺文字触犯忌讳者为数不少，而最多的是因为用了“则”字。当时的江淮方言，“则”与“贼”读音相似，朱元璋以为这是在讥讽他有落草为寇的经历。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所作《万寿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被杀，还有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和桂林府学训导蒋质等。

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元被处斩。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的表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等语，朱元璋说文中的“光”指光头，“生”是“僧”的谐音，徐是在借进呈表文骂他当过和尚。德安府训导吴宪的表文中有“望拜青门”之语，朱元璋认为“青门”是指和尚庙。这些犯了忌讳的，都在朱元璋的淫威之下丧了命。

有个叫卢熊的读书人，人品文品都很好，朱元璋委任他到山东兖州当知州。卢熊到兖州后要启用官印，发布文告。当他把皇帝授给他的官印取出一

看傻了眼，原来，朱元璋笔下的诏书是授卢熊为山东兖州知州，这官印是根据皇帝的诏书刻制的，这兖州自然变成衮州了。卢熊于是就向朱元璋写了一份奏章，要求朱元璋更正，把官印重新刻制过来。朱元璋一见奏章，知道是写错了，但是不认错，还大骂卢熊咬文嚼字，这“兖”和“衮”就是同一个字，卢熊竟敢将它念成“滚”州，这不是要朕滚蛋吗？随即将卢熊斩首。

其实，这些文字都没有鄙视的意思，但朱元璋心里总觉得所有文字的背后都有可能暗藏着数不清的挖苦、揶揄和讥讽。确有其事的，杀了活该；被冤杀的，权当是一种震慑吧！

第十二节　朱元璋与养子的家庭生活

在朱元璋的一生中，曾经收养了很多义子。在日常生活中，朱元璋对义子以家人对待。朱元璋的这些义子在他建立明朝和治理国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李文忠，是朱元璋大姐的儿子，小名保儿，12 岁时母亲去世了，不久发生了元末农民起义，保儿跟父亲李贞东奔西走。至正十四年(1354 年)，李贞听说朱元璋在滁阳领兵，于是就带着保儿投奔朱元璋。朱元璋那时还没有儿子，除了亲侄子朱文正之外没有其他亲人，就把保儿收为义子，并将保儿取名为朱文忠，请文士教他文化，又让他学习兵法。至正十七年(1357 年)，朱元璋令文忠从军打仗，这时他 19 岁。朱文忠是义子、外甥双重身份，与朱元璋的关系在所有义子中是最亲近的。

沐英，定远人，他的父亲早逝，与母亲一同生活，8 岁时母亲又亡故，成了流浪儿。朱元璋在行军打仗时遇到了他，收交马皇后抚养，成为义子。他因年龄小，连父母姓氏都不知道，朱元璋给他取名为文英。沐英 18 岁时，朱元璋命他随军打仗，用为帐前都尉，侍奉于帷幄之中。

何文辉，滁州人，至正十三年(1353 年)朱元璋攻下滁州时何文辉 14 岁，被朱元璋收为子，改姓朱，后被朱元璋任用为天宁翼元帅，镇守宁国。

徐司马，扬州人，9 岁成了孤儿，约在至正十四年(1354 年)被朱元璋收为义子，改姓朱，小名马儿，年事稍长，在朱元璋身边服务，后出任总制，随从常遇春镇守婺州。

平安，其父平定官至济宁卫指挥佥事，在攻打元大都战役中牺牲。朱元璋在平定在世时把平安收为养子，改姓朱，并让他袭父职。

朱元璋一共有20多个义子，除了上述5人外，知道名字的还有朱文刚（柴舍）、朱文逊、金刚奴、真章等人。朱文刚和真章随同耿再成镇守处州，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当地发生叛乱，文刚与再成均战死。金刚奴镇守过衢州。朱文逊在太平战死。

外姓义子在朱家，与朱元璋夫妇及其亲生儿子朱标等人以父子、母子、兄弟关系相处，建立起了一家人的感情。在朱家，对义子，不管是父母兄弟，均以小名相称，显示亲热。朱元璋不仅与义子有感情，对他们的儿子也有家人之情，表现之一是给他们起名字，如李文忠的三个儿子景隆、增枝、芳英的名字均为朱元璋所取。

称帝后的朱元璋对义子、义孙长期以家人相待。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将要任命沐英长子沐春为后军都督府佥事，按规定这类任用先要作一段时间的代理，然后才能实授，但是朱元璋说：那孩子是我家人，不要试用，于是就给了他实职。

朱家人生活在一起不免会有矛盾，义子出去做官，也会有不如老人家心意的地方，所以朱元璋看到不高兴的事情要加以惩处。太子朱标与义兄弟相处很好，一旦获知其父对哪位义兄不满意就告诉母亲，马皇后就出面劝解。有马皇后和太子的居间调停，朱元璋的义子在洪武朝的屡兴大狱中都没有被牵连到，只有徐司马的两个儿子被列进蓝玉党而遭到了惩处，但这时徐司马已死，马皇后和太子也在此前亡故，没有有力的亲人加以劝谏了。义子对朱家也是眷念的，其中以沐英的表现最明显。当马皇后死时，沐英伤心痛哭，直到咯出血来。他与太子关系更好，当从南京传来太子噩耗后，沐英急出病来，不久便死在云南任所，时年48岁。

朱元璋在政治上对义子非常信任，刚开始派他们出去做官时，他们多是做大将的助手，既让他们历练取得功名，又有监视主官的作用。朱元璋收养这么多义子的目的是找帮手，建立自己的势力集团。他在从事反元活动时既无根基，又缺乏亲属的援助，自己的儿子在那时尚未出生，只好用抚养义子的办法，以名义上的血缘关系作为笼络人的手段。他的目的达到了。

朱元璋在养子有了功名之后，就让他们独立生活，恢复原姓。在复姓时，朱元璋向他们说明了收养真相。义子们虽然不姓朱了，却更感激朱元璋。

第十三节　朱元璋评诗趣事

朱元璋在江南与陈友谅等人大战时，偶然投宿一寺。住持不知他是谁人，便问他的姓名。朱元璋不答，乃题诗一首壁间。诗云：

战退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山僧并不知分晓，只管叨叨问姓名。

前两句有杀气，后两句有不耐烦之意。后来朱元璋称帝，寺僧也知道了当年的题诗者是当今皇上，十分惊恐，便命人用水洗去其诗。

有一天，朱元璋忽然想起了这首诗，便派人去问此诗是否还在，诗已被洗刷掉，众僧惶恐不已。内有一僧有急才，即献诗一首呈上。诗云：

御笔题诗不敢留，留时恐惹鬼神愁。

曾将法水轻轻洗，尚有龙光射斗牛。

前两句说朱元璋的诗是天子墨迹，留在人间会惹鬼神之怒，故此用水洗去。后两句则是拍马屁，说朱氏之诗虽经水洗，仍然透出万丈光芒，足见是非凡之物。

朱元璋看了这首诗之后，龙颜大悦，便不再追究寺僧洗诗的过失。

朱元璋评诗乃随心所欲而评，吹捧者大多得到奖赏。有一次朱元璋微服出行，遇到一名岁贡至京的书生彭有信。朱吟出《虹霓》诗二句："谁把青红线两条，和云和雨系天腰。"彭应声续道："玉皇昨夜銮舆出，万里长空驾彩桥。"马屁拍得恰到好处。朱元璋认为他"有学有行，君子也"，便任为北平布政使。

但并非所有拍马屁者都能获奖赏。有一个诗僧名来复，一次朱元璋召见他，并与共饭。饭后他写诗谢恩。诗云：

淇园花雨晓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

阙下彩云移雉尾，座中红茀动龙光。

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

稠叠滥承天上赐，自惭无德颂陶唐。

朱元璋见诗大怒，下令杀了这个和尚。僧人来复这首谢恩诗，获罪的原因是用了"殊"和"无德"三个字。朱元璋说："诗用殊字，谓我为歹朱，又谓我无

德。奸僧敢大胆如此！"把"殊"字无端拆为"歹朱"二字，僧人"自惭无德"竟被说成是攻击朱皇帝无德，实是匪夷所思。

第十四节　朱元璋的"着实打"艺术

其他各朝代常常是刑不上大夫，专上百姓。老百姓的起刑点都特别低，而大人物大贪特贪国家财物、霸强硬奸良家妇女，却一点事情也没有。明朝却不同，刑上百姓，刑更上大夫。朱元璋当过老百姓，后来官当大了，与老百姓不一个鼻孔出气了，但到底还是残留着底层百姓的心气，比如对贪官污吏的憎恨，就与百姓有点心气相通。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大臣们说过这样一番动感情的话：从前我当老百姓时，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心里恨透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危害百姓的，绝不宽恕！朱元璋是说到做到的，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按照购买力计算，60两银子约合现在人民币2万～3万，贪污这么一点，就要丢脑袋。朱元璋的治国理念是治国先治官，不单单是治国只治民，若治官也严治民也宽，总比治官也宽治民也严要好，从这点来说，朱元璋值得称赞。

除破了刑不上大夫古礼之外，洪武年间还实行了一种特别刑罚：脱掉裤子打官员的屁股。朱元璋动用这一刑罚，是从自家开始的，永嘉侯朱亮祖是开国元勋，与朱元璋一起扛过枪，也与朱元璋一笔难写两个朱字。朱亮祖在广东，纳了小妾罗氏，其小舅子罗某在地方上横行霸道，被当地官员抓了起来，这个朱亮祖听小妾枕边风，竟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给抢了出来。朱元璋得知此事龙颜大怒，他动用廷杖，作死地打，死打屁股，硬是将朱亮祖给打死了。朱元璋实行这一刑罚之初，给官员们留了一点面子，裤子不脱，不但让他们穿着裤子，还令人拿一块毡布给他们垫屁股上，给"厚棉底衣"的隔层保护。到了明武宗，太监刘瑾当道，他就扒了官员裤子，让官员们白乎乎的屁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抡起大棍，往死里打，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那些养尊处优惯了的官员们，细皮嫩肉的，没几个禁得起打，常常没打几下，就呜呼哀哉了。

对官员们犯贪污犯渎职犯欺压百姓诸般不法情事，朱元璋及其以后几个

皇帝，都是批示“着实打”来严肃处理的。打屁股的行刑地点一般设在午门外，行刑时，司礼太监捧皇帝批示，与锦衣卫分左右坐，后列太监与锦衣卫各30人，下面环立旗校数百人，皆穿无袖衣服，手执木棍，再外围是文武百官，观摩观礼，现场受教育。司礼太监喝一声“带犯人”，犯人就带上来，太监再喝一声“跪下”，然后宣读皇帝批示，完毕，再喝一声“着实打”，锦衣卫就抡起大棍，一棍一棍打，每打两棍，再喝一声“着实打”，旁边站着的几百上千锦衣卫跟着喊号子齐声呼应：“着实打”。声如滚雷，场面着实吓人。

开始搞“着实打”这一刑处，那是着着实实的。先是那刑具就特别“实在”，棍子特别重，一般人拿不动，专门操这一行的锦衣卫也常常力有所不逮，以致每打五下，就得换人。明武宗时候的御史李熙，上书骂了皇帝，惹得明武宗火起，批示“着实打”30棍。李熙当时不在北京，人在南京，明武宗下令“就地处理”，而南京没有刽子手，为了落实这一指示，南京地方政府从地方部队挑选了身强力壮的士兵，训练了好几天，才练好这30棍。张居正的父亲过世，按理应该交了印回家奔丧，三年不得做官，张居正舍不得做官这个味，引得刑部员外郎艾穆参了张居正一本，张居正有权，有权就有理，权大就理大，他下令“着实打”艾穆80棍，专门操这行的刽子手吃不消，一连换了16人，才把这80棍落实下去，可想而知，那棍棒打起来有多重。那回明武宗自降为“朱寿大将军”，要去南方亲自捉拿朱宸濠，引起文武百官大上书，皇帝要去打仗，要去钻枪林弹雨，万一有个闪失，他们连跪的人都没有了，所以大家都来死死劝阻亲征，惹恼了明武宗，他下令“着实打”，168人挨打屁股，其中15位大员当场被打死。

打人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这“着实打”，看起来这么吓人，想起来这么一打，挨打者几无活路，其实也不尽然。一方面许多挨打者打出了经验，据说在临刑前，预先吃点蟒蛇胆，挨打时尽量放松神经，使血液不往脑门顶上冲，那就能够禁得起打了，有些被打习惯了的，打100大板，也不在话下，还据说，如果被打之后，昏死过去，则舀一大勺小便，掰开嘴巴往里猛灌，也可以起死回生；另一方面刽子手也打出了技术，如果在行刑之前，送了刽子手够分量的银子，刽子手打起来手下留情，表面上，刑棍抡得呼呼响，每一下都声震屋瓦，其实一点也不伤筋动骨，而如果不给钱或者给的不到位，那就必死无疑：表面上，他下手很轻松，屁股上放一张纸，薄纸完好无缺，屁股表皮白润的仍然白润，红润的仍然红润，而筋骨已然碎断而稀烂，人就绝无活路。

第十五节　朱元璋毒辣对付出轨女人

据说,朱元璋对女人的管理很严,甚至残酷;对于出轨的女人,手段更是毒辣而残忍,一旦发现身边的女人不忠,必置其于死地。

虽然朱元璋与马秀英两人之间感情极好,这并不是说朱元璋的后宫生活就不丰富,朱元璋也是男人,是男人就喜欢美女,他性生活同样出色。

《明会典》称,太祖朱元璋有40个妃嫔,只有2个妃子葬于陵的东西两面,其余俱从葬。又有史书称朱元璋有46个嫔妃。不论哪一个数字正确,至少可以证明朱元璋死前碰过的女人不低于40名。

《国榷》中记载,朱元璋有昭敬充妃胡氏、成穆贵妃孙氏、淑妃李氏、安妃郑氏、庄清安荣惠妃崔氏、安妃达氏、硕妃、宁妃郭氏、惠妃郭氏、顺妃胡氏、郜氏、韩氏、余氏、杨氏、周氏、贵妃赵氏、贤妃李氏、惠妃刘氏、丽妃万氏,等等。

朱元璋对女人管理很严,甚至很残酷。一旦发现身边的女人对他不忠,或有红杏出墙之嫌,那必死无疑。民间有一种说法,朱棣非马皇后所生,其母亲是硕妃。硕妃怀孕不足月便产子,生下朱棣后,硕妃便受铁裙之刑惨死。

铁裙刑是中国古代男人惩罚不忠女人的一种酷刑:将铁片做成刑具,形如裙子,逼犯人穿到身上,然后把裙子放在火上烘烤。刑具受热,犯人的皮肉如被烙铁烙在身上,其惨状不可想象,结果可想而知。

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对待自己早产的女人?原来朱元璋怀疑她与人私通怀孕。当然,朱棣生母之死只是一种民间传说。但是,从中透露出朱元璋对待不忠女人的态度,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第十六节　朱元璋与美食的传说

明太祖朱元璋不仅上得朝堂,而且还下得厨房。如今,我们身边的许多饮食都与这位皇帝有关。

朱元璋出身布衣,小时候生活非常贫苦,被迫出家当了和尚。有一次,他的家乡闹饥荒,他接连三天都没有吃饭,眼看就快饿死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

给了他一碗汤，朱元璋喝了之后感觉非常美味，便问老婆婆这汤叫什么名字？老婆婆随口调侃说这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其实就是由碎米粒儿（珍珠）、白菜帮子、菠菜叶子（翡翠）和豆腐（白玉）做成的菜汤。因为朱元璋当时饥饿难耐，觉得这汤非常好喝。据说，他做了皇帝以后，也常让御厨给他做这种汤喝，忆苦思甜。

朱元璋发明了我们在夏天经常喝的"酸梅汤"。元朝末年，朱元璋曾是个卖乌梅的小商贩，那时瘟疫横行，朱元璋也不幸被感染了，一病不起。当他挣扎着去库房取乌梅时，忽然闻到了乌梅的阵阵酸气，马上感觉精神振作了许多。于是，他以乌梅为主料，搭配山楂、甘草两味中药加水煮成汤，每天服用，过了几天，他的瘟疫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从此，朱元璋改卖可以祛除瘟疫的酸梅汤，人们纷纷购买，朱元璋也得以迅速致富，为他后来起兵反元奠定了经济基础。朱元璋称帝后，仍对酸梅汤情有独钟，常喝酸梅汤清除体内油质，益气安神，酸梅汤也成了明朝宫廷里的日常养生保健饮品。如今，酸梅汤行业更把朱元璋奉为祖师爷，在不少酸梅汤专卖店里大都有朱元璋的画像。

烤鸭原本起源于南京，这也与朱元璋有关。朱元璋称帝后定都南京，他酷爱吃鸭肉，但水煮、红烧、清蒸的鸭子吃多了便觉得腻烦，整日闷闷不乐。宫廷御厨们绞尽脑汁，改变了传统烹制方法，采用果木炭火挂炉烘烤，使鸭子肉质细嫩、肥而不腻，被朱元璋命名为"烤鸭"。朱元璋死后，他的儿子燕王朱棣用武力夺取了帝位，并将都城迁到北京，烤鸭技术也随之传到北京，并得以进一步发展。

第十七节　朱元璋的宫膳

朱元璋打天下，历尽艰辛。他做了皇帝后规定，每顿饭必有粗菜，让后来的皇帝们"知外间辛苦"。这成为明朝的一个家法，也是明朝宫膳制度中最有特色的地方。

朱元璋每顿饭都上一个豆腐，以表明自己不忘贫苦出身。但是，到了他的子孙们辈时，这每顿必有的豆腐就变味了。

清代吴骞《拜经楼诗话》讲述了一个明代宫廷豆腐的故事。故事说，京城各官署中，翰林院是清水衙门，平常清汤寡水。皇帝如到别的地方赴宴，翰林们就向光禄寺索要剩下的御膳，以改善一下生活。有一天，皇帝去赴宴，众翰

林纷纷去讨皇帝的剩饭。一个年轻的翰林去晚了，只端回一盘豆腐，大为懊恼。一个后来的老翰林知道了，十分高兴，连喊“拿酒来”，然后大快朵颐而去。原来这豆腐其实并不是豆腐，而是用几百只鸟的脑髓做成的。原来，朱元璋死后，其后代们虽然保持了顿顿上豆腐的家风，其实那些豆腐的原料已经不是豆子，而换成了鸟的脑髓。

朱元璋的忆苦饭，最后都成为徒有其表的摆设，其功效是一点也没有的。但把这些粗菜、豆腐与宫廷御膳的巨大花费相比，则更加具有讽刺性。

明代宫廷可谓全世界最大的食材店和餐厅。御厨每天要准备1万～1.5万人的伙食。专门负责宫廷饮食的组织，就有光禄寺、尚膳局和尚食局。只光禄寺一个机构的皇帝御膳食材采购人员和厨师的编制人数，宣德朝是9462人，后来一度降到5000人，到了成化年间又增长到6884名。

宫廷所有的人最根本的服务对象是皇帝、皇后、妃嫔和皇子皇女们，但在宫里服务皇帝等人的太监、宫女等也要吃饭。这么多的人吃饭，伙食费肯定也是一个大数字。宫廷御膳费用的准确数字现在几乎无法计算，一年花百万两银子用于吃喝也是有可能的。

明朝灭亡后，有宫女谈到皇帝的伙食费标准，说皇帝一天的标准是3000两银子。根据历史的一些记载，崇祯皇帝的伙食费是每天36两银子，皇后是每天11两半银子，这些都不包含原料费。皇帝一个月的伙食费是1046两银子，可以买大约6万千克大米，可以让4000人吃一个月。

皇帝一个人的伙食费如此之多，就算餐桌上摆放一些豆腐、野菜之类，又能证明什么！

第十八节　朱元璋的小金库

在封建社会，整个中国都是皇帝一个人的。为了花钱的方便，皇帝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内库。历朝历代都有内库，到了明朝，内库被称为内承运库。

明代的内库始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对待内库的态度是前后矛盾的。起初，朱元璋并不想设置内库。他认为，皇帝享有四海，理应不屑于为了积蓄私财而设立内库。他还批评宋太祖赵匡胤设内库是有失贤明的错误举措。在朱元璋看来，宋太祖设立私人库藏，存私房钱，很小家子气。但朱元璋

为何食言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内库尽显皇帝的权威，对朱元璋来说很是受用。二是朱元璋是位很自信的皇帝，他出身于布衣，对民间疾苦有切身地体会，对官员的各种小心思看得透彻，他甚至认为，天下的事没有能够瞒得过他的。所以，朱元璋就设立了内库，并将其功能定位于“天下为公”。朱元璋认为，设置内库并辅以必要的制度，既能消除宋内库的弊端，又可以在彰显唯我独尊的同时很好地为国家服务，且能显示他的治国才华……可谓一举数得。

事实上，洪武一朝的内库也确实按朱元璋的本意，大致遵循了“天下为公”的理念，其作用也主要是用于“出财”而非敛财，其中较为常见的是赏赐、抚慰百姓和臣子。

按照朱元璋的理想，内库是国家性质的，相当于“国家基金”，其支出用途主要是供国家物质性表彰、荣誉性赏赐或者成为表现皇恩浩荡的“福利”而福泽万民。

朱元璋自以为找到了一个两全的方法解决内库和军国社稷的矛盾，通过内库“天下为公”的定位，而实现既能使皇帝享有蓄私财的特权，又不至于过度加剧社会矛盾，使社会关系处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上。而且，他认为自己给后世子孙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并坚信这种惯例可以延续下去。

朱元璋的愿望是好的，但也是不切实际的。尽管他在设立内库时，主要考虑的是将内库所藏作为国家财政的一种有效补充和周济。事实上，内库不论在何时都储藏着缎匹、金银、珠玉、象牙等奢侈品，这就不可避免地打下了一种奢靡的基调，为后世子孙的敛财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明太祖使用特权是为了彰显个人魅力、治理国家。那么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就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滥用特权了。朱元璋的那些子孙最喜欢做的就是默许、放任臣子为内库聚敛钱财。他们将挪用国库银到自己的内库视为常态。他们无限扩大和利用了内库的特权，肆无忌惮地盘剥百姓，侵吞国库银，使得明王朝越来越趋向衰败，朱元璋的理想随之灰飞烟灭。

第十九节　朱元璋把祖陵葬水底

1963年，位于江苏省盱眙县的洪泽湖遇到了特大干旱，水位下降后一批大型石像露出水面，这些石像被雕塑成麒麟、雄狮、带鞍子的马和牵马侍从、文

臣、武将、太监等形象。根据专家的研究，被确认为明祖陵，此时距明祖陵成为水下皇陵已整整近300年。

明祖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高祖、曾祖的衣冠冢及其祖父的实际葬地。明祖陵所在的位置并不理想，它并不处于高山大阜之侧，而是在有“九岗十八洼”之称的丘岗之地。明祖陵四周除了一片水洼之外，并无多少妙贵可言。

朱元璋之所以把祖陵设在此处，是因为这是他祖父的实际葬地所在，如果要移墓，势必会泄了王气，影响大明江山社稷。为了解决风水欠佳的问题，在当年筑陵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地理改造，填埋洼地，补修不足，挖地成河，堆土为山，人工造出了砂、水、近案、明堂等风水要素必具的景观，这才形成了一块标准的风水宝地。

到了明弘治七年(1494年)，刘大夏筑太行堤阻断黄河北支，使南支夺淮入海后，河道开始紊乱，淮河中、下游连年洪水泛滥，明祖陵不断遭受水患。明万历年间总理河道的工部尚书潘季驯提出了“蓄淮刷黄”的治水方略。他主张筑堤纳水归于一道，反对疏浚支流另开新河，而应当“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借水攻沙，以水治水”。他的这一治水方略，省钱省力，省人省心，因而很能打动人心，并且最终取得了明神宗的支持。

可惜，无论怎么集淮河水之力也不敌滔滔黄河水。清河口很快就泥沙高淤，靠近这里的淮河河床也被黄水倒灌而增高，这又使淮河水的冲击力减弱，遇阻即回，沙随波停，淮河水所带泥沙又在清河口停淤。淮河水无力刷黄，又无法从清河口入海，而入湖故道又尽筑高堰，淮河水不得不上溢泛滥，最终淹没了明祖陵。

潘季驯的治水方针在实践中行不通，照理应当重新检点，这时如果改弦更张，尚为时未晚。可惜这时候治水方略已成了庭争的工具，成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与权威的武器，为此他不仅革除了反对意见的阻挠，而且甚至编造谎言，说祖陵“松柏之郁茂，护沙之如故”。到了万历二十年仍然上疏坚持自己的主张，把分流之议列为病议，痛加指陈。这就注定了明祖陵要到水下沉沦300多年。

按常理说，朱元璋的祖先们既然被追尊为皇帝、皇后，其葬处就应该建陵，并应依制建造帝陵建筑。但根据历史记载，朱元璋在洪武初年只追加封号，没有营建祖陵建筑，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历史原因呢？原来朱元璋少时家贫，居住地一迁再迁，使他根本不知道其三代祖考的确切葬地。因此，他为寻找祖陵葬地颇费了一番周折。

根据史料记载，朱元璋经过回忆，想起他二姐曾说过祖父的坟墓在泗州旧陵嘴一带，但具体位置已无从考察。到了洪武十七年(138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使朱元璋弄清了祖陵的真实位置。话说朱元璋的同宗朱贵向朱元璋说过，他祖父与朱元璋的祖父一起从朱家巷迁到了泗州城北的孙家岗，通过回乡查访，朱元璋终于知道了自己祖父母葬在泗州城北的杨家墩。

朱元璋祖上几代非常穷困，四处漂流，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他的祖父朱初一在60多岁时流落在古泗州境内，为双沟镇一个姓水的财主家放猪。这水员外号称“水半湖”，双沟东去印里洪泽湖边全是他家的地。朱初一带着全家搭个窝棚，就住在湖边孙家岗为水财主放猪、垦荒，以维持生计。这孙家岗庄后面有个墩子，人称“杨家墩”，墩上有个凹窝。一年深秋，在这里放猪的朱初一躲在墩上的凹窝内避风，意外得知这座山背山面水，后面青山雄壮葱郁，前面洪泽湖宽广博大，是一块龙脉，谁死后葬在这里，谁的后世就一定有人会出皇帝。老人欲将此地占为己有，从此隐藏了这个秘密，即使对家人也没有透露，直到临死前才告诉了儿子要把自己葬在这里。

朱元璋登上皇位后，朱氏坟冢葬于龙脉的传说很快就流传开了。先是从洪泽湖畔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地像水银泻地般地遍布全国。这是一种明显的穿凿附会，朱元璋为什么要创造这样一个传说呢？这和他的出身有关，他的帝位是由自己和众兄弟从最低层打下来的，他并没有显赫的家世。历史上开千古帝业的几乎都比他这个放牛的、打扫庙院的和尚强。为了给自己的登帝塑造天地之功，证明自己是天意所授，标榜自己血统是天之相承，朱元璋最终也只能把自己的老祖宗请出来进行一番神化宣扬。

朱元璋为了表示对祖先的推崇和孝敬，更为了向天下显示皇家的威严，就在依稀寻到的埋有祖父的小山包前建造规模宏大、尽显皇家雄壮气派的祖陵，将其曾祖父、高祖父、祖父的遗物一起葬在了这里。

第二十节　朱元璋墓葬之谜

据历史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初九死亡，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十六日下葬。

堂堂一位开国之君，死后几天就被下葬了，很多分封在外地的王子都没有

赶回来。朱棣在听说侄儿朱允炆把朱元璋匆匆埋了后十分恼火。朱棣以为父亲奔丧为名，要找朱允炆讨说法，这为以后篡位找到了第一个理由。

朱允炆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速葬"了朱元璋呢？有史书上称，这是朱元璋自己选择的时间。而秘史更称，朱元璋担心自己死后出乱子，留下遗言要朱允炆从速办自己的丧事。朱允炆在即位的前一天，即闰五月十五日就把朱元璋下葬了。

而从天气的角度考虑，速葬朱元璋也不无道理。南京素有"火炉"之称，闰五月时已是夏天了，气温已经很热了。如果不尽快埋了，尸体就会腐败。

传说，朱元璋下葬那天，南京的 13 个城门同时出殡。他这样做是为了干扰视听，防止有人盗墓。在葬后不久即传出了朱元璋没有葬在孝陵，而是独葬于朝天宫。

朝天宫，宋代时为"天庆观"，元代叫"元妙观""永寿宫"，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改为"朝天宫"。朝天宫在城里，速葬起来很方便；如果葬在孝陵内，就没有必要搞假象。但后世好多学者都不信。

清朝文人甘熙认为，朱元璋花了几百万两银子、造了十几年的陵寝，不可能是只为马皇后一个人造的。而且，朱允炆是一个很讲孝道的仁义皇帝，也不忍心把朱元璋葬在陵外的地方。

后来又传出，朱元璋没有葬在孝陵，也没有葬在朝天宫，而是葬在了北京的万岁山。后经考证，这个说法不可信。如果真是这样，朱棣造反的第一理由又从何而来？

朱元璋到底是否真的葬在孝陵内？现在并没有学者能够十分的肯定。相关专家经过数年的科学探测、考古，证明明孝陵地宫未曾被盗，完好无损。专家在宝城内采用无损磁测法，已经明确发现在宝顶地下深处有一个面积达数千平方米的建筑空间，而且找到了进入这个空间长达百米的墓道走向和入口，无疑宝顶下存在的这个巨大建筑空间只能是明孝陵的地宫，而地宫的入口就在明楼东侧十几米处现呈下沉错位、有裂口的宝城城墙下面。

但这并不能证明朱元璋的尸骨就在地宫中，真相恐怕只有等到开挖明孝陵的那一天才能最终揭开！朱元璋到底葬在何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是一个谜！

第三章　永乐大帝朱棣

第一节　朱棣尴尬的身份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七日,朱允炆的亲四叔、以“清君侧”为名起事的燕王朱棣夺权成功,正式登基称帝,次年改元永乐。从此,官方记载中少了一位温文尔雅的惠帝,多了一位雄才大略的成祖。

史书记载,朱棣在登基之前,心里充满了期待和忐忑。

四年前,即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初五日的凌晨,朱棣正式扯起了“靖难”的旗帜,宣布废除建文年号,改称本年为“洪武三十二年”。从这一刻起,他真正地感觉到自己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只能胜利的道路。

朱棣起事不久,北京城的四周要塞都被朝廷派来的10万重兵把守,而朱棣只有燕王府的800名亲兵,双方实力悬殊,无法武力对决。对此,朱棣的策略是阴谋加闪电出击。

七月初四日下午,朱棣用计将领兵包围王府的张昺和谢贵骗入王府斩杀,府外守兵群龙无首。五日凌晨,朱棣果断起事,命手下大将张玉和、朱能迅速出动,一夜之间占领了九门,城内明军纷纷投降。到了第二天,北京局势大定。

八月十二日,洪武朝唯一一位躲过朱元璋屠杀的开国宿将耿炳文率领30万大军北上平叛。出师才一个月,就兵败定城。十月,建文帝用李景隆代替耿炳文领兵50万再次去平叛,结果又失败了。到建文二年五月时,水陆重镇德州失守,城内百万石粮食及无数兵器尽为燕军所得,明军一败涂地。

在此期间,朱棣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对战争的判断、分析和决策水平毫不逊于其父朱元璋。而南京城内的朱允炆则多谋寡断,毫无权谋之术。他在关键时刻识人不明,竟任命朱棣的心腹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让其监视朱棣,实则是与虎谋皮;他在出征前还告诫将士“毋使朕有杀叔父名”的妇人之仁,绑自己人手脚,授敌人于盾甲……失败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

朱元璋独特的集权方式，造成了他死后朱允炆的窘迫局面。他几乎杀光了一切可能会危及他及其子孙权力的文臣武将。无论是同起草莽、忠心耿耿的元勋，还是计定乾坤、辅国佐君的良臣，或者能征善战、勇冠三军的宿将，都被他除尽。他还收回了一切尽可能的权力，集中在帝王手中。因此，当他死后，等到建文帝即位时，身边竟然没有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文武英才。

朱元璋机关算尽，预防了一切外人，却唯独没有防到萧墙之祸。他精心打造的拱卫帝室的防火墙，却将武器对准了自己钦定的接班人。

朱元璋偏执地认为，只有朱家的直系亲属，方可以分享权力。所以，他自己的子孙后代们无论是否出过力，都可以被封王。朱元璋对子孙的封王是实封，亲王不仅拥有自己的领地，还有属于自己的军队，是实实在在的小国王。朱元璋不惜一切分封权力，目的是打算依靠这些藩王来帮助自己“皇图永固”。

朱元璋的设计固然巧妙，但他完全忽视了一点，即诸藩王有无个人野心，那些拥有重兵的亲王们是不是永不眼红皇位。

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之前，朱元璋健在时，藩王们还能老老实实地守在自己的领地上。可是朱元璋死后，新皇帝年仅 22 岁，并且他还是一个文雅、浪漫、充满理想主义的书生。这就不能不使那些在各自王国里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雄心万丈的叔父藩王们心潮上涌了。

建文三年（1401 年）十二月，朱棣第四次出师南下。这一次出师，他一如既往地发挥着自己高超的战争智慧，并取得了最终胜利。

在此之前，朱棣在山东屡屡被南军大将铁铉和盛庸顽固纠缠。于是，他决定绕道山东，逼近徐、淮，直扑南京而去。

建文四年（1402 年）五月二十日，扬州城不战而降。六月十三日，把守金川门的谷王朱橞和李景隆开门投降，南京沦陷。

南京城破后，皇城已禁闭。此时，朱棣并没有决定立即攻城，而是将燕军退驻金川门，并且递书给建文帝。朱棣希望朱允炆能主动逊位或者自裁，这样他就可以避免背上杀侄的罪名。但朱允炆的答复却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当朱棣看见皇城内的火光时，他已明白让朱允炆自动逊位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他还心存幻想，急忙派兵救火，以确定朱允炆的生死。然而，朱棣并没有找到朱允炆。

第二天，投降的朝中文武及诸王纷纷以个人名义上表请求朱棣即位。朱

棣反复推让之后，于六月十七日举行了登基大典，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永乐大帝。

从战争结束那一刻起，朱棣就尴尬地发现，虽然自己赢得了战争，却并没有受到欢迎、拥戴和臣服。

靖难之变不过是一次皇族内部统治者之间争权火拼的事，不论谁做皇帝都与老百姓无关，大家为何要抵制朱棣呢？道理很简单，不过是伦理纲常而已。按照儒家弘扬的理念，朱棣不是胜利的英雄，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谋权篡位者。人们不可能情愿放下万古长存的道义而服务于一个篡位者。

还有一个原因，则可能是建文帝朱允炆的“贤德”所致。

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朱允炆在任内推行了一系列大受百姓欢迎的新政，如将全国的田租减免一半、取消江南重税、裁汰政府冗员等，极大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他还宽刑律，一改朱元璋时期“重典治国”的策略。后人将朱允炆的四年之治比作“阳春”。

反观朱棣上台前后的残暴，他不被人接受是必然的。因此，朱棣上台后，大多数忠于建文帝的官员纷纷选择了弃官、隐退、逃亡甚至殉道等方式来表达对新皇帝的不认可，这种局面一度让朱棣措手不及。

方孝孺是明朝开国功臣宋濂的得意门生，建文帝时期又是朱允炆的老师和首席顾问。他在士林中的声望极高，被天下读书人视为楷模。基于此，最后一次出征前，朱棣的军师姚广孝曾深谋远虑地叮嘱朱棣，无论如何都不能杀方孝孺，杀了他，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

南京城破后，方孝孺被捕。朱棣记着姚广孝的话，同时想借助方孝孺的名望让他为自己草拟即位诏书，从而让整个士林对他皇帝身份的合法性予以承认。面对朱棣的要求，方孝孺投笔于地，不给朱棣草拟诏书。结果朱棣大怒，命人将其磔于市，并灭其十族、杀 873 人。

方孝孺的拒绝让朱棣彻底明白了，受过正统儒家教育的士人们绝不会轻易接受的，只有通过屠杀，才能使那些士人迅速扑倒在他的脚下。于是，他放弃了讲理，再一次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于是，整个永乐元年都在血雨腥风、毫无节制的大屠杀中度过。朱棣要用自己的行为告诉别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朱棣登基以后，尽管对文人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酷刑以及极其歹毒的身心摧残，但朱棣知道，单靠这些仍然远不足以平弭朝野上下乃至后世的非议。


朱棣

他要做的是一步步从根本上彻底毁灭一切“篡位”证据，让一切对自己“非法性”的异议结束。

朱棣首先是焚毁历史，然后再伪造历史。史载，在朱棣的授意下，一大批人专职“焚史”一事，千方百计、不惜一切地销毁了建文朝的文字记录，致使到最后建文朝史事只字不留。与此同时，为防“怀疑怨谤”，他还下旨严禁民间谈论或书写建文时期的历史，如果被发现，即灭九族。

朱元璋的《明太祖实录》在建文帝时期已经修过，但是朱棣上台后并不满意。他要把所有有利于朱允炆的记述都删减干净，然后再添加进去自己的辉煌形象，以显示自己才是朱元璋钦定的接班人。

那部世界上块头最大的《永乐大典》真正的出身是朱棣名为搜集古今文献，实为彻底消除不利于自己的历史资料，是企图永远掩盖其篡位事实的工具。

朱棣通过种种手段牢牢控制了“史者”的操守和气节，然后摧残他们，收服他们，进而通过他们操作历史。控制了历史之后，朱棣的第二个手段则是制造白色恐怖。

害怕世人的非议成为朱棣一生的噩梦。他担心在某个隐蔽的角落，有人会对他“念念有词”，有人在对他进行抵制。他异常恐惧地认为，若是不加控制，这些人总有一天也许会慢慢汇聚起来，变成一股能够正面冲击他的力量。

为防止抵制他的力量壮大，朱棣认为自己必须先发制人。他命令兵部发布公告：不准百姓“疑惧”，更不准在背后议论，否则就是死罪。为了彻底防止人们对他非议，他还鼓励民间百姓相互揭发。朱棣还重新起用了锦衣卫，恢复其刑侦职能，只要是锦衣卫认为某人不法，即可直接投入诏狱定刑定罪，甚至还可以只要皇帝同意，便可越过法律程序将人犯直接处死。

对于疯狂地想要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帝王来说，这些手段是有效的。

第二节 朱棣迁都秘史

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的一天深夜,北京城突然风雨大作,夹杂着阵阵惊雷。新修成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座大殿因雷击起火,化为灰烬。

朱棣心中顿时升起不祥之感。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天人合一这一哲学命题,被强调到绝对的地步。地震、灾害、雷击等自然现象,都被看成是执政者的失误而带来的。"上天示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朱棣立刻下诏,希望朝野明智之士能够为他找出雷击三大殿的原因。很快,礼部主事萧仪的奏本就被送到了御前。他认为,三大殿遭受雷击是因为迁都的缘故,把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不但诸事不便,就连大明的皇脉也撂在江南,这是大不敬的事。

朱棣看过奏本之后,异常震怒,他认为萧仪把迁都与雷击三大殿联系起来,完全是蓄意诽谤。于是他立刻命令锦衣卫将萧仪抓进北镇抚司大牢,不作任何审讯,就以"谤君之罪"处以极刑。

在官员中,同情萧仪的官员多半是科道言官。科道言官专门弹劾不法权贵,历代皇帝对言官颇为倚重。言官们就事论事,认为朱棣迁都有伤国体。朱棣对这些言官非常恼火,就让这些科道言官与部院大臣一起到午门外跪下对辩。迁都究竟好不好,让双方各抒已见。

当时正值清明时节,天下大雨。言官与大臣在午门外的广场上分跪两边,虽然他们全身都淋得湿透了,依然争论得面红耳赤,当天没有争论出结果。朱棣让他们第二天再来午门下跪辩论。第二天,雨还在下着,朱棣在城楼上看着。官员们冒雨下跪,不依不饶地争论着。

朱元璋创立的大明王朝,虽然定都南京,但从一开始,朱元璋就觉得南京不太合适作都城。因为它偏安江南,对控制辽阔的北方十分不利。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了一个诏书,以金陵(今南京)、大梁(今开封)为南、北京。朱元璋觉得自己年事已高,完成不了首都北迁的任务,便将希望寄托在懿文太子身上。谁知懿文太子早亡,定都关中的计划落空。

朱棣夺取帝位后,将首都迁到了北京。

朱棣迁都北京,有两个原因。一是北方虏患不绝,建都在北京,便于就近

制御。二是由于“靖难”之役，朱棣在南京杀人太多。建文帝的支持者多半是江南士族，朱棣对他们大开杀戒，结怨于江南，继续在南京做皇帝，已经失去了执政基础。因此他从取得皇位的那一天起，就有了迁都的打算。

从永乐七年(1409年)开始，朱棣就让太子留在南京监国，自己经常到北京居住。当时的情况是南京仍作为首都，而北京则成为行在。实际上，早在永乐四年，朱棣就开始了北京的建都工作。

据传，明北京城及皇宫的设计者是姚广孝，总工程师是蒯祥。姚广孝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扩建和改建北京城。他按照儒家的观点，把北京建成了一座方城，而皇城则在方城的正中央。

北京城的建设整整进行了15年。这期间，为配合迁都，朱棣从江南各地向北京大量移民。他还疏通运河，打通南北的运输干线。这样解决了北京的财赋供给与人口问题。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朱棣发布了迁都的诏令。迁都最初的几年，围绕该不该迁都的问题一直争论不断。朱棣为了压制反对派意见，杀过几个人，包括前面提到的萧仪。

自从萧仪死后，朱棣再没有为迁都的事而杀人。这是因为那次雨中跪辩，所有的部院大臣与科道言官都看清了朱棣的决心:迁都不容置疑，哪怕上天震怒，再雷劈十座奉天殿，朱棣也绝不会把都城搬回南京。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朱棣死亡。他的儿子仁宗继位，次年改元洪熙。仁宗登基之后，决定把首都再搬回南京，但仁宗在位还不到一年就死了。仁宗的儿子宣宗继位，宣宗喜欢北京，于是做出了暂不迁都的决定，其实宣宗根本就不想迁都。

第三节　朱棣五征漠北真相

明成祖朱棣即位时，蒙古已经分裂为兀良哈、鞑靼和瓦剌三部，他们各自为政，其中以鞑靼的实力最强。

兀良哈部散居在辽河、西辽河、老哈河流域一带，靠近中原，实力相对比较弱，在朱元璋一朝时就已经内附中原。明太祖朱元璋在兀良哈部设立朵颜三卫，归宁王朱权统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宁王朱权被朱棣挟持，部下兵马

都并入燕军。在朱棣夺得皇位的过程中，精悍骁勇的朵颜三卫骑兵立下了赫赫战功。朱棣为了报答兀良哈朵颜三卫的帮助，承诺把宁王朱权的封地大宁转封给三卫的部落首领。但朱棣当上皇帝之后，很快决定要将明朝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大宁的地理位置就显得相当重要。所以，朱棣迟迟没有兑现当初的诺言，由此招来朵颜三卫部落首领的不满，埋下了祸根。

鞑靼部以和林为中心，活动在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以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势力最强，是明朝的主要威胁。瓦剌部主要驻牧地在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其以南的准噶尔盆地附近。

北元自脱古思帖木儿（元顺帝之孙）统治后，继位称帝者有恩克卓哩克图、额勒伯克、坤帖木儿三代，他们在名义上保持了元帝国的正统。永乐元年（1403年），鞑靼别部首领鬼力赤篡夺了北元帝位，废除了元朝的称号，改国号为鞑靼，自称为鞑靼可汗。

鬼力赤改称鞑靼可汗以后，鞑靼内部以及蒙古各部落之间的纷争加剧，进入白热化的状态。当时鞑靼内部有太师右丞相马儿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孙台、太保枢密知院阿鲁台等势力，这几种势力相互角斗。鬼力赤自立为鞑靼可汗后，瓦剌部首领猛可帖木儿很不服气，更是自称"瓦剌王"。鞑靼可汗鬼力赤同时面临着内忧与外患。不久，瓦剌部猛可帖木儿和鞑靼部阿鲁台联军共同夹攻鬼力赤。阿鲁台杀死鬼力赤后，拥立坤帖木儿的弟弟本雅失里为鞑靼可汗。阿鲁台自任太师，大权在握。

明成祖朱棣即位时，中原刚刚结束靖难之役，真心希望北部边境安定，便积极派遣使者与鞑靼修好。但鞑靼忙于内讧，对此没有任何回应。阿鲁台掌权后，断绝了与明朝的一切往来。朱棣见鞑靼与瓦剌互相仇杀，而鞑靼势大，便想利用瓦剌来牵制鞑靼。刚好瓦剌也希望取得明朝的支持，在朱棣即位后不久，便派遣使者前来朝贡。之后，明朝与瓦剌之间的使者不断往来。

永乐元年（1403年），鞑靼阿鲁台进攻瓦剌，被瓦剌部的马哈木打败。阿鲁台听说马哈木与明朝通使之后，十分担忧和恐惧，也派使节与明朝通好，朱棣自然很高兴。

永乐七年（1409年）四月，明朝派使臣郭骥到鞑靼本雅失里处通好。为了表示诚意，还将以前明军俘虏的本雅失里部属全部释放。但这次出使没有成功，明使臣郭骥被鞑靼杀害。六月，郭骥部分随从从鞑靼逃回，向朱棣报告了郭骥被杀的消息。朱棣听后十分愤怒，决定对鞑靼用兵。

朱棣担心瓦剌与鞑靼联合，就事先进行了大量分化瓦解工作。当时瓦剌部首领猛可帖木儿已死，瓦剌部由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三首领控制，势力日盛，而且与鞑靼阿鲁台素来不和，经常互相仇杀。朱棣为了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另派使臣到瓦剌部封赠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想利用这三部削弱和牵制鞑靼的势力。自此，明朝、鞑靼和瓦剌相互间展开了长期的外交和战略上的斗争。

永乐七年(1409 年)七月，明成祖朱棣派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总兵官，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为副总兵，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为左右参将，率精骑十万北讨鞑靼。然而，丘福急功近利，冒险轻进，中了鞑靼的埋伏。双方在克鲁伦河北岸激战，丘福被杀，明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少数人逃回。朱棣闻讯后十分恼怒，剥夺了丘福的世袭爵位，将其家属全部流配到海南。

丘福率领的明军打了败仗之后，朱棣认为诸将无一能任，决定亲征。永乐八年(1410 年)五月，朱棣经过周密准备，亲率 50 万大军北进至斡难河，与本雅失里遭遇。在此地，明军击溃了鞑靼主力军，本雅失里只带着七名随从仓皇向西逃遁。

六月，明军在回师途中遭遇阿鲁台部。明军的火器优势在此战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明军所使用的神机铳，每矢可毙敌二人。众铳齐发，声震数十里。鞑靼军无不惊恐万分，急忙逃跑。阿鲁台部大多溃散。此时，天气炎热，明军已经饥渴交加，于是朱棣下令收兵。

经此一役，鞑靼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本雅失里逃往瓦剌。阿鲁台不得不派遣使者向明朝贡马，表示通好之意。朱棣将洪武年间捕鱼儿海一战中俘虏的阿鲁台兄长和妹妹送归，阿鲁台对此十分感激。

本雅失里和阿鲁台被朱棣第一次亲征打败后，鞑靼实力大为削弱，瓦剌却日益强盛起来，时常骚扰明朝边境。永乐十年(1412 年)，瓦剌部马哈木杀死本雅失里，吞并了鞑靼的西部，立同族人答里巴为可汗，大权掌握在马哈木手中。朱棣封阿鲁台为和宁王，使其有能力与瓦剌部马哈木对抗。马哈木对此相当不满，对明朝的敌对情绪越来越严重。

永乐十二年(1414 年)，瓦剌部马哈木等进兵饮马河，宣称将攻打阿鲁台。朱棣闻讯后，又亲率大军出塞进行第二次北征。六月，明军与瓦剌三部主力军会战于忽兰忽失温(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这场战斗十分惨烈，交战双方损失相当，直到傍晚瓦剌军才败走。明军两度越过高山，一直追击到土剌河(今

蒙古国境内的图拉河)。次年,瓦剌遣使卑辞谢罪。

此后,鞑靼和瓦剌互相冲突,明朝采取双方离间政策,有时乘机出兵助弱抑强。朱棣又在永乐二十年(1422 年)、二十一年(1423 年)、二十二年(1424 年),三次亲征蒙古,使漠北蒙古各部间保持势力均衡,借以减轻边防上的威胁。在第五次亲征的归途上,明成祖朱棣病死于榆木川的军营里。

完全可以想象,在成祖一朝的 20 多年的时间里,明朝千万人民被征调在铁马金戈的劳役下,付出了多少鲜血,染红了广大的沙漠和草原,才保持了北边国防上的相对优势。

第四节　谁是朱棣的生母

史学界对朱棣的生母究竟是谁一直争论不休,正史加上野史、秘史,朱棣的生母有四个版本,分别是马皇后、高丽李氏、元顺帝妃洪吉喇氏和蒙古女子翁氏。

认为朱棣的母亲是马皇后的说法,最为广泛。

在清人朱好阳编纂的《历代陵寝备考》中记载,朱棣是朱元璋与马皇后所生的第四个儿子。这一说法,来源于明朝当时的史书,如《太祖实录》《太宗实录》《靖难事迹》《玉牒》等。朱棣更是亲口说过,他的母亲是皇后马秀英。

但也有秘史称,马皇后没有生育能力,包括太子朱标、燕王四子朱棣在内,她的几个儿子都是别人所生。马皇后把别的妃子所生育的孩子据为己出。

认为李氏是朱棣生母的说法,有不少人很相信,并认为证据很充分。

《南京太常寺志》上记载:“孝陵祀太祖高皇帝、高皇后马氏。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左二位皇妃,生楚王、鲁王、代王、郢王、齐王、蜀王、谷王、唐王、伊王、潭王;左三位皇贵妃,生湘献王、肃王、韩王、沈王;左四位皇贵人,生辽王;左五位皇人,生宁王、安王;右一位硕妃,生成祖文皇帝。”

太常寺为皇家机构,《南京太常寺志》自然是官方文字,其记载有很高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国内很多历史学家都深信朱棣的生母为“硕妃”李氏。硕妃是为高丽(现在的朝鲜)选送给朱元璋的女子。当时因为李氏尚未到预产期,朱棣便出生了。

朱元璋遂怀疑李氏与人私通，于是龙颜大怒，将碽妃活活折磨死了。

朱棣知道自己的生身之事，在即位之后，于永乐十年（1412 年）在南京重建大报恩寺塔，以报答生母碽妃。

但事实上，朝鲜向明朝称臣送贡女是在 1365 年，而史书上明确记载朱棣生于 1360 年，其时朱棣已 5 岁了。根据这种推测，朱棣的生母是李氏的说法也不可信。

朱棣生母是元顺帝妃洪吉喇氏的这个说法，可上溯到朱元璋未称帝前。

在至正年间，朱元璋跟随郭子兴起兵反元，郭子兴病死后，朱元璋取而代之，南征北伐，先占领集庆（今南京），后又攻下大都（今北京）。元顺帝看大势已去，遂弃大都，退守蒙古。朱元璋入城后亲临元顺帝后宫，落难人群里有一位美女姿容姣美、眉目含情，顿时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遂收她为妃子。这个女子就是元顺帝的第三位妃子格勒德哈屯，她是元顺帝洪吉喇托太师的女儿。

早在朱元璋攻占北京之前，洪吉喇氏已怀孕七个月，元顺帝出逃时，不方便带上她。两个月后，洪吉喇氏生下了一个儿子，此即朱棣。

据说，当时朱元璋知道此子不是自己亲生，并不想认这个儿子，但看到朱棣相貌不凡，朱元璋就喜欢上了，并认下这个儿子。

民间对这种说法传得神乎其神的，而朱棣与其他几个兄弟长得确实不一样，一点也不像朱元璋，这也加大了这种猜疑，民间据此称朱棣是蒙古人。但史上记载，大都失守是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而朱棣生于至正二十年（1360 年），时间相差八年。因此，这种说法也不可信。

与洪吉喇氏一样，翁氏也是蒙古女子，也是元顺帝的妃子。但民间之所以还有翁氏一说，可能是“洪”“翁”译音上的相似而以讹传讹。

刘献廷所著的《广阳杂记》称，朱棣不是马皇后生的儿子，他的母亲是蒙古人翁氏，因为曾是元顺帝的妃子，所以史书上不方便提这事。但朱棣没有忘记这位蒙古生母，而是在宫中另外建庙，供奉她的牌位，让世世代代纪念她。

刘献廷是清朝人，他的文字仅是自己的观点。况且，他的记载来源于北京一带的坊间传言，而且是小时候听说的，自然不可信。

朱棣的生母到底是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马皇后和碽妃李氏最有可能。

比较一下马、李二人，朱棣还应该是马皇后所生，因为碽妃的情况与洪吉喇氏、翁氏一样，在时间上有破绽，生育时间与朱棣的年龄不一致的。

第五节　朱棣惨烈的后宫生活

朱棣在做藩王时，朱元璋便为他册封了王妃，那就是开国功臣徐达的长女。徐氏自幼贞静，好读书，朱元璋听说她贤淑，便让徐达把徐氏嫁给朱棣，徐达立即就同意了。正式册封徐氏是在洪武九年(1367年)，这时朱棣17岁。

靖难之役中，朱棣颇得力于这位王妃。朱棣带兵去攻打大宁，李景隆乘机围攻北平。当时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形势很危急，多亏了王妃徐氏的支持。城中兵少，徐妃便激劝将校士民的妻子参战，组成一批女兵，披上铠甲，登城拒守，终于坚持到朱棣回师。

朱棣做了皇帝后，将徐氏册封为皇后。她常规劝朱棣与民休息，又劝朱棣对新旧官员不要区别对待。在靖难之役中，徐氏的弟弟徐增寿常把建文帝朝中的情报送给燕王，因而被建文帝所杀。朱棣要为他追赠官爵，遭到了徐氏的反对。后来朱棣还是将徐增寿封为定国公，并让其子袭封，徐氏说这不是我的意愿，而不向朱棣道谢。徐氏还曾将朱棣所倚重的大臣的夫人们召进宫来，让她们以民生为念，做好内助。徐氏还采辑《女宪》《女诫》，编成了《内训》20篇。又编了《劝善书》，颁行天下，以化育人心。

永乐五年(1407年)，徐氏病逝，她临终时还劝朱棣要爱惜百姓，广求贤才，恩礼宗室，不要骄宠外戚。对于她的死，朱棣十分伤心，为她在灵谷寺、天禧寺举行了大斋，听群臣前来致祭。徐氏被谥为仁孝文皇后。后来朱棣在北京天寿山为自己营建了长陵，首先将徐氏安葬其中。徐氏死后，朱棣不再册立皇后。

朱棣还有两个心爱的妃子，一个是昭献贵妃王氏，另一个是恭献贤妃权氏。王氏有贤德，侍奉徐皇后很恭谨，为朱棣所倚重。朱棣晚年性情暴躁，臣属动辄得罪，不论太子、诸王、公主，还是大臣，都得到过王氏的保护。徐氏死后，宫中一切大事实际都由王氏掌管。

权氏是朝鲜人，天生丽质，善吹玉箫，甚受朱棣宠爱。永乐八年(1410年)，权氏突然原因不明地死去，朱棣极为伤心。因为思念权妃，朱棣对她的哥哥更加厚待。在给他授予诰命时，朱棣不禁含泪伤叹，悲痛得说不出话来。

权妃突然死去的原因，起初无人猜疑。但一次吕美人和权贵妃两家的奴

婢在吵骂中却透露了不寻常的消息。权贵妃入宫时，皇后徐氏已死。朱棣让她接替皇后，掌管六宫的事。吕美人对此十分不满，曾面责权妃说："有子孙的皇后也死了。你管得几个月，这般无礼！"于是，吕美人串通宦官金得、金良，从一个银匠家里要来砒霜，放进胡桃茶中送给权妃喝了，权妃因而毙命。朱棣得知此情后大怒，将内官、银匠一并处死。朱棣命人用烙铁烙了吕美人一个月后，最终将她杀死。吕美人在宫内的从人也一起被杀，牵连被诛杀者达数百人。朱棣还逼迫朝鲜王廷将吕美人的母亲抓来杀了。但这实在是一个冤狱，直到永乐晚年才大白于天下。

原来，权贵妃、吕美人等被选入宫后，又有商人之女吕氏被选入宫。吕氏因与吕美人同姓，欲相结好。但吕美人不乐意，吕氏因而怀恨在心。后来权贵妃猝死，吕氏便乘机诬告吕美人毒死了权妃，以致造成上述的惨案。

后来，吕氏和宫人鱼氏行为不检点，与宦官私通。朱棣虽有察觉，但却因宠爱吕、鱼二人而未做处置。二人知道隐秘泄露，惧罪自缢。朱棣认为坏事都因吕氏所起，便把吕氏的侍婢都拘来审讯。这些侍婢不胜拷打，便违心认罪，说是要谋杀朱棣。此案连坐被杀的竟达 2800 人。

此案初发时，朝鲜人嫔妃任氏、郑氏便自缢而死。黄氏、李氏被鞫处斩。黄氏死前援引了很多人。这时朝鲜诸女大都被诛杀，只有崔氏在南京而幸免。朱棣曾命南京的宫女北上，崔氏因病未成行。惨杀开始时，韩氏被幽闭在空室，好几天不给饮食。守门宦官可怜她，有时在门口放些吃的，因而她没有被饿死。但她的从婢却全部被杀了。韩氏的乳母金黑也被囚于狱中，事后才得赦免。

就在朱棣滥杀的时候，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日晚，雷雨交加，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被雷击中起火。大火冲天，力救不及。经十余年耗尽民财修建成的壮丽宫殿，就这样化为灰烬，很多人丧身火海。宫人们却庆幸火灾的发生，以为天降的大火可能会使皇帝的虐杀稍稍收敛。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天变是对人事的惩戒。人事有错误，天才震怒降灾。

第二天，朱棣下了一道诏书，对上天的惩戒表示自责。朱棣认错反省的态度似乎极为诚恳。然而，后宫的杀戮并未被列入他的反省范围之内，朱棣并没有停止对宫人的诛戮。先后因二吕之案被杀的竟有 3000 多人。

第六节　朱棣捕捉尼姑的隐情

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成祖朱棣突然下令将全国所有的尼姑以及女道士,统统逮捕送到京师逐一审问,以验明真实身份。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捕天下尼姑案,既打破了佛门千年以来与世无争的静雅,也让后人感到莫可名状的疑惑。

朱棣捕捉天下尼姑的起因是一场发生在山东境内,由唐赛儿领导的农民起义运动。据《明史》记载:唐赛儿于永乐十八年二月在蒲台(今山东滨州)聚集数千白莲教徒,以红白旗为号,揭竿而起,对抗朝廷。这场发生在山东境内的农民起义,让朱棣非常震惊。他不但派出了"京营"五千精锐人马,还把正在山东沿海"抗倭"的军队也用在了镇压这场起义上。

朱棣之所以如此兴师动众,是因为起义军不断壮大,屡败官军,且唐赛儿对于朝廷的招安不予理睬,使朱棣颜面扫地。这使朱棣对唐赛儿分外仇恨,对起义军进行疯狂镇压。因为寡不敌众,腹背受敌,起义军坚持了三个月就失败了,唐赛儿却下落不明。

为了防止死灰复燃,朱棣下令严察唐赛儿的行踪,但搜捕工作没有任何进展。民间搜不到,朱棣决定把搜捕唐赛儿的重点放到了佛门。朱棣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唐赛儿起义时曾自称"佛母",朱棣以此认为唐赛儿与佛门有着某种关联。

于是,朱棣下令将北京、山东的尼姑和女道士全部逮捕,押送朝廷审讯。同年七月,朱棣又命段明为山东左参政,继续搜索唐赛儿。段明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不仅把山东、北京的尼姑逐一搜查,全部捕捉,甚至还逮捕了全国范围内的数万名出家妇女。一直到朱棣病逝,他捉拿到唐赛儿的愿望也没能实现。

明朝强大而严密的特务、巡察机构,在捉拿唐赛儿的问题上,因为不得民心,即使想出通过捕捉天下尼姑的荒唐、极端的办法,最终也无济于事,得到的结果是"赛儿卒不获,不知所终"。唐赛儿究竟去了哪儿?至今仍无定论。

第四章　开国元勋之死

第一节　徐达死亡悬案

明朝开国功臣徐达(1332—1385年)，字天德，濠州钟离永丰乡(今安徽凤阳东北)人。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幼年好友，比朱元璋小4岁。

根据正史记载，至正十三年(1353年)，徐达随朱元璋参加红巾军郭子兴部队，并逐步成为朱元璋手下的著名将领。他有勇有谋，在攻取滁州(今属安徽)、和州(今和县)等地的战役中都有出色的表现，因而受到朱元璋的器重。至正十五年(1355年)，徐达随朱元璋渡过长江，攻克采石矶，占据太平(今安徽当涂)。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徐达在鄱阳湖大败陈友谅。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朱元璋称吴王，徐达为左相国。洪武元年(1368年)七月，徐达与常遇春率军北伐，连战连捷，于八月攻克元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灭亡。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徐达班师回朝，朱元璋亲往迎接，授中书省右丞相，封"魏国公"，食禄五千石。洪武五年(1372年)，徐达北征沙漠。洪武十七年(1382年)，徐达患背疽。洪武十八年(1385年)二月，徐达死亡，被朱元璋追封为"中山王"，谥"武宁"。

徐达出身于普通的农家，没有真正上过学。徐达的军事知识基本上是靠自学和在实践中积累出来的。徐达为人低调，在朱元璋的众多开国功臣里面排名第二，仅次于韩国公李善长，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恣意妄为。就是这样一位忠臣良将，却出现一个被"蒸鹅赐死"的说法。

传说，徐达因为功高震主，引起朱元璋的恐惧。徐达晚年患有背疽，忌吃鹅，朱元璋偏赐蒸鹅全宴给徐达。明朝规定赐宴必须即时食、全食。徐达知道朱元璋的意思，于是流着眼泪把鹅肉吃完，不久毒发而亡。

吃蒸鹅真的会死人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并没有背疽要忌食鹅肉的

说法。所谓背疽，应该是一种人体背部发生的大面积急性化脓性感染，是由病毒或细菌侵入人体背部多个相邻的毛囊及其所属的皮脂腺或汗腺所引发的。鹅肉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和脂肪，并不含能导致病情恶化的毒素，反而有助于增强患者的营养，因此并无“忌口”之必要。由此可以说“背疽忌食河鹅”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如果以今天的医疗水平来讲，治疗背疽病并不困难。但在医疗技术和手段都非常落后的中国古代，背疽的治愈概率却是相当之低。史书上多处出现历史名人死于背疽的例证，如项羽的军师范增、三国里割据荆州的刘表、曹魏政权早期的军事将领曹休、唐代大诗人孟浩然、五代十国时期后唐政权的建立者李克用、两宋时期的老将军宗泽、明嘉靖年间曾任内阁首辅的杨一清等人均死于背疽病。背疽病在当时的确是一种危险性很高的疾病，被成功治愈的可能性非常低，患了背疽无异于得了绝症。

徐达被朱元璋蒸鹅赐而死的说法有些匪夷所思。徐达当时已是身患绝症的病人，他的死是早晚的事，朱元璋是不可能也没必要急于对身患绝症的徐达在下毒手。

朱元璋虽然晚年杀了不少功臣，但每一次都是公开治罪。即便是因为徐达慬言慎行没有把柄可抓，朱元璋也完全可以采取更加秘密、稳妥的办法杀害他。怎会偏偏采用完全没有用处的蒸鹅毒死徐达呢？

徐达是著名的军事将领，他行武多年，手下有众多对他舍命相随的手下，如果朱元璋采用如此拙劣的方法致徐达于死地，难道不怕徐达会被逼急了造反吗？何况徐达的三个儿子都被封了官职，其三子徐膺绪还是手握军权的指挥使，朱元璋不怕徐达的儿子们会为父报仇吗？

《明实录》及《明史》都认为徐达死于背疽病，同时记载徐达死后，朱元璋伤心欲绝，辍朝祭奠深致哀悼，并列徐达为开国武将中之第一功臣，誉之为“万里长城”。明朝中叶的野史笔记《翦胜野闻》里面有徐达生病时朱元璋赐食的记载，但并没说具体是什么食物。清代文人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转述了这个故事，提出了“赐以蒸鹅，疽最忌鹅”的说法，可见所谓徐达被蒸鹅赐死的说法其实是到了清朝才有的，此时距徐达之死已经隔了两百多年。

徐达被朱元璋蒸鹅赐死的说法极有可能是被清人蓄意编造出来的。清王朝是少数民族政权，其入主中原后，民间的反清复明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清王朝对明代历史进行了抹黑和歪曲。把明朝说得恐怖黑暗，把明朝的君

主说得血腥残忍，其目的是让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恐惧明朝，仇视明朝，拒绝明朝，从而达到巩固和强化清朝政权统治的目的。

第二节　大将军蓝玉冤案

蓝玉，是明朝初期一员骁勇善战的猛将，其战功仅次于常遇春和徐达。蓝玉是常遇春的妻弟，常遇春去世后，蓝玉追随徐达、傅友德，在征战中屡建奇功。

大将军徐达去世之后，蓝玉脱颖而出。他多次统率大军北伐、西征，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洪武二十年(1377 年)，蓝玉被提升为大将军，驻扎在长城边的蓟州。逃亡蒙古的元顺帝之孙脱古思帖木儿不甘心失败，经常南下骚扰。朱元璋命令蓝玉统领 15 万大军前往征讨。蒙古军队退至贝加尔湖附近，以为明军缺乏水草，不可能长驱直入，就毫无防备。明军在沙尘暴的掩护下突然袭击，使得蒙古全军覆没，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在几十名骑兵保护下逃跑，其余 8 万人被俘。朱元璋得到捷报，大喜过望，把蓝玉晋封为凉国公。

蓝玉是个粗人，没有文化，性情暴躁，刚愎自用，因得到朱元璋的赏识和宠信，愈加骄横恣意，竟然做出了种种目无法纪的事情。

他蓄养了几千奴仆、义子作为随从亲信。这批人依仗他的权势，横行乡里，霸占民田。负责纪律检查的御史接到民众投诉，要依法惩办蓝玉的这些奴仆、义子。蓝玉藐视王法，竟把御史赶走。

他北征回师，连夜赶到长城喜峰关时，关门已经紧闭，守关官吏在关城上不明情况，没有及时开门，他竟然纵容士兵毁关而入。

他北征回来之后，贪污了缴获的大量珍宝，还把元皇妃据为己有。蓝玉上朝时，朱元璋当面严厉责备，要他今后加强道德修养，痛改前非。

他无视皇帝的威权，恣意骄纵。他被皇帝召见时，赐坐交谈，或随侍宴饮，他的言行总是傲慢而粗鲁，一点没有人臣之礼。他带兵在外，常常超越权限，擅自决定将校的升降，不向朝廷请示报告。为了显示自己的威权，他任意对军士施加黥刑(在脸上刺字)，以此来挟制部下，使军队成为自己的私家武装。蓝玉西征回来后，皇帝赏赐给他“太子太傅”的头衔，他居然不识相，大发牢骚：难

道我还不配当"太师"吗？这就激化了将权与皇权的矛盾，是朱元璋绝对不能容忍的。

洪武四年(1371年)，常遇春的女儿被册封为太子妃，蓝玉的女儿则被册封为蜀王妃。因为这些关系，朱元璋暂时未对蓝玉下手。

其中还有另外一层纠葛。当年蓝玉北征归来，发觉分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表现异常，就对皇太子朱标说燕王有"不臣之心"，让太子审慎对待。洪武二十五年(1382年)，太子朱标英年早逝。太子一死，朱元璋已无所顾忌，决意对蓝玉下手。一向与太子以及蓝玉有矛盾的燕王朱棣，要朱元璋继续清洗异己分子。朱棣说：在朝诸公侯，恣意妄为，将来恐怕尾大不掉。他含沙射影地指向蓝玉。朱元璋听了这话，更加猜疑功臣，不出数月，就发生了蓝玉案。

洪武二十六年(1383年)二月八日早朝时，锦衣卫指挥突然控告蓝玉"谋反"，说他勾结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皇帝到郊外举行"籍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蓝玉当场被拘押，遭到突击审讯。次日，蓝玉连同家属一并处死。株连处死的高官有公爵1名、侯爵13名、伯爵2名，连坐处死的功臣及家属达1.5万人。

明朝廷专门公布的《逆臣录》，其实全是诬陷不实之词。朱元璋要处死骄横跋扈的蓝玉，易如反掌。但是要株连一个庞大的"蓝党"，必须罗织"谋反"的罪状。因《逆臣录》编得仓促，漏洞百出，反而露出了罗织罪状的马脚。

《逆臣录》搜罗了近千人的口供，唯独没有凉国公蓝玉、景川侯曹震的口供。即是说，这两个主犯根本不承认"谋反"。蓝玉不仅为自己申辩，而且没有诬攀其他功臣宿将，所谓"蓝党"完全是凭空虚构的。

朱元璋在指责蓝玉罪状时，只字未提发动军事政变之事。可见以"谋反"罪处死蓝玉以及"蓝党"分子，其实是一桩冤案。

蓝玉被处死7个月后，朱元璋似乎意识到胡蓝二党诛杀过当，于是就下了一道诏书："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到那时，因蓝玉案已经杀了4万多人，功臣宿将差不多都死了，"概赦不问"已没有实在意义。

胡蓝党案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洪武三十年(1387年)正月，朱元璋任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西将军，武定侯郭英为征西副将，坐镇西北边防。不久，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幌子发兵南下时，建文帝已无将可派，不得不命年迈的长兴侯耿炳文率军出征，败局已定。

第三节　“智囊”刘伯温之死

刘伯温生于1311年，名基。刘伯温自幼聪颖异常，天赋极高。在家庭的熏陶下，他从小就好学深思，喜欢读书，对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之书，都非常熟悉。尤其对天文、地理、兵法、术数之类更是潜心研究，颇有心得。他14岁时入处州郡学读《春秋》，17岁师从处州名士郑复初学习宋明理学，同时积极准备科举考试。

刘伯温于元统元年(1339年)考取进士。他在中进士后不久，被任命为江西高安县丞，后又任元帅府都事。但是他的建议往往得不到元朝廷的采纳，反而受到元朝廷的压制。刘伯温非常失望，先后三次辞职回故乡青田隐居。



刘伯温

在当时，全国各地反元起义风起云涌，元朝的统治摇摇欲坠，但各支反元义军又互相纷争，各不相让。

1360年，义军统帅朱元璋两次向刘伯温发出邀请，刘伯温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辅助朱元璋，希望通过帮助朱元璋打江山来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大志。刘伯温初次与朱元璋相见，就提出了“时务十八策”。朱元璋大喜，从此将刘伯温视为自己的心腹和军师。

刘伯温出山之后，积极为朱元璋出谋划策。他为朱元璋制定了“先灭陈友谅，再灭张士诚，然后北向中原，一统天下”的战略方针。朱元璋基本上按照刘伯温为他定下的战略、战术行事，先用诱敌之计大败陈友谅，挫其锐气，再于1363年在鄱阳湖与陈友谅决战，将其势力彻底消灭。第二年，朱元璋又依计将张士诚的势力消灭。然后，朱元璋派部队北上攻打元大都北京，同时准备在南方称帝。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帝，正式建立大明王朝，改元“洪武”。为朱元璋最后平定天下、开创朱明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刘基，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不久又追封刘伯温的祖父、父亲为永喜郡公。

洪武三年(1370年),刘伯温被任命为弘文馆学士,受“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称号,赐封诚意伯。至此,刘伯温的事业达到了最辉煌的时期。

刘伯温在功成名就之后,于洪武四年(1371年)主动辞去一切职务,回青田隐居起来。

洪武六年(1373年),刘伯温的政敌胡惟庸当了左丞相,指使他人诬告刘伯温霸占一块“有王气”的土地做自己的坟墓,图谋不轨。早就对刘伯温放心不下的朱元璋听到诬告后,剥夺了刘伯温的封禄。刘伯温非常惶恐,于是亲自上南京向明太祖朱元璋谢罪,并留在南京不敢回来。后来,胡惟庸升任右丞相,刘伯温更加忧虑,终于一病不起。胡惟庸曾派太医为刘伯温诊病送药,但刘伯温吃了他的药后病情加重。

洪武八年(1375年),有病在身的刘伯温由朱元璋所派使者护送回家,不久就在家忧愤而死,终年65岁。

第四节　李善长死亡真相

李善长(1314—1390年),字百室,定远(今属安徽)人。少读书有智谋,策事多中。元末迎谒朱元璋,从下滁州,为掌书记。

李善长善于调护诸将,因材用人,使之各得其所。朱元璋任太平兴国翼大元帅时,以李善长为元帅府都事。朱元璋任江南行中书省平章时,以李善长为参议,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由他裁决。后来,枢密院改为大都督府,李善长兼领大都督府司马,升任行省参知政事。

朱元璋自立为吴王之后,以李善长为右相国。他娴于辞令,明习故事,处理政务,裁决如流,将吏帖服,居民安堵;调兵转饷无乏,恢复制钱,榷淮盐,立茶法,开铁冶,定鱼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

吴元年(1367年),李善长论功被封为宣国公,李善长改称左相国,居百官之首。他曾与刘基等裁定律令。

李善长被朱元璋称为“在世萧何”。他在朱元璋实力最微弱时投奔而来,一直负责军队的粮饷供应。他是朱元璋登基典礼的“总导演”,是朱元璋大封功成时的“首席公卿”。

明朝建立后，李善长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定官制、礼仪，监修《元史》，编《祖训录》《大明集礼》，事无巨细，都由善长与儒臣谋议而行。洪武三年（1370年），李善长被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卷，免二死，子免一死。时封公者共六人，而善长位居第一。

但李善长"富贵极"便"意稍骄"，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以疾致仕。他病愈后主持修建临濠（今安徽凤阳）宫殿。当时朱元璋迁徙江南富民14万到临濠，又以李善长管理其事。洪武九年，李善长与曹国公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督修圜丘。李善长之子祺尚临安公主，拜驸马都尉。

胡惟庸是李善长推荐的，被擢为太常寺少卿，后为丞相，两人往来甚密。洪武十三年（1380年），发生了胡惟庸案。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长因胡党获罪，朱元璋连其妻女弟侄家70余口人一律处死。次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疏诉其冤，朱元璋得书后，竟不加罪。

关于李善长详细的死因，因其当时有句话。胡惟庸在朝时欲谋反，曾想拉李善长下水，李善长不从，胡惟庸就让李善长的弟弟劝说李善长，时间久了，善长终于说了一句"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这句话后来由于李善长的下人屈打成招，说了出来，朱元璋便由此定下他的谋反之罪。

从史籍中分析，实际上在大封功臣之前，朱元璋就已经对李善长不满了。朱元璋曾经几次当着大臣的面说李善长无相才。在很早的时候，在李善长家族表面风光的时候，杀机就开始在他头顶盘旋。只不过，在朱元璋杀心盈怀时，难免想起当年的患难与共，想起李善长的种种功劳和苦劳，可能还有很多的现实考量，毕竟杀开国第一文臣、宰相，常常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也许正是拖到李善长77岁，朱元璋才下定决心的原因。

《明史》为了彰李善长之罪，说"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贵富极，意稍骄"等，李善长性格上的这种缺陷，或许确实有，但这肯定不是他不得好死的根本原因。李善长之所以会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只是因为他离朱元璋太近。

第五节 “奇男子”常遇春之死

常遇春，字伯仁，安徽怀远人。他是明朝开国六王之一，战功仅次于徐达。

1355年，常遇春参加了起义军，随朱元璋渡长江，取太平，破集庆等地，每战必先，屡立战功。1356年2月，在采石矶大战中，元兵守将蛮子海牙借地利击退义军的数次冲击，这时常遇春乘一艘小船，左手持盾，右手挥戈冒着乱箭直冲而上，冲到跟前时一跃而上，刺死守矶头目老星卜喇，左冲又突如入无人之境，这时义军一捅而上击溃蛮子海牙部。这一战使常遇春名声大振。

1357年，常遇春攻打宁国，身中流矢，裹伤再战。此后连克宁国、池州、婺州等城。随朱元璋军救援安丰的刘福通，到达时吕珍已杀死刘福通，率兵据守，朱元璋左右军都战败，常遇春横击其阵，三战三胜，俘获兵士马匹无数。

1363年秋，朱元璋在鄱阳湖与陈友谅的60万大军进行了一场持续36天的大决战，此战战况相当惨烈，双方投入力量之大在中国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一战，常遇春与众将奋勇作战，呼声震天动地，无不以一当百。陈军占据上游，军船大而坚固，装备精锐，朱军的船小而灵活，双方相持，难解难分。一次，朱元璋乘的船搁浅，陈友谅手下勇将张定边直冲到朱元璋船边，形势十分危急，这时常遇春一箭射伤张定边，然后又用自己的船撞击朱元璋的座船，使其脱离浅滩，但是自己的船却搁浅了。他乘败退下来的船只再战，转战三天，朱元璋的军队以火攻陈友谅的船只，湖水被映成红色，旋即率军封锁湖口，会同诸将全歼号称60万的陈友谅军队，陈友谅死于乱箭之中。这一战扭转了局势，朱元璋一跃成为群雄之首。

1367年，朱元璋以徐达为主将，常遇春为副将率25万大军北伐，大军从安徽一路打到元大都(今北京)。北伐期间，在洛阳塔儿湾与元军遭遇，常遇春单骑冲入敌阵，一箭射死起前锋大将，麾下士气大振，猛冲杀，在洛水之北击溃5万元军，俘获无数，史称塔儿湾大捷。后在夺取大都后西进与元猛将扩廓帖木儿军进行了艰苦的搏战，平定山西、陕西。元军反扑大都，常遇春又回救大都，向北追击敌军千余里。为了覆其巢穴，最终解除元军对北平的威胁，常遇春又率军径取元上都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元顺帝逃奔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常遇春夺取开平，全歼留守元军，缴获车1万辆、马3万匹、牛5万头。

从上都胜利归来的途中，常遇春暴毙于军中，年仅 40 岁。朱元璋追封常遇春为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追封开平王，谥曰忠武。配享太庙。常遇春逝世后，全国很多地方怀念他的功绩为他建祠祭祀。

常遇春体貌奇伟，沉毅果敢，长臂善射，一生从未败北，被誉为"天下奇男子"。他曾自负地说："我率十万人便可横行天下"，军中送他一个绰号叫"常十万"。朱元璋评价常遇春"虽古名将，未有过之"。

常遇春曾娶定远人蓝氏为妻，生有三男三女。长子常茂，次子常升，三子常森。长女常氏被册封给太子朱标为妃，史称元妃。元妃为朱标生有两男，长子为虞怀王朱雄英，是朱元璋的皇长孙，在洪武十五年夭折；次子为吴王允熥，后来在明成祖靖难夺位时被废为庶人，一直囚禁在凤阳，死于永乐十五年(1417 年)。

第五章　海上超级帝国

第一节　郑和下西洋的起因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他被国际公认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

郑和(1371—1433年)原姓马，名和，字三宝，出生于云南省昆阳州(今晋宁县宝山乡和代村)的一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

洪武二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为了消灭盘踞在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派手下大将傅友德、蓝玉等率30万大军发起平定云南的战争。在战乱中，年仅11岁的郑和被明军俘虏后被阉割，在军中做秀童。云南平定之后的洪武二十八年(1385年)，郑和又随军先后转战于蒙古沙漠和辽东等地。郑和19岁时，被挑选送到北京的燕王府服役，从此追随燕王朱棣身边，逐渐得到了朱棣的信任。1399—1402年，朱棣为和建文帝争夺皇位，进行了“靖难之役”，郑和立下了功劳。朱棣夺得皇位后，郑和被提升为内官监太监。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初一，朱棣为表彰他的功绩，亲笔赐姓“郑”，从此更名郑和，史称“三宝太监”。

人们曾猜测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寻找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据说，“靖难之役”以后，朱允炆出走，不知所终。这对猜忌心很重的朱棣来说，自然是一件最不放心的事。朱棣怀疑朱允炆逃到了海外避难，恐怕他将来会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派郑和下西洋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以杜绝后患。

其实，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另有原因。

明朝初年，正是国势向上发展的时期。这时在北方，蒙古势力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明朝的统治已十分巩固，加上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势日趋强盛，这就有可能使它向海外发展。

永乐年间，由于国力强盛，朱棣要建立一个天朝大国的思想就更加强烈。

明成祖朱棣的好大喜功，常常向异域显示中国的富强，对明朝初期对海外的消极政策深表不满，故朝廷对外政策为之一变，即位后便派宦官出国，召各国来朝，此举可以提高朱棣的威望。郑和下西洋便可以在国外显耀兵力，向海外各国夸耀显示中国的富强，宣扬明朝的威德。同时他还想用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一部分人对他武力夺取皇位的不满。

明成祖朱棣之所以挑选郑和下西洋，主要有四个原因。

一是郑和懂兵法，有谋略，英勇善战，具有军事指挥才能。郑和少年时就在朱棣身边，跟着朱棣南征北战，是“靖难之役”的有功之臣，并被朱棣视为心腹。

二是郑和知识丰富，熟悉西洋各国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具有卓越的外交才能。在郑和下西洋前，郑和曾出使暹罗、日本，有进行外交活动经验。特别是永乐二年（1404 年）出使日本，通过郑和的外交活动，使得日本主动出兵清剿在中国沿海的倭寇，并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签订贸易条约。这些外交成果使朱棣十分满意，并为下西洋解除了后顾之忧。

三是郑和具有一定的航海和造船知识。郑和从小就从父亲那里得到有关的航海知识，熟悉海洋，向往航海。在郑和担任内宫监太监时，监造过船舶，有造船经验。

四是郑和是伊斯兰教徒，熟悉伊斯兰教义、教规和宗教习俗。郑和又是佛家弟子，他熟悉、尊重佛教。而郑和下西洋途经的国家和地区，不是信奉伊斯兰教，便是信奉佛教。共同的宗教信仰，有利于沟通相互关系。

正是由于郑和自身条件和所具备的才能、素质，才被朱棣赏识，并委以重任，成为下西洋船队的统帅。

第二节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

根据史料记载，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在当时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后认为：“中国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郑和下西洋的人数，史料上有明确记载的有 4 次。第一次为 27800 人，第二次为 27000 人，第四次为 27670 人，第七次为 27550 人。郑和每次下西洋的人数相当于明朝军队的 5 个卫，明朝每个卫有 5000～5500 人。当时西方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航海的人数分别是 90～1500 人、170 多人、265 人。航海人数的多少，反映了一种实力。

郑和船队由舟师、两栖部队、仪仗队三个序列编成。舟师就是现在的舰艇部队，基本单位战船，它们被组成编队，叫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两栖部队用于登陆行动；仪仗队担任近卫和对外交往时的礼仪，庄严威武。

按照下西洋的任务，郑和船队人员主要有指挥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贸易部分、后勤保障部分、军事护航部分五个部分。指挥部分是整个船队的中枢，对航行、外交、贸易、作战等进行指挥决策。航海部分负责航海业务、修船、预测天气等。外交贸易部分负责外交礼仪、进行贸易、联络翻译等。后勤保障部分负责管理财务、后勤供应、起草文书、医务人员等。军事护航部分负责航行安全和军事行动。

郑和还打破"有女同行，航行不利"的说法。特别造了一只小船，船上载着几十个老年妇女，专门为官兵们补衣服。当时的船员们穿的是布袜和布鞋，一双鞋穿不到一个月就坏了，如果没有妇女为他们制作和缝补，即使出海时准备 20 万双鞋袜，也不够长期穿用。

船上还带了两名接生婆。原来，郑和每到一处，总要设帐施诊给药，还教导当地土人如何接生。郑和还请了几个农夫。因为耕田的人通过观察气候的变化，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测到何时刮风，何时下雨。只要被农夫们观察到预兆，郑和就提前下令准备将船只驶到避风港之中。

郑和下西洋的船，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郑和每次出使都有 200 多艘船。大船"宝船"数量都在 40～60 艘，而西方哥伦布航海时只有 3～17 艘，达伽马有 4 艘，麦哲伦有 5 艘。

一些学者根据文献记载结合郑和航海的需要进行研究，认为郑和下西洋的船最少有 7 种，包括宝船、马船、战船、座船（战座船）、粮船、水船等。宝船是帅船，取宝之船。马船是快速的综合补给船，搭载中层官员、军需品、各国朝贡的动物，并能作战。战船作为护航用，吨位小，机动灵活，配有火器和战斗员，保障整个船队航行安全。座船用于船队防海盗袭击和执行两栖作战。粮船装载粮食和副食品。水船储存运载淡水。

郑和船队中装备了先进的兵器,除了冷兵器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火器,如碗口铳、喷筒、“赛星飞”等。碗口铳是一种可灵活操作的火炮;喷筒用于水战、攻城池之用;“赛星飞”是世界上最早的水雷雏形。

郑和下西洋船队配有交通艇、音响信号、旗帜等装备。史书记载,郑和下西洋船队在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则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如果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或雨天,就用铜锣、喇叭和螺号进行通信联系。

郑和船队是完全按照海上航行和作战需要来进行编组的,在统一指挥下形成一支严密的船队,这是创造郑和成功远航的重要基础。

第三节　郑和船队的航海技术

郑和下西洋的辉煌成绩,反映了我国在世界文明史上独领风骚的科技成就。最能代表和体现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技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中国很早就可以通过观测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郑和船队已经把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人们称之为“牵星术”。用“牵星板”观测定位的方法,通过测定天的高度,来判断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线。这项技术代表了当时天文导航的世界先进水平。

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叫作针路,罗盘的误差不超过 2.5 度。

《郑和航海图》被明代晚期的茅元仪收录在《武备志》中。原图呈一字形长卷,收入《武备志》时改为书本式,自右而左,有图 20 页,共 40 幅,最后附“过洋牵星图”二幅。海图中记载了 530 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 300 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 16 个。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其中明确标明了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和中沙群岛(石星石塘)。

《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该图与同时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郑和航海图》制图的范围广,内容丰富,虽然数学精度较低,但实用性胜过波特兰海图。

郑和下西洋折射出的中国先进航海科技光辉，表现了中国古代人的卓越智慧，从而催生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

第四节 郑和船队的海上饮食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每次航行长达两三年，人数多达两万七八千人，如此庞大的队伍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是怎么解决饮食问题的呢？郑和船队会不会面临败血症的威胁？

曾随郑和远航的巩珍在《西洋番国志》所附的敕书中，对郑和船队出洋饮食的准备有如下记载："下西洋去的内官合用盐、酱、茶、酒、油、烛等件，照人数依例关支。——永乐十九年十月十六日。"这样的记述，并未描绘出远程航行的饮食状况全貌。

郑和船队行经之地多在热带，即使冬季腊月，温度也多高于20摄氏度，为持续预防食物腐败变质，载运上船的食物除可趁新鲜食用的食物以外，大多数必须是经得起存放的。

在明朝初期，人们已能处理保鲜期短的食物，如将肉类、水产、蔬菜以盐、酱、醋、酒糟腌制，或烟熏、晒干；将水果曝晒制成果脯，或以蜜、糖渍，或用火焙。因此携带上船的食物除了盐、酱、茶、酒及饮用水之外，应当包括不易变质的米麦等谷物、豆类，还有加工处理过的果菜、肉类、水产以及醋、盐、蜜、糖等调料。

郑和船队出海之后，除了库存食物之外，水产类食物可就地捕钓，并在船舱中以活水养殖；家禽类食物可以在船上畜养；蔬菜也可以在船上栽种，船员常在木盆中栽种蔬菜、生姜，提供日常食材。然而船上的产量毕竟有限，大量的新鲜蔬果、肉类及饮用水，势必待上岸时补给，尤其是不可或缺的淡水。

马欢随郑和船队下西洋，将行旅见闻记录成书，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完成《瀛涯胜览》，书中记录了郑和船队途经20个地点的地理、气候、宗教、习俗及物产等。

米、谷在郑和远航所经之地多有生产，如中南半岛、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及印度半岛等地，但这些热带地区却"无大小二麦"。阿拉伯半岛兼产米、麦，古里、忽鲁谟斯虽有麦贩售，却并非当地出产。船队所经之地，部分地区米、麦全

无。到达以上地区的船员可能不免口腹受苦。

船队的动物性食物主要有畜肉、禽肉、水产及奶酪等。马欢记述的地区都位于海岸线上，或在沿海溯流而上的河岸边，居民通常以渔为业。中国人摄取的肉类一般以猪、鸡为主，而伊斯兰教徒忌吃猪肉，崇信佛教者忌吃肉类。郑和船队所到之地，除中南半岛、印度半岛、锡兰等地以外，多信奉伊斯兰教，故食用鸡、羊。郑和船队途径占城、那孤儿王、榜葛剌以及中国人聚居的爪哇、旧港等地时，则能够食用猪肉，古里还有鹿肉和兔肉供食用，祖法儿有骆驼肉食用。乳类及奶酪相对不普及，只在苏门答腊、锡兰及古里有供应。

马欢有关食物的记述中，以蔬果种类最为繁多。有三大类：第一类是瓜类、茄子、萝卜、胡萝卜等耐存放的蔬菜，是带上船的主要菜类；第二类是葱、姜、蒜、胡荽、韭、薤等辛香菜类，是用于调味或烹调的佐料；第三类是叶菜类，但《瀛涯胜览》中只提到芥菜一种。芥菜不仅可供新鲜食用，且可腌制成酸菜、雪里蕻、霉干菜等。

在爪哇、马来半岛及印度半岛等地区，主要有椰子、芭蕉、甘蔗、西瓜等水果，还有一些热带水果，如山竹、冷塞果、榴梿、波罗蜜及杧果。

在阿拉伯半岛，主要有石榴、苹果、西瓜、甜瓜以及晒干的椰枣与葡萄干等水果。另外，还有松子、杏仁、核桃等坚果。这些可为船员们提供蛋白质和脂肪。

在暹罗、满剌加、榜葛剌、古里、锡兰与溜山等地，酒类的生产原料为茭章、椰子和米。而在阿拉伯半岛，由于伊斯兰教地区禁酒，故并无此类产品。调味品方面，忽鲁谟斯盛产岩盐，锡兰、古里以椰制糖。

由上可知，郑和船队的饮食汇集了东、西方的特色，促进了国际饮食的交流。

第五节　郑和船队所到之处

前英国皇家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通过长达14年的研究，认为郑和的船队曾实现环球航行，并早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就发现了美洲和大洋洲。

孟席斯认为，郑和在1421年的一次远航中，在舰队到达满剌加（今马六甲）之后，将舰队分成四支，每支船队载有一支装备有火炮的军队，其中三支船

郑和下西洋图

队分别由太监洪保、周满、周闻率领，第四支船队规模最小，由郑和直接指挥。郑和在奉命将亚洲、非洲16国使臣送回国后便独自返回中国，而其他的船队则继续前行，从而开始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发现之旅。

他们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到达非洲西海岸，并沿着海岸线北上，到达大西洋中的佛得角群岛。他们在这里遇到了巨大的风暴，而好望角也回不去了，于是决定分兵西进，穿越大西洋，各自探寻回国的道路。

周闻的船队独自向西偏北航行，穿越大西洋到达中美洲，并沿海岸一直北上，到达北美洲东北部的格陵兰岛，然后绕过格陵兰岛，穿越北大西洋、北冰洋向东续航，一直到达西伯利亚东北部的楚科奇海，从那里穿过白令海峡后，经日本海回到了中国。

而洪保和周满的船队则从佛得角群岛向西偏南航行，穿越大西洋到达南美洲的北部，并沿海岸线一直南下，通过了南美洲最南的麦哲伦海峡，此时遇到了非常恶劣的气候，为了更好地寻找生路，他们再次分开。洪保向南继续航行，到达了南极洲附近，并绕着南极洲向西航行到南舍得兰群岛，然后折而北上，沿南印度洋东进，抵达澳洲西南角后又继续向西北航行，进入南中国海，最后他们高兴地发现，自己竟又回到了马六甲，在此获得补给后返回中国。

周满率领的船队，简直经历了一次终极大冒险。他们在通过麦哲伦海峡后，沿南美洲西海岸北上，到达厄瓜多尔后转而向西横渡太平洋，到达新西兰和澳洲的东海岸，并环航了澳洲大部，接着向西北航行至菲律宾群岛北上。由于迷路，此时历经千辛万难的周满船队却错过了从这里回国的良机，而是又转向东，再次驶入了茫茫无际的太平洋中，他们第二次横渡太平洋，到达了加拿

大的西海岸，又沿着海岸线南下，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的西海岸，在那里一部分人留了下来，而其余的人则折向西航行，第三次横渡太平洋，向菲律宾行驶，最后取道南中国海回国。这次航行大概有3万千米，历时两年半才返回南京，此时船队损失殆尽，已经所剩无几。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西南部曾经发现过一艘红木沉船。考古学家挖到了一些红木片，这些红木片经断定不是澳大利亚土生的树木，而是可能来自中国。这似乎又证明了孟席斯书中，关于中国人最早发现澳大利亚的论点。

在一份冰岛的古代文献中，其记载似乎也与中国有关。1448年，教皇尼古拉斯五世写给冰岛斯卡洛特和豪拉主教的一封信颇富传奇色彩，信中写道："约30年前，从附近海岸异教徒中来的野蛮人，暴虐无道地用火与剑残酷的袭击了格陵兰岛原住民，摧毁了他们的国家和神圣的建筑，只剩下不到九个教区的教堂幸存下来。可怜的原住民被他们不分性别地带走。其中大部分人已经脱困，回到他们自己的房子里。"

永乐十六年(1418年)大约是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时间，教皇所指的野蛮人可能就是中国人。而在冰岛民间也一直流传着很早就有中国人光临的传说，时间上与郑和下西洋的时期正好相吻合。

种种迹象表明，郑和的船队可能真的到过我们现在所知的更远的地方。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创举。

第六节　郑和归葬何处

据史料记载，宣德八年(1433年)，62岁的郑和在归国途中积劳成疾，在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病逝。可是，郑和到底归葬何处，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

1964年，考古人员在南京牛首山发现一座墓葬。此墓坐落在一座名为"回回山"的山坡上，旁边有一个郑家村，村中的一支郑氏自称其祖辈世代在此看守墓地。有当地人说，这座墓与这一带的罗志墓等明太监墓形制相同，可能是郑和墓。1981年，有关部门对"回回山"明代古墓进行了勘察，认定为"郑和墓"。

目前南京牛首山的郑和墓南北长300米，东西宽60米，高约8米，墓为长方形，整个墓制呈巨大的"回"字状，墓盖下部雕饰祥云草叶莲花座，瓦梁状的

墓顶雕有阿拉伯文“安拉伟大”等字样。墓下石阶共4级28层，每级7层象征郑和七下西洋，历时28年的壮举。在距离墓地50米处，竖立着一块青石碑座，体制硕大，半陷泥中。

但有学者认为，古墓被认为是郑和墓不过是依据村民的传说和推论，未必可信。

宣德八年(1433年)3月，郑和在印度古里病逝，同年7月他的船队回到国内。此间经历了长达4个月的时间，正是炎热季节穿越热带的航线，郑和的遗体能否保存带回国内安葬是一疑问。郑和的家族中一直流传这样一句话：“马三宝下西洋，自身难保”，因此牛首山的郑和墓并不排除是埋葬郑和衣物、靴子、头发及指甲之地。

牛首山的郑和墓建造得极为普通，不得不让人疑惑，注重身后事的古人常常凭借千古之地的气势来延续身前的辉煌与荣耀，依照郑和被赐姓、出使海外蒙受皇恩，其墓葬似乎应该更气派宏大。有学者认为，作为2.7万多人的船队统帅，郑和的宽大胸怀、正直无私一直为后人称道。郑和所信仰的伊斯兰教历来就有“薄葬”的传统，郑和墓规模简单而朴素也是合乎情理的。

南京最南面的牛首山上郑和墓所在之地则另有一番玄机。郑和墓、墓葬神道与牛首山弘觉寺宝塔都在一条中轴线上，前临湖，后依寺院，是一块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

还有一种郑和衣冠冢在北京的说法，学者认为，可能只是清宫太监把郑和奉为祖师爷而立碑进行拜祭而已。

另一种说法认为，郑和葬在了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三宝土龙。这是因为郑和逝世后，船队在运送郑和遗体回国途中，担心天气炎热，遗体不能长期保存，就葬在了路过的爪哇岛的三宝土龙。现在当地还有三宝洞，供郑和像，洞旁有三宝墩，相传为郑和墓。

第七节　明王朝的海外贸易

万历元年(1573年)6月中旬，两艘挂着西班牙国旗的大帆船从马尼拉港驶往墨西哥海岸的阿卡普尔科，船上载着绸缎712匹、棉布11300匹和瓷器22300件，总值30万比索，折合白银7.5吨，贸易利润高达600%。这就是被称

作“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首航。至此，马尼拉确立了它作为中介港的地位，由西班牙人经营着明朝与美洲的贸易，他们从明朝商人那里获取丝、绢、瓷等高级奢侈品，并将之转口到美洲以换取白银，再将这些白银作为支付给明朝商人的硬通货。这条航线利益巨大，以平均每年 80～125 吨的白银流入中国。

明朝与美洲的间接贸易是由西班牙人开启的。自此以后，明朝的商人被巨大的利润吸引到东南亚，数万人集中在吕宋岛，带去丝织品、棉织品、瓷器、茶叶、布匹、锦缎、丝绒等商品，换回自美洲运来的白银。从明朝本土来到这里的海船技术先进，每艘造价仅千余两白银，而所获经常过万，财富的积累越滚越多，明朝的官员、将领大都参与进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南方利益集团。

当时从阿卡普尔科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平均每年运量达到了 150 吨，根据当时的航海资料和西班牙官员的信件可以得知，其中的绝大部分都被作为支付给明朝商人的货币而运走了。万历十年（1582 年），棉价每匹 0.3 两白银，绢价每匹 0.7 两白银，按照每匹最低获利十倍的价格计算，历年自明朝输出的商品根本无法统计。当时从智利到巴拿马，随处可见质优价廉的中国丝绸。中国丝织品的价格只是其他地方的三分之一。很显然，这样的价格优势只能出自规模化生产。

据估算，明朝的江南地区在 17 世纪初已产棉布达 2500 万～3000 万匹、丝织品 70 万～100 万匹，如此之高的产量仍然因海外贸易的巨大需求而导致价格持续攀升，巨大的利润刺激促使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产量，至中清时棉布可年产 8000 万匹、丝织品 600 万～800 万匹。

如果说吕宋岛为明朝与美洲贸易的中继站，那么马六甲就是连接明帝国与欧洲的桥梁。马六甲驻扎着许多明朝的商人，来自福建的人由于来的时间较早而负责当地的商业运营，来自浙江的人由于家乡作为商品输出地的有利条件而负责船货的运输，这些明朝的商人和葡萄牙人、荷兰人、亚美尼亚人和阿拉伯人一起经营着获利极大的印度－东南亚－中国贸易航线，或许因为一些信仰的因素。明朝的商人用从中国本土运来大量的纺织品、瓷器和草药等，换回的主要是香料，还有不少珍珠和玛瑙。

马六甲与中国的航线起初是以走私的形式存在，它的另一端很可能在距浙江舟山百里之遥的双屿港，那里地势险要，悬于海洋之中，在被走私集团占据前是个荒无人烟的小岛。它的腹地是浙江——明朝最富产丝绸的省份，同时也是明朝粮食和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那里水运交通发达，在历经多年的发

展后，它的城镇化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们享受着白银大量流入带来的种种好处。双屿港早在1528年以前就成了国际走私贸易的一个重要据点，海洋贸易或许因为明朝政府的禁令而受到了限制，但商品的大规模输出从未间断。每日有上千艘船只往来于双屿与外洋之间，这些人在那里筑码头、建仓库、设医院、开商店、盖教堂，其繁华程度可见一斑。

马六甲的这条航线可能将大量的白银带入了中国，而且也是海洋贸易的主要渠道。葡萄牙人登上了澳门，开辟了一条从里斯本到果阿，从果阿经马六甲再到澳门的航线。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资料可以证明，1602－1682年中国的瓷器输出达到了1600万件。因为种种因素，大量产自美洲的白银的确通过葡萄牙人的航线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中途经过了印度，有一部分长期滞留在那里，其余大部分来到东南亚，通过购买香料的形式置换掉一部分，剩下的汇合马尼拉航线的白银被中国的商人运走。留在东南亚的那些白银一部分通过穆斯林商人到了印度，其余部分由于拥有香料和宝石的交易而放缓了流入中国的速度，但最终仍然来到了中国。此外，葡萄牙人通过澳门得到了特殊的贸易地位，由于日本自始至终都无法得到与明朝直接贸易的权力，所以葡萄牙人可以通过转手中国货物获得每年235万两白银的收益。

日本虽然被排斥于直接贸易体系之外，它却是明朝白银的几个主要来源之一。日本富产白银，日本人在石田、但马、佐度、甲斐、秋田等地开采银矿，用“银山银吹”的方法使矿渣分离，提高了白银产量，从而使白银成为他们的主要硬通货。银矿的大量开采使日本的白银价格持续降低，而此时由于银荒所导致的银价居高不下却困扰着明朝，这无疑大大刺激了日本白银的对外输出。

白银和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明朝，全世界不断地向明朝支付硬通货，这支撑着明朝工业的发展。

大量白银的流入在导致物价上涨的同时，解决了一直困扰明朝的白银短缺问题，使实施银本位真正成为可能。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继位时，白银与铜钱的比价是1∶3000，黄金与白银的比价跌到了1∶13，显示美洲白银的流入持续增加。白银的不断流入必然导致金价的上涨，从而在某个临界点形成对黄金的迫切需求。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建立在银本位的基础上，在他通过明朝的名义正式宣布改革前，民间早已储备好大量的白银用以支撑明朝的货币信用，被货币危机折磨了近百年的明朝从此步入了新的时代。

城镇开始迅速发展，大批新兴市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很多都是以专

业生产丝棉著称。这些市镇人口普遍超过两千，无法统计他们之中有多少受益于海外贸易而发达，因为明朝从未承认海外贸易是其税收的主要来源，明朝的海关数据也支持了这种论断。万历后期福建月港的统计是 29000 两白银，其余主要港口都低于这个数字。由此可以推断大量的税收被逃避了，明王朝的税收损失尽管难以统计，但其数额必定极其惊人。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那个时代的成就，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明朝的海外贸易对国家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第八节　海洋帝国的终结

马六甲海峡是亚洲出海口门户，谁控制了这里，谁就是亚洲的海洋霸主。

早在 15 世纪初，明王朝与马六甲就形成了战略同盟关系，马六甲王国在明王朝的支持下成为区域强国，而明王朝则通过在马六甲设立航海中转站，建立了以马六甲为中心的朝贡圈，进而控制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线，成为那个时代亚洲海洋的帝国。

永乐元年(1403 年)，在北京登上皇位的朱棣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朝贡体制与外交思想。登基之后，他立即派遣使臣分赴四方，宣告明王朝帝位的轮替，并重新确认明朝在海外的影响力与控制力。随即，琉球、日本、暹罗等各国使节陆续到中国朝贡，建立了宗藩与册封关系。

此时的马六甲王国，被中国称为满剌加。它处在战略通道上，受到明朝廷的高度重视，很快被纳入了明王朝的朝贡体制之下。永康元年(1403 年)10 月，朱棣派遣宦官尹庆往谕满剌加，赠送其国王礼物，国王拜里迷苏剌大喜，遂遣使随尹庆到明帝国朝贡，开了永乐朝御笔题赐的先例。

明成祖还亲笔写碑文赐给满剌加，碑文上盛赞满剌加及其国王。其实，拜里迷苏剌最关心的是立刻摆脱暹罗的统治，这是他与中国交好的实质动机。

开国之初的马六甲王国四周都是强敌，拜里迷苏剌以怀柔的外交手段争取生存的空间。一面与左边的暹罗王国搞好关系，每年缴纳 40 万两黄金给暹罗国换取暂时和平；一面与南面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王国结亲联盟，同时以明王朝为宗主国，并建立了宗藩关系。

永乐四年(1406 年)，拜里迷苏剌率妻子及陪臣 540 多人，随郑和船队来中

国访问，这是明朝以来到访中国的最庞大的外国使团。这次访问，拜里迷苏剌受到明朝政府的礼遇。在此期间，明成祖曾五次宴请或赏赐使团，当九月十八日使团离开南京回国之时，明成祖又命在龙江驿设宴饯行。这样的规格待遇，在明朝接待外国家来访的国王中是唯一的一次。

永乐九年(1411 年)，拜里迷苏剌第二次来访明王朝。永乐十二年(1414 年)，也就是郑和第四次率团远航的返程的时候，拜里迷苏剌第三度率团访问明王朝。

马六甲对明帝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就意味着帝国将拥有长久的海疆安宁。

由于郑和船队每次出使的人数均有近三万，历时一年半以上，需装带大量物资，因此需要在航程中途设立一个固定的物资转运站，存放不急需的物品，缓和船队的运输压力，也为使团的往来船队不断补充应用物资。

马六甲正是郑和船队中转的理想地点。它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既有利于船舶的停靠补给，又有利于船队等待不同的季候风，为南下远航与返回中国争取到最有利的时机。通过马六甲，明王朝的影响范围可达整个东南亚。

马六甲航运中转站的建立，意味明王朝建立了以东南亚为基地的战略缓冲区，那时的南中国海真正成了中国的内海。

15 世纪的马六甲与当时的明王朝建立战略同盟关系，以政治上的让步换来马六甲一个世纪的和平与繁荣。同时，马六甲国王励精图治，试图逐渐摆脱明王朝的政治影响。

在马六甲王国的发展方向上，它选择了伊斯兰化，而没有像越南一样采用中国传统的儒家立国思想。

特别是从 1445 年起，马六甲王朝的第四代国王穆扎法尔·沙继承王位后，采用穆斯林君主的尊号"苏丹"，奉伊斯兰教为国教。他在位时，伊斯兰教沿着苏门答腊和爪哇各港口迅速传播开来。这位马六甲的君主执政后，拒绝向信奉印度教的暹罗继续纳贡。1446—1447 年，马六甲军队先后两次从海陆击败暹罗军队的入侵，从此暹罗欲征服马六甲的企图暂时中止。穆扎法尔·沙加强军队建设，扩充舰队，控制了马六甲的海岸，并派兵从西北攫取雪兰莪作为粮食基地，又控制了苏门答腊海岸的战略要冲，成为该地区的霸主。

在贸易上，当郑和船队绝迹于亚洲海域之后，马六甲充分运用了明王朝建立起来的贸易网络。穆扎法尔·沙努力使马六甲成为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商

人之间的重要贸易桥梁。他铸造了统一的阿拉伯文锡币，正面为“苏丹穆扎法尔·沙”，背面为“宇宙与伊斯兰教之救主”。

当1459年穆扎法尔·沙去世时，马六甲迎来了它鼎盛的时代。

马六甲在16世纪大航海时代兴起前，成为东南亚真正的海洋城市。每年吸引好几百艘船只顺着季风前来贸易，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欧洲人挤满了港口。从各国运来的货物全都汇集到马六甲，再转运到世界各地，马六甲俨然是当时全球的商品集散中心。

当马六甲一跃成为地方霸主之时，明朝采取了严厉的海禁政策，不仅停止政府庞大船队出海的计划，而且严厉制裁私自到东南亚等地的中国贸易商人。明王朝自动放弃了海洋贸易，放弃了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权。

16世纪初，盛极一时的马六甲海峡很快引起了西方新兴海权国家的觊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来到马六甲。此时，葡萄牙人已经渡过印度洋，并准备染指马六甲。

1509年，葡萄牙人曾经到达过马六甲，受到了当地人的猛烈袭击，他们撤退了。这场战争让葡萄牙人认识到，要占领马六甲、控制马六甲海峡入海口，必须从军事上先占领马六甲城的咽喉之地——马六甲河上的大桥。

1511年7月1日，阿尔布克尔克率领一支由18艘舰船、1200名葡萄牙士兵及200多名马尔巴拉援兵组成的舰队到达马六甲，提出了释放战俘、赔偿以及割让一块土地来修建要塞的要求。当时的马六甲是一个10万人的城市，由3万马来人和爪哇人守卫着，双方兵力悬殊，因此当地苏丹拒绝了葡萄牙人的要求。7月24日，葡萄牙人发动了第一次攻击，由于没掌握潮水的关系，葡萄牙舰船无法进入河道，只好等待潮水的涨起。而马六甲苏丹组织了强大的抵抗，迫使阿尔布克尔克下令撤退。

8月10日，阿尔布克尔克又进行了第二次攻击，成功占领了大桥，接下来他们又占领了面向马六甲河、依山建立的马六甲王国与清真寺。苏丹及其王子派出20头大象企图阻止葡萄牙人的攻势。黑夜降临后，葡萄牙人终于占领了大桥两侧的制高点。

8月24日，沿着街道，葡萄牙士兵并排清除来自各方的零星抵抗。马六甲苏丹见大势已去，放弃了富甲一方的马六甲城。苏丹率领残余势力退到巴莪从事复国运动，他的后裔偏安柔佛，建立了柔佛王国，延续马六甲的王统。

此时，阿尔布克尔克下达到了抢掠的命令。抢掠的珍宝数以万计，几乎是

马六甲王国三分之二的财富。攻占了马六甲的葡萄牙人，照例进行了屠城。

马六甲王国的灭亡，除了因为遭遇强大的外敌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为当时马六甲王国名义上的宗主国——明王朝，皇帝与大臣都无能、短视，他们对马六甲的陷落无动于衷。

明朝廷得知马六甲被侵占一事是在 1520 年，距马六甲落入葡萄牙人之手已过了九年。而在这九年中，葡萄牙人的脚步早已穿过南中国海，进入中国广东沿岸。

如果不是马六甲王子宾塘王公的使者穆罕默德来到北京，向礼部送来马六甲的求援信，马六甲落入葡萄牙人之手一事，明朝廷还会一直被蒙在鼓里。而明武宗早已失去了解决此事的能力，在一批大臣的建议下，终于对马六甲的沦陷做出回应：不许葡萄牙入贡，同时葡萄牙出使中国的皮雷斯一行于同年春夏被押往广州，并作为归还马六甲疆土之人质投入监牢。

面对马六甲朝廷的屡次求援，明朝廷声明要求葡萄牙归还马六甲，否则扣押使团直到归还马六甲为止。这种以扣押使节的方式来应对武装占领的葡萄牙人，是一种无能和缺乏国际海洋观的表现。

明朝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关系只是一张政治承诺书，苍白无力。在郑和这样的王师绝迹于东南亚之后，明王朝毫无力度的外交辞令与交涉，挽救不了马六甲王国灭亡的命运。失去了马六甲的明王朝最南端的海上大门大开，从此无法阻挡西方殖民者的东来。

第九节　明朝海航衰落之谜

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明朝便开始停止建造船只，并主张俭约的经济策略，水师以不堪想象的速度崩溃了。

永乐三年（1405 年）的极盛时期，明朝的水师拥有 3500 艘各型船舰，只浙江一省就拥有超过 700 艘船舰组成的舰队。到了英宗正统五年（1441 年），浙江船只的数量还剩不到先前的一半。到了 15 世纪中叶，该省的舰队仅剩一小部分。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 年），如果建造双桅以上的船只，就犯死罪；世宗嘉靖四年（1525 年），明朝廷又下令准许沿海总督、巡抚摧毁所有远洋航行的船只，并逮捕驾驶这些船只下海的商人。几乎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中，全世界最

强大的水师便进行了自我毁灭。

明朝水师迅速自我毁灭的原因首先是政治斗争。宦官与士大夫在明朝的历史中，始终持续着紧张的关系。海上航行与海上贸易是宦官集团惯常涉足的范畴，因此，摧毁海上贸易，就是截断了对手的主要权势与经济收入。

在宣宗去世后，其太子幼小，没有能力应付宦官与士大夫的斗争。宦官控制了厂卫机构，成为财务上的代理人。在复杂的宫廷政治环境中，宦官和士大夫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宦官继续涉足海上贸易，从而引发了朝官对船只大小以及平民参与海外贸易的限制。朝臣们认为即使无法杜绝宦官的贸易活动，也要加以限制。于是建造大型航海帆船的船厂被迫停工，中国人先进的航海科技终于被毁于一旦。16 世纪时，已经很少有船匠知道如何建造大型宝船了。而枪炮的发展也同样迟缓，使得欧洲各国在火力上胜过中国。中国人开始丧失超越西方的科技优势，并且这种优势从此一去不复返。

其次，明朝一连串经济因素也对政府维持建造远航大帆船的船厂与庞大的沿海水师造成困难。永乐十三年（1415 年）大运河的开通，不再需要海上的大帆船载运南方的米粮到北方，船只建造的焦点因此转移到了河上航行的驳船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导致国力衰退，而蒙古威胁的持续增加，令政府有限的军事资源，被从海岸调往长城以北的边境去防守，更令政府无暇顾及海上贸易和海外出航。

更主要的是文化原因。崇尚儒家的朝官们为了科举考试，着重经典的记诵，对创造力或对外国的任何事物没有兴趣。翰林院官员在 15 世纪中叶发展出一种观点：中国以其礼仪教化即足以“绥服”他国；国家无须急于进行对外贸易或对外征伐。

在士大夫看来，宦官热衷的对外贸易以及与海外接触对国家来说完全是没有用的。从此，中国关闭了海上的大门，直至 400 多年后，列强以炮火敲门。

第十节　郑和海航档案销毁之谜

自郑和以后，中国的海洋开拓精神消失了。郑和下西洋这一壮举，被执政当局视为弊政，连有关档案资料也被销毁。郑和和他开拓的伟大事业，也被人试图抹杀。

由于郑和远洋航行的档案资料被销毁一空，许多基本问题至今仍是一团迷雾，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销毁了这批档案。正史中没有记载，几种明人笔记上提到是刘大夏销毁了这批档案，但似乎证据不足，不能定案。

陆树声的《长水日抄》只说刘大夏藏匿了这些档案，未说是销毁了。焦竑在《玉堂丛语》卷五中也说刘大夏是藏匿，没有说销毁。

由于档案被销毁一空，郑和下"西洋"最大的船有多大也是一个谜。根据顾起元的《客座赘语》卷一中有《宝船厂》一条内记载，郑和的宝船折算成今天的公制，最大的船长约150米，宽约61米，排水量约在2万吨以上，相当于一艘轻型航空母舰。宝船的主桅杆高达72米，相当于24层楼房那么高。据雍正《崇明县志》记载，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郑和远航归来，由于船大吃水深，竟进不了浩荡的长江。

对此，有的学者认为，9桅万吨级木质帆船，以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是造不出来的，要完成下西洋的各项任务也不需要这么大的船舶，古今中外也没有过那么大的木帆船。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考古出土船舶文物、大量的文献资料以及木帆船建造工艺的调查研究可以证明，明朝肯定可以造出那么大的宝船。

由于郑和远洋航行的档案资料被销毁一空，不仅宝船的大小成了一道不解之谜，甚至连郑和最远究竟到哪里也说不清楚。

虽然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被销毁了，但随郑和出航的幕僚和译员却留下了许多重要的亲历记录，如《星槎胜览》《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还有当时一些文人的笔记和近年出土的水下考古资料。

现存资料使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郑和所率领的船队规模之大，造船技术之精巧，航海经验之丰富，航程之远，结交国家之多，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

第六章　明宫秘档

第一节　大脚马皇后传奇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成就大业的前后，在他身边有一位贴心辅助他的贤内助，就是人称“大脚皇后”的马娘娘。在民间，曾经流传很多关于她的贤德懿行，有许多关于她帮助朱元璋的故事与传说。

马娘娘，名秀英(1332—1382年)，安徽宿州人。马秀英在小时候，因为父亲仗义，杀了当地富豪，逃亡避难，客死异乡。临终前，将马秀英托付给好友郭子兴抚养。马秀英聪慧过人，深得养父母的宠爱。她在幼年时，就坚持不肯缠足，长了一双天足，人称“马大脚”。由于元朝政治腐败，百姓纷纷起来造反。郭子兴也举旗起义，攻占濠州(今凤阳)。当时，朱元璋就在郭子兴麾下当亲兵，因朱元璋作战勇猛，颇受郭子兴的赏识，就将义女许配给他为妻。

从此，马秀英就一心帮助丈夫，为他排忧解难。朱元璋作战勇敢，屡建奇功，但生性耿直，经常遭到旁人的嫉恨。他曾多次被人诬陷，受到郭子兴的关押与监禁，都是马秀英从中斡旋，使他脱离困境。当郭子兴等人阵亡后，朱元璋逐渐开始掌握军权，一切军状文书则交由马秀英管理，都被处理得井井有条。朱元璋率领部队在与元军以及张士诚、陈友谅等队伍作战时，马秀英便动员义军家属为将士们缝衣做鞋，以供军需。在遇到强敌时，朱元璋的军队作战失利，人心浮动。马秀英毅然散发金帛犒赏将士，稳定军心，鼓舞士气。据说有一次朱元璋在阵前受伤，马秀英在危急时刻仗着有双大脚，竟背着朱元璋逃脱。

朱元璋最后能取得胜利，马秀英功不可没。因而，当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对马秀英非常尊重和感激，并册封她为皇后。

朱元璋打下江山、大功告成之后，为保持以后的统治地位，不断寻找借口屠杀功臣良将。对此，马皇后总是婉言规劝，减少了不少冤狱，保护了很多无

辜臣民。朱文正、李文忠、沐英等功臣,都曾险些被朱元璋治以重罪,都是被马皇后救下来的。富户沈万山曾捐资帮助修筑都城,并要出资犒赏军队,受到朱元璋的嫉恨,欲治死罪,经马皇后的劝说,沈万山被免除死罪,流放到了云南。

在宫中,她一方面主张内侍不得兼任外臣文武官职,杜绝宦官乱政之弊。另一方面大力倡导节俭之风,建议不要大兴土木。她平时粗茶淡饭,并带头缝织衣服,赏赐给王妃和公主们,要她们爱惜财物,知道养蚕种桑的艰难。当臣下进贡珠宝等财物时,她就劝说朱元璋:元朝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才亡了国的,只有招揽贤才,才能治理好国家。这些意见都被朱元璋采纳了。朱元璋一生自负,生性多疑,但对马皇后从来都很尊重。1382 年,马皇后病故,朱元璋失去贤德的妻子,非常悲痛,决定从此不再立皇后,可见他对马秀英的一片真心。

第二节　建文帝下落之谜

朱元璋在早年曾经立其长子朱标为皇太子,但由于朱标早逝,朱元璋便改封长孙朱允炆为皇太孙,让其继承皇位。对于朱元璋的这种安排,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是极为不满的。朱棣多年随朱元璋东征西讨,为大明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洪武三年(1370 年),朱元璋封朱棣为燕王,负责统帅重兵,驻守北平,以防蒙古骑兵进犯。

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71 岁的朱元璋去世,依照他生前的安排,由 21 岁的皇孙朱允炆继位,年号建文,即明惠帝。

大明王朝的藩王们分驻全国要害之地,他们手握重兵,称霸一方,在朱元璋在世之时,不敢有非分之举。但朱元璋死后,他们根本不把建文帝朱允炆放在眼里,不服从中央政府的管辖。为了解决地方藩王对中央皇权的威胁,建文帝采纳了齐泰、方孝孺等人的建议,厉行削藩之策。他先是派兵进抵开封,软禁了周王朱肃,然后将其废为平民。他接着又发兵湖南、湖北,除掉了岷王朱便、湘王朱柏。此后,他又先后将齐王朱博、代王朱桂等人囚禁。这一措施严重损害了地方藩王们的切身利益,几乎所有的诸侯王都对此不满,尤其是手握重兵,觊觎帝位的燕王朱棣。

其实,燕王朱棣早就有起兵反叛、夺取帝位之心,只是苦于没有好的借口,这次建文帝削藩弄得天下诸侯怨声载道,这对燕王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借口发动了“靖难之役”。他名义上是要帮建文帝清除身边的奸臣，实际上就是起兵反叛。

燕王朱棣起兵之后，建文帝急忙征调各地方的军队入京勤王。但是，由于建文帝的削藩，地方诸侯已被他得罪殆尽，使得地方诸侯纷纷投向燕王帐下。建文帝手下虽然有很多文人，但没有几个可以带兵打仗。于是，燕王的军队很轻易地打到了南京城。建文帝见大势已去，下令火烧皇宫。燕王朱棣攻入皇宫之后，没有找到建文帝，便命人仔细搜查寻找建文帝，宫里的太监说建文帝投火自焚了，并从火堆里找出一具尸体指认说是建文帝。朱棣以皇帝之礼将建文帝厚葬，但在正史的文献中没有任何有关建文帝陵寝的记载。

废墟中的那具焦尸到底是不是建文帝，建文帝到底有没有死，没死的话又逃到了哪里？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后世史家和民间传说众说纷纭。

一种说法认为，建文帝并没有死，而是逃出南京，到了贵州的一个寺庙当了和尚。有人甚至还找到了建文帝出家后的隐居之所——贵州安顺平坝县境内的高峰寺。据《平坝县志》记载：高峰山寺内斋堂地下有一个藏身洞，洞底有一块石碑上刻有“秀峰肇建文迹尘知空般若门”的铭文。寺中的另一块石碑上还刻有开山祖师秀峰收留建文帝的经过。以此，后人推测此处就是建文帝出家后的归宿之地。

还有人认为，建文帝出逃之后没有去贵州，而是就近在今兰溪市东山上的一座古寺归隐。寺院里的和尚世代口传建文帝在此削发隐跸的传说，并说寺院中还保留有建文帝的隐居之处和古碑遗迹。在寺院的大殿内塑的是身穿袈裟的建文帝像，两旁分别为伴帝出家的杨应能和叶希贤，殿内的后壁绘有建文帝出逃的路线。此外，寺院内还保留有建文帝出家后所作的几首诗。

还有一种说法，建文帝逃出南京城后，辗转来到武昌罗汉寺。罗汉寺的住持达玄和尚，赶紧将建文帝引入寺中躲藏。过了一段时间后，建文帝等人见此处易被燕王的人发现，他们又在达玄和尚的指引之下坐船前往泉州开元寺，泉州开元寺的住持念海和尚是达玄和尚的弟子。建文帝来到泉州开元寺之后便隐匿寺中，并派人寻找出逃海外的机会。终于有一天，他们乘上了一个阿拉伯商人的货船，随行来到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开始隐居在苏门答腊岛。

对于建文帝的生死和下落的每一种说法，都只是一家之言，因为没有一种说法有十分确凿的证据。也许这将会成为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

第三节　明仁宗险丢皇位

明仁宗朱高炽是明成祖朱棣的长子。朱棣不喜欢朱高炽，一个原因是他太老实仁厚，没有英武之气，不像个君主。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身体不好，患了严重的肥胖症，走路很不方便，必须要两个人搀扶。

朱高炽最终能当皇太子，一是嫡长继承制对朱棣的约束；二是因为他娶了个好老婆，生了个好儿子，朱棣喜欢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朱高炽的王妃张氏有朱元璋的马皇后、朱棣的徐皇后之风，见识远大而乖巧伶俐，是个不折不扣的贤内助。

据史料记载，张氏自从嫁给朱高炽之后，很得成祖和仁孝皇后的喜爱。朱高炽在东宫做太子时，多次被汉王、赵王两位弟弟挑拨离间，又因身体肥胖，不能骑马射箭，明成祖很生气，太子几次险些被换，然后最终能被保全，正是因为张氏的缘故。

朱高炽当了皇帝以后，对朱棣喜欢的长孙朱瞻基反而不喜欢，他喜欢被封为襄王的第五子。

朱棣生前一再表示他立朱高炽为太子的原因是喜欢长孙，而且明确向臣民表明将来继承高炽皇位的只能是长孙朱瞻基。朱棣对孙子的培养远比对儿子用心。

在朱棣在世时，朱高炽在几次重大事件面前都有惊无险，证明他做事极有主见，关键时刻行事非常理智。

朱棣带领二儿子挥师南下时，建文帝的部队直捣燕王的都城北京，而燕王大军在外，如果贸然班师来救，得胜之势将功亏一篑。朱高炽这时带领老弱将士坚守北京城，自己冒着弓矢上城督阵，激励将士，南军终于无功而返。他的这个功劳是日后得到继承权的一个重要砝码。

永乐十六年(1418 年)，明成祖住在北京城，让朱高炽以太子身份在南京监国。他怀疑太子有不轨行为，命令礼部侍郎胡濙暗中监视太子，收集太子的“不轨”言行。而胡濙被太子的老实折服了，朱棣自此不再怀疑朱高炽。

做了 22 年皇帝的朱棣驾崩后，47 岁的朱高炽终于继承了皇位，但他只坐了 8 个月的皇位就去世了。

明仁宗朱高炽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他赦免了建文帝的许多旧臣，平反了许多冤狱，废除了许多苛政，停止了大规模的用兵，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文化得到了复兴，读书人的待遇比洪武、永乐两朝都好。所以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朱高炽的庙号为“仁”。

第四节　品节高洁的张太后

明仁宗诚孝皇后张氏，永城（今河南永城市）人。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封燕王朱棣世子朱高炽妃。永乐二年（1404 年）封皇太子妃。洪熙帝继位，册张氏为皇后。明宣宗宣德帝即位，尊为皇太后。明英宗正统帝即位，尊为太皇太后。

张皇后做王妃时，她能严谨遵循妇人操守，颇得公婆永乐帝与徐皇后的喜欢。她的两个小叔子是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都想取代太子的地位，太子多次被汉王和赵王所离间，她从中保护、劝慰、解释，帮助丈夫保住了太子的位置，没有被易储。

太子体肥硕不能骑射，永乐帝很不高兴。她就让太子减少饮食，加强运动，减轻体重，颇有成效。她的儿子宣德帝初继位，凡军国大政，多禀听裁决。时海内太平，皇帝侍奉起居，陪伴游宴，四方贡献，先奉太后。皇帝与太后，慈孝闻天下。太后游西苑，皇后皇妃伴随，皇帝亲自扶舆登万岁山，奉觞上寿，献诗颂德。去永乐长陵和洪熙献陵，经过河桥时，皇帝下马扶辇。

宣德帝死后，她的孙子正统帝九岁继位，宫中流言四起。张太皇太后急召诸大臣到乾清宫，指着太孙哭泣说：“这是新天子。”群臣呼万岁，流言乃止。有大臣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她则说：“毋坏祖宗法。第悉罢一切不急务。”她时时勖勉正统帝，勤奋学习，委任股肱。大太监王振在太皇太后在世时，不敢专权，违法胡为。

她对娘家兄弟，按规矩办事。张太皇太后对他们不轻易升官赏赐，不许他们搞特权，也不许他们理国事。

到十三陵谒陵时，百姓夹道拜观，陵旁老幼皆山呼拜迎。张太皇太后回头对皇帝说：老百姓爱戴国君，因百姓能得到安居乐业，皇帝应当牢记。回程时路过农家，张太皇太后召老妇问寒问暖，并赐给他们钞币。有献蔬食酒浆者，

张太皇太后就送给皇帝，说："这是田家味。"以此谕诫皇帝，不忘农家。

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张太皇太后病危，遗诏劝勉大臣，辅佐皇帝，惇行仁政，惠及百姓。她的善政，赢得了百姓的赞誉。

可以说，史书所说的"洪宣之治"，张太皇太后也有一份历史功绩。

第五节　明景帝贿赂群臣内幕

明景帝朱祁钰(明代宗)本来不是皇帝，只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弟弟。明英宗好大喜功，听了宦官王振的唆使去跟瓦剌打仗，结果一败涂地，自己也被俘虏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在大臣们的拥戴下，朱祁钰做了皇帝。

景泰帝坐稳龙椅后，有一件事在心里难受得很。原来此时的皇太子还是他哥哥明英宗的儿子，他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但自古以来废立太子一事必须得到大臣们的支持，否则就不得人心。可是，这件有悖常理之事是很难得到大臣们的支持的。这时候，有个叫兴安的太监为他出了一个好主意。

不久后的一天，景泰帝召集内阁成员首辅陈循、次辅高榖等六人开会。但景泰帝只是跟他们随便拉了一些家常，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公事，然后宣布散会，搞得大臣们半天摸不着头脑。散会后，兴安太监分别找到了六位辅臣，一一奉上白花花的银子，具体数额是：首辅陈循、次辅高榖每人100两，其余四位阁员每人50两。这六人都是聪明之人，知道皇帝的目的。

搞定了最重要的六位大臣之后，接下来就是贿赂群臣了，虽然只有区区百十两银子，但其中意思大臣们都心领神会。

收了钱的大臣们一致同意改立太子的倡议。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皇太子朱见深被废为沂王，景泰帝之子朱见济继任太子。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后爆发了著名的"夺门之变"，英宗复辟。景泰帝被废为亲王，软禁于西内，不久气死于永安宫。

第六节　“夺门之变”真相

明宣宗朱瞻基只有两个儿子，长子朱祁镇即为正统皇帝，次子就是郕王朱祁钰。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明英宗朱祁镇被漠北元朝余部势力之一的瓦剌部落首领也先俘获，消息传到北京后，朝廷内外一片惊恐。当时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才2岁，临朝议政的事务落在郕王朱祁钰身上。为安定人心，皇太后孙氏下诏立朱祁镇2岁的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又命郕王朱祁钰为监国，总理国政。朱祁钰提升积极抗击瓦剌军的兵部侍郎于谦为兵部尚书。并调集军队，以都督石亨总京营兵。

九月，朱祁钰即皇位，为景泰帝。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次年为景泰元年。景泰帝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废原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不久，朱见济暴亡，诸臣请求复立沂王为太子，景泰帝固执不从，并笞死了建议官员礼部郎中章纶、御史钟同。

景泰帝继续组织军队抵御瓦剌入侵，并在北京城外给瓦剌骑兵以沉重打击，也先大败，不得已退回草原。风雨飘摇的大明政权终于在此战之后稳定了下来，而景泰帝朱祁钰也因此战稳定了自己的皇帝位。后来于谦说服景泰帝，将英宗迎了回来，并将其软禁在南宫，派人严加看管。

景泰八年(1457年)，突然得了重病。大臣们顿时手忙脚乱，因为接班人还不明确，他们寄希望于景帝突然痊愈，危机便可以暂时得到缓解。文武百官每天都到左顺门问安，每次都是太监兴安出来发布消息，时日一多，他不耐烦了，于是就暗示大臣们早日册立皇储。

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召集大臣会议，请求景泰帝重新册立沂王朱见深为皇太子。会议达成的共识，由内阁大学士商辂起草一份文件。大臣们联名签署的文件送到景帝的病榻前，得到的批示是：“朕的身体并无大碍，过几天就可以上朝，不必考虑接班人问题。”

景泰帝从十二月二十八日一病不起，连最重要的仪式——正月初一的元旦朝贺也不得不取消，到了正月十五，需在郊外举行祭祀仪式，他把武清侯石亨叫到病榻前，命他代行祭祀。

景泰帝看错了人，铸成了大错。石亨虽是一名武将，却机敏过人，在景帝病榻前近距离观察，景泰帝已经病入膏肓这是其他大臣不可能获得的机密信息。一旦景泰帝驾崩，拥戴谁继位，何去何从，必须做出抉择。

石亨从宫中出来，立即与都督张𫐄、都察院左都御史杨善、掌管京营的太监曹吉祥一起密谋。他说：皇上病危，拥立皇太子不如恢复太上皇的帝位。这样可以邀功赏。张𫐄、杨善、曹吉祥支持石亨的主张，考虑到恢复太上皇的帝位带有极大的风险，弄不好将招来杀身之祸，需要得到更多人的参与，周密谋划。于是他们去找太常寺卿许彬商量，许彬表示赞同，并让他们去请副都御史徐有贞帮助出谋划策。

石亨、张𫐄等人连夜赶到徐有贞家中，徐有贞一听此事，大为欢喜，点拨道：一定要让太上皇知道我们拥戴他的意思。必须得到他的赞同，才可以进行。一场宫廷政变正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正月十六日夜，徐有贞事先已经布置张𫐄，借口边关形势吃紧，派遣军队进入紫禁城，以防万一。掌握大内钥匙的石亨在半夜四更时分，打开长安门，让军队把守要害部位。

石亨等人乘着夜色来到南宫，命随行士兵捣毁围墙，进入宫内。但见太上皇已经在秉烛等候，士兵把太上皇抬进轿子。很快就到了东华门，警卫不肯开门，只听得轿子里喊道：我是太上皇！于是大门洞开，一行人马来到奉天门，太上皇在殿上升座，徐有贞带领众人跪拜，口呼"万岁"。

景泰帝前几天宣布十七日早朝会见群臣，文武大臣这天凌晨早已来到宫门等候，忽然听到殿内传来"万岁"的呼喊声，正在惊愕之际，钟鼓声齐鸣，宫门大开。徐有贞出来，向大臣们宣布：太上皇帝复位，请入内祝贺！

太上皇对大臣们说：卿等考虑到景泰皇帝有病，迎接朕复位，各位继续任事如故。

躺在病榻上的景泰帝听到外面的钟鼓声，询问左右侍从，侍从回答：太上皇复位。景泰帝连声说：好，好！这"好好"两个字，可以理解为无可奈何的叹息。

英宗复辟以后，不再沿用"正统"年号，把景泰八年改为天顺元年。

英宗复辟的当天，就任命徐有贞为原官兼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务，次日又加上兵部尚书头衔，实际上成为内阁首辅。石亨晋封为忠国公，张𫐄晋封为太平侯，杨善晋封为兴济伯，曹吉祥的养子曹钦晋升为都督同知。以后陆续加

官晋级的有功官员达3000人。

与此同时，英宗和徐有贞们毫不留情地首先清算了少保、兵部尚书于谦，以及内阁大学士王文。英宗复位后的第五天就处死了于谦和王文，并且抄了他们的家，家属发配边疆。陈循、江渊等人充军，商络、萧镃等人革职为民。

于谦死后，没有什么财产，清贫萧然，仅有一房书籍，还有皇帝赏赐的玺书、袍铠、弓箭、冠带之类。都督同知陈逵感念于谦的忠义，为他收殓遗骸。次年，于谦的女婿朱骥把他的遗骸归葬杭州。

二月初一，英宗以"皇太后诏谕"的形式宣布：废景泰帝，仍为郕王，迁往西内居住。十七日，景泰帝突然病逝。关于他的死，一说病死，一说害死。从种种迹象判断，害死的可能性极大。因为英宗害怕景泰帝东山再起，也来一次复辟。景泰帝的祭葬礼仪一如亲王，但谥号是一个贬义字——"戾"，是英宗对他的盖棺论定。对于景泰帝的嫔妃们，英宗赏赐她们上吊自尽，为"郕戾王"殉葬，一起安葬于西山。

第七节　明宪宗擅宠万贵妃

英宗朱祁镇之子明宪宗朱见深于18岁时继位后，为冤死的于谦平反昭雪，恢复了郕王朱祁钰的帝号，等等。但是，他的这些德政掩盖不了为人诟病的弊政，一是擅宠万贵妃，把内宫和外廷都搅得一塌糊涂；二是任用太监汪直，设立西厂，把特务政治视为不二法门。

万贵妃本名万贞儿，是山东诸城人，四岁时入宫，成为宣宗皇后孙氏的侍女。朱见深被册立为太子，孙太后把万贞儿派去侍奉太子。景帝即位后，朱见深被废为沂王，与寂寞冷清的朱见深朝夕相伴的只有万贞儿。两人的年龄相差17岁，却滋生了超越年龄的复杂感情。英宗复辟后，11岁的朱见深再度成为太子，万贞儿的地位逐渐显要起来。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朱见深即位，对万贞儿多年相伴的依恋之情难以忘怀，18岁的朱见深把35岁的万氏册封为妃子。宪宗娶了一个可以充当母亲的女人为妻，在常人看来，或许离奇，在宪宗心目中，最爱怜他的正是这个妻子与母亲一身二任的女人。甚至在皇后吴氏与万氏发生冲突时，宪宗都毫不犹豫地站在万氏一边。

吴皇后当时只有17岁，一上台就整顿后宫，首当其冲的就是朱见深擅宠的万氏。吴皇后寻找借口，把万氏杖责了一顿。这样的事情，宪宗是不能容忍的，于是他废掉了吴皇后。皇后被废是万氏进谗言的结果。

成化二年（1466年），37岁的万氏生下第一个皇子，宪宗大喜，并且册封万氏为贵妃。但10个月后，她的儿子不幸夭折，以后她再也没有怀孕。

成化四年（1468年），宪宗鉴于地震灾变，颁布罪己诏，向全国臣民检讨自己的过失，唯独不提擅宠万贵妃。内阁大学士彭时向皇帝进谏，强调宪宗富有青春，而无皇子，原因是专情于万氏。希望宪宗对其他嫔妃广施"恩泽"，以广传子嗣。宪宗有些不耐烦了，在他们的奏折上用红笔批复道："后宫的事情是朕的家事，朕自有主张。"

直到次年四月，柏贤妃所生的二皇子朱祐极出世，汹涌的议论才稍稍缓解。

万贵妃把柏贤妃所生的皇子朱祐极收养在昭德宫，成化七年十一月被册立为太子，两个月后就夭折了。死因十分可疑，有传言是被万贵妃害死的。从各种迹象判断，这种传言是有根据的，万贵妃自己不再有孕，就千方百计让怀孕的嫔妃流产，饮药流产者无数。

两个皇子接连死去，使宪宗伤心不已。其实他还有一个皇子，是西宫的纪淑妃所生的。

纪氏是广西土司的女儿，因被俘入宫，因为文化素养很高，负责管理皇室内库。有一天宪宗偶然来到此地，见纪氏应对如流，颇为喜欢，一来二去，使纪氏怀孕了。万贵妃非常妒忌，命婢女让她服堕胎药。宪宗知道此事后，要纪氏谎报病重，谪居安乐堂（养老院），委托太监张敏照看。不久，皇子出生。纪氏害怕因此遭祸，请求太监张敏把婴儿溺死，张敏知道婴儿是皇子，不敢下手，便假称已把婴儿溺死，实际上则抚养在密室中。被废的吴皇后住在西内，离安乐堂很近，获悉此事之后，时时前来哺养。

得到了万贵妃的同意后，宪宗派太监前来安乐堂迎接皇子。此时皇子已经六岁，还未命名，宪宗要礼部草拟，由他圈定为"祐樘"。

外廷大臣得知皇子由万贵妃抚养后，害怕又弄出什么事端，内阁大学士商辂与同僚联名上疏，向皇帝请求把皇子生母移住近处，使母子朝夕相处。纪氏迁居永寿宫后，宪宗多次与她宴饮。万贵妃妒火中烧，设计下毒，致使纪氏病倒，几天后去世。千方百计保护皇子与纪氏的太监张敏，因害怕遭到万贵妃的

陷害,自尽而死。

成化十一年(1475年),宪宗册立皇子朱祐樘为皇太子。皇太后周氏担忧太子的安危,向宪宗提出由她来抚养太子,于是朱祐樘离开万贵妃,来到太后的居所仁寿宫,得以平安成长。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春,万贵妃暴病而亡,宪宗连续七天不上朝。八月间,宪宗追随万贵妃而去。万贵妃的肆无忌惮,完全是因为宪宗的纵容。

第八节　荒诞的正德皇帝

朱厚照是明孝宗唯一的儿子,为张皇后所生,既是嫡子,又是长子。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十八日,朱厚照即皇帝位,时年15岁,改第二年年号为"正德"。

这个15岁的少年,居然会在以后15年的岁月里,把大明王朝搅得乱七八糟,使他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最能恶作剧的皇帝。



朱厚照

在朱厚照周围有一群号称"八虎",引诱他游玩的太监,为首的刘瑾更是一个阴险狡猾之人。

明孝宗给武宗留下了刘健、谢迁和李东阳三位内阁大臣,李东阳比较能出谋划策,刘健善于决断,而谢迁善于提意见。这三个人在当时号称"贤相",但在武宗眼里,他们让他勤于早朝,参加经筵的劝谏是令人厌烦的唠叨。而大臣们则把武宗对朝政的冷漠归结为他身边太监们的诱惑。于是,在朝臣和太监之间,一场皇帝争夺战开始了。

先是内阁大臣联合九卿集体向皇帝上疏,弹劾"八虎"在平时用各种游戏诱惑皇帝不理朝政,要求将他们处死。据说当时武宗被吓着了。他派人去内阁和大臣们商量,把他们发配到南京去就算了,没必要处死他们。但是内阁的态度强硬,非处死不可。武宗就先拖着,慢慢想办法。

"八虎"听到了风声,在刘瑾的带领下,一齐来到皇帝面前跪下哭诉。刘瑾说朝臣在密谋逮捕他们,武宗对于自己不知此事十分生气,就站在"八虎"这边

了。于是他否决了大臣们对于“八虎”的处置意见。三位顾命大臣立即表示不满，要求辞职。武宗立即批准刘健和谢迁辞职回家，只留下了性格比较温和的李东阳。经此一事，刘瑾独霸内廷，很快执掌了朝廷大权。

按照孝宗的遗诏，武宗在正德二年(1507年)八月举行了大婚，迎娶皇后夏氏，后来还娶了两位妃子，但他对皇后和妃子们却毫无兴趣。明代宫禁管理严格，皇帝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管，还要专门记下来以备后来查对。武宗对这种束缚人的制度深恶痛绝，但他知道要改变这种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他把眼光瞄向了宫外。

武宗选中的地方叫作“豹房”。豹房坐落在皇宫西华门外太液池的南岸，本来是皇家豢养猛兽的地方，武宗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以扩建，称这里是自己的“新宅”。从此以后，一直到死，武宗都住在这里，明朝的政治中枢实际上也从皇宫中心搬到了豹房。

豹房不属于大内，武宗在这里不用受那些繁文缛节的困扰，可以自由自在充分发挥自己的兴趣。他天资聪颖，兴趣也十分广泛，对什么都是一学就会。从斗鸡走狗、骑马射猎到吹拉弹唱，甚至梵文和阿拉伯文，都无所不通。武宗搬进豹房后又养了不少凶猛的虎豹，他闲暇时便观赏这些猛兽斗来斗去，有时还亲自下场跟虎豹斗上几下，不惜被抓伤。武宗还召集天下善搏虎豹的人，入豹房做“勇士”。

武宗喜欢姿容美艳妖娆、皮肤白皙细嫩的色目女子，他下旨让西域进献12个擅长歌舞的舞女。等到美人一来，武宗天天没日没夜地观赏歌舞。他觉得这12个美人还不够，就在京城的色目人家大肆搜索，把他们的女子招来歌舞，其中尤其美艳的，就留下来供他玩弄。

明武宗喜欢的一个女子叫王满堂。她是霸州百姓王智的女儿，从小生得俏丽动人。武宗听说她是个美人，就把她召入豹房，大加宠爱。

武宗还在豹房里开设了一条街市，建有定和、宝延等六个店铺。他自己穿着商人的衣服，戴着小太监的帽子，在这六个店铺里跟他们做买卖，持簿算账，讨价还价，玩得好不高兴。这个街市的街头有各种杂耍，沿市还有当垆卖酒的美妇人。但武宗还觉得不过瘾，又让那些豹房的美人们都扮作歌伎粉头，他挨家挨户地进去听她们唱曲，兴致一来就淫乐一番。正德帝还专门建造了一间“乐室”，在四壁和屋顶都嵌上镜子，地下铺着厚厚的锦被，他在那里命两个美人相陪，三人赤裸裸一起行乐，映到周围的镜子里，正是一幅幅“活春宫”。

豹房里美女如云，乐在其中的明武宗不会关注群臣们的奏章。刘瑾常常趁着武宗正玩在兴头上的时候，把奏章拿给正德帝看，于是武宗就不耐烦地让他自己去处理。于是刘瑾大权独揽，权势熏天。他把朝臣们当作了眼中钉。有一次，他曾经借口有朝臣写匿名信骂他，让朝臣们在中午的太阳下集体罚跪，有些身体不好的朝臣因此而死去了。刘瑾的滔天权势召来了“八虎”中其他人的侧目，朝臣们抓住这个机会，让其中的一位天天在武宗面前哭着说刘瑾要谋反。武宗真的在刘瑾家里搜出了几百副甲胄，他于是下令将刘瑾凌迟处死。

武宗虽然杀了刘瑾，但依然贪玩如故，玩闹的本性一直到死也没有改变。关于正德帝的荒唐事真是不胜枚举。

正德帝一心想出宫玩玩，可被大臣们死死堵在紫禁城里，不让他出门，还老在他耳边念叨要读书、勤政、亲贤臣远小人。正德帝烦死了，就想出一个“朱寿”来，让朱寿做大将军，做太师，大夸朱寿。其实，朱寿就是正德帝朱厚照。

机会终于来了，宁王造反。正德帝大喜过望，马上要求“御驾亲征”。这回，大臣们不好拦他了。正德帝高高兴兴地“郊游”去了，孰料纵马过卢沟桥时，大意把宠妃刘氏相赠的簪子掉了，正德帝按兵不行，让三军将士趴在地上搜索簪子。找了三天没找着，正德帝悻悻地继续南行。

到了涿州，前线传来南赣巡抚王守仁生擒宁王的消息。正德帝闻报，顿足大骂王守仁，骂完后对王守仁的捷报不承认，也不宣传，下令继续南征。

到了山东，正德帝嫌当地安排的宴席不好，不吃，也不生气，笑道：“慢我何甚！”

到了扬州，正德帝大索美女。不过，正德帝也觉得拆散夫妻不对，所以只抓处女和寡妇。正德帝不为色，不为享受，而是关起来当肉票，让家人拿钱来赎。

正德帝在扬州钓了一条鱼，以五百金的天价强卖给太守蒋瑶。蒋太守没钱，就把妻子的首饰都拿出来了，说：“臣没钱，只有这些了。”

随驾的太监索贿不成，就用铁链把蒋瑶绑了好几天。扬州官府去求正德帝，正德帝立刻下令释放，成全蒋瑶的贤名。

正德帝一路闹下去，花了8个多月时间才到南京。王守仁早在6个月前就把宁王押到这里等着了。半年来，王守仁多次苦求皇帝受俘，正德帝一概不准。后来，王守仁终于开窍了，重新报捷，说太师“朱寿”运筹帷幄、指挥若定，

迅速平定宁王叛乱，对自己苦战恶战之情一字不提。捷报递上去，正德帝高兴地准奏。不过，他下令在南京玄武湖上重新“平乱”：把宁王安置在一艘船上，自己指挥大军再把他抓一次。受俘之后，大军北返。同样的道路正德帝又玩了一遍，觉得无聊，竟然要释放宁王，要和宁王再玩“打仗游戏”。大臣们瞠目结舌，好在正德帝在清江浦捕鱼时，自己驾的船翻了，落水着寒，玩不了了，只好迅速返回北京。

正德十四年(1519 年)，正德帝在游巡江南时颁行了“禁猪令”。百姓如若违反禁令，全家发配极边永远充军。

发边充军是古代一种非常严厉的处罚法令，明朝更甚。明朝的流罪分为三等，分别为 1000 千米、1250 千米和 1500 千米，流放充军者因为长途颠簸和水土不服，多半会客死他乡，幸存者终生不得返乡。可见，明武宗对违反“禁猪令”的惩罚是很重的。

“禁猪令”一出，引起了全国轰动。那些深恐引火烧身的百姓立刻把家里的猪全部杀掉，减价出卖，小猪也全部被杀死埋掉。这使得所有活人吃不到鲜美的猪肉，就连祭祀仪式上也不得不用羊肉替代。

明武宗生于辛亥年，生肖属猪，且“猪”与“朱”同音，所有人都应该避讳。显然，明武宗已经把养猪、杀猪这件民间寻常事视为对皇帝的大逆不道行为。明武宗还抛出了吃猪肉会生疮，会对健康不利等荒诞观点。

明武宗发布“禁猪令”之后，受影响最大的是江北地区，后来一直蔓延到京师。一个月后，留守京师的内阁大学士杨廷和才知道这件事，于是他于正德十五年(1520 年)二月专门就此事上了一道《请免禁杀猪疏》。他从崇尚科学和关心民生的大局出发，逐条驳斥了明武宗所有的禁猪理由，并建议重新颁诏天下，废止禁猪令，让百姓安于生计。正德十五年(1520 年)三月，礼部上奏说国家的正常祭典都要用牛、猪、羊“三牲”，如今猪肉绝迹，无法按常例进行，请求更改。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明武宗不得不悄悄地取消禁令，内批仍用猪，只是在圣驾所过地方稍微回避即可。这场施行了 3 个月的荒唐的禁猪闹剧宣告结束。

第九节 嘉靖帝的荒唐事

明嘉靖皇帝朱厚熜昏庸无道,极度追求"长生不老"。他在位45年,最大的特点是偏信方士邪术,竟然征召数千少女入宫,逼献经血,供其饮用。

据说朱厚熜小时候常患病,有一次上吐下泻,面红耳赤,茶饭不思,连宫中的太医也把不准脉。于是,家人请来了江湖方士来驱邪。那方士从香炉中抓了一把香灰,在自己脖子上揩了几把汗,又吐了口唾沫,揉成团团,称为"仙药",让朱厚熜服下。两天后病好了。从此,嘉靖皇帝的脑子里就种下了相信方术的种子。

朱厚熜做了皇帝以后,由"仙药"治病想到应该有能使人长生不老的"仙丹"。于是,他向天下征求长生不老的"仙丹"炼制方法。

有一天,有个鹤发童颜的老者进宫求见,自称已经八百岁。嘉靖亲自赐座,急急地讨教长生之法。老者很神秘地向他说道,取千名雏女初次月经,可练成"先天铅丹"。此丹是雏妇人经水炼制而成。雏女经水系阴中之阳,纯火金精,凝胎元之气。吃一颗能固体;吃一双则精神不倦;如果常吃不断,就会童胎重返,青春永驻。

嘉靖帝于是一声令下,按这名老者建议的方法行动起来。

他昭示天下,大选8～12岁的少女入宫。一时选不够,就派官兵到民间去抓。淫威之下,数千少女进了宫。她们尽失自由,待月经初潮来了以后,阴部裹一块白绫绸,经血采出,越鲜越浓者则奖,色淡量少者则罚。许多少女体弱多病,营养不良,月经来得迟,被以欺君之罪惨遭斩处,如此死去的就有600多人。

依靠一些药物,嘉靖帝还疯狂地对少女们进行了所谓的"采补"。暴戾、好色的朱厚熜渐渐引起了宫女们的怨恨,她们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残酷的折磨,私下商议要杀死嘉靖帝。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二十一日夜,嘉靖帝在其宠爱的曹妃宫中饮宴嬉乐了一整天,晚上倒在曹妃床上酣然入睡,曹妃则到另一间房歇息。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们趁他熟睡之时,潜入了他的寝室。杨玉香把一条粗绳递给苏川药,苏川药又将拴绳套递给杨金英。邢翠莲把黄绫抹布递给姚淑皋,姚淑

皋蒙住朱厚熜的脸，紧紧地掐住他的脖子。邢翠莲按住他的前胸，王槐香按住他的上身，苏川药和关梅秀分把左右手。刘妙莲、陈菊花分别按着嘉靖帝的两腿。待杨金英拴上绳套，姚淑皋和关梅秀两人便用力去拉绳套。眼看她们就要得手，绳套却被杨金英拴成了死结，最终才没有将嘉靖帝杀死。宫女张金莲见势不好，连忙跑出去报告方皇后。前来解救的方皇后也被姚淑皋打了一拳。后来总牌陈芙蓉把管事的叫来了，这些宫女才被捉住。嘉靖帝虽没有被勒断气，但由于惊吓过度，已处半昏迷之中，好久才醒来。

事后，司礼监对行凶未成的宫女们进行了多次的严刑拷打，对她们逼供，但供招均与杨金英相同。最终司礼监得出："杨金英等同谋弑逆。张金莲、徐秋花等将灯扑灭，都参与其中，一并处罚。"

嘉靖帝后来下了道圣旨："这群逆婢，并曹氏、王氏合谋弑于卧所，凶恶悖乱，罪及当死，你们既已打问明白，不分首从，都依律凌迟处死。其族属，如参与其中，逐一查出，着锦衣卫拿送法司，依律处决，没收其财产，收入国库。陈芙蓉虽系逆婢，阻拦免究。钦此钦遵。"刑部等衙门领了皇命，就赶紧去执行了。有个回奏，记录了后来的回执情况："臣等奉了圣旨，随即会同锦衣卫掌卫事、左都督陈寅等，捆绑案犯赴市曹，依律将其一一凌迟处死，尸枭首示众，并将黄花绳黄绫抹布封收官库。然后继续捉拿各犯亲属，到时均依法处决。"圣旨中提到的曹氏和王氏，是宁嫔王氏和端妃曹氏，因此有人根据这道圣旨得出结论：是曹氏、王氏指使发动了这场宫廷政变。

司礼监题本中记录了杨金英的口供："本月十九日的东梢间里有王、曹侍长(可能指宁嫔王氏、端妃曹氏)，在点灯时分商说：'咱们快下手了罢！强如死在他手里。'"有些人便以这一记载作为主谋是曹氏、王氏的证据。

然而有人则认为如果主谋是曹氏和王氏，那么史料上应该记载宁嫔王氏和端妃曹氏的情况，而在以上所述的行刑过程当中，却从未见到过对曹氏和王氏的处置的描述，因此主谋是谁尚不能断定。

史家们对宫女弑君发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种解释。

第一种观点认为，"壬寅宫变"是由于嘉靖帝为炼制长生不老的丹药、酷虐宫女所致。当时，司礼监审问宫女的口供记录中，有"咱们下手了罢！强如死在他手里"的话。据此推断，这时宫女们一定处于危险的境地，将被置于死地。反正死是难免的，不如先下手为强，拼死一搏，杀死嘉靖皇帝。而各种资料表明，事件发生前宫女们并没有做错事情，既无大错而又面临危险，推察情由，这

件事很可能是嘉靖帝炼制长生不老丹药所致。朱厚熜贪恋女色，纵欲无度，他自己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而越是这样，他又越是迷恋道教仙术，以求长生不老。一些有名的方士、佞臣都以进献房中秘方或炼丹药而大发横财。

为了投皇帝所好，当时搜集进献各种房事秘方、炼制或炮制各式长生不老丹及房中药的风气流行大江南北。当时所进献的秘方和炼丹药可谓五花八门。其中"红铅"作为最流行的炼丹制药之法，是将处女月经和药粉经过拌和、焙炼而成，形如辰砂。还有一种"含真饼子"，即婴儿出生时口中所含的血块。据说这些药物能够起到强身健体和增强性欲的作用。在"壬寅宫变"两年前，宫内这种炼丹之风达到了顶峰。嘉靖帝信用方士段朝用等人炼制丹药，不惜牺牲宫女的身体，甚至年轻的生命。此外，为了防止泄露炼药的秘密，甚至可能杀掉取过血的宫女灭口。可以推测，当时部分宫女亲眼看见宫内姐妹们饱经残害的过程，自知这种灾难早晚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因而才决定拼死一搏，她们明知无论能否成功，死是在所难免，但既然怎么都是死，不如与嘉靖皇帝同归于尽。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宁嫔王氏首谋发动这次宫变的。朱厚熜自嘉靖元年大婚后，身体很虚弱，经常气喘、咳嗽，直至嘉靖九年还没有孩子。嘉靖十年，嘉靖帝在宫中钦安殿建坛求嗣，以求得到一个儿子。起初，以礼部尚书为监礼使，文武大臣轮流值班进香，依然没有效果。直到嘉靖十五年，嘉靖帝请道士邵元节等主持祈坛。当年，后宫妃嫔就生了男孩，此后又生了几个孩子。宁嫔王氏也在这期间为嘉靖帝生了一个儿子，按惯例，她应该由嫔晋封为妃，但嘉靖帝没有晋封她。因此宁嫔王氏心存不满。她便在嘉靖帝夜宿于宠妃曹氏宫中时，指使杨金英等宫女将皇帝勒死以作为报复，同时也可把责任推到曹氏身上。这一说法大抵是根据一般宫闱斗争的逻辑所进行的猜测，但于情理并不符。因为，一个生有皇子的妃嫔，为了争宠而冒如此大的风险，是没有必要的，十几位宫女为给主人争宠而不顾生死谋害皇帝，而且这么多人如此一致的态度，可能性也不大。

第三种观点认为，嘉靖帝喜怒无常，任意残害宫女而导致了这次宫变。据历史资料记载，嘉靖帝性格残暴，喜怒无常，任意对待臣子和后宫。孝洁皇后陈氏仅仅因为对嘉靖帝好色有所不满，嘉靖帝便雷霆大发，陈氏和她腹中的孩子一起死去。陈氏死后，嘉靖帝立顺妃张氏为后，宠爱有加。然而，嘉靖帝就因为一件小事，一怒之下废了张氏，改立德妃方氏为后。方氏在"壬寅宫变"中

对嘉靖帝有救命之恩,但她处死了皇帝宠妃曹氏。嘉靖帝心有戒恨。几年后,后宫失火,嘉靖帝竟然眼看着大火燃烧而不救,使方氏在惊吓中死亡。

对皇后都是如此,嘉靖帝对待出身低微的宫女宫婢当然不看在眼里。宫人只要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嘉靖帝从不宽恕,痛加责打,因此多达200多位宫女被打死。这种非人的待遇使宫女们担惊害怕,蓄谋拼死斗争。而这起宫变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宫女才发出"咱们下手了罢,强如死在他手里"的呼声。

第四种观点认为,此次宫变与一妃一嫔有关。推测可能是一场政治斗争。明武宗死时没有留下子嗣,也未留遗嘱,临终时告诉身边太监,由太后与朝臣商议酌定立嗣之事。经慈寿皇太后与朝臣商议,兴献王之子朱厚熜被迎立,即明世宗嘉靖帝。论辈分世宗与武宗为堂兄弟,如按继承皇位的要求,他应尊重皇家传统,称自己生父兴献王为叔父,而尊武宗之父明孝宗为父。但朱厚熜却希望尊自己的生父为皇考,甚至想追封兴献王为皇帝。由于皇统的问题事先没有讲明。导致朱厚熜即位后朝廷争论不休,很快一场政治风波在嘉靖初年上演。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代表的一方主张尊重明朝的皇统,而以张璁等人为代表的一些大臣则迎合嘉靖帝私意,要求按照嘉靖的意思行事。明廷上下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一场史称"大礼仪"的激烈争论,延续近20年。这场斗争表面上是礼仪之争,实际上则是朝臣与皇帝、朝臣各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

大礼仪刚刚以嘉靖帝的胜利宣告结束,就发生了"壬寅宫变",而且与一妃一嫔,即端妃曹氏和宁嫔王氏有关,因此推测是政治斗争失败者利用妃嫔除掉嘉靖帝的结果。

总之,这次宫变因何而起,正史没有能够给出明确的解释,人们对此只能做出种种估计,但证据都不够充足,无法使各家看法统一起来。

嘉清帝一心想长生不老,在位45年,有一半以上时间不理国事,一帮宠臣投其所好,到处搜罗方士和秘方,许多人因此一步登天,更有文人因为给他撰写青词(道教仪式中向上天祷告的词文)而入阁成为宰相。严嵩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然而,无论是道士们的斋醮,还是甘露、丹药、房中术,都没能"强健"嘉靖帝那孱弱的身体。过度的纵欲与滥服所谓的"丹药",只能加速他的生命衰亡。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嘉靖帝重病不起,次年十月去世,结束了他寻神弄仙的一生。他死时口含的一颗"仙药",据说是用婴儿的指甲壳和老妪的眼泪合炼而成的。

第十节　万历帝的“课程表”

明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初三日,10岁的皇太子朱翊钧即位,改元万历,是为万历皇帝。他的父亲隆庆帝在留给他的遗诏中,除了国事以外,“进学修德”成了遗嘱的重要内容。其实这一年的三月,朱翊钧就已正式“出阁就学”,为将来成为一个称职的皇帝作准备。

皇帝就学,分为日讲和经筵两种。日讲是学习平常的知识,经筵则是为皇帝讲授经传史鉴特设的讲席。日讲为经常性的学习,经筵为不定期的讲座。皇帝年幼时日讲尤受重视。

张居正因做过隆庆帝潜邸时的师傅,这段经历是他能在隆庆朝入阁的重要因素。因此他承担起了小皇帝学习的事务。

这一年的六月,张居正上疏为万历帝初步排定了上朝与日讲的日程表: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其余的日子做日讲。这就是说,每10天里有3天上朝,其余7天日讲。对每天日讲的内容,张居正专门上奏了《日讲仪注八条》,对其做了相当细致的规定。

《日讲仪注八条》规定,每日天不亮皇帝就要起床,早饭后到文华殿听日讲。第一节课是学习儒家经典著作《大学》和《尚书》,先是传统式的通读背诵,然后是讲官串讲。课间休息时,还要在司礼监太监的协助之下处理奏章以锻炼应对国事的实际操作能力。第二节课是正字课,万历需工工整整写若干幅字,由正字官指点,接受他们中肯的意见。第三节课主要是有选择地讲解《资治通鉴》,通过探求历代兴亡的规律,借鉴其中的帝王统治经验。三节课上完时,已是中午,用完午膳后,皇帝起驾还宫,一天的日讲结束。

另外,即使上朝不日讲的日子,万历仍需温习经书或习字,如果遇到疑难问题,应在讲官讲完后及时向辅臣发问。一年四季,除了过年和大寒、大暑等天气外,皇帝并没有假期。万历帝生母李太后对其管束严格,每逢经筵日讲之后,总要他复述一遍,如遇到该背却没有背下的,万历就要受到训斥,甚至罚跪。

经筵的仪制要比日讲隆重得多,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官员亲自参与其事。经筵分在春、秋两季进行。月凡三次,逢二进行。春讲,从二月十二日开始,到

五月初二日结束；秋讲，从八月十二日开始，到十月初二日结束。全年共15次。经筵主要讲解四书五经，结束后光禄寺在皇极殿（今太和殿）东庑设宴款待参加经筵的官员。

为了让小皇帝能更快地从历史经验中学习治国的方法，张居正于隆庆六年（1572年）向万历进呈《帝鉴图说》一书，该书由张居正命讲官马自强等人考究历代帝王事迹，选取"善可为法者"81事，"恶可为戒者"36事，每一事配一幅图，后面附以传记本文，图文并茂，很适合少年皇帝的心理。万历对此书十分喜爱，常将之置于座右，便于随时翻阅，借以明理澄性，每逢讲读之日，便让张居正解说，习以为常。

课余时间，万历帝对诗词、对联、书法等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万历帝酷爱书法，写得一手好字。习字时先摹赵孟頫，后专章草。万历帝经常借兴挥洒盈尺大字赏赐给辅臣们。他曾赐首辅张居正、次辅吕调阳、六卿、讲臣六人字。张居正等人虽然事后上疏称颂御笔，但同时也委婉地规劝万历帝在此方面不必过分花费精力，并指出"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者，并列举汉成帝、唐玄宗通晓音律，梁元帝、陈后主、李后主、宋徽宗能文善画，可他们的这些才华对治理天下丝毫无补，皇帝应该及时"讲求治理，以圣帝明王为法"。张居正尽心尽力地对万历帝提出了殷切希望，希望他勉力尽心，能达到或超过前代贤王，再现大明帝国的辉煌。

然而事与愿违，万历帝亲政后不仅没能将其少年学习时的勤奋精神带到治理国事中来，还成了几十年不上朝的怠政的皇帝，终将明王朝推向了灭亡边缘。

第十一节　被迫"守法"的万历帝

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是宫女所生，朱常洛的弟弟朱常洵为皇贵妃郑氏所生。万历喜欢郑氏，欲立朱常洵为太子，但是按照明朝祖制，应该立长子为皇太子。如果立朱常洵为皇太子则属"废长立幼"，不但违反祖制，也不合儒家"立嫡、立长"的继承原则。因此，万历采取了拖延策略，迟迟不立太子。

万历十八年（1590年），朱常洛七岁半，还没有出阁讲学，很多朝臣深感不安，担心他长大后不能和文官正常交往。但出阁讲学必须具有太子的名义，否

则就名不正言不顺。因此，京官集体向文渊阁的四个大学士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运用自己的声望，敦促万历皇帝册封朱常洛为太子。于是，以首辅申时行为首的四个大学士向万历皇帝提出了辞呈，理由是不立太子他们无法向百官交代。万历没有接受他们的辞呈，不过他宣布，他无意废长立幼，如果一年之内朝臣不再以立储之事打扰他，他可以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立朱常洛为太子。如果再有人以此纠缠，立储就要延后。

在这一年里，群臣不再以立储相催促。万历十九年(1591年)，工部的一位官员因为万历帝允诺的册立太子的期限在即，立储大典的各项开销理应由他负责筹备，他就编撰预算，呈请万历帝批准。万历帝的朱批说，他早已声明不准臣下在一年之内催促他立储，这个工部官员借编撰预算为名而行催促之实，这就是违反了他的命令，而他也就必须延后立储。这种缺乏诚意的节外生枝使群臣深感忧虑，于是他们联名奏请万历帝收回朱批，并希望他将亲口许诺的明春立储一事付诸实现。

这一大规模的抗议使万历帝震怒，他找借口处分了相关官员。不过他也很清楚，无论他多么宠爱郑贵妃和朱常洵，废长立幼之举绝不会被朝臣所接受。如果公开坚持自己的主张，势必引起大规模的流血，而且流血之后未必能如愿以偿。万历帝一时找不到充分的理由公开自己的意图，他只能找出种种借口来拖延。

他找的第一个借口是朱常洛年龄太小，经不起各种典礼的折磨；第二个借口是立储大计属于皇帝的职权，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干扰；第三个借口是皇后年纪尚轻，仍有生育的可能，如果皇后生下儿子，那就是当然的太子。

这同样引起了官员们的抗议，这一局面竟然维持了10年。万历不立皇太子的事引起了皇太后的关注，当皇太后问万历帝不愿立朱常洛位皇太子的理由时，万历帝说朱常洛是宫女所生，不能立为太子。皇太后大怒，指着万历说："我本来也是宫女，你也是宫女所生。"万历帝这才迫不得已立朱常洛为皇太子。此时朱常洛已经20岁了。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万历与群臣间的立太子之争。"立长"这一法律对万历皇帝起到很大的约束力，使得他最终立朱常洛为皇太子，使法律战胜了王权。

第十二节　天才的木匠皇帝

朱由校是明光宗朱常洛的长子。朱常洛苦等数十年终于登上了皇位，却在位仅一个月就撒手西去。朱由校在乾清宫即位，是为明熹宗，年号“天启”。

朱由校即位时只有16岁，他生性活泼好动，加之心灵手巧，对制造木器到了痴迷的程度。凡是刀锯斧凿、雕刻上色，甚至是创新设计，他都能信手拈来。但他却对处理国家大事毫无兴趣。

朱由校常常雕刻一些小人、小玩具或小动物，每一个的造型都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他派身边的太监把这些木雕拿到市场上去卖，总是能卖到很高的价钱。他还常常将一些精雕细刻的作品赐给身边的太监和大臣。他身边的一些太监因为做他的助手，久而久之，也都受到他的影响而变成了能工巧匠。

据说，朱由校最得意的作品是一整套的护灯小屏。在长不足30厘米的地方，他雕刻出了生动逼真的花鸟鱼虫、人物走兽。太监把这套作品拿到市场上去卖，要价就是10万两白银，可是仍然有人抢着买。

朱由校还想做一个出色的建筑师。凡是被他看过一眼的亭台楼阁，他都能够照原样制作出来。他曾经在宫中仿照乾清宫的样式做了一座微缩模型宫殿，高不过1.3米，但曲折微妙、巧夺天工。

天启五六年（1625－1626年）间，朝廷对紫禁城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三座主殿进行大规模的重建，朱由校在工程中大显身手。从起柱到上梁再到外部装饰，他都亲临现场，仔细指导，还会和工匠们一起大干一场。



朱由校

朱由校有时还会在宫中建一些小巧别致的房屋，内设精密的机关。建成后他总是找来身边的人一起欣赏。时间一长，他的兴趣过去了，就派人立即毁掉，再重新建造别的花样。即使是按照他的设想，需要在门上安装一颗宝石装饰门环，也毫不减料地照样去做，力求做到尽善尽美。等到房子被拆掉的时候，这些贵重的材料与其他建筑垃圾一起被废弃了，宫中的太监有许多人都借此发

了横财。

朱由校还发明了中国最早的喷泉。宫中的人都叫这种喷泉为铜缸水戏。那时宫中都用铜缸或木桶盛水饮用，他就在这些盛水的容器下方凿一个孔，在里面设置机关，机关使得缸中的水飞散出来，有时泻如瀑布，有时散若飞雪，最后变成一根玉柱，打击放在缸外面的许多小木球，木球就浮在水尖上，随着水的喷吐而跳跃不已，久久不息。

朱由校的木雕手艺非常高超，他经常雕一些演傀儡戏用的人物，男女不一，形象各异，上面全涂上五彩油漆，一个个栩栩如生。这些小木人的脚下分别安置一块小木板，使之浮在水面上。通过机关可操纵小木人在水面上移动，再随着动作配上声音，就成了一台精彩绝伦的好戏。

朱由校对国家政事不处理而热衷当木匠，让明朝政坛悄悄崛起了一股政治势力，这就是魏忠贤太监集团。

魏忠贤不但控制着昏庸的朱由校，还在要害部门安插亲信，组织听命于自己的官僚集团，构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太监集团，以求把持天下。

魏忠贤通过各种手段窃得了批朱之权，此后便使不肯依附于他的朝臣们处处受其掣肘。内阁拟定的意见常常得不到批准，有的甚至石沉大海；而“皇帝”不与内阁大臣商量就直接发出要求执行的“中旨”却越来越多，违背了原有的程序。朝臣们知道这是魏忠贤在作祟，于是开始对他进行弹劾。其中以天启四年(1624 年)的都御院左付都御史杨涟上疏最为著名，他参魏忠贤 24 大罪行。而朱由校未看奏疏，只听魏忠贤一面之词，就指责杨涟“捕风捉影，门户之见，大胆妄言”。魏忠贤此后更有恃无恐，恢复“廷杖”之刑，对不依附他的官员任意罗织罪名，进行迫害。

魏忠贤凭借朱由校的宠信为所欲为，大力培植私党，疯狂打击异己。他在皇宫内组织起了一支一万多人的宦官武装。他还加强和控制锦衣卫、东厂特务组织，偶尔有人说一句不满魏忠贤的话，被特务侦知，就会立即被捕，惨遭杀害。以顾秉谦为首的内阁，对魏忠贤卑躬屈膝，如同奴仆。如果朝臣在路上遇见魏忠贤，必须跪地叩头，高呼“九千岁”。全国各府州县，到处为魏忠贤建立生祠。百姓入祠必须跪拜，否则就有被杀头的危险。宦官的气焰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明王朝的统治也腐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朱由校的个人爱好，给大明王朝带来了不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

第十三节　守财亡国的崇祯帝

明朝的崇祯皇帝，特别喜欢攒私房钱。崇祯皇帝很勤政，可不知什么原因，他很吝啬皇家私房钱，对动用内帑非常敏感。

崇祯在除去魏忠贤后，大明朝此刻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北方的女真族努尔哈赤的后金势力。

崇祯元年(1628 年)冬，崇祯起用了辽东旧帅孙承宗的爱将袁崇焕，授以督师之名，命其出镇辽东。袁崇焕一到辽东，就面临辽东军团已经缺饷四个月的大难题。

先是辽东巡抚毕自肃屡屡上奏请饷，但户部一直未作回复。到了宁远、锦州边兵哗变兴起，才倚仗当地军政部门的储备发出了大约 2 万军饷，而库房存银已告罄。之后又由毕自肃等人出面，向当地商户贷借了 5 万两银子来充当军饷，可饷银依然短缺不足。而北京户部的官员又一再地说目前外库缺钱，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陆续筹措完毕。

于是，袁崇焕上疏崇祯帝，请求暂且借用皇帝内库的私房钱，先发军饷救急，以平息缺饷军哗。然而崇祯帝对这个建议极为抵触，并认为辽东部队缺饷哗变的原因是袁崇焕以及辽东将帅们未能对待部属如家人父子一般。

在此事的处置上，袁崇焕为了不得罪户部而委曲求全，已然有些枉杀无辜。当时他为平息军哗，放过了两名为首官员，斩杀了十六名从犯。为此，袁崇焕颇为时人所诟病。

部队的将士是在为大明王朝和崇祯皇帝卖命，这军饷原本就是朝廷应该发的。崇祯帝好像一点都不明白，这些人是在为他守江山。按照他的说法，朝廷不用发军饷，明军将士们可以照样去为皇帝和朝廷打仗。

崇祯帝和一部分大臣的这种态度，正是引发明末农民起义，且起义屡镇屡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原本西北、西南的农民军，主要是由无组织无训练的饥民、流民组成的，他们基本上没有军事素质。但随着大股明军的加入，使得他们的军事素质大为提高，原来屡战屡败的不少“流寇”，突然变成了与明军一样有鲜明军事结构和具备标准军事训练水准的部队，最终颠覆了大明王朝。

明朝末年官兵之害尤甚于"流寇"。官兵们转而为"寇"抢劫百姓，而"流寇"们却打出"剿兵安民"的旗号去争取民心，顿时官匪殊难分清，整个情况已经颠倒，大明朝焉能不亡？

舍生忘死抗击清军的袁崇焕和辽东将士们不但吃不饱、无钱养家，还因讨要拖欠军饷而被指责。在崇祯三年（1630 年）让袁崇焕含冤九泉的罪状中，就有袁崇焕勾引清军犯北京，乃是企图挟持朝廷以邀功邀钱这一条。

第十四节　连犯"大案"的郑贵妃

郑氏，万历皇帝朱翊钧的贵妃，长得娇艳妖美而又最善于迎合。她一入宫即被越级加封为贵妃，甚至地位跃居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之上。

郑贵妃一心想当皇后，希望自己的儿子朱常洵成为太子，但是皇帝却立了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对郑贵妃来说，是个沉重打击。万历四十二年（1614 年）的二月，李太后死去，郑贵妃的顾忌再也没有了，一手策划了宫廷两大谋杀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五月初四傍晚，一个不知姓名的汉子，手持枣木棍，悄悄地闯进了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直冲到大殿前檐下才被内侍抓获。

经查证罪犯名叫张差，他供出自己谋害太子的行动是郑贵妃的心腹宦官庞保、刘成所指使。郑贵妃越想越害怕，于是到万历帝面前，连哭带号地要求给她做主，不然的话，就要死在皇帝的面前。经她这么一闹腾，万历帝心软起来，他要郑贵妃去找太子求情。郑贵妃到了东宫，装出十分可怜的样子，抽泣着，一见太子便俯身下拜。朱常洛毕竟年轻，对宫廷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没有经验，便很痛快地让手下草拟一道旨意，要朝中大臣们不必再为此事多加纠缠，既然凶手已抓到，即刻正法就是了，不要牵扯他人了。

5 年后（1620 年），万历皇帝病死。朱常洛继位，是为泰昌帝，可他在位才 30 天便驾崩了。

梃击案了结以后，郑贵妃见朱常洛皇太子的地位不可动摇，为将来着想，索性极力去接近朱常洛。郑贵妃先是把自己最喜爱的珠宝献给朱常洛，又在自己的宫中选送 8 名最漂亮的美女给他。朱常洛从此开始整日沉湎于酒色之

中，年纪尚不足四十，却早已垮了身子。等到即位称帝时，就已经病入膏肓了。后来，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一颗红丸，自称是仙丹，泰昌帝服后，觉得精神大有好转。过了半日，李可灼又献上一颗，泰昌帝服后竟再也没有起来。泰昌帝一死，内外官员都要严查凶手。但最后却只把李可灼充军，而与李可灼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郑贵妃却躲了过去。

泰昌帝一死，郑贵妃立刻企图当太后垂帘听政。她一面把皇太子暂时隔离起来不让太子登基与群臣见面，一面又唆使太子最宠爱的妃子李选侍不要搬出乾清宫，以便向朝臣发号施令。但朝中官员们不买她们的账，群臣以新登基皇帝朱由校的名义宣布削去李选侍封号，对郑贵妃也不予理睬。崇祯三年(1630年)七月，这个一生享尽荣华富贵，连做梦都想当皇后的女人，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欲望而结束了可悲的一生。

第十五节　屡遭骗婚的公主

在明代，皇家公主的婆家往往都是寒门之辈。因为明朝的皇帝非常忌讳外戚干政，担心文臣武将利用子女联姻干预朝政，甚至发生夺权的危机。为了彻底斩断外戚干政的可能，大明皇室便不许皇家和文臣武将联姻。

明代的公主分为好几个等级，皇帝的姑姑叫“大长公主”，皇帝的姐妹叫“长公主”，皇帝的女儿叫“公主”。她们都是皇家的金枝玉叶，但婚配驸马只能选择民间英俊善良的男子。于是，民间男子争当驸马便成了明代社会一种独特的社会风貌。

由于官民脱离，明皇室挑选驸马只能靠熟人举荐。离皇帝最近的是宦官，于是众多民间男子便通过贿赂宦官近臣向皇室骗婚，诈娶公主，谋求富贵。

明弘治八年(1495年)，民间有个富人名叫袁相，他重金贿赂内宫太监李广，希望娶到一位公主。李广利用各种机会大肆吹捧袁相，弘治皇帝因信任李广，便同意招袁相为婿。弘治皇帝亲自召见了袁相后，感觉还算满意，便和袁家约定了大婚之日。不料，此时有人告发了李广和袁相的骗婚阴谋。弘治皇帝大怒，推翻了婚期，下旨废除了袁相的驸马名号，另选了新驸马。

嘉靖六年(1527年)，皇室为永淳公主招选驸马。通过太监、女官的推荐，选定了一个名叫陈钊的男子。不料，在大婚前有人向皇室密告，陈钊家族世代

患有恶疾，其生母是二婚，且在陈家做的是二房。如果把大明公主嫁给一个小妾的儿子，实在有辱皇室尊严。嘉靖皇帝接到奏折后，马上悔亲。为了挽回面子，嘉靖皇帝急忙命人在全国海选，另招驸马。但挑选出来的男子是个秃子。大婚那天，全国震动，如花似玉的永淳公主竟然许配给了一个秃子。

万历十年(1582 年)，万历皇帝的亲妹妹永宁长公主要选驸马。北京城有个姓梁的富豪，贿赂大太监冯保，让梁家子弟梁邦瑞参与海选。经过重重审查，梁邦瑞果然中选。其实，梁邦瑞早已重疾在身，大婚当日竟在婚礼现场流鼻血。收受了梁家贿赂的太监们眼见要败露，撒谎说大婚见红乃是喜兆，众人一通哄骗，硬是把永宁长公主推进了梁家大门。新婚刚满一个月，梁驸马便病亡了。永宁长公主寡居数年后抑郁而死。

第十六节　明朝选后妃制度

在中国古代，皇帝为天下至尊，富有四海，为了把江山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所有皇帝都希望自己能子孙满堂，人丁兴旺。为了确保皇帝有更多子嗣，中国古代的皇帝都广纳嫔妃。

据史料记载，明朝末年的内廷宫女多达九千人。这些宫女大多数一辈子没见过皇帝，他们只是默默地做着杂役，直至老死宫中。

明朝吸取了前朝外戚干政的教训，严格控制后族的势力，因此明朝的皇后多来自民间。在后妃的遴选上，为防范朝中权臣与后宫勾结，规定后、妃、宫嫔偏重于选择清贫之家的女子，试图以此辅佐皇帝节俭勤政。因此，后族爵位虽然高，但基本上没有实权。

明代选后妃的制度十分规范，采用逐级筛选淘汰的方式。一般要经过六七关才能选拔出皇后来。

第一关是“海选”。每当皇帝到了大婚年龄时，皇宫都会派遣宦官到全国各地挑选年龄为 13～16 岁的少女，从中选出 5000 名由皇家支付路费，由父母在规定的时间内送到京城进行第二轮选拔。

第二轮选拔时，宦官们会选择一个较大的场地，把少女每百人排成一行，并按年龄大小排序。经过一番察看后，把那些过于高、矮、胖、瘦的少女淘汰。这一轮大概会淘汰五分之一。

第三轮选拔时，宦官们采用上一轮的列队方式，仔细察看每人的五官、头发、皮肤以及音色、仪态，只要有一项不合规定，便被淘汰。这一轮又会淘汰掉剩余人数的一半。

第四轮选拔时，太监们不仅会用尺子细量少女的手足，还会考察少女的步姿与风韵。这一步又会淘汰1000名少女。最终留下的1000名少女被召入宫中继续参加选拔。

过了前四关的女子都成了宫女。入宫后，宫娥们将这些宫女分别引入密室“探其乳，嗅其腋，扪其肌理，察其贞洁”，身上不能有一丝疤痕，肌肤必须细腻光泽。从这1000人中再选出300人作为宫女头目。

第五关是由皇帝派遣的宦官详细观察这300名留宫的少女一个月，依据她们的性情言语，判断其性格是否温柔敦厚，是否聪明且贤惠。据此，再淘汰250人，剩下的50人便自动晋级为嫔妃。

第六关是“选三”，即由皇太后或太妃从50人中选出三个供皇帝钦定。最后由皇帝钦定一名皇后。一般“选三”后陪选的两名美女，都会被封为贵妃，但也有被赐予金银币退回家的。如泰昌帝朱常洛当太子时选太子妃，刘氏与郭氏姐妹进入最后一轮角逐，郭氏老大被选为太子妃，其妹与刘氏落选，赐给金币后返回家中。

第十七节　明朝的殉葬制度

明朝被选定的后妃们，大多数要面对极为残酷的现实——殉葬！每当皇帝驾崩，太监们便把那些没有生育过子女的后妃赶到一间小偏殿。地上放着一排小凳子，上面的横梁上悬着一条条的白绫，这些都是为后妃们上吊准备的。

据史料记载，朱元璋死后，为他伺寝的40余名妃嫔全部陪葬于孝陵。其后，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也有从殉妃嫔30余人，仁宗的献陵有7名妃嫔陪葬，宣宗的景陵由10名宫人殉葬。妃嫔殉葬时，其状很惨。为明宣宗生殉的10位宫妃中，有一人名叫郭爱，进宫还不到一个月，连皇帝的面还没见过，却要为刚刚死去的皇帝殉葬。

后妃们殉葬的方式主要是自缢和绝食，这在中国正史是很少记载。朝鲜

《李朝实录》中详细记载了给明成祖殉葬的嫔妃集体"自杀"的过程。明永乐二十二年十月戊午，30余名被挑选出来殉葬宫女嫔妃先在殿外用餐，后被带到殿内，此时宫女哭声一片。殿内放了30多张小木床，这些即将赴死的妃嫔被命令站到木床上去，她们的头顶上方是已经准备好自缢的绳子，把伸到绳子里面，撤去床后，这些妃嫔皆被吊死。

在这30多个人中，有两个是朝鲜进献的女子，一个是宫女韩氏；一个是崔氏，封号"美人"。临近自缢时刻，韩氏突然跪倒在地，向与她们"辞决"的明仁宗苦苦哀求，求仁宗放她回国赡养老母，可是仁宗不为所动，最终这两个朝鲜女子只能在异国他乡命归黄泉。

这些殉葬的妃嫔死后，下一任皇帝多半会给她们及她们的亲戚一些好处。最常见的是追赠谥号，表彰其行。

在明朝皇帝中，英宗朱祁镇没有建树，一生都受制于人。他九岁登基，38岁去世，他经历了"土木之变"，被掳去做俘虏，后来艰难归国复位。他在临终前下遗诏废止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制度。

明英宗的继任皇帝宪宗在临终前也再次强调不要殉葬，以表达对先帝决定的尊重。两代皇帝的坚持执行，终于给明朝的人殉制度画上了句号。

第十八节　一生凄惨的王皇后

孝靖皇后王氏（1565－1611年），宣府都司左卫人（现属河北张家口怀安县）。明神宗之皇贵妃，明光宗之生母。从宫女到皇后，王氏生前遭到百般摧残，一生凄惨。

王氏出身于中下级军官家庭，父亲王朝寀，在女儿未被选入宫之前官任锦衣卫百户（正六品）。生于嘉靖四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寅时。万历初年，朝廷为明神宗皇帝大婚，在民间大范围选美，13岁的王氏顺利通过前几关选美入宫，但是没能进入前三名。选美前三名中的王喜姐被钦定为皇后，另两位女子分别册为刘昭妃（宣懿太妃）、杨宜妃。

落选的女子一部分按规矩遣返回乡、一部分条件较为出色者则成为宫女。王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万历六年二月初二日（1578年）分配到慈宁宫，侍奉明神宗的生母李太后（孝定太后）。

三年后，16 岁的王氏偶然被皇帝遇见，“私幸之”，她因此怀了身孕，但不敢明言。后因身形变化被李太后看破。太后召问神宗，神宗最初想赖账，拒绝承认。太后命人拿来《起居注》，对照当时日期，神宗只好勉强承认了。王宫女因此晋封为恭妃。万历十年八月十一日（1582 年），17 岁的王恭妃生了一个男孩，这就是神宗的长子朱常洛，此后她又生下皇四女朱轩媁，早夭，追封云梦公主。

王恭妃先后生一子一女，实际却并不受宠，最受宠的是九嫔之一的郑淑嫔。万历十四年（1586 年），郑氏生皇三子朱常洵，神宗进封郑氏为皇贵妃。这就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引出了麻烦。按照中国封建时代一贯的制度：“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在皇后没有生育嫡子的情况下，应立庶出的长子做太子。王恭妃生的朱常洛是庶长子，自然也应是皇太子。群臣和李太后都支持立朱常洛为太子，可是神宗不喜欢王氏母子，郑贵妃又总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因此立太子的问题，迟迟不能进行。

围绕这个问题，大臣们与皇帝斗了 15 年，期间发生很多事情，大案迭起。后来，李太后得知朝廷上下舆论纷纷，不得已亲自出面干预。神宗在内外交困之下，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立已经年满 19 岁的朱常洛为皇太子。

在这 15 年中，王恭妃母子因受到神宗的厌恶冷落，又被盛宠的郑贵妃视为眼中钉，饱受屈辱，各方面待遇极差。比如，一直到万历二十一年二月（1593 年），神宗才在大臣们一再的请求下允许已经 13 岁的朱常洛读书，而且没过多久就长期辍读，险些让他成为文盲。

王恭妃对儿子的安全极为担心，一直到其子 13 岁时母子还一同起卧。万历二十二年（1594 年），郑贵妃污蔑皇长子喜欢和宫女嬉戏，已不是处男。神宗派使者前去验视。王恭妃大哭：“13 年来我同儿子一同起卧，不敢有丝毫的疏忽离开半刻，就是怕有变故，我的忧惧今日果然应验了！”使者不敢隐瞒，如实禀报神宗，皇长子的清白才算保住。

朱常洛在嫡母王皇后、祖母李太后的多方关照调护之下，终得以平安长大成人。

儿子当了太子，但是王恭妃依然盼不到出头之日。王氏被幽禁在景阳宫，整整十年不能与儿子见面，晋封就更谈不上了。直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十一月，太子有了儿子、神宗有了孙子，而且朝臣们多年来的谏言力争，民间也议论纷纭，神宗才借着给母亲加徽号的机会，顺便将王氏封为贵妃、皇贵妃。

成为皇贵妃后，她凄惨的日子并没有什么改变，有名无实，始终受着迫害，一直被幽禁着。在她身患重病时，神宗也没有去看望过她。

万历三十九年(1611)九月十三日，王贵妃病危。朱常洛请旨见母亲一面，神宗同意了。但是当太子赶到母亲居所时，景阳宫依然深锁不开。太子无奈，只得找太监拿来钥匙，破锁而入。王氏在临终时，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儿子，可惜早已双目失明。她伸出手抚摸着儿子的衣服，百感交集，凄然泪下。母子俩抱头痛哭。太子悲痛欲绝，太子的侍从们也纷纷落泪。当日酉时(下午 5 时正至下午 7 时正)，王氏气绝而死。可怜这位宫女、恭妃、皇贵妃，在深宫中苦熬了近 30 年，还是没有盼到出头之日，就这样离开了人间。

王氏生前受到百般摧残，后事也不顺利。神宗对王氏择地安葬之事，也是极为刻薄的，依照他的本意，草草埋葬了事。但大臣们不服。首辅沈一贯、大学士叶向高数次上折，说儿子是太子，葬礼应当按照明世宗皇贵妃王氏(“庄敬太子”生母)的规格办理。神宗却欲按明世宗皇贵妃沈氏(未生育子女)的规格办理，一再拖延。最后安葬时正值八月，天气炎热，棺椁又经十个月的停放，尸体早已腐烂不堪。

王氏葬在明十三陵陵区内东井左侧的平岗地，谥“温肃端靖纯懿皇贵妃”。神宗不派人守坟，也不拨给守坟的费用。直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六月，神宗才旨下礼部：“给皇太子母坟户三十名，园地二十五顷，以供香火。”

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八月，神宗驾崩，太子朱常洛登位当了皇帝。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按制度追封自己的母亲为皇后。不料，朱常洛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在“红丸案”中不明不白的死去，他死后宫廷又发生了“移宫案”，因此直到王氏的孙子明熹宗朱由校登极后，才正式追封自己的祖母为“孝靖皇太后”，又从东井把棺椁迁来，与明神宗和孝端皇后王氏一起葬入定陵的地宫内。全谥为“孝靖温懿敬让贞慈参天胤圣皇太后”，神主奉祀于奉慈殿。

第十九节　命运多舛的天启皇后

明熹宗天启帝的懿安皇后张氏，名嫣，字祖娥，小字宝珠，河南祥符县人。她的父亲张国纪为明朝生员。天启元年(1621 年)四月二十七日，熹宗与张皇后成婚。这一年，天启帝 17 岁，张皇后 15 岁。


张嫣

张皇后喜欢读书，也爱写字，临摹颜体，书法秀劲。她又选择聪明知书的宫女朗读唐诗宋词，长夜孤灯，静心学习。她还喜欢女红，用白绫制衣如鹤氅式，穿上礼佛敬香，宫中称这种衣服为“霓裳羽衣”，受到妃嫔和宫女们的赞扬。但如此贤惠的张皇后，在坤宁宫并不平安，未能躲过“三灾八难”。

皇后张氏与乳媪客魏为天敌。客氏见熹宗宠爱中宫皇后，内心嫉妒，非常不悦。客氏和魏忠贤勾结，引导熹宗疏离皇后，日夜淫乐。

天启三年(1623 年)，张皇后怀孕。客魏设法使皇后堕胎，熹宗失去元子。后来，客魏又设计陷害张皇后。时有河南人叫孙二，犯重罪，在狱中。魏忠贤以出狱和重金为诱饵，同孙二设计，编造说张皇后为自己所生，给张国纪为养女。客魏又在宫中散布流言，并对熹宗说：罪人孙二之女，不宜玷辱宫闱。天启帝曾怀疑，几次打算废后。熹宗到坤宁宫见皇后，又恋恋不舍，便开玩笑说：“你是重犯孙二之女吗?”皇后颊晕微红，默然不应，良久，便答道：“皇上若信浮言，妾岂敢久辱宫禁，愿早赐废斥。”帝谢之，后起入内室，手为整冠，后始强颜一笑。熹宗留与后对坐御膳，遂雍睦如初，对魏忠贤说：“皇后朕所怜爱，浮言不足深究。”

熹宗有时同张皇后到西苑荡桨泛舟，熹宗手操船桨，摇橹灵巧，去来便捷，要博得皇后一笑，但皇后正言规谏要览章奏，御讲筵，亲正士，戒小人。天启帝说：“汝吾师也。”但不久嬉游如故。

天启七年(1627 年)五月初六日，熹宗生病。至七月末，移居懋勤殿。每召皇后侍疾。魏忠贤进仙方灵露饮之，熹宗病日重。到八月十八日，熹宗病危。魏忠贤设计夺权。

魏忠贤抬出魏良卿对付危局。魏良卿是魏忠贤的侄子，在宁远大捷中毫无战功，却被封为肃宁伯，皇极殿建成晋升为肃宁侯，不久再晋为肃宁公。魏忠贤想了个主意：让张皇后假装怀孕，取魏良卿的儿子为皇后的儿子，张皇后垂帘听政，立魏良卿为摄政，等其长大再立。这时张皇后 21 岁。魏良卿私下对人说：我并不乐于当皇帝，因皇后张娘娘才德色兼茂，若同床共枕，虽死无憾矣！张皇后见生死安危都操纵在魏忠贤之手，便严肃地说：我从命也死，不从

命也死，若不从而死，可以见列祖列宗在天之灵！魏忠贤未敢轻举妄动。后来，魏忠贤又设阴谋，在饮食中下毒药。张皇后预先告诫崇祯帝，要警惕饮食，勿食宫中食。崇祯帝继位后，非常感激张皇后。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军队攻陷京师外城。当天，崇祯帝命周皇后自缢死。崇祯帝派宫人逼懿安皇后自杀，但事出仓促，宫女心慌乱，信息未到达。懿安皇后也不知道宫外消息。十九日，天蒙蒙亮，望见火光。宫内传言，内城已陷。宫女哭声如雷，纷纷奔出宫门。懿安皇后要寻剑自刎，下不得手，改为自缢。

明天启帝懿安皇后的一生，既是荣华富贵的一生，又是悲惨结局的一生。从15岁到38岁，作为皇后自然是享尽荣华富贵，却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懿安皇后幼年凄苦、青年丧夫、盛年遭变、自缢身亡，在悲喜交织的命运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

第二十节 揭秘明朝皇帝的龙袍

1956年5月17日，北京天寿山下的明十三陵沉睡了数百年的寂静被打破了。一支考古工作队来到这里，新中国第一次发掘帝王陵墓的行动拉开了序幕。这次考古发掘的目标是十三陵中的定陵，统治大明王朝48年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墓。经过一年的努力，考古工作队终于找到了地宫的入口，使这座深藏了300多年的古老幽深的地下玄宫重见天日。

玄宫后殿有三个硕大无比的朱红色棺椁静静地排列在棺床上，里面分别是墓主人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当考古队员打开万历皇帝的棺椁时，发现下面整整齐齐的堆放着一层层的织锦坯料。考古队员清点了一下，竟然有100多层。据统计，这里共有成件的袍服117件，面料233匹，大多比较完整。其中大部分图案都是龙纹，游动在江水海崖之上，气象万千，这难道就是失传了300年的大明皇帝的龙袍吗？

令人奇怪的是，定陵出土的这些龙袍，为什么大都是未经剪裁的面料呢？形式也很古怪，都是一段一段的图案，好像是拼接的衣料。这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原来，皇帝的龙袍是“量体织衣”，就是根据皇帝的身材尺寸来设计面料，

直接上机织造，织好袍料以后，只要剪去多余的部分，最后拼接起来，就是一件完整的龙袍，这带有一段一段的图案的面料就是“织成料”。这批龙袍料的出土，不仅填补了织锦业的空白，也解开了学术界多年的困惑。

这些龙袍料出于江南织造之手。明朝在南京曾经设江南织造，织锦业十分发达。当时南京出现了一个传世的品种——云锦。云锦，以其色彩美丽，如天上的云霞而得名，兴于东晋，盛于明清，进入皇家已经有700年，成为宫廷的御用之物，平民百姓不得染指，其身份之高贵，可想而知。云锦有三大品种——库锦、库缎和妆花。专家考证，定陵的这些龙袍，正是南京云锦的巅峰之作——妆花。

妆花织造最核心的技术就是挑花结本。首先要画出衣服的结构素描，也就是纹样，然后是涂上对应的颜色，这叫作意匠稿。然后按照古代结绳记事的方法，把意匠稿变成一根根的丝线，连贯起来，成为一团团的花本。最后，在织造过程中，再把平面的图画放大成立体的结构，还原到衣服上。即使两个工人昼夜不息，一天也只能织一寸多，称为“一寸妆花一寸金”。

众多的龙袍料中，有一匹用纱做成的面料，重量只有900克左右，显得格外轻薄。根据记录，它当初从定陵出土时是大红色的。所谓“黄袍加身”，皇帝的龙袍不都是黄色的吗？怎么会变出一件红色龙袍呢？

历朝历代，都讲究五行之说，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元朝崇尚金德，明朝就崇尚火德，以火克金，火就是红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明朝的皇帝姓朱，朱也是红色的意思，所以明朝以红色为正色。这件龙袍在明代称为绛色，所谓“红染三次为绛”，因为当时都是植物染色，用红花来染，颜色不够鲜明，所以要连染三次才能看起来红云缭绕、光彩夺目。

明朝对龙袍的纹样要求非常严格，每条龙的大小、位置都不可有丝毫的改变，否则织造者就有杀身之祸。这种“柿蒂型”龙袍，穿上去以后，刚好一个龙头在前面，一个龙头在后面，在颈部交会，明朝称之为“喜相逢”。整件龙袍全身上下有大小17条龙，其中大龙有9条。分别从前面和后面看，都是5条大龙，加上衣襟里面藏着的一条大龙，总共是9条大龙，隐喻皇帝是“九五之尊”。

这匹大红龙袍料幅宽69.3厘米，长度竟然达到17.82米，这样做成的龙袍，腰围在1.32米左右，身长就突破了1.65米，应该是一个膀大腰圆、身高1.8米以上的魁梧大汉所穿。但是，据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尸骨检验结果，明

神宗朱翊钧身高只有1.64米，而且上身驼背，左足微跛，根本不是一个能撑起这件巨大龙袍的魁梧男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皇帝都喜欢穿宽大的衣服，尤其是重大场合，穿上厚底朝靴，长袍垂地，显示帝王的威严。

定陵还出土了一匹皇帝祭天时的礼服，尊贵无比。令人惊讶的是，它本身竟然是大红色的，而且虽然经过300年的岁月，尸体腐烂的浸泡，已经严重褪色，但是织成的17条龙却仍然金碧辉煌，而且还夹杂着五彩光芒。这么神奇的衣服，是怎么织成的呢？经专家分析，这17条龙都是用黄金织的。

黄金，不仅是一种象征皇家地位的昂贵金属，也是一种永不褪色的神奇材料。把金块做成金线，织进龙袍里，叫作织金，是云锦的一种特殊工艺。古时，皇帝的龙袍是从来不洗的，稍有污损，就换上新衣。除了皇家奢华富有之外，其实主要还是怕金线洗过以后斑驳脱落。

制作真金线，首先要把金块制成金箔。两人相对而坐，轮流举锤，经过3万多下的锤打，把一块厚重的黄金硬是变成了轻如鸿毛的金箔，这叫作“打了戏”。然后把金箔挑出来，轻轻吹平，进行包装。这时的金箔只有0.1微米厚，娇嫩柔软，稍微吹重一口气，就会破碎。其中最核心的机密就是夹金箔的乌金纸。一块金子都被打成比纸还薄，而乌金纸竟然不破不碎，真是令人称奇。

造龙袍的真金线的制作工序有上百道，褙金、砑金、切金、搓金线，经过重重加工，最后和蚕丝相互缠绕，加捻搓成。古代皇家独占真金线的制作工艺，严禁外泄，而且只有皇室可以用真金线，平民百姓即使富可敌国，也不能用黄金来做金线，而只能用白银代替。是否用真金线，成了检验龙袍真假的重要手段。

一件龙袍，用色50多种，丝线上百万根，每一经一纬，都不能有丝毫错乱，否则就会出现大祸乱。

南京地处江南，气候湿润，四季分明。各个季节的温度、干湿度都大不相同。最麻烦的是，龙袍要求“天衣无缝”。织成的面料，剪裁后要完美地对接，每条龙不能有丝毫错乱，否则就前功尽弃。但一幅龙袍料，织成时间最少也要一年，这一年之中，阴晴雨雪，天气的变化，对织造影响极大。前面织好的面料和后面织好的面料，缩水程度是不一样的。特别是组织材料差异最为明显，蚕丝、黄金、孔雀羽毛，能平稳匀称地结合在一起，已经是非常困难，它们的干湿度、热胀冷缩都大不相同，怎样能保证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个最让工匠们头疼的问题。

古时龙袍织造属于官府的机密技术，云锦工匠不管是寒风呼啸，还是酷热难耐，都只能在闷罐子一样的机房里挥汗工作。而且，因为云锦的特点是使用大量的金银线，如果烤火的话，金银线和一氧化碳接触就会发黑变色，所以绝对不能烤火取暖。而到了夏天，容易有穿堂风吹断织机上的丝线，所以也不能打扇乘凉。但这样一来，只苦了那些整日穿梭的工匠们。

一件惊世的龙袍，凝聚了无数工匠的心血。

第二十一节　明朝的“宫猫”

明朝豢养“宫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猫儿房是“宫猫”的管理机构。它的职责不仅是管理好大量的“宫猫”，还要在众多的“宫猫”中选拔佼佼者，觐献给皇帝。皇帝把自己喜欢的留下，其他的则赏赐给皇亲国戚。这些“宫猫”和人一样，分三六九等，公的叫“某小厮”，母的叫“某丫头”，得到皇帝和后妃们特别宠爱的，无论生前还是死后，该赐名的赐名，该封号的封号。有了职衔的猫就叫“某管事”，它们享受特别待遇，即“随同内官数内同领赏赐”。由于“宫猫”主人的官衔不同，所以这些“猫管事”们也就有了“大管事”与“小管事”的差别。特别有意思的是，有的公猫被阉割后，一般叫“某老爷”。猫老爷在“宫猫”中享受一定的待遇，地位较高。

如果“宫猫”得到皇帝的恩宠，那就生有风光，死有哀荣。

嘉靖初年，有一只“宫猫”通体毛色淡青，双眉洁白，性情温驯，善解人意。经猫儿房推荐，这只叫“霜眉”的“宫猫”得到嘉靖皇帝的喜爱，日夜伴随皇帝左右。时间稍长，“霜眉”就熟识了皇帝的日常习性。皇帝起身或外出，它必先导；皇帝就寝入睡，它不离左右。如果它遇到饥渴或需要大小便，也一定要等到主人醒来方才离去……因此，皇帝愈加溺爱，并封它为“虬龙”。“虬龙”死后，嘉靖伤心不已，下令葬于万岁山北侧，立碑祭祀，命名为“虬龙冢”。

为了解除嘉靖皇帝失“霜眉”之痛，猫儿房又千选万遴来一只狮猫，以填补皇帝内心的空虚。据《万历野获编》记载，这只狮猫死后，“上痛惜，为制金棺，葬之万寿山之麓；又命在值诸老为文，荐度超升”。这实在难为了那些饱读诗书的大臣们，一个叫袁炜的侍讲学士，因写出“化狮作龙”之句，得到嘉靖皇帝的赏识，后被提升为少宰，加一品入内阁，享尽荣华富贵。

这些玩物丧志的皇帝，万万没料到“宫猫”盛行所酿之患。特别是猫儿发情时期，嘶叫不绝，上蹿下跳，猫影幢幢，那些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岂能遭此惊吓？有的竟抽搐成疾，甚而夭亡，而侍奉婴儿的乳母、宦官却不敢进言。另外，供养这些“宫猫”，耗资巨大。

明代猫儿房和“宫猫”的繁盛，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风貌。

第七章　明王朝奇案

第一节　胡惟庸谋反案

朱元璋称帝以前，胡惟庸的官位一直不高，他担任过县令、通判等职务，最高做到正三品太常卿。这个官职负责祭祀、礼仪等事情。

明军夺取了元大都后，胡惟庸才做了中书省参知政事。中书省是国家的最高部门，下管六部和各地行政机构，参知政事是从二品的官位。

这时候，明朝的宰相是李善长。可他年老多病，常常不能料理政务，实际上一切事务都由右丞相杨宪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打算换个年轻点的人代替李善长。他想到了刘伯温，可刘伯温始终没有应承。

于是朱元璋发布了两道任命。一道是任命汪广洋为右丞相，另一道是将胡惟庸从参知政事擢升为左丞相。

汪广洋平时喜欢喝酒，喝酒之后不仅不管事，还误事。朱元璋一气之下，把他贬为广东行省参政。就这样，胡惟庸当上了宰相，独揽朝政大权。

胡惟庸是个实干家，办事能力很强，因此得到朱元璋的宠信。胡惟庸因此渐渐变得骄横而狂妄了。

根据《明史》的记载，胡惟庸的越轨行为可归结为三方面。一是办事不汇报朱元璋，自己独断专行。二是私拆朝廷各部上奏朱元璋的奏疏，对自己不利的奏疏就私藏起来。三是收受贿赂，为了升官或想逃避处罚之人，都给胡惟庸送礼。

洪武十三年（1380 年）正月，朱元璋给胡惟庸最初定的罪名并不是“谋反”，而是“擅权植党”。这一罪名要从洪武十二年（1379 年）九月说起，当时占城国来进贡，可是接待人员没上报给朱元璋。这件事让一个宦官知道了，就私下通报给朱元璋。朱元璋大怒，立即责问胡惟庸和汪广洋。两人磕头请罪，说这件事情应当由礼部负责，所以过错在于礼部。朱元璋又质询礼部，礼部又推向中

书省。

这可把朱元璋给气坏了，于是他下令把所有相关人员全部关进牢狱。这件事不过是一次办事人员的疏忽大意，可朱元璋感觉自己受了一伙大臣的蒙骗，自己被架空了，所以必须查清楚。但最终没有查出结果，只得让汪广洋做替罪羊，朱元璋将他赐死。

汪广洋有个叫陈氏的侍妾，汪广洋死后，她自杀殉夫。朱元璋认为陈氏的品德很高尚，要给予表彰。可一查陈氏的出身状况，才知道她是犯官之女，是被卖为官奴的。按照规定，官奴只能赐给功臣，不能纳为妻妾。朱元璋再度愤怒，再一次审查相关人员。这次审查六部官员，包括胡惟庸都受到了牵连。如此一搞，朝中人心惶惶，相互弹劾。

洪武十年(1380 年)正月，大臣们纷纷上疏弹劾胡惟庸。御史中丞涂节诬告胡惟庸有谋反篡位之心。前御史中丞商嵩也弹劾胡惟庸，说他擅权。朱元璋派人彻查胡惟庸，并未查出谋反迹象，所以先给他定了个“擅权植党”的罪名。不久后，又查出胡惟庸勾结北元、勾结倭寇等其他罪名。此案一共审理了十年，不仅查出了胡惟庸的诸多罪恶，他的同党也暴露了出来，这其中就有太师李善长、大将陆仲享、名臣宋濂等人。

胡惟庸从洪武十年(1377 年)开始当宰相，到洪武十三年(1380 年)正月被处死，执政时间只有两年半。胡惟庸虽然当了宰相，可终究是一个文官，手里没有兵权。如果他要造反，只有拉拢握有兵权的人。

朱元璋手下的武将大多是开国功臣，他们居功自傲，骄纵枉法，在遭到朱元璋训斥或贬官后，就怀恨在心。这就给胡惟庸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将这些人拉拢，作为自己的党羽。

吉安侯陆仲享和平凉侯费聚，很快与胡惟庸结成死党。胡惟庸利用他们招兵买马，为的是应付变局。此后，胡惟庸还把李善长拉下水，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为妻。然后利用李佑去游说李善长。此时李善长已无法制约胡惟庸等人了，只得说其年事已高，等他死后再胡作非为。

这一切都说明胡惟庸有谋反之心，他的谋反之心多半是自保。因为朱元璋对王侯将相越来越猜疑，加上开国功臣们的骄纵违法，官僚中形成各派集团，他们互相倾轧排挤，在朱元璋面前攻击对方。面对这种情形，朱元璋必须向他们开刀。胡惟庸撞在了刀口上，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他。同时被杀的还有陈宁、涂节等数人。

在胡惟庸死后，案子还在继续调查，又给胡惟庸加上“通倭”“通寇”和“谋反”的罪名。并且案子不断牵连扩大。

到了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明军与北元军交战。北元军中有一位名叫封继的将领，他在大将蓝玉北伐时被俘。据他供认，宰相胡惟庸曾经通过他与北元太子爱蝤识理达蜡联络，打算向北元借兵，推翻朱元璋的大明王朝。朱元璋一直不知道这件事，因为封继被押回南京后，居然被李善长藏匿了起来。太师李善长自然就被牵扯进了此案。与此同时，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陆仲亨的家奴封帖本等人纷纷向朱元璋告密，说李善长、陆仲亨等人曾参与胡惟庸的“谋反”，是“胡党”中人。

于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朱元璋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的罪名，将李善长、陆仲亨、毛麒、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昇、李伯昇、丁玉等人全部诛杀。此时的李善长已经 77 岁，朱元璋念他年事已高，赐他自缢，而他的 70 多口家属全部被诛杀。因此受到株连而丧命的多达 3 万余人。

胡惟庸案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由朱元璋的猜疑和不信任造成的。这样的帝王，最终成为冤案的制造者。即使此案不是冤案，但牵连甚广，使太多无辜者都付冤屈中。

第二节　空印案之谜

朱元璋以严刑苛法治理天下、驾驭群臣，不但没像秦朝那样二世而亡，还奠定了明朝近三百年国祚的基础。这其中的原因就是他“不得罪百姓”，心系万民，懂得如何爱护老百姓。

朱元璋为了反腐惩贪，一再对官僚队伍的腐败进行大规模的整治，掀起一个个大案。

明初，官员在考校钱粮时，使用盖有半个官印的空白文书，是官员们习以为常的做法。但在朱元璋看来其中藏有奸恶，为此他不惜大开杀戒。这就是发生在洪武九年（1376 年）的空印案。

明政府规定，各布政司、府州县对本地的户口、钱粮、军需等事项，须在年底时派人到京师的户部进行核对。地方官员携带的文书要加盖印信，逐级核对无误以后方可通过，如发现上下统计数字不符，户部则要予以驳回。地方官

员应回到原地重新填写，盖好印信后再来核对。因为各地离京城太远，往返费时，地方官为了方便，就在来京时带有预先盖好印信的空白文书，如遇到户部驳回，就在原地重新填写，不必再回本地盖印，以免往返之劳。这种做法行之已久，上下官员已经习以为常。

洪武九年(1376年)，这种做法被朱元璋发现，他认为各地方官存心欺蔽，大怒，竟下令将所有掌印的官员处死，将副职一律杖责一百，发往远方当兵戍守。

宁海人郑士元牵扯到空印案之中，他的弟弟郑士利为郑士元上疏诉冤，说郑士元刚直不阿，在地方上做过很多好事，而且使用空印文书不应治罪。他说，陛下想要严厉处罚使用空印文书的人，是害怕奸吏借用空印文书，行文虐害百姓。而有效文书必须加盖完整的印信才可以使用，如今考核钱粮所用的文书册，是两张纸的骑缝印，不能和一张纸上一个印相比。即使奸人得到也不能行使，何况一般人还得不到呢！各地钱粮之数，府一定要与省相合，省一定要与部相合，经过多次核对，到户部才最后确定。省府离中央户部远的有三四千千米，近的也有500千米，书册核对完成后回本地加盖印信，往返至少要用一年时间。因此，就先加盖印信而后书写，这不过是权宜变通的办法，很久以来都是这样做的，怎么能对他们加以追究治罪呢？而且国家立法，一定要先把规定向天下公开讲明，以后有违犯的人就可以治罪了，因为他们是明知故犯。现在的情况是，自立国至今，没有关于使用空印文书违法的规定，各部门一直按习惯做下来，不知这是犯罪。如今忽然要给他们治罪，怎么能使受诛杀的人口服心服呢？

郑士利接着又说，朝廷选拔贤能，把他们安排到各个位子上，这些官员得到这个位子都十分难得。一个官员能够当到郡守，是数十年努力的结果。这些通达廉明之士的头，并不像野草一样，割了以后可以再生。陛下为什么对那些不足以治罪的过错给予治罪，而损坏了那些可用之才呢？

郑士利事先已料到，如果给朱元璋上疏，肯定会招来杀身横祸，但他希望以自己的死，换来数百人的生。朱元璋果然大怒，将郑士利定罪，与郑士元一同罚到江浦做苦工，数百名使用空印的人被处死，牵连者无一幸免。

第三节　扫荡政坛的郭桓案

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发生了一件震动天下的大案。户部侍郎郭桓盗卖官粮,把仓库里的粮食据有己有,接受地方官的贿赂,并与地方官勾结起来共同作弊。郭桓案不仅遍及浙西四府,而且牵连全国的12个布政司,这个案子扫荡了明初政坛。

《大诰》记载的郭桓罪行主要有以下五条:

应天、宣城、太平、广德、镇江五府州是朱元璋最早的根据地,由于这里长期承担粮饷夫差与徭役供给,朱元璋下令将这些地方民田的夏税秋粮全部免除,官田减半征收。但是,到了征税的时候,这些州县数十万官田的夏税秋粮并无一粒收缴上仓,全部被官吏张钦等人勾结户部官员郭桓等作弊私分了。此为其罪行之一。

户部官吏收受浙西秋粮,应该入仓450万石(1石约合60千克),郭桓等只收60万石入仓,钞80万锭入库。以当时牌价折算,可抵粮200万石,其余190万石不曾入仓。郭桓等人接受浙西等府钞50万贯贿赂,致使府县官黄文等人勾结刁顽人吏沈原等作弊,将其私分。此为其罪行之二。

浙西各地有关机构在征收税粮时,对百姓的扰害甚如虎狼。官府折钞征收秋粮(即让百姓交钱充抵税粮),府、州、县官每发米1石,应该折钞2贯,但征收者巧立名目,征1石米就索要水脚钱100文、车脚钱300文、口食钱100文,看管仓库的又要办验钱100文、蒲篓钱100文、竹篓钱100文和沿江神佛钱100文。于是,1石米除折钞2贯外,又征收杂费900文。此为其罪行之三。

户部侍郎郭桓等官吏收受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五府州纳草人徐添庆等户的赃钞,不征收应该收缴的马草,却向已经交纳马草的安庆农户多收取,以补足五府州所欠数目。此为其罪行之四。

他们还搞纳粮入水、纳豆入水的勾当。每年都有一些奸顽大户伙同仓官在豆中拌水,以增加斤两。每仓一间容量不下1万多石,往往只因为一户奸顽掺水缴纳,导致官粮经湿热一蒸而满仓全坏。此为其罪行之五。

郭桓等人盗卖的官粮总数高达到2400多万石。这样惊人的浪费与损失让平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心疼不已,他感叹说:古往今来,贪赃枉法大有人在,

但是搞得这么过分的,实在是不多!

朱元璋要求各地耆民赴京面奏,揭发地方官的犯罪事实,下决心严厉惩处各级官员和牵连案件的富民。根据《明史》里的记载,在这一大案中,从中央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直隶和各省的好几万人都牵连进这个案子当中,被关进监狱或处死。更令人吃惊的是,窝赃的人遍布天下,也都遭受到惩处,全国中等人家大多数因此破产。

朱元璋后来发觉处罚面有些扩大化了,于是他把责任推给了办理郭桓案的右审刑吴庸等人,将他们处死,以抚平人们的怨气。对郭桓案的惩治面虽然扩大了,但朱元璋所针对的只是贪官污吏以及那些勾结贪官污吏为害乡里的富民。惩治贪官污吏,对普通老百姓是有好处的。

在郭桓案中,龙江卫仓官因为伙同户部官员郭桓等盗卖仓粮,被处以墨面、文身之刑,他们被挑断脚筋、割去膝盖之后,仍然留在本仓看管粮食出人。然而,不到半年时间,一个进士到仓库放粮,早晨发出筹码 200 根,到晚上竟然收到 203 根。进士当面责问,发觉是已经受过刑的仓官康名远不思改悔,奸顽依旧,偷出放粮筹码,转卖给同样受过刑的小仓官费用来盗支仓粮。

对于这样凶顽的人,朱元璋不得不使用重典。朱元璋规定,凡贪污赃款 60 两白银以上的,就要将犯者枭首、剥皮示众。被剥下的案犯人皮填满草,悬挂在官府公堂座旁,以示警诫。后任官吏于此办公,无不触目惊心。

当时的酷刑,除了凌迟处死之外,还有洗刷、铁刷、枭令、称竿、抽肠、挑筋、剁指、刖足、断手、刑膑、去势等。一时间,明初官场犹如人间地狱。

第四节 驸马欧阳伦案

朱元璋的严刑峻法不仅适用于一般官员,即使是他的亲属犯法,他同样也不会饶过。在他的眼里,法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他的女婿欧阳伦因为动用公家车辆走私茶叶,破坏了茶马之法,被他断然处死。

欧阳伦的妻子是安庆公主,她是高皇后马氏生的女儿,是朱元璋最亲的人,欧阳伦则是朱元璋的亲女婿。马皇后只生了两个女儿,安庆公主是其中之一。

洪武三十年(1397 年),欧阳伦凭着自己的势力派手下的人走私茶叶。当

时，只有中原地区才产茶叶，西番、青海、西藏等地区的人们吃牛羊肉时需要内地的茶叶。明朝为了控制西番，规定严格禁止茶叶走私。茶叶作为战略物资，由官府控制，用来交换西番地区的马匹。明政府这样做，既控制了西番，又得到了马匹，加强了自己的实力。所以，朱元璋规定任何人不得走私茶叶。

欧阳伦怂恿家人走私茶叶，依仗的是其皇亲国戚的特殊身份。他们征用地方车辆，非法闯关。如果地方官员对他们伺候得不好，还对地方官员连打带骂。地方官不堪忍受，告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大怒，不管什么皇亲国戚，就把欧阳伦抓来杀了。他这样做事为了朱家的江山长治久安。朱元璋要杀欧阳伦，公主也不能救。他为了治理国家，为了建立一个有纪律、有效率、廉洁的政府和官员队伍，以法夺情，不惜大义灭亲。

朱元璋重典治国，一时间形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因而遭到了激烈的批评。然而，面对吏治败坏的顽疾，也只有施用猛药才能收到些许功效。

第五节　沈万三族诛案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正月，苏州府周庄的粮长顾学文在京师应天府(今南京)做事。有一天，顾学文去凉国府看望在府内教书的同乡王行。

王行是苏州城有名的老塾师。从元朝末年开始，除了洪武十二年(1379年)短暂在南京蓝玉蓝家坐馆外，王行长期在顾学文的妻弟沈达卿家任教，和顾学文认识有30多年了。顾学文从去年十一月起就多次来凉国府看望王行，每次来都提着许多礼物打点府上各色人等。因此，凉国府的人对顾学文很熟，很有好感。

这一次，顾学文照样和王行在耳房内说话。凉国公蓝玉刚好经过，见一个陌生人在自己家里大方地交谈行走，走过来奇怪地问王行："这个人是谁?"王行回禀说："他是小人乡人沈万三的女婿。"蓝玉听说后脸色大变，立即热情地招呼起顾学文来，吩咐准备佳肴酒宴招待顾学文。

蓝玉是堂堂的凉国公，多次出任大将军，战功显赫，权势炙手可热；顾学文是乡下粮长。两人身份悬殊，蓝玉为什么对顾学文这么热情呢？这都是因为沈万三。

沈万三是元末明初江南第一富豪，其资巨亿，田产遍于天下。苏州周庄原

本是一个小村庄，沈万三在周庄安家后硬是把小村子建设成了一个闻名遐迩的集镇。

王行在沈家教书时，每教会学生一篇文章可以拿到20两黄金的酬劳。王行在蓝玉家教了一年书后又回沈家坐馆授徒，主要原因是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党案”发生，他唯恐受牵连，所以辞别蓝家重返沈家；另外沈家的“天价工资”也是他重返沈家的重要原因。可到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王行家莫名其妙地被编为“织挽匠户”，要去应天府住坐。凉国府蓝家知道后，立即再次请他来府中教学。王行跟沈、蓝两家的长久交情，让沈家众人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机会：通过王行结识蓝玉，给沈家的巨额财富寻找一个政治靠山。蓝玉名震朝野，手握军权，而且他的姐姐是开国元勋常遇春的妻子，外甥女是懿文太子的王妃，很有希望成为未来的皇后。蓝家的地位看起来稳如泰山。和显赫的蓝家拉关系总不会有错吧？



沈万三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正月十三日，顾学文还将沈家的沈德全引荐给了蓝玉。沈德全送了一条珍贵的乌犀带给蓝玉。蓝玉很高兴，照样酒食款待他们。酒筵尽兴后，蓝玉让顾学文、沈德全准备些粮米、银子、段匹前来，他要赏人。顾学文和沈德全见蓝玉开口要钱要粮，立刻满口答应。借钱就要替沈家办事，顾沈二人正巴不得。蓝玉借到钱后，更进一步要求沈家“帮”他做丝绸生意了。顾学文见蓝玉要插手沈家的生意，拿干股，分红利，也爽快地答应了。蓝玉和沈家的感情更“深”了。

几日后，顾学文又在蓝玉宅内欢宴。觥筹交错间，蓝玉对顾学文说：“我亲家靖宁侯为胡党事发，怕他招内有我名字，累了我。如今埋伏下人马要下手，你那里有什么人，教来我家有用。”回到周庄后，顾学文还对副粮长金景、纳户朱胜安等人说起这些事情。他们不知道，这些日后都成了他们“串同谋逆”的铁证。

没几年，沈家的投资还没有获得回报，蓝玉这座靠山轰然倒塌了。朱元璋大开杀戒，牵扯出一个比“胡惟庸党案”更大、株连更重的“蓝玉案”来。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同里镇的陈某出面告发入赘沈家的顾学文等人串同蓝玉谋逆。这桩大案的起因,其实是顾学文拈花惹草引发的一个桃色事件。

同里的陈某在衙门里当差,家里留下一个弱智的儿子和儿媳妇梁氏。梁氏美貌出众且知书达理。顾学文偶见梁氏,一见钟情,开始引诱梁氏。他一边找人拉着弱智的陈家儿子到处游玩,不着家,一边买通陈家的邻居天天在梁氏面前说顾学文的好处,最后亲自出马一举将梁氏"拿下"。两人感情日深,频频有书信往来,桃色新闻传得沸沸扬扬。谁想梁氏偷情疏于防范,竟把顾学文的书信裁开后卷成纸燃放在灯罩下。陈家人拿到书信后,寄给了陈某。陈某一心报复,蓝玉案刚好爆发了,朝廷广撒株连之网。于是陈某告发顾学文和沈家参与了蓝玉的"谋反"。

朱元璋接到沈家参与谋反的控告后,立即下诏逮捕严讯。顾学文全家包括妻族沈家,一共有72家人逮捕下狱。因为沈家蔓延很广,财富又遍布全国各地,所以刑追逼供隐匿人口和田产的工作持续了好几年时间。最终顾家和沈家全族同日被凌迟处死,共杀80余人,全部家产没收。周庄沈家势力被连根铲除了。

这就是明朝洪武年间著名的"沈万三族诛案",整个案子缺乏明确的证据,是彻头彻尾的冤案。

第六节　腰斩高启案

高启(1336—1374年),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县(今苏州市)人,元末明初诗人。高启出身于富家,童年时父母双亡,生性警敏,读书过目成诵,久而不忘,尤精历史,嗜好诗歌,与张羽、徐贲、宋克、王行等十人经常在一起切磋诗文,人称"北郭十才子"。同时,他还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也称作"明初四杰"。虽然同为"十才子""四杰",但高启的文学成就远远高于其他人。

高启在文学上的最大成就,是在元末明初独树一帜的挑起了发展诗歌的重担,并改变了元末以来缛丽不实的诗风,从而推动了诗歌的继续向前发展。后人尊称他为"明初诗人之冠",历代诗评家也都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为中国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诗人，却被朱元璋一声令下施行腰斩酷刑，并被截成八段，这在中国历代被屠杀的诗人中，是最惨无人道的一幕。

把高启送上刑场的是一篇《郡治上梁文》。古代平常人家盖房子上大梁时，都要摆上猪头祭神，点上鞭炮驱鬼。作为苏州治所的官方办公大楼建造，更要有一篇像样的上梁文。时任苏州知府的魏观，便把高启请出来书写上梁文。这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却让朱元璋抓住了把柄。一是魏观修建的知府治所选在了张士诚宫殿遗址，而张士诚正是朱元璋当年的死对头；二是高启写得那篇上梁文里有“虎踞龙盘”的字眼，犯了朱元璋的大忌。

按照朱元璋的逻辑，“虎踞龙盘”之地当为帝王所居，高启把张士诚住过的地方称为“虎踞龙盘”，有不可告人的企图。

其实，上梁文中的敏感字眼只是高启被杀的导火线，而真正的祸根早就已经埋下了。朱元璋以此为由杀人，很明显是在“秋后算账”。

朱元璋从一开始就不喜欢高启，这除了高启不肯接受户部右侍郎一职外，还在于他写的诗多次触动和冒犯了朱元璋。高启所写的“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本是一首针对元顺帝宫闱隐私的闲散之作，与明初宫掖毫不相干，可朱元璋偏偏认为高启是在借古讽今挖苦自己，所以记恨在心。高启写的“不闻龙虎苦战斗”的诗句，因高启写这首诗时，正是朱元璋率军与元军、陈友谅、张士诚三方强敌在“苦战、苦斗”之际，所以使朱元璋感到厌恶。另外，高启在诗中还有“不肯折腰为五斗米”的句子，表示对做官毫无兴趣，这也是朱元璋所忌恨的。

据史料记载，高启被行刑时，是朱元璋亲自去监斩的，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高启被腰斩后，并没有立即死亡。他伏在地上用半截身子的力量，用手蘸着自己的鲜血，一连写了三个鲜红的“惨”字，表达了对眼前这个当过放牛娃、和尚的农民皇帝的强烈蔑视。

高启被腰斩事件，是朱元璋向那些不愿顺从的士人发出的明确、冰冷的高压警告。正是这一惨剧，才切实加速了明初士风的转变。

第七节　假太监行骗案

明朝成化十三年(1477 年),从北京城来的太监汪直搅乱了江南官场的平静。

汪直从南京、芜湖、常州、苏州、杭州、绍兴、宁波一路巡查过来。听说汪直要来,沿途地方当局和交通部门都提前作了各种准备,他们忐忑不安地等着汪直的到来。各级官员对汪直既爱又怕,因为汪直当时的职务是"钦差总督西厂官校办事太监",是管理西厂的"一"把手。

明代最著名的特务机构是东厂,东厂直接受皇帝的指挥。东厂的"一"把手,常常是皇帝最信任的人,他能够左右皇帝的想法,拥有炙手可热的权力,因此各级官员甚至朝中大员,都以能结交他们为幸。明朝的另一个特务机关是西厂,西厂的权力比东厂还要大。它不仅能侦查百姓,也能侦查东厂,而且拥有的特务数量比东厂还要多。因此,作为西厂的"一"把手,汪直的到来,在江南引起的轰动极大。

汪直到江南视察,各地官员自然要小心陪侍,一些有冤屈的老百姓也指望能通过"钦差大臣"讨个清白。一时间,很多官民持讼词前往告状。

汪直视察过江南后继续南下,一路搜刮民财。汪直索要钱财的手段很高明,他本人口口声声称要廉洁奉公,手下的校尉却一个劲地伸手要钱,就这样一路中饱私囊到了福州。福州的大小官员也毫不含糊,小官吏如果惹恼了汪直,拖出去就是杖责。

就在汪直在福建耀武扬威时,却出了一桩意外。福州镇守太监卢胜是个细心人,他发现这个汪直虽然自称提督西厂,是钦差大臣,可是手中并没有任何皇家信物。卢胜仔细盘查后,认为"汪直"是假冒的。

福州镇守太监卢胜经过调查,很快就查了个水落石出。

假汪直其实名叫杨福,是江西人,曾经在北京崇王府里当过内使。后来他逃了出来,想回老家。路过南京时,杨福碰到一个熟人,熟人发现杨福长得很像汪直,于是杨福决定冒充汪直骗些钱花,那位熟人就扮作他身边的校尉随从。两个骗子先到芜湖敲了一笔,见没有败露,于是他们继续沿江而下,再顺着浙江沿海南下。由于杨福在北京城混过,对朝廷礼数略知一二,所到之处居

然没有人怀疑两人的真假。

假汪直案轰动了朝野。成化十四年(1478 年)七月,杨福被处死。假汪直死了,没过几年,真汪直的命运也急转直下。

成化十七年(1481 年),带兵远征的汪直请求班师回朝,成化皇帝却叫他继续御敌,不久之后,又命令军队全部撤回。之后,朱见深又派汪直到南京担任御马监,西厂也被撤销。此后汪直终老南京,再也没有回到皇帝身边。

尽管假汪直死了,真汪直也被削夺了权力。但是继汪直之后,借着东厂、西厂或锦衣卫的名义,假充特务的事件依旧层出不穷。例如,明世宗朱厚熜时,竟有强盗冒充锦衣卫,到县衙门绑架知县大人。

第八节　假冒内阁中书案

一天,明朝江宁县居家的施御史和秦中书收到了赋闲在家的高翰林的请柬,邀请他俩和县里的两位秀才来家一聚,去会一位到访的官员。

施御史和秦中书到高家后,高翰林边叫管家去催到访的“万老爷”,边介绍说:“这位朋友叫万里,前日他从京师回来,说已经担任了内阁中书。”

所谓的内阁中书,就是内阁里面的办事人员。他们的品级一般,顶多算个中层干部,虽然守在皇帝身边却没有什么实权。就因为内阁中书中听不中用,新晋进士几乎都不愿意担任此官。头等进士选择翰林院,走清要文雅和高层路线;第二是去谋求实职,比如各省县令和各部主事;再不济的,才去内阁做抄抄写写的中书,争取早日谋得一个实职。这一个有虚名无实权的职务,决定了它的编制必然日益膨胀。江宁的秦中书是花钱买的官,得官后一直待在家里,不去内阁上班。他自然不认识同样懒散、四处游荡的万中书了。

不多时,万中书已经到了门口,送进名帖来。高翰林赶出来,拱手立在厅前滴水下,叫管家请轿,开了门。万中书下了轿,只见他 50 岁左右,头戴纱帽,身穿七品官服,急趋上前,拜揖叙坐。两人相互客气地来到正厅和四位来客相见。六人大谈科甲学问,许些将来少不得互相照应的空话套话。

众人到西厅饭毕,高翰林拉着万中书的手,谈得火热。官场讲究的就是人脉和热气。初次见面,江宁的众人就和万中书“一见如故”,称兄道弟了。

到了第二天,秦中书在家大摆宴席,盛情款待万中书,邀请高翰林、施御史

作陪，还请了一个戏班子唱戏。戏才刚刚开始，只听得大门口忽然一棒锣声。江宁县的方知县带着二十多个捕快冲了进来，两个捕快走上前把万中书一手揪住，用一条铁链套在颈子里，抓了出去。秦中书等人吓得面面相觑。方知县也不解释，一言不发地回去了。

秦、高、施三人差秦家的管家去县衙里打探消息。

原来万里是被牵涉进了浙江省台州总兵苗而秀的案子里。苗而秀海防不力被浙江巡抚参奏革职。官府在抄苗家的时候，查到了万里拍苗而秀马屁的诗文。于是台州知府发文江宁县缉拿万里归案。亲自来抓人的方知县是个浙江人，看到老家发文来拿人，特别上心，抓住万里后第二天就准备押送台州。

事情紧急，秦中书只好求助一个能人：凤四老。凤四老是是极有义气的人，是一个专门替人解决麻烦、半黑半白的“侠客”。

凤四老当晚就在牢里见到了万里。万里道出了原委，他原来本是个秀才，不是中书。20多年来，万里在科场上屡次名落孙山，连个举人都没捞着，年近半百后衣食无着，只好假冒官员，四处骗吃骗喝，解决生计问题。

凤四老听完，让万里先住下，又安排人好酒好菜把三个差人安排好，把押解一事压下来。自己赶忙到秦中书家去商议对策。秦中书等人听完凤四老的汇报之后，目瞪口呆。他们三人决定帮万里渡过难关。

万里假冒内阁中书，人证物证俱在，一送回台州就人赃俱获了。怎么才能帮他洗刷呢？

凤四老告诉秦中书：“若要图干净，干脆替他买一个内阁中书的官位来。买官的钱，让他打欠条，等他赢了官司上了任，再让他还回来。”

于是，秦中书拿出1200两银子，拜托高翰林出面买官。高翰林赶紧照例写了一份买官的揭帖送到内阁，先给万里存案排队。施御史则连夜打发人进京，给万里办去了。三人不惜代价，连夜办理，万里的“内阁中书”到了第二天就“转正”了。

成为货真价实的内阁中书以后，万里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台州原籍了。他的“内阁中书”如今有案可查，货真价实，顺带着给苗而秀拍马屁一事也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于是，凤四老也收拾了行李和三个差人一道，送万中书回台州审官司去了。

一个落魄书生，行走江湖的骗子，一夜之间衣锦还乡。这桩离奇的假冒内阁中书案由此结束。

第九节　孝子杀人案

明朝万历年间的一天，浙江金华府武义县城外蝴蝶山的山脚路旁埋伏着一个黑影。不多久，该县放高利贷的王俊从乡间的姘妇家中出来后，一个人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王俊慢慢踱过山岭，那黑影看得明白，飕地钻将过来，喝道："还我父亲的命来！"王俊毫无提防，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黑影劈头一剁。王俊头上中了一刀，倒在地下哀号抽搐。那黑影扑上前来，按倒王俊，再一刀割下了他的首级。

这个杀人者并不是一般作奸犯科的凶犯，而是本县温文儒雅的秀才、王俊的同族兄弟王世名。王世名平日读书吟诗，手无缚鸡之力，杀王俊时却毫不犹豫。因为王俊是王世名的杀父仇人。

当年王世名的父亲王良向族侄王俊借了 2 两高利贷。王俊逼债太紧，王良还不起，两人打斗起来。王良被打成重伤，第二天就死了。王良临死时，吩咐王世名不可忘记此仇。王世名与王俊实力相差悬殊，他不想和王俊同归于尽，拖累家人。刚好王俊央求王家族长出面"私了"，于是王世名接受了王俊"赔偿"的 30 亩好田，和母亲一起向官府申请了尸体免检，再由族长出面作证王良是正常死亡的。王俊殴打王良致死一事就这么"私了"了。王世名私下表示"永无翻悔"。

私了后，王世名暗地里将 30 亩田每年的租金收入都封存起来，分毫不动，并悄悄铸造了一把利剑，镂下两个篆字"报仇"，随身佩带，寻找合适的机会报仇。白天，王世名和人嬉笑如常，回到家里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抚心号恸。

五年以后，王世名考中了秀才，妻子俞氏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王世名家有后了，他即使和仇人同归于尽，王家也不会绝嗣。王世名便去伏击了王俊。杀人后，王世名取了历年所收田租账目，左手持刀，右手提头，到武义县衙自首。

王世名光天化日手刃仇家的案件，很快在县里传开了。大家听说王秀才是为父报仇，杀的是县里名声很坏的放高利贷的王俊，如此孝子杀人的感人事迹引起了满城轰动。王世名提着头在前面自首，后面跟着他的同学、朋友和百姓。县衙前摩肩叠背，喊声震天，等到县衙开堂的时候已经是万人挤塞。

武义陈县令升堂，惊问缘由。陈县令听完前因后果，又看堂外人声喧嚣，

早有了心理倾向。他认为王世名杀人是忠义至孝之举，他不能擅自处理此案，需将详细情况禀报上司。让王世名先回去等待通传。王世名就在同学、朋友和百姓的欢呼声中回家去了。

陈县令在给上司的申文中大大夸奖了王世名一番，言辞恳切，申文之外还给知府写了一份禀揭，替王世名说情。他用八个字来定性王世名杀人案件：孝义可敬，宜从轻典。

金华知府拿到陈县令的公文和求情禀揭之后，也认为王世名可赦免。但此案毕竟事关人命，必须得有个说法。知府将此案转给金东区的汪县令，要求此案由汪县令和陈县令会审，共同拟定个意见。

汪县令赶到武义县问清案情后，也一心想保全王世名性命。他决定在“孝”字上作文章，将王世名能轻判就轻判。汪县令和陈县令商量说需要将王良的尸体重新检验，如果的确是因伤致死，王俊就应该抵命。现在王世名杀王俊，一命抵一命，罪就轻了。会审时，汪县令把意思和王世名说了，但被王世名断然拒绝了。

第二天上堂时，王世名依然拒绝尸检。汪县令故意发怒说要强行检验尸体。王世名听完汪县令的话后，愤然朝县堂台阶一头撞去。王世名因用力很猛，早已把颅骨撞碎，脑浆迸裂而死了。聚在外面的秀才和书生们，情义激发，哭声震天。

汪县令和陈县令以及书生们共捐了 50 两银子召王家亲人来领回尸首，从厚治丧。秀才们还写了祭文，将王世名的葬礼办得隆隆重重。王世名的妻子俞氏在其丈夫自尽后，坚持要将尸体停丧三年。三年后，孩子茁壮生长，俞氏毅然绝食而死，与丈夫共同入葬一墓。消息传出，又轰动全县。书生们禀告了陈县令，陈县令将王世名家的事迹报告上司，先行奖恤。浙江省将事迹上报朝廷。明朝朝廷下诏褒扬王世名夫妻，赐王家“孝烈”名号，修建牌坊，大肆宣传。

此案因“为父报仇”一说而将“行凶杀人”案转变成了“孝子杀人”案。其中的“孝”字，威力巨大。我们不能判定王世名为父报仇的真伪，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孝”字就能征服一大片人，它不仅抓住了朝廷的喜好，也抓准了百姓的人心好恶。

第十节　明宫梃击案

万历皇帝的皇后没有生子，宫人王氏生皇长子朱常洛，理应成为皇太子，但万历一直想立他所宠爱的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但遭到法律的制约和群臣的反对，所以朱常洛直到19岁才被立为太子，住迎禧宫。朱常洛被立为太子之后，长期笼罩在“更立”的阴影里，随时忧虑皇父会以三弟朱常洵取代自己。朱常洛从被立为皇太子到继位又是19年。在这19年里，朱常洛终日战战兢兢，唯恐被废。直到朱常洛32岁时，福王朱常洵离开北京到洛阳封地之后，他才稍稍松口气，觉得太子的位子应该是稳坐了。

朱常洛坎坷的经历，使他形成了胆小怯懦的性格。他在读书时，正值寒冬，太监居然不给他生火取暖。他即使被冻得浑身发抖，也不敢吭气，气得讲官郭正域训斥太监，太监们才给他生火。在万历皇帝病重时，朱常洛带着儿子朱由校等去探望，守门太监拦着不让他们进去，朱常洛也不敢抗争，而是从早到晚一直等在门外，后来是兵科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和东宫太监王安等周旋，他才见到万历皇帝最后一面。

太子朱常洛因为长期受到万历皇帝的冷落，心情压抑，寂寞寡欢，无所事事。于是借酒色填补精神空虚。朱常洛的妃子很多，有太子妃郭氏、才人王氏（天启帝朱由校的母亲）、贤妃刘氏（崇祯帝朱由检的母亲）等。还有两位姓李的选侍（侍候皇帝起居而未有封号的宫女），一位是东李选侍，另一位是西李选侍。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傍晚，蓟州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打伤守门太监，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直到前殿屋檐下才被捉拿住。当时，慈庆宫第一道门只有两名太监守门，第二道门竟无人看守。此事件让朱常洛惊恐万状，举朝震惊。万历皇帝下令审讯。负责审问的官吏说张差是个疯癫病人，企图糊涂结案。而巴结郑贵妃的内阁首辅方从哲也不愿深究。朝中东林党人怀疑是郑贵妃欲谋害太子，坚决要求彻底追究。

郑贵妃闻知后，对万历帝哭泣。万历皇帝让她去求太子。郑贵妃找到了皇太子朱常洛，号啕大哭，诉说事情的原委，请求太子宽恕。万历皇帝一看这件事闹大了，不但牵连到了太子，也牵扯到了郑贵妃，使他两头为难，他决定亲

自来处理这件事。

于是，万历皇帝在慈宁宫皇太后灵位几案前召见太子和百官，令太子降谕处理此案，禁止牵扯太多人。皇太子朱常洛既不愿意得罪万历皇帝，也不愿意得罪郑贵妃，不敢深究此事，也想息事宁人。最终决定将张差处死，把庞保和刘成两个太监在内廷秘密打死，草草了结这桩大案。负责此案审理的王之寀遭到反东林党一派官吏的攻击，万历帝将他削职为民。

梃击案从表面上看是郑贵妃意欲谋害太子朱常洛而未得逞，好像是皇帝的家事。但实质上反映出了朝廷中东林党与其他派系的政治斗争，其实是国事。尽管万历皇帝亲自处理结案，但这件事始终疑云重重。

第十一节　明宫红丸案

春药在我国宫廷有悠久的历史。汉代有“慎恤胶”，魏晋有“五石散”，唐宋有“阳起石”，明代有“颤声娇”。

春药在明代成了色鬼们淫乐的帮手。明代皇宫长期以重赏的方法吸引献这类秘方的人，从宪宗成化年间开始，献秘方者络绎不绝。陶仲文本是个守仓库的小吏，因献房中秘方而一跃而成为朝廷显贵。传说，他所献的春药秘方就是“红铅丸”。

红铅丸的制法很特别。须取童女首次月经盛在金银器内，加上夜半第一滴露水、乌梅等药，连煮七次浓缩，再加上乳香、没药、辰砂、南蛮松脂、尿粉等搅拌均匀，用火提炼，最后才形成固体，制成丸药。

根据《明实录》的记载，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二月，从畿内挑选 11～14 岁的 300 名少女入宫。嘉靖三十一年(1552 年)十二月，又选 300 人入宫。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九月，选民间女子十岁以下者 160 人入宫；同年十一月，又选湖广民间女子 20 余人入宫。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正月，选宫女 300 人入宫。前后共计 1080 人入宫。这些尚未成年的小姑娘，后来竟成了嘉靖皇帝制药用的“药渣”。

由于嘉靖帝凶狠的淫欲和无情的摧残，引发了一场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宫女暴动。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几名宫女用绳子套住嘉靖帝的脖子，要把嘉靖帝勒死……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即泰昌帝。

朱常洛体质原本不好,此时忽然从逆境转入顺境,不免失之放纵。他有了郑贵妃献上的八名美女之后,加速了体质下降,到他父亲死时,他的身体也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在1620年八月初一登基时,只是勉强支撑着才完成了即位大典。他即位后的十多天还能理事,后来就卧床不起了。

有一夜,八美人之一的吴赞侍寝。朱常洛服了一粒红铅丸,狂躁不已。尽管吴赞一再提醒朱常洛节制,朱常洛却神情异常兴奋,狂笑不止,使得吴赞不得不在第二天一早去求助于御医。

当日太医院由崔文升值班,听说皇帝亢奋狂躁,不知是阴虚肾竭,还以为是邪热内蕴,于是下了一副泻火通便的猛药。哪知朱常洛服下一剂药之后,一昼夜竟腹泻了三四十次。

随后,朱常洛的病竟不断加重,以致不得不召辅政大臣和皇太子来安排后事。这时候,皇帝突然问:听说鸿胪寺有人前来进药,他在哪里?

首辅方以哲答道:鸿胪寺丞李右灼说他有仙方可治圣上的病,臣等未敢轻信。

自知不行了的朱常洛想试试这个"仙方",即刻派人宣李可灼进宫,并让他快快进药。

李可灼进献的是一颗红色的丸药。内侍捧着红丸,服侍朱常洛咽下。不一会儿,朱常洛的喘象平复下来,呼吸也渐渐均匀了。大家都舒了一口气。

晚上李可灼再进一丸。朱常洛服下第二丸后,初时气象平复,但后来突然间一声尖叫,朱常洛挣扎了几下后就长眠不醒了。朱常洛还没有来得及制定自己的年号即驾崩,即位仅30天。

两粒红丸要了皇帝的命,朝野顿时卷起了轩然大波。这红丸到底是什么药?

有的人认为,李可灼进献的红铅丸只是一种普通的房中药。房中药大都是升阳壮火的热药,皇帝大泄大泻,阴寒弥漫,以火制水,也算用药正途。

也有人认为,这红丸就是道家金丹,是用汞炼成的汞化合物。明代诸帝希求长生不老,大都宠信方士。方士们也常常铤而走险,用救命金丹来对付垂危病人,死了是病重难救,而一旦活了,则名利双收。

还有人认为,拿春药给垂危病人吃,是出乎常理的。李可灼显然是受人利

用，故意拿这种药物来加速皇帝死亡，是一件精心策划的谋杀案。

那个进献泻药而使朱常洛病情突然加重的崔文升，原是郑贵妃属下的人，李可灼又是首辅方从哲带进宫来的。所以，保太子派的人一致认为，崔和李都是弑逆，应该处以极刑，不仅如此，还要追查幕后指使。这个幕后人，指的是郑贵妃。

首席辅政大臣方以哲也成了众矢之的。方以哲慌忙上疏请求致仕（即退休），想借此得以逃脱。可是致仕之后，声讨他的疏文还是像雪片一般飞来。对此，方以哲自请削去官阶，并愿远流于边方异域。此时，有很多宦官在内廷为他打点，在外廷也有许多官僚站出来为他说话，但事情还是盘根错节，很难了断。

最后，李可灼被判为流戍，崔文升则发往南京安置。“红丸”一案，到此暂时了结。

第十二节　明宫移宫案

万历皇帝的长孙、泰昌帝的长子朱由校的母亲王才人，原来是在东宫伺候皇太子朱常洛的宫女，直到生下朱由校后才被封为才人，因长期遭到朱常洛宠妃西李选侍的凌辱和朱常洛的冷落，抑郁而死。第二年七月，朱由校的祖父万历皇帝驾崩，接着朱由校的父亲泰昌帝驾崩。朱由校接连失去三位亲人，特别是他的父亲泰昌帝即位才一个月即驾崩，全国乱作一团。这年，朱由校 16 岁。

万历皇帝在世时，他始终不肯立长孙朱由校为太孙，也不肯让朱由校出阁读书。直到临死前才留下遗嘱：皇长孙宜即时册立、进学。几天以后，泰昌帝朱常洛即位，但朱常洛并不热心册封太子，后来在大臣的一再请求下，才下旨打算在九月初九日册立太子。但九月初一，泰昌帝竟然驾崩。朱由校未做成皇太孙，也未做成皇太子，书一天也没读，竟然要继承皇帝大位。这样的皇位继承者，在明代仅此一人。

朱常洛有“东李”“西李”两位选侍，选侍是比较低级的妃子。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母亲生下他之后不久就死了，朱由校及其同父异母五弟朱由检由西李选侍照管。西李为了控制朱由校，便要求他与自己同居一宫。泰昌帝朱常洛即位后，朱由校和西李随之移居乾清宫。西李得宠于泰昌帝，泰昌帝打算将她

封她为皇贵妃，但西李要求封为皇后。不久，泰昌帝驾崩，西李封后的梦想破灭了，便勾结心腹宦官魏忠贤，打算移居乾清宫，觊觎垂帘，把持朝政。杨涟等人到乾清宫哭祭，乾清宫门关着，大臣们排闼而进，宦官挥梃乱打。诸臣强入，哭临之后，请见皇长子，皇长子被西李选侍阻于暖阁。大学士刘一燝、吏部尚书周嘉谟、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人，上疏请求西李选侍不能与太子朱由校同住一宫，但西李选侍不肯移宫，甚至把朱由校禁闭在乾清宫。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乘西李不备，将朱由校抢抱出来，魏忠贤等太监追出来，朱由校的衣袍都被追赶的太监撕坏了。阁臣刘一燝掖左，勋臣张维贤掖右，共拥朱由校登舆，抬到文华殿。西李派人来请朱由校回乾清宫，大臣们又把朱由校安排到慈庆宫。朱由校就这样摆脱了西李等人的挟制，逃出乾清宫，住进慈庆宫。

朱由校避住在慈庆宫，西李却居乾清宫。朱由校要登临大位，必须回到乾清宫。为了让西李尽快“移宫”，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人多次上奏，朱由校最后才于九月初五日下令让西李搬到仁寿宫居住。但西李还是赖在乾清宫不搬。于是，大臣们就移宫一事争论了数日也没有做出决定。到了登极的前一日，刘一燝、韩爌率其他大臣请西李选侍搬到鸾宫（明代宫妃养老之地），皇长子朱由校才从慈庆宫般回到乾清宫。

第八章　大明锦衣卫

第一节　朱元璋埋下的祸种

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每卫辖正规军士约5000人，其下设所，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8处。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改革了禁卫军，建立了12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

锦衣卫衣着华丽，最初只是皇家的仪仗队，随驾出行。这些锦衣卫一般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而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从外表上看颇有威严，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其职能是负责执掌侍卫、巡查缉捕。



锦衣卫服装

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一样，其中比较著名的为“大汉将军”。大汉将军主管皇帝侍卫、展列仪仗、传递皇帝命令以及职掌廷杖等事务，可以说和一般禁卫军毫无不同。经历司则主管锦衣卫公务文书的出入、誊写及档案封存等事项。

巡查缉捕，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也是它能被人们牢牢记住的原因。

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只是用来卤簿仪仗，但后来由于他大肆屠戮功臣，感觉一般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来不顺手，于是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提升为皇帝的私人警察。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北镇抚司负责，各地藩王及官员秘密监视、肃反肃贪，独立侦讯、逮捕、判决、关押权力（诏狱）以及反间谍等事务。此外，锦衣卫曾参与收集军情、策反敌将的工作，如在万历朝鲜战争中收集了大量的日军军情。南镇抚司负责一般卫、所部队人员之犯罪侦查、审讯、判决、情报以及军事武器之研发事项。

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 1000 人，最多时多达 6 万人。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无不良记录的良民，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

第二节　明王朝的弊政

大明王朝有许多朝廷官僚以外的、直属皇帝的专设监察、刑狱系统，包括锦衣卫、东西厂、镇抚司狱等，这类系统有自己的军队和监狱，直接向皇帝负责，基本上贯穿整个大明王朝的始终。

《明史・刑法志》把它们与廷杖（皇帝在朝廷打臣僚板子的肉刑）加在一起，称之为“明之自创，不衷古制”。一语道破了贯穿明皇朝的特别专制的酷政性质。

《明史・刑法志》记载，明朝的锦衣卫近似于汉武帝时期的诏狱。所谓诏狱，主要是指九卿、郡守一级的二千石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诏书才能系狱的案子。汉武帝与匈奴作战多年，将国家拖入了战时体制，多用法家酷吏，严刑峻

法。汉武帝晚年，诏狱多达 26 所，关押有郡守、九卿一级高官前后达百余人，牵连对象至 10 多万人。在汉代，这类酷政只是汉武帝晚年阶段较短时期的现象。

明太祖朱元璋担心自己死后，下一代皇帝驾驭不了文武功臣，所以他几兴大狱，假借各种理由，将辅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几乎都杀干净了。这类案子，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如果交给朝官们依法办理，就有可能旷日持久，甚至定不了案。所以就把这些案子作为诏狱交给锦衣卫办理。

汉武帝时期的诏狱仍是由朝官办案，只是严刑峻法的政策失误；明太祖的锦衣卫则以消灭功臣为目的，罗织罪状，置无罪者于死地。

明朝初期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竟然株连了 4 万人，足见其酷烈程度。它是皇帝心术不正的产物，所以其后遗症也特别严重。

明太祖朱元璋也知道，酷政不可以为常。所以，在蓝玉案以后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朱元璋就下旨：案件无论大小均不得由锦衣卫审理，而全交由一般司法机构审理。

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借着京城文武功臣已经杀光、大伤元气的特殊机遇，起兵夺得了建文帝的帝位。朱棣因为需要大杀忠于建文帝的正直官僚，所以又需要特务机构了。在明成祖手上，锦衣卫再次灿烂辉煌。

第三节　灭绝人性的酷刑

在明朝，“锦衣卫”三个字是恐怖的代名词。因为他们的存在，朝野人人自危。因此，有人认为，锦衣卫才是大明朝灭亡的元凶。

大明王朝皇帝朱元璋和朱棣，由于其出身的特殊性，对皇权的维护有强烈的欲望。这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的扩大了。

一般来讲，锦衣卫的工作只限于侦察各种情报、处理皇帝交付的案件，一旦适逢一个野心大、心肠狠的指挥使掌权，就会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既可以打击异己，也可以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如成祖时的纪纲、英宗时的逯杲、武宗时的钱宁等，在他们掌权时，缇骑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会家破人亡。

北镇抚司大牢中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死于锦衣卫酷刑之下的正直

人士更是不计其数。这种恐怖的氛围，终明一朝几乎是绵绵不绝，这种毫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

锦衣卫另一项职能是“执掌廷杖”。廷杖制度始自明朝，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官员一旦触怒了皇帝，就会被宣布加以廷杖，他会立刻被扒去官服并反绑双手，押至午门的行刑地点。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早已严阵以待。受刑者被裹在一个大布里，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大腿和屁股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地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个人的脚尖向外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但明朝的皇帝却乐此不疲，锦衣卫将校对它也是情有独钟。

厂卫除了常用的杖刑、夹棍等刑罚之外，还有令人不寒而栗的不常使用的几大酷刑。在几大酷刑中，刷洗、油煎、灌毒药、站重枷等都能把人折磨得生不如死。

刷洗，就是将犯人脱光衣服按在铁床上，用滚烫的开水浇在犯人的身上，然后趁热用钉满铁钉的铁刷子在烫过的部位用力刷洗，刷到露出白骨，最后直到犯人死去。

油煎类似于后来的铁烙铁，是将一口平的铁盘烧热后，将人放在上面，不到片刻，就将犯人烧焦。

灌毒药，就是特务们灌犯人一次毒药，然后喂一次解毒药，然后再灌另一种毒药，直到将犯人毒死。

站重枷，就是让犯人站着戴枷，枷的重量超过常人体重，最重的大枷有150千克，犯人戴上几天后就被活活累死了。

另外，厂卫杀人的酷刑还有剥皮、铲头会、钩肠等，这些刑罚又要胜过以上的几种酷刑。

在明朝，虽然也出现过一些比较正直的锦衣卫，但毕竟是凤毛麟角。也许因为他们华丽的外表，锦衣卫也赢得了一些人的喜爱。但由于他们对人权无情的摧残，至今仍被看作一种灭绝人性的政治工具，遭受人们的唾弃。

第四节　恶贯满盈的纪纲

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反对自己的侄子建文皇帝，号称“靖难”。第二年，他亲率大军进攻山东，占领了鲁北的一些府县。在行军至临邑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秀才主动来到军中，要为朱棣效犬马之劳。这位秀才就是纪纲。

纪纲是济南府临邑县人，自幼聪明干练，通文墨又善骑射，为人乖巧，特别善于揣摩他人的心意。他一度进入县学做过生员，但由于品行不端而被革黜。功名被革造成的失意感大概是促使他投靠朱棣的重要原因。

朱棣在军中召见纪纲后，对他的乖巧敏捷十分欣赏，立即让他在身边任贴身侍从，而且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一直对他宠信有加，视为心腹。

1402年6月，燕军攻克南京，朱棣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元为永乐。这样，纪纲就成了新王朝的功臣。

在朱棣称帝之前，纪纲已经被授予忠义卫千户的世职。到了南京之后，朱棣又提升他为锦衣卫指挥使，把王朝的特务系统完全交给他管辖。从此以后纪纲就成了永乐皇帝朝廷中最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永乐帝用暴力篡夺政权，在朝野间受到许多非议，一部分有气节的官僚还公开抵制永乐新朝，宁死也不为其服务。永乐帝本来有些心虚，此时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对反对派采取了高压政策，锦衣卫首领纪纲于是得以大显身手。

纪纲召集了一大批无赖之徒充当锦衣卫校卫，并把他们散布到京城内外的各个角落，对官员百姓的一举一动进行监视。有些校卫甚至装扮成仆役到一些重要官僚家中长期卧底，将其家中的大小事全部写成材料汇报。纪纲根据校卫们收集到的情报综合制造成案件报告皇帝，永乐帝再把对案件的刑讯、审判权交给纪纲。这样，在纪纲主掌锦衣卫的时期，锦衣卫已经完全演变成了独立于国家司法、警察、治安制度之外，以皇帝的名义掌握着侦缉、拘捕、刑讯、审判等一整套特殊权力的秘密警察组织。

凡是永乐帝憎恶的臣子以及内侍，纪纲就会罗织罪名，将其抓入北镇抚司狱，甚至定为死罪处以极刑。遇到有永乐帝特别忌恨而又不愿公开杀戮的大臣，纪纲就在北镇抚司狱中秘密裁决。

纪纲在打击异己上不择手段，心狠手辣，在敛财上也十分贪婪。他多次指使家人模仿永乐帝笔迹，伪造诏书，带到苏北几处盐场，向盐商勒索银子达四百万余两。在南京，纪纲利用锦衣卫陷害一百几十户商贾，又佯装帮这些人家消灾，乘机诈骗他们的钱财。

有一次，交趾（越南）使者来到南京，带来珍奇玩物，欲结交明朝新皇帝。纪纲以帮忙引见为由，诈骗了交趾使者的珍奇宝物。纪纲还巧取豪夺，霸占了许多官吏百姓的田地房产。他甚至没收了朱元璋儿子吴王、晋王家的无数财宝。

纪纲干的最大的一件坏事，便是害死了明代初年的著名学者解缙。

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由交趾到南京，向朝廷奏事，正值皇帝北征，不在朝中。解缙便去拜谒了太子，不久便离开南京，返回交趾任所。

解缙刚离开南京不久，明成祖朱棣回来了。朱棣的二儿子、汉王朱高煦便乘机弹劾解缙，说解缙私自见太子，却不觐见皇帝，未尽人臣之礼。朱棣大怒，下令将解缙关入大牢，朱高煦此举是为了报复解缙。原来在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明成祖征求朝臣意见，在朱高炽、朱高煦中究竟立谁为太子之时，解缙支持立朱高炽为太子，朱高煦因此怀恨在心。纪纲在办理此案时，还罗织罪名，将多人一起关入监狱。

永乐十三年(1415年)冬南京室外特别冷，并下着鹅毛大雪。纪纲到牢中看望解缙，并带了一坛酒，两人对饮，解缙喝得大醉。纪纲命狱卒将喝醉的解缙拖到院中，用积雪将他埋起来，解缙很快就被冻死了。解缙死的时候才47岁。纪纲命令锦衣卫抄没其家产。

永乐十三年(1616年)的端午节，永乐帝按照当时的风俗率领武臣在御园射柳为戏。纪纲射而不中，他的部下竟然不顾有圣驾在场而大呼小叫，这使得永乐帝很不愉快。更让永乐帝不愉快的是，在现场的众多专门负责纠察风纪的监察御史和高级文武官员竟没有一个出面指责纪纲和他的属下。朱棣从这件小事中感觉到，纪纲在朝廷中的势力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端午节射柳以后，朱棣下定决心要除掉纪纲。

两个月后，有几个皇帝的贴身太监告发纪纲图谋不轨，这显然是皇帝亲自授意的。朱棣没有作任何调查就立即将纪纲逮捕了，送交都察院审讯，同时命令负责监察的给事中和御史集中揭发他的罪行。不到一天时间，对纪纲的审讯就结束了。纪纲在当天就以“谋大逆”的罪名被凌迟处死。纪纲被处决后，

他的家属都被流放戍边，其爪牙也大多被处死。这是全国当年大快人心的事情。

第五节　断案严明的朱骥

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四日，明英宗在“土木之变”中被瓦剌军队所俘虏，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惊。孙太后让明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任监国。

朱祁钰担任监国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王振的党羽肃清。当初瓦剌侵扰北方疆土，就是太监王振怂恿明英宗御驾亲征的，结果导致大明皇帝成为了瓦剌的俘虏。只有除掉王振党羽，京城的臣民们才能齐心协力抗击来敌。而当时和王振走得最近的就是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朱祁钰把马顺乱杖打死在了朝堂上。

把马顺打死后，朱祁钰下至让兵部侍郎于谦的女婿朱骥担当锦衣卫指挥使。朱骥性格纯善，办事公允，刚直果敢。他兼具仁厚和刚直于一身，天生就是管刑狱的好手。

当时朱骥所接管的锦衣卫，收受贿赂之风盛行，纪律松散，大多以权谋私。朱骥担任锦衣卫指挥使之后，首先把那些违纪枉法的锦衣卫的小头目们惩治了一番，情节严重的甚至直接下狱，接着，朱骥颁发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并且公开奖罚制度，凡是违反规定的锦衣卫都被施以重刑。这下锦衣卫们终于又回到了机械严谨的状态上了。

朱骥掌管锦衣卫初期的主要工作，第一是要肃清与王振有来往的“余孽”。第二是要把那些收受过瓦剌贿赂的“间谍”挖出来。第三就是要把那些散播京城危亡消息的不安分分子控制起来。与从前的锦衣卫更注重监控外廷不同，由于处于特殊时期，朱骥时期的锦衣卫所负责的工作更类似于现在的国家情报机构。

除此以外，朱骥还改革了锦衣卫“诏狱”里的刑具。他去除了一些过于残忍和变态的刑具，这尤其体现在朱骥对“诏狱”里最出名的刑具刑杖的改革上。朱骥之前的锦衣卫所使用的刑杖，大多又粗又重，有的刑杖还是金属制作的，所以很多犯人受不了几下就死亡了。朱骥认为刑杖只是“逼供”的手段，而不是用来杀人的，所以他将原来的刑杖换成了较轻的刑杖，这样打下去一般不会

伤人性命。

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瓦剌兵临城下,当时已任兵部尚书的于谦面对强敌沉着应战,与敌军征战五天五夜,终于打败了来犯的敌人,迫使瓦剌兵退回塞外,使明朝转危为安。

除掉了瓦剌对明朝政权的威胁,明朝的统治者终于开始忙于重新巩固统治、恢复建设。此时的锦衣卫依然在扫清剩余的不安因素。同时,伴随着国家政局的逐渐稳定,战时很多趁机大发战争财的朝臣和商贾们成为了锦衣卫新的侦办对象。朱骥丝毫不敢大意,他断案以公正严明著称,在锦衣卫有"青天"的美称,他成为锦衣卫历史上以断案严明而著称的锦衣卫指挥使。

在严格治狱的同时,朱骥也很注意对锦衣卫官员的选拔和任用。凡是选拔进入锦衣卫的,几乎都是清正廉明的人,朱骥觉得这样才能达到"上行下效"的效果。

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朱骥掌锦衣卫开始,锦衣卫开始了一段与众不同的岁月,正是这段时期,体现出了锦衣卫正面的历史价值。

第六节　护驾有功的袁彬

袁彬,字文质,江西新昌县义钧乡(今宜丰县澄塘镇秀溪村)人。1401年(建文三年),袁彬出生于近侍家庭,自幼聪颖,能诗善文。其父袁忠,建文四年(1402年)被选为锦衣卫校尉,在宫中近40年,一直当皇帝的近侍。正统四年(1439年)袁忠辞疾家居,以39岁之子袁彬代其校卫职。校卫是一般的卫士。袁彬虽地位卑微,然因在"土木堡之变"护驾北征,成为捍卫国格、护驾有功的英雄。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北方的瓦剌部首领也先兵分四路、大举南犯。此时,正值宦官王振掌权,面对瓦剌的进攻,王振不与诸大臣商议,擅自调动50万大军挟持朱祁镇亲征。明军到大同后,王振风闻也先兵力强大,没等交锋便吓得收兵回京。八月,明军行至土木堡(今河北怀南县东南),瓦剌追兵杀到,明军阵脚大乱,王振被杀,正统帝被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

也先拥帝北上,正统帝的众多侍从抛下正统帝仓皇逃命去了,唯有袁彬跟

随正统帝寸步不离，与瓦剌首领交涉等一切事务，全由袁彬承担。

袁彬对正统帝的照料无微不至。正统帝被掳后，住的是破旧不堪的蒙古包。每到夜晚，北风刺骨，正统帝难以入睡，袁彬便解开衣服将正统帝冻僵的脚裹怀入中取暖。每逢随军转移车马不能行，袁彬便背着正统帝前行。当正统帝仰头南天，长吁短叹时，袁彬便反复开导，帮助正统帝坚定回国的信心。

正统帝对袁彬的依赖也到了片刻难离的地步。有一次，袁彬感冒发烧不省人事，正统帝急得不知所措，趴在他的背上大哭。不料经正统帝这么一压，袁彬出了身大汗，感冒竟不治而愈。

正统帝被掳时期，袁彬不但在生活上百般照护他，在政治上也千方百计助正统帝免遭外族人的玷污。有一天，也先派人到正统帝住处提亲，欲将他的亲妹妹许配给正统帝，以“美人计”达到逼降的目的。于是袁彬规劝正统帝道：“以陛下中原大国之君，若成为外族人的女婿，不但气节丧失，尊严丢尽，今后还将处处受制于人。而且，你在做俘虏的时候娶亲，会让人觉得你身为流亡之君，不思返国，却在敌营贪图享乐，于大明帝国，于陛下今后的声誉都很不利。因此，望陛下能顾全大局，辞掉这门亲事”。正统帝听罢，点头赞许。后来，也先又选了六名美女去服侍正统帝，袁彬又教正统帝回复说：“待朕归国娶令妹时，再将六女纳为媵从，也算不负令妹了。”以后，也先又多次按照汉奸中官喜宁的划策行事均失败。

喜宁深知，正统帝之所以能够数次对付也先逼降之计，是袁彬在为他出谋献策，于是他极力唆使也先杀掉袁彬。一天深夜，也先、喜宁把袁彬五花大绑拖到野外，要将他五马分尸处死。袁彬临刑前，怒斥喜宁，破口大骂，喜宁令人赶快行刑。在这紧要关头，正统帝赶到，他置皇帝尊严而不顾，哭求也先将袁彬救下。事后，袁彬对正统帝说喜宁经常挑拨也先，犯我大明，制造边事，只有除去此人，回归才有希望。正统帝点头称是，即令袁彬想好计策，密书两封，遣另一侍卫带回给朝廷兵部尚书于谦。按照信中的计策，于谦将喜宁处死。

也先失去喜宁又遭大明的齐心抵抗，正统帝在袁彬策谋下一时难以降服，于是在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将正统帝送返，袁彬等人也一同回京。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泰帝病危，袁彬辅佐当时的太上皇朱祁镇复辟。袁彬从锦衣试百户，升为锦衣卫指挥使。弘治元年(1488年)袁彬去世时，朝廷赐给他光禄大夫上柱国左军都督，母、妻都诰封为一品夫人。

第七节　仁厚治狱的牟斌

牟斌是在成化末年加入锦衣卫的，牟斌把朱骥和袁彬树立为其人生的坐标，他立志改变锦衣卫在世人眼中的形象。牟斌需要做的，就是勤勤恳恳地好好工作。所幸随着明孝宗的登基，整个明朝的风气都开始有所变化，明孝宗是一个以个人的性格和生活来影响时代发展的人，而他在选择朝臣上也以要求自己的传统规范来作为选择朝臣的标准，因此，很多恪守传统道德的人得以重用。

耿直刚正的牟斌很快就从一名普通的锦衣卫擢升到了锦衣卫的管理层。伴随着"弘治初政"的到来，司礼太监怀恩开始物色锦衣卫指挥使的人选。怀恩是一个正直的宦官，很多正直的朝臣都是经他推荐的。经过怀恩的长期观察，认定了牟斌的人品和能力之后，弘治朝的锦衣卫指挥使——牟斌就披挂上任了。

牟斌在治狱初期，正是"弘治中兴"开始的阶段，明孝宗不仅办事严明，而且勤政，使明朝从成化间的混乱中恢复过来。加之牟斌本人仁厚刚正，使弘治年间锦衣卫的治狱真正做到了公正和仁厚。牟斌对待关押在"诏狱"里的罪犯都很人道，处理案件都要求必须清晰无误，凡是有疑点的都必须收回刑部重新审理，在清理宦官李广和蒋琮时，锦衣卫也提供了足以致二人于死地的罪证。可以说，弘治朝的锦衣卫真正发挥出了促进国家正常发展的功能。

明孝宗一生都只与皇后张氏过着一夫一妻的生活。明孝宗虽然对臣子要求严格，可毕竟自己只有一个婚姻伴侣，所以对张皇后家的人要求宽松一些。

张皇后的弟弟寿宁侯张鹤龄，平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有张皇后做靠山，张鹤龄有点有恃无恐了经常唆使张皇后向孝宗要一些财物和田庄，还时常出去惹是生非。

当时著名文学家李梦阳正担任户部郎中，为非作歹的张松龄恰好被李梦阳发现了。于是李梦阳就参了张松龄一本，说他欺压乡里、抢占农田、为非作歹。

奏折刚刚落到明孝宗的手里，张皇后就知道了这件事。张皇后就去跟张松龄说了，张松龄抓住奏折中的"陛下厚张氏"这一句大做文章，诬蔑李梦阳对

张皇后大不敬，居然要让明孝宗治李梦阳死罪。

张皇后本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女人，由于张松龄的唆使，再加上其家里人都站在张松龄这一边。张皇后迫于无奈，只能到明孝宗面前去求情，明孝宗只好让锦衣卫把李梦阳抓进了“诏狱”。

锦衣卫指挥使牟斌，早就听闻过李梦阳的名声，而且对李梦阳被抓进“诏狱”的原因基本上都清楚。李梦阳被抓进“诏狱”以后，不仅没有受到丝毫刑罚，还受到了牟斌的款待。牟斌让锦衣卫们收拾了一间干净些的牢房，把李梦阳安置进去，还不时地带着酒肉去陪李梦阳聊天。

明孝宗觉得风声过去了，就找来了牟斌，询问李梦阳在牢里的情况。牟斌就说李梦阳现在好吃好喝好觉的，不仅没有掉一斤肉，还比进去前白嫩了。

李梦阳从“诏狱”里出来以后，依然跟张氏家族对着干。张松龄立刻又去找张皇后，要把李梦阳置于死地。张皇后又跑到明孝宗那里哭哭啼啼起来，这次明孝宗不耐烦了，他生气地说：“你们这些人分明是想让我把李梦阳处死！可是我怎能为了你们几个人而把帮助我治理国家的人除掉呢？”张皇后一听孝宗生气了，吓得赶紧退了出去，回去让娘家人都收敛一些。

锦衣卫在牟斌治狱期间，让朝臣和民众们印象深刻的，不再是“恐怖”和“血腥”，而是“公正”和“仁厚”。

牟斌的仁厚治狱并没有经历太长时间。明孝宗去世以后，继位的明武宗宠信宦官刘瑾，刘瑾把持朝政，排挤所有反对他的官员。刘瑾最初执政的时候，反对派的势力很强大，他依靠强暴的方式打压反对派，将大批大批的臣子们送进锦衣卫的“诏狱”。牟斌毕竟只是锦衣卫的指挥使，没有办法忤逆刘瑾的命令，只好尽自己所能地照顾好这些含冤入狱的朝臣们，不给他们施用刑罚，而且还尽量改善他们的伙食。

有一天，刘瑾到“诏狱”视察工作，一看自己的死对头们不仅都没有被折磨死，而且还都越来越发福了，精神状态比在牢狱外面时还好。刘瑾便找来看管“诏狱”的锦衣卫一问，才知道是牟斌在后面搞鬼，刘瑾就下令把牟斌抓了起来，并用严刑酷法折磨牟斌。牟斌最终死在了自己曾尽力经营的锦衣卫牢狱里。

第九章　明代的宦官机构

第一节　内务十二监

明朝宫廷设置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和都知监十二监。这十二监是管理皇室内务的12个衙门，各有掌印太监一员。事实上只有在这些衙门工作的宦官才是太监。

十二监中以司礼监最为重要，监内的提督太监主管宫内一切宦官礼仪刑名。而秉笔太监在宦官极端专权时竟代替皇帝批公文。司礼监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明朝历代擅政的宦官如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等，均为司礼监太监。

司礼监的职权主要有三项，一是批复奏章，传宣谕旨，这是司礼监最重要的职权；二是总管有关宦官事务，司礼监不仅在各宦官机构中处于"第一署"的地位，实际上也居于总管、统领其他宦官机构的地位；三是兼顾其他重要官职，当时宦官系统的其他一些重要官职，如东厂提督、南京守备等，或专由司礼监太监兼领，或为司礼监太监外差，这也是司礼监职权的一个重要方面。

内官监主要掌管采办皇帝所用的器物，如围屏、床榻、桌柜等。司设监掌管卤簿、仪仗、围幕、帐幔、雨具等。御马监主管内府马政。神宫监掌管太庙及各庙的洒扫及香灯等。尚膳监掌管御膳、宫内食用和筵宴等。尚宝监掌管宝玺、敕符、将军印信。印绶监掌管古今通集库以及铁券、诰敕、贴黄、印信、图书、勘合、符验、信符等。直殿监掌管各殿及廊庑洒扫之事。尚衣监掌管皇帝的冠冕、袍服、靴袜等。都知监起初负责各监行移、关知、勘合等事，后来专门跟随皇帝，负责导引清道。

第二节 内务四司

内务四司即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混堂司,它们各有掌印太监、佥书、监工等。

钟鼓司掌出朝钟鼓及宫内杂戏,设掌印太监一名。钟鼓司的首要职责是出朝钟鼓,还负责宫内乐舞、演戏、杂耍等事。凡圣驾朝圣母回宫以及万寿节、冬至节和年节升殿回宫之时,也在皇帝前演奏乐曲,迎导宫中升座承应。

惜薪司是专门职掌宫中薪炭的机构。冬季北京气温较低,为了御寒,凡是皇帝、皇太后、皇后起居之所,以及皇子、皇孙、公主、嫔妃、宫女、太监居住的地方都用木炭烧暖炕和火炉。明朝每年用木炭1300万千克。优质的木炭,叫红罗炭,产于通州、涿州、宛平、大兴等地,是用硬质木材烧制而成的。乌黑发亮,燃烧耐久,火力旺,无异味,不冒烟,不致污染宫殿内的空气。

薪炭是宫中必不可少的物资,送薪炭的官员要送货上门直抵内廷,因此素有近侍牌子之称。就其重要性来说,这个衙门仅次于锦衣卫。取名为惜薪司,多半是取珍惜薪炭,节省度用之意。惜薪司下设三个机构:热火处、薪炭处、烧炕处。职掌薪柴木炭供应,以及火盆保养与分发等,皇宫里有许多大型的防火水缸,冬季为了防止水缸里的水冻冰,水缸底下,还要设置炭火盆加热保温。另外,守夜打更之事,惜薪司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宝钞司主造粗细草纸,设掌印太监一名,管理、佥书、掌司、监工无定员。皇帝所用的草纸由内官监制作,呈淡黄色,细密绵软,由伺候皇帝大、小便的管净近侍保管。宝钞司所造草纸,一般竖不过70厘米,宽不过1米,以独轮车运送平地晒干,然后入库。

混堂司掌管宫内沐浴事务。混堂即澡堂,混堂司由正五品的太监担任,由惜薪司供给燃煤,内官监拨给火伕。有权势的太监常在皇城外边的私人澡堂洗澡。

第三节　宦官八局

宦官八局分别为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和司苑局。各有掌印太监、佥书、监工等。

兵仗局设于洪武年间，负责制造皇帝的各类卫士及锦衣卫所需各式盔甲兵器以及一部分火器。这些军器盔甲每三年制造一次，由工部具料。而弓弩火器则随时制造。明初，火器的制造主要由内府兵仗局负责，正统以后渐由军器局分造。兵仗局所造盔甲军器有90余种，火器40多种。其火器主要供给各边关使用。兵仗局设掌印太监一名、提督军器库太监一名，该局的工匠人数一般在1700人左右，最多时达3000多人。兵仗局附设火药局，实则是兵仗局的军器库。兵仗局所造兵器有时成为各卫所成造兵器的标准。

银作局设于洪武三十年，初设大使、副使各一员，后改设掌印太监一名。银作局负责打造金银器饰，如金银钱、金银豆叶、金银锭等。该局制作的金银豆、金银叶，重量都不足10克，主要供欣赏之用。此外，银作局还承担一部分其他工作，如为铸造亲王印符、金牌的金牌厂的产品镀金等。银作局的工匠人数一般是两三百人，规模较小。

巾帽局设掌印太监一名，其工匠在500人左右。负责内官、内使所用平巾官帽以及驸马、藩王所用旗尉帽靴。赏赐的对象包括新选中的驸马、新升任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以及随藩王之国的旗尉。巾帽局所造诸物的工价从工部支领。

内织染局的职责是染造御用和宫内所用的缎匹，以及祭祀用的帛等。内织染局设掌印太监一名，工匠人数在1400名左右。内织染局的外署有蓝靛厂，在都城西，另外在朝阳门外还有一处外厂，是浣洗袍服之所。

酒醋面局位于地安门内，其职责是负责制造宫内食用的酒、醋、糖酱、面豆诸物。所谓宫内，是指皇宫内为皇室服务的人。在其职责中，酒、醋等项是由该局自造的。酒醋面局设掌印太监一名，其工匠人数在170人左右。

浣衣局位于德胜门迤西浆家房一带，是唯一不在皇城内的一个内府机构。浣衣局是为内府清洗衣物的机关，同时是收容年老、有罪宫女的地方，以防泄露大内之事。浣衣局设掌印太监一名，佥书、监工无定员。

司苑局负责宫苑中种植的蔬菜和瓜果。

针工局掌造宫中衣服，由掌印太监主管，下设管理、佥书、掌司、监工等员。

第四节　臭名昭著的东厂

东厂是明朝最大的特务组织，它建立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的永乐十八年(1420 年)。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因此被命名为东缉事厂，简称东厂。

东厂的权力之大、作恶之多、名声之臭古今罕见，就是名震天下的锦衣卫也很难与之比肩。东厂还开创了太监干政的先河，为后来的太监制造乱政祸国的恶果埋下了祸根。

东厂建立之初，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力，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后来，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所有太监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番役则是这个特务组织中最基层的特务。

东厂在最兴盛的时期职责很广。朝廷会审案件，东厂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上班，东厂要派出人员坐班；吏、兵、刑、户、工、礼六部的各种文件，东厂要派人查看；这些人还负责市场调查，连菜市场中的菜价，都要记录在案。这些特务无孔不入，不但监视百官，连他们的同行锦衣卫也监视，可见其权力之大。

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他们的身影，导致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

由于东厂的特务头子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也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太监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的特务头子都要毕恭毕敬，甚至还要下跪叩头。

这些东厂的特务还专门供奉抗金英雄岳飞的雕像，其目的是迷惑朝廷百官和天下百姓，让他们觉得东厂人人都是为国为民不惜牺牲的忠臣，以解除天

下对东厂特务们的憎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教育特务们，在为朝廷和东厂效忠的同时，在生死关头，即便是无辜被杀，也要像岳飞一样效忠而死，千万不要有另外的企图用心。

第五节　短命的西厂和内行厂

西厂的成立是非常偶然的，成化十二年(1476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于是他身边机灵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派往宫外打探消息。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几个月后，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首领便是汪直。西厂厂址设在灵济宫前，以旧灰厂为厂署总部。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东厂。

西厂的成立初衷，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地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西厂仅仅成立五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辅臣集体上疏向宪宗痛陈西厂的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

但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一个奸臣戴缙在得知皇帝心思后，主动上疏，大肆吹捧汪直。宪宗大喜，立刻恢复西厂。汪直复出后，更加严酷地办案，戴缙也得以升职。

在此后的五年里，汪直领导西厂又办下了无数"大案"，将反对自己的朝臣

如商辂、项忠等全部铲除，他的权势也达到了极点。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引起了皇帝的警觉，后来汪直被调出京城，西厂也随之解散。几年以后，汪直在失意中死去。

到了宪宗的孙子明武宗朱厚照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西厂由当时的八虎的成员谷大用掌管，另一位八虎成员马永成则掌管东厂。当时司礼监太监刘瑾因与他们有矛盾，又在京师荣府旧仓地（惜薪司）另设内行厂，自成系统，侦缉范围比锦衣卫、东厂和西厂三个特务机构还要大，除监察臣民外，锦衣卫、东厂和西厂也在监察之例，权势居东、西厂之上，用刑尤为酷烈。锦衣卫侦伺一切官民，东厂侦察官民和锦衣卫；西厂有时还监视东厂，内行厂则监视官民和厂卫，而皇帝直接领导与监督所有侦查机关，构成一套侦察特务体系。

直到五年后，刘瑾倒台，明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西厂和内行厂就这样在历史上永远地消失了。虽然西厂和内行厂仅仅存在了五年，仍然残害了不少忠良。

第六节　明朝的宦官制度

明朝的宦官人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急剧增加的趋势，由明初的数百人发展到明末的数万人。比如在正德十一年（1516年）就一次录用自宫者3000多人，从万历元年至万历六年之间，两次从自宫者中就录用了6000多名宦官。

明朝则宦官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包括选用制度、管束制度、奖赏制度、病老丧葬制度等。

选用制度。当时规定，凡自愿阉割要求成为宦官者，事先必须得到官府的批准。如果私自阉割，一经发现，则课以重治，邻居知而不报者，一并治罪。但是，这一规定并未能严格遵行。从明代录用宦官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按照规定报名就阉、候补收用者之外，朝廷还大量直接录用了那些未经报名起送而私自至京的自宫者。

管束制度。在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明确规定，宦官不许干预政事。除此之外，还曾陆续制定了一些有关宦官管束惩罚的具体制度。宦官犯法，照例由司法机构逮问治罪。或下刑部狱，或下都察院狱，或下锦衣卫狱，并由法司

议罪。为了惩治宦官在外犯法，明廷还特意强调了"有司"惩治犯法宦官的职权。对犯法宦官的惩罚方式，主要包括死刑、籍家、革职、革荫、降职、调斥、杖笞等。

宦官因功劳或因受到君主宠幸，除了擢升官职之外，还有赐金银、加禄米、赐免死诏、赐印记、赐敕旌励、赐祭赐祠、父母授(赠)官号、弟侄族人荫官授爵等奖赏方式。

病老丧葬制度。宦官年老有病，多退居京城内外各寺庙，供给柴米、冬衣、靴料，以颐享天年。宦官供职内廷期间，如患病可到安乐堂就治，病愈后销假继续供职。如果病故，则由内官监给棺木，由惜薪司给焚化柴，抬至净乐堂焚化。地位较高的宦官死后，可以特旨赐葬并建造碑亭享堂。

第十章　抗倭名将戚继光

第一节　中国沿海倭患

倭，是古代人对日本的称呼。倭寇是在中国、朝鲜沿海进行掳掠的、有日本人参与的海盗集团。这个海盗集团的主要由日本封建主支持的武士、浪人以及中国的不法商人、海盗等组成。

明代的倭患，以16世纪的嘉靖年间最为严重。早在14世纪的元朝，日本海盗就已经开始骚扰中国的沿海，而到了明代时，辽东、直隶、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更是屡遭劫掠。朱元璋亲手缔造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水师，经常出海巡逻，在陆军的配合下，共同剿杀倭寇。朱棣登基之后，加大了剿杀倭寇的力度，沉重地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最著名的一次战斗发生于永乐十七年(1419年)4月，明王朝从朝鲜得到倭寇进犯的情报后，辽东总兵刘江事先做好准备，在金州卫金线岛西北的望海埚设伏，一举捉获113名敌人，并斩首千余级。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倭患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为了平息外患，明政府一面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与外国进行商品交易，一面与日本进行多次外交交涉，允许他们以朝贡的名义定期进行商贸往来，以达到借助日本封建主抑制倭寇的目的。

嘉靖之前，明王朝虽然经常与日本进行朝贡贸易，但是对其来华商人及货物的数量均有限制，而日本国内矛盾重重，各种势力盘根错杂，互相竞争，终于在与明朝朝贡的问题上酿成了乱子。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分别隶属不同封建主的两位贡使在浙江的宁波爆发了冲突，这些日本人在争斗中杀死及俘虏了前来平乱的一些明军卫所官兵，并劫掠沿海各县，最后夺船逃返。

明朝为此撤销了掌管与日本贸易的市舶司，并加强了海禁。但是，国内的沿海走私集团为牟取暴利与日本海盗勾结在一起，使倭寇日益猖獗。那时的日本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剧变，进入群雄割据一方的战国时代。一些武士、浪

人、商人、水手在乱世中纷纷加入海盗行列，企图靠海外掠夺致富。

据说，真正的日本人只占了倭寇的三成，剩下的七成则是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中国人。倭寇之中，著名的中国人是拥有数百艘船只的王直以及拥有数万部属的徐海等人。

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开始的五六年间是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他们入侵异常频繁，人数从数百人到数万人，延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倭患甚至在大陆建立了军事据点，以便随时抢劫。

明军与倭寇之间的战斗无数，武备废弛的明军经常吃败仗。影响最恶劣的一次战事发生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当时有一股六七十人的倭寇，从绍兴高埠一带向内陆纵横行进数千里，一路途经杭州、严州、徽州、宁州、太平、南京地区，杀伤明军四五千人，死者当中包括1名御史、1名县丞、2名指挥、2名把总。历时80多日后才在浒墅关被明将曹邦辅围歼。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12月的嘉善之战，明军百户赖荣华在执行任务时误中埋伏，被倭寇用鸟铳打死，次日，嘉善失陷。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4月，倭寇包围了桐乡，动用了云梯、云楼以及铜将军(一种火器)等军械攻城。后来，明朝官员对倭寇头目施行反间计才解除了桐乡之围。

倭寇在中国沿海地区到处流窜，所到之处人民惨遭蹂躏，明朝官僚们积极倡议设立乡兵，保卫家园。嘉靖帝先后派遣朱纨、王杼、张经轮流督军抗倭，整军备战，陆续打了一些胜仗，收复了一些失地。

著名的胜仗有王江泾之役，此役发生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5月，明将卢膛、俞大猷、汤克宽等率领从湖广、广西等地调来的狼兵、土司兵，在各路水陆部队的协力之下，在王江泾击败倭寇，斩首1900多级，焚烧、溺死之人则不可计算。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在王江径之战中立功的胡宗宪被任命为总督。

胡宗宪上任之后，利用海盗的亲属进行策反，同时派使者招抚流亡日本的倭寇大头目王直。王直眼见明军战斗力日益增强，掳掠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倭寇内部也因为分赃不均等原因矛盾重重，遂产生停战的想法，表现出愿意接受明朝招安的意愿。

这时，以徐海、陈东、麻叶等中国海盗为首的倭寇分数路入侵，在浙江等地抢掠，并包围了桐乡。胡宗宪也派人对他们进行招抚，并巧妙地运用离间计，使倭寇内部互相猜忌，终于因内讧而四分五裂。胡宗宪最后将这些人一一捕

杀或击毙在战场上。

从日本重返中国的王直，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到达岑港，并在11月亲自进见胡宗宪，以示归顺诚意。胡宗宪上奏朝廷请求赦免王直，却遭到京城多位官僚的抨击而失败。最终，王直于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被斩于杭州。

王直被杀之后，盘踞在岑港的倭寇从海路突出重围，扬帆而去。就这样，浙江的倭患逐渐减轻，然而，大批倭寇却南下福建与广东，继续为非作歹。

王直、徐海、陈东、麻叶等人的死亡，使日本人失去了得力的内应，倭寇的势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胡宗宪虽然灭倭有功，但他却因结交奸臣严嵩而倒台。最终平息福建与广东倭患的则是名将戚继光与俞大猷等人。

第二节　戚继光抗倭

戚继光于嘉靖七年(1528年)出生在山东鲁桥(今济宁市东南)的一个军人世家。戚继光的父亲熟读兵书，精通武艺，治军有方。戚继光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熏陶，怀抱忠心报国之志。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17岁的戚继光承袭父职，担任登州卫(今山东蓬莱)指挥佥事，负责山东一带的沿海防守。上任伊始，戚继光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南倭"。

嘉靖三十一年(1522年)，戚继光参加了山东的武举考试。他在数百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一举考中。第二年夏天，戚继光被提拔为山东都指挥佥事，开始全面参与防海抗倭。

戚继光率军之初，其同僚和敌人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有一次，一支800余人的倭寇窜到浙江慈溪沿海一带，将数倍于自身兵力的明军打得大败。戚继光率军救援，他跳到一个高处，弯弓搭箭，一连三箭，把三路倭酋一一射倒。贼首束手就擒，敌人四散逃跑，明朝将士对他连连称赞。



戚继光

戚继光虽然以三箭退敌，但他深感明军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认为，整肃军纪、加强装备、提高战斗力才是制胜的关键。原先世袭的兵士战斗

力太差，戚继光多次上疏请求招募新军。在戚继光的一再请求下，终于被获准招募新兵。经过几个月的严密筛选和艰苦训练，他建立起了一支以义乌农民和矿工为主的新军。戚继光还创造了“鸳鸯阵”战术，统一编组、统一口号、严肃军纪，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戚继光对属下士兵要求极为严格。有位官员到前线视察军队，突然间大雨如注，其他官兵一阵骚乱，有的甚至离队避雨，只有戚继光的军队纹丝不动，军容整齐。

戚继光对军队严格要求，自己同样以身作则。戚继光率军到浙江乐清，恰逢天降大雨。当地的士绅百姓邀他入室避雨，戚继光却说：“士兵们都在外面淋雨，统帅怎么可以独自进屋避雨呢？”戚继光领导的这支纪律严明的军队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受到百姓的支持和爱戴，被誉为“戚家军”。

嘉靖四十年（1561 年），戚继光率军在浙江台州迎击来犯之敌，救出了上万名被俘百姓，打出了戚家军的威风。浙江倭寇被消灭之后，戚继光又转向福建，成功地捣毁了倭寇的老巢。凶残的倭寇一听到戚继光就心惊胆寒，畏之如虎，他们称戚继光为“戚老虎”。

此后几年，戚家军驰骋海疆，所向无敌。嘉靖四十五年（1566 年），在中国沿海横行 200 多年的倭患终于被肃清了。

第三节　戚继光的长城防务

隆庆元年，刚刚平定“南倭”的戚继光奉命北上抵御“北虏”。他先被任命为京军神机营副将，后被任命为蓟镇总兵，负责从山海关到京师的军政事务。这一时期，戚继光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练兵，二是修长城。

大明王朝为加强北方防务，将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御区，分别驻有重兵，称为九边或九镇，每镇均设有总兵官管辖。蓟镇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拱卫京师，是九镇中最重要的一镇。

蓟镇长城最早修建于明朝初期，虽然到弘治、嘉靖年间长城也都有所修筑，但均属简单的修修补补。真正大规模的修筑则从隆庆至万历初由戚继光完成的。

戚继光巡行塞上，经过仔细考察，认为这些边墙不仅低薄，而且颓废较多，

根本无法阻遏蒙古人的武装袭击。在旧长城线上虽有一些砖石小台,但这种小台彼此之间毫无联系,既不能掩蔽士卒,又没有地方贮存军火器具,敌军只要登上高处发箭,台上守军就很难固守,不利于战斗。于是他上疏请求重修长城。自隆庆三年起,戚继光开始了艰巨的修墙、筑台工程,他亲自监工,对工程质量要求极为严格。戚继光将城墙分为三等,双侧包砖城墙为一等边墙,单侧包砖城墙为二等边墙,石城为三等边墙。他要求要冲地段一律包砖,严禁任何偷工减料现象。在城墙垛口下的宇墙上以一定的距离及地势情况设置了望孔、射孔,有些地段在外侧城墙筑有雷石凹槽溜道,大大加强了城墙的防卫能力。

在加固城墙的同时,他又令人修建空心敌台。空心敌台分为基座、中空及顶部楼橹三层。墙台是齐墙而建的平台,上面也可以放置军械、粮草等物品,并且可以协助敌台攻击来犯的近敌。烽火台与敌台密切配合,形成一定的传烽路线,一遇敌情,就举烽鸣烟放炮,可以迅速地把情况传递到蓟镇防线。而关隘处建筑的城堡,在战时守兵登城打仗,平时则可在城门设卡盘查过往行人。一时间在东起山海关,西到居庸关的1000千米防线上,长城随着地势蜿蜒起伏,加之疏密分布的敌台、烽火台、关城等建筑,高下相间,蔚为壮观。

明王朝的兵制本来是比较完善、比较合理的,对平时练兵、战时用兵都有明确的规定。但随着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兵制几乎成了空文,守边官兵纪律松散,战斗力很弱。

戚继光为了提高练兵效果,上报朝廷批准,从浙江调来了他原来在沿海抗倭时召募的训练有素的数千将士,作为练兵的骨干和典范。在练兵过程中,戚继光强调两点:一是平日训练要认真,二是练兵必须循序渐进。在教场操练时,他非常重视金鼓号令和行伍营阵,命令士兵必须如临阵一般,不能只走形式。

戚继光还从实际出发,注重战术训练。他认为,用兵时必须根据不同地形而采纳不同的战略战术,不能千篇一律,不顾客观条件。戚继光将蓟镇地形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平原;第二种是半险半易之地;第三种是山谷之地。平原广陌利于车战,半险半易之地利于马战,山谷之地则利于步战。据此,他创立了车营,注重车、马、步兵的混合训练。使蓟镇军容成为诸边之冠。

蓟镇戍卒军纪严明,是与戚继光重视赏罚分明分不开的。戚继光明确奖罚制度,淘汰平庸的将领,严处违纪官兵,升赏戍边有功人员。并且爱护士卒,

至诚待下，大大鼓舞了士气，增强了战斗力。

修建长城，边镇练兵，使蓟镇一带的长城防务迅速得到了加强，使得蒙古骑兵的入侵一次次被击退。

戚继光在北边巡防驻镇16年，修边垣、筑关塞，整训马、步、车三军，有效地保护了京畿和华北地区的安全，明代北部边境出现了少有的太平景象。

第四节　戚家军常胜秘诀

自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戚家军形成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戚继光去职，戚家军共斩杀倭寇15多万人。更令人赞叹的是，戚继光从未打过败仗。戚家军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是因为戚继光走了一条创新之路。

戚继光是一个大军事家，他写了《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兵书。《纪效新书》系统阐述了选兵、号令、战法、行营、武艺、守哨、水战等内容，有许多新思想。比如，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人防御重点，迅速瓦解歼灭之。戚继光还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他以“保国卫民”等思想理念训导官兵，从而提升了戚家军的战斗力。此为理念创新。

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时，他将步兵编制依次设为队、旗、局、司、部、营，每队12人，每营2699人，想再加1人凑个整都不行。他以队为基本单位，尤其重视基层建设。他发明了一种“鸳鸯阵”，此阵由11名士兵组成，队长站在队前中央，其余10人分成两列纵队，分别持4种不同的武器；队长身后是2名持标枪的盾牌兵，其后是2名狼筅兵（一种长铁棍上扎满铁枝和倒刺的兵器），再其后是4名长矛兵，最后是2名短刀手。戚继光到蓟镇后，又将全部防区划分为12路，上面设东、西协守，分管东、西各路军队。同时，戚继光还组成车、骑、步三军，创造性地设立了7个军营，并在各营配置重车156辆、轻车256辆、步兵4000人、骑兵3000人。此为组织创新。

戚继光很重视抓第一战斗力。戚继光注重研究西洋新式火器，还开展了自主创新，使戚家军拥有当时东亚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戚家军除了配备鸟铳之外，还有火力威猛的佛郎机炮、神威将军炮、加农炮等。尤其可贵的是，戚继光的技术创新充分体现在综合集成上。戚继光主镇蓟州时，为了对付蒙古骑兵，他积极推动车、骑、步协动的技术进步。在戚家军的车营中，配置的战车特

别有创意，有 2 名士兵，2 门“佛朗机”战炮，并且摆了 8 片可折叠的屏风，平时放在车辕上，战时打开树立一边，供步兵出入。这个战车胜似现代的装甲车，作战时，战车先在骑兵之后排成队形；待敌军逼近，骑兵退入战车阵内，车上的士兵施放火器；经过一轮喷火吐烟，步兵随即从车后冲出，最后再是骑兵出击。有了冷热兵器混用、互动的技战术保障，使得明军一次次打败蒙古骑兵。此为技术创新。

戚继光多年来大力改革军制，不用卫所制的士兵，而招募流亡农民和矿工，组建新式部队。同时，戚继光建立了严明的军法，要求必须步调一致，因而推出了“连坐法”。若因作战不力而战败，主将战死，所有偏将则要斩首；如果偏将战死，手下所有千总将被斩首；如果千总战死，手下所有百总将被斩首；如果百总战死，手下所有旗总将被斩首；如果旗总战死，手下队长将被斩首；如果队长战死，而手下士兵没有斩获，10 名士兵将全部被斩首。戚继光对于斩敌人首级的士兵的赏赐也很丰厚，每斩一个首级赏银 40 两，按购买力折算，相当于现在的 1 万元。戚继光还设立了固定的考选日期，武艺精通者予以奖赏，武艺生疏者则予以处分。此外，像作战有功、被俘不屈、遵守军纪等，一律有赏；恃强霸道、讹言狂惑、偷摘瓜果、奸淫妇女等，则一律论罪。这就形成了非常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此为制度创新。

戚继光如此拼命地创新，必然换来官兵的拼命作战。虽然戚继光后来去职，但以戚家军为班底的队伍，一直是明朝的国防中坚。万历朝鲜之役，为克复平壤立头功的是戚继光的老部下；镇守辽东的袁崇焕，所倚重的关宁铁骑与戚家军也有渊源。

第五节　戚继光斩子疑云

几百年来，戚继光斩子的故事一直在闽、浙一带广为流传。此外，在福建宁德、连江、闽侯，浙江义乌等地也有类似的传说。戚继光斩子的故事到底是不是历史事实？到底发生在哪个地方？一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

有人认为，戚继光斩子的故事发生在浙江台州地区。

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在浙江抗击倭寇，连续取得了几次大胜仗，打得倭寇闻风丧胆。有一次，戚继光率领军队在台州围剿一股倭寇，倭寇与戚家军接战之

后，很快大败，有一股残敌想绕道城北的大石退守仙居。为了彻底消灭这股倭寇，戚继光立即命令自己的儿子戚印为先锋，率领军队抄近路在白水洋常风岭一带伏击。临行前戚继光一再交待戚印，与倭寇接战之后，不要急于求胜，要佯装失败，将敌人诱至仙居城外再予以反击，以迫使城中的倭寇出援，这样可一举歼灭倭寇。如果违反军令，就按军法处置。

戚印率军队到达常风岭之后，将军队埋伏在山道两旁的树丛中，此时，倭寇的队伍也沿着这条山道开了过来，前面还押着一些抢掠来的妇女和牛羊等，戚印看到后，气愤万分。他立即下令军队展开总攻，一时间箭石齐飞，刀枪猛舞，喊声震天。戚印只顾奋勇杀敌，竟然忘记了父亲临行前交代的“只许败，不许胜”的命令，很快就将敌人全歼在山道之上。

戚印率军回营后，将士们都夸戚印作战勇敢，杀敌有功。但戚继光却在听完儿子禀报之后，勃然大怒，说他违反军纪，不服从指挥，应该以军法处置，便命将校将其绑出辕门外正法。诸将虽然苦苦为戚印求情，但戚继光最终还是斩了儿子。

后来当地的百姓怀念戚印，在常风岭上为他建造了一座太尉殿。

第六节　戚继光惧内趣事

抗倭英雄戚继光，在历史上还有另外一个响亮的名头——怕老婆的戚继光！

戚继光 18 岁时，娶了王氏为妻。王氏出身于官宦之家，她的父亲最高做到总兵官的位置。王氏年轻时，喜欢舞枪弄棒，而且拜过名师、得过真传，功夫了得。

王氏婚后，她的泼辣性子没变。她的脾气很大，遇事很有自己的主张，以至于经常跟戚继光顶撞起来。王氏动不动就拔出兵器来跟戚继光比画两下，戚继光居然打不过她，这下戚继光就没好日子过了。

有关戚继光怕老婆的典型事例，最被广为传颂的是以下两件事。

一件是说戚继光在训练出戚家军后，因为王氏一直随军，所以戚继光惧内的事就被他的兄弟们知道了。大家总是在戚继光被王氏欺负后给他出些馊主意。

有一次，戚继光在家里又被王氏打得落荒而逃，一直逃到了军营里。那帮兄弟看戚继光很惨，就对他说："你老婆太不像话，把她宰了算了。不如我们在帐中设伏，找人把她叫到大帐里来，然后大家刀枪剑戟一齐上，就把她收拾了。即使杀不了她，也能给你解解气！"

戚继光听了，一发狠，于是就同意了。于是命令一个亲兵到家里去请王氏到大帐里来，然后戚继光就跟这帮兄弟们个个刀剑出鞘，杀气腾腾地等着王氏。

过了一会儿，王氏来了。王氏还没进帐，戚继光只听得帐外一声吼："你没事儿叫我来干嘛！"说着帐门一挑，王氏柳眉倒竖，大踏步地走了进来。

大帐中的几十个兄弟见王氏大模大样地走进帐来，都看着帅案后的戚继光，就等他一声令下，便一拥而上，替戚继光教训一顿王氏。

戚继光看王氏进来后，在帐中一站，不由得一脸肃然。他从帅案后一拍桌案就站了起来，左手一握肋下的宝剑，右手夸张地往空中一挥。

很多人看他这个姿势，以为他要先把王氏痛斥一番，然后再要让大家一起动手。所有的兄弟都不由得跟着挺了挺胸脯，握了握宝剑，就等着戚继光发号施令了。

哪知气宇轩昂的戚继光指着帐中几十个铠甲鲜明的兄弟气宇轩昂地说了一句话："特来请夫人阅兵！"

王氏也不客气，把这些攥着刀、握着剑的男人们一个个打量了一番后，没说一句话，鼻子里只哼了一声，然后扬长而去。

还有一次，兄弟们又给饱受折磨的戚继光出了个馊主意。他们说："你可以趁王氏午睡时，拿着刀突然冲进去，然后趁她刚睡醒，神智还模糊的时候，拿刀架在她的脖子上，这样她肯定很害怕。她只要害怕了，以后就不敢欺负你了。"

戚继光听了之后，觉得这个办法也可以试一试。

于是，有一天中午，就在王氏午睡时，戚继光真的抽了把马刀就冲了进去。戚继光一边挥舞着马刀，一边喊了两声给自己壮胆。当冲到王氏的门前时，戚继光突然听到屋里一声怒吼："你要死啊，大中午的喊什么！"

戚继光站在门前一抬头，只见王氏正坐在床上怒目圆睁地看着他。这一下戚继光立刻傻眼了，他看着发威的王氏，犹豫了一下后说："我想杀只鸡来给夫人补一补！"

王氏听了之后，只说了一句："以后杀鸡动静小点儿！"便倒头就睡。于是，戚继光就拎着他的马刀去杀鸡了。

第七节　戚继光凄凉的晚年

万历十年(1582年)，身居内阁首辅的张居正病故。反对派群起攻击张居正，戚继光因深得张居正的赏识，被诬陷为张居正的同党。甚至连戚继光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也到处散布流言，企图取代戚继光的地位。对戚继光早已心怀不满的给事中张鼎思，借机上疏说戚继光闽浙抗倭有功，请求把他调往南方，以达到一架空戚继光的目的。这时，蓟门边境已平静多年，朝廷认为戚继光可有可无，于是便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二月把戚继光调任广东镇守，都督南粤诸军事。

与此同时，戚继光的弟弟戚继美也被罢免了贵州总兵的官职，戚继光的老部下浙江总兵官胡守仁也受到弹劾，被革职。这一切都给戚继光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打击。尽管他怛怛不快，依然服从了朝廷的命令，起程去了广东。

当时的广东倭寇已平，并无战事。戚继光到任后，唯一的职责便是整饬身边的士兵。他不顾年老虚弱的身体，亲自巡视了广东沿海惠州、潮州、肇州、庆州等地的防务。在整饬兵备的同时，戚继光重新校补刊印《纪效新书》，并对《止止堂集》进行了再整理。如此宽松的环境，如此安逸的生活，对驰骋疆场的一代名帅来说，充满了空虚和无奈。

万历十三年(1585年)十月，戚继光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蓬莱。在回乡途中，其弟戚继美因受他牵连而致死。这一噩耗对于戚继光来说，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原配夫人王氏因为他娶妾之事同他反目，使离职回家的戚继光心里也得不到安宁。

退居林下的闲适生活让戚继光无所事事，他只好用修立家庙、延师教子、整理公文函牍、捐款助修蓬莱阁等事情，排遣晚年的寂寞。

万历十五年(1587年)冬，河南道御史傅光宅上疏朝廷，建议再度起用戚继光，结果不仅遭到朝中当权派的严厉拒绝，连傅光宅本人也因此受到了夺俸的处分。

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初七(1588年1月4日)，戚继光突然病发，第二天便病

逝。戚继光这位身为特进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督的一品高官，死后朝廷竟杳无声息。直到两年后，其长子戚祚国到京师请求恤典，朝廷才下诏祭葬。万历末年，明朝廷谥以“武庄”，天启年间改谥“武毅”，崇祯八年(1635年)在蓬莱建表功祠，春秋祭祀。

第八节 戚家军的最后鏖战

戚继光离开人世之后，为明帝国留下了用毕生精力操练的军队和练兵的纪要。无论是从东南抗倭时就跟随他，还是镇守蓟北边防时跟随他的一批军官，后来都成了万历年间明军的栋梁。他训练过的军队更是如此，在万历三大征中，都是在相持不下，或者明军连败的颓势中，只要浙兵一到，战场形势就立刻改观，浙兵也往往是第一个直捣敌人巢穴的部队。南兵或者浙兵是史书上对民间戚家军的称呼。

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明王朝抗日援朝战争中，原浙江兵为主的老戚家军和被戚继光整训过的蓟辽军，成了这场战争中明军的主力。攻克牡丹峰，收复平壤，都是浙兵第一个攻上日军阵地。攻打平壤时，年过花甲的戚家军老将吴惟忠左肋中弹，血透衣甲依然站在最前沿指挥。倭寇时代就对戚家军胆寒的日军，在平壤大战中更是被吓破了胆。收复汉城时，浙兵先头部队千余人马刚到汉城城下，数万日军竟紧闭城门不敢出战。朝鲜的史书上处处可见对浙兵的赞誉。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女真酋长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在抚顺边将李永芳的协助下连克抚顺、清河等城，歼灭进剿的辽东总兵张承荫部，明廷举朝震动。万历帝征调全国的精锐部队和身经百战的总兵赶赴辽东，打算直捣努尔哈赤的老巢赫图阿拉，毕其功于一役。调集的部队总兵大多是参加过援朝战争的将领，这次进剿的统帅是已经退休的文官出身的杨镐。

10万明军兵分四路，杜松率领主力3万人马从东路进兵主攻，李如柏南路吸引敌人主力，马林从北路侧击，川军老将刘绥从东路攻敌侧后，刘绥率领的这支军队是战斗力最弱的。杨镐连续催促刘绥进兵，刘绥毅然率领这队弱旅提前进兵，在这支部队里先到达的一部分浙兵成了主力先锋。

努尔哈赤正确判断出了明军的主攻方向，集中兵力发扬后金军骑兵机动

的特长和连续作战的能力，先在萨尔浒歼灭了明军主力杜松部，后在尚崖间歼灭了马林所率的北路明军，明军的正规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此时南路的李如柏离赫图阿拉最近，李家在辽东驻守两代，对辽东地形最为熟悉，可是李如柏却进兵缓慢，努尔哈赤看出了他的怯战，完全不理会他，回师向东全力对付东路刘綎部。

刘綎军一路上没有遇到强敌，作为前锋的浙兵连拔营寨据点、开路搭桥，逼近赫图阿拉，此时刘綎对杜松、马林两路的败亡完全不知情。在努尔哈赤利用杜松投降亲兵和缴获的号炮的引导下，刘綎进入了地形狭窄阿布达里岗，熟知明军的努尔哈赤知道这支军队里最强的浙兵善于摆鸳鸯阵队形，一旦结阵就会给对手造成大的伤亡，于是他令后金军在这个只能单人单马走的山路上伏击明军。迎面而来假扮成杜松部明军的后金军，让作为前锋的浙兵放松了警惕，狭窄的地形又无法施展鸳鸯阵，最终该部浙兵经过奋战与他们的主帅刘綎全部战死。

萨尔浒一战后，开原、铁岭也相继失守。明军精锐尽失转为守势。任辽东经略熊廷弼，以筑堡、军屯的坚守战略抑制了后金军的攻势，但天启帝即位后，便以其不进兵收复失地为由，罢免了熊廷弼，接替他的是不懂兵法的文官袁应泰。袁应泰打算在此征调 10 万大军进剿，各方准备还没有眉目，后金就先发制人进攻沈阳，拉开了明清辽沈战役的大幕。八旗军直扑辽东重镇沈阳，沈阳城高池深，粮秣军器充足，如果坚守至少能到坚持到辽阳援军的到来。

此时，川浙军团已经在赶赴沈阳增援了，部队的主帅是年近七旬的老将陈策。川兵中最强悍的是女将秦良玉的石柱白杆兵，白杆兵此时由秦良玉的哥哥秦邦屏和弟弟秦民屏率领，浙兵的带队指挥官是副将戚金。

川浙军团仅用一天的时间就赶到了离沈阳城不远的浑河边，但还是来晚了。沈阳仅仅守了一天便被攻破。沈阳守将何世贤、尤世忠不顾敌情，出城与敌接战，中了后金军的埋伏，双双战死。新任的辽东经略袁应泰收留的上万蒙古饥民成了后金军的内应，斩关落桥让后金军攻入沈阳。

川浙军在浑河南岸停了下来，几位将领研究下一步的行动。在军事会议上，陈策、童仲揆两位总兵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最终却作出了主动进攻的部署。于是，这支不足万人的队伍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周敦吉、秦民屏率领 3000 余人从浑河浮桥过河，在河北岸扎营迎敌；部队主力则在南岸结阵驻扎，戚金指挥士兵迅速摆开明军著名的车阵。

随后，白杆川兵向沈阳城下的后金军展开了迎面冲锋，努尔哈赤立刻派出了凶悍的正白旗部迎战。两军一接触，后金的骑兵就被白杆川兵的长枪戳的人仰马翻，很快正白旗就败下阵来。努尔哈赤立刻又派出了他亲自统领的正黄旗，但很快又遭到了同样的败绩，两轮攻击竟使后金军伤亡了2000多人。正当努尔哈赤一筹莫展时，李永芳用重金收买的几名被俘的沈阳城明军的炮手向白杆兵的阵地发射了炮弹，后金军队一拥而上，终于冲垮了这只勇猛的川兵，川兵将领周敦吉、秦民屏战死，只有少数人冲过了浮桥回到了浙兵的浑河南岸大营。

浑河南岸，浙兵车阵已经构筑完成。车阵是戚继光、俞大猷在北方防御蒙古鞑靼时期，摸索出的一套用步兵尤其是火器步兵对付骑兵的行之有效的战法，战车在行军时可以装载粮草、兵械、军火，驻扎时可围起做营寨，防御时车围成环形防御阵地，将火炮架在车上，同时士兵以车为掩体，释放火铳火炮，在与蒙古和日本作战时，车阵都发挥过重大作用。此时，明军摆开车阵，沉着应战。

后金军渡过浑河，从四面围了上来，并很快先以四旗的兵力从左翼发起进攻。当后金骑兵冲击到300步时，明军浙兵的大口径佛郎机火炮首先开火，一个排炮齐射轰乱了后金军的进攻队形；冲击到200步时，车阵内弓弩齐发；后金军冲击到100步内时，正是明军轻火器的火力范围，明军的火铳、火箭、小口径虎蹲炮以及其他火器齐射，后金兵纷纷落马；对于突破火力网冲击到了车阵前的后金军骑兵，手持戚家军特种兵器——铁狼筅的明军士兵立即将其刺倒。两轮进攻之后，后金兵坠马伤亡者达3000多人。努尔哈赤立刻变阵，将攻城用的防御火器和箭矢的武器——楯车推了出来，后金兵改骑兵为步兵猫着腰跟在楯车后面，进到200步内，明军车阵突然闪开一角，用拉车的挽马组成的骑兵队冲了出来，又将后金的步兵一顿砍杀。努尔哈赤下了死命令让后金军轮番攻击明军，后金军队的这种死攻收到了效果，明军弹尽矢绝，车阵终于被打破。

车阵被突破之后，浙兵立刻以哨为单位组成鸳鸯阵，与后金军展开惨烈的肉搏，每个队形中狼筅手、藤牌手、刀手相互掩护配合与敌鏖战，特别是浙兵使用由凶猛的日本刀改进而来的戚家刀，挥舞之处后金兵血肉横飞，但终因寡不敌众，浙兵不断地倒下，总兵陈策斩杀了十几个敌人后，也倒在了血泊里。总兵童仲揆和戚金率军战至傍晚，仅存的几十名浙兵战士将戚金、童仲揆围在当

中，他们的鸳鸯阵式依然不乱。后金兵四面围定，万箭齐发，将戚金、童仲揆以及几十名浙兵战士全部射死。

川浙军团在牺牲近万人的同时，也使后军付出了伤亡上万人的代价。只有极少数先期突围和辽阳留守的浙兵幸存了下来，明廷派员来抚慰劳军，问他们有什么需要和封赏，这些浙兵竟然流着泪说，不要赏赐，请求把他们编入其他部队，他们要给戚金等主将报仇。在之后的辽阳之战中，这些战士亦全部战死。

自此，戚家军连同他们鸳鸯阵、狼筅等，全都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第十一章　枭雄李自成

第一节　李自成起义

李自成于明万历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1606 年 9 月 22 日）出生在陕西延安府米脂县李继迁寨。这里东距县城约 100 千米，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荒僻的小山村，住的都是当地特有的土舍或者窑洞。

李自成出生时名叫李鸿基，世代务农。其父名叫李守忠，母亲吕氏朴实勤劳。他们家在其祖父的时候生活还过得去，到了父亲时便家道日贫。李自成 8 岁时入学，但为生计所迫，曾一度出家为僧。在他 13 岁时，母亲去世，家境更加穷困，李自成甚至当起了同村姬氏的牧羊奴。

李自成曾与他的侄儿李锦、同庚刘国能向罗教师学习武术，练得一手骑马射箭、单刀冲杀的好本领。李自成力大无穷，能一只手挺举三四十千克的铁炉绕殿一周。李自成 20 岁时，因父亲病故，无法糊口，常常挨饿，只得应募到米脂西解川驿站充当驿卒。他体格强壮，性格刚毅，勇猛有胆略，待人忠厚，爱打抱不平，颇为众驿卒所敬重。

崇祯三年（1630 年）春天，陕北遭遇了特大灾荒，朝廷在此时下令裁撤驿站冗员。李自成被裁，顿时失去了生活来源。其妻与一名县役私通，李自成一怒之下杀死了两人，他很快被捕，被带刑枷当街在烈日下示众，预备处死。众驿卒见他受难，立时聚集捣毁刑具而将他救走，然后共同推举他为首领。于是他将驿卒、饥民组成了起义队伍，投奔了西川的义军首领张存孟。此年四月，张存孟率军不幸于米脂兵败，并在绥德被杀。李自成便召集残部东渡黄河，成了山西 36 营中的一营。

崇祯五年（1632 年）五月十二日，李自成率军攻克了辽州（今左权）。崇祯六年十一月，他率军南下，自毛家寨飞渡黄河，攻破了河南渑池，与李锦、顾君恩的部众结为一军后，实力进一步壮大。崇祯七年（1634）春，李自成与李锦、

顾君恩等人率义军在陕西兴安的车厢峡，运用诈降计出奇兵击败了统率明廷精锐的延绥巡抚陈奇瑜。

崇祯八年(1635年)一月，13家72营义军将领在河南荥阳召开大聚会，讨论了此后义军的共同战略动向。在此次大会上，李自成提出了“分兵定所向”的策略，得到了与会者一致赞同。会后，李自成随着高迎祥的部众开进了安徽凤阳地区。不久，又经河南回师入陕，激战于宁州、真宁，攻克咸阳。

崇祯九年(1636年)秋，高迎祥在黑水峪遭敌伏击牺牲，李自成就被拥戴为新首领。

崇祯十年(1637年)夏天，李自成与明军悍将孙传庭激战七昼夜，最终向秦州(今甘肃天水)退却。在遭敌东西夹击的情形下，李自成带部众冲出重围，长驱入川，一路攻克了30多个州县，不到20天便兵临成都城下。在明朝大军的追赶下，李自成又挥师北上。

崇祯十一年(1638年)一月，李自成在川北遭到了明军的伏击，伤亡极大，李自成突围西走。此时的农民军，有的被招安，有的遁形隐迹，只有李自成仍然高举义旗，准备打出潼关，东进河南。十月，他亲率大军向东挺进，在潼关南原又一次陷入了明军的包围圈。经过几昼夜的血战，数万义军牺牲，他仅以18骑杀出重围，逃往了川陕楚的交界，从此遁迹在商洛山区。

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李自成获悉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之后，连忙召集数千人前往支援张献忠在罗喉山对明军的作战。第二年九月，李自成被围在四川鱼腹山，经过部下殊死战斗，终于突破封锁，穿越湖北进入河南，与河南农民军会合，打出了新局面。几个月内，他的队伍从五千余人发展到了十几万人。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一月，李自成率军攻破了洛阳，处决了福王朱常洵，并抄获了王府和富室，数万石存粮和数十万金银均分给了百姓。这时李自成的队伍迅速发展到了100多万人。二月，李自成以50万兵力一围开封，疾走三昼夜后，与明军相持七天。李自成在亲临前线指挥时，不幸为流箭射中左眼，由于明军援兵将至，他只得暂时撤退。七月，李自成与罗汝才联军，先后进行了项城、襄城、朱仙镇、家头寨、汝宁战役，攻克14个州县，歼灭明军40余万。十二月，李自成再围开封，激战20余天，因明军偷袭其粮草地，便舍弃开封南下。

第二年五月，李自成以百万大军三围开封，他采取围城打援的战略方针，列营数十座，将开封团团围住，明政府的40万援军在他的凌厉攻势下四散逃

亡。明军将领黄澍、严云京、高名衡在朱家寨扒开黄河大堤，致使古城被淹没，37万居民仅幸存3万余人。崇祯十五年(1642年)年底，李自成占领荆襄，提出了“三年不征，一人不杀”的口号。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建立大顺国，改西安为西京，年号“永昌”，完善机构，开科取士，免除贫民赋税，勒令官僚、地主助饷，安置流民，奖励垦荒，铸永昌钱，造《甲申历》。

同年的二月，李自成率大军由龙门飞渡山西，先后攻破了蒲州、汾阳、太原、忻州、代州，接受明大同、宣府、居庸关守军投降。沿途将士严格执行“马腾入田者斩”的命令，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三月十六日，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此日开始与刘宗敏会师攻城激战。十八日下午，太监曹化淳开门投降，半夜时军队攻入内城，崇祯帝在煤山(今景山)自缢。十九日上午，李自成率大军由德胜门进入皇宫，沿途百姓焚香结彩，夹道欢迎。

大顺军进京之后，关外的吴三桂拒绝投降。崇祯十七年四月，李自成率军东征，在山海关一片石意外遭到了吴三桂与清军的联合夹攻，大败而归。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仓皇登基，三十日便撤离了北京，经固关入晋返回陕西。

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潼关陷落，李自成放弃西安，经蓝田、商州、武关入襄阳。不久，李自成又放弃襄阳、武昌南下，五月初时退到了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区。而十几天后，当大顺军再次离开九宫山区继续转移时，队伍里从此再无李自成的身影。

第二节　李自成带给北京的灾难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占据了北京以后，给北京带来了“五大灾难”。

农民起义军带给北京的第一大灾难是寒了天下人的归附之心。首先，起义军焚烧明朝的太庙。《明史》对于崇祯皇帝的丧礼记载道：“自成命以宫扉载出，盛柳棺，置东华门外，百姓过者皆掩泣。越三日己酉，味爽……”意思是，用门板抬、用柳棺装，在东华门外一停，三天就臭了。跟“抛尸”差不多。

农民起义军带给北京的第二大灾难是在北京大搞白色恐怖。起义军刚进北京一个星期，便开始大面积地抓人、抄家、敲诈、劫掠，明朝旧臣变成了“唐僧肉”。规定：“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

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掏不出那么多银子，就往死里折磨。被迫害致死者有1600余人。明朝旧臣根本没有机会在大顺朝廷安身立命，他们绝大多数沦为被镇压的对象。八百多名明朝官员，被押进刘宗敏的军营，即使是被勒索了钱财，也活不了。

农民起义军带给北京的第三大灾难是对无辜百姓下手。他们趁火打劫，还令京城的百姓五家养一个起义军，给百姓带来了较大的负担。

农民起义军带给北京的第四大灾难是其荒淫贪腐比朱明朝廷还严重。包括李自成在内，首先寻找女人。尽管有原配高夫人，李自成还是希望纳妾，刚入驻紫禁城，就安排这件事。宫女窦氏成为他的妃子。农民军进了紫禁城后，宫女魏氏投河，从者200余人。崇祯皇帝16岁的女儿长平公主已经被父亲砍掉左臂，可惜没死成，苏醒之后，便落到刘宗敏手里。李自成撤离北京前，还命一支庞大的骡车队将黄金白银运往西安。每饼千金，约数万饼。

农民起义军带给北京的第五大灾难是焚烧宫殿，毁弃城市。1644年4月29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仓皇即位。接着，起义军在撤离北京时焚毁宫殿及九门城楼。

第三节　李自成归宿悬案

几百年来，关于李自成的最终归宿，各种记载和传说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其中，只有两种说法所据史料较为翔实，且影响较大，即湖南石门夹山逃禅为僧说和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遇害说。

李自成逃禅石门夹山一说，流传极广。湖南的石门县古称澧阳，又称澧州。据澧州知州何璘的《李自成传》记载，李自成兵败之后，逃到石门县的夹山寺为僧，法名奉天玉和尚。夹山寺位于石门县东15千米处的三板桥，是一座唐代古刹。寺内遗有与此说相关的一些碑记塔铭、诗文残板，以及奉天玉和尚的骨片和包括宫廷玉器在内的许多遗物。这些无疑构成了此说的有力佐证。



李自成

《李自成传》的作者何璘曾到夹山寺进行考察，见到了一位服侍过奉天玉和尚的、口音像陕西人的 70 岁老和尚。他告诉何璘，奉天玉和尚是顺治初年来到寺里的，并取出其画像。据说画上人酷似史书所记的李自成的模样。而奉天玉和尚墓葬中发现的骨灰和砖刻《塔铭》，以及其弟子野拂所撰碑文，都与何璘之文相印证。据持此说法的人推测，“野拂”就是李过，李过就是李自成的亲侄儿李锦，由此可证，被野拂精心侍奉的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

人们还在夹山寺里发现了记述奉天玉和尚的《重修夹山灵泉禅院功德碑》（康熙碑）和《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坛》（道光碑）及咏梅残版和野拂撰文残碑、野拂墓碑、闯王令牌、临澧蒋家传世文物、六枚“永昌通宝”铜币、七个“西安王”铜马铃，在夹山寺地道地宫密室里还发现了石雕龟形敕印。敕只有君王才能使用，一般人是不能私藏此物的。敕印与奉天玉诏更进一步证实了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的事实。

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遇害一说，出自负责追击李自成的清军统帅阿济格向多尔衮的报告。

阿济格在报告上说，大顺军在九江地区失利后，尽力穷窜入九宫山。他们在山中到处搜寻，也没有找到李自成。降卒和被擒的大顺军士兵都说李自成逃走时被村民围困，不能逃脱，自缢而死。于是找了认识李自成的人去认尸，但是尸体腐烂，无法辨认。李自成是死是活，还得继续察访。

可是，就在阿济格班师回朝途中，得到了大顺军重现江西的情报。由于阿济格并没有取得李自成的首级为验，多尔衮因此开始怀疑李自成的死讯不可靠。顺治二年（1645 年）七月二十日，多尔衮派人对即将进京的阿济格大加呵责。

李自成的死讯在南明的隆武朝廷里也激起了波澜。何腾蛟关于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团练之手的消息直接来自跟随李自成的许多大顺军将领，其中甚至包括李自成牺牲时在其身旁的养子张鼐，应当说是相当可靠的。但由于何腾蛟也没有献上李自成的首级，隆武朝廷内部表示怀疑的便大有人在。

这样，明、清双方虽然分别得到了李自成牺牲的准确消息，却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怀疑。其原因就在于谁也没有找到李自成的遗体，所以不敢十分确定。

关于李自成失败后的最终归宿，至今真相难明，虽然以上两种说法各执一词，各有依据。但诸多的记载与传说，还有待于人们进一步去发现。

第四节　李自成失败的真正原因

李自成失败的真正原因一直是个谜。百余年来，专家们对此的解释众说纷纭，有说是败于不得人心的，有说是败于骄傲自满的，有说是败于腐化堕落的，有说是败于红颜祸水的，等等，都不能令人信服。因为这些答案都不能解释一个问题：占领北京时，李自成的军队有100多万，为何进京40天后部队突然间失去了战斗力——遇清军一触即溃，兵败如山倒，而且从此一蹶不振？

是这支部队的军纪涣散吗？非也。李自成治军有方，义军的组织性很强。是这支庞大的军队的物质力量跟不上吗？非也。李自成大军在北京通过肃贪追赃搞到了7000万两银子，相当于明朝的十年税收，至少可以在几年里实施"迎闯王不纳粮"而更深得民心，他有足够的财力可支撑他庞大的军队。

这就奇怪了，军费奇缺时李自成尚且能屡败屡战组织起百万大军，财大气粗后为何反而失去战斗力？为何撤出北京后再未组织起一次像样的战斗？不屈不挠是李自成的显著特点，在以前的几次战役中，他都是几乎全军覆没，一次只剩下18个人，一次只剩下50多人，可李自成硬是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竟一次次卷土重来，最后拥兵百万打进北京灭了大明王朝。那么，进京后，是什么让李自成的元气丧尽？原来李自成并非败于清朝，而是败于当时肆虐横行的鼠疫。

李自成进京前后，北京周边地区流行鼠疫。鼠疫是一种烈性传染病，致病源为鼠疫杆菌。主要传播于人一跳蚤一鼠之间。其特征是淋巴结肿大，死者肤色发黑。研究表明，鼠疫每次传到一个新地区时，由于当地人和鼠以及跳蚤都没有抵抗力，其死亡率高、传染性强，死亡率高于50%。可见，鼠疫是一种极易流行的、死亡率很高的且很难控制的可怕疾病。

李自成军于农历三月进抵北京（公历为四月），有关文献记载，崇祯十六年秋鼠疫已出现在北京一带，只因冬天气温低，鼠疫传播变缓。到了三月，春暖花开，桃红杏白，跳蚤、老鼠开始趋向活跃，大规模的鼠疫自然爆发。由于鼠疫的传染死亡率很高，崇祯皇帝的御林军在短时间内失去了战斗力，李自成因此未经大战就占领了北京。李自成大军进京后感染了鼠疫，战斗力大减，当然敌不过清兵。并且败兵因此成了鼠疫传染源。因此李自成虽然此时财雄天下，

可以大规模招兵买马，但新兵入伍即染鼠疫，失去战斗力，兵力再多也没用，始终无法抵挡清朝的虎狼之师。军营蔓延鼠疫且长时间无法摆脱，李自成的精神遭受毁灭性打击，因此痛失江山并一蹶不振。

李自成的百万大军在肆虐的鼠疫面前，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

那么，为什么清兵就没患鼠疫呢？欧洲人在研究14世纪欧洲鼠疫时从留下的壁画及文字中发现，在鼠疫大流行时只有骑兵幸免于鼠疫。于是得出结论：鼠疫经跳蚤传播，跳蚤讨厌马味，所以骑兵不被鼠疫传染！清兵主要由骑兵组成，所以是不会传染上鼠疫的。尽管只有十几万军队，但未患鼠疫的清军战斗力自然在深受鼠疫困扰的李自成大军之上。

鼠疫是当时中国人不了解的新型烈性传染病，无法救治，在这种自然条件下，明朝灭亡和李自成的失败不可避免。在汉满的军事博弈中，鼠疫帮了清朝的大忙。李自成的百万大军就这样土崩瓦解于一场瘟疫。

第五节　寻找李自成宝藏

天门山，位于湘西张家界市南郊8千米处，是张家界市的一道天然壁画。

关于天门山，有一个传说：明末，李自成带领农民义军大败明军，攻陷京城后，占领了皇宫，掠夺了大量的宫廷珍宝，后来李自成败退出京时，将国库金银财宝席卷一空，派手下大将李过将这些金银珍宝藏了起来，意图日后东山再起。于是李过削发为僧，法号野拂，带着一百多名徒弟，将财宝装进木箱后装运上船，沿澧水而上。几天过后，船队到了古镇溪口境内，野拂命船公将船停在五狮寨下的平坦村岸边。

下船后，野拂站在平坦的岸边仰望五狮寨，五个山头像五只伏在河边的狮子，气势雄伟，显的生龙活虎。山上有一座五狮寨庵，整日香烟缭绕，他觉得此处可安息养年，可自耕自足，还可以操练兵马，便决定暂住此地，等待李自成举事的号令。

后来，野拂觉得庵太小，便向庵主静安师太吐露出自己的心愿。静安师太便写了一封推举信给天门山寺的方丈，叫野拂带上信去投奔。过了几天，野拂的船队驶到永定境内，停到岸边，带上举荐信来到天门寺。法圆方丈见到静安师太的亲笔信后，就收留了他。因野拂带来的徒弟众多，天门寺专门为他们新

修了宅院。

随着形势急转直下，农民义军最终土崩瓦解，清廷建立，野拂于清顺治十七年(1661年)去世，葬于慈利县高峰茅庵。那几大船金银珠宝，自野拂死后，再无下落。据说野拂临死前，将带来的财宝全部分散秘藏于天门山中几个秘密去处，并用毒酒将藏宝人全部毒死，只是这种说法无从考证。

距天门寺不远的莽山地区，也流传着闯王宝藏的传说。

湖南南部边陲莽山脚下的天塘村，是一个古老村落。几百年来，一直口口相传着一句充满玄机的秘诀："石岩冲，三座桥，慢行百步走，三窑金"。据说，只要能破解这句秘诀中所藏的玄机，就能得到一笔巨额的财富。而这笔财富就是李自成兵败后，带到莽山的"九驴十八担"金银珠宝。

从古至今，这句神秘的口诀引诱着无数人前来寻宝。当地的村民找到了一个名叫"皇藏岩"的山洞，这个岩洞的洞口非常隐蔽，洞内怪石嶙峋，青烟缭绕，寒气逼人，在洞口的一个平台处，留有一层防潮的三合土沙层。很显然，这里曾经有人活动过。但经过仔细发掘后，结果只发现了一些铜钱，没有所谓的宝藏。

在与莽山相距近40千米外的白沙圩乡，村民们找到了一块刻有"李闯王之墓"的石碑。石碑高约80厘米，宽30厘米，厚约17厘米，碑文为阴刻。

人们还在路边的山坡边上发现了一堵人工垒砌的石墙，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一般老百姓不会建这样的工程，因为它长100多米，宽10多米，有三层。经过考证，在距离这堵石墙不到1000米的地方，原本有一个名叫溶家洞的巨大山洞。溶家洞在莽山的背面，岩洞里面有一个水洞和一个旱洞，据说可以藏一万多人。当地一直相传，被清军连续追杀的李自成就曾躲进此洞中。但后来由于山体遭受雷击，溶家洞的洞口被掩埋了。

为了探寻李自成的巨额宝藏，很多人曾经先后到溶家洞里进行发掘，但至今仍没有人找到传说中的宝藏。

李自成的宝藏究竟藏于何处？何时才能揭开这个历史之谜呢？有待人们去继续考证。

第十二章　王朝末日之象

第一节　万历皇帝丧国

明神宗万历皇帝十岁登基，自从万历十四年（1586 年）起，明神宗就没有踏出皇宫一步。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岁月，是在后宫度过的。明神宗直到去世，不理朝政达 32 年。

明神宗的最大乐趣是泡在后宫的脂粉堆中醉生梦死，他平生最厌恶的就是文官们自以为是的面孔，不愿意让那些枯燥的奏折搅扰了自己的软梦。甚至内阁首辅，也很难见到皇帝本人。

大臣们的奏章大多被万历皇帝“留中”，不做任何处理。甚至部院主管大臣之类的任命，万历也不过问。在他看来，那些品级不同的官服穿在谁的身上都是一样的，与自己无关。按照明朝的官制，上述职位在没有得到皇帝钦命的情况下只能空缺，于是，政府中的许多重要职务长期空缺。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大学士沈鲤向万历皇帝诉苦，吏部尚书已缺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刑部、工部只有一位侍郎兼理，兵部则尚书、侍郎全缺，礼部仅存一位侍郎，户部也只有一位尚书。总计部院堂上官 31 位，竟缺 24 位，如果除去那些不守职责的官员，朝中几乎已经无人理政。朝政到了如此地步，万历皇帝依然无动于衷。万历帝甚至把庄严的庙祀等繁文缛节一律交由官员代行。

大明帝国的政治机器在空转。对此，万历皇帝已经习以为常。万历无心也无力收拾这种复杂的残局。他选择的策略就是回避。除了渔色，他的最大兴趣就是赚钱，为子孙，尤其是他最宠爱的福王谋些产业，使他们在自己死后高枕无忧。但事与愿违，他的所有努力造成的结果却是将整个王朝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宣布即汗位，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率领 2 万步骑

征讨大明王朝，临行前写下《七大恨》作为讨明宣言，焚香告天。誓师完毕，努尔哈赤将他的八旗铁骑分成两路，向明王朝发起进攻。左翼四旗攻东州、马根单；努尔哈赤亲率右翼四旗，进攻辽东重镇抚顺城。

即使努尔哈赤在中国东北部的迅速崛起，也无法改变万历皇帝的固执。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万历皇帝依然态度冷漠。边地的烽火无法燃起他的激情，他沉溺于炼制长生不老药之中。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九月，在吏部尚书赵焕的号召下，朝廷百官一起跪在文华殿门前，乞求万历皇帝视朝议政。这是一次来自百官的请愿行动，官僚们以这种决绝的方式表达了对万历皇帝的抗议。抗议行动持续了一天。一整天，万历皇帝都没有任何指示，这使抗议的官员们陷入两难：他们既不能自己站起身来就此结束抗议，也难以坚持下去。在与皇帝的较量中，百官们永远不可能占到便宜。万历皇帝看时机差不多了，就命太监跑到文华门宣旨，请所有官员回府。至于上朝一事，万历皇帝的答复只有两个字：免谈。

失望之极的赵焕在奏章中质问万历皇帝：如果有朝一日蓟门遭蹂躏，铁骑踏京郊，陛下是否还能在深宫内高枕无忧呢？

固执的万历皇帝不可能因官僚们的施压而改变自己的立场，相反，他因此对百官们更加痛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在御宇48年之后，万历皇帝平静地去世了。他被安葬在其亲自参与设计的定陵里，安放在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的棺椁之间。在万历手中颓败不堪的大明王朝，即使出现崇祯皇帝这样励精图治的君主，也依然无力回天。24年后，大明王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在煤山寿皇亭自缢身亡，大明帝国最终被清帝国取代。

第二节　魏忠贤：帝国的代理人

太监魏四从其22岁那年入宫倒马桶开始，已经在紫禁城幽深的高墙内耗掉了整整30个年头。在这漫长的30年里，他悄无声息地存在着。倒马桶的闲暇被魏四全部用来喝酒和赌博。他在宫里混了10多年后才混上了一个伙食管理员的工作。

《玉镜新谭》是一本记录明天启朝阉党罪恶的史书，作者朱长祚在叙及魏四早年的为人时，说魏四其实是一个忠厚之人。

见多了大太监们的翻云覆雨，自以为积累够了经验的魏四跃跃欲试。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从小喜爱赌博的魏四，在宫廷政治斗争的赌桌上，押下了他入宫30年以来的第一笔赌注。

魏四能够获得赌客的资格，纯属偶然。

魏四负责的是当时的皇太子朱常洛的一位妃子王才人的伙食，这位王才人为太子朱常洛生下了一个儿子，而且还是长子。

万历皇帝不喜欢太子，甚至不想让他接受正常的教育，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自己和郑贵妃所生的他的第三个儿子福王朱常洵继位，只是碍于臣僚们的坚决抵制，为此他不惜和臣僚们闹了几十年的别扭。皇帝对太子的厌恶直接导致太子在宫廷中毫无地位，长年累月地战战兢兢小心度日。

郁郁寡欢的王才人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突然去世，魏四被调去服侍太子朱常洛的另一位妃子李选侍。李选侍是太子最喜欢的妃子，但这不足以改变魏四在宫廷中的地位。

1620年，事情出现了转机，在那一年夏天，万历皇帝驾崩了。

万历皇帝驾崩之后，太子朱常洛即位，史称光宗。这位新皇帝，此时已经39岁了。光宗经常一夜连幸数人，纵情声色的过度释放造就了他孱弱的体格。光宗在位仅仅一个月，竟驾崩了。随后，王才人的儿子朱由校即皇帝位。

自汉代以来，深宫高墙之内，太监与宫女们产生了一种畸形婚恋："对食"。宫女们不能出宫，但凡油盐、蔬菜乃至针线，都要依靠太监们采买，久而久之，宫女们就都有了各自固定的采买太监；值班的太监们不允许生火做饭，只有宫女有此权力，热乎乎的饭菜也促成了太监们需要和宫女结成固定关系。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一种畸形的婚姻关系。

魏四也有自己的"对食"，他的"对食"就是新皇帝朱由校的乳母客氏。

新皇帝朱由校已经16岁了，照理这个年纪早已用不着奶妈了。大臣们照惯例请求皇帝朱由校恩准客氏出宫安置。然而，客氏刚出宫，朱由校就开始茶饭不思，郁郁寡欢。大臣们在无奈之下，只好将客氏接回来侍奉新皇帝。

事实上，朱由校对魏四也始终怀着一种与对客氏类似的感情。

魏四曾经为朱由校的母亲王才人做过多年的伙食管理员。光宗满意于魏四的任劳任怨和小心翼翼，曾调他去服侍过年幼的朱由校很长一段时间。在那些枯燥的时间里，小朱由校经常坐在魏四宽阔的肩膀上，听他讲那些市井间的奇闻和乡俗里的鬼怪神祇；魏四歌曲弦索，弹棋蹴鞠无所不能，给备遭漠视、

生活苦闷的小朱由校带来了不少快乐。

在朱由校16年潦倒落魄的日子里，他的身边除了几个贴身的小婢女和小太监之外，就是乳母客氏和魏四了。

朱由校是在一种近乎放任自流的环境里长大的，没人过问他的教育，也没人过问他的日常起居。那些年宫廷内正好大兴土木，本应背诵圣贤书的朱由校，却整日在木料厂与木工们厮混。许多年后，做木工活竟成了他生命中唯一的乐趣。

在缺乏教育、自娱自乐中长大的朱由校，不可能对处理政务产生兴趣，也不可能具备处理政务的能力。作为一个半文盲，他听不懂大臣们口中文绉绉的词语。他希望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人能够帮助自己从这些麻烦中解脱出来。他选中了魏四。这一年，魏四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魏忠贤。

按照明王朝的制度，大臣们呈送给皇帝的奏章或票拟意见，以及皇帝发还的批示，都需要经过司礼监秉笔太监之手。爬上司礼监秉笔太监这个职位，意味着魏忠贤攀上了帝国权力的巅峰。

其实，魏忠贤是很愿意代替皇帝把朝政处理好的。当辽东战事吃紧，急需马匹支援时，魏忠贤甚至可以背叛自己的"阶级"。明王朝宫中旧制规定，资格老、地位高的宦官们，皇帝可以加恩，允许他们在宫中骑马；作为代价，这些宦官们每逢年关节庆须向皇帝进献一匹好马。魏忠贤一下子就代表皇帝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内骑马的特权，然后又代表皇帝不断地降旨让他们献马。尽管质量一般，国家最后还真得到了不少马匹。

万历怠政30余年，宫廷萧条，许多建筑长年失修，零落不堪，内金水河更是早已淤塞干涸，成了一连串的死水沟。魏忠贤掌权之后，立即组织人力进行全面整修，断壁残垣焕然一新，内金水河恢复了碧波荡漾；为了厉行节约，魏忠贤甚至还改革过宫廷内的一些生活制度，譬如取消后宫长街上多余的路灯。

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为了掩饰自己的无知，树立起一个决策者应有的权威，他曾经荒唐地处理过许多政务。

天启六年(1526年)，兵部想把武将董节从提调武官升为游击将军。提调武官和游击将军之间隔着一个都司佥书的官阶，魏忠贤以为其中必有隐情，抓住了外臣们的把柄，于是降旨诘责兵部。兵部解释说，都司佥书一职实缺素来很少，所以提调武官往往直接升任游击将军，这是实行了多年的惯例。魏忠贤这才明白，但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竟然硬把主管此事的兵部官员削籍为

民。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他还宣布此后武官升迁，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得越级升迁，把多年行之有效的制度废除了。

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掩饰自己的无知，魏忠贤连自己人也不放过。礼科给事中李恒茂本是魏忠贤的死党，有一次他在奏章里用了一句“曹尔桢整兵山东”，魏忠贤揪住这句话不放。因为前不久曹尔桢刚刚打通了魏忠贤的关节而升任山西巡抚，此事魏忠贤自然记得很清楚，李恒茂居然还在奏折里说“整兵山东”，显然让魏忠贤觉得这是对他权威的冒犯。

魏忠贤不过是想借此展示一下自己的精明，可李恒茂偏要再上折子去解释，说曹尔桢虽已升职，但既然还没赴任，兵部又确实曾有公文命令他“整兵山东”，自己的说法有凭有据，不能算错误。李恒茂的辩解让魏忠贤很窘迫，一怒之下便把李恒茂削籍为民。

朱由校即位的最初几年，是东林党人在朝廷内部最鼎盛的时期。这些年里，魏忠贤对东林党人没有敌意。魏忠贤很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大的权势，全都依靠朱由校对自己的信任，而朱由校能够顺利继承皇位，又多亏了东林党人几十年如一日的不懈保护。魏忠贤从这个角度很朴素地将东林党看成了同盟。

天启二年(1522年)，东林党巨擘赵南星升任左都御史，魏忠贤便主动派了自己的外甥傅应星带着礼物前去拜贺。令魏忠贤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外甥在赵府吃了个闭门羹。

有一点我们应该承认：在朱由校即位的前几年里，除了一些出于面子问题的恼羞成怒之外，魏忠贤并没有多少劣迹。然而，东林党对他的攻击却从他走上司礼监秉笔太监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停止过。

天启元年(1621年)，御史周宗建等人对魏忠贤的女人客氏发起总攻，试图把她逼出宫廷。

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御史江秉谦、周宗建等人弹劾大学士沈榷交通阉人，弄兵大内。周宗建等人的奏疏直接指斥魏忠贤“目不识一丁，心复不谙大义……”，这一次驱逐沈榷，东林党们已经摆明了自己和魏忠贤势不两立的态度。

同年十月，新科状元文震孟给皇帝上了一道《勤政讲学疏》，敦促皇帝切实负起应尽的责任，亲自执掌国政。折子里竟说朱由校只是一个全部兴趣都在木匠活上面的傀儡。盛怒之下的魏忠贤决定对这位新科状元廷杖八十，因为

大臣们的救护，最后外贬作罢。

天启三年(1623年)，御史周宗建等人再次上疏弹劾魏忠贤。周宗建说，明帝国现在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魏忠贤的罪恶和权势已经超越了前朝的汪直和刘瑾。对于这样的类比，魏忠贤反应相当强烈，他本想要对周宗建施以廷杖，但碍于大臣们的争执，最后仅仅潦草罚俸了事。

依照魏忠贤当时的权势，他完全有能力对文震孟、周宗建等人施以更残酷的惩罚，但他没有这么做，他仍然重视以东林党为主体的朝臣们的舆论压力。在他心里，对东林党的好感也许还没有完全消退。

直到天启四年(1624年)，东林党另一巨擘杨涟抛出了24条、条条足以将魏忠贤千刀万剐的罪状，魏忠贤才终于发觉：自己和东林党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共戴天。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魏忠贤不遗余力地打击东林党人。

魏忠贤的同党把反对派官僚开列名单，括入百余人，称为邪党，而将阉党60余人列为正人，以此作为黜陟的根据。

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首辅叶向高被迫辞去官职。此前，中官为了搜寻一个被缉拿的御史，闯入叶向高宅邸，鼓噪谩骂，这是历代首辅从未受过的大辱。十月，赵南星、高攀龙致仕，杨涟、左光斗被削籍投入狱中。

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熊廷弼弃市，传首九边。八、九月间，杨涟、魏大中、左光斗、顾大章等人相继死于狱中。

随着魏忠贤的地位不断提升，相当一部分官员出于各种原因向他靠拢，协助他控制局面，打击反对派，他们被称为魏党或阉党。天启五年(1625年)以后入阁的大臣，大多为魏忠贤的党徒。崇祯初年清查“阉党逆案”的结果，一共清查出首逆同谋6人，交结近侍19人，交结近侍次等11人，逆孽军犯35人，谄附拥戴军犯15人，交结近侍又次等128人，祠颂44人，共计258人，如果加上“漏网”57人，总计315人。可见“阉党”声势之大。

魏忠贤与东林党的斗争已超出朝廷的范围，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明熹宗朱由校病死，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即位，即崇祯皇帝。九月，崇祯帝把客氏赶出了皇宫。十月，弹劾魏忠贤和魏党的奏疏突然出现。十一月，魏忠贤被免去了一切职务，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守祖陵。魏忠贤行至途中时，接到了崇祯帝命锦衣卫擒拿他治罪的密报，竟在当夜上吊自杀了。

第三节　辽东经略熊廷弼之死

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人。万历二十五年(1497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他有胆略，知兵事并且善射。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熊廷弼升任御史巡按辽东。他针对辽东地广人稀、边防多事的现状，主张实行军屯，缮垣建堡，按劾将吏，于是军纪大振。但是，他的"修边筑堡、以守为战"的存辽大计与时任辽东经略的杨镐的观点不和，后被排挤，转岗督学南直隶。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之战爆发，辽东经略杨镐指挥的47万大军惨败。明王朝擢升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取代杨镐为辽东经略，从而使大明王朝辽东战局大为改观。

明末朝政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以原吏部郎中顾宪成为首，一批下野官吏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一部分在职官吏也遥相应合，东林党因此得名。与此同时，另有一批官吏士绅组成浙、齐、楚、宣、昆各党派。其中，以东林党人的势力最强大。

起初，只是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则发展成了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到了明熹宗天启年间，东林党人得势，浙、昆、宣各党派受到排斥。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与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部分人结成联盟，被东林党称为"阉党"。熊廷弼本为楚党，与东林党人非一路人。但是，当时的东林党杨涟等人曾在辽东军事等问题上为熊廷弼说过好话，熊廷弼同东林党中的一些人也有私交。这一切，为熊廷弼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熊廷弼重任辽东经略之后，阉党们不放心，强行给他配了一个叫王化贞的巡抚。熊廷弼虽为辽东经略，却无实质的兵权，而握有实权的巡抚王化贞却好大喜功，盲目冒进，与熊廷弼的"防守策略"大相径庭。

熊廷弼与王化贞之间是上下级关系，但王化贞自恃朝中有人，根本不把熊廷弼放在眼里。这一切，直接造成了广宁兵败，致使辽东尽失。

辽东尽失后，大明朝廷震怒，下令处置败军之将，最后的决议是判熊廷弼死罪。

熊廷弼为了保命，曾托一个名叫汪文言的人向魏忠贤行贿。魏忠贤向其索要四万两银子，但熊廷弼根本拿不出这笔钱，继而不再提行贿之事。于是，

受到了魏忠贤忌恨，他决定速斩熊廷弼。此时，正值“东林六君子”案发，杨涟等人被下狱。魏忠贤便指使人诬陷熊廷弼曾向杨涟行贿，将熊廷弼行贿之事与“东林党案”硬扯在一起。魏忠贤的党徒冯铨还趁着陪天启皇帝吃饭的时候，拿出一本民间流传的《辽东传》，上面有记载熊廷弼英武善谋的言辞。冯铨挑拨说：“这是熊廷弼写的，不过是想脱罪罢了。”惹得天启皇帝大怒。

熊廷弼之所以有此下场，也与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熊廷弼的脾气不好，遇事特别容易激动，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熹宗初立之时，有人弹劾熊廷弼无谋、欺君，也有人弹劾他经略辽东失职。熊廷弼对此的反应则是极为愤怒，并上疏极力为自己争辩，甚至公开将乌纱帽摔在地下。说到激动的时候，即使皇帝在场，也从不忌讳，但凡有人弹劾，他总是要抗辩上疏一番。因此，给满朝大臣留下了他根本听不进任何意见的深刻印象。万历皇帝在世，可以包容他，但天启皇帝不会包容他。

熊廷弼同王化贞之间的矛盾，虽然主要责任在王化贞。但熊廷弼也有责任，他反对王化贞的军事策略，又无法阻止，便上疏告状，话说得很难听，且不留余地。王化贞自然对他心存不满。到王化贞兵败时，两人相见，王化贞哭，熊廷弼却微笑着讥讽他，弄得王化贞无地自容。两人同被朝廷究责之时，熊廷弼依然态度不好。

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熊廷弼被处死。熊廷弼死后，因为朝廷追赃，其长子熊兆被逼自杀。直到崇祯二年(1629年)，熊廷弼案才得以昭雪。

第四节　洪承畴降清真相

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他出生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二十二日，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二十七都英山霞美乡(今英都镇良山村霞美)人。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23岁的洪承畴中了举人，次年殿试又得二甲第十四名，赐进士出身，正式进入官场。从万历到天启年间，洪承畴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默默无闻。崇祯皇帝即位后，洪承畴迅速崛起。

从崇祯元年(1628年)起，陕西爆发了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人的起义，上百支起义军此起彼伏，震惊朝野。天启七年(1627年)，洪承畴刚刚升陕西督道参议，来到此地。崇祯二年(1629年)，农民起义军进攻韩城，时任三边总督

的杨鹤因无将可调,便让洪承畴领兵出战。洪承畴大败起义军,解了韩城之围。之后,洪承畴被擢升为延绥巡抚,他在此任上的主要政绩是镇压了陕西的农民起义。因此,他继杨鹤之后升任总督。接着,他集中兵力全力清剿起义军,取得了"西澳大捷",扭转了明军颓势。崇祯七年(1634年),崇祯皇帝给洪承畴在三边总督基础上加封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军务,将关内的军事大权托付给他。洪承畴接连取得了镇压农民起义的胜利,俘杀高迎祥,多次打败李自成。李自成最后仅带18骑逃入陕南商洛山中。

至此,洪承畴成了明王朝的栋梁和崇祯皇帝的股肱之臣。当关外清军夺关南下,扫荡京师时,崇祯皇帝和大臣们首先想到的是调洪承畴来主持对清军作战。于是,洪承畴从陕西来到北方,任蓟辽总督,主持辽东军务,指挥帐下八位总兵官的13万精兵。

当时,明军和清军围绕山海关和锦州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清军一旦占领此地,就打开了进军北京的大门。崇祯十四年(1641年)年初,清军主力围攻锦州,锦州守将祖大寿告急,洪承畴率军迎战。决定明清命运的大会战在锦州城下爆发。

洪承畴的作战思路是稳扎稳打、缓慢逼近锦州。他的这一思路起初获得了崇祯皇帝的首肯,战争开始时明年也因为这一思路控制住了制高点,挫败了清军的主动进攻。在取得初步成绩后,好大喜功的崇祯皇帝下令洪承畴迅速进攻,寻找清军决战。甚至还派出监军到前线督促洪承畴速战速决。洪承畴迫不得已,只好督率大军大跨步前进。皇太极得到此消息之后,倾全国之力,绕开明军主力进攻明军的后方塔山,切断了明军的粮草供应。明军军心动摇,各部总兵官主张撤退,洪承畴和大家商定共同突围。不想,诸将去意已决,违犯军令争相撤军。先是大同总兵王朴连夜率部逃跑,接着马科、吴三桂二部跟着南逃。清军趁机追杀,十几万明军土崩瓦解,5万多人被杀,自相践踏而死和跳海而死的不计其数。这场主力会战以明军的惨败告终。

洪承畴率领万余残兵败将逃入松山城,被清军团团围住。此后半年,洪承畴组织了多次突围,但无一成功。而外线明王朝援军畏战,不敢救援。松山城守军弹尽粮绝,清军在明降将的配合下一举攻破松山城,洪承畴被俘。

大臣们都以为洪承畴必死无疑,崇祯皇帝极为悲痛,辍朝三日,以王侯规格祭祀洪承畴。但在祭祀时,传来了洪承畴降清的消息。明朝廷立即停止对

洪承畴的祭祀，改为讨伐鞭挞。

洪承畴的儒学根底深厚，明白纲常伦理，重视个人名节。被俘之初，洪承畴一言不发，对来劝降的人闭目不见，只求速死。比洪承畴早降清的汉人范文程抓住了他的心理。范文程来劝降的时候，丝毫不提招降之事，反而和洪承畴大谈诗书典籍。洪承畴久居兵戎，又身陷塞外，竟然听到中原掌故和儒家典籍，耳目一新，与范文程相谈甚欢。谈话间，房梁上落下来一块燕泥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一面说话，一面轻轻地把它掸掉。范文程看在眼里，回去奏报皇太极："洪承畴不死矣。"

皇太极很赞同范文程的判断，对洪承畴的恩遇更加优厚，希望招降为己所用。崇祯和皇太极相比，崇祯乖戾多动、政无定法、吝啬多疑，政治上极不成熟；皇太极则稳重厚道，文韬武略远在崇祯之上，他统率的清王朝朝气蓬勃，正处于茁壮成长时期。洪承畴的心理天平开始向皇太极的一边倾斜了。直到有一天，皇太极见洪承畴衣服单薄，当即脱下身上的貂裘披在洪承畴的身上，洪承畴为此大受感动，当即表示归顺大清。

洪承畴降清后，辅助政务、招抚南方长达 16 年，对明末清初的社会顺利变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降清后的政绩远远超过了在明朝镇压农民军的政绩，这段时间是他实现抱负、施展才华最辉煌的人生历程。

第五节　袁崇焕冤案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万历四十七年（1519 年）进士，天启六年（1626 年）出任辽东巡抚，镇守宁远。在孤立无援的情势下，拒绝努尔哈赤的诱降，题写血书，激励士兵拼死抵抗。他指挥唐通判用红夷大炮击中努尔哈赤的黄龙幕帐，迫使后金军狼狈败退。宁远之战使得他崭露头角，也使屡战屡败的辽东战局出现了转机。

努尔哈赤自从 25 岁征战以来未尝败绩，此次宁远城下之败，使他愤愤而归，不久就病死在沈阳。之后，袁崇焕又在锦州、宁远再次挫败皇太极。没想到，袁崇焕遭到了专擅朝政的魏忠贤的忌恨。魏忠贤唆使其党羽诬陷袁崇焕，迫使他辞官而去。

崇祯皇帝即位后，为了扭转辽东的局面，重新起用袁崇焕，任命他为都察

院右都御使兼兵部添注左侍郎。主持兵部常务的左侍郎吕纯如请求皇帝重用袁崇焕，他对袁崇焕的评价为："不怕死，不爱钱"和"曾经打过仗"。这种品格，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是十分难得的，要在辽东力挽狂澜，非袁崇焕莫属。崇祯皇帝接受了吕纯如的建议，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使，把北京、辽东、山东军务全权委托给了他。

崇祯元年(1628 年)七月十四日，崇祯皇帝召开御前会议，讨论辽东事宜，希望袁崇焕能够提出振奋人心的方略。袁崇焕提出了"五年复辽"的方略：倘若皇上能够给我便宜行事的权力，那么五年之内就可以平定辽东外患，收复辽东失地。这样的豪言壮语，使崇祯帝和在场的大臣们欢欣鼓舞。

袁崇焕在御前会议上又提出了许多前提条件，例如钱粮与武器必须悉心筹措，用人必须得心应手，件件落实才行。崇祯帝迫切希望"五年复辽"得以实现，马上交代户部、工部、兵部、吏部一一照办。

崇祯帝刻意营求中兴之治，对袁崇焕寄予了厚望，几乎对其言听计从。但根据当时辽东的军事力量对比，"五年复辽"是不可能完成的。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终于酿成了日后的悲剧。

袁崇焕犯下的另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是擅杀东江总兵毛文龙之后，承诺若不能恢复辽东，愿以死谢罪。无异于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袁崇焕

毛文龙被杀，为清军大举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崇祯二年(1529 年)十月下旬，皇太极率领十万满洲与蒙古骑兵，避开袁崇焕在宁远、锦州的防线，绕道辽西，突破喜峰口以西的大安口、龙井关、马兰峪长城关隘，直逼长城南面的军事重镇遵化城下。遵化市距离北京城不过 100 多千米，十一月初一日，北京城宣布戒严。

袁崇焕立即派遣总兵赵率教前往救援。赵率教因仓促应战，十一月初四日在遵化城下阵亡，并全军覆没，形势顿时严峻起来。十一月初五日，袁崇焕亲自率领重兵进关增援，集中兵力防御北京外围。临危受命的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孙承宗，主张防守蓟州、顺义、三河一线，而不赞成退守昌平、通州一线。但已经无济于事，袁崇焕的部署已成定局。

袁崇焕犯下的另一个错误是，当他得知敌军已经越过蓟州向京城进发时，

理应在前面阻截，但他居然率领军队在后面跟着。于是，敌军接连攻陷了京城的屏障——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城。他于十一月十五日赶到河西务后，不顾将领们的反对，悍然率部前往北京，于次日晚抵达广渠门外。这一决策最终铸成了大错。本来应该把敌军阻挡在蓟州至通州一线，展开决战，确保京城安全。

袁崇焕此举无异于纵敌深入，把战火引向京城。这使得居住在京城郊外的达官贵人纷纷向崇祯帝告状：袁崇焕名为入援，却听任清军劫掠焚烧民居，不敢抗击，致使城外许多庄园别墅被蹂躏殆尽。

皇太极兵临城下之后，散布谣言：袁崇焕与他有约在先，故意引诱满洲铁骑逼近北京。此谣言很快就传到了崇祯皇帝那里。

十二月二十三日，崇祯帝在宫中召见了袁崇焕、满桂、祖大寿、黑云龙等将领，以及新任兵部尚书申用懋。自始至终没有流露出对袁崇焕的戒备之心。等到崇祯帝把京城与皇城的警卫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之后，十二月初一日再度召见袁崇焕时，态度就不一样了。

崇祯帝直截了当地责问袁崇焕三大罪状：杀毛文龙、导致敌军进犯北京、射伤满桂，所隐含的潜台词就是与皇太极的“密约”。袁崇焕毫无思想准备，一时语塞，无言以对。崇祯帝以为他默认了，不由分说地厉声下令锦衣卫将袁崇焕扭押到西长安门外的锦衣卫大堂，发镇抚司监禁。

对于这种非常举动，内阁辅臣们极力劝谏，临敌易将，兵家所忌。现在的确不是逮捕袁崇焕的时候，崇祯帝忽略了主帅被逮后辽兵的动向，这是致命的潜在危险。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问题，向其上司兵部尚书及时提醒：辽兵无主，不败即溃，今日之上策，莫过于释放袁崇焕，以维系军心，责成他驱逐敌军出境，立功自赎。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余大成所料。辽兵平素对袁崇焕感恩戴德，祖大寿又与满桂有过节，袁崇焕被捕，要他听从满桂节制，大为不满。十二月初四日一早，祖大寿悍然率领辽兵离开北京，回归宁远。敌军还未撤退，一支最有战斗力的劲旅脱离战场，形势堪忧。

崇祯帝接受了兵部尚书梁廷栋的建议，指派内阁六部官员前往狱中开导袁崇焕，让他顾全大局，阻拦祖大寿东行。袁崇焕欣然从命。于是，手持袁崇焕蜡书的信使昼夜兼程，在距离锦州只有一日路程的地方追上了祖大寿。祖大寿下马捧读袁崇焕的手书，泣不成声，一军尽哭。在其年逾八旬的老母的规

劝下，祖大寿回师北京。崇祯帝大喜过望，顿时又闪现出重新起用袁崇焕的想法。

正在此时，朝廷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制造事端，掀起了清查阉党逆案以来第一次翻案风波，并且由袁崇焕牵连到内阁辅臣钱龙锡，终于使得袁崇焕的罪名层层加码，丧失了转圜的可能。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下午，崇祯帝召开御前会议，商议处决袁崇焕事宜。他列举袁崇焕的种种罪状后，问朝臣们该怎样给袁崇焕定罪。大臣们都不敢造次，一味顿首，听凭皇帝发落。崇祯帝见大家并无异议，随即宣布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于是，袁崇焕被绑赴西市遭凌迟而死，惨不忍睹。他死后，其兄弟妻妾被流放福建，家财被没收。袁崇焕被杀之后，辽东的祖大寿、吴三桂等将领纷纷降清，最终导致了清军入关。

崇祯帝杀袁崇焕，对于明王朝而言，无异于自斩手足，自毁长城。

第六节　袁崇焕诛杀毛文龙的缘由

毛文龙，字振南，浙江杭州人，万历四年(1576年)正月十一生于杭州府钱塘县松盛里。毛文龙早年丧父，寄居在舅舅沈光祚家中，沈光祚当时是山东布政司，将毛文龙推荐给了王化贞，授予练兵游击。

天启元年(1621年)的一天深夜，毛文龙亲率3000人马攻入镇江，生擒镇江游击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60多人。镇江大捷后，宽甸、汤站、险山等城相继归降毛文龙，一时间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他不断袭击后金局部地区，收复了辽南诸岛城镇，有力地牵制了后金的西进。

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毛文龙派部将陈忠率兵攻克了后金占领的樱桃涡、涡站。九月，毛文龙的部队攻克满浦、昌城。

十月，毛文龙亲自率部与后金军队在凉马佃大战，双方都受到了重大伤亡。后金军队主力因集结在西南前线，无力进剿毛文龙，毛文龙也由于兵少将寡、粮草不足而无力进攻，双方对峙或周旋，战事呈胶着状态。

毛文龙不断派人深入后金进行“煽惑”，致使大批辽民叛去，同时还带领一些辽民揭竿而起。虽然毛文龙的这些行动规模不大，对后金腹地的民情影响却很大。

皮岛也称东江，东西 7.5 千米，南北 5 千米，位于辽东、朝鲜、山东登、莱二州之间。与鸭绿江口的獐子岛、鹿岛构成三足鼎立之势。毛文龙将皮岛作为根据地后，又招纳汉人，声势日渐盛大。明朝政府特别设立东江镇，升毛文龙为总兵，累加左都督，为正一品武将。

天启七年(1627 年)，后金军队进攻镇江，毛文龙率部撤到了海上，不久乘虚攻占东江，设军镇于皮岛，重建抗金势力，与宁锦明军互相呼应，对后金形成牵制。

毛文龙虽然孤悬海外，但党争并没有放过他。毛文龙是王化贞提拔的人，王化贞在广宁战败之后被归属"阉党"，毛文龙也难免受到牵连。尽管有天启皇帝的老师、大学士孙承宗的支持，毛文龙与东林党的关系却并不好。

崇祯帝继位后，东林党人对魏忠贤集团实行"斩尽杀绝，除恶务尽"的政策，毛文龙因远在天边，没有被杀害。但是朝臣仍不时在崇祯帝面前做他的文章，毛文龙的日子很不好过。朝中的大臣很希望他死在后金手里，或是打败仗后弹劾他。毛文龙认定，如果自己的军队被消灭，自己被害也就是早晚的事了。

迫于形势，毛文龙必须保存自己的军队。毛文龙开始找后路，他通过中间人搭线，同后金密谋和谈，以达到息兵自保的目的。而八旗军不善于水战，一时之间无法将皮岛攻陷，皇太极想先稳住毛文龙，以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骚扰和袭击。因此双方使者一直来往不绝，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天启八年(1628 年)正月，毛文龙的使者到达沈阳。在致皇太极的信中，毛文龙表达出强烈的和平愿望。对于毛文龙的主动示好，皇太极表示欢迎，并决定派遣使臣阔科等五人赴东江议和。

农历五月初三，阔科等人抵达东江，因为不认识路，误入正在毛文龙处发放粮食的明户部官员营帐中，被当场擒获并押送到北京。这个消息传到沈阳后，皇太极恼羞成怒，断然下令停止与毛文龙的一切来往。

毛文龙心急如焚：如果阔科等人重刑之下招供自己与后金议和之事，就死到临头了。于是连夜派人携重金进京，向有关官员贿赂 4 万两白银，保全了阔科等人的性命，但他们被羁留在了内地，不准放回。

毛文龙将事情经过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皇太极，并在信中一再表示歉意。但皇太极对毛文龙议和的诚意产生了怀疑，坚决要求将阔科等人送回，然后双方才能重谈议和之事。

毛文龙一再回书信解释，并恳求皇太极谅解，皇太极不为所动。双方议和陷入僵局。恰在此时，袁崇焕东山再起，第三次出关守边。袁崇焕一上任就开始策划除掉毛文龙。

毛文龙控制了辽东海上一个繁荣贸易区域，东倚朝鲜，北联辽西、海盖沿海，西至天津，南濒登莱，海上贸易十分兴旺发达。中朝之间的商路和贡路，以前以陆路为主，走的是自山海关至辽西这条路，朝鲜商人一次携资数十万两白银是很常见的事。自辽东战事起后，这条路就移到了海上，主要商品有朝鲜及辽东的参貂，中国的粮食、布帛、铁器以及违禁物品硫黄、炮硝、武器等，而天津、登莱、淮安的海上运粮又为商人创造了许多谋厚利的走私机会。

当时，明王朝已经下令断绝了金、明两地的贸易往来，贩卖后金土特产品被视为非法。而物以稀为贵，关内一些有钱人将辽东土特产的价格炒作得甚至超过了黄金。毛文龙立即在从辽东后金政权下逃出来的人们中组织采参队，由军队护送他们乘坐军用船只，溯鸭绿江而上，在今抚顺新宾县境内登岸，入深山采参。回来后，毛文龙以平价收购众人所采之参，再送到胶东半岛各口岸甚至京师间高价销售，牟取暴利，一夜暴发。但毛文龙并不满足，他向朝廷报告说，自己手下共有 20 万大军，请朝廷发饷，一年至少需要数百万两白银。

朝中大臣决定派人前来核查军队人数。来人尽管受到毛文龙的热情招待，仍没有办法核算出 20 万人的数目，最后以 10 万人上报。

东江在行政上归山东登莱道衙门管辖，军队人数经登莱道衙门再次核查，只查对出 2.8 万人，于是按 2.8 万人向皮岛输饷。坚信自己有 20 万大军的毛文龙更加有理由理直气壮地从事走私活动了。

袁崇焕上任后决定先从经济上入手整治毛文龙：实行海禁，不许登州、莱州通往东江的私船出海；控制毛文龙的粮饷、军械。凡是朝廷运往东江的物质，都必须受蓟辽督师衙门的节制、转发与核查，运送路线不再由登州、莱州直接运往东江，改为由山海关起运至宁远近海的觉华岛，经督师衙门挂号，再转运至东江。

就这样，袁崇焕控制了毛文龙粮饷装备的供给渠道，还切断了他海上贸易的命脉。面对袁崇焕的咄咄逼人，毛文龙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他向皇帝上疏说：这是拦喉切我一刀。此时的毛文龙似乎也预感到了处境的危险，向皇帝抱怨：诸臣独计除臣，不计除奴，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

袁崇焕的做法最终因为毛文龙的激烈反对而作罢，但是毛文龙与袁崇焕

之间的矛盾至此已经十分尖锐。

毛文龙堪称一代枭雄，但绝对不是气节高尚的真英雄，他过于重利且野心勃勃，这样的人控制不好，可能成国家大患。

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袁崇焕这才有了“毛文龙可用就用，不可用就杀了他”的决心。

第七节　加速明王朝覆灭的新闻稿

一直以来，皇太极都以议和为话题，与明王朝不断周旋，在战与和之间纵横捭阖：议和是为了选择更有利的时机发动战争，而战争又是为了能够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促成双方的议和。皇太极屡次提出议和，并不完全是出于兵不厌诈的军事考虑，他的议和举动还具有相当的真诚成分。

以前努尔哈赤一直希望明朝廷封其为王，以号令东北各少数民族。到皇太极时期后金的实力虽然比努尔哈赤强，但也一直希望同明朝保持友好关系，发展贸易。即使在攻明战争屡次胜利时，他在议和书上也低明王朝皇帝一字书写，并接受了明朝廷要其遵明正朔、取消“伪号”的要求——在尚未达成议和协议之时，不书后金天聪年号只写干支。当其羽翼丰满，多次攻入内地，明朝无法招架之时，他仍然多次发布告示说愿与明王朝友好、议和。皇太极还把征战中抢夺来的原明朝发给海西女真四部及蒙古诸部的敕书，一直保存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表明了他要与明朝发展贸易的愿望。由此可见，后金(清)和明王朝之间原本是存在着议和成功的可能性的。

当然，将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明王朝需要付出必要的代价，即承认后金实体的存在，划出地区让其统治，封其为王。这虽然损害了明王朝统治者的威望，却可以平息战火，安定辽东，减少困扰，最重要的是可以确保明朝“天朝大国”的地位。

皇太极的成熟与稳健，也促使他思考问题比群臣更深入一些，比崇祯帝高出一筹。皇太极感到，目前内部的稳定局面是因为有明王朝这一大敌才形成的，一旦失去这一大敌，清廷内部的稳定和谐将会随之瓦解。只有在取得一些胜利之后，加强内部的整顿和对周边势力的驯服，才能维护自己的统治。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基于对敌我形势的分析，尽管崇祯帝的“议和信”让皇

太极看了很不高兴，但皇太极还是委曲求全，热情地接待了马绍愉等来使，并给予他们优厚的赏赐。经过半个多月的谈判磋商后，六月三日，在马绍愉等人离开盛京时，皇太极派官将他们送到7.5千米之外设宴饯别，并命军士将使团护送到明王朝控制的连山（今连山区）境内。

皇太极给崇祯帝写了一封长信，托马绍愉递呈。在信中，皇太极在追溯了后金（清）与明王朝开战的历史渊源后，又谈到尽管清兵已处胜势，但仍愿议和通好。

从这封信的行文来看，皇太极的态度比较谦恭，在一番客套话之后，皇太极提出了并苛刻的停战四项条件，字里行间完全没有威胁的意味。

尽管如此，皇太极对明王朝的诚意并没有信心，他在信的末尾发出了最后通牒："若不愿和好，再勿遣使致书……约九月不至则治兵。"言外之意，和谈一旦无望，只有兵戎相见了。

当马绍愉返回京师，将议和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呈送给兵部尚书陈新甲后，陈新甲因为着急上朝议事，就将信件随手放在几案上，他的书童误以为是"塘报"（抄送诸臣的报告），未经请示陈新甲便开始抄传，并拿到当时的政府机关报——《邸报》上发表了！本来是保密的议和经过，一下子被群臣百官览阅，朝野为之哗然，很多大臣纷纷上疏弹劾陈新甲贪生怕死、妥协求全、私定议和条款。

崇祯帝极为愤怒，起初他还想袒护陈新甲，并不想追究他的责任，还将大臣们的奏疏压下不发，希望不了了之。但舆论鼎沸，难以平息，迫于言论压力，崇祯帝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在内心不愿意给别人留下一个无法应付时局，向"蛮夷"低头的印象，感到议和是自己的耻辱，于是遂将全部责任推给陈新甲，降旨责令陈新甲悔过。实际上，崇祯帝很信赖和赏识陈新甲，这个处分完全是为了平息朝廷中的舆论，处罚还是十分轻的。

然而陈新甲觉得议和自始至终都是在皇帝的指示下进行的，自己并没有在其中增添额外的内容，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诩其功，还引用崇祯帝给自己写的敕谕中的话语为自己开脱。崇祯帝恼羞成怒，终于下令将陈新甲处死。

直到亡国的最后时刻，崇祯帝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可惜已经于事无补，无法挽回败局了。

其实，明朝在与后金（清）的军事对峙中，不是没有看到议和的好处，也不是没有采取议和行动，但最终议和却被自己破坏，使明朝遭到后金（清）更大规

模的进攻，终于一败而不可收拾。这种结局，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明朝廷上下缺乏议和的大环境与气氛。明朝始终未给议和创造必要的条件，主持议和者从未展开有关议和大政方针的讨论，也未纠正一直批驳的一些模糊认识及错误论调，以统一朝臣的思想。相反，传统的所谓天朝大国不可冒犯的习惯思想始终占据上风。朝野上下一直坚定地认为后金（清）是国贼、凶寇，必欲剪除之，绝不与其言和。所以议和伊始，便遭到不断地围攻和咒骂。

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主持议和的人均身负恶名。这种攻击、反对议和的声浪持久不衰，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任何正确的议和主张都难以畅行。

在"议和即误国"的叫嚷声中，出现了"一日不战"便"流言四起"的局面，主和派一直处于被动、受误解、受谴责、遭围攻的境地。

崇祯帝在议和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恶劣，他采取杀替罪羊的办法，虽然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却又一次关上了本是由他授意打开的明清议和的大门。

而皇太极原本对议和是抱有诚意的，他甚至已经初步划定了两国的边境线，只等崇祯帝点头就可收兵，各安其政了。

这时的崇祯帝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他将为自己的出尔反尔和丧失议和时机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第八节　最后的落井石：奢安之乱

从汉朝到唐宋，西南地区（尤其是贵州）长期处于中原封建王朝的羁縻制度的统治之下。羁縻制度下的少数民族政权和势力向中央政府称臣归顺，但拥有完全的自治权，只是官名职位由中央政府设定，世袭的首领由中央政府授予称号。

元朝时期，元政治者对西南的少数民族势力继续施行的羁縻政策，在西南推行土司制度。土司制度中，各级土司实际是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封建领主，这些封建领主世袭继承土司职务，但经元政府赐印、诰敕及贡赋。

明王朝建立后，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沿袭了元朝的土司制度。水西（今贵州黔西北地区一带）安氏是贵州黔西北一带历史非常久远的彝族少数民族家族势力，其先祖罗济在三国蜀汉时期曾被封为罗甸国王。唐时阿佩、宋时普

贵、元时阿画都在开国时纳土袭爵，持续执掌水西地区统治权。

永宁奢氏是四川永宁（今四川泸州江安合江一带）土司，与水西安氏世代联姻，两者唇齿相依。

明王朝与水西、永宁二土司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显得异常微妙，合作、猜忌与防范并存。

水西安氏的首领霭翠在洪武初年便率众归附，朱元璋大喜，将水西、水东合并，设为贵州宣慰司，以霭翠为贵州宣慰使，赐姓安，位居贵州各宣慰之上。

但对安氏，朱元璋始终报着不信任和防范的心理。后来霭翠曾请求发兵参加讨伐抗拒明政府的垅居部落，朱元璋竟不许，还令当地驻军慎守边境，加强军备。

对于朱元璋来说，当时西南最大的威胁是一直拒不归顺云南的故元梁王和大理段氏。洪武十四年（1381 年），朱元璋派傅龙德、蓝玉、沐英率 30 万大军平定云南梁王和大理段氏。

朱元璋平南时，霭翠逝世，其妻奢香代袭贵州宣慰使职，年仅 20 岁。同年，贵州宣慰同知、水东大土司宋钦也逝世了，其妻刘淑贞代袭宣慰同知。贵州的行政大权落在了两个年轻的女人手中。

在平南战争中，年轻的奢香投向了明王朝的阵营。她积极让明军在水西境内安营扎寨，并贡马 1 万匹、毡 1 万领、牛羊 1 万以及军需若干，支持明军经贵州进伐云南。她还凭借水西与西南彝族各部的宗族姻亲关系，亲自出访乌撒（今威宁）、芒部（今云南镇雄）等地，为明政府充当说客，鼓动云贵川各少数民族势力支持明政府。最后，明军通过水西顺利进入云南，一举消灭了元守军，梁王自缢而死；明军接着又挥师攻克大理，土酋段氏就擒。从此结束了云南割据势力的统治，使明王朝完成了对西南的统一。

但是，在征南之战中立下大功的奢香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从朱元璋建立明帝国的那天起，在西南，他的最大梦想就是把一切权力集中到明政府的手中。

平南胜利的第二年，明王朝的平南大军在归途中在安氏水西势力范围内的毕节、赤水、七星关、黑张（赫章）、瓦店等地纷纷设卫，令傅友德以大量兵力控制水西。

发生在洪武十七年（1384 年）的奢香事件，是朱元璋对水西安氏的第一次试探。这次事件中，二品都指挥使、都督马晔竟然公然敢公开扣押并裸挞当时

贵州的最高女统治者——贵州宣慰使奢香。都指挥史马晔是马皇后的侄儿。

面对明帝国公然挑衅，水西、水东两位年轻的女政治家极为冷静。奢香被马晔关押期间，宣慰同知刘淑贞四处走动，在安抚深觉受辱而欲起兵的水西及其他彝族各部的同时，并亲自上京上访，向朱元璋为奢香讨个说法。

朱元璋看水西、水东各部未被激怒，而自己明显也太过理亏，于是先召奢香进京，后召马晔进京治罪。

奢香的忍辱负重，朱元璋的小心谨慎，避免了明帝国自统一西南义来该地区第一起政治危机。但这一事件却在奢安两氏人民心里烙下了耻辱的印记，悄悄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到了明朝中后期，在西南，明统治者与土司阶层以及广大少数民族百姓的矛盾日趋复杂化与尖锐化。

明朝中央政府派出的流官不但鱼肉百姓、苛收重赋，还对当地的土司们苛责打骂。长期以来世袭的土司制度，流官们也加以干涉，凡世袭者必向流官交纳黄金已为不成文之陋规。不纳金者，则不得就职。

万历年间，奢氏首领奢效忠死后，奢氏陷入了效忠亲弟奢崇明与效忠庶子奢崇周的土司位置争夺战中。永宁总兵郭成、马呈文竟然利用双方混战之机，出兵赶火打劫，将奢氏积财搜掠一空。而在奢崇明成为代永宁宣抚使后，当地流官却以“行堪未定”为由，拒绝承认。长期高压的政治，使奢崇明日益滋生叛意。

天启元年(1621年)，明政府在后金战线上吃紧，要求水西永宁二土司征兵赴辽作战，这成为“奢安之乱”的导火线。奢崇明调集2万兵马至重庆，明政府拒不发放军饷军粮，本应发放的40万两饷银也只给了4万两；重庆巡抚徐可求还指责奢崇明所调之兵大都老弱病残，毫无战斗力，要求遣回永宁重新征调。

奢崇明以此为机，率领2万永宁军攻占了重庆，杀巡抚徐可求及其他官员20多人，并分兵攻占了合江、纳溪、遵义等重镇，后来还围攻成都达100多天。之后，奢崇明建立大梁国，自称大梁王。

此时，水西安氏首领安尧臣刚死，其子安位年幼，尧臣妻奢社辉(奢崇明的亲妹妹)摄事，水西大权掌握在奢社辉与安尧臣之弟贵州宣慰司同知安邦彦手中。奢社辉和安邦彦听到奢崇明起事的消息后，也举起了反旗，并迅速占领了毕节、安顺、沾益等地。

水西安氏在西南的影响力巨大，此次战乱因安氏的加入而升级，一时间西

南地区土司纷纷响应。水东土司宋万化也起事自称罗甸王，占据龙里。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安、宋两氏为主的10万起义军包围了贵阳，将贵阳围了整整一年，城中军民男妇40万人几近饿死，仅余200人。

天启三年(1623年)，贵州巡抚王三善率兵解贵阳之围后，安邦彦率部回水西，与奢崇明的永宁军合流，与明政府打起了持久战。期间，奢安军借助川黔边界的有利地形，屡屡取胜，贵州巡抚王三善、总兵鲁钦战死。

崇祯元年(1628年)，明政府启用朱燮元总督云贵川广五省。朱燮元用了七年时间，集五省兵力，才于崇祯七年剿杀奢崇明、奢社辉和安邦彦于水西永宁。后来，年轻的安位归降，奢安之乱基本结束。

为了平息“奢安之乱”，明政府付出的代价是异常惨重的。14年战事庞大的军费开支，对于已疲于应付北方战事及各地农民起义的明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原本温驯的西南土司们，在大明帝国最危难时刻群集而起，向大明帝国投去了最后一块落井石。

第九节　尴尬的清廉秀

崇祯帝朱由检从他哥哥天启帝朱由校手里接过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江河日下的大明帝国，年少气盛的崇祯帝犯了第一个错误：求治太急。崇祯帝最不满意的是帝国的吏治。此时的大明政府官员贪污风行，腐败成性，政以贿成是世人皆知的潜规则。对此，崇祯帝拿不出像样的措施，只好一方面不断责备吏部尚书不得力，另一方面空洞地提倡文官不爱钱。空洞的道德说教让某些官场投机分子找到了快速升迁的捷径。其中，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是一个。

韩一良，山西澄城人，在崇祯帝上台那一年出任户科给事中。正当救治心切的崇祯帝不断发布上谕，倡导“文臣不爱钱”的优良作风时，他上了一道奏章，准确地搔到了崇祯帝的痒处。韩一良在奏章中说，当今世上，干什么事不用钱？哪个官员又不爱钱？做官是花钱买来的，这些官员上任后，为了收回成本当然就得贪污受贿。因此，说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却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绅要打秋风，进京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

从天而降，让他们如何廉洁呢？韩一良举例子说，州县的官员进京，对于京城的御史和给事中们来说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有五百两。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作祸水，才有可能实现廉洁爱民的良性循环。

崇祯帝深信韩一良的说法，并专门为此开了一次现场会。崇祯帝令韩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朗读了这一奏章，然后又让大臣们互相传阅。现场会上，崇祯帝指出，韩一良乃忠诚耿直之臣，可以提拔为右佥都御史。经常被崇祯帝批评的吏部尚书王永光一面连连称善，一面却别有用心地说，韩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请皇上命他挑出其中最严重的贪污受贿者，以便以此为例进行重处。

韩一良本来是要在崇祯面前表明他的忠心与干练，又哪敢真的举出哪个官员贪污、哪个官员受贿！他只得支吾着说折中所言俱是风闻，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事实。这下崇祯帝不高兴了，他说："你难道连一个贪污受贿者都不知道就写了这个奏折吗？限五日内奏明。"

五天后，韩一良只得纠弹了几个已被打倒的官员交差，崇祯帝看出他在敷衍此事，再次取出韩的奏章，亲自朗诵，当读到文中"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时，崇祯帝厉声追问韩一良：这五百两银子到底是谁送的？韩一良支吾着推说记不清了。崇祯帝大怒，对大学士刘鸿训说：都御史哪能轻易授给这种人！结果，韩一良不仅右都佥御史没做成，连其本来担任的户科给事中也被罢免了。

朱元璋建立明帝国后，把官员的工资定得极低。如果官员们都清廉如玉，最终的结果只能像海瑞那样，死后连安葬自身遗体的积蓄也没有。大明两百多年间，官员的主要收入都在工资之外。这些灰色收入，有的是多年来形成的惯例，有的则是贪墨之所得。崇祯帝以德治国的愿望根本不符合晚明事实。

韩一良事件之后，崇祯帝对大明帝国的文官系统越发感到不满，对大臣们的从政能力和品德人格也持怀疑态度。此后，他在用人上总是颇多猜疑，甚至只得自己亲自去干。一个自以为是而又事必躬亲的专制君主给明帝国造成的伤害，可能大过一个平庸、惰怠、无所事事的皇帝。

第十节　崇祯皇帝的最后时刻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当时北京的大明皇帝崇祯已不是中国唯一的皇帝了，在北京东边的沈阳有虎视眈眈的大清军队，在北京的西面有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在崇祯皇帝在位的17年中，这三股势力此消彼长。到了1644年，原来均衡的势力被打破了。在这年的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国。建国伊始，李自成作的第一个决定就是要挺进中原，矛头直指北京城。

面对这样的局面，当时大明王朝的大臣们议论纷纷，有的大臣主和，也有的大臣主战。其中有一位名叫李明睿的大臣建议将都城迁往南京。正月初三，崇祯皇帝召见了李明睿，与他商量迁都事宜。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在南京定都，到崇祯帝时南京依然是大明王朝的陪都。不仅那里的皇宫等建筑是现成的，而且官员设置和北京城也差不多。更重要的是，清军和大顺军的势力都在长江以北地区，江南则安定多了。

在崇祯皇帝和李明睿研究完后，李明睿就在上朝时提出了迁都的动议。但是这个建议一提出来就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反对最强烈的是崇祯皇帝最信任的大臣大学士陈演。

大臣们反对这个提议的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崇祯皇帝是个忠烈的君主，皇帝不可能同意这样一个逃跑的方案，所以纷纷表示反对以显示自己的忠诚。事到如今，崇祯皇帝只能打消了迁都的计划。不能迁都，只有死守这一条路了。

1644年的北京城内外城城墙总长为75千米，但是守卫京城的三大营的兵力总共只有3万，许多城墙没有士兵守卫。

当时吴三桂拥有精兵三万人，是大明王朝最精良的一支军队，崇祯皇帝打算把吴三桂的军队调进关来，对付农民军。但吴三桂部一旦入关，就等于把山海关外拱手送给了大清军队。1月21日，崇祯帝召集大臣们集体议政，希望能有人配合提出这个建议。但大臣们都不同意调兵勤王之事，因为崇祯皇帝的想法不明朗，所以大臣们都不敢承担这个责任。就这样，调兵勤王之事又搁浅。

3月1日，李自成的农民军已攻陷大同，即将兵抵宣府，离北京只有100多

打来了。此时，崇祯皇帝终于做出了放弃宁远，招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四将入京勤王的决定。但此时崇祯已经失去了对部下的控制。只有唐通率领 8000 名援军及时赶来，其他的三个将领不是称病，就是延缓。三月初，一只由近 4000 名太监组成的城防军开上了北京的各处城墙。

3 月 18 日，李自成的起义军将北京城的四郊各路官军基本扫平，北京已是一座唾手可得的孤城。

李自成围住北京城后并没有下令立即攻打，而是派出投降的太监杜勋作为使者和崇祯帝议和，但是崇祯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投降。

劝降失败以后，农民军开始攻城了，一时之间火炮齐发，震耳欲聋。大顺军早已准备好了云梯，在呐喊声中蜂拥而上。很快西直门、平则门、德胜门被一举攻占，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投降。到下午时，外城被大顺军全部攻占。

此时的崇祯帝登上了紫禁城的最高处，见北京外城烽火连天，大顺军攻城不止，却看不到任何援军的影子，知道大势已去，大顺军攻进内城是早晚的事。他回到乾清宫，先是令人将太子们换上便服，送到皇亲们家去，以备东山再起。

送走太子之后，崇祯帝来到后宫，他命令皇后和妃子以及女儿们自杀，周皇后悬梁自尽，元贵妃自尽未果，崇祯挥刀砍去，接着他又连续砍伤了几个平时宠爱的嫔妃。面对自己最喜欢的年仅 15 岁的长平公主，崇祯皇帝有点心软，连砍了两剑都砍偏了，最后长平公主失掉了一条胳膊，晕倒在地。小女儿昭仁公主被他一剑砍死。

崇祯帝杀完至亲后，带着数十名持利斧的太监骑马跑到朝阳门，但接近城门时，城墙上竟然有太监向他开炮，崇祯一伙人只好前往正阳门，但正阳门城楼上已经悬挂起表示情况紧急的三盏白灯笼，他又到北边的安定门，但城门打不开，崇祯帝只好又回到宫中。

崇祯帝返回宫中之后，鸣钟召集众大臣。但是他敲了好一阵，却没有一个人来。崇祯帝的身边只剩下太监王承恩一个人，两人走上了煤山（即景山），到达了山顶的寿皇亭。崇祯帝朱由检，在寿皇亭旁的一棵海棠树上自杀了。

崇祯帝在他的衣襟上留下了这样的遗言：

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貌恭，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崇祯帝虽然励精图治，勤于政事，但却从此被人称作亡国之君。

第十一节　朱氏皇族的悲惨命运

李自成、张献忠等明末起义军纵横大地之后，朱元璋的子孙们成为农民军最有兴趣的猎物。农民军所过之处，皇族均在劫难逃。那些各地最壮丽的王府，在连绵全国的战争之中，几乎无不灰飞烟灭。

明末山西有晋王、代王两大藩王和西河王等多位郡王，皇族多达数万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李自成挥军进入山西，每到一地，首先捕杀皇族。起义军陷山西平阳后，西河王等300多人遇害。起义军攻占汾阳后，也首先搜杀"宗绅"。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攻克太原后，李自成军捕晋王宗室400多人，送到西安后，将他们全部杀害。这400多人都是晋王一系的高级皇族。接着，因为担心中低层宗人反抗，便闭门搜捕，得1000多人，将他们杀害于海子堰。经过这两次杀戮，山西晋王宗室中的主要人物被杀殆尽。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军又攻取大同。六天之内，代王朱传齐以下的4000多名诸王宗室皆被杀尽。其他郡王也几乎没有幸免：定陶王及其子效锋同赴井殉国，翟山王效钦、陵川王效铿等相继被拷掠至死，沈世子迪洪被执不知所终。李自成军仅在山西就杀掉朱姓子孙1万多人。

尽管李自成以"不嗜杀"闻名，但是他兵锋所过之处，那些朱姓王爷几乎没有活下来的。

崇祯十三年(1640年)十二月，李自成攻占河南永宁，万安王朱采轻被捕捉，在西关被公开处死。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一月，攻占南阳，杀唐王朱聿莫于麒麟岗。十二月，克禹州，徽王被杀，其十七家支系亲属皆被杀。崇祯十五年(1642年)闰十一月，李自成军攻破汝宁，崇王朱由贵及其世子诸王被杀于泌阳。十二月，李自成军攻入荆州，湘阴王朱俨尹全家皆被诛。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军抵兰州，执肃王朱识铭，"宗人皆死"……

而张献忠军本以玉石俱焚为特长，所过之处，诸王扫灭。

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张献忠军攻取了襄阳，将襄王朱翊铭杀害于南城楼上，接着焚烧城楼，投尸于火中。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克武昌，俘获楚王朱华奎。他将楚王沉

于西湖，拥有近千间宫殿楼阁、壮丽近于皇宫的楚王府也赴之一炬……

明末起义军诛戮明皇室成员，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坚决、彻底。只要是朱元璋的后代，不论是主动投降还是被动俘获，不论是立地不跪还是苦苦求生，不论是拒不交代藏宝地点，还是痛痛快快地献出所有财富，结果都是一样：一律诛灭。

第十二节　福王朱常洵之死

河南本来是富有之地，但连年灾害，加上明朝廷七藩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贫困人民非死即逃，或为盗贼。李自成进入河南之初，手下仅有 1000 名兵士，几个月便发展到了数万人，农民军一举攻克了宜阳、永宁、偃师、灵宝、宝丰等地，杀死了明王朝宗室万安王以及各县官员数百人。也恰在此时，宋献策和朱金星加入了李自成农民军。朱金星是犯法被贬戍的“举人”，宋献策是江湖术士，二人深受李自成重用。

农民军在河南的最大目标是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此人是明神宗的第三子，是宠妃郑贵妃所生，他差点夺了明光宗当时的太子之位。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明神宗封朱常洵为福王，婚费达 30 万金，在洛阳修盖壮丽的王府，超出一般王制十倍的花费，并一次赐田 4 万多顷。就国之后，福王横征暴敛，侵渔小民，千方百计搜刮，坏事做绝。崇祯帝即位之后，因这位福王是帝室尊属，对他很是礼敬。

朱常洵体重达 150 千克，他终日闭阁畅饮美酒，遍淫女娼，花天酒地。陕西流贼猖炽之时，河南又连年旱蝗大灾，人民相食，福王不闻不问，仍旧收敛赋税，连基本的赈济样子也不曾表示。四方征兵队伍路过洛阳时，士兵纷纷怒言：“洛阳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着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

当时退养在家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到王府，劝他说即使只为自己打算，也应该开府库拿出一些钱财援饷济民。福王嗜财如命，不听吕维祺的劝告。

崇祯十四年（1641 年）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用抛石机攻打洛阳。洛阳城极其坚固，农民军攻了一个白天也没有攻下来。傍晚，城内有数百名明兵士

在城墙上纵马驰呼，城下农民军响应。明王朝守城兵士因怨生恨，准备献城投降。

总兵王绍禹闻讯之后，急忙赶来谕解。哗变士兵大叫："贼军已在城下，王总兵您又能把我们怎样！"一时间叛兵杀掉了守城明军士数人，不少人因受惊吓而堕城。城外农民军见状，趁乱蚁附攀城，哗变的明军士伸手引梯，洛阳就这样陷落了。


朱常洵

福王朱常洵与女眷躲入郊外僻静的迎恩寺，仍旧想活命。其子朱由崧缒城逃走，日后被明臣迎立南京，即"弘光政权"。

很快，朱常洵就被农民军寻迹捕获，押回城内。福王见了李自成后，立刻趴在地上叩头，哀乞饶命。

李自成看到堂下跪着哭喊饶命的朱常洵，他灵机一动，让手下人把朱常洵绑上，剥光洗净，又从后园弄出几头鹿宰杀了，与福王同在一条巨锅里共煮，名为"福禄宴"，与将士们共享。

农民军中有几个大厨子出身的兵卒持刀上前，先把福王身上的毛发刮干净，然后拔去指甲，又用药水灌肠排去粪便，里里外外弄干净之后，把他放入大锅中慢炖，笑看他在白汤佐料间上下翻滚。

一个时辰过后，煮得烂熟的福王朱常洵以及数只梅花鹿已经被几千名兵士吃入腹内，成为大家的美味晚餐。

事后，李自成手下搬运福王府中的金银财宝和粮食，数千人人拉车载，数日不绝。

第十三节 "朱三太子"疑案

崇祯皇帝和一后二妃共生育了七子六女，到"甲申之变"时尚有三子二女。16岁的太子朱慈烺、13岁的三子定王朱慈灿和12岁的四子永王朱慈焕乔装改扮后被送出宫去。

护送太监将三位皇子献于李自成，李自成很大度地封太子朱慈烺为宋王，朱慈灿和朱慈焕也被封为公爵。从王朝更替的角度看，三位皇子无疑是非常

重要的战利品，对安抚民心，招降明朝官员都能起到积极作用。但大顺政权在北京的一个月中多次发现传单，称“东宫已称帝，灭贼有期”，太子朱慈烺的名号俨然已经成为反对大顺政权的旗帜。

1644年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大军征讨吴三桂。李自成在军中除了带着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之外，还带上了三位皇子，显然将他们作为要挟吴三桂的人质。大顺军惨败于一片石，吴三桂发出檄文，要求归还三位皇子，却只字不提父亲吴襄。可见当时太子政治价值之大。

四月三十日，大顺军撤出北京，其后兵败如山倒，在庆都、真定两次大败，元气大伤。民间都认为太子死于乱军之中，但实际上三兄弟居然分别逃脱出来。太子朱慈烺一路乞讨回到北京，意欲投奔外祖父周奎，不想被拒之门外，旋即被捕获。

十二月初，多尔衮命令周奎带着长平公主和见过太子的大臣来辨认，周奎一口咬定太子是假的。长平公主开始说是真的，被周奎打了几记耳光后便不敢再开口了。太子身边的几个太监都说太子是真的，大臣们却异口同声说太子是假冒的。甚至连太子的老师、内阁大学士谢升也信誓旦旦说太子是假的。

山东东阿地主祁八联合秀才杨凤鸣等人聚集千人起义，一举攻占东阿县城，给清政府发出通牒，要求归还太子。此次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从此多尔衮对凡是坚持太子是真的人一律处死，其后朱慈烺也被处斩。高压之下，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南明弘光元年，北京的太子事件刚刚平息下来，南京又冒出来一个“太子”，事情更加曲折，风波之烈，甚至直接影响了南明政权的存亡。

三月初，前明鸿胪寺少卿高梦玘在从北京到南京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少年，少年自称是东宫太子朱慈烺。高梦玘没见过太子的面貌，听此人大谈宫中往事，难辨真伪。弘光帝朱由崧大为吃惊，太子来到南京，自己的皇位如何维持下去？刚听到这个消息，朱由崧就令马士英协同大学士王铎、蔡亦琛以及皇亲国戚会同九卿科道的官员去辨别该少年真伪。南明的大臣中只有刘宗政和李景琏两个翰林远远地见过太子，都觉得这个少年比太子朱慈烺要矮一些。朝臣们顿起疑心，向少年问了一些宫中内情，回答也多有谬误。

一番审讯之后，原来这个少年名叫王之明，是万历朝驸马王昺的侄孙，家住保定府高阳县，听说太子下落不明，就突发奇想假冒太子之名希冀富贵，那些宫中见闻多半是听家里老人和父亲在朝为官时的朋友说的，还有一些则是

道听途说。

此事在民间传得沸沸扬扬，弘光帝朱由崧特意把审讯记录刊刻出来颁行天下，以正视听。但民间和各地官员早对朱由崧的横征暴敛极为不满，一些手握重兵早已蜕变成军阀的驻镇大将出于各自的目的，认定朱由崧故意以真为伪，屈打成招，大逆不道。朱由崧只得把王之明关在狱中，期望慢慢解释，以安抚各军队首领。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多铎大军攻到了长江北岸，此时驻扎在武昌的左良玉自称奉了“太子朱慈烺”的密诏，借口救护“太子”，率 20 万大军顺长江东下，要攻入南京诛杀奸贼以清君侧。弘光政权顷刻瓦解。五月初十，朱由崧弃城而逃，南京的一些百姓拥着王之明到南明故宫的武英殿即位登基，希望他能率领南京军民抵挡住清军。王之明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居然是要选秀女，到五月十五日城破，王之明死于清军的刀下。

引起全国轰动的“朱三太子”案发生在顺治十六年，当时一伙江湖无赖以朱三太子朱慈灿的名义几乎骗遍了大半个中国。这伙骗子分工明确，开口就能让人平步青云做清朝的官，而且大多是盐道、粮道、工部、吏部等肥缺，半年间骗了七万余两银子，朝野轰动。

康熙十二年(1673 年)，吴三桂叛清，落第秀才杨起隆自称“朱三太子”密谋在北京起事，成为仅次于“三藩”首领人物的特级通缉犯，被称之为“朱三太子案”。

康熙十八年(1681 年)，清朝定远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在湖南新化抓获一名还俗僧人，自称崇祯之子定王朱慈灿。此人不仅知道朱慈灿，而且还知道朱慈焕和太子朱慈烺以及夭折的几个皇子的名字和排序。反复强调自己是定王，并非太子，不能僭越太子名号。对于他的皇子身份真伪问题，康熙轻描淡写的推测道：“那时朱慈灿年纪很小，在乱军中不可能逃出。”无疑是否定了。

崇祯帝幼子永王朱慈焕竟然奇迹般地幸存下来。朱慈焕不仅尚在人世，还繁衍出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

“甲申之变”后，朱慈焕流落到安徽凤阳时偶遇一位姓王的明朝给事中，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王给事收养了他。王给事为了掩人耳目，按照凤阳王姓的家谱给他取名为王士元，让他随同自己的几个子弟读书。朱慈焕 19 岁时，王家突遭变故，朱慈焕再度流落江湖。几年后，他娶了胡姓女子为妻，落户浙江余姚，在家开设私塾。

朱慈焕曾隐约对密友透露出其非同一般的出身，这个爆炸性的消息更大范围流传开来。浙东有位念一和尚，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在大岚山起事，凭此传闻号称自己拥戴着崇祯之子。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念一和尚被捕。四月，在山东汶上县躲避了两年多的朱慈焕被官府抓住，朱慈焕矢口否认参与谋反。

同年九月，五位大学士在审讯后结案，由张廷玉书上奏称："王士元自认崇祯第四子，查崇祯第四子已于崇祯十四年身故，又遵旨传唤明代老太监，俱不认识。王士元明系假冒，其父子俱应凌迟处死。"康熙帝为了显示他的宽仁，特旨改凌迟处死为斩立决。

至此，崇祯的子孙俱已不在人世，再也不能被人奉为反清的旗帜了，民间再也没有"朱三太子"统领大军的消息了。

第十三章　南明政权

第一节　弘光帝朱由菘

朱由菘，是福王朱常洵的长子。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杀朱常洵时，朱由菘逃脱而流落江淮。崇祯十六年(1643年)，朱由菘袭封福王。清兵入关后，朱由菘又逃至江苏淮安。1644年5月，朱由菘被凤阳总督马士英和总兵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人在南京拥立为帝，改年号为弘光，建立了南明第一个政权。

南明的控制区最大时包括黄河下游以南、今京广线黄河长江间段以东、武昌上游的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其人力、物力、资源是当时中国境内四个政权(大清、南明、大顺、大西)中最丰富的。它的统治却是最腐朽的。

朱由菘称帝后，与农民军为敌，幻想与清军议和。他昏庸而不理朝政，沉湎于酒色中，还强征民女入宫，将大权委于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排斥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

由于弘光帝在其内部的党争中偏向马士英、阮大铖等佞臣宦官，对外又不作防御清军的准备，这直接导致了南明政权的失败。

以朱由崧为首的统治集团醉生梦死于危急存亡之时。朱由崧在做世子时便以荒淫出名，此时在马士英等人的怂恿下更是忙于兴营造、选淑女、配春方，穷奢极欲，不问政事。执政的马士英集团则卖官卖爵，贪污纳贿，横征暴敛。朱由崧即位时，曾许诺豁免练饷，裁汰漕粮中各种加派，取消崇祯十四年(1641年)后各项积欠钱粮等，但实际上一项也未实行。不但三饷加派未减，而且继续加税，百计搜刮，民不聊生。

1645年，弘光朝廷内又闹起了“三疑案”，即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

大悲是个和尚，俗家姓朱，潞王信佛，曾和他认作本家。由于东林党人曾想立潞王为帝，所以弘光帝对潞王一直严加防范，害怕他夺了自己的帝位。此

时大悲和尚来到南京，弘光帝怀疑他是来为潞王刺探情报的，便将他下狱，定成死罪。这就是大悲案。

有一个自称是崇祯太子朱慈烺的年轻人，从北方来到南京，弘光帝怕自己的宝座被他夺去，于是就匆匆定他是假太子，投入狱中。这就是太子案。

当年李自成攻下洛阳时，时为福王世子的朱由崧扒城逃脱，在开封与周王府侍女童氏私订终身，而今童氏千里寻夫到南京，他却坚不承认，并将童氏投入狱中折磨而死。这就是童妃案。

这"三疑案"闹得满城风雨，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尤其是太子案，加速了弘光政权的灭亡。

当时镇守南京上游的左良玉，早年是东林党人侯恂一手提拔起来的，跟东林党人的关系很好，与马、阮等阉党和弘光帝相互猜疑，太子案为左良玉提供了一个借口，于是他便以清君侧的名义浮江东下。与此同时，清豫亲王多铎率领的清军在进占西安，击败李自成农民军之后，正横扫中原，直扑江北，进抵淮河一线。此时的弘光帝与马士英等人却命令江北防线的明军回师攻打左良玉，以致江北防线大开，不战自乱。

弘光政权以"北连虏、西灭闯，则恢复之势成"为基本国策。为此，史可法等人曾一再致书清廷，要求与清廷联合消灭农民军。当时弘光政权内部一致认为，为了消灭农民军，必须割让统治权益，只是在价码上有争议：有人认为可以两淮为界，有人则主张"当界河间"；有人认为弘光帝应该当儿皇帝，有人则认为弘光帝应做清帝的侄儿。最后，弘光政权决定先试当清帝侄儿，于是在七月下旬派左懋第、陈洪范、马绍愉为使臣，出使北京，要求与清帝结为叔侄之君，同心杀灭逆贼。然而清廷却不认这个侄儿，把送来的礼物收下后，只丢下一句话："无多言，我国不日发兵下江南"。使团在北京受尽屈辱，首席使臣左懋第和马绍愉等人被扣押，只有陈洪范因降清愿为内应，才被放回。清廷之所以如此蛮横，完全是看透了弘光政权的软弱无能。

1645 年 5 月，清豫亲王多铎率清军血洗扬州后渡江直扑南京。警报传来，朱由崧还在饮酒作乐。他慌忙收拾行装，于 10 日深夜携爱妃暗暗从通济门出走，弃城逃至芜湖黄得功军中。第二天，清军追到，朱由崧与爱妃避入黄得功船中。两军展开了水战，黄得功被箭射死，部将田维乘机反叛，捆绑了朱由崧及其爱妃送予清军邀功。5 月 25 日，朱由崧被押回南京。9 月，朱由崧被押送到北京。第二年，朱由崧被杀于北京宣武门外的柴市。

第二节　永历帝朱由榔

朱由榔，是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桂王朱常瀛之子，袭封桂王，崇祯年间受封永明王。清兵入关后，朱由榔流徙广西，居于梧州。1646年1月，受丁楚魁、吕大器、陈子壮等人拥为监国，接着在广东肇庆称帝，建年号为永历。

此时，唐王弟朱聿粤则在广州称帝，建元绍武。在关键时刻，永历政权和绍武政权为争正统地位而互相攻伐。绍武政权仅存在40天就被清军消灭，朱由榔也在清军进逼下逃往广西，颠沛流离，处境极为险恶。此时永历政权开始与大顺军余部协同抗清。

李自成死后，他的余部分为两支，分别由郝摇旗、刘体纯和李过、高一功率领，先后进入湖南，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联合抗清。1647年，郝摇旗部护卫逃来广西的桂王居柳州，并出击桂林。年底，大败清军于全州，进入湖南。次年，大顺军余部又同何腾蛟、瞿式耜的部队一起在湖南接连取得胜利，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这时，广东、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再起，在江西的降清将领金声桓和在广州的降清将领李成栋先后反正，清军后方的抗清力量也发动了广泛的攻势。一时间，永历政权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七省。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一次抗清斗争的高潮。

1649—1650年，大顺军将领何腾蛟、瞿式耜先后在湘潭、桂林的战役中被俘牺牲，清军重新占领了湖南、广西；其他刚刚收复的失地也相继丢掉了。不久，李过病亡，其子李来亨同其他农民军将领率部脱离南明永历政权，独立抗清。

1652年，走投无路的朱由榔接受张献忠的大西军余部孙可望、李定国联合抗清建议，在贵州安隆所投靠了农民军。此时，孙可望、李定国已据有云南全境。这一年，李定国发动反攻，率军8万东出广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广东，使驻守桂林的清定南王孔有德战败自杀；随后又在衡州杀清军统帅敬谨亲王尼堪。同时，刘文秀也出击四川，克复川南。东南沿海的张煌言等的抗清军队也发动攻势，并接受了永历封号。抗清斗争再次出现高潮。

不幸的是，此时因孙可望妒忌李定国功高势大，阴谋杀李。李定国避往广

东，希望与郑成功会师，收复广州，但战斗失利，实力大损。他撤到贵州，接走了被孙可望劫持的永历帝，1656 年，李定国拥桂王回师云南。1657 年，孙可望率军征讨李定国。孙可望兵力虽多，但骄横妒功，军心不附，最终阵前倒戈，被李定国所败。1658 年，孙可望部降清，贵州、广西均被清军占领，使朱由榔失尽了地盘。1659 年，清兵三路追逼，朱由榔于 12 月逃入缅甸境内，被缅甸人解除武装后安置于草房之中，十分困辱。李定国曾多次交涉，欲迎他回云南，均遭缅甸国王拒绝。

1662 年，吴三桂进兵缅甸，向缅甸国王索取朱由榔，缅甸国王无力与吴三桂对抗，只得答应吴三桂的请求。缅甸国王发兵三千围住朱由榔的住所，假称要与朱由榔盟誓，要他的随从出屋饮咒水。他的随从一个个被杀，共死 42 人。缅甸国王派兵士把朱由榔送到吴三桂军营。吴三桂将他押回云南，拘禁于昆明。吴三桂担心如将他押送北京，中途有被反清人士劫夺的危险。经清廷批准，吴三桂于 4 月 14 日将朱由榔及其眷属 25 人押到昆明篦子坡绞死。

第三节　绍武帝朱聿𨮁

朱聿𨮁，其兄朱聿键于 1646 年 8 月被清军俘后，他便从福州逃奔广州。同年 11 月，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与顾元镜、林察等人拥立他为帝，改年号为绍武。

朱聿𨮁即位时竟还大讲排场。为了准备宫殿、衣冠、卤簿而骚扰百姓，并下令家家都要张灯结彩，夜如白昼。在即位后的 10 天之内，他就任命了几千个官吏，要他们都穿着朝服进宫参见。官吏们没有朝服，只得借戏装代用，被时人传为笑话。

朱聿𨮁一登上帝位，就和同月称帝于广东肇庆的桂王争夺正统地位而攻战不已。他又收编各路海盗，以图充实力。潮州有个无赖叫杨明亮，到广州来吹嘘说他在潮州、惠州一带有 10 万精兵，朱聿𨮁竟然封他为潮惠巡抚，将当地全部官吏的任免权都授予他，还发给他官印。杨明亮回乡后就一手收钱，一手交货，拍卖官职。

同年 12 月，清将李成栋乘唐、桂两王自相残杀的机会，从福建攻入广东潮、惠地区。当地用钱买来职位的官吏纷纷降清，李成栋命令他们仍然按时向

广州朱聿𨮁报告民情,使朱聿𨮁还不知潮、惠地区已经落入清军之手。接着,李成栋挥军进攻广州。12 月 25 日,朱聿𨮁正准备由苏观生陪同去检查军队的训练情况时,突然接到报告说清军已经逼近城门口,苏观生还大骂报告的人胡说八道。清兵杀入城门,朱聿𨮁的主力部队因调去和桂王作战,无力抵抗,只得慌忙逃到大臣王应华宅第躲避。事中梁烘为了降清而骗苏观生自缢后,又自告奋勇带领清兵闯入王应华宅第,搜得朱聿𨮁,关押于东察院。清兵送来饭食,朱聿𨮁说如果我饮你们一滴水,怎么去见地下的祖先,坚决绝食。当天晚上,朱聿𨮁趁守兵不防备,他解下腰带自缢而死。他死后,在广州的明朝皇族 24 人均被清兵捕杀。

朱聿𨮁虽然不是一个好皇帝,在被俘后却表现出了一定的气节。

第四节　鲁王朱以海

朱以海,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鲁王朱檀九世孙,于 1644 年袭封为鲁王。清兵入关之后,朱以海流徙台州(今浙江省临海县)。

1645 年闰六月十二日,故明刑部员外郎钱肃乐于宁波起兵,与定海总兵王之仁结盟抗清,并遣举人张煌言赴台州迎鲁王朱以海监国。二十八日,朱以海于绍兴监国,以抗清相号召。当时南下的清军已于六月占领杭州,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奉调回京,该部由勒克德浑统率。由于清廷强制剃发,浙东军民抗清日炽。鲁王政权主要拥有张国维、方国安、王之仁、钱肃乐等部武装,包括大量的水师,布置于钱塘江南岸。八月,鲁监国大学士张国维连克富阳(今属浙江)、於潜(今浙江临安西紫溪东岸)。鲁王朱以海赐上方剑,令张国维总领诸军。九月初二日,镇东侯方国安、武宁侯王之仁率部从富阳进攻杭州,被清军击败。十月十四日,张国维出师钱塘,会同钱肃乐等部合攻杭州,于城郊连战十日,获小胜。清将勒克德浑急率兵援杭州,明军遂退。

1646 年三月,王之仁率舟师在钱塘江大败清军,乘胜进围杭州,但没攻克杭州,于是撤军。五月二十日,清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率部到达杭州,陈兵钱塘江北岸。当时鲁王诸军连绵 100 多千米,舣舟江上以待。清军没有船,不能渡钱塘江。二十七日,清军攻打富阳,北蜂山南明守将潘茂斌等人败走,清军以数百骑尾随其后,骑马渡江。这天晚上,方国安部的 10 万兵马不战而退,来

到绍兴之后，与马士英、阮大铖携朱以海南行。次日，江上南明诸师闻讯俱溃败。兵部尚书黄宗羲等集兵三千打算进入太湖，当行至乍浦时，听到江上南明诸师溃败的消息后，兵也散去，黄宗羲率余众500人结寨于四明山，继续抗清。六月初一日，清军大部渡过钱塘江，初二日入绍兴。鲁王朱以海自台州出海，命张国维防遏四邑，以图后举。张国维守东阳，知道大势已去，于是投水而死。马士英、阮大铖等人降清。七月，清军接连攻破义乌、东阳、金华、衢州、严州，迅速平定了浙东。朱以海逃奔舟山，鲁王政权名存实亡。守御浙闽交界仙霞岭的南明将领郑芝龙以防备海寇为由，将兵全部撤回福建晋江安平镇。八月，清军攻克建宁（今福建建瓯市），遂进兵福建。

1647年，鲁王朱以海进入福建，继续以抗清相号召。二月，鲁王部从先后攻克海澄（今福建龙海）、漳浦，不久又被清军攻占。七月，鲁王朱以海亲征，到达长垣，与郑彩、周瑞、周崖芝、阮进诸师会合攻福州，但未成功。八月，鲁王朱以海遣兵攻连江（今属福建）。

1648年正月，鲁王朱以海乘船到达琅岐屿（今福建连江与长乐间海上），其部将杨耿攻占兴化（今福建莆田）。至三月，鲁王朱以海所部收复福建3府1州27县。清廷调两广、江、浙清军三路进讨。至七月，鲁王朱以海仅余宁德、福安2县。

1649年四月，清将陈泰底平定福建全境，郑彩率军而逃，张名振、阮进护鲁王逃往浙江南田（今牛头山）。此后，鲁王朱以海就在浙江沿海漂泊。六月，张名振率军自南田收复健跳所（今属浙江临海）迎鲁王在此居住。九月，张名振等人袭杀南明隆武政权将领黄斌卿，夺取舟山，并让鲁王过去居住。

1650年十月，清浙闽总督陈锦攻打四明山等山寨抗清武装，张煌言、王翊等人败走舟山。

1651年，舟山被清兵攻陷，朱以海在张名振、张煌言的陪同下，取消监国名义，赴厦门依靠郑成功。郑成功念朱以海是明朝宗室，还是以礼相待，安排他居住于金门。

1662年，朱以海要重返南澳岛发展力量，引起郑成功的不满，郑成功派人将他沉杀于海中。

第五节 隆武帝朱聿键

崇祯末年，国家多难，朱聿键报国心切，不顾“藩王不掌兵”的国规，率兵从南阳北上，中途和李自成军交手，双方互有胜负。虽然朱聿键动机纯粹，仍使崇祯帝大怒，派锦衣卫把他关进了凤阳皇室监狱。

崇祯帝自杀后，弘光帝继位，朱聿键才被放出来，但已经被关押了八年多。弘光朝并未恢复他的王爵，责其往广西平乐府居住。朱聿键刚刚走到杭州，弘光朝就灭亡了。潞王在众人推戴下于杭州自称“监国”，三天后，清军杀到，潞王朱常芳与属下没做任何抵抗，就向清军献城投降了。

此前一天，朱聿键已离开杭州。潞王被俘的消息传来，黄道周等明臣劝朱聿键监国。在郑芝龙家族的拥护下，朱聿键在建宁（今福建建瓯）称监国，20天后，他又在福州正式称帝，改元隆武。

由于朱聿键身世坎坷，隆武帝善于抚慰群臣，乐于纳谏，甚至同意招纳大顺军余部，以共同抵抗清军。同时，针对南明军杀害剃发的平民一事，他也予以阻止。“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的谕旨使得一般百姓纷纷来投。

隆武帝一直被郑氏集团架空。以郑芝龙、郑鸿逵、郑芝豹、郑彩为首的郑氏家族，都是大海盗头子出身，数十年横行福建、广东、浙江一带沿海，兼商兼盗。崇祯初年，郑氏集团受招安后，趁天下大乱之际一直忙于扩大地盘，充实实力。郑芝龙等人推举隆武帝，其实是看上了他“奇货可居”，朝中一切实权都掌握在郑家手里。

郑氏家族不仅对隆武帝傲慢无礼，还卖官鬻爵，大肆搜刮百姓，横毒凶暴甚至超过弘光朝的马士英，以至于受害者盼望清兵早日到来。由于当时鲁王朱以海在绍兴也称监国，使得隆武帝三面受困，一是受制于郑氏家族，二是要防鲁王军队，三是李成栋率领的节节逼近的清军。无奈之下，隆武帝声言要亲自北伐，以挽回颓势，但总领大军的郑芝龙却不理会他。60岁的黄道周带数名门生故吏，一路招至九千多人，北上抗清，最终被清军俘获，慷慨就义。愤懑之下，隆武帝不顾郑氏阻拦，携数千明兵“御驾亲征”。而平日在海口作威作福的郑彩等人忽然舍弃新城（今江西黎川）而逃。郑芝龙早已暗中与清兵约降，福建各关隘均无人把守。

李成栋的清军在浙江先后攻下绍兴、东阳、金华、平州，很快攻陷了仙霞关。隆武帝奔逃湖南不成，又取道汀州去江西，此时的“御驾亲征”变成了“御驾亲逃”。

隆武帝到达汀州的次日凌晨，有大队身穿明军军服的人敲汀州城门，声言护驾。守门士兵不知是计，城门一开，原来门外都是李成栋派出化装为明军的清军。隆武帝闻乱惊起，持刀刚入府堂，就被清军乱箭射杀，同时遇难的还有其皇后曾氏和不满月的皇子。

第六节　南明皇帝向罗马教皇求援始末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一些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亲历了中国的改朝换代。

1649 年，南明永历皇帝在清军向西南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定派使节向罗马教皇求援，西洋在华传教士卜弥格被委派为全权特使。为了使欧洲更为直观地了解南明朝廷，司礼太监庞无寿特命年轻官员陈安德携带永历帝的亲笔信函与卜弥格同行，陈安德遂成为第一个赴欧洲的“中国外交官”。

历尽千难万险，他们于 1652 年 12 月来到了威尼斯。起先，威尼斯共和国总督弗朗西斯科·莫林拒绝接见“南明使臣”，他想在中国明清交战双方之间保持中立。卜弥格设法求法国大使帮忙，终于得以见面，卜弥格和陈安德就将信件递交给了弗朗西斯科·莫林。然而，法国人的介入使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世产生了反感，新当选的耶稣会总长古斯维斯·尼克尔又认为接受“南明使臣”的要求将会危及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这使得卜弥格和陈安德在意大利一等就是三年。在此期间，罗马教廷三次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对“南明使臣”。

1655 年 12 月，对卜弥格和陈安德持消极态度的英诺森十世去世，新任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接见了卜弥格和陈安德。亚历山大七世虽然同情南明和永历皇帝的艰难处境，但他表示提供不了实际帮助，只写了封回信让“南明使臣”带回中国，在信中他祈祷南明能渡过难关。教皇的回信使卜弥格和陈安德在欧洲有了活动空间，他们来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觐见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约翰四世答应给予南明军事援助。

1656年3月，卜弥格和陈安德踏上了回程。当他们到达印度果阿时，获知南明永历政权已岌岌可危。虽然约翰四世三令五申不得为难“南明使臣”，但葡萄牙殖民当局还是不允许他们前往澳门，葡萄牙殖民者此举是为了确保与清政府的贸易不受影响。卜弥格和陈安德再度不顾葡萄牙殖民者的禁令，从陆路抵达暹罗(今泰国)首都大城府。在那里，他们从海盗手里雇用了一艘船前往如今的越南北部，此时已是1658年初。他们徘徊于中国边境，卜弥格于1659年去世，陈安德将其安葬后独自一人带着几封重要的外交信函返回云南向永历帝复命。

永历帝最终没有盼来欧洲的援助，他于1662年被吴三桂俘获并处死，而中国第一位“外交官”陈安德于1659年后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第七节　史可法死因之谜

史可法，祖籍顺天府(今北京)大兴，1602年(万历三十年)生于河南祥符(今开封)，崇祯元年(1628年)中进士，初任西安府推官。崇祯五年(1632年)，史可法升任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右参议。崇祯十年(1637年)，史可法因与农民起义军作战立下功绩，加官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四府，治皖颇多惠政。崇祯十二年(1639年)，史可法出任户部右侍郎，总督漕运，兼抚凤阳、淮安、扬州，漕政有起色。崇祯十六年(1643年)，史可法被擢升为南京兵部尚书。

许多人将南明政权瓦解的源头指向马士英和阮大铖。其实，倘若不是史可法在决策上的重大失误，马士英和阮大铖是难以实现其阴谋的。

史可法出任兵部尚书时，北京已经失陷，崇祯皇帝自杀，册立新君成为当务之急。崇祯的三个儿子都没能逃出北京，可选者只有散居在各地的藩王。

几位藩王当中，以血缘关系看，崇祯帝的祖父明神宗的直系子孙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最有资格当选。但桂、惠二王均在广西，距南京较远，且均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福王以兄弟关系继统妥当。除此之外，神宗的侄子潞王朱常淓也因避乱逃到了淮安，卷入拥立新君的政治风波中。

按伦理，福王即位是顺理成章的，可是，由于福王朱由崧牵涉到党祸问题，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担心一旦朱由崧登基，重翻旧案，东林党人将再次受

到打击，因此倾向于拥立潞王朱常淓。其实，他们还有另一层用意：潞王本不当立，此时努力使其当选，日后自己必会受到重用。

主持大局的兵部尚书史可法在感情上倾向于东林党人，但在思想上又力主按伦序迎立福王朱由崧，并试图说服东林党人："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此言论一出，拥立潞王者大哗，史可法因此对拥立福王之事"引避不言矣"。

当时势需要史可法做出决策时，他有点犹疑，试图寻求折中的方式，前往浦口，同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议，决定拥立远在广西的桂王。史可法对自己两全其美的决策似乎很满意，既避开了矛盾的焦点，又使南京的官绅没有意见，而且又借凤阳总督马士英获取军队方面的支持。但他没有想到，马士英另有算盘，很快便背弃约定，转而成了拥立福王的领军人物，并组织了一个"拥福"势力，而史可法全然不知。

福王即位后，党争重新加剧，新朝一片混乱……

纵然不能把弘光政权瓦解的责任全推在史可法身上，但无论如何，名臣史可法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清军攻破南明的江北重镇扬州城，守卫扬州的南明督师史可法以身殉国，史称"乙酉之变"。

关于史可法之死，有多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扬州城破时，史可法自刎而死。此种说法见于计六奇的《明季南略》。书中记载，同时自刎的还有很多人，如原兵部尚书张伯鲸被清兵所俘，不肯投降，身上多处负伤，也自刎而死。

第二种说法认为，史可法在城破后，自投清营而死。此说法见于王士祯的《池北偶谈》。史可法自投清营而死，显然是为了自己的名节不被埋没，也合乎情理。

第三种说法认为，史可法死于乱兵之中。此说法见于《明季南略》，书中说，清兵伪装成明军骗取史可法打开西门，入城后大肆屠城，史可法在无奈之下，出北门南走，死于乱军中。《清实录》的记载也与此说相似。

第四种说法认为，史可法自刎不成，死于小东门清兵之手。此说法见于《明史》的记载，古藏室史臣《弘光实录钞》也持此说。

第五种说法认为，史可法被清兵杀死于南门。如《史可法别传》记载，当扬州城破时，史可法见大势已去，与部将史德威等诀别。史可法引颈让庄子固动

手，但是庄子固不忍举刀。情急之下，史可法拔刀自刎，庄子固等人一起抱住史可法，使他血溅衣衫而气未断绝。这时史可法命令史德威再给他一刃，但史德威只是哭泣，不愿动手。接着众人拥史可法下城，来到小东门，不料东门已被清兵所破，只好折回走南门。结果被一个名叫张鹰的人把史可法送交给清豫王多铎。多铎劝降，史可法不从，遂在南门被杀。

第六种说法认为，多铎将史可法尸裂于新城。戴名世所著的《扬州城守纪略》中说，扬州城破后，史可法自杀不成，被部将拥至小东门，正好遇到清兵。清兵将他押到新城楼见豫王。因为史可法不肯投降，豫王就悍然将他尸裂。

第七种说法认为，扬州城破后，史可法缒城逃亡。《甲乙史》中说，清军渡过淮河之后，当天晚上就大破扬州新城，肆意屠杀。此时史可法守卫在扬州旧城，收到清兵劝降书，不为所动。清军故意传出假消息说有明军来援，史可法误以为真。因为清军已经占领东门，史可法就打开西门迎接，不料进城的却是伪装成明军的清军，一进城就大开杀戒。史可法遂同总兵刘肇基缒城潜舟去。第八种说法认为，扬州城破之后，史可法骑白骡从南门逃生。根据乾隆《江都县志》的记载，康熙初年，有扬州人贩茶过安徽桐城，夜宿村中，遇见一位老者非常魁梧，对于史可法的下落知之甚详。据这位老者说，城破后，史可法乘坐骑从南门逃出，不到5千米路，被游兵散勇所伤，后即不知所终。

第八种说法认为，史可法逃亡后，沉水而死。传说史可法出城后，骑马渡河，因马蹶落水溺死；或说他出东门遇清兵堵截，自觉无望，即赴水自尽。

第九种说法认为，史可法在城破后突破重围，与清兵决战而死。此种说法见于张岱的《石匮书后集》。

史可法到底是怎样死的？这个牵动人心的问题，在他死后300多年仍是一个难解的谜。

第八节　大海盗郑芝龙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郑芝龙出生在南安石井一个小官吏家庭，原名一官，字飞黄，后改芝龙。

郑芝龙在17岁时，因家庭生计艰难，与其弟芝虎、芝豹到当时的广东香山澳(今澳门)投靠舅父黄程。黄程是个海商，在澳门从事海外贸易。他留下郑

芝龙在身边做帮手，协助商务。郑芝龙学会了经商贸易，到过马尼拉，并学会了卢西塔语和葡萄牙文。

黄程见郑芝龙能干，于天启三年(1623年)派郑芝龙押送一批白糖、奇楠、麝香、鹿皮等货物，从香山澳放洋远赴日本，侨居长崎。郑芝龙后来成为当时最有势力的海商李旦的部下，帮助李旦做生意。李旦资本雄厚，拥有一支船队，专门从事海外贸易，是当地华侨的首领。李旦觉得郑芝龙能干可靠，交给一部分资产和船只让他到越南做生意，竟获得了大利。短短几年，郑芝龙成为巨贾，常往来中国、日本之间，居日的华侨都推崇他。

郑芝龙以华侨领袖的身份，会见了日本幕府大将军德川家康。郑芝龙受幕府召见，被日本人视为光荣显赫人物，地方豪贵常与他交往。

后来，郑芝龙迎娶田川昱皇之女田川松为妻。田川松天启四年(1624年)生长子郑成功，崇祯二年(1629年)生次子七左卫门。

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人占领澎湖，李旦居中斡旋，说服荷兰人退出，转移台湾。

明天启四年(1624年)1月底，郑芝龙被李旦派到澎湖，担任荷兰人的翻译。但荷兰人这时正与明军进行军事对峙，双方没有交往，中国商人也不可能与荷兰人交易，故郑芝龙的通事派不上用场。

荷兰人为了垄断对日贸易，指使一些中国海盗船只在中国沿海掠夺，郑芝龙也是与荷兰人合作的海贼之一，为荷兰人执行在台湾海峡上截击前去马尼拉的中国帆船的海盗任务。

天启五年(1625年)夏秋之交，荷兰人在明军的压力下撤出澎湖，转移到台湾大员(今台南安平)，在台湾建筑“热兰遮”和“赤崁城”两个要塞，侵占了台湾南部地区。同年，荷兰人打败西班牙人，独占了整个台湾。

在随荷兰人在大员立定根基后不久，郑芝龙就奉荷兰人之命率领几艘中国帆船袭击前去马尼拉与西班牙人通商的中国船只，直到天启五年(1625年)的3月20日才回到大员。

天启五年(1625年)四、五月间，郑芝龙离开荷兰人，开始了亦商亦盗的海上生涯。天启五年(1625年)4月底，他已经带着手下活跃在台湾海峡了。

8月12日，李旦在平户去世。李旦死后，他在台湾的产业和事业都归郑芝龙所有，为郑芝龙合并当时台湾的其他汉人武装势力及从大陆招收新的势力到台创造了条件。

郑芝龙自立门户之后，从福建招来了郑兴、郑明、杨耿、陈晖、郑彩等部将。郑芝龙继续拓垦大业，势力不断壮大，成为当时海上最大的武装集团。

1626—1627年，闽南发生严重旱灾。二月，郑芝龙利用此机会，自率船队袭击福建漳浦，劫掠金门、中左所(今厦门)和广东靖海、甲子等地，不久又回师福建，再犯厦门，袭铜山(东山)，陷旧镇，击败金门游击卢毓英、福建总兵官俞咨皋的进剿，纵横东南海上，声势所向披靡，官兵疲于奔命，无可奈何。奔袭中，郑芝龙等还招抚了泉州饥民数万人赴台拓垦，沿海饥民及无业者竞往投靠，使厦门从此成为郑氏的地盘。

郑芝龙海上势力的日益扩张强盛，引起明朝统治者的恐惧，多次派兵追剿，但均失败。

崇祯皇帝即位后，于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招抚郑芝龙。九月，郑芝龙就抚于福建巡抚熊文灿，率部降明，诏授海防游击，任“五虎游击将军”，离开他多年经营的海上贸易根据地台湾，坐镇闽海。此时，郑芝龙有部众3万余人，船只千余艘。

郑芝龙受明朝招抚后，原先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刘香一股势力心有不甘，拉到广东，继续其海上劫掠营生。刘香势力与荷兰人勾结，在一段时间内对郑芝龙造成很大威胁。

崇祯五年(1632年)12月4日，郑芝龙与刘香的船队在福州附近遭遇，双方各死伤千人，刘香本人向南逃逸而去。崇祯六年(1633年)7月，新任荷兰台湾长官普特曼斯在刘香的帮助下，派出八艘战舰对刚刚追剿刘香回到厦门毫无戒备的郑芝龙部和明朝官兵发动突袭。击沉、烧毁和损毁港内郑芝龙和明朝官兵的20多艘战船。9月，普特曼斯与刘香在台湾的大员汇合，准备再度进攻郑芝龙。10月22日，由郑芝龙带领，明军150艘左右的帆船在金门料罗湾追上荷兰大船9艘、刘香船50多艘。郑芝龙使用铁钩钩住敌船纵火焚烧战术，共焚毁荷兰快艇1艘，并捕获另一艘快艇。刘香临阵败逃，普特曼斯狼狈退回台湾。经此一役，郑芝龙声势大振。

崇祯八年(1635年)5月23日，郑芝龙在广东田尾洋击溃刘香海上武装集团，刘香引火自尽。刘香死后，台湾海峡恢复安宁，原来害怕海贼伏击的中国商船开始源源驶向台湾。

崇祯十三年(1640年)，明朝廷擢升郑芝龙为福建总兵官，署都督同知。

郑芝龙率部在扫清海上障碍之后，又利用泉州安平镇的航海和经商基地，

打破官方的海禁,武装船队航行于中国沿海、中国台湾、中国澳门和日本、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地之间,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势和财力,扩大海上贸易,几乎垄断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贸易。

崇祯帝自缢煤山之后,1645 年闰六月,郑芝龙、郑鸿逵与福建巡抚张肯堂、巡按御史吴春枝、礼部尚书黄道周等人拥立唐王在福州称帝,改元隆武。郑芝龙受封平虏侯,掌握军政大权,随后又被晋封为平国公。八月,隆武帝诏赐,晋封平国公郑芝龙加太师。

1646 年五月,降清的明臣洪承畴写信劝郑芝龙降清。六月,清军兵分两路由仙霞关、分水关进逼福建,郑芝龙决意降清,拥兵不进。八月,郑芝龙尽撤水军回晋江安平;镇守仙霞关的郑鸿逵闻讯逃窜,清兵攻陷仙霞岭,隆武帝逃到汀州,被清军捕获,后绝食死于福京。九月十九日,清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统兵占福州。不久,清兵夺取兴化、泉、漳诸县。同月,博洛派泉州绅士郭必昌持书前往安平招抚郑芝龙,许以闽粤总督之职。郑芝龙不顾郑成功的苦谏,于十一月十五日北上福州降清。十一月三十日,清兵进劫安平,田夫人未及逃出,担心受辱,于是自缢而死,享年 45 岁。

1654 年,清政府封郑芝龙为同安侯。二月,清廷命郑芝龙派其家人李德与郑、贾二位使臣到福建招降成功。郑芝豹、郑彩皆降,只有郑成功不降。

1656 年,郑成功率军北上,攻克闽安及罗星塔,攻取连江,进攻罗源、宁德等城市,在护国岭击杀清将阿格商。清廷大震,逼迫郑芝龙差家人谢表持巡抚佟岱书到宁德见郑成功,再度相劝就抚。郑成功怒叱不理,令谢表持书返回,自是抚议永绝。

1661 年十月初三日,郑芝龙及其子孙家眷 11 人被清廷杀于北京柴市。

第九节　施琅投清内幕

施琅(1621—1696),字尊侯,号琢公,中国福建晋江龙湖衙口村人,祖籍河南固始县。

施琅很早就进入军伍,当兵为生。崇祯十六年(1627 年),施琅 23 岁,当时,其叔父施福在郑芝龙帐下已经很有影响,施琅得其推荐,很快便在郑军中占有一定位置。明末福建灾荒频频,饥民起义,遍及全省各地,郑芝龙所部在

各地镇压民众起义，施福与施琅都起了很大作用。当时，施福以善谋得到郑芝龙的信任，而施琅以勇武而冠三军。施琅因战功得授游击将军。弘光政权建立后，施福得授都督之衔，而施琅得授副总兵。

从明末到隆武时期，施氏叔侄已经逐步成为郑芝龙部的骨干，所部为郑芝龙的"中军"。由此可见，郑芝龙的主力部队是由施氏叔侄率领的。

隆武帝即位后，施福与施琅在铅山前线作战，颇有战功。隆武帝因此给施福等人加官，施福被封为武毅伯，而施琅为佥都督、左冲锋，这都是明朝武将中的高级职务。

在隆武朝，郑成功被封为御营指挥。隆武二年六月十六日之后，隆武帝将崇安的军事交给郑成功，当时郑成功已成为施福与施琅的顶头上司。

在隆武朝后期，郑成功的政治态度与郑芝龙发生对立。郑芝龙业已暗地里决定降清，而郑成功仍然忠于隆武帝。郑芝龙为了给清军入闽扫清道路，下令从前线撤军，郑成功抗命不从，仍然在杉关前线坚持到最后一刻。在郑氏父子的冲突中，施氏叔侄选择了郑芝龙，从崇安前线撤军。

隆武二年八月，清军从仙霞关及分水关分路入闽，郑成功后路被抄，从杉关前线溃退，他冲破道路上清军的封锁，东下福州。不久，郑成功再退安海。在安海，他与郑芝龙发生争论。郑芝龙不顾郑成功的反对，决定降清。在这场争论中，施氏叔侄再次站到了郑芝龙的一边。郑成功只好带少数人下海起兵。

明隆武二年(1646 年)十一月，郑芝龙在清军统帅博洛的利诱之下，赴福州降清，随后被清军扣留，送至北京软禁。而泉州的清军突袭安海，大掠而去。其后，郑芝龙的军队分作二部，一部分在郑鸿逵、郑成功及郑彩、郑联等人的率领下，转至沿海岛屿抗清；但另一部分主力却在郑芝龙带领之下降清，他们便是施福、施琅所部。被改编为清军后，施福与施琅随李成栋所部清军南下攻打广东。施福与施琅率部南下广东后，为清朝屡立战功。

在广东抗清活动风起云涌的永历元年(1647 年)，施福与施琅作为清军参加了镇压广东义军的战斗，不惜与自己昔日的袍泽作战。此时的施福甚至没有名分，还是以明朝所封的武毅伯指挥作战，施福所率闽军也未列入清军正式行列，没有正式军饷。

明永历二年(1648 年)正月，降清的金声桓、王得仁在江西南昌反清归明，三月十七日，李成栋在广州反清，施福与施琅随李成栋反清复明。于是，施福被永历改封为延平伯。

反清之后，李成栋把广东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奏请永历帝核准把施福等福建兵将遣送回籍。而与此同时，郑成功一直设法将施福军重新纳入麾下。

郑成功于隆武二年下海之后，以明朝招讨大将军为号召，郑芝龙旧部多来归附。但这一时期郑氏诸将带来的军队，作战能力很差，郑成功非常盼望施福所率的闽军回归帐下。施琅随清军南下时，嘱咐原为明朝军官的弟弟施显留在家中，在反清浪潮遍及江南的永历二年，施显率家人投入郑成功的根据地厦门。收揽施显，是郑成功招揽施福与施琅的第一步。

施福所部闽军有水陆两支，施氏叔侄与李成栋分手后，施福与施琅分率水陆两军归闽。施琅率陆军转战千里，历经险难，途中受到南明军队郝尚久的袭击，幸有郑成功在广东潮州的黄岗镇接应，施琅所部才最终脱离了危险。永历三年二月，施琅所部投入郑成功部下。永历三年十一月，施福所部也归入郑成功部下。

郑成功得到施琅这一支军队后，开始走出屡战屡败的阴影。郑成功部下敢战的名将士卒，大都来自施琅所部，郑成功从此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发展。永历三年九月，郑军在云霄大败清军守备张国柱。随后，郑成功率兵入潮州，击败潮州南洋寨的许龙、达濠寨的张礼，并攻克了和平寨、狮头寨、员山寨、和尚寮、棉湖寨等地。永历四年六月，郑成功围攻潮州的郝尚久，双方互有胜负。施琅还用其影响力将诏安县有名的万礼所部招于麾下，万礼后来成为郑成功的主要将领。

施琅在郑成功部下，最大的动作是为郑成功筹划袭击厦门郑联。郑联在名义上是郑成功的抗清同盟军。郑成功将其作为袭击对象，实为南明内部的内战。关于郑成功袭击郑联，施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郑成功在厦门袭杀郑联之后，吞并了他的部队。这样，原属于郑芝龙旗号下的海上力量基本重归郑成功管辖。而从大局来说，这些军事行动都不利于南明。

永历四年(1650年)闰十一月，郑成功传令各镇官兵南下勤王。次年正月，郑成功南下勤王之兵抵达闽粤交界处的南澳岛，左先锋施琅谏阻郑成功南下，但被郑成功拒绝了，并将其免职，令其回厦门驻守。

郑成功在明末以招讨大将军的称号号令部众，在他的部下，有来自各方面的势力，而郑成功一概授以“总兵”的称号，简称为“镇”。大的镇有数千人，小的镇只有数百人，其中以施琅、施显兄弟二镇的兵力最强。由于郑成功的信任，施氏兄弟在郑军中的权势很大。施琅于是利用这一点作威作福。

永历五年，在厦门发生了郑成功与施琅冲突的事件。此事件的起因是南明战将曾德在厦门得罪了施琅，躲入郑成功家中。施琅带兵冲入郑成功家中，将曾德捉去杀害。郑成功因此大怒，下令拘捕施琅、施显及其父施大宣。其后，施琅逃走，而施显与施大宣则被郑成功处死。施琅逃到安海之后，郑成功派刺客到安海去刺杀，施琅因无法安身，只好投奔清朝。

这次冲突事件，实际上是郑成功军队内部亲清派与拥明派的一次政治斗争。施氏家族在郑成功部队中有很大的影响，且他们又有亲清的倾向，若让施氏家族的势力发展下去，对郑成功是一大威胁。于是，郑成功借口施琅杀曾德事件，一举将施氏家族连根拔去。施琅此次成为清军将领之后，已经完全拥护清朝；而郑成功则是一心拥明。

第十节　郑成功暴亡之谜

1661 年三月，郑成功派他儿子郑经带领一部分军队留守厦门，自己亲率 2.5 万名将士，分乘几百艘战船从金门出发，大军越过台湾海峡后，在澎湖休整，准备直取台湾。

荷兰侵略军为阻止郑成功军队进攻“台湾”，将军队集中在台湾和赤嵌两座城堡，并在港口沉船，以此阻挡郑成功的船队登岸。郑成功利用海水涨潮的时机，驶进了鹿耳门，登上台湾岛。经过激战，荷兰侵略军惨败，龟缩在两座城里不敢应战。在围困 8 个月之后，郑成功下令向台湾城发起强攻。荷兰侵略军走投无路，只好投降。1662 年初，郑成功将荷兰侵略者赶出了“台湾”。



郑成功

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突然暴病而亡，年仅 38 岁。关于郑成功之死，有如下说法。

据说郑成功在收复台湾的同时，接到了一封信，说他父亲被家奴伊大器告发和郑成功之间经常有书信往来，欲图谋不轨。清朝廷震怒，将郑芝龙全家处死。郑成功听到此消息后，捶胸顿足，望北恸哭。

不久，郑成功又得知，叛将黄梧在自己家乡挖了郑氏祖坟，郑成功更是捶胸拍案，整天哀伤

恸哭。他咬牙切齿发誓将来有一天若是领兵打回去，必将黄梧碎尸。14 年后，郑经攻陷漳州时，挖了黄梧的坟并鞭尸，替父亲雪了恨。

1662 年 4 月，南明兵部司务林英削发为僧，从云南逃到台湾见郑成功，向郑成功哭诉永历帝在缅甸被吴三桂杀害之事。郑成功听罢，更是痛哭不已。

随后，郑成功的部下唐显悦告发郑经与乳母通奸，郑成功顿时气塞胸膛，立刻派人到厦门，欲斩郑经与其所生婴儿及乳母陈氏，但留守厦门的众将拒不执行命令。郑成功天天登高眺望澎湖方向有船来否，因而患上了风寒。到了第八天时，郑成功突然死亡。

也有人认为郑成功是被人投毒杀死的。这一说法主要的依据是：郑成功死前的情形与中毒后毒性发作的症状极为相似。在清初的众多书中都记载了郑成功之死。如李光地的《榕村语录续集》记载道："马信荐一医生以为中暑，投以凉剂，是晚而殂"。林时对的《荷闸丛谈》记载道："（成功）骤发颠狂，咬尽手指死"；夏琳的《闽海纪闻》中说，郑成功临终前将药投之于地，然后"顿足扶膺，大呼而殂"。郑成功大概察觉出有人谋害自己，但为时已晚。

之前，清政府也的确有谋害郑成功的想法。《台湾外志》记述说，当时清政府派一个高级军官携带一枝孔雀胆混入郑军，用重金买通专为郑成功做饭的厨师，让他毒死郑成功。这个厨师虽贪财，但害怕事情暴露，不敢下手，于是把这件事交给他弟弟办理。他弟弟到了真正下毒时，也不敢下手，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的父亲，但遭到了其父的怒斥。其父带他们到郑成功住处自首。郑成功非但没有处罚他们，而且还对他们施以重赏。此后，郑成功加强了保卫措施。但这并不能排除郑成功被毒死的可能。

郑成功的部将马信神秘地死去，仿佛也证明了郑成功有可能是被毒死的。马信是清降将，后来成为郑成功的亲信，郑成功去世当天，是由他推荐的医师开的处方，夜里郑成功死去，他本人也在郑成功去世的第二天死去。因此，马信可能直接参与谋害郑成功，但后来又被人灭口。

如果郑成功真的是被人毒死的，那么作案者是谁呢？清政府有重大的嫌疑。还有人认为是郑成功兄弟辈的郑泰、郑鸣骏、郑袭等人，特别是郑泰。

郑泰在郑成功率军攻打台湾之时，就与郑成功有矛盾。当时，郑泰为运粮官，当军队出现补给困难时，郑成功对郑泰的失职极为不满，他在座前写下了五个大字："户失先定罪！"意思是，如果出了乱子，首先处分郑泰。郑成功去世后，郑泰等人伪造郑成功的遗命讨伐郑经，并抬出有野心但无才干的郑袭来承

兄续统。最后，他们的阴谋被郑经挫败，郑泰入狱而死，郑鸣骏等人率部众携亲眷投降清朝。据此分析，有可能是郑泰等人策划谋害了郑成功。

郑成功死后，郑经先是忙于对付郑泰的叛乱，后又追讨郑泰存在日本的巨款，因此郑成功的死因在当时没有被深究。看来，郑成功的死因需要更多的史料发现来证实了。

1683年八月十三日暮途穷，施琅率军入台。十八日，郑克塽带领文武官员做册降清。从此，南明最后一个政权覆灭。

第十四章　大明往事

第一节　明朝的监国制度

皇帝是“天子”，但也生在凡间，站在权力的顶峰，除了感受到“一览众山小”的畅快淋漓外，还会有“高处不胜寒”的落寞。所以有时，皇帝也需要暂时离开庄严肃重的紫禁城，去呼吸民间轻松自由的空气。皇帝出京巡游，军国大事要如何处理呢？在漫长的实践中，为应对皇帝不能正常行使职权的情况，朝廷制定了相应的应急体制——监国制度，使皇帝在巡游的时候，不必担心自己的皇位易于他手，大权旁落。

监国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周取代殷商后，周武王派遣王室亲信到各地驻守，代天子行使监督的职权。此后，监国制度不断地完善与改进，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操作机制。监国大致有三种形式：朝廷的代理元首，即皇帝缺位的情况下，临时选出一位重要人物行使皇帝职权；临时的政府首脑，即皇帝和朝廷无法履行职责的情况下，由其他重要人物组织临时政府，出任首脑，行使职权；朝廷的常务副元首，即太子辅佐皇帝、参与政务的一种行政称号。在这监国的三种方式中，前两种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而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最后一种则着眼于政权的长久经营，也就是在皇帝因故离京出行期间，昭命太子或太孙监督政府各临时机构并临时执政。

根据史料记载，明朝一共有四位监国者，分别是明成祖朱棣的太子（即后来的明仁宗朱高炽）、明仁宗朱高炽的太子（即后来的明宣宗朱瞻基）、明英宗朱祁镇的弟弟郕王（后来的明代宗朱祁钰）、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太子（即庄敬太子朱载壡）。

根据记载，皇帝出行，代皇帝坐镇京师的太子、太孙要代皇帝行使职权，并要承担一定的职责。首先，就是保证局势的稳定。古人云：国不可一日无君。这句话并非是说天下一定不能少了皇帝，而是说，无论如何，总要有人出面来

维持局面，这个人可以是皇帝，也可以是其他人，而皇太子、皇太孙就是最适当的人选。一旦国内有人乘皇帝不在之机，煽动暴乱，按制监国的太子、太孙在飞章奏闻行在的同时，可以自行调动军队捕杀犯人；如果边陲告急，异族入侵危及国家安全，监国的太子、太孙可以一边奏知皇帝，一边调兵御敌。其次，监国之人要恪守礼制，禁止监国之权凌驾于皇权之上。也就是说，皇太子、皇太孙虽然可以行使监国之权，但是，其行使的权力被规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绝对不能冒犯和威胁皇权。例如，每逢各种节日庆典，或是迎接皇帝诏书时，要行跪拜大礼；皇太子、皇太孙在御门听政时，御座的方位不能像皇帝一样居于正中；一些事关军国最高机务的大事都要奏请皇帝处理。由此可见，皇太子、太孙监国只是皇权在一定范围的延伸，是在皇帝的严格控制下，部分放权于人。

第二节　耻辱的“土木之变”

明朝初年，蒙古分裂为兀良哈部、鞑靼部、瓦剌部三部。其中，瓦剌经过长期发展，势力增强，瓦剌首领也先统一了蒙古。

明朝第五任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时只有十岁，陪伴他长大的宦官首领王振，就成了代理皇帝管理禁卫军当然人选。王振的职位是内衙总提督，其侄王山历任锦衣卫千户、指挥同知。王振借助皇帝的幼稚、软弱和轻信，大肆扩张自己的权势，以至于成了朝廷政务的实际决策人。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也先遣使2000余人进贡良马，诈称是3000人。总提督王振大为气愤，认为诈称贡使人数是蔑视朝廷，下令削减马价的五分之四。在此之前，也先遣使入贡，厚贿明廷通事官员，通事详告国内虚实；也先向通事表达通婚意愿，通事私下许诺，又不奏报朝廷。也先以为通婚成功，这才以贡马作为聘礼。也先想不到明廷不仅削减马价，还拒绝通婚，恼羞成怒之下，遂决意调动兵马，大规模入寇大同。

这一年七月，也先统领瓦剌骑军大举犯边，势如破竹。北部边境告急的十万火急军报送达京师，京师一片慌乱。7月8日，也先军团进入明朝境内，兵锋甚锐，势不可当。大明大同守军溃不成军，塞外一应要隘、城堡陷落，瓦剌军所向披靡。

在大同、宣府分练京军的驸马都尉井源，都督王贵、吴克勤等四位将军奉

命各带领京军一万人抵御瓦剌军。井源统领的京师禁卫军出发后，王振觉得这是一次大显自己威风的机会，于是鼓动皇帝亲征，顺道让皇帝光临自己的家乡，以光耀门庭。23岁的正统皇帝朱祁镇并不清楚边防局势之严重，对王振的见解一贯言听计从，这次统领数十万兵马亲临前线，在皇帝看来是件十分豪迈而且风光的事。于是他下令两天之内出发。

正统帝又接连发出了一系列指令，指令禁卫军护驾北征；太师、英国公张辅，太师、成国公朱勇统领大军相从；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学士曹鼐、张益等统禁卫军扈征。整个北征大军由禁卫军统帅、内衙总提督王振统领和指挥。

7月16日，英宗和王振率30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使参与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大军19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8月1日，明军抵达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本欲使英宗在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以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

8月13日，明军撤退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禁卫军出现骚动，从未经临战阵的将士衣冠不整，面色苍白。

禁卫军统帅王振急令太师、成国公朱勇率领3万禁军精骑迎击瓦剌军。朱勇有勇无谋，统3万大军进军鹞儿岭，瓦剌军早就在山岭两翼设下伏兵，以逸待劳，突然向朱勇骑军发动夹击。3万明禁卫军被杀掠殆尽，全军覆没。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奉命抵御大量涌至的瓦剌军，战败阵亡。

王振率领侍卫亲军护着皇帝向安全地带转移。皇帝一行来到土木堡。土木堡没有险障阻挡，没有天险遮蔽，更没有泉水和丰厚草木，正是敌骑险冲之地。此时正值下午三至五时，从这里到怀来城仅10千米。邝埜急请正统帝快速进入怀来城以自保，以精锐军殿后，但被王振拒绝。王振以千余辆辎重没有赶到为由，拒绝驰赴怀来城，下令全军就地待命。邝埜急闯行在御帐，拼死要求入关，被王振喝令禁卫军赶了出来。

8月14日，大军刚准备起行，瓦剌军就杀到了。大军被困在土木堡，不敢移动。连续被围了两天两夜，将士和马匹没有饮水，又饥又渴。王振命令禁卫军就地取水，但深挖5米后，仍不见出水。而距此地向南七八千米处便有一条河，但此河已被瓦剌军占据。

瓦剌首领也先指挥瓦剌军分两路，沿麻谷口两侧向明军发动攻击。守护谷口的明军都指挥郭懋统率禁卫军将士英勇阻击了四昼夜。守护谷口的明朝官军死伤惨重，渐渐支持不住。此谷口一开，正统帝和他的侍卫亲军只有坐以待毙。

8月15日，瓦剌军派遣使者持书面见正统帝讲和。正统帝朱祁镇心神甫定，信以为真，立召学士曹鼐草敕讲和书，并派遣两位通事随瓦剌军使者同去。王振以为和议已定，下令立即传示三军，起驾移营。逾越堑沟行军，回旋之间，队伍大乱，兵器、仪仗扔得遍地都是。正统帝车驾刚南行不远，瓦剌骑兵就从四面八方展开了全面攻击。明朝禁卫军一触即溃，将士们争相逃命。

正统帝在侍卫亲军的团团护卫下，骑马试图突围，但终究无法冲破瓦剌骑军的重围。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学士曹鼐、张益和数百名亲军将士战死。瓦剌骑军一次次冲杀，杀得侍卫亲军七零八落。转眼之间，正统帝发现其身边只有女真族太监喜宁一人。正统帝从马上下来，盘腿向南，闭目静坐。

瓦剌士兵将正统帝押往雷家站，交予也先的弟弟赛刊王。赛刊王不敢怠慢，立即让亲军押送着正统帝去见也先。也先命人将正统帝送押伯颜帖木儿军营，好生守护。

8月17日，正统帝被俘的消息传到了北京，举朝大惊。正统帝秘派使者到来，传口谕命郕王朱祁钰速即帝位。郝王于九月初六登基，是为代宗，以第二年为景泰元年，奉正统帝为太上皇。

第三节　明末党争的源头

关于党争兴起的源头，明人自己有一个高度的概括：今日之争，起于门户，门户起于党争，党争起于东林，东林起于顾宪成。

顾宪成是江苏无锡人，他是东林书院的创立者，而东林书院是东林党的发源地。顾宪成的一生都在和人事打交道，他成为东林党的创立者，有其必然性。

万历四年（1576年），27岁的顾宪成参加乡试，取得了第一名，高中解元。在那次考试中，他的文章阐述了选人、用人与治理国家的关系，可见他对人事

的热忱。万历十年(1582年)以后，顾宪成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吏部工作，在此期间，他积累了丰厚的人脉关系，并深度参与了当时的人事斗争，这为他后来走上组党的道路打下了基础。

那个时期的政争，主要是"阁部之争"。首辅张居正死后遭到了清算，他生前独揽大权的局面引起了广泛的批评，朝廷吸取经验教训，有限制内阁大臣权力的倾向和共识。在这种背景下，各部与内阁展开了权力之争，尤其是作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在人事权力上与内阁的矛盾十分尖锐。

人事斗争主要集中在人事考核时期。明朝对官吏的考核分为"京察"和"外察"。"京察"是考察京官，每六年一次；"外察"是考核地方官吏，每三年一次，一般趁外官来京师朝见皇帝时加以考察。"京察"根据官员的政绩与品行来决定升迁、降调或罢官等奖惩，如果官员在"京察"中被罢了官，就终身不再起用。由于"京察"的致命性，使之成为官僚间互相斗争的一个重要平台。

作为吏部的官员，顾宪成参与了这个时期的斗争。万历十五年(1587年)京察时，顾宪成上疏言事，因"语侵执政，被旨切责"，被贬为桂阳州判官。不久他又被"擢升为吏部考功主事，历员外郎"，重新回到了他热爱的人事工作岗位上。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京察争斗，比六年前那一次更激烈。在这场争斗中，顾宪成再次脱颖而出。顾宪成虽然职务不高，能量却很大，作为一个小小的主事，竟然能够在幕后左右他的上级，去修剪首辅的羽翼。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顾宪成升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这是一个很有实权的职务，虽然顾宪成只是一个司长，却能决定部长的任命。在这个岗位上充分行使了他的职权，与内阁进行斗争。顾宪成不仅可以左右他的上级和他的上级的上级的意志，还可以任免他的上级，不仅明目张胆地和首辅对着干，甚至连万历皇帝也不放在眼里。

不久，首辅王锡爵年老引退，万历皇帝命令吏部根据品望推选六七位能够胜任首辅之职的官员听候点用，顾宪成等人违背万历皇帝的意思，几次提名的人都是万历帝所厌恶的。在封建社会，皇帝对臣子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然而这种情况到了顾宪成这里就完全颠倒过来了，顾宪成如此大胆的原因只有一个：他有自己的组织，有恃无恐。有组织做靠山，一切都不在话下。

万历皇帝对于吏部抗旨不遵的行为十分恼怒，并认为顾宪成在"徇私"，在吏部的奏疏上批了"司官降杂职"五个字，矛头直指顾宪成。关键时刻，许多大

臣上疏申救，奏疏上百封。

然而这一个群体性事件并没有吓倒万历皇帝，他不仅没有收回成命，反而加大了处罚力度，他以"忤旨"罪将顾宪成革职为民，并将那些上疏申救的官员外放、降调、削职等。很显然，万历皇帝已经认识到吏部已成为一个"独立核算"的小团体了，因此对其进行了一次大手术。

顾宪成回到家乡以后，在人事方面的热忱不减，他不仅没有就此止步，反而开拓出一种新的途径。短暂休整之后，顾宪成就开始以讲学为名，广交朋友，四处活动。

他想把各方人士"请进来"，就在自己住宅南边建了几十间书舍专供来人居住；他想"走出去"，经常奔赴苏州、松江、常熟、太仓、嘉兴、宜兴等地，与吴中士绅聚会。

伴随着活动量的增加，顾宪成感到有必要建造一个固定的场所，将分散的讲学活动变成一个有协调组织的统一活动，从而增强社会影响力。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经过多方努力，官府终于批准在无锡城东门内的东林书院遗址重建东林书院。九月，工程竣工了，共用了1200多两银子，顾宪成捐银最多，他还发动吴地官员和缙绅捐资助修，出了很大力。顾宪成还审订了书院讲会的宗旨及具体会约仪式。

这一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除了严寒盛暑之外，定期会讲。

东林书院从成立之初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校，而是一个政治意图明显的在野人士俱乐部，它由一批心有不甘的在野人士发起成立，主要目的是学术搭台、政治唱戏。

明朝官场各种复杂关系不断在东林书院交汇凝结，东林书院很快就发展成为各种关系的总部基地，编织了一个隐秘而庞大的关系网，每年一次的大会有时多达千人，积聚了很大的政治能量，并逐渐由在野拓展到朝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官员加入其中，逐渐形成了势力庞大的东林党。

东林党虽然以气节道义相号召，以君子自居，但他们结党必定营私，结党必破坏势力平衡。伴随结党而来的是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和令人眼花缭乱的人际关系。

东林党成立以后，威胁到了其他非东林党人的利益，许多非东林党的官员

为自保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高官为领袖，结成帮派，一时朝中宣党、浙党、楚党、齐党林立，他们联合起来打击东林党人。斗争由原来的阁部之争和门户之争逐渐演变为党派斗争，规模进一步升级，性质更加严重，影响也更加恶劣，明代政争急剧恶化，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第四节　被神化的明朝“狼兵”

明王朝的狼兵是指壮族地区的土司兵，以广西的狼兵人数最多，名头最大。

征调广西狼兵是抗倭总督张经的主意。张经曾经总督两广军务，深知当地狼兵的骁勇善战，因而力主远调狼兵抵御倭寇。他选中的狼兵，是名气最大的田州（今广西右江地区的田阳县）岑氏兵。

岑氏的始祖是北宋名将狄青的部将，几百年来一直世袭守卫本土。张经征调时，田州土司首领岑猛已死，其妾瓦氏夫人主持大局，已经年近六旬。

瓦氏夫人，原名岑花，嫁给土官岑猛后，改姓为“瓦氏”。岑猛早年因起兵反明而被杀，儿子同时战死，其孙岑芝也在几年后战死，瓦氏独力处理州事。经历了家族巨变的瓦氏抱着替家族洗清耻辱、重立荣誉的念头，欣然接受了朝廷的征调。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瓦氏亲率两个年幼的曾孙岑大寿和岑大禄，以及田州、南丹州、归顺州、东兰州和那地州等地狼兵共6872人一同誓师出征。

瓦氏夫人出征时携有450匹战马，全是当地的德保矮马。德保矮马是世界上最矮的马之一，只产于广西德保、靖西等地，貌虽不扬却善爬耐驮。土司兵是奴隶制下的私人武装，生死取决于首领，所以士兵作战一向勇猛无畏。而岑氏兵法又有独到之处：“七人为伍，六人击刺，一人割级，所获功绩，七人共分之。凡一人赴敌，一伍争救，若没一人，必斩一伍。”除了七人阵法，还有两人为一组的野战法，临敌时两人一前一后，执枪者突前，执弓弩者在后，口衔刀手持矢，矢射尽，扔掉弓弩抓起刀，与枪兵一起战斗。千锤百炼的阵法，连坐的残酷军纪，使得其兵可死而不可败。

东南的百姓听到狼兵出征的消息后个个奔走相告，认为骁勇无敌的狼兵一到，倭寇就会败亡。东南官兵得到狼兵的增援，兵威大振，倭寇听到狼兵

已到的消息，闻风震慑。

一心想立功的瓦氏很希望速战，朝廷派来的钦差赵文华也屡次催促派狼兵剿贼。稳重的张经却认为狼兵“勇进而易溃”，不能托大，要等保靖、永顺的土兵到来之后，合力夹攻才是万全之策。

不久，狼兵和倭寇的白刃交战终于开始了，但几次规模不大的接触战之后，狼兵损兵折将，“可死不可败”的神话破灭。

第一次，总兵俞大猷派狼兵出哨探敌，落入倭寇的埋伏，狼兵头目钟富、黄维等 14 人战死，损兵大半。明朝官兵畏倭如虎，不肯救援。次日，瓦氏夫人的侄子岑匡自恃勇力独自出哨，贼兵掩至，岑匡力战杀四贼，自己也人马俱毙。此后，倭寇 3000 多人南来金山，白泫率狼兵迎战，贼鼓众来冲，狼兵死伤很多，全军大溃，白泫被围数匝。年近花甲的瓦氏夫人亲自出战，突破重围救出了白泫。

1555 年 5 月，4000 名倭寇突犯嘉兴，张经分遣参将卢镗率部分狼兵和保靖兵驰援嘉兴；总兵俞大猷率部分狼兵和永顺兵扼其归路；副总兵汤克宽引舟师从中路击之，倭寇大溃，斩首 1980 多级。东南御倭战争此为第一功，史称“王江泾大捷”。此后，狼兵又在陆泾坝战役中斩获倭首 300 多级，烧毁海盗船只 30 多艘。

广西狼兵终于在此战中得以扬眉吐气，瓦氏夫人也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朝廷赏赐，被诏封了“二品夫人”，光大了门楣。

第五节　敢骂皇帝的官员

1564 年，海瑞到京赴任。当时嘉靖皇帝在位，年近花甲的嘉靖皇帝崇信道教，为修仙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且刚愎自用，以致国事荒废，民不聊生。于是海瑞给嘉靖皇帝递了一道奏疏，一一罗列嘉靖皇帝的种种罪行，还很不客气地说：“皇上你昏聩多疑、刚愎残忍、自私虚荣。既是昏君，又是暴君。既不是一个好皇帝，也不是一个好男人。普天下的臣民百姓，早就对你有意见了。希望你改掉这些坏毛病！”

此事在当时引起了轰动效应，消息频传，街谈巷议，尽人皆知。海瑞倒也不怕死，很有自知之明地买好棺材，放在家中客厅里，等着皇帝杀掉他以后用

来收殓。

不过后来，海瑞不仅没有死，还名垂青史了。被臭骂一顿的嘉靖皇帝心里窝火那也是没法子的事情，谁让人家有骂你的权利呢？

明朝万历年间，不少朝中大臣也争相暴风骤雨般地抨击过皇帝，言辞激烈，态度强硬。譬如右都御史漕运总督李三才上疏指责万历皇帝："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还历数历代昏庸君王比较万历皇帝，声称："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甚至说出了"天神共愤，大难将作"的骇人心魄的话来。

李三才上了这样的奏疏，不仅相安无事，高枕无忧，还被朝野传颂，为他人拥戴！

对于这样的"非君"浪潮，皇帝们是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明实录》记载万历皇帝埋怨大臣们"讪言卖直"，但谏诤者因此被贬责的确实有，而受重罚的却很少，几乎没有发生过因疏谏皇帝而丧命的事情。

此种现状，让主编《明史》的清代学者为明朝的皇帝抱以同情之心，认为对皇帝破口大骂不是为人臣该做的事情。

第六节　明朝春节官员的送礼规则

明朝的官员在春节期间给上司送礼是惯例，但想要对方不动声色地接受这份心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官员首先要身体好，因为春节送礼，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万历年间，有位叫周晖的人在《二续金陵琐事》文中记录：除夕前一天，他步行到南京内桥，只见中城兵马司衙门前聚集起一支庞大的队伍，人人皆捧食盒，细一打听，都是给兵马司的官员送礼的。

在北京，从大年初一开始，街面上从朝官到普通百姓摩肩接踵去各处拜年，一连好几天。

送什么是一门大学问。脸皮薄的官员会赠送刊刻文集——内中挖空，满是金银。送礼时，口叙寒暄，双手授受，这种雅贿主要流行在仕人之间。

也有送一些生活日用品的，比如夜壶。曾有人给一位江南御史进呈了一尊尿壶，上有双金绊丝花鸟人物，让御史非常受用。

许多官员甚至当起了送礼中间人。春节这一天正是他们集体出动的好时候，兵马司外提食盒的队伍里可以觅见他们的身影。

送礼花样如此繁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不仅事关道德，更是当时政治的一部分。

在明朝，不论京官还是地方官，俸禄都很微薄。想要生活优渥，基本都是靠送礼，以及被送礼过活。如吏员收礼清单当中的重要一项叫作“顶头银”。吏员考满准备升迁时，可举荐一人代替自己的原职，受举者相应地要以重金作酬。在家族制社会中，这样的举荐常在家族内发生，孝敬前辈的“顶头银”金额不菲，京城内肥缺，有时达到数百至千金，地方上衙门口的价格，也有几十两。

作为一名可靠的春节送礼者，还需要在正月十六这天做好安全保卫工作，防止各种明目张胆的小偷小摸活动。因为这一天是“放偷”日，盗钱盗物甚至盗人都不禁止，在这样一个劫富济贫的喜庆日子里，社会再分配运动将轰轰烈烈地走一遭，一定要小心，不然送给高官的礼物，就白白送给小偷了。

第七节　明朝教坊中的性骚扰

明朝的女演员一般集中在教坊司里，与普通青楼里的女子不同，她们的身份比较尊贵。教坊司是政府办的乐舞演出机构，旗下女演员们非得个个“艳过六朝，情深班蔡”不行，主要负责为达官显贵、豪富之家提供家祭堂会上的文艺活动，并收取一定报酬。行政上归礼部领导，财政上自负盈亏，不纳税，原因是政府认为她们的钱不干净。

从洪武末年开始，即征收教坊司的演出管理费，不是上缴国库，而是用于各种应酬与福利。

礼部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首屈一指的“清水衙门”，无人事任免权，无执法司法权，更够不着国家的财政和税收，所以，没什么外快可捞，官员一般只能靠薪水过日子。到了明代，官员的薪水更低，如果没有额外的收入，就会生活得很清苦了。

所谓“穷则思变”，朝廷按例给外国朝贡使团的赏赐，要经过礼部发放，偷偷截留一部分；各地僧侣道士来度牒纳银，是礼部代收的，也可稍稍瞒报。可是，这些都不是常态的进账，还得另觅稳定的财源。这一来，女演员们聚集的

教坊司就跑不掉了。

明朝教坊司的女演员，市井百姓、普通士子平时很难见她们一面，更别说调戏或骚扰她们了。可礼部官员一个比一个好色，又管着教坊司。本来收点管理费，只要官员与女演员们不见面，就谈不上性骚扰，加上朝廷也不允许，女演员们基本安全。如教坊司去某地演出，先知会礼部一声，演出结束后，再派人将管理费交给礼部，双方相安无事。

偏偏礼部的官员不放心，唯恐这一票来钱最快的外快收入被经手人揩油或者教坊司交钱时短斤少两，居然派人轮流去倡优乐舞的教坊值班。这些轮流跟班的官员在教坊里喝着茶，看着歌舞，身边自然少不了女演员陪侍，其间不乏癫狂不堪入目之状。据史载，光隆庆一朝，礼部因“亵妓恣娱”被弹劾的官员就达 37 人，远远超过同时期的其他部。

官员跟班演出，是去收钱的，已经不招人待见了，再对女演员大搞性骚扰，还不掏钱。那些被骚扰又没拿到钱的女演员，个个心中窝火，还敢怒不敢言，于是就相约排了一出短剧，取名曰送瘟神，借民间流行瘟疫事讥讽礼部官员贪得无厌，是邪恶的化身，希望他们拿了钱赶快走人。

第八节　被烤死的汉王朱高煦

汉王朱高煦是永乐皇帝朱棣的第二子，他性格非常凶悍，举止轻佻，平时喜欢舞刀弄剑，不喜读书，在朱元璋还在位的时候，就很不喜欢朱高煦这个孙子。

朱高煦善于骑射，一向以雄武自负。燕王朱棣举兵之后，跟随朱棣南征北战，立下很多的大功。淇国公丘福等大臣都拥立朱高煦。燕王也曾经许诺过：如果自己以后当上皇帝，就立朱高煦为太子。然而等朱棣真的登上皇位后，很多人眼中懦弱无能、无寸尺功劳的大哥朱高炽仍然成了皇太子，朱高煦只是被封为“汉王”，封国云南。对此，朱高煦大为不满，嚷嚷道：“我究竟有什么罪行，要把我流放到万里之外？”朱高煦硬是赖在南京，不肯去云南。永乐皇帝自食其言，本来就觉得对不住这个儿子，便任由他了，后来朱棣就近把他改封在山东青州。朱高煦在青州仍然对皇位不死心，暗地招兵买马，并且纵容手下在青州胡作非为。朱棣知道这个儿子不会安宁，决定不再这样任他胡闹下去，下定决

心把他召到南京，准备把他废为庶人。这次多亏太子朱高炽苦苦哀求，朱高煦才被改封到乐安州(今山东广饶)，但永乐皇帝还是削除了他的两支护卫军队。

仁宗朱高炽登基后，对他这个兄弟倒是不计前嫌，赏赐不断。然而仁宗登基十月左右就驾崩了，宣宗朱瞻基即位。历史似乎要重演建文帝故事，主弱臣疑，王叔跋扈于外，但朱瞻基不是仁柔少断的建文帝，"蹇夏""三杨"这一帮老臣也不是只会夸夸其谈的齐泰、黄子澄，世易时移，朱高煦还想要造反已经是自寻死路。

在仁宗死后，朱瞻基从南京奔丧途上，朱高煦阴谋伏兵邀击失败后，便决定效仿自己父亲当年故技，指责夏原吉等人是奸臣，举兵要"清君侧"，要再来一次"靖难"。朱瞻基在一帮重臣建议下，决定亲征。进军途中，宣宗朱瞻基问大臣们说："你们看，汉王看到我亲征，他的动向会是如何呢?"有的大臣说："汉王的封地乐安城太小了，他肯定会先攻占济南来作为自己的巢穴。"宣宗摇摇头。又有大臣说："汉王以前就眷恋南京不肯离开，他定会举兵南下。"宣宗又摇摇头，笑着说："济南虽然离乐安近，但却是坚城，一时难以攻下；而南京嘛，汉王的护卫军都是乐安人，他们是远离乐安的。汉王欺负我年少新立，想浑水摸鱼，看似武勇，其实内心胆怯得很，又缺少谋断。我猜他听说我要亲征，肯定吓得躲在乐安城不敢出来，只会坐以待毙。"事情果真被宣宗说中，朱高煦起初听说朝廷派薛禄出征，便不把他放在心上，后来又传来消息，皇帝要亲征，朱高煦一时面无人色。宣宗指挥大军把乐安城团团围住，朱高煦走投无路，自缚请降，宣宗胜利班师。

朱高煦被抓到北京后，宣宗并没有杀他，只是将他废为庶人，囚禁在西安门内的逍遥城。

有一天，宣宗去看望皇叔朱高煦。朱高煦见宣宗到来，欲羞辱之，等宣宗一进门，朱高煦运足力气猛拽拖地长木，宣宗猝不及防，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一帮随从赶忙一边按住朱高煦，一边扶起狼狈不堪、恼羞至极的朱瞻基。但朱高煦力大无比，几个侍从用尽全力也按不住他。气急败坏的朱瞻基一边躲闪，一边想起宫殿门外有重达 150 千克的消防用大铜缸，立即命几位大力士去抬了一口来，众人七手八脚地把朱高煦反扣在大铜缸之下。没想到，膂力超常的朱高煦依然能把铜缸顶起，对着周围的人横冲直撞，朱瞻基情急之下，竟命人将宫中囤积的木炭搬来，把被扣在铜缸里的朱高煦堆埋起来，然后把堆成小山一样的木炭点燃。眼见着炭火熊熊，越烧越旺，青烟弥漫中，大铜缸由最初的

剧烈摇晃到慢慢泛红、透亮、塌陷、熔化……与当年被朱棣赶下台的建文帝朱允炆同为火字辈的朱高煦，就这样被活活炙死在铜缸内。

除掉朱高煦之后，朱瞻基接着把朱高煦的正妃韦氏和十个堂兄弟统统杀掉。就这样，帮助父亲朱棣夺得江山的朱高煦，最后的结局是惨遭灭门。而对于明成祖朱棣来说，尽管他夺得了江山，但所传三支中的一支惨遭灭绝。

第九节　明朝皇族的生殖竞赛

截至大明弘治五年八月，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纪录，他已生育了子女共 94 人。庆成王的儿子们也大多继承了父亲出众的生殖能力，他的长子的儿女也达到了 70 人。庆成王在儿女数量创纪录的同时，孙子辈的人数已经达到了 163 人，曾孙辈更是多达 510 人。就是说他的直系后代在这一年已达 767 人，再加上众多的妻妾女眷，整个庆成王府中，“正牌主子”就有 1000 多人。

不久之后，朱钟镒生殖冠军的称号就被他的一位后代，另一位庆成王所夺取。这位庆成王光儿子就达 100 多人，以致每次节庆家庭聚餐时，同胞兄弟们见面，都要先由人介绍一番，否则彼此都不认识。到了正德初年，庆成王府终于弄不清自己家的人口数了。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 49 位。这些王爷好比种子，一两百年之后，在各地繁衍出的皇族数量都十分惊人：在山西省，洪武年间只有一位晋王，到了嘉靖年间，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经增长到 1851 位。洪武年间河南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万历年间，已经有了 5000 多个皇族后代……据明末徐光启的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数每 30 年左右即增加一倍。查明代皇家档案即玉牒上正式收录的人数，洪武年间是 58 人，到了永乐年间增至 127 人，到嘉靖三十二年增至 19611 人，而万历三十二年又增至 8 万多人。这仅仅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数目，不包括数量更多的底层皇族。据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 100 万人了。

朱元璋子孙数量的急剧膨胀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也是世界人口史上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

第十节 明朝的皇店

明武帝正德八年(1513年),太监于经奏请开设宝源、吉庆二皇店。自此,皇店一发不可收拾。

所谓皇店,经皇帝特许并赐名号,由皇亲、太监及权贵开设的客店。有的由官店、塌房(即濒水为屋,以储商货的仓库)改设,有的在皇庄附近或交通要道开设。

皇店的业务与官店一样,经营仓库,供客商停放货物,并榷敛商货,兼为收税机关。但是,不同于官店的,则皇店不受官府管理,其收入也不归官府而入内府,即皇帝的"小钱柜"。甚至,有的皇店放皇债,经营高利贷。

明代的皇店已不限于京畿之地,远及东北山海关、广宁(今辽宁北镇)、辽阳,西边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通州(今北京通县)、张家湾、卢沟桥,山东临清等地。

这些皇店拦截客商,横征暴敛,渔利无厌,为所欲为。正德时,皇店一年缴纳白银达八万余两,其余的中饱了太监权贵的私囊。

正德九年(1514年)春,乾清宫火灾,宫内外皆成灰烬。当时,右都御史杨一清、南京礼科给事中徐文溥、大理寺丞袁宗儒、兵科给事中潘埙等先后上疏,复引乾清宫灾,言皇店以罔财之害,力请罢皇店。

正德皇帝死后,明世宗嘉靖初,皇店一度削弱,但是始终未能罢除。史载,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吏科左给事中张养蒙还上奏,"极谏时事缺失,谓奸宄实繁有徒,采矿不已,必及采珠;皇店不止,渐及皇庄"。

可见皇店科敛扰商,侵害民利,成为明代中后期商业资本发展的一大桎梏。

第十一节 悲壮的人口大迁徙

纵观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历次移民活动,没有任何一次能比明朝初年的那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史称"大槐树移民")在中华民族留下的烙印更深刻。

明朝强制性的山西移民活动开始后，每次移民的规模都很大，动辄数千民户，甚至万余户。当时山西移民主要来源于太原、平阳二府和潞、泽、辽、沁、汾五州，即以今天的太原、临汾、晋城、长治等地，而位于交通要道、人口稠密的洪洞县自然就成了重要的移民集散中心之一。当时官府在洪洞县城北的广济寺设局住员，负责给集中起来的移民编号发放"凭照川资"，之后移民们便由此散奔向冀、鲁、豫、皖各地。

大量山西移民到达迁居地后，在当地官员的监督下，以屯、营为基本单位定居下来。为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政府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政府向他们免费提供农具、种子和耕牛，减免赋税，耕地由政府根据丁口的数量统一划拨，或50亩，或80亩，许多地方甚至规定"迁民附籍，任其开垦，亩数无定额"。如洪武三十五年，就对迁往北平各地的民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内免征其税"。朱元璋还在河南设置了司农司专门负责移民垦田的管理工作，规定凡农民及移民开荒，均归开荒者作为永业。明太祖还责成地方官员发放耕牛、种子给流民、移民，以帮助他们进行生产。

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迁入地，主要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北京等地，少量分散于今陕西、甘肃、宁夏等地。朱元璋的家乡安徽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主战场，又是水、旱、蝗灾的频发地区。朱元璋起兵于此，转战江苏、湖北10多年，与元军及张士诚、陈友谅部反复争夺、殊死拼杀，造成了当地残破荒凉的局面。因此，明初移民，朱元璋首先就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朱元璋称帝不久，就曾将太湖流域的数千民户强行迁入他的家乡安徽凤阳的。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朱元璋又将山西及真定民户迁至凤阳，目的是尽快让他的家乡繁荣起来。河南地区的移民以洪武年间迁入者居多，永乐年间次之。据方志、家谱、碑文资料统计，移民中有95%以上来自于山西洪洞县。从河南地区移民的分布情况来看，多处于黄河和淮河流域，这一地区因元末天灾人祸而人烟凋敝。河北、北京地区的移民，大多是永乐年间自洪洞县迁入的，这与该地区"靖难之役"期间战乱破坏严重以及明成祖迁都北京有着密切的关系。迁往山东地区的移民主要分布于黄泛区的东昌、济南、兖州、青州等府，涵盖今天山东的60多个县市。移民迁入后，多以姓氏为村庄、屯名，也有以故土的县名为名的，如丁官屯、随官屯、胡官屯、李营、屯留营、长子营等。

为了防止移民在迁入地聚族而居，形成新的家族势力，影响社会稳定，明朝的移民条律还规定，凡同宗同姓者不能同迁一地。移民们为了避免骨肉再

次分离，纷纷被迫更姓易名，于是就从一些家族中分离出多个姓氏。而那些不愿更改姓名者，只能骨肉分离、天各一方，被异地安置了。

明初持续 50 多年的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过程，对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安定社会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第十二节　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海盗

16 世纪至 18 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西方殖民者不断向东方扩张，侵略骚扰中国沿海省份，烧杀抢掠，罪大恶极。

明正德十二年(1517 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入广东东莞，占据屯门岛，剽窃行旅，抢掠商船，把海边年轻女子劫走，掳掠中国人运往印度和欧洲充当奴隶。

这些罪恶行径激起了琼州民众的愤怒。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五月，葡萄牙三艘舰船停泊铺前港。海盗施和得知消息之后，立即率领部众攻袭葡萄牙舰船，使其桅杆折断，不得不退入内港，寻求明朝官府保护。明朝琼州指挥高卓统领所部官兵与土司王绍麟所率黎兵一起出动，攻击施和船队。施和设伏击败了官兵，高卓只身逃走。

随着在中国进行殖民活动的收益越来越大，西方侵略者改变了过去仅仅要求通商和占据商业据点的政策，开始在我国周边地区攫取殖民地。很快菲律宾等地被西方侵略者占领，被作为进一步入侵中国东南沿海的基地。

当时，潮州人林凤组建了一支海岛队伍，陆续收编了一些海上活动组织，组建成一支强大的船队，在广东和福建沿海等地专杀贪官污吏，有时也以劫掠为生。明万历二年(1574 年)，林凤率领 62 艘战船、水陆军 4000 多人，从台湾开赴菲律宾，联合当地民众驱逐西班牙殖民者，开拓海外贸易基地。船队急航两天，到达吕宋岛边界，立即攻占密雁，西班牙守将撒示洛驾舟逃走，船队乘胜前进，直逼马尼拉。兵贵神速，林凤即命先锋率 600 名精兵乘夜袭击马尼拉。不料入夜天气骤变，风雨交加，巨浪如山，船只一半沉没，损失 200 多人，同时因天黑难航，错登地点，辗转至马尼拉时，天已大亮，西班牙人已有准备。先锋部队不顾疲劳，奋勇进攻，攻入西班牙人的指挥部，杀死总指挥高第，后直攻总督府。总督勒比撒里亲督卫队百余人及城内西人死守，双方僵持不下。先锋队因连续颠簸、作战，体力渐渐不支，只得退出。

休整两天后，林凤再派出 1500 人前往攻城。城内有工事可依，且殊死抵抗，很难得手。进攻部众须冒矢石、炮火冲锋，故伤亡惨重，虽有一队冲进城内，但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等林凤增派 500 名援兵赶到时，已难再组织有效进攻。因天时地势的原因，两次进攻马尼拉均以失利结束，但林凤并不气馁，引部众退入玳瑁港，并在班诗兰建立都城。几个月间，他率部众建立了住所，还建立了一个城寨和一座宝塔，并凭险筑垒，设炮台多处，准备对抗西班牙殖民者。林凤被拥为国王，受到当地土人的欢迎和支持。

西班牙人见林凤筑城建国，视为心腹之患。驻菲总督勒比撤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调集舰队兵员 6000 多人，于明万历三年(1575 年)三月协同明军潮州把总王望高联合围剿林凤。林凤率众抗击，战斗激烈，相持 4 个多月。西班牙兵及军械源源不断，而林凤却孤军作战，粮械不继。在中西两国舰队夹击下，林凤胆略过人，八月四日夜，一夜之间巧妙突围，率 40 余艘战船突围返回台湾。

林凤回台湾后又返潮州，出没于柘林、靖海、碣石之间，船舰又增至 150 多艘，势力复振，后因队伍内部谋略分歧，部属蔡德、李瑞奇，陈木童到潮阳受抚。林凤坚持反抗明廷，由于当年历史条件的限制，孤军难鸣，林凤不得不复走西番，不知所终。

第十五章　明朝名人轶事

第一节　汤和保命秘诀

朱元璋称帝之后便大杀功臣，功臣几乎被他杀绝了，唯独信国公汤和活了下来，其原因何在？

无论是先立的太子朱标，还是后立的太孙朱允炆，都为人仁厚，性格偏软，朱元璋不放心自己死后留下一帮战功赫赫的老臣，因此在自己去世前想方设法把这些旧臣杀掉，为子孙后代的江山永固铺平道路。

有一次，太子朱标进谏说："父皇您杀大臣太多了，恐怕会伤了君臣间的和气。"朱元璋听了以后沉默很久。第二天，朱元璋把太子朱标叫来，将一根荆棘扔在地上，命令太子朱标去捡起来，面对长满刺的棘杖，太子朱标觉得很为难。朱元璋说："这根荆棘你拿不起来，我替你将刺磨干净了，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所杀的人都是将来可能威胁到你做皇帝的人，我把他们除掉了，是在为你造莫大的福啊！"

本来，汤和也在必杀之列，因为他的机警和自律，急流勇退，不贪恋权势，所以保全了自己和家人。其自保"经验"可圈可点。

汤和对朱元璋有拥戴之功。他早年和朱元璋一起在郭子兴麾下效力，比朱元璋的资格还老一些。后来朱元璋脱颖而出，逐渐成为首领，其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将领看到朱元璋做首领，心里不服气，而汤和却在关键时刻率先承认朱元璋的领导地位，这份功劳，朱元璋是一直认账的。

汤和不争功，能以平常心对待不公待遇。打下江山大封功臣时，朱元璋故意降汤和一等，找个理由只封他为侯，而其他同等条件的人都被封为公爵。汤和很谨慎，从不发牢骚，继续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地伺候朱元璋，并及时向朱元璋做出诚恳而深刻的自我检讨，几年后进封为信国公。

汤和识相知趣，迎合皇帝的心思以自保。《明史・汤和传》记载，朱元璋对

掌握军权的老臣开始不放心了，汤和就投其所好，自己主动急流勇退，在众多高级将领中第一个自请解除军权。朱元璋大为高兴，立马拨款为汤和在凤阳老家造房，让他衣锦还乡。

汤和回家后又低调做人，从不以功臣自居，并且束缚子孙及家奴，遵守法纪，善待乡邻，不授人以柄。汤和知道，朱元璋的耳目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报到朱元璋那里，因而他就整天吃酒下棋、游山玩水、含饴弄孙，从不结交地方官员和乡绅，不谈国家大事，给人一副只贪图享受、别的事一概不管不问的印象。这些都让朱元璋非常放心。

就这样，汤和活到了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以70岁的高龄而逝，是明初少有的几个能善终的老臣，他死后被追封为东瓯王，谥襄武，可谓备极哀荣。

第二节 张居正的灰色人生

晚明首辅张居正扭转了明朝后期持续颓靡的局势，营造了明史上的最后一段辉煌。

张居正是一个改革家，他的改革成就，即使王安石也不能与他相比。他秉承法家“不法古”“不循礼”的作风，革故鼎新，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他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改变官场流行的颓靡习气。他推行财政经济改革，清丈耕地，整理赋税，把隐匿、逃税的耕地清查出来；继而把在南方部分地区出现的“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使赋税和徭役货币化，人头税向土地税转移。



张居正

他在财政经济改革中，强调不必增加赋税而使得国库充裕，为此两手并举：一手是“惩贪污以足民”；另一手是追查逃税、漏税，增加国库收入。

张居正在权力斗争中，常常不择手段，他的口头禅是“嫌怨有所弗避”“不拘泥于常理”。这种政客作风在“附保逐拱”与“王大臣案”中，流露得淋漓尽致。

隆庆皇帝去世以后，内阁首辅高拱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之间的权力争斗白热化，高拱发动

言官弹劾冯保，企图罢黜司礼监，把权力收归内阁。在双方的权力博弈中，张居正的动向是举足轻重的，是双方都要争取的关键人物。按理说，作为内阁次辅，他应该全力支持内阁首辅，打击太监势力，加强内阁权力。然而，张居正却站到了冯保这一边。结果高拱被罢官。

高拱被罢官后，冯保害怕他东山再起，一手策划了"王大臣案"。

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十九日清晨，皇帝上朝的轿子刚抬出乾清门，警卫人员就抓住了一个打扮成宦官模样的刺客，从他身上搜出刀、剑各一把。张居正与冯保密谋，诬陷高拱是幕后指使人。冯保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东厂总督的身份，一手包办对刺客王大臣的处理。他用升官发财为诱饵，炮制假口供，牵连高拱。

大多数官员认为，高拱虽然作风跋扈，但不可能做出谋刺皇帝的事，要求张居正悬崖勒马。张居正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接受吏部尚书杨博的建议，派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与冯保一起"三堂会审"。朱希孝事前已经查明，王大臣提供的是假口供，要王大臣在会审时如实交代。冯保以为会审是稳操胜券的，结果大出意料。于是匆匆判处王大臣死刑，顾全了冯保和张居正的面子。

张居正善于敛财，却不随便接受一般官员的贿赂。辽东总兵李成梁，由于他的提携，获得朝廷的嘉奖，特地派人送来大批黄金、白银，张居正婉言谢绝，便是一例。

张居正是一个好色之徒。他的管家游七投其所好，专门收罗各种房中药供他纵欲。据说，戚继光还给他送过两名少数民族美女。

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时，万历皇帝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他的母亲把辅佐和管教小皇帝的双重责任全权委托给了张居正，张居正就以首辅兼帝师的双重身份来摄政。

张居正从北京回家乡江陵安葬父亲灵柩时，有一个官员送给他一座硕大无比的轿子，前面是起居室，后面是卧室，边上有走廊。张居正坦然处之。

张居正是精通权术的人，他担心代帝摄政没有好下场。于是在他权势显赫的后期，曾经先后三次向皇帝提出辞职，但都没有成功。他至死也没有能够急流勇退。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使得皇帝的亲政提前到来。皇帝亲征后，必须消除笼罩在他头上的张居正阴影，否则无法树立自己的威

权。皇帝首先罢了与张居正结成权力联盟的冯保的官职，让他到南京去赋闲养老。

在皇帝眼里，原先与张居正联手缔造新政的功臣，一下子变成“专权乱政”“谋国不忠”的奸臣，并抄了他们的家。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受不了主持抄家的刑部侍郎丘橓的严刑逼供，自缢身亡。

在海瑞看来，张居正善于为国家谋划，而不善于为自身考虑。张居正的悲剧，无疑是一桩冤案。天启二年(1522 年)，明熹宗给张居正平反。崇祯三年(1530 年)，明思宗给张居正的后人平反。

第三节　清官海瑞逸事

海瑞，数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景仰。

正德八年(1513 年)，海瑞出生在海南一个官宦世家。嘉靖二十八(1549 年)，他 36 岁时才考中举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年底，40 岁的海瑞被任命为福建延平府南平县教谕(类似于县级学校校长)。海瑞在上任不久就引起了朝野的关注。

延平府的督学官到南平县视察工作，海瑞和另外两名教官前去迎见。在当时的官场上，下级迎接上级都是要跪拜的。随行的两位教官都跪地相迎，可海瑞却站着，只行抱拳之礼。这位督学官大为震怒，训斥海瑞不懂礼节。海瑞却说：“按大明律法，我堂堂学官，为人师表，对您不能行跪拜大礼。”这位督学官虽然怒发冲冠，却拿海瑞没办法。

几年后，海瑞因为考核成绩优秀，被提升为浙江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淳安县经济比较落后，又处于南北交通要道，接待应酬，多如牛毛，百姓不堪其扰。海瑞上任后，严格按标准接待，对吃拿卡要的官员毫不客气。

有一次，都御史鄢懋卿到淳安县视察工作，此人是严嵩的手下，海瑞拒绝给他浩浩荡荡的随从队伍提供食宿，气得鄢懋卿只好绕道而行。

海瑞在淳安县任上时，穿布袍，吃粗粮，让老仆人在自家后园里种菜，自己下朝后也常和家人一起劳动。酒肉之类的食物，平时难得吃上一次。有一次，为了给母亲过生日，海瑞只买了两斤肉。结果此事不仅传遍了他当时任职的淳安县城，甚至整个官场都知道了。

随着严嵩的倒台，凡是过去敢跟严嵩党羽作对的人，大都升了职。海瑞也官升两级，上调到京城户部工作。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海瑞到京赴任。此时在位的嘉靖皇帝已年近花甲，他崇信道教，一意修仙，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而且还刚愎自用，喜好阿谀奉迎，导致国事荒废，民不聊生。海瑞直接给嘉靖皇帝递了一道奏疏。在罗列了嘉靖皇帝的种种恶行后，海瑞毫不客气地说："皇上你昏聩多疑、刚愎残忍、自私虚荣。既是昏君，又是暴君。既不是一个好皇帝，也不是一个好男人。普天下的臣民百姓，早就对你有意见了。希望你改掉这些坏毛病!"嘉靖皇帝刚读了一半，就愤怒地把奏疏扔到地上，并命人把海瑞关入大牢。

海瑞骂皇帝的事，很快就在朝野上下传开了。出狱以后，海瑞的名气更大了，他的刚烈作风在官场也越发显得超凡脱俗。

隆庆三年(1569年)夏，海瑞被任命为应天巡抚。应天就是今天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当时大明帝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当地的官员听说海瑞要来主政，都非常害怕。一些人请求调离工作，一些人请求告老还乡。那些飞扬跋扈的权贵，纷纷把宅门由红色改漆成黑色；平时作威作福的宦官，也把乘坐的轿子由八人抬大轿换成四人抬小轿。

海瑞在担任应天巡抚期间，下令境内公文一律使用廉价纸张；公文后面不许留有空白，以免浪费。他甚至干预官民的私生活，就连佩戴奢华的首饰、食用甜美的零食，也在禁止之列。

隆庆四年(1570年)，海瑞辞职回到海南老家时，只能住在早已破旧不堪的旧宅里，靠祖上留下来的几亩薄田度日。他甚至常常靠给别人写一些东西，收取稿费来贴补家用。海瑞的母亲去世后，还是靠别人的资助才买了一块坟地将母亲安葬。

主持国政的张居正特意派一名御史到海南探望海瑞。这位御史到海瑞家中时，海瑞正在地里忙农活。海瑞便倾其所有，杀了一只鸡来招待御史。御史见海瑞住得冷清简陋，连连叹息，告辞回京。

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亲政，他让海瑞做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尚书。这让誓死效忠朝廷的海瑞很是失望。他竟一口气向万历皇帝递交了七封辞职信，但均未获准。海瑞只好留在南京任上，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没过多久，他就郁郁寡欢地去世了。

海瑞的死讯传后出，南京的商户和百姓自发罢市以示祭奠。在海瑞的灵

柩用船运回家乡的途中，披麻戴孝的人站满了两岸，祭奠哭拜的人百里不绝。很多百姓还在家中供着海瑞的画像。

海瑞去世后，都御史王用汲去拜谒，在葬礼现场，看到的只是用葛布制成的帷帐，破烂不堪的竹器。而这些东西在当时连最贫寒的读书人也不愿用。

海瑞的一生中，共有两妻一妾。海瑞的第一位夫人是许氏，她为海瑞生有两个儿女。嘉靖二十五年(1546 年)，海瑞 32 岁时，许夫人被海瑞休弃了。接着海瑞又娶了王氏，王氏为海瑞生了两子一女。隆庆二年(1568 年)7 月 24 日晚上，王夫人突然病逝。海瑞的小妾时邱氏，为晚年的海瑞生了一个儿子，但孩子长到三岁就夭折了。

第四节　沈有容:收复台湾第一人

明弘治年间，明政府为了防止沿海商人联合海外势力危及朝廷统治，开始实行严格的禁海政策，不许他们与外国商旅接触，更不许私自交易货物，这样就可将防御的重点放在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上。但此战略布局并未收到实效，反而给海外势力可乘之机，最先骚扰东南沿海的是倭人。

明朝初期，倭寇尚处于小打小闹的阶段，到了嘉靖年间，倭乱终成心腹大患，随着戚继光、俞大猷将军重创倭寇，大批倭寇只得窃据台湾，伺机劫掠东南沿海。

鉴于此，明朝政府便在澎湖群岛设立巡检司，以加强澎湖地区的军事部署，后又增设“澎湖游”，派遣 800 名士兵在春秋两季汛守澎湖。即便如此，盘踞台湾的倭寇仍然以台南为根据地，与明朝政府军打起了游击战。

目睹此情此景，时任浯屿(金门)把总的沈有容义愤填膺，他跑到福建巡抚宗弘演处明确表达了自己愿亲率大军扫荡在台湾倭寇的决心。宗巡抚大为感动，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沈有容为平定台海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一方面派人侦察敌情，了解气候、风向、海流情况；另一方面则造船、练兵、储粮。为了出奇制胜，他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万历三十年(1602 年)冬，沈有容亲率 21 艘水师战舰秘密出海，不料中途骤遇飓风恶浪，七艘较小的战舰被巨浪吞没。属下心惊胆战，力劝将军回师浯

屿。沈有容毅然决定继续向前。

倭寇哨兵见滔天白浪之中隐约有船队驶来,十分狐疑。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沈有容的先遣军已联合水师向舰中、陆上倭寇发起两路攻击。明军殊死冲杀,倭寇滩涂部队抵挡不住,死伤无数,纷纷投降。沈有容接着下令向岛内纵深穿插,倭寇来不及撤退,全都被明军消灭。

台南之役,沈有容的军队共击沉日舰 6 艘,斩首 15 级,救回被劫持百姓 370 人,俘虏倭人数百名。台湾百姓终于摆脱了倭人的暴政。

沈有容克复台湾后,仅过了两年,野心勃勃的荷兰人又来了。

嘉靖三十六年(1557 年),葡萄牙人用贿赂的方式租借澳门,随后把魔爪伸向了台湾。荷兰人垂涎于葡萄牙人的既得利益,决定如法炮制,其战略构想的第一步就是占领台湾和澎湖,将其作为对华贸易的基地。

万历三十一年(1603 年),荷兰人在奸商李锦、潘秀的引领下,利用明朝汛兵撤离澎湖回大陆休整之际,出动两艘巨型炮舰强占澎湖,并在岛上伐木建房,想把澎湖改造成"澳门第二"。

为了打击荷兰人的嚣张气焰,福建巡抚决定拨 50 艘战舰给沈有容,让他二剿澎湖。可是这一次沈有容却主张谈判,巡抚便委派沈有容为使者,赶赴澎湖"谕退红夷"。

荷兰舰队司令韦麻郎做梦也没有想到,堂堂明军将领竟会驾着舴艋舟前来谈判。在谈判中,翻译林玉把明朝 50 艘战舰正在合围两艘荷兰炮舰的态势通报给了荷兰人。韦麻郎只得审时度势,明智地退出了盘踞半年之久的澎湖。

欧洲海上新霸主同明政府的首次较量就这样被沈有容以不流血的方式化解了,这是中国外交史上一次成功的折冲樽俎事件。

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日本内乱。失势的日本武士被迫离开本土,妄图南下占领台湾作为根据地。南下的倭寇有两股势力,一股以明石道友为首,窃据澎湖;另一股以狄安为首,盘踞东沙岛,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台湾。

在此紧要关头,明政府调沈有容任福州参将,统领水师,再剿倭奴。沈有容到任后,首先放弃强攻,以商船为诱饵,活捉明石道友,制伏澎湖守敌。接下来利用两股倭寇的仇隙,以明石道友的军力全歼东沙岛倭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典战例。

沈有容在闽海守边多年,足迹遍布海峡两岸,屡立赫赫战功。沈有容用

兵，擅长出其不意，斗智斗勇。万历皇帝听说沈有容歼倭驱夷的事迹后，连夸他“实良将才”。

第五节　五朝太监萧敬

萧敬（1438—1528年），字克恭，别号梅东，延平府南平县（今福建南平市）人，司礼监太监。他自幼入宫服役，因聪明伶俐，被选入司礼监内书堂读书。他学习努力，进步很快。天顺初年，任长随。

明英宗朱祁镇发现他很有心计，所以信用他。天顺二年（1458年），萧敬升为奉御，不久再升为御用监左监丞。天顺五年（1461年），萧敬升为右少监。英宗很宠爱萧敬，相继赐给他蟒衣玉带和多种珍宝。端午节那天，皇帝亲自检阅射箭，萧敬按着马鞍，连发三箭，箭箭中的，英宗十分高兴，从此对他更加关怀、赏识，把他升为佥书监事，每年还给禄米若干石。萧敬奉使到荆州、襄阳办事，各地方官的奏报都说他行事清静，注意影响，没有骚扰老百姓。天顺八年（1464年），英宗去世，萧敬被派到神宫监负责烧火。

成化三年（1467年），萧敬调到内宫监，负责管理仓储粮饷。他的账目出纳清楚，把过去一些弊漏基本上剔除了，过了不久，便升为司礼监佥书，并受命前往勘查武冈、蕲州等藩府的大案。在那里，萧敬排除干扰，审问清楚，办案公正，回来汇报情况亦扼要清晰，宪宗对他很满意。

但是，萧敬与当时掌管东厂的权宦尚铭关系密切，而尚铭则是一个罗织京师富宝勒索重贿，卖官鬻爵无所不至的人。在成化末年，尚铭被抄家，谪放到南京当净军。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宪宗去世时，为躲避牵连，萧敬主动请求到裕陵司香。

弘治初年，萧敬屡次受到朝臣弹劾。但孝宗庇护他，为他开脱。

弘治三年（1490年），司礼监出了空缺，大家都认为萧敬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孝宗起用他为司礼监太监，参与一些重大的军政问题。

萧敬为人谨慎，熟悉典故，每当皇帝询问事情，他都了如指掌，能按规章制度给予清楚而详细的回答，而且常有正言规谏，所以孝宗很重视他，多次命他负责安排冠、婚、丧、祭等多种重大的典礼，检阅团营兵马。萧敬受命会同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审讯重大案件时，他审问得仔细，判得很恰当。

当时张皇后的弟弟寿宁侯张鹤龄、建昌伯张延龄，都借着帝后的宠爱，纵容家奴违法乱纪，科敛钱财，被朝廷内外许多官员弹劾，但孝宗都不予追究。可是，当案子落到萧敬手里时，他按照法律作了判处，不稍宽贷，这使得大家对他都很信服。

弘治十八年（1505年），孝宗病危，把太子托付给了萧敬，这就是后来的武宗。

正德七年（1512年），武宗起用萧敬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赐给他绣着坐蟒的袍子，准许萧敬在宫中乘小轿出入。这时他已经74岁了，但对时事仍然能常常提出好的意见。正德十二年至十四年（1517—1519年），武宗经常打着"巡视"的幌子到外地游荡作乐，萧敬和一些宦官、朝臣极力劝谏，都无法制止。

武宗让萧敬留守京师，京师内外的人都重视和依靠他。但是，由于萧敬曾和宁王朱宸濠有交往，所以朱宸濠谋反失败后，武宗虽然因为萧敬年老，不予逮捕，但仍罚了他的钱，并将他罢免。

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病逝，没有儿子，由藩王朱厚熜入承帝位，就是世宗。世宗因为萧敬德高望重，又熟悉宫廷各种事务和礼制，所以特地诏令他入宫管理机务。世宗到南北郊祭祀，逢年、节、四时用酒食祭拜太庙，视察国子监，耕籍田的时候，都由萧敬侍从。当时萧敬已经85岁了，仍然头脑清楚，精力充沛，在宫中进退周旋，行步不差尺寸。但是弹劾萧敬的官员亦不少。

嘉靖元年（1522年），萧敬因屡受廷臣弹劾，请求告老退休。世宗准许了他的请求，并念他过去的功劳，除年俸外，每月再加米十石；每年拨十人给他役使；逢年过节都像过去一样赐给他时令食品。这样的待遇，比退休的内阁大学士还要高，也是以前的宦官从未得到的。

嘉靖七年（1528年），萧敬在宫外私宅病逝。世宗命司礼太监赖义负责丧事的礼仪，御马监太监韩锡等综合办理有关丧葬的事。谕祭三坛，赐新钞三万缗。敕命要切实办好棺木、造墓、建享堂等事。皇太后赐给白金100两，文绮4表里。大学士翟銮为他撰墓志铭，杨一清为他写墓表。

萧敬历侍六位皇帝，他四次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四次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前后长达50年。他名下的宦官有百人之多。他对待士人温和恭敬，从不揽权牟利，拉帮结派。

萧敬虽然在皇帝身边几十年，但宅第始终还是原来那一处，没有为自己添置产业。萧敬退休后更是杜门不出，绝口不谈时事，只和相知的来客赋

诗、鼓琴、下棋。像他这样不敛财、不滥用权力的宦官，在明朝中叶后是很难得的。

第六节　张三丰真面目

传说张三丰是武当山道教的开山祖师，他不但发明了太极拳，还把道教的影响力带到了一个新高度。那么，张三丰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综合各类史料，大致可以确定，张三丰名全一，又名玄玄、通一，出生于1247年或者1248年。出生地一说在今天的辽宁黑山县，一说在陕西宝鸡，还有的说在福建邵武市。

据说，他长相不凡，大耳朵大眼睛，"龟形鹤骨"，络腮胡子像钢丝一样，头上梳了个髽髻，喜欢在手中拿一把方尺。无论寒暑，他只穿一件百衲衣，在大街上四处游逛，人送外号"张邋遢"。张三丰平时说话不多，但与之讨论佛儒道三教，则侃侃而谈。

张三丰登山如履平地，隆冬季节躺在雪地里也可以安眠。

史载洪武初年，他在武当山建立了几个道教教观，使其弟子丘玄清住在五龙，卢秋云住在南岩，刘古泉、杨善登住在紫霄。他自己则在展旗峰北设观，名为遇真宫，又在黄土城建屋，名曰会仙馆，令弟子周真得看守。

洪武初年（1368年），张三丰已经120岁了。更令人惊奇的是，1390年，张三丰离开了人们的视线，不知所踪。而此后不久，朝野上下掀起了一个寻找张三丰的热潮。

先是朱元璋派人到武当山找张三丰，均不得见。有人说他可能去了山东青州的云门山洞窟中。朱元璋的手下追到青州后，还是没看到张三丰。

朱元璋找张三丰，据说是为了清理道教，找寻的心情还不是很迫切。

朱棣登基以后，马上派侍读学士胡广去武当山访求仙人。胡广来回数次，问遍了所有人，十多年时间都没有结果。

为了讨好张三丰，永乐帝在武当山大兴土木，为张三丰建造了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

按说像张三丰这么大岁数的人，人们也该猜到他或已不在人世，为何还要苦苦寻觅呢？原来，民间一直流传着张三丰仍在全国各地游走的行踪。

杨溥所著的《禅玄显教编》中就说，张三丰曾经在陕西宝鸡死而复生。河南柘城县人张某，声称自己在一个道观见过张三丰。张某后来入朝当官，跟永乐帝提起此事，永乐帝便派他跟随胡广一起到武当山找张三丰。

这些真假难辨的消息像兴奋剂一样刺激着皇帝们的神经。若能找到如此一位仙人，向其当面请教长寿之道，岂不可以享尽人间荣华富贵！

明朝的历代皇帝都坚信张三丰还活在世上，并纷纷给其封号。明英宗赐号“通微显化真人”，明宪宗封其为“韬光尚志真仙”，明世宗赠封他为“清虚元妙真君”。

那么，张三丰到底去了哪里？是死是活？据《古今太极拳谱及源流阐秘》的作者李师融考证，张三丰卒年应在明朝天顺二年（1458 年），其寿为 212 岁。这是根据零星的文字记载推断出的，很多人也认同这个说法。

无论如何，张三丰最后还是死了。死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

第七节　坚持裸葬的黄宗羲

生活在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人、学者、思想家。由于家世的关系，黄宗羲很早就开始卷入晚明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他是在血海深仇中成长起来的。中年时期，他又碰上了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一次改朝换代。种种内忧外患，让他的一生历尽劫难，在百折不挠、颠沛坎坷之后，终于成长为一代大师。

黄宗羲死于 1695 年，但早在 1687 年，他就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对后事的安排还引来了一场轩然大波。

黄宗羲一生抗清，晚年从事学术文化活动，不被人理解，内心十分痛苦。这种痛苦反复折磨着他，使他对自己的葬礼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

按照传统，人去世之后，一般都会穿上寿衣，放到木制棺材里下葬。黄宗羲却希望自己死后将头发散开，盖上一条单被，放在一副石头棺材里裸葬。清朝入关以后，老百姓都要扎辫子。散发表示不愿意再扎辫子，不再当清朝的老百姓。这是当时很多明朝遗民的做法，倒也不稀奇。但尸体不穿寿衣，放在石棺里很容易因虫蚁啃噬而迅速腐烂，这种下葬的方法就很难被人们接受。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很为难，于是就请自己的族叔前去和黄宗羲商量，看能不能

让他改变主意。结果黄宗羲非常不高兴，特意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儿子，说对于父亲的遗嘱，儿子都要遵守，否则就是逆子。而且，作为儿子，不能阳奉阴违，一边答应父亲，另一边却希望父亲去世后仍按照普通的葬法来安葬。这让黄百家感到非常委屈。

那么，黄宗羲为何如此激烈地坚持自己的想法呢？当时就有很多人猜想，说黄宗羲一定有心事，也有人说这是黄宗羲洒然超俗的表现。

雍正时期，有人写了一篇《黄梨洲先生裸葬说》的文章，说黄宗羲之所以坚持裸葬，是因为他的父亲黄尊素被害后全身腐烂，黄宗羲对此耿耿于怀，所以希望自己死后也烂掉，才敢去九泉之下见父亲。这种说法只是猜测而已。

其实，黄宗羲之所以坚持裸葬是为了求得死后尸骨速朽。在黄宗羲心中，他的一生是失败的：在父亲被害时，他没能陪伴父亲一起对抗；在老师刘宗周绝食身亡时，他为了抗清匆匆离去；当朋友们在抗清的战役中殉国时，他却苟活了下来。他虽然战斗过、抗争过，却没有战死在沙场上，而是活到了 80 多岁。他晚年的事业也不为世人理解，有何面目到地底下去见父亲、老师和朋友？亡国之恨一直缠绕在他的心头，所以他要散发，不再绑辫子；所以他要裸葬，而不穿满族的异族寿衣；所以他要躺在石棺里，期待迅速腐烂。

黄宗羲是一个遇事反应比较激烈的人。他性格急躁、爱较真儿。他之所以不被好友和亲人理解，很多事情不能处理得圆满，都与他的性格有关。

黄宗羲更是一个立身严谨的人，他不像其他的文人学者那样有很多风流韵事让别人评说。他的一生忙忙碌碌，似乎永远在和黑暗的现实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几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仔细品味黄宗羲的一生时，才慢慢发现他的思想、情感与痛苦，永远是我们的文化财富。

第八节　唐伯虎的坎坷人生

《明史》唐寅本上说，唐伯虎天生聪明伶俐，他年轻时与街坊张灵一起整天狂喝滥饮。后经好友祝枝山规劝才闭门读书。

其实，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风流不羁不假，但有关他的那些奇闻艳事，却多属野史稗记所附会。在他风流传说的背后，是仕途的坎坷与生活的凄怆。

唐伯虎在 20 余岁时，家中连遭不幸，其父母、妻子、妹妹相继去世，家境也

随之败落。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唐伯虎参加乡试,以第一名高中举人,故有"唐解元"之称。当时录取他的考官梁储对其文章颇为赞赏,并把唐伯虎的文章推荐给朝中学士程敏政,程敏政也对其文章赞叹不已。

不久,程敏政出任会试主考官。江阴有一徐姓富户通过买通程家仆人,偷出考题作弊。此事败露后,御史弹劾程敏政,唐伯虎也被关入大牢。后来有人向明孝宗奏报唐伯虎是冤枉的,弘治帝赦免了唐伯虎,将其贬为小吏员。

心高气傲的唐伯虎瞧不起一个办事小吏员的职位,他觉得这是奇耻大辱,于是拒绝赴任。在唐伯虎最失意落魄时,他的第二任夫人离他而去。仕途失意与婚姻失落的双重打击,让唐伯虎痛不欲生,行为更加放浪不羁。他开始以卖画为生,整天借酒浇愁,纵情欢场,消磨时光。

正德九年(1514年),江西的宁王朱宸濠用重金聘请唐伯虎到宁王府做幕僚。唐伯虎在南昌宁王府入幕半年多后,觉察到宁王蓄意谋反,便故意装疯卖傻,甚至当众脱光裤子,裸奔街头。宁王实在难以忍受,就放走了唐伯虎。

后来宁王果然起兵造反,但很快就被朝廷平定了,宁王一干人被诛杀。唐伯虎侥幸逃过了杀身之祸。

唐伯虎返回故里后,在苏州城北宋人章庄简废园址筑室桃花坞,后半生便在这桃花坞中,与吴中的朋友整日饮酒作乐、吟诗作画。

晚年的唐伯虎贫困凄怆。他因常年多病,不能经常作画,加之不会持家,使得生活艰难,甚至经常靠向好友祝枝山、文徵明俩人借钱度日。唐伯虎54岁那年在穷困潦倒中谢世。

第九节　名妓柳如是的救国梦

明末有名的美女加才女柳如是,位列秦淮八艳之首,嘉兴人。柳如是本姓杨,名云娟。

柳如是的童年和少年充满了不幸。幼年时就被卖入青楼。柳如是14岁时,嫁给了年逾花甲的大学士周道登为侍妾。周道登是状元出身,非常喜欢聪明伶俐的柳如是,常把她抱在膝上,教她学问。导致周道登家的其他妻妾醋意大发,柳如是相当孤立。周道登死后,柳如是被迫重操青楼旧业。此后一段时期,柳如是以影怜之名独张艳帜,风靡吴越。

柳如是喜爱和文人交往，这些人中就有她的初恋情人宋辕文，但由于宋辕文母亲和郡守的阻拦，他们最终未能走到一起。

柳如是接下来结识了比她大十多岁的陈子龙。他倾听柳如是的心中烦事，共同煮酒赏花，品茗吟诗，那是一段非常烂漫的时光。

崇祯七年(1634 年)，她再次出游嘉定。在那里，柳如是受到了诗坛老前辈的热烈欢迎。柳如是的这次嘉定之旅只待了两个月，主要靠年已七旬的程孟阳张罗，她一度借住在他家。崇祯八年(1635 年)春，柳如是和陈子龙同居了，房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然而，他们在一起仅仅度过了一个春天。这个时候，张孺人惊了这对鸳鸯。这一年，柳如是 18 岁。

崇祯十二年(1639 年)夏天，60 多岁的东林领袖钱谦益在原配健在的情况下，明媒正娶了比自己小 36 岁的柳如是。钱谦益为柳如是另筑精室，以柳如是的号“我闻居士”命名为“我闻室”。他们日夕晤对，谈诗论文。

柳如是与钱谦益，一个是美艳的妓女，一个是高官兼文人，他们却有着思想共鸣，更重要的是，两人的抱负都不浅。

柳如是常与人纵论天下兴亡。她还常以妓女出身而能破敌救国的梁红玉自比，希望成就一番事业。

弘光二年(1645 年)五月，清军打到了南京。二三十万南明守军望风而逃，弘光帝丢下南京自己逃命去了，此事史称“乙酉之变”。当时，钱谦益以礼部尚书的身份留守南京。柳如是见明朝灭亡的命运已无可挽回，就劝钱谦益千万不能干对不起祖宗和国家的事。



柳如是

几天后，鼎鼎大名的文坛巨匠钱谦益出城降敌。这其中的原因，有对死亡的恐惧，也有担心自己作为知名人士以及高官，如果杀身成仁，会连累城里成千上万的人。之后，钱谦益作为清朝的官员要北上任职，柳如是拒绝随行，独留南方。然而，不到半年，钱谦益失意而归。

钱谦益回到家乡不久，卷入了一件反清复明的重案中，并锒铛入狱。后来，靠着柳如是的精神支撑，以及她的四处奔走，案子不了了之。日后，他们还曾与郑成功以及南明永历朝廷联络，图谋复辟，但都没能成功。

1664年,83岁的钱谦益去世。当晚,柳如是用一根白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钱谦益的儿子钱孙爱以匹嫡之礼将她埋葬。

第十节　陈圆圆归宿之谜

陈圆圆,原名陈沅,苏州人。她天生丽质,既有天生的好嗓子,又工于声律,书棋琴画都很娴熟,是蜚声江南的绝代佳人。

明末内忧外患,崇祯帝抑郁寡欢,田妃为讨他欢心,让自己的父亲田弘遇到江南寻选美女为崇祯帝稍解苦闷。田弘遇到江南花了20万两银子接走陈圆圆,崇祯帝成天忧虑不好女色,陈圆圆进宫后又很快被退回田府。陈圆圆在田府锦衣玉食的环境中,日日歌舞宴饮,技艺更加精进,声名响彻京城。

宁远总兵吴三桂,手握一支10万人的精锐部队,在山海关防御清军的入侵。吴三桂回京时,田弘遇想深结他作为以后的依靠,就让陈圆圆招待吴三桂。吴三桂一见到陈圆圆,疑为天仙,又惊叹她的才艺,于是向田弘遇索取陈圆圆。田弘遇便将陈圆圆送给了吴三桂。

由于前方军情紧急,吴三桂只得将陈圆圆安置在京城,自己返回山海关。就在此期间,李自成军攻入了北京,崇祯帝吊死在煤山。

李自成军进京后,刘宗敏将吴三桂的父亲抓来拷打,并抄了吴家,掠走了陈圆圆。据说当时吴三桂一听到陈圆圆被霸占,立即"痛哭三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表面为崇祯帝举丧,实则为报夺妻之恨,立誓与李自成为敌。

吴三桂投清打败李自成之后,在追击大顺军途中找到了陈圆圆。吴三桂坐镇云南后,即在昆明翠湖、莲花池等处大兴土木,与陈圆圆共赏风花雪月。

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开始举旗叛乱。陈圆圆苦劝无效,便请求吴三桂允许她出家。吴三桂在昆明凤鸣山为她修筑了一座金殿,让她在此带发修行。

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同年秋,吴三桂在焦虑中死去。吴三桂死后,叛军很快瓦解。两年后,清军攻入昆明。

吴三桂兵败之后,陈圆圆下落不明。

历来关于陈圆圆的最终归宿,在民间有以下五种说法:

一是先死说。刘健在《亭闻录》谈道,清军攻入昆明时,陈圆圆已先死。

二是自缢说。孙旭在《吴三桂始末》一文中称：昆明城破之后，陈圆圆和吴世藩的郭皇后都自缢而亡。

三是投水说。阮福在《后圆圆曲·序》说，陈圆圆在昆明城破后自沉于莲花池，随即被人葬于池旁。

四是出家说。关于陈圆圆出家又有两种说法。其一，余兰仙说她自望海楼再迁而入金马山，借梵修以自保，死后即安葬金马山；其二，在昆明瓦仓庄三圣庵中发现了据称是陈圆圆的寂静画像。

五是隐居岑巩说。岑巩县的文史工作者在经过一系列的考证后，提出了陈圆圆葬于古思州治地（今黔东南州所辖）岑巩县水尾镇马家寨的狮形山山麓的说法。

尽管有以上五种传说，但每一种传说都没有找到确切的实物证据，陈圆圆的归宿至今仍然是个谜。

第十一节　奸相严嵩的腐败与亮点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把持朝政达 20 多年的奸相严嵩终于倒台了，其子严世蕃斩于京师，人心称快。严嵩虽然没死，却受到了抄家的处置。据说，东厂、西厂在抄严嵩的家时，有过一本账，后来印成一册书，书名《天水冰山录》，记载了严嵩 20 多年来所积聚起的像山一样的财富。严嵩发迹较晚，其春风得意时已 60 多岁，但捞起钱来，却永无厌足。他一进入内阁，就把嘉靖皇帝哄得团团转，马上把几个同僚如曾铣、夏言等排挤出局，正直大臣如杨继盛、沈链等予以杀害。从此，他作为首辅，主政长达 21 年。这段时期，也是嘉靖跟大臣闹情绪，索性不理朝事，搬到西园去炼丹，拒绝上朝的罢工时期。朝臣们都无法见他一面。严嵩独蒙圣眷，才有了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的贪污、作恶机会。

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比他更坏，两人沆瀣一气，卖官鬻职，贿赂公行，敲诈勒索，作恶多端，搜刮民财，疯狂聚敛。据《天水冰山录》记载，仅在他北京的府邸和江西的老家查抄出来的财产计有：纯金器皿 3185 件，重量 11000 余两；玉器 857 件；耳环耳坠 267 双；布缎绫罗纱绒 14300 余段；扇柄 27300 余把；南昌和分宜的宅第房店 3300 余间。

但清人赵翼认为野史所载“每百万为一窖，凡十数窖”的说法，比较接近实际。

显然，严嵩的贪污所得绝对不止书上所说的这个数字。这里面有嘉靖帝给自己好交代的因素在内；试想，他这个当皇帝的宠幸了一个20年的亲信，竟成为这样的巨贪，那么，在历代帝王中，他恐怕也算是一个昏君之最。于是不得不想法关照东厂、西厂的锦衣卫，去查抄时，尽量缩小其账面额度，以遮掩天下人耳目。所以杀了严世蕃以后，嘉靖帝特意饶了严嵩一条命，让他削籍回乡看守坟茔，证明他并非罪不容诛，也有稍稍给自己留一点面子的意思在内。

在嘉靖帝的包庇下，严嵩在穷凶极恶地贪赃枉法、想尽办法疯狂攫取、权钱交换无可餍足、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时，根本想不到他所营造的金山银山，可惜是座冰山，太阳一出便化了，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在古代官员中，曾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讨个小、刻个稿”。明朝更是官员纳妾成风，尤其是有一定品级一定地位的官员，如果没有一两个妾，就好像不正常似的。

严嵩一辈子作恶多端，坑过的人不计其数，真可谓十恶不赦。但他也有着一个全心全意、相知相守的人。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欧阳氏。

据记载，严嵩的妻子名叫欧阳淑端，严欧两人是娃娃亲，由于两家是世交，使他们两人有了青梅竹马的培育温床。严嵩是属于高攀欧阳家的，欧阳氏自20岁与19岁的严嵩完婚。后来严嵩得势，位高权重，欧阳淑端随他进京，治家颇有手腕，德才兼备，被封一品诰命夫人。她会写书法，天天在严嵩面前反复练写“六必居”三个字。严嵩看夫人写不好，他就给写个样子，让夫人照着样子去练，可谓相敬如宾。

原先正直的严嵩在官场扑腾数年后，慢慢地发生蜕变，成了左右逢源、溜须拍马、阴险毒辣、无恶不作的坏人。但从严嵩对夫妻的感情来看，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亮点。

第十二节　徐阶与严嵩的斗争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三月，徐阶以少保兼礼部尚书的身份进入内阁，当时的内阁首辅是严嵩。他们之间的政治斗争就此开始。

起初，徐阶委曲求全，尽藏锋芒，以便博得世宗的欢心。

徐阶不仅精心撰写“青词”（道教举行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还主动请求为嘉靖帝烧炼灵芝。有一次，嘉靖帝将五色灵芝分给严嵩等人，让他们按药方烧炼仙丹。嘉靖帝没有将灵芝分给徐阶，对他说：“你负责政事，这事就不要掺和了。”徐阶奏道：“身为人臣，最重要的事就是保佑天子享福万年，炼仙丹难道不关乎政事？”嘉靖帝听后，非常高兴，马上将灵芝分给徐阶，让他参与了炼长生不死之药的活动。

嘉靖帝中年以后，长住西苑（今中南海）。西苑宫室湫隘，嘉靖帝想要重修。严嵩反而劝嘉靖帝迁回大内。嘉靖帝因此对严嵩很不满。他转而询问徐阶，徐阶领会了嘉靖帝的意图，建议以修建三大殿的余材，让工部尚书雷礼负责重修西苑。嘉靖帝任命徐阶之子尚宝丞徐璠任工部主事，负责营建事宜。十年之后，新宫建成，嘉靖帝立即搬了进去。自此嘉靖帝更加亲近徐阶，疏远了严嵩。

严嵩见自己败局已定，害怕徐阶报复，转过来乞怜于徐阶。有一天，严嵩摆酒设宴隆重地宴请徐阶。他让儿子严世蕃率子孙家人跪拜徐阶，自己举杯说：“我旦夕且死，他们唯有请徐公照顾了。”徐阶表面上客客气气地表示不敢，内心则窃喜。

道士蓝道行以善于扶乩（假借神鬼名义，两人合作以箕插笔，在沙盘上画字，以卜吉凶）闻名士大夫间，徐阶将他推荐给了嘉靖帝。于是蓝道行进了西苑，为嘉靖帝预决吉凶祸福。他串通嘉靖帝的心腹太监，所以言事屡屡奇中，使嘉靖帝深信不疑。

有一天，严嵩有密札进呈，徐阶事先通告了蓝道行。蓝道行便进行扶乩活动，预告说：“今日有奸臣奏事。”一会儿，严嵩的密札送到了。就这样，通过仙语道术，在嘉靖帝的心中，严嵩已有奸臣之嫌了。还有一天，嘉靖帝又让蓝道行扶乩，世宗问：“谁是贤臣，谁是奸臣？”蓝道行借乩仙之口说：“贤者如辅臣徐阶、尚书杨博，奸臣如严嵩父子。”

在徐阶的布置设计之下，严世蕃终于以“勾结倭寇、蓄意造反”的罪状被杀，严嵩家产被抄，凄凉地死去。至此，徐阶在与严嵩的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第十三节　“杀人狂”张献忠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暴君虐将，他们的残虐酷杀皆有极大的目的性，属于冷静思考下的有计划杀人。但是，像明末张献忠这样无目的性的嗜杀狂，中国历史上仅此一人。

崇祯十六年(1643年)年底，本来已在湖南和江西作战取得重大进展的张献忠，忽然弃两省之地大举入川。原因是李自成的势力太大，张献忠觉得自己斗不过他，索性走远一些，以免两虎争食。

张献忠入川后，越下牢，渡三峡，如入无人之境，克涪州后，直捣重庆。

本来，重庆三面临江，易守难攻。张献忠将坚硬的石墙炸塌，军队一拥而入。

张献忠入城后，先剐杀守城的巡抚陈士奇等人，然后又把明神宗第五子瑞王朱常浩绑至法场。张献忠亲自上前砍下瑞王头颅，并杀其家属及重庆官吏1万多人。

此时的张献忠，杀心不算太重，对被俘的3.7万名明军作了如下处理：每人砍掉一只胳膊，尽数放走。于是，操武场上堆满了3万多血淋淋手臂。这些只剩一只胳膊的士兵逃出重庆四窜，成为张献忠的“活广告”。诸城士民骇走，望风狂逃。

张献忠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成都。成都是大明王朝的富藩，可惜蜀王是个财迷，不肯拿出王府的金银来犒军。

经过四天对成都的攻城，张献忠攻入城中，蜀王夫妇、当地巡抚及总兵皆投井自杀，巡抚刘之勃被捉。张献忠把他绑在校场上，劝他投降。刘之勃大骂。这让张献忠十分恼怒，便令人慢慢剐他。刘之勃按大声说：“宁多剐我一刀，少杀一百姓！”贼军把刘之勃剐后放箭射死。

成都失陷后，四川大部分州、府、县应声而溃，很快皆为张献忠所占。只有遵义(今属贵州)、石柱(秦良玉部)以及黎州被攻下。

张献忠在成都立稳后，建立大西国，称帝。他首先娶大学士陈演之女为皇后，仅仅过了十天，张献忠生厌，便一刀砍下陈氏的脑袋，并派人杀尽了她在成都的所有亲属。

张献忠还"开科取士",共收取"进士"130人。一夜之间,他忽然变脸,把进士们全杀了。

当时,川中各地赴试生员还皆未离开,张献忠假称再试,尽诱其人于青羊宫,进一个杀一个,共杀约1万人,士子们所携应试用的笔砚,一时间堆积如丘。

杀尽文生后,张献忠佯称开武科。数千武举齐集校场,皆配发一匹劣马乘骑。忽然间,巨炮一响,金鼓齐鸣,军队乘壁射箭,把武举们当成猎物,一一射死。侥幸未死的,堕于地上,被践踏成泥。

当"大西皇帝"的朝臣更惨。早晨上朝,张献忠打了喷嚏,感觉不爽,立即让兵士把300多人拖出去杀了。

有时朝会,张献忠又会牵出数十条巨大的獒犬下殿,只要獒犬嗅谁,谁就会立刻被拖出去斩首,名为"天杀"。

由于张献忠统治残暴,川地郡县皆痛恨张献忠,人民纷纷反抗,袭击伪官和张献忠的士兵。

张献忠大怒之下,下发"除城尽剿"的命令,派出军队到各地屠戮民众。穷乡僻壤,深崖峻谷,张献忠军无不搜及,得男人手足200双者授"把总"官,得女手足400双者也授"把总",按杀人数目依次升官。有一士兵手壮,日杀数百人,立擢为都督。所以,张献忠军营灭亡前有公侯"大官"无数,皆因屠杀积功所得。

张献忠军杀人皆有名目:割手足称为"匏奴",中割背称为"边地",枪挑背部称为"雪鳅",以火围儿童烤炙称为"贯戏"。由于士兵们以人尸为马槽,放麦豆于血腹中食之,内杂人肝为"精饲料",所以他们的军马也凶性十足。张献忠军不仅四处杀人,还把牛犬牲畜也搜杀一尽,称不为后人留畜种。

张献忠还大兴剥人皮。他平日指令士兵剥人皮无数,掺以石灰,实以稻草,用竹竿标立,在大街密植两边,累累千百人,遥望犹如送葬纸人。其手下人说此种景象不吉利,张献忠接受了意见,自己就新创"小剥皮"方法,即把活人两背的皮从背沟处分剥,揭至双肩,反披于肩头。然后把这些被剥上身的活人赶出效外,严禁他们的亲人送饭送水,任其慢慢饿痛而死。此外,张献忠凌迟之刑,必须割尽500刀才能死,数不尽人死,则依此法杀掌刑兵士。

只要张献忠有军府衙门的地方,均人掌山积,千里横尸,腐臭盈空。明军曾缴获贼军一名"副总兵"的信札,他自己注记其所砍下的手掌就有1700

多只。

由于百姓中的小儿、幼女不能计功，张献忠军或衬马蹄，或抛空后以白刃接之以为笑乐。

张献忠之灭绝人性，无论亲疏。他常与陕西老乡痛饮于王府之中，临行厚赠黄金珠宝。酒足饭饱后，陕西籍的友人们欢笑告退。张献忠事先在路上埋伏壮士，把他们尽数斩杀，拿回所赠金银。

张献忠酷爱斩斫妇人小脚，置于花园叠累成峰。有一天，他与爱妾酌饮欣赏，仰视香足堆，叹道："方缺一足尖，置之会更好看。"其爱妾也有几分酒意，伸出自己三寸金莲，笑言："此足如何?"张献忠仔细持于手中细观，说"甚好"，信手一刀割下香足抛于足堆之上。其爱妾哭号宛转于地，他复加一刀，劈下其秀美之头。其爱妾数十，依次被斩杀，或肢解为乐，或烹之为食，或脔之喂狗。他本人还有一数岁小儿，一晚忽怒，亲手毙之，虎狼之性如此。转至早晨，见小儿尸体横于席间，他又怒左右手下不劝解，立杀数百人。

1645年秋，张献忠毁弃成都，尽杀城中居民。成都数十万居民被驱于南门，见张献忠骑马而来，都跪地乞命，声称是良民顺民。张献忠狂性大起，纵马挥刀跳入人群中，刀砍矛捅，血流成河。

从成都临行前，张献忠命令各营杀尽所掠妇女，上缴所有抢掠金银。

行至顺庆，张献忠忽然下令，尽杀军中四川籍士兵10余万人，仅有都督刘世忠一营闻讯先逃。他自川北遁去，投降清军。

杀完川军后，张献忠嫌所带兵将有家属累赘，他本人以挑选水军为名，喝令全营兵士及家属从他面前经过受检。只要是他挑中的人，就会马上被集中。最后，共挑出近4万人，押入一木城之中，先用炮轰，然后纵兵斫杀，有数千杀不完者，就驱入江中淹死。自己杀自己的军队，也是张献忠"首创"。

1646年，当张献忠军队到达川西充县与盐亭县交界处的凤凰山坡时，与清朝亲王豪格相遇，两军激战之中，张献忠中箭身亡，结束了一生。

第十四节　不想做皇后的徐妙锦

永乐帝朱棣为了篡位，打着"靖难之役"的幌子，逼杀了自己的侄儿、建文帝朱允炆。紧接着，为了起草登极诏书，他在建文帝的忠臣方孝孺那儿碰了个

硬钉子；没过多久，为了策立新皇后，他又在当朝美女徐妙锦这儿碰了个软钉子。

徐妙锦是明朝开国元勋、魏国公徐达的第三个女儿，才貌极其出色，甚至超过了她姐姐仁孝皇后。正因为她锦心玉貌，所以仁孝皇后去世后，朱棣便对新皇后不作第二人选，一心要把徐妙锦迎进宫去，填补她姐姐留下的那张空床位，从此母仪天下。可能是徐妙锦打从心底里瞧不起这位奸诈强横、冷血暴虐的永乐皇帝，所以她递上一封情词哀恳的书信，婉言谢绝了朱棣的"美意"。徐妙锦熟读史乘，深知暴君如狂龙恶虎，绝对不能使他受到过度刺激，暴君一旦被激怒，便会六亲不认，大开杀戒。因此她巧妙设辞，反复强调自己从小生长于豪门大户，性甘淡泊，不慕荣华，而且一心向佛，无复入世之念，宁愿远离红尘俗世，长伴古佛青灯，以此了却余生。她并未拗着性子一味地强调她不想进宫，不想母仪天下，不想成为笼中苦鸟失去自由，不想与众妃嫔争夺皇帝的宠幸……

徐妙锦亦可谓明代不折不扣的奇女子，她不肯与暴君同眠，甘心忍受一辈子的孤寂——皇帝没得到的美女，别人当然也无福消受。要是换一个人，这个决定可不是那么容易拿定的，这个代价可不是那么容易付出的。

第十五节　李元芳惩强除恶

历史上的李元芳并非唐代名臣狄仁杰的助手，而是明朝的一位普通官员，他的性格让他的官场生涯起起伏伏。他终其一生用只方不圆的处世哲学证明着自己的表字：子实。

李元芳出生于弘治二年（1489 年）夏天，甘肃秦安县人，自小聪慧伶俐，加上叔叔们的教育，18 岁时就中了举人。李元芳在 30 岁时，被明世宗朱厚熜任命为顺天府宛平知县。

宛平地理位置特殊，历朝历代都备受重视。李元芳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来到宛平县。因为他早就知道这里到处是朝廷高官、外戚或宦官家族。他们肆意侵占百姓的农田，欺压良民，无恶不作。

李元芳上任后，有三个案件让他寝食难安：一是村民状告建昌侯张延龄无故侵占民地；二是有人举报惠安伯张伟私藏罪犯，还暗中派人威胁举报人；三

是东厂恶意诬陷张仲金等7人，全部当定为死罪。

张延龄是国舅爷，他的姐姐是孝康皇后。耿直的李元芳一面派人把建昌侯侵占民田的恶行调查清楚并写成书面材料暗中呈送给张皇后，一面当庭判定：建昌侯所占民田悉数奉还村民，并作出适当赔偿；对建昌侯的处罚因涉及皇亲，交由皇帝裁决。

对于惠安伯私藏罪犯一案，李元芳勒令他限期交出罪犯，并作好"自省书"，否则就上报朝廷，由皇帝决断。惠安伯听说李元芳很难缠，不想将此小事闹大，只好服从。

第三个案子则有点棘手，因为东厂是皇帝的心腹，关进去的很难活着出来。李元芳在朝臣的帮助下，找到东厂负责的太监，当面据理力争，连续几次的努力后，终于免去了张仲金等人的死罪。

李元芳作为一方地方官，他深知百姓的疾苦。于是李元芳冒死上疏请求废除让宛平民众深受其苦的七件事，还谈及明世宗炼丹求仙的害处。上疏之后，他便脱下官服，坦然等待受罚。明世宗朱厚熜看完奏折后一一批准了。消息传下来，宛平县的百姓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当年七条谏书被皇帝批准后，有人以为世宗对李元芳青睐有加，便推荐让其担任台谏，负责专职为皇帝提意见。宦官们暗中多方阻挠。因李元芳在朝中没有后台，也从不结交权贵，最后只得出任登州府（今山东蓬莱）同知，几年后转任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长治）同知。李元芳任职其间，由于政绩显著，山西巡抚和按察使一起呈文，请求擢升李元芳任潞安府知府。谁知，先前在宛平县得罪的惠安伯等人联合宦官，诬告李元芳拉拢关系，巴结上司，虽然最后吏部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但李元芳受不了这种打击，称病回归故里秦安，闭门不出，颐养天年。余生里，他一边梳理自己的人生，一边教书育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李元芳去世。

第十六节　抗倭英雄张经之死

张经（1492—1555年），字廷彝，号半洲，福州洪塘乡人。他少年时曾在高湖乡舅家读书，张经母亲是高湖郑善夫的姐姐。

明朝嘉靖年间，倭患严重。当时张经担任南京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他临

危受命，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任总督江南北、鲁、浙、闽、湖广诸军御倭。

张经研究了形势，听取了浙江巡抚李天宠及苏松副总兵俞大猷的意见，新败的官兵素质不佳，士气也不高，有待休整。他认为应急调广西一带能征惯战的“狼土兵”以及永顺、保靖的土兵(苗民)，待各路军会齐时决战。张经曾在两广总督军务，深知“狼土兵”可用，“狼土兵”也敬服他。

这时，严嵩死党赵文华以祈海为名前来督军，荒唐地想以祭祀海神来退倭。他极力排斥不依附自己的大臣和名将，大大削弱了抗倭的力量。赵文华几次催促出兵，由于张经等待援兵，按兵不动。赵文华就向皇帝诬告张经、李天宠畏贼失机。

就在这时，由瓦氏率领的田州“狼土兵”先到，继而永顺、保靖土兵也赶到。张经就命卢坚、俞大猷、汤克宽等将率诸军水陆并进，在浙江嘉兴王江泾围剿倭寇。这一仗歼灭倭寇1980人，这是明军抗击东南倭患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接到赵文华诬告张、李的上疏后，嘉靖皇帝大怒，下诏逮捕张、李二人下狱，不久王江泾捷报也到了。嘉靖皇帝也有过怀疑，并询问奸相严嵩。严嵩竟然将王江泾之战的功劳归于赵文华和胡宗宪。因而不容张经辩解，张经、李天宠及敢于直言的兵部员外郎杨继圣，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被斩于西京。一时京师震惊，国家一日冤杀三位能臣，百姓连续多日罢市。

后来，张经孙子懋爵伏阙申冤才得以平反，人们在他的墓石上刻有“冤同武穆”的诗句，将他和抗金英雄岳飞相提并论。张经墓在洪山桥西北的原厝村黄店山。

第十七节　文徵明自虐式的修行

大明成化六年(1470年)，文徵明出生在苏州府长洲县的一户官宦人家。他原名文壁，字徵明。后来以字为名，改字为征仲。他的祖上曾经居住在衡山，所以他以“衡山居士”为号。幼年的文徵明身体孱弱，略显迟钝，“八九岁语犹不甚了了”。

在父亲文林的安排下，文徵明师从吴宽学习古文。吴宽是成化八年(1472年)会试、廷试的第一名，也就是状元。作为同科进士的父亲文林，让文徵明拜

吴宽为师，是希望他能够在科场上有所作为。然而，文徵明前后参加不下十次科举考试，竟然全部失败了。

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年出生的好朋友唐伯虎在科场上的胜利。唐伯虎16岁时即以童子试第一名考中秀才，29岁高中乡试第一名解元。而文徵明却至53岁时，依然在乡试中败北。


文徵明

可以想见，科举失利，严重打击了文徵明的自信心，也使他很早就明白苦学补拙的道理。当唐伯虎和祝枝山、张灵等一帮哥们在苏州城里寻欢作乐时，文徵明却在家中读书习字。正是在失败中焕发出来的强大的意志力，使文徵明不仅以苦学为乐，也使他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堪称儒家道德模范的品行。正是这种坚忍苦行的力量，最终铸造出文徵明在明朝绝无仅有的，德、艺、寿三馨的人生。

当然，最重要的是，文徵明有一个爱他、知他的父亲。当别人以为他弱智时，父亲不以为然。当同伴唐寅，乡试高中解元，自己却再次败北时，父亲写信安慰他："子畏之才宜发解，然其人轻浮，恐终无成，吾儿它日远到，非所及也。"

一切竟被文林不幸言中，在接下来的北京会试中，唐寅牵涉科场弊案，黯然返乡，命运从此跌入谷底。而文徵明虽然科举不第，经过刻苦努力，却成为吴门画派的主将和旗手。并以其漫长的一生，成为影响文人画未来发展的重要人物。所以，文林说"吾儿它日远到，非所及也。"真成谶语。

当然，作为父亲的文林，一生中最重要的正确举措之一，是带他拜苏州画坛领袖沈周为师。于是，文徵明在26岁时，成为沈周的学生。

一个天赋平平的孩子，通过后天的勤学苦修，终于成长为伟大的艺术家。

第十六章　明朝社会气象

第一节　明朝的科举考试

明朝建立之初，官员缺额很多。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朱元璋令各行省连续三年举行乡试，所有举人都免予会试，赴京师听候选官。又从各行省的举人中选拔一些人才担任翰林院编修、秘书监直长等官职，让他们在宫中的文华殿肄业，由著名学者宋濂等负责教学。

连考三年后，朱元璋发现所录取的人才，文章虽然写得好，但缺乏实际工作能力。于是，他在洪武六年(1373年)二月决定暂停科举，令有司察举贤人才。

举荐的科目有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由各地方长官举松京师破格录用。从此，科举制停止了十年。但是，被举荐的人也不比科举入仕的人更有行政才能。经过比较，朱元璋感到科举制度还是有它的优越性。便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下诏恢复科举考试。

明朝的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进行。

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又称乡闱，每三年一次，于子、卯、午、酉年举行。乡试的地点在南、北京府和各布政司驻地。主持乡试的有主考2人、同考4人、提调1人，此外还有负责受卷、弥封、誊录、对读、巡绰监门、搜检怀挟的官员。

考试分为三场：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第二场，试论一道，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试经史策五道。三场考试，分别在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考生入场，要经过严格的搜查，不许挟带。入场后，每一名考生由一名号军监视，防止作弊。黄昏时交卷，如果没有作完，给蜡烛三枝，蜡尽还没有完卷，就要被扶出考场了。考生交卷后，经过弥封、誊录、对读等程序，然后送主考、同考批阅。批阅的时间，名义上是十天，实际上

真正用在批阅上的时间不过三四天。因为试卷很多，不能遍阅，试官往往只阅前场得书义，如果第一场所写的三篇《四书》义得到试官的赏识，就可以成为举人。乡试的录取名额是由朝廷决定的。洪武十七年(1384年)，诏"不拘额数，从实充贡"。洪熙元年(1425年)规定了名额，各考区从十名到五十名不等。后来逐渐增加，明朝后期，南北直隶增至一百三十余名，各布政使司的名额也大大增加了。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在乡试的第二年于京师举行。参加会试的必须是乡试中试的举人。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考试的内容和程序基本上和乡试一样。但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增加了一倍。主考、同考一级提调、监试等官，都由级别较高的官员担任。会试的录取人数，明初没有定额。最少的一次只有32人，最多的达472人。

殿试，是明代科举的最高一级考试，因考场在奉天殿或文华殿而得名，凡是会试中试的人都可以参加。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皇帝就是主考官。殿试的时间，按科举成式的规定是三月初一，从成化八年(1472年)起，改为三月十五日。

殿试的内容很简单，仅考时务策一道。试题一般由内阁预拟，并在考试前一天呈请皇帝圈定。殿试以一日为限，日落前必须交卷。完卷后，受卷官以试卷送弥封官，弥封毕送掌卷官，掌卷官立即转送到东阁，由读卷官进行评阅。

读卷官从进士出身的高级朝官中选拔。按照明初的规定，殿试完毕后，第二天读卷，第三天放榜。在一天当中，人数不多的几个读卷官要评定几百份试卷。读卷官的任务，只要是在试卷中评出三份最优的卷子，以便确定一甲三名的人选，其他分等定名次是就不那么紧要了。

明朝殿试的名次分为一、二、三甲。一甲三人，称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当时士大夫又通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会试第一名为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在科举场中是很难得的。在明朝，连中三元的只有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

发榜后，皇帝赐诸进士宴于礼部，称"恩荣宴"。接着，皇帝给进士们分别授予官职。

第二节　明朝的财政经济政策

明朝的财政经济政策具有连贯性，它由朱元璋一手设计，其特点是彻底放弃商业化的努力，财政经济退回到以广大小农经济为基础，可以说是宋朝政策的大后退。

朱元璋痛恨王安石变法，他"改制"的基本精神就是重农抑商，以最落后的经济部门——广大农村为财政税收之基础，将大帝国建筑在小农经济之上，厉行节俭，注重均平。明朝统治者打击工商业，商贾之家不许穿绸纱；百姓不许航海，对外贸易以进贡名目由礼部掌管。朱元璋又连兴大案，打击富豪。这样就确立了全国小自耕农为主的基础，保证了帝国农业自然经济的本位。

这就意味着明朝政府不再发展商业，不再追求用提高社会生产和流通的效率来增加社会财富，而是完全回到小农经济时代。这样的经济就只能在数量上膨胀，而没有效率和质量上的实质性进步了。这样做政治上确实简化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和政治控制，但文明却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有的只是王朝的循环。

自此，全国变成无数个村庄的集合，全国经济成为一个庞大的扁平体，除了千万个小农家庭，就是统治者。民众直接面对国家，没有独立性的中间团体的阻隔，没有中层的商业代理机构及各种审计、会计机构的监督，也没有适当的司法程序来维护，政府机构又由一班文学之士来主持，对地方的人户、田土、物价等实际情况很难做到切实了解。

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又有较显著的发展，被许多人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尽管如此，晚明在商业化方面仍远不及宋代。明代整个铸钱不超过千万贯，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钱量。

第三节　明朝的婚姻习俗

明朝的婚嫁制度与礼仪习俗，在继承传统礼制的同时，对古代礼制既有损益也有发展创新，表现出了明代的社会发展风貌。

明朝皇帝的纳后婚礼，可谓“国婚”，华贵、典雅、隆重是其主要特点。明朝天子纳后，其完婚成礼的过程，基本依照“六礼”的程序而行，要行纳彩、问名、纳吉、纳征、告期和发册奉迎之礼，但天子无亲迎之礼。完婚的皇后，还要拜见皇太后，分别接受百官、亲王及内命妇和外命妇的庆贺，最后，帝后要行盥馈礼仪，至此婚礼方告结束。

明朝前期，讲究门第等级是当时婚俗的突出特点。但是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当时的婚姻关系已突破了门第观念，不管出身如何低贱，一旦富贵，就可与各门大姓结亲联姻，各门大姓看中这些新暴发户的财富，也就不再死守门当户对的陈腐之规。这时缔结婚姻，索取财礼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婚姻的买卖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明朝的品官阶层与庶人百姓主要实行一夫一妻的聘娶婚制。明朝统治者不但对不同品级品官与庶人百姓的聘礼、婚姻对象有许多规定与限制之外，还对品官与庶人百姓的礼仪程序也作了相应的规定。如洪武五年（1372 年）定制，凡品官婚娶，或为子聘妇，必须要有媒人，男女订婚之初，各使两家明知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女方同意后，才可依礼聘娶。还规定婚娶除了要具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及聘约的条件之外，婚姻过程还必须依照“六礼”的程序而行，“六礼”齐备，婚姻关系才告成立。婚后次日，还有拜见“宗庙”“见舅姑”“见舅姑醴妇”“盥馈礼”等礼仪活动之后，才算成婚。

对于退婚与改嫁，明代律令也有详文规定。婚约一旦确定，男女两家理当遵守，只有在遇到下列原因之一者，才可以依法许其解除婚约，另外嫁娶：第一，男女一方死亡或生死不明者；第二，订婚后无故三年不娶者；第三，男犯罪女犯奸者；第四，双重婚约及订婚后男另娶者。在明代婚姻习俗中，有身份地位之家丧子，寡妇是否再嫁一般由夫家及公婆决定。然而在民间，寡妇再嫁，必须自行主婚。另外，明律对随母改嫁女子的主婚也有明确规定，由其母主婚决定，后夫不得强行干预。

明朝休妻与离婚的原因，依照礼与法，除了“违律为婚”“义绝”“七出”等原因以外，还有其他原因。但无论何种原因离婚，均须明立离婚证书，离婚才能生效。并且离婚证书必须由夫及男女两家尊长签署，并且还要由邻人见证。若是妻请求离异，也必须由夫写立休书。夫妇离婚之后，所生男子一般应归夫家，是为定则。如果女方改嫁，她夫家的财产及原有的妆奁，要听夫家的分配。如果妻子离婚后还想复婚，则取决于夫家是否愿意。

在明朝婚姻关系中，官宦缙绅、士大夫以及富裕暴发户普遍存在纳妾重婚的习俗。这一婚姻实为买卖关系。明统治者对纳妾的范围、程序以及妻与妾在家庭中的地位等作了明文规定。无论何人娶妾，必须立婚书一通。妾的嫁娶之仪，也有鼓乐、花轿、傧相、纸烛、拜堂、撒帐等程序。

入赘，民间又称“倒插门”“倒踏门”。入赘的原因大多是因为男方家里贫穷，付不起沉重的聘礼，只好上门到女方家，以身为质，具有抵押性质。而招婿之家也大多无儿，或爱其女，不愿其远离，或招婿生孙，以承后嗣，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上蔑视入赘女家的男子。明代盛行此婚俗。入赘也要举办婚礼，但婚礼要在妻家举行，其仪礼习俗略同嫁娶。男方入赘后，有改从妻姓的，但赘婿子女均属婿家，仍从父姓。按规定，赘婿子女应享有家产一半的权利。赘婿离婚的权利属于女氏，俗称“逐婿”，明律禁止随意逐婿。明朝民间还盛行童养娘或典妻的习俗。

第四节　明朝的春宫图

明朝中后期，道士们精修的房中术在高压统治之下，渐渐变成了贵族享受的秘籍，成为皇宫内院之中皇帝独享的秘诀。

这时，对房中术研究很深的道士依旧在研习房中秘术，而一些精通此道的色情文人将房中秘术引入小说中，创作了著名的色情小说《金瓶梅》和《隔帘花影》。

《金瓶梅》是一部内容丰富多彩的作品，不仅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还有很重要的社会文献价值。故事的背景发生在宋徽宗时代，写的是一位药店老板西门庆与六个美丽女人之间的纵欲生活。

在明朝，不仅出现了大量以性爱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性艺术也发展到丁一个高峰，春宫画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春宫画是描绘男女性爱生活特别是各种性交姿态的图画，由于它最初产生于帝王的宫室，描写春宵宫闱之事，所以称为春宫。唐朝大画家周昉《春宵秘戏图》颇为有名，宋代也出现过这种“秘戏图”，元朝画家赵孟頫还因画这种画而知名，可是春宫画的广泛流行却在明朝，它是在严酷的性禁锢与性压迫的条件下发生逆变的产物。

在明朝，宫廷与民间最为秘密流行的画，就是春宫画了。许多知名作家是好色之徒，许多著名画家也好女色，特别喜爱画春宫画。这些春宫画在社会上广为流行，许多画也传入宫中。大臣们好房中术，春宫画也是他们淫乐寻欢的好佐料。宰相万安就痴迷房中术，喜爱春宫画，他还将房中书和春宫图秘密送进皇宫，从而获得了明宪宗的信任和宠爱。

春宫画在明宫中风行，皇帝和后妃们都极为喜欢，甚至在一些日用品上也能见到春宫画。明代宫廷御用瓷器上就印有春宫画，特别是明隆庆、万历年间，瓷器上印春宫画蔚然成风，而且画面生动，制作精致。版画中的春宫画更是风行，甚至还有许多象牙雕的春宫画。

明朝的春宫画，装裱十分精致，通常是横幅的手卷，也有的是经折装册页，或者是龙鳞装的册页。绫子装裱，锦绣护手，泡红玉质或象牙别子。明内府装帧的春宫画，更是精美绝伦。

明朝下半时期，这方面的著名画家首推唐伯虎和仇英。

唐伯虎寄身于烟花柳巷，喜欢美女，特别欣赏女人的身体。他创作了大量的春宫画，将中国传统的春宫画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层次。一些与他关系亲密的女人甘愿做他的模特儿，使得他的春宫画将女性描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精致的画笔勾勒出了女性的动人之处和独特的魅力。

仇英，字实甫，号十洲，太仓（今属江苏）人，居住在苏州。他是工匠出身，后来也从周臣学画，为文徵明所称誉，从而知名于世。他主要以卖画为生，画春宫画也很有名。他画全身着衣的恋人，也画裸体相交的男女。在一轴明春宫卷的卷首中指明他画了一套“十荣”，即十种不同的性交姿势，但这些画并没有流传下来。

在明朝，春宫画风气所及，连大家闺秀也喜欢绘春宫画。当时，天津杨柳青一带的贫家妇女也精于此道，每年春节前将春宫画当作年画在市场上销售，这就是有名的“女儿春”。

明末的春宫画不仅盛行于京师、天津一带，也盛行于锦绣富丽的江南。《江南销夏图》被认为是明朝时期套色春宫画的最晚的典型作品，年代大约是在1640—1650年，设计水平很高，人体姿态画得准确细腻，对环境的描绘也独具匠心。

明朝的春宫画通常都装裱成横幅手卷，或作旋风装折叠册页。前者大多是男女性交的连续画面，画了性交的各种姿势。这种手卷高约30厘米，长3～

6 米，画纸通常不超过 25 厘米见方；它们约作 24 幅一套、36 幅一套或其他数字，每套的幅数各有典故，并在每幅画的后面还衬以写着艳诗的纸页或绢页。手卷用绫子镶边，古锦为护首，最后用玉或象牙雕成的别子别紧；册页以木夹板或外裱古锦的硬纸板为封。总之，装帧是很讲究的。

由于春宫画流行广，需求量大，有些出版商又在印刷上下功夫，其技巧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明末尤甚。最好的套色翻印于 1606—1624 年，使用了 5 种颜色，这些画流入宫中，深得皇帝后妃们的喜爱。

当时，流行于宫中的春宫画《风流绝畅》十分精美，共 24 幅绘画，都是套版精致的裸体。第七幅是唤庄生，画的是一位年轻俊艉的儒生，深夜在书房用功读书，不意太过疲倦了，竟然伏在书上睡着了。他的情人站在身边痴情地看着他，如荑的玉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桌子上摆放着一只小香炉，仿佛香烟袅袅。旁边是一只精美的花瓶和一个茶杯。左边摆放着一只青铜烛台。桌子后面是一组折叠屏风，上面画着青绿山水画。画页上照例有一首香艳题诗。

流行于宫中的还有一套五色套印的春宫画《鸳鸯秘谱》，共 30 幅图，图旁边配写精美的诗。宫中秘藏的春宫画《燕寝怡情册》，彩绘 10 幅。

这些画代表了套色春宫画的全盛期，它只流行了约 20 年。1644 年清朝建立后，这种艺术几乎绝迹。

第五节　明朝宫廷的饮食

明朝宫廷的膳食品种繁多，制作十分精美。无数奇珍异味秘不外传，它们随着大明王朝的灭亡而绝迹。

近年，人们发现了一份明深宫漏传宫外的大内食单，名字叫一了百当；其制作过程也很奇特：猪、牛、羊各一斤剁烂成馅；虾米半斤捣成碎末；马芹、茴香、川椒、胡椒、杏仁、红豆各半两，捣成末；十两细丝生姜；腊糟一斤半；麦酱一斤半；葱白一斤；盐一斤；芜拂细切二两。先用好香油一斤炼热后，将肉料一齐下锅炒熟，然后都下锅。放冷以后，装入瓷器，封贮收藏，随时食用。吃时可以调以汤汁。

明朝皇帝对宫中美味各自有不同的偏好。天启帝喜吃大杂烩。宫中特地

将炙蛤、鲜虾、鲨翅、燕菜等十几种海味烩在一起，天启帝吃得有滋有味，乐不可支。

隆庆帝朱载垕喜欢吃果饼，在即位前，朱载垕生活在藩邸，常派侍从到东长安街去买果饼，吃得很上瘾。做了皇帝以后，隆庆帝仍念念不忘，总是想吃这种果饼。负责皇帝饮食的尚食监、甜食房得知皇帝想吃街上的果饼，立即派人观摩，并开价数十两银子到宫外去买原料，精心制作。隆庆帝吃得十分开心。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喜欢吃燕窝羹。崇祯帝朱由检生性多疑，厨师们细致精到地做好后，先由负责的人品尝，再由五六个人递尝，让咸淡合适、滋味美妙，方才进献给皇帝。皇帝吃得舒服了就会不作声，而一旦不如意，便龙颜震怒，内臣和厨师们就要挨罚。

明神宗万历年间，宫中有一位太监名叫刘若愚。他对大内生活，包括宫中饮食自然十分熟悉。其所著的《酌中志》，真实地记述了明代宫中皇帝、皇后、嫔妃、太监、宫女的宫中活动和明宫宫殿、内廷职掌、饮食好尚、内宫书籍等。

刘若愚在《酌中志·火集》中专谈明宫饮食好尚，从正月到十二月逐月叙述，生动翔实，令人叹服。

寒冬正月，宫眷内臣不惜一二十日的费用，热衷于蒸点心，储藏生肉。这一活动是从腊月二十四以后开始，直到正月佳节。

明宫正月好饮椒梧酒，吃水点心，即饺子。水点心中个别的包一两个银钱，吃到的人被认为来年一年吉利。新年时，通常吃百事大吉盒儿，就是将柿饼、荔枝、圆眼、栗子、熟枣等装在盒子里。驴头肉也是必吃的，宫中称吃驴头肉为嚼鬼，因为俗称驴为鬼。

明宫正月初七日是人日，这一天宫中要吃春饼和菜。宫中元宵节都吃元宵。

凡遇下雪的天气，宫人便聚在暖室，吃羊肉包子、炙羊肉、乳皮、乳窝卷蒸食，喝浑酒、牛乳。

二月初二日，各宫各室用黍面枣糕油煎进食。有的将面和得很稀，摊成煎饼，称薰虫。这个月宫中讲究吃河豚，饮芦芽汤。各宫室开始准备消夏的凉酒。宫中在月末还时兴吃鲜，称为桃花鲜。

三月十八日，宫人吃烧笋鸡，吃凉糕、糍巴。宫监们尤好吃雄鸭腰子，主要是壮阳补虚。

四月份，明宫尚吃笋鸡、白煮猪肉。各宫室还常做美味可口的包儿饭：选出各样精肉、肥肉；将姜、蒜、葱剁成豆子大然后拌饭，再用莴苣叶子包裹而食。宫室自造甜酱豆豉。饮白酒，吃冰水酪。

五月初五日，宫人喝朱砂、雄黄、菖蒲酒，吃粽子，吃加蒜过水的温淘面。夏至伏日时，吃长命菜，即马齿苋。

六月，宫中吃过水面，尤其是初伏、中伏、末伏日必吃这种面。立秋这天，宫人喜欢吃莲蓬和藕。隆庆帝喜欢在这段日子喝鲜莲子汤，还喜欢用鲜西瓜种加些盐焙吃。

七月十五日，是中国传统的中元节，甜食房要进供佛波罗蜜。这个月鲥鱼肥美，宫中吃鲥鱼羹，搭台相聚，观赏荷花。

从八月初一开始，宫中就有人买食月饼。宫人们纷纷用月饼、藕、西瓜互相馈赠。十五日，各宫各院都备有月饼、瓜果，相聚在院中，静候皓月升空，焚香祭拜，然后大吃月饼、瓜果。这个月的螃蟹正肥，宫眷内臣们喜吃螃蟹。他们先将螃蟹洗干净，用蒲包好蒸熟，揭开螃蟹脐盖，用长指甲挑食蟹肉，蘸些醋、蒜佐酒吃。吃完螃蟹，通常要喝苏叶汤，用苏叶洗手。

从九月初一开始，宫中吃花糕。九日是重阳节，宫中讲求吃迎霜麻辣兔，喝菊花酒。

十月，宫眷内臣们吃羊肉、爆炒羊肚、麻辣兔，吃虎眼等细糖。喜吃的美食还有牛乳、乳饼、奶皮、奶窝、酥糕、鲍螺。内臣们这时最喜欢吃牛和驴的生殖器，以及羊白腰（外肾卵）、白公马卵。

十一月，宫人好吃糟腌猪蹄、糟腌猪尾、鹅肫掌。宫中喜吃炙羊肉、羊肉包、扁食馄饨、冬笋。宫中讲究每天清晨吃煨汤，吃生焰肉，喝浑酒，借此御寒。

十二月，宫中吃灌肠、油渣卤煮猪头、烩羊头、爆灼羊肚、馃铁脚小雀加鸡子、清蒸牛乳白、酒糟蚶、糟蟹、煤银鱼、醋熘鲜鲫鱼、鲤鱼。初八日，则吃腊八粥。二十四日祭灶，蒸点心，办年货。宫中美酒佳肴飘香，迎接新年。

第六节　明朝人的收入

明朝是一个没有民族压迫、没有割地赔款、人口相对较少的时代。明朝人的收入相对较高，物价平稳，税负较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清代。

给官府买柴烧水、干杂活的人员，年收入为白银 20 两。今给政府公务员赶马的马夫，年收入为 40 两。

明朝正七品官员每月俸禄为 7.5 石或白银 3.75 两；每年工资为 45 两白银。新官上任，还可以先拿到 40 两修理费。

明朝的县官、典史等的住房、出行、皂隶人员、衣食花费基本上由国家支付和补贴，所以年俸基本是净收入，而且笔墨费都是固定按（白银）两计算，由国家拨给，还有剩余。

如果考上了秀才，政府每人每天给一升（约 1 千克）米和鱼肉油盐。明朝优待秀才时，甚至可以拿到每月 1 两白银的廪膳费。

街头挑担卖油的小贩一年收入约 20 两，合每月收入 1.66 两。

屠夫的年收入约为 36 两白银，月收入约为 3 两白银。

农民每亩约能收入 125 千克至 175 千克大米，按 150 千克算，南方一年收二季，北方一年收一季，如果丰年加勤恳，南方农民年均毛收入约为 24 两白银，北方农民年均毛收入约 12 两白银。

明朝的物价基本上是平稳的，尤其是官俸硬比例，一两比二石大米，对稳定货币价格有相当的作用。

明朝的商税原先是三十取一，也就是 3.3％。后来明朝皇帝与内阁考虑减轻国用以减少百姓负担，万历时期降到了 1.5％。小生意、小商小贩、年营业额在 40 两白银以内，则免税。

农民税在洪武朝初期，原先有三四斗，后来民田税收减为每亩一斗米，约 9.45 千克。官田为一至三斗米。人民交税少，跟明朝的政府机构精简有关。万历年间最好收成时，全国财政一年有 200 万两白银的收入。明朝万历时期，全国的总人口约有 6000 万，人均每年负担国家税支 0.033 两白银。

明朝没有叫花子和流浪汉，每个县都有养济院，免费收留。

遇水灾或旱灾流亡的人，凡有力可耕者，国家给每人 15 亩田耕种，还给牛和农具。如果贫民没钱买地下葬，国家就给地。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国家赐爵，爵是有收入的，也就是国家养老。

清兵入关后，税收重重，人们的生活水平降低了，难怪反清复明一直进行了半个清朝。

第七节　明朝的社会福利

在中国历代封建社会中，明朝是一个社会福利比较高的时代。这个功劳，应当属于朱元璋。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格外重视民间疾苦，从小吃够了苦的他出台了各种政策，让老百姓不再吃苦，他的三大福利政策分别是“养济院”“漏泽园”“惠民药局”。养济院，就是负责收留城市中的鳏寡孤独的福利院。漏泽园，就是国家公墓，免费埋葬死者。惠民药局，就是国家免费医院，可以免费看病和免费领取药品。

朱元璋还规定，如果城市里发现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或者是发现了生活不能自理且不是无人照料的残疾人，地方官就要被追责，轻则撤职查办，重则下狱问罪。

朱元璋还曾经试验过“保障房”政策，命令在南京试点，于郊外修筑公房，并安排无家可归者居住，尽管这项政策限于封建时代的经济条件未能全国推广，但可算是世界最早的国家免费福利公房。

除了这些福利机构外，明朝的福利待遇也很好，以“养济院”为例，凡是被收留的，每月都会给予三斗大米、一匹库布。以至于许多生活并不贫困的人，也假装穷人被收留进来，且赖在里面不走。如果遇到水旱灾害等情况，对于因此而无家可归者，明朝更免费给予稻种、耕牛，并赐15亩田地。

到了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时期，明朝出台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养老制度——优老之礼，即年满70岁以上的老人，国家就要赐予爵位，每月给予生活补贴。

毫不夸张地说，大明王朝，堪称当时世界上全民福利的国家。这种全民福利，造就了明朝3个世纪的凝聚力。即使在许多皇帝昏庸，政治腐败的时代里，明朝的老百姓对待国家，依然表现出了不离不弃的深厚感情。鼎盛时期的大明，尽管存在着诸如腐败等问题，依然是一个具有繁荣经济和高度凝聚力的强大国家。

第八节　明朝人的服饰

在经过元朝蒙古人统治之后，明朝恢复了汉族的传统，明太祖朱元璋重新制定了服饰制度。

明装与唐装相比，衣裙比例明显倒置，由上衣短下裳长，逐渐拉长上装，缩短露裙的长度。衣领也从宋代的对领蜕变成以圆领为主。

明式服装的一个特色是襟上佩佳饰物，并且十分醒目。都是些金、珠、玉等材料做成的各种饰物。其中垂挂在胸前的叫"坠领"；系在前襟的叫"七事"；走起路来有响声的叫"禁步"，这些佩饰统称叫"杂佩"。另有一种特别的佩饰，是在一条金链上，以环相连挂着四件小物件：即镊子、牙签、耳挖子和小刀等，均是妇女的生活实用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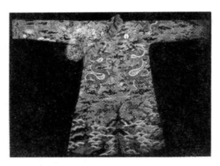
披风是明朝比较流行的一种服饰，明代的披风其实和宋代的褙子样式相似，披风跟斗篷则是不一样的，披风是有袖子、直领、两边开衩的。

明朝妇女的服装，主要有衫、袄、霞帔、背子、比甲及裙子等。其中霞帔、背子、比甲为对襟，左右两侧开衩。成年妇女的服饰随各人的家境及身份的变化，有各种不同形制，普通妇女服饰比较朴实，主要有襦裙、背子、袄衫云肩及袍服等。明朝背子有宽袖背子与窄袖背子之分。宽袖背子只在衣襟上以花边作装饰，并且领子一直通到下摆。窄袖背子则袖口及领子都有装饰花边，领子花边仅到胸部。

明朝贵族女装用料均为各色纻丝绫罗纱，而平民女服用料则受限制，即便是礼服，也限用紫色粗布，并且禁止用金绣，袍衫也只限用紫色、绿色和桃红色等浅淡的颜色，而禁止使用大红色、鸦青色和明黄色等浓艳的色彩。明洪武十四年(1381 年)还规定，商贾之家只能用绢布制装，农家可以使用细纱和绢布。

明朝皇帝的常服以黄色的绫罗，上绣龙、翟纹及十二章纹。明朝的龙集中了各种动物的局部特征，头如牛头、身如蛇身、角如鹿角、眼如虾眼、鼻如狮鼻、嘴如驴嘴、耳如猫耳、爪如鹰爪、尾如鱼尾等。除传统的行龙、云龙之外，还有团龙、正龙、坐龙、升龙、降龙等名目。

对于皇后的常服，洪武四年(1371 年)三月规定：戴龙凤珠翠冠、穿红色大袖衣，衣上加霞帔，红罗长裙，红褙子，首服特髻上加龙凤饰，衣绣有织金龙凤


明朝龙袍

纹,加绣饰。凤冠是一种以金属丝网为胎,上缀点翠凤凰,并挂有珠宝流苏的礼冠。明朝凤冠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后妃所戴,冠上除缀有凤凰外,还有龙、翚等装饰。皇后的皇冠缀九龙四凤,大花、小花各12束;皇妃凤冠九翚四凤,花钗九束,小花也九束。另一种是普通民妇所戴的彩冠,上面不缀龙凤,仅缀珠翟、花钗,但习惯上也称为凤冠。

官员平日里在本署衙门办理公务,则穿常服。戴乌纱帽、身穿盘补服是明朝官吏的主要服饰,以补子来区分官职。这种袍服是明朝男子的主要服式,不仅官宦可用,士庶也可穿着,只是颜色有所区别。明朝建国25年以后,朝廷对官吏常服作了新的规定,凡文武官员,不论级别,都必须在袍服的胸前和后背缀一方补子,文官用飞禽,武官用走兽,以示区别。

明朝圆领大袖衫为儒士所穿的服饰,其特点是宽袖、皂(黑)色缘边,青圆领、皂绦软巾垂带。

明朝水田衣是一般妇女的服饰,是一种以各色零碎锦料拼合缝制成的服装,形似僧人所穿的袈裟,因整件服装织料色彩互相交错形如水田而得名。它具有其他服饰所无法具备的特殊效果,简单而别致,所以在明清妇女中间赢得普遍喜爱。

明朝骑士多穿对襟,以便乘马。作战用兜鍪,多用铜铁制造,很少用皮革。将官所穿铠甲,也以铜铁为之,甲片的形状,多为“山”字纹,制作精密,穿着轻便。兵士则穿锁字甲,在腰部以下,还配有铁网裙和网裤,足穿铁网靴。

第九节 明朝女子的化妆

明朝女子以细眉为美,颇近时下习气。浓眉大眼在当时会被看成村姑,惨遭嘲笑。明朝女子也打腮红,当时比较流行的是“桃花妆”与“酒晕妆”,前者比较淡一点,后者比较浓。脸蛋上若长有麻子,还得弄些“花子”类的装饰以掩盖。当时,南京的长江出产一种比较名贵的鲥鱼,鱼鳞色泽如银,贵妇常贴在

脸蛋上作“花子”以掩盖麻子。

明朝的胭脂分为四种:第一种是红蓝花粉染胡粉而成,第二种是山燕脂花汁染粉而成,第三种是山榴花汁制成,第四种是紫矿染棉而成。其中第四种是上品,第二种也很好,红花和山榴花汁染成的就要次一点。到了明末,山东一带还用红花的渣滓制成胭脂,称作“紫粉”,价格很便宜,乡村里买不起脂粉的贫穷姑娘,也可以用之来染红双颊,增添妩媚。

明朝没有香水,但姑娘们要除掉异味或者增加香味,也有办法。去除体味之外,姑娘们若要香味,则主要是使用香囊。在明代,香囊里常填塞的是兰草,制作者在夏天取下兰草叶子,用酒浸泡后晒干,添些香料,充实在布囊或丝囊中。南京秦淮河教坊旧院市场上常出售香囊,在明朝很有名。明末的北京城隍庙市上,还有一种“香串”,功能近似于香囊,也能香身,不过便宜多了。

明朝的姑娘们也涂红指甲,明末女子有用凤仙花染指甲的风俗。除了凤仙花,当时常用的还有金凤花,又名“指甲桃”,染指甲的效果不让凤仙花。

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地域,人们对美的追求总是没有止境的。

第十节 明朝的民居

住宅在古代不仅是居住场所,而且还被视为宅主身份的标志。唐、宋时期朝廷对官员及庶民的住宅形制已有一定的限制,但还比较粗略宽松。

到了明朝初期,统治者对住宅的等级逐步划分严格,官员造宅不许用歇山及重檐屋顶,不许用重拱及藻井。这些限制在宋朝原是针对庶民的,如今已针对品官了,这就意味着除了皇家成员以外,不论官位多高,住宅不能用歇山顶,只能用“两厦”(悬山、硬山)。此外,统治者又把公侯和官员的住宅分为四个级别,从大门与厅堂的间数、进深以及油漆色彩等方面加以严格限制。至于百姓的屋舍,则不许超过三间,不许用斗拱和彩色。

以上这些反映了明朝等级制度的森严在住宅形制上已有充分表现,但逾制的现象十分普遍,至今江苏苏州一带的民居中,仍保存着一批很精美的贴金彩画和砖石雕刻。

明朝在宅第等级制度方面有较严格的规定。一、二品官厅堂五间九架,下至九品官厅堂三间七架;庶民庐舍不逾三间五架,禁用斗栱、彩色。

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定制:六至九品官厅堂三间七架,正门一间三架;庶民正厅不得超过三间五架。洪武三十年(1397 年)重申:房屋可以多至一二十所,但间、架不容增加。正统十二年(1447 年)稍作变通,架数可以加多,但间数仍不能改变。

明朝住宅的等级制度主要是限制间数和架数,至于建筑层数,则可因地制宜。明朝住宅均能表现明代建筑特点,典雅稳重,做工讲究,装修精美,雕刻和彩画细腻而雅净。

明朝砖石住宅数量大增。明初出现用筒拱建的房屋,上加琉璃瓦屋顶,仿一般房屋形式,俗称"无梁殿"。无梁殿平面多为长方形,承重结构常采用筒拱;或单拱,或大拱两侧附有小拱,采用纵联砌法。

明朝初期无梁殿建筑用厚重的外墙来抗衡筒拱所产生的水平推力,明中叶以后改厚墙为厚壁柱,在结构、功能和节省费用方面有显著的提高。当时有些无梁殿在发展中还出现了楼房。无梁殿建筑在发展过程中受木构建筑的影响日渐显著,主要表现在外观、细部装饰的模仿上。

明朝初年无梁殿外墙面上平整简洁,明中叶以后则每一开间均砌出半圆壁柱,上有仿木额枋样式、砖雕及其他细部装饰。无梁殿的出现同它的防火要求、坚固耐久的特点有关,此外还同下述因素有关:制砖技术提高,产量增加,砖价降低,以及发券技术提高到已能砌筑 10 米以上的跨度的拱券。

第十一节　明朝的家具

明朝是自汉唐以来,我国家具历史上的又一个兴盛期。随着当时经济的繁荣,城市的园林和住宅建设也兴旺起来,贵族、富商们新建成的府第,需要配备大量的家具,这就形成了对家具的大量需求。明朝的一批文化名人,热衷于对家具工艺的研究和家具审美的探求,他们的参与对于明朝家具风格的成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郑和下西洋,从盛产高级木材的南洋诸国,运回了大量的花梨、紫檀等高档木料,这也为明朝家具行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明朝家具的造型简洁明快,工艺制作和使用功能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一时期的家具,品种、式样极为丰富,成套家具的概念已经形成。布置方法

通常是对称式，如一桌两椅或四凳一组等，在制作中大量使用质地坚硬、耐强度高的珍贵木材。家具制作的榫卯结构极为精密，构件断面小轮廓非常简练，装饰线脚做工细致，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形成了明朝家具朴实高雅、秀丽端庄、韵味浓郁、刚柔相济的独特风格。

明朝家具按其功能，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几案类包括桌案与几，是五大类中品种最多的一类。大致可分为炕桌、炕几、炕案，香几，酒桌、朱桌，方桌，条桌案（条几、条桌、条案），宽桌案（书桌、画案）以及其他桌案（月牙桌、扇面桌、棋桌、琴桌、抽屉桌、供桌、供案）。

只有床身，上面没有任何装置的卧具称之为"榻"，有时亦称为"床"或"小床"；床上后背及左、右三面安围子的叫"罗汉床"；床上有立柱，柱间安围子，柱子承顶子的叫"架子床"。

椅凳类包括了不同种类的各式坐具。如杌凳、坐墩、交杌（马扎）、长凳、椅、宝座。

框架类家具，或以陈设器为主，或以储藏器为主，或一器兼用。可分为架格、亮格框、圆角框、方角框。此外，还有屏联类家具。

明朝的家具造型简练、以线为主。明朝家具局部之间的比例、装饰与整体形态的比例，都匀称而协调。并且与功能要求极相符合，没有多余的累赘，整体感觉就是线的组合。简练、质朴、典雅、大方。

明朝家具的卯榫结构，极富有科学性。不用钉子少用胶，不受自然条件的潮湿或干燥的影响，制作上采用攒边等做法。在跨度较大的局部之间，镶以牙板、牙条、圈口、券口、矮老、霸王枨、罗锅枨、卡子花等，既美观，又加强了牢固性。

明朝家具的装饰手法多种多样，雕、镂、嵌、描等都为所用。装饰用材有珐琅、螺钿、竹、牙、玉、石等。不贪多堆砌，也不曲意雕琢，根据整体要求，作恰如其分的局部装饰。

明朝硬木家具用材多数为黄花梨、紫檀等。这些高级硬木，都具有色调和纹理的自然美。工匠们在制作时，除了精工细作而外，同时不加漆饰，不做大面积装饰，充分发挥、充分利用木材本身的色调、纹理的特长，形成自己特有的审美趣味和自己的独特风格。这是明朝家具的又一特点。

第十二节 明朝的体育运动

明朝在体育运动的类型上，对宋代的继承较多。

宋朝逐渐形成体系的武术在明代得到了进一步的独立，并以古代的阴阳、五行、八卦学说为其武术理论的基础，体现了鲜明的传统文化特色和浓郁的哲学色彩，并形成了流派。

明朝是中国古代武术全面大发展的时代，南、北流派都在此阶段达到了鼎盛时期。在短短200多年的时间里，南派武术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并扩散到整个南方，衍生出了诸多的分系，逐步赶上了北派。

明朝，民间棋艺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流派纷起。明朝正德、嘉靖年间，形成了三个著名的围棋流派：一是以鲍一中为冠，李冲、周源、徐希圣附之的永嘉派；二是以程汝亮为冠，汪曙、方子谦附之的新安派；三是以颜伦、李釜为冠的京师派。这三派风格各异，布局攻守侧重不同，皆为当时名手。在他们的带动下，长期为士大夫垄断的围棋，开始在市民阶层中发展起来，并涌现出了一批"里巷小人"的棋手。他们通过频繁的民间比赛活动，使得围棋游艺进一步得到了普及。

明朝，北京地区每到春季在富贵之家和民间大户就有走马骑射活动。这项活动在皇室的提倡下，渐渐推展至民间的名门富户。由明朝的消闲娱乐发展为清朝的走马竞速和技能表演。在北京的东西南北城都出现了一些赛马场。主要的场地有永定门外南顶、东便门外蟠桃宫、西便门外白云观、安定门外黄村北教场、先农坛东墙外、安定门城隍庙等处。永安门外南顶马场的赛马期间最长，春季开放，深秋才收场。黄寺北教场马场的马道最长，东起安定门，西讫德胜门。参加赛马的多是王公贵族和富家子弟及社会名人。马匹都是自备。参赛的人可相互约定会面比赛时间，人数可多可少，没有定规。平时也可随时来练习跑马，互相观摩骑术和马技。

马球，是骑在马上以球杖击球入门的一种体育运动。它是一项相当惊险、激烈的活动，要求竞技者不仅具备强壮的体魄、高超的骑术与球艺，更要有勇敢、灵活、顽强、机智的素质。到了明朝，马球运动仍然流行。史料记载永乐帝朱棣曾数次在东苑打马球。明《宣宗行乐图》长卷中绘有宣德帝朱瞻基观赏马

球比赛的场面。北京白云观前也有群众骑马击球之典。不过，从总体上看，这时的马球已呈衰落之势。尤其是进入明中叶后，马球只是作为宫廷礼制或民间节日活动才得以开展。明朝时期尽管马球运动没有太大发展，但还是方兴未艾。

在明朝，蹋球已和淫乐连在一起。据历史记载，拥兵三吴、称兵割据的吴王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每到出师之时，不问军事，只携带着樗蒲（一种赌具）、蹴鞠，拥妇女酣宴。朱元璋称帝之后，传下圣旨，严厉禁止军人蹋球。朱元璋的圣旨只能禁止军人蹋球，但并不能禁止民间的足球娱乐运动。

投壶是在春秋时期出现的一种兼具礼仪与娱乐功能的活动，具体做法是：以酒壶为器皿，把去掉箭头的箭从距酒壶几尺远的地方向壶中投掷，投中者得分，不中者则罚酒。

投壶的来源投壶源自射礼。根据周朝礼仪规定，凡是正规的宴饮，开始前一定要举行各项仪式。在这些仪式中，射礼是较为重要的一项。举行射礼时，主客双方都要前往射箭场所射箭，这不仅要求有很大的射箭场地，还要有不少人在旁侍候，因此，无疑是过于麻烦了。为了使宴会举行得既符合礼仪，又方便快捷，于是人们便发明了投壶之戏，以投壶来象征射箭。

到了明朝，投壶已经变成一种纯娱乐活动。当时的人们发明了很多新玩法，有春睡、听琴、倒插、卷帘、雁衔芦、翻蝴蝶等 30 余种。投壶的娱乐性增强了，玩的人自然也就多了。据说，当时有个名叫苏乐壶的人，因投壶技术高超，被人称为“投壶绝”。他不仅能背身投壶，还能用三支箭同时向三个壶投射，据说从不失手。

第十三节　明朝的音乐舞蹈机构

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开始陆续兴建宫室庙社，其中在正阳门（今光华门）外东南一带，建有规模宏大、用于祭祀天地山川的“大祀坛”“山川坛”等，并附有一系列辅助建筑群，内中就有建于洪武十一年（1378 年）的“神乐观”。神乐观地处大祀坛与山川坛之间，是专门为祭祀天地山川活动时服务的音乐舞蹈机构。

在音乐方面，朱元璋是个内行，他很重视音乐，因而作为音乐舞蹈机构的神乐观，组织规模非同一般。

当时南京共有大观2所、中观16所、小观50所。其中的2所大观，一个是朝天宫，另一个便是神乐观。它直属礼部太常寺，并设有正六品提点和正八品知观负责掌管。全观有乐工62人、歌工12人、引舞2人、协律郎1人。舞蹈分文、武两组，各有舞生62人，加上舞师2人，共130人。舞乐两队共达200多人，皆为道士。

神乐观内的乐舞生有着严格的挑选、培养、考核、淘汰和给养制度，成员均少年出家，投师训练，经久有余。每逢春秋两季，皇帝亲临南郊祭祀，整个过程都有一整套隆重的礼乐相伴，以示对天地神灵的虔诚。除此以外，发生严重灾荒及朝廷有重大事件而举行祭祀活动时，也都是神乐观乐队出场演奏。

神乐观的面积比朝天宫大得多，内有山门、大殿、画廊、祠堂、食堂、仓库、住房、提点公房等，道院147房，且亭台楼阁林立。

朱元璋去世后不久，燕王朱棣起兵，攻破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有一种民间流传很广的说法是，当年建文就是从皇宫通往神乐观的地道中逃出的。

明朝灭亡后，神乐观曾改建为真武大帝庙，至清朝中叶，神乐观开始衰微，随着岁月流逝，古神乐观早已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

第十七章　明代科学家

第一节　医学家李时珍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湖北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1518年7月3日）。

李家世代从医，其祖父是“铃医”，其父李言闻是当地名医。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李言闻决定让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不屑于学空洞乏味的八股文。自14岁考中秀才后的9年中，其三次到武昌考举人均名落孙山。于是，他放弃了科举做官的打算，专心学医。李言闻见儿子的确不迁合科举，而是爱好钻研医学终于答应了儿子的要求，同意李时珍的要求，并精心教他。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了一名很有名望的医生。

李时珍38岁时，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太医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李时珍在此只任职了一年，便辞职回乡。

辞职回乡后，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

他首先在家乡蕲州一带访问，后来多次出外访问。除了湖、广之外，他还到过江西、江苏、安徽的很多地方，他到过均州的太和山。盛产药材的江西庐山和南京的摄山、茅山、牛首山，也有他的足迹。

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地向各式各样的人请教。其中，采药、种田、捕鱼、砍柴、打猎之人，都曾热情地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比如芸苔，是治病常用的药，但《神农本草经》说不明白，各家注释也搞不清楚。李时珍就问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指点下，又观察了实物，才知道芸苔实际上就是油菜。于是，这种药物便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一清二楚地解释出来了。

不论是在四处采访中，还是在自己的药圃里，李时珍都非常注意观察药物的形态和生长情况。

蕲蛇，就是蕲州产的白花蛇，这种药有医治风痹、惊搐、癣癞等功用。李时珍早就研究它，但开始只从蛇贩子那里观察。内行人提醒他，那是从江南兴国山里捕来的，不是真的蕲蛇。真正的蕲蛇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一位捕蛇的人告诉他，只有城北龙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蕲蛇。李时珍想亲眼观察蕲蛇，于是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那里有个狻猊洞，蕲蛇就生活在这一带。李时珍不顾危险，在捕蛇人的帮助下，终于亲眼看见了蕲蛇，并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经过这样深入实际的调查，后来他在《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就得心应手，说得简明准确。

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就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的功用。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参考历代有关医药及其学术书籍，历时27年于万历六年（1578年）编成了《本草纲目》这本药物学巨著。

《本草纲目》约有200万字，52卷，载药1892种，新增药物374种，载方10000多个，附图1000多幅，成了中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甚多，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出成就，并对其他有关的学科（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李时珍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逝世，享年75岁，葬于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竹林湖村。李时珍一生著述颇丰，除其代表作《本草纲目》以外，还著有《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五脏图论》等十种著作。

第二节　外科学家陈实功

陈实功（1555—1636年），字毓仁，号若虚，生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江苏东海（今南通市）人。

陈实功幼年时多病，少年时期开始学医，师从著名医学家李沧溟。陈实功改变了过去外科只重技巧而不深研医理的落后状况，在发展外科医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实功兴趣广泛，尤其喜欢历代名医的理论、病案等一类书籍。对于古代典籍，陈实功从不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而是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把自己在行

医实践中取得的一些经验与古人治病方法相互结合,总结出一套适合于大众的,切实可行的理论。

陈实功继承和发展了李沧溟的观点,并根据病者的实际病况,采取内治或内治外治相结合的方法。在外科手术治疗上,尤为突出。陈实功主张外部手术与内服相结合,如对息肉摘除、气管的缝合等。由于他医术高明,因而名声大震,登门求医者络绎不绝。

陈实功在晚年,根据自己多年行医的丰富经验和明朝以前外科医学方面的部分成就,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 年)撰写了一部重要的外科医学著作《外科正宗》。全书共 20 余万字,共分四卷。从病痛的根源、诊断到外科上常见的大部分疾病,从各家病因理学说到临床症状和特点,以及各种病症的治疗方法,手术的适应症、禁忌等,从各种病情的形状到药剂的组成,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其中对皮肤病、肿瘤都有较多的论述。

对于肿瘤之症,陈实功认为肿瘤只有及早地发现,才能摸清病源,以便能够及早地治疗,或许尚有一线希望治愈。另外,对于现代医学中所遇到的淋巴转移、鼻咽癌等,也有论述。

《外科正宗》综述了自唐朝以来历代外科中有效治疗经验,科学性强,论述精辟,能充分代表明代时期我国外科医学的巨大成就,具有较高的学习研究价值。其中对下颏骨脱臼的治疗整复手术,完全符合现代医学的要求,直到现在仍一直沿用。《外科正宗》印行后,广为流传,并流传到日本等国。自成书 300 余年来,共有各种版本 50 余种,成为中医外科的经典著作。

陈实功还著有《医家五戒十要》,书中对医家的专业学习、思想修养、言行举止、服务态度及如何处理同事之间的关系等,都做了正确的论述。

陈实功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作风正派,对同道之士谨慎谦和,对上进青年能提携爱戴,对病人,无论穷富贵贱都能一视同仁,实属难能可贵。他不仅为穷人看病不收分文,而且还捐资赠物,修建山路,造福一方。

第三节　传染病学家吴又可

吴又可(1582—1652 年),名有性,字又可,号淡斋,明朝江苏吴县人。一生从事中医传染病学研究,著有《瘟疫论》一书,阐发了传染病病因学说。

明末清初，连年战争，灾荒不断，各种传染病不断流行。在吴又可59岁那年(1641年)，江苏、河北、山东、浙江等省，当时瘟疫流行甚剧，他家乡吴县一带也不例外。悲惨凄凉景象，使他废弃仕途，走上了研究医学的道路。他遇到的当务之急，首先是“流行病”。他刻苦钻研前人及民间有关传染病的治疗经验，不怕传染，不辞辛苦地在病区、病家为患者诊治疫病。经过一段时间的钻研和临床实践，他渐渐体会到以仲景之伤寒学说来治当时流行的一些疾病，收效甚微，有时甚至适得其反，遂产生了另创新路，以提高疗效的想法。他推究病源，创立“戾气”说，并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逐渐形成一套温热病的论治方案，提高了疗效。并将这些经验，经过整理，著成《瘟疫论》一书。自此，不但瘟疫证治，有绳墨可循，而且又将温热与瘟疫，逐步合为一家，充实了中医学关于传染病的内容。

吴又可一生，治愈了很多传染病患者，其中包括一些疑难大症，且往往是出奇制胜。有一次，他治疗一位传染病患者，大便不通，脘腹胀满，疼痛难忍，四肢强直不能动，卧如塑，目闭口张，舌强，问话不能答，脉实有力，苔生芒刺。根据证候，是一派实热象，病情危重。据患者儿子代诉，三日来已服承气汤三剂，每剂大黄用至一两左右，病仍不减。一般医家，遇到此况，一定会考虑另立治法的。然而，吴又可则不然，他仔细权衡了患者的脉症，认为“下证悉具，药轻病重也”，不但不改方剂，反而将方中大黄增至一两五钱，连服半月而痊愈。吴氏用药之妙，可见一斑。

《瘟疫论》，成书于1642年，全书共2卷。阐述瘟疫的发生是由“戾气”，从口鼻侵入人体，伏于募原，其邪在半表半里之间，其传变有九，并提出一整套辨证施治法则，其辩证与治疗和伤寒不同。

第四节　近代科学的先驱：徐光启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光启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徐家汇)一个小商人的家里。

徐光启小时候进学堂读书，就很留心观察周围的农事，对农业生产有着浓厚的兴趣。

万历九年(1581年)，20岁的徐光启考中秀才后，在家乡和广东、广西教



徐光启

书，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广泛阅读古代的农书，钻研农业生产技术。由于农业生产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又离不开数学，他又进一步博览古代的天文历法、水利和数学著作。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徐光启受聘去韶州任教，2年后又转移至浔州。徐光启在韶州见到了传教士郭居静。这是徐光启与传教士的第一次接触。

在郭居静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一幅世界地图，第一次听说地球是圆的，第一次听说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制造了天文望远镜，能清楚地观测天上星体的运行。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从此，他便开始接触西方的自然科学。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徐光启由广西入京应试，本已落选，但却被主考官焦竑在落第卷中检出并拔置为第一名。但不久，焦竑被劾丢官，转年徐光启参加会试也未能考中进士。徐光启便又回到家乡课馆教书。

在同郭居静交往的过程中，徐光启听说到中国来传教的利玛窦精通西洋的自然科学，就到处打听他的下落，想当面向他请教。1600年，他得到了利玛窦正在南京传教的消息，立即专程前往南京拜访。

徐光启见到利玛窦后，表示希望向他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利玛窦看他是个读书人，也想向他学习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并热衷发展他为天主教徒，于是就同他交谈起来。他们从天文谈到地理，又谈到中国和西方的数学。临别的时候，利玛窦送给他两本宣传天主教的小册子。一本是《马尔谷福音》，另一本是《天主实义》。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徐光启在南京接受洗礼，全家加入了天主教。后来徐光启一直是教会中最为得力的干将。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徐光启考中进士，后来担任了翰林院庶吉士的官职，在北京住了下来。利玛窦在同徐光启见面的第二年，也来到了北京。徐光启在公余之暇，常常去拜访利玛窦，彼此慢慢熟悉了，开始建立起较深的友谊。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徐光启再次请求利玛窦传授他西方的科学知识，利玛窦爽快地答应了。他用公元前3世纪左右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

《原本》做教材，对徐光启讲授西方的数学理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徐光启完全弄懂了欧几里得这部著作的内容。徐光启建议利玛窦同他一起把它译成中文。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的春天，徐光启和利玛窦译出了这部著作的前六卷。同年，《几何原本》前六卷正式出版，马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了明末从事数学工作的人的一部必读书，对发展我国的近代数学起了很大的作用。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徐光启授翰林院检讨，不久丧父，返乡守制。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守制期满，回京复职，此后一直担任较为闲散的翰林院检讨。在此期间，徐光启用大量的时间进行天文、算法、农学、水利等科学技术研究，并从事了很多这方面的翻译和写作。

万历四十年(1612年)，徐光启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了《泰西水法》，书中介绍了西洋的水利工程的做法和各种水利机械。

在向传教士学习科技知识的同时，徐光启对他们的传教活动也进行了协助，帮他们刊刻宗教书籍，对传教士的活动也有所庇护。徐光启的这些行为，多被朝臣误解，加上与其他官员的一些政见不合，因此他辞去工作，在天津购置土地，种植水稻、花卉、药材等。

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1613—1618年)间，他在天津从事农事试验，写成了"粪壅规则"(施肥方法)以及农学巨著《农政全书》的编写提纲。

天启四年(1624年)，魏忠贤阉党擅权时，为笼络人心，曾拟委任徐光启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的官职，但徐光启不肯就任，引起阉党不满，结果被劾，皇帝命他"冠带闲住"，于是他回到上海。在上海"闲住"期间，他进行了《农政全书》的写作。徐光启自编的军事论集《徐氏庖言》，也是此时刊刻出版的。

崇祯帝即位后，杀死了魏忠贤，阉党事败。崇祯元年(1628年)，徐光启官复原职，八月，充日讲官，经筵讲官，为天子师。崇祯二年，他又升为礼部左侍郎，三年升礼部尚书，已是朝廷重臣。

这期间，徐光启对垦荒、练兵、盐政等方面都多有建树，但其主要精力则是用于修改历法。

此前自从与传教士接触之后，徐光启即留心天文历法。万历四十年(1612年)就有人推荐由徐光启督修改历，未成。至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朔日食，徐光启恢西法推算，其结果较钦天监为密，九月，朝廷决心改历，令徐光启主

持。徐光启从编译西方天文历法书籍人手，同时制造仪器，精心观测，自崇祯四年(1631年)起，分五次进呈所编译的图书著作。这就是著名的《崇祯历书》，全书共46种，137卷。

崇祯六年(1633年)十一月七日，徐光启逝世，终年72岁，谥文定。

第五节　大科学家宋应星

宋应星(1587—约1666年)，字长庚，奉新县宋埠镇牌楼村人。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宋应星考中举人。但以后五次进京会试均告失败。

崇祯七年(1634年)，宋应星出任江西分宜县教谕(县学的教官)。在此时间，他把长期积累的生产技术等方面知识加以总结整理，编著了《天工开物》一书，并于崇祯十年(1637年)刊行。

《天工开物》详细叙述了各种农作物和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生产技术和工艺装备，以及一些生产组织经验，既有大量确切的数据，又绘制了123幅插图。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又细分为18卷。上卷记载了谷物豆麻的栽培和加工方法，蚕丝棉苎的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工艺。中卷内容包括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的建造，金属的铸锻，煤炭、石灰、硫黄、白矾的开采和烧制，以及榨油、造纸方法等。下卷记述金属矿物的开采和冶炼，兵器的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等。

在化学方面，宋应星是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地论述锌和铜锌合金(黄铜)的科学家。他明确指出，锌是一种新金属，并且首次记载了它的冶炼方法。这是我国古代金属冶炼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宋应星记载的用金属锌代替锌化合物(炉甘石)炼制黄铜的方法，是人类历史上用铜和锌两种金属直接熔融而得黄铜的最早记录。

在生物学方面，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录了农民培育水稻、大麦新品种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气候、栽培方法对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又注意到不同品种蚕蛾杂交引起变异的情况，说明通过人为的努力，可以改变动植物的品种特性，得出了"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科学见解，把我国古代科学家关于生态变异的认识推进了一步，为人工培育新品种提出了理论根据。

在物理学方面，新发现的佚著《论气・气声》篇是论述声学的杰出篇章。

宋应星通过对各种音响的具体分析，研究了声音的发生和传播规律，并提出了声是气波的概念。

宋应星除著《天工开物》以外，还有《卮言十种》《画音归正》《杂色文》《原耗》等著作，现多已失传。近年来，在江西省发现了宋应星四篇佚著的明刻本，即《野议》《论气》《谈天》和《思怜诗》。《论气》和《谈天》是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很可能是《卮言十种》中的部分篇章。

第六节　数学家王文素

王文素，字尚彬，山西汾州（今汾阳市）人，约生于1465年。王文素在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年）随父到河北饶阳经商，遂定居。

王文素自幼颖悟，涉猎书史，诸子百家，无所不知。尤其擅长于算法，留心通证，以一生之精力，完成了《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这一数学巨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算学宝鉴》中对研究数字排列组合的纵横图（现也称为幻方）的研究，如连环图、璎珞图、三同六变图等，其复杂程度远远高于宋朝杨辉、明朝程大位。该书立体插图采用现代轴测图法中常用的正等测图法，使三轴的轴间角两两呈120度，是在中国算书插图中最早采用这一先进方法的著作。该书中加、减、乘、除、开方等由简单到复杂的运算，均是用珠算完成的，或者说很多运算方法、步骤、口诀都是专为珠算编的，被珠算专家称为中国第一部珠算书。

《算学宝鉴》中的例题均取材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实际。除古题原题照搬外，书中对当时社会商品流通中米、麦、棉、马、牛、羊、鸡、绫、罗、麻、绢、人参、红花等价格资料应有尽有，船费、脚银、军饷、税种、税率等经济史料不胜枚举，书中还有“假令秦至燕二千八百八十里”的路途的较精确的距离等资料，与今相差无几。

《算学宝鉴》从39卷至42卷，以4万言的篇幅，共载10首算法歌诀、34问、45术、52草，研究了一元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内容翔实，也是代表该书数学水平的精华所在。

在开高次方程中，王文素介绍的算法算理严谨，程序承接巧妙，要较他晚些的程大位、朱载堉以及清朝甚至更晚的很多数学家、珠算家的方法都高明

得多。

王文素解高次方程的方法，比英国的霍纳、意大利的鲁非尼要早近300年；在解代数方程上，他比17世纪牛顿、拉夫森早140多年，率先用导数逐步迭代求解，为中国数学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对于17世纪微积分创立时期出现的导数，王文素在16世纪已率先发现并使用。

《算学宝鉴》对当时社会商业、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纪实，是我们了解、透视明代社会的一本极珍贵的史料。它代表了当时数学、珠算的最高水平。

第七节　植物学家朱橚

朱橚（约1362—1425年），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植物学家、方剂学家和词人。朱橚的生母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马皇后（也有人说他为朱元璋的庶妃“硕妃”所生）。

朱橚的父亲朱元璋出生贫寒，他早年就目睹了朱家半月间饿死三人，以及父母相继去世无钱无地下葬的惨境。朱元璋登基当了皇帝之后，仍念念不忘当年的痛苦。少年时代的朱橚多次聆听过父亲讲述的这些情况。受父亲的教诲，封爵后的朱橚虽贵为王族，但仍不忘百姓疾苦。

洪武三年（1370年），10岁的朱橚被封为吴王。当时朱橚因年龄尚小，只能先在宫中接受教育，等长大后再履行王爵之责。这一时期，朱橚一方面认真阅读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另一方面接受父亲朱元璋对他的教育，了解了不少军事知识。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时任周王的朱橚主要担负着防范和镇压中原叛乱的任务。因此，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驻守在开封，几乎没有参与朝政。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朱橚竟然未向父皇朱元璋请示，就擅自离开藩国开封，来到时为中都的安徽凤阳。朱元璋闻讯后大怒，打算将他流放云南，但后来把他暂留京师。

朱橚充分利用藩王王府的特殊地位，亲自带领一批学者先后编纂了《保生余录》《袖珍方》《普剂方》及《救荒本草》等书。其中，《普剂方》是一部卷帙达168卷，搜集药方61739个的巨著。

朱橚的《救荒本草》是中国古代研究救荒植物的拓荒之作，开启了我国对野生食用植物研究的先河。书中共列出植物 414 种，其中录自李时珍的《本草》有 138 种，新增 216 种。书中介绍的各种可食植物，先绘图，然后介绍其性味，有无毒性及其采摘食用方法等。因此这也是一本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书，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植物学图谱。

由于《救荒本草》以救荒为目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都很强，此书一经问世，就深受人们的欢迎，历代曾经多次翻刻。该书还在日本的出版，对日本的农学、植物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八节　音律学家朱载堉

朱载堉(1536—1611 年)，字伯勤，号句曲山人，生于怀庆府河内县(今沁阳市)，是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仁宗帝的第六代孙，郑藩王族嫡世。嘉靖二十四年(1545 年)，年仅 10 岁的朱载堉被封为世子，成为郑王的继承人。

朱厚烷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第六世孙，袭父封爵，为郑恭王。他生活朴素，为人刚直。朱厚烷被囚禁时，朱载堉只有 15 岁。在此期间，朱载堉致力于乐律、历算之学的研究，撰写了大量学术著作。

隆庆元年，朱厚烷冤案平反。万历十九年(1591 年)，朱厚烷病逝，朱载堉为世子，本可继承王位，但他上疏皇帝，甘愿放弃。从他父亲去世那一年起，直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经过 15 年 7 次上疏之后，明神宗才予以允准。让爵之后，他自称道人，迁居怀庆府，潜心著书，过着纯粹学者生活。

朱载堉自幼喜欢音律和数学，他的著述颇多。朱载堉著有《瑟谱》《律历融通》《律学新说》《律吕精义》《算学新书》《操缦古乐谱》《乐学新说》《灵星小舞谱》《旋宫合乐谱》《六代小舞谱》《小舞乡乐谱》《二佾缀兆图》《嘉量算经》《圆方句股图解》《律吕质疑辨惑》等书。上述著作，大部分都收入在了他的《乐律全书》中。

朱载堉对古代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他创建了十二平均律。在中国古代音律学发展过程中，如何能够实现乐曲演奏中的旋宫转调，历代都有学者孜孜不倦进行探索，但到朱载堉时无人成功。他在总结前人乐律理论基础上，通过精密计算和科学实验，成功地发现十二平均律的等比数列规律，称其为密率，在其

《律学新说》卷一中，他概述了十二平均律的计算方法："创立新法：置一尺为实，以密率除之，凡十二遍。"

在《律吕精义·内篇》卷一中，他对十二平均律做了描述：

"盖十二律黄钟为始，应钟为终，终而复始，循环无端。……是故各律皆以黄钟……为实，皆以应钟倍数 1.059463……为法除之，即得其次律也。"

用这种方法确定的各律相应弦长，其音程相等，完全可以满足音乐演奏中旋宫转调的要求。这也正是现代国际音乐中通用的十二平均律。

另外，为了解决十二平均律的计算问题，朱载堉讨论了等比数列，找到了计算等比数列的方法，并将其成功地应用于求解十二平均律。为了解决繁重的数学运算，朱载堉最早运用珠算进行开方运算，并提出了一套珠算开方口诀，这是富有创见之举。朱载堉还解决了不同进位小数的换算方法，做出了有关计算法则的总结。在数学史上，这些都是很引人注目的成就。

朱载堉在研究音律学的同时，对计量学和度量衡的演变也做了考察。他亲自做了累黍实验以确定古人所说的尺长。为了确定量制标准，他测定了水银密度，测量结果相当精确。他从理论上辩证说明了"同律度量衡"之关系，对后世影响很大。

朱载堉在天文学上也有很高造诣。明朝通用的历法是《大统历》，因行用日久，常出差错。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他上疏皇帝，进献《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二书，提请改历。其见解精辟，深得识者称许。

朱载堉是我国古代一位富有创造性的学者，是明代科学和艺术上的一颗巨星，中外学者尊崇他为"东方文艺复兴式的圣人"。

第九节　珠算大师程大位

程大位(1533－1606 年)，字汝思，号宾渠，出身于小商人家庭，自幼聪明好学。程大位少年时随父经商，足迹遍及吴楚地域。

程大位在商务往来中，切身感到传统筹码计数法的不便，决心编撰一部简明实用的数学书。于是，行商之余，他遍访当时数学名家和珠算能手，同时不惜重金购求遗书，悉心攻读获得数学基础理论知识，并搜集了大量我国古代的数学难题和计算方法。程大位在 40 岁以后，毅然弃商归里，专心著书。

1592年，程大位经过近20年的刻苦钻研，终于完成了影响深远的《算法统宗》一书，计17卷，并自费刊行。1598年，经过数年的修订，程大位又刊行了《算法统宗》的简明本《算法纂要》4卷，成为后世民间算家最基本的读物。

《算法统宗》内容包括当时能收集到的各种实用数学问题和数学方法，依《九章算术》的次序，分为九章，分别叙述整数、分数的加、减、除、乘、乘方、开方等基本知识。珠算开方法是第一次记述，在列举各种计算方法的同时，还指出最方便的计算方法，他认为乘法以留头乘为最好，开方法以商除法为最好。这些运用方便、计算准确的方法，至今仍为人们常用的珠算计算法。书中按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盈朒、方程、勾股等九项，叙述各种问题及解法。

《算法统宗》的精华部分是全面介绍了珠算，以及珠算的各种方法和归除口诀。比如沿用至今的珠算除法的《九归歌》，"二一添作五，逢二进一十……"并用图形加以详细说明，书中还列举595道演算题，均附有详细解法。此书又多用口诀、诗歌形式写成，通俗易懂，浅显易记，从而大大推广了算盘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

程大位除了在珠算方面有很大成就外，还发明了一种"丈量步车"，以竹篾制作，类似今天的皮尺，上标长度单位，解决了实地丈量的用尺问题。

第十节　生物学家屠本畯

屠本畯（1542—1622年），字田叔，又字豳叟，号汉陂，浙江鄞县（今宁波）人。其父屠大山在嘉靖间曾为后部右侍郎，受严世蕃算计，被革职，后朝廷复其官。

明朝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较重大的成就。屠本畯就是其中之一。他通过调查研究，著有《闽中海错疏》《海味索引》《闽中荔枝谱》《野菜笺》《离骚草木疏补》等书。内容涉及植物、动物、园艺等广阔领域。

《闽中海错疏》主要记载福建沿海一带的海产动物，是中国早的海产动物志。《海味索引》记载海产动物16种，内容不及《闽中海错疏》所记的丰富。《野菜笺》1卷，记载屠本畯家乡四明（今宁波）的野生植物。《闽中荔枝谱》8卷，主

要记载福建地区荔枝品种、习性以及栽培和加工等。

《闽中海错疏》是屠本畯的代表作，成书于明万历丙申（1596 年）。全书分为三卷，上、中两卷为鳞部，下卷为介部，又有自序和附录各一篇。此书共记载福建沿海海产动物 200 多种（包括少数淡水种类），以海产经济鱼类为主，有中国著名的大黄鱼、小黄鱼、带鱼、乌贼 4 大海产珍品，以及驰名的对虾、鲥、鳓、鯮（中华青鳞鱼）等海产动物。

《闽中海错疏》所记载的鱼类除同种异名外，计有鲫鱼、真鲷、方头鱼、鲻鱼等 80 多种，分别属于鲤科、鲷科、鲳科 40 个科，及鲤形目、鲈形目、鲻形目等 20 个目。书中所记载的两栖类动物有黑眶蟾蜍、中国雨蛙、泽蛙、虎纹蛙、棘胸蛙、沼蛙等 10 种，分属于蟾蜍科、雨蛙科、蛙科 3 科。

此外，书中还记有软体动物的贝类，节肢动物的虾类，以及少数龟、鳖等，还有福建常见的外省海产燕窝、海粉等。应该指出的是，书中有些记载是前人不曾提到的。如"海胆"一名，过去曾被认为来自日本，其实日本是引自此书。

屠本畯通过对海产动物的研究，获得了许多海洋动物形态生态知识。例如，在《闽中海错疏》中，他形象地描述方头鱼头略呈方形；狭纹虎鲨头目凹而身有虎纹的形态特点；对真鲷、橄榄蚶、结蚶等海产动物形态的描述也很具体。在生态习性方面，屠本畯明确记载了泥螺的生长、繁殖情况。从屠本畯对泥螺自然繁殖的描述来看，反映出他对泥螺的生态习性已有清晰的认识。他还观察到棱鲻在深冬时卵巢和精巢充满腹腔，以及性腺成熟和产卵。到春天棱鲻排精产卵后，体瘦而无味。这种对棱鲻生殖期的认识，在养殖业上有参考价值。对过腊的食性、冬季入港和第二年春天出海的洄游规律的记载和认识，与现今福建地区过腊的渔期相符。书中对某些海产动物的内部器官也有叙述。

《闽中海错疏》还介绍了福建地区饲养草鱼和鲢鱼的方法。书中指出，在池塘放养鱼之前必须清除池塘中的乌鱼。

屠本畯在《闽中海错疏》中将性状相近的种类放在一起，例如，把真鲷、黄鲷、方头鱼、黑鲷、魴等连续排列，泽蛙、黑眶蟾蜍、中国雨蛙、棘胸蛙、黑斑蛙等连续排列，等等。以上分别相当于现代动物分类上的鱼类、两栖类。

屠本畯又把大类中性状更接近的水生动物排列在一起。例如，在鱼类中，把尖头银鱼、白肌银鱼、短尾新银鱼排列在一起，它们属于银鱼科；在两栖类中，把石鳞、青鉀、沼蛙、水鸡等排列在一起，它们都属于蛙科。屠本畯把海产动物分成不同的大类，在大类中再分小类，这种排列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

动物的自然类群，反映了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屠本畯在《闽中海错疏》中采用的动物分类法，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

第十一节　水利专家徐贞明

徐贞明(1530—1590年)，字孺东，一字伯继，江西贵溪人，明朝倡导发展海河水利的代表人物。万历三年(1575年)，徐贞明任工科给事中。

当时，北京城驻军所用粮食都是从东南水运而来，每运至北京一石粮食，就要消耗数石粮食作为军船夫役的费用，给百姓造成很大负担。另外，河流多变，运粮的水路时常阻塞。一旦军粮供应不上，后果不堪设想。徐贞明任工部给事中后，经过一番考察思索后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从畿辅征收军粮。这样，就需将畿辅的旱地改为水田，增加产量。实际上，畿辅具有这个条件，畿辅诸郡流经的河流，或自出的涧泉，都可以利用起来灌溉田地。以往，北方人未习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是由于水利未兴。如果挖渠修壕，引水灌溉，便可杀水势；高处仿南方人筑堤拦水，旱时则可灌溉。这样，水利兴，水患亦除。

于是，徐贞明上《水利议》，建议朝廷选派得力官员，兴修水利工程。他还建议朝廷制定优惠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如给穷人送耕地的牛、缓征富户的赋税、许可南方人占有他自己开垦的土地等。然而，主持此事的工部尚书郭朝宾却以水田劳民为由，认为兴水利之举不能马上实施。徐贞明的建议便被冷落在一边了。

后来，御史傅应祯获罪入狱，徐贞明与傅应祯素有交往，得知消息后，便到狱中调护了几天。因此举徐贞明被谪，贬为太平府知事。

在此期间，徐贞明写下了《潞水客谈》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从十四个方面，洋洋洒洒地论述了水利当兴。他说北方的土地，旱则赤地千里，涝则洪流万顷，只有风调雨顺时，百姓才可不受饥荒之苦，而年年风调雨顺是不可能。只有兴修水利后，旱涝有备，才能使百姓摆脱饥荒。兴修水利，不仅可以安民富国，兴教化，美风俗，而且有利于国防。

顺天巡抚张国彦、副使顾养谦按徐贞明所论，在蓟州、永平、丰润、玉田等地兴水利，都很见效。御使苏瓒、徐待也在万历皇帝面前言说徐贞明所论可

行。给事中王敬民特意上疏举荐徐贞明。在诸臣的举荐下，万历十三年(1585年)，徐贞明重新回朝，升任尚宝少卿，万历皇帝赐诏，命他与诸臣实地勘察后再议兴水利之事。

徐贞明领了敕令，来到京东，逐州逐县地进行实地勘察，哪里是低洼涝地，每一方土地适宜播种何类作物，全都摸得一清二楚；他还跋山涉水，将每一条河流的走向，何处分流，何处汇合，四季水流变化，每一眼泉的出处，水量多少，全都弄得明明白白。然后，将他所掌握的情况及处理意见，上奏朝廷。

户部尚书毕锵等大臣阅罢徐贞明的上疏后，连声称赞，采纳了他的建议，并议定了以垦田勤惰为标准，徐贞明可对各郡县官员举荐、弹劾；地宜种稻者要逐步改成稻田，不改者追究当地官员责任，令其按时完成；招募南方人，来教如何种稻；所垦田地子孙可继承，成绩显著者按功封官加赏以及贷谷种、止徭役等六项措施，一并上奏万历皇帝。这些建议，都被万历皇帝采纳。万历十三年(1585年)九月，万历皇帝命徐贞明兼监察御史领垦田使，如果谁敢阻挠垦田，随时弹劾惩治。

徐贞明领旨后，立即着手进行兴水利、垦水田之事。他先从京东州邑治起，平谷水峪寺、龙家务村及三河塘会庄、顺庆屯等地开始有了一些水田。徐贞明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夜不安寝，呕心沥血。到了第二年二月，不足半年光景，就在平谷、三河、密云、蓟州、遵化、丰润、玉田等地，开垦出水田39000余亩。接着，他又紧锣密鼓地制定出治理京东诸河的计划，准备疏通河道，以防洪水泛滥。

就在徐贞明踌躇满志，准备大展宏图时，万历皇帝却一道圣旨调他回朝。原来，朝中一班阉人、勋戚，在京郊占有大量闲地为家业，如果都被开垦为水田，谁开垦归谁所有，他们的损失太大了。于是，他们一有机会就在万历皇帝面前进谗言，说开垦水田的坏处，应该将徐贞明罢官加罪。万历皇帝被这些人说得起了疑惑，也觉得垦水田、兴水利之举不妥。阁臣申时行等纷纷劝说万历皇帝，力陈其利，还是解不开皇帝的疑惑。就在这时，身为畿辅人的御史王之栋又上疏说，水田必不可行，疏通河道种种不便。万历皇帝终于决定收回原旨，调徐贞明回朝，仍为原职。

徐贞明回朝之后，觉得报国无门，心灰意冷。不久，就找了个借口请假回乡。万历十八年(1590年)，徐贞明郁郁而死。

在京东水利发展史上，徐贞明可谓京东水利第一功臣。

第十二节　火器专家赵士桢

赵士桢，字常吉，号后湖，乐清人。大约生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大约死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 年）。

赵士桢的祖父赵性鲁，官至大理寺副，博学多才，工诗词，精书法，曾参加修订《大明会典》。赵士桢自幼受祖父熏陶，亦擅长书法，于万历六年（1578 年）被授为鸿胪寺主簿，任职 18 年后，受诏入直文华殿，至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晋升中书舍人。

赵士桢从小生长海滨，深受倭患侵扰之苦，因此他注意研究军事及火器技术书籍，留心访求神器，向当时《火攻大全》的作者请教，从抗倭名将戚继光、胡宗宪的部下处了解倭寇所用火器的情况，认识到火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并同在抗倭作战中屡立战功的将领林芳声、叶子高等朝夕探求学问，研讨火器。

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当他在温州同乡游击将军陈寅处见到外国传入的火绳枪后，即访求因进贡而留居北京的土耳其掌管火器的官员朵思麻，见到了朵思麻收藏的噜密铳，并详细学习了该铳的制造和使用方法，经过精心研究后，仿制成比同期欧洲火绳枪威力大，比日本火绳枪轻巧灵便的噜密铳，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进献朝廷。由于此枪安有良好机械回弹性的枪机，具有扣机即发，射毕即自动弹起的特点，因而被军工部门大量仿制后装备明军使用。之后，赵士桢又在此基础上，历经艰难困苦，勤奋钻研，不惜自解私囊，散金结客，募工制造，先后制成各具特色的火绳枪等十多种火器。其中单管火绳枪（明代称鸟枪）有轻便灵巧的西洋铳，安于战车上的鹰扬铳，能安放子铳进行连续发射的掣电铳，集轻便、快捷、平稳三个特点于一身的三长铳，镢与铳合一的镢铳，锨与铳合一的锨铳；双管火绳枪有震叠铳；五管火绳枪有迅雷铳；还有滑槽式古代火箭发射装置“火箭溜”。上述各种火绳枪的创制，把明代后期单兵枪的研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火箭溜”的创制，保证了火箭能沿目标方向飞行，颇与近代火箭导轨的作用相类似，是我国古代火箭发射技术的一大飞跃。

赵士桢在研制上述各种火器的过程中，还撰写了《神器谱》《神器杂说》《神器谱或问》《恭进神器疏》《防虏车铳议》《铳图》《倭情屯田议》等研制和使用火

器的论著。这些都是赵士桢关于火器制造与使用所获成果的结晶。

在明朝中期东有倭寇侵掠、北有游牧民族袭扰的严峻军事形势下，赵士桢从战略的高度出发，建议朝廷大力发展火器制造，认为这是抗倭寇、挫凶锋、扬国威的长治久安之计。为了保证所制火器的质量和毁杀威力，赵士桢在《神器谱》中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首先，他选用福建等南方各地的上好木炭作燃料，炼出色泽光亮、质地坚韧的钢材，作为制造枪炮管的原料，避免了北方用煤冶炼的钢材因含硫磷过多而使枪炮管容易脆裂的弊病。其次，他采用向熔炉内频洒稻草屑的多次脱碳法，炼成含碳量适当的可制枪炮管的优质钢材。第三，他要求火药配制者要根据各地天气晴朗、阴雨、凉爽、郁蒸的不同，分别确定火药中硝硫炭的组配比率，配制成适应当地使用的火药，以保证火药的毁杀威力。这是赵士桢对提高古代火药配制科学性所做出的独特贡献。第四，选用技精艺熟、不辞劳苦的工匠进行制造，以便造成质量精良的火器。

为了使精良的火器充分发挥作用，他反对滥造滥用，提出造器用器统一的主张，要求造器者必知用器之法，用器者必知造器之理，这样才能运用自如，临战无患。为此，他要求统兵将领必须善于指挥部队使用各种火器，必须善于因时、因地、因我、因敌、因众、因寡、因动、因静而不断改变使用火器的方式，切不可拘泥死板；在使用火器时要做到势险节短，使人猝不及防；使人莫知其妙；虚虚实实，使人莫测端倪；险地、易地，都能操射自如。只有这样，才能使用火器战胜强敌。

上述成果表明，赵士桢不愧是我国明朝万历年间杰出的火器研制家。他的《神器谱》等论著，是继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之后，关于火器制造与使用理论的水平更高、科学性更强的著作。

第十三节　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

孙云球，字文玉，或字泗滨，江苏吴江市人。他生于明崇祯初年(1628 年)，死于清康熙初年(1662 年)，享年仅 33 岁。

孙云球勤奋好学，善于钻研刚从西方传入的数学知识，探讨测量、算指、几何之法。他精于器械制造，为了校准自鸣钟，他制造了“自然晷”，这是一种据

日影以定时刻的仪器。经过使用后证明十分准确。

眼镜在元代已从西域传入我国，但是其价格昂贵，非一般人所能享用。到了明代，眼镜仍是珍稀之物；到了晚明，杭州成为我国早期眼镜制作的中心。孙云球年轻时就到杭州学习制镜技术，而在他的思想中又接受了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传入的几何、物理等科学知识，经过自己制作眼镜的实践积累和探索，最后终于掌握了“磨片对光”技术，创造性地用水晶材料磨制成镜片，还创造了磨制镜片的牵陀车。经过他的一番悉心研究改进之后，使磨镜对光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孙云球短暂的一生中，他一共制造了 70 多种光学仪器。在孙云球研制的光学仪器中，望远镜常被人们提及。他所研制的望远镜性能良好，据记载，浙江天台有一个名叫文康裔的人患有严重近视，孙云球曾和他一起登上虎丘山，用自制的望远镜眺望，看到苏州城内的楼台塔院近在眼前，清晰可辨；天平、灵岩、穹窿诸峰苍翠挺拔，历历在目。文康裔赞叹不已，视为神技。

另外，孙云球还为苏州眼镜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用以矫正视力的眼镜并非孙云球所发明，孙云球的贡献在于他创造性地采用水晶为原料，磨制成各种凹凸镜片，并根据近视、远视不同情况分别配镜，使人们配到适合自己眼睛的镜片。他还通过配制不同的镜片，使人们的视力得到矫正。这种水晶眼镜在当时很引人注目，人们不惜出重资购买，苏州眼镜业也就在此基础上兴盛起来了。

孙云球还制有“存目镜”，这种镜能将极细小的东西看得一目了然。这有可能是一块放大镜或一架简单的显微镜。

还有一种“万花镜”，这种镜会使一个像变成多个，类似于今天的万花筒。估计其结构是一种呈菱形折射的镜片，依靠光线的多次反射形成群像。

另外，孙云球还发明了“察微镜”。如果说“存目镜”是一种简单显微镜的话，那么“察微镜”就应该是一种复合显微镜。由于他英年早逝，加上中国当时科学状况的限制，这架显微镜在当时的科学研究中未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还有一种“半镜”。这种“半镜”应该是一种半圆盘形的眼镜，即眼镜仅仅有下面半块透镜，佩戴者眺望远方时可以直接通过上部，不必借助镜片。这种形式的眼镜特别适合于老花眼者使用。

除了这些仪器之外，孙云球还磨制过多面镜、夜明镜、幻容镜、鸳鸯镜、放

光镜、夕阳镜等，这些仪器性能和用途各异。孙云球还总结多年制镜经验，写成《镜史》一卷。这本书的问世，对后世光学仪器制造技术影响很大。

第十四节　地理学家徐霞客

徐霞客(1587—1641年)，名弘祖，字振声，出生于江苏江阴一个有名的富庶之家。徐霞客的父亲喜欢到处游览欣赏山水景观，受其影响，徐霞客幼年喜爱读历史、地理和探险、游记之类的书籍。这些书籍使他立志要遍游名山大川。

徐霞客22岁那年，他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家乡，从此开始了旅行。

在30年间，徐霞客先后游历了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16省。他东到浙江普陀山，西到云南腾冲，南到广西南宁一带，北至河北蓟县的盘山，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他寻访的地方，多是荒凉的穷乡僻壤，或是人迹罕见的边疆地区。他不避风雨，不怕虎狼，与长风为伍，与云雾为伴，以野果充饥，以清泉解渴。他几次遇到生命危险，出生入死，尝尽了旅途的艰辛。

徐霞客并不是单纯为了寻奇访胜而游历，更重要的是为了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寻找大自然的规律。比如他对福建建溪和宁洋溪水流的考察，就是一例。黎岭和马岭分别为建溪和宁洋溪的发源地，两座岭的高度大致相等，可是两条溪水入海的流程相差很大，建溪长，而宁洋溪短。徐霞客经过考察，找出了宁洋溪的水流比建溪快的结论：路程越短，水流越急。这个地理学上的著名结论，就是由徐霞客通过实地考察得出来的。

徐霞客还对许多河流的水源进行了探索，比如广西的左右江，湘江支流萧、彬二水，云南南北二盘江以及长江等，其中以长江最为深入。长江的发源地在何处，很长时间都是一个谜。战国时期的《禹贡》中有“岷江导江”的说法，后来的书都沿用此说。徐霞客对此产生了怀疑。他带着这个疑问查出金沙江发源于昆仑山南麓，比岷江长500多千米，于是断定金沙江才是长江上源。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徐霞客没能找到长江的真正源头。但他为寻找长江源头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徐霞客还是世界石灰岩地貌科学考察的先驱。他在湖南、广西、贵州和云南作了详细的考察，对各地不同的石灰岩地貌作了详细的描述、记载和研究。徐霞客还考察了100多个石灰岩洞。他没有任何仪器，全凭目测步量，但他的考察大都十分科学。

徐霞客对火山、温泉等地热现象也都有考察研究，对气候的变化，以及植物因地势高度不同而变化等自然现象，都做了认真的描述和考察。

此外，徐霞客对农业、手工业、交通的状况，对各地的名胜古迹演变和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也都有生动的描述和记载。

崇祯九年(1636年)，徐霞客已经51岁了，他在这一年进行了最后一次出游。这次他主要游历了我国的西南地区，一直到达中缅交界的腾越。崇祯十三年(1640年)，他返回了家乡。他回乡不久就病倒了。崇祯十四年(1641年)3月8日，徐霞客在家中病逝，享年52岁。

徐霞客写下的游记有240多万字，可惜大部分失散了。留下来的经过后人整理成书，就是著名的《徐霞客游记》。这部书40多万字，是一部将科学和文学融合在一起的"奇书"。

第十五节　农学家黄省曾

黄省曾，字勉之，号五岳山人，江苏吴县(今苏州)人，生卒年不详，生活于明朝中期。

黄省曾是一个在农学的许多方面均有建树的人。黄省曾的农学著作主要有《稻品》1卷、《蚕经》1卷、《种鱼经》1卷、《艺菊书》1卷，此四书合称为《农圃四书》。此外，黄省曾还著有《芋经》1卷、《兽经》1卷。他的地学著作有《西洋朝贡典录》3卷。

《稻品》是一本水稻品种志。《稻品》先对稻(稌、稬)、糯(秫)、秔(粳)、籼等概念作了解释，然后列举了34个水稻品种的性状、播种期、成熟期、经济价值以及别名等。《稻品》所载的品种以苏州地方品种为主，还记载了周围其他地方的一些品种。《稻品》记载水稻品种性状时注意到籽粒、质地、外形、稃芒、株秆、抗逆性、产量、品质等因子。还记载了每个品种的播种和成熟月份。

《蚕经》的部分内容引自宋元时的农书，如《陈旉农书》《农桑辑要》《王帧农书》《农桑撮要》等。《蚕经》所载养蚕技术与其前后有关农书相比较，并没有特别的贡献。江南地区写作蚕桑专书则是从《蚕经》开始的。

《芋经》是一本关于种芋的专著，包括“名”“食忌”“艺法”“事”4章，大部分是汇录古书中有关芋的记载。“名”一章记载了芋名及其种类。“食忌”一章，则是有关食芋时的注意事项，以及防止野芋中毒。“艺法”一章，还叙述了当时种芋的方法，主要包括选种藏种、整地育秧、绒种塘土等。“事”一章，引述了食芋救饥的一些历史事实。黄省曾的《芋经》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种芋专书。

《鱼经》是一部关于养鱼的专书。全书共分3个部分，“一之种”介绍了几种鱼类的繁殖方法。这几种鱼是鲤鱼、鳟鱼、草鱼、白鲢、鲻鱼等。繁殖方法有产卵孵化和取苗(秧)池养两种。“二之法”介绍了养鱼的方法，着重于在凿池和喂食两个方面。“三之江海诸品”介绍了江河湖海中19种主要的鱼类，且多属鱼中珍品，有鲟、鳇、鲈、鳓、鲳、石首、白鱼、鳊、银鱼、鲥鱼、鲙、鮆、鳜、鲫、虾虎、土附之鱼，鲙鱼、针口之鱼、河豚等。

《艺菊书》是一部种菊专书。全书包括储土、留种、分秧、登盆、理缉、护养六目。此书着重于种艺之法，与以记载花品为主的宋代菊谱不同，其价值也就在于此。

《西洋朝贡典录》是一本记载西洋地理的著作。全书分上、中、下3卷，始自占城，终于天方，记载了西洋23个国家和地区的方域、山川、道里、土风、物产、朝贡等情况。每国(或地区)后面都附有“论”。写作此书时，黄省曾搜集了一些随郑和下西洋的随员的著作，按照典要的体例，使用规范化的语言，走访前辈父老，核查文献书籍，经过前后7次修改，于明正德庚辰(1520年)前后完成了此书的写作。它研究明初远洋交通的重要资料。

除另外农学和地学以外，黄省曾在医学和生物学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他还写过《兽经》1卷，搜集了古代辞书、神话传说、博物志、史书等文献中有关动物的名称、掌故等内容，并涉及动物的分类、生态习性、医用价值、肉用价值等方面，是一本动物学书籍。

第十八章　明帝国悬疑

第一节　大明国号之谜

国号，诠释了开国皇帝的政治理想。比如元朝，其国号取自《周易》中“大哉乾元”。这个“元”，不仅表明了元世祖的胸襟，而且也是元朝最明显的特征——元朝疆域之辽阔。那么，明朝的“明”是什么意思，它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人们很容易想到，明朝的“明”字来自元朝末年的小明王。朱元璋最初投到郭子兴麾下，郭子兴的红巾军所奉之主就是小明王韩林儿。

自唐朝以来，有一群一群的人参拜着一个不为寻常人所知的“魔”。这个“魔”就是明教崇拜的是光明之神。这个光明之神为不满于现实的人提供了精神武器。对现实不满的人侍奉这个神，就是用他来组织民众、对抗政府。

明教即摩尼教产生于公元 3 世纪中叶，由波斯人摩尼创立。摩尼教创立后，即在波斯境内广为传播，并迅速进入北非、欧洲、小亚细亚、中亚一带。据说，摩尼本人在游历中亚时曾到过中国西北地区，但摩尼教正式传入中国则是在唐武则天时期（公元 7 世纪末）。由于摩尼教宣扬光明，在传入中国后，逐渐被称为“明教”。

安史之乱中，唐朝屡次向回鹘借兵求援，明教借回鹘的势力，重新风行于中土，在各地广建寺院（称大云光明寺）。经过 70 余年的发展，明教在中国的势力达到顶峰，仅次于佛教，居著名的三夷教（明教、景教、袄教）之首。唐武宗会昌三年（843 年），朝廷下令禁止明教在华传播，并没收明教的寺院财产，明教教众遂转入秘密活动。在组织上，中土明教也逐渐与西域的摩尼教团总部脱离联系。唐朝灭亡后，明教继续在民间秘密流传。

宋朝农民运动中，特别是在江浙和福建一带，反抗官府的农民所参加的诸多秘密会社中，不少都吸收或渗透了明教的成分，如北宋末年，方腊利用明教

组织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震动了东南半壁河山。

元朝末年是明教最后的兴盛时期。不但明教的教义被其他秘密宗教如白莲教吸纳并发展,而且明教自身在下层民众和一些知识分子中不断传播。

只要民间一遇水旱饥馑,百姓不满时,明教便会被利用来聚众造反,政府又不能不对它加以镇压。明教徒为了逃避禁律,便一再改名,或与其他宗教融合。到北宋末年,它便与出自佛教净土宗的白莲社、弥勒教合流了。

红巾军以明教为起事的招牌,需要一个活生生的明王。为了增强号召力,义军称他为宋朝皇室之后,只是后来被蒙古贵族夺去了。红巾军要壮大势力,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具有双重身份的小明王就成为最好的招牌。

朱元璋作为僧人云游四方时,所到之地正是彭莹玉、杜遵道传教布道的地区,因此他也接触到了白莲教。

郭子兴、孙德崖等以白莲社烧香聚众,于至正十二年(1352 年)在濠州起兵。郭子兴要增强自己的权威,就要借小明王的牌子,遥奉大宋小明王为主。此后,朱元璋也因为实力不够强大,还要借用小明王的旗号。但是,朱元璋建立了明朝之后,还没有离开这个"明"字。

朱元璋军队及其归附者的主要成分是原红巾军将士,这些人参加起义就是为了投奔"明王",不可能让他们马上抛弃原来的迷信思想。朱元璋不能让他们失望,以"大明"立国就暗示自己就是明王,地位无可取代。

历朝统治者所遵行的正统祭礼,都有"大明""朝日""夕月"这样的祭礼,这就使得"明"这个国号看起来堂堂正正,表明新皇帝乃是受命于天,与日月齐光。因此,以"明"作为国号,也得到了信奉儒家学说的人的认可。

明朝建立以后,一再下令严禁白莲社,并将其写入《大明律》。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别人再借此来聚集民众,窥伺皇帝宝座,但白莲社还是在民间流传,并且仍有人声称"弥勒佛下世",僭"明王"之号起而造反。这也正可看出朱元璋占据"明王"的位置是多么重要。

第二节 永乐大钟之谜

永乐大钟自诞生以来,至今还存在着一些令人向往的神秘色彩,揭示永乐大钟之谜,本身就是一个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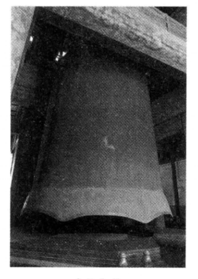
永乐大钟所铸铭文分为汉文经咒和梵文经咒两类文字。其中,汉文经咒共有7部佛经、9项佛咒;梵文则有100多项藏密佛咒。汉文经咒铭文字数约为226257字,另有御制年款9字;汉字铭文总数约226266字。梵字铭文约5400字(音节),其中有梵文种子字,均属于蓝查体梵文陀罗尼。铭文约23万多字。

永乐大钟的钟身上下内外共铸有100多种梵字陀罗尼佛咒,永乐大钟铭文最高端的中心铭文为:八叶莲花种子字曼荼罗,圆形曼陀罗内有9个代表了佛及佛母的种子字。曼荼罗又称曼陀罗,佛教意义为坛,以便祭供。曼荼罗有四种,即大曼荼罗、三昧耶曼荼罗、法曼荼罗、羯磨曼荼罗。法曼荼罗为绘有诸尊种子字,或真言,或经文义理文字的绘画。大钟上的这幅曼荼罗即"法曼荼罗"。永乐大钟悬挂结构的连接销南、北两端为花形曼荼罗,均铸有4个种子字,上边为阿弥陀佛种子字;悬挂结构上还铸有加持真言;钟口底部环绕一圈梵字陀罗尼,其中有总佛菩萨咒。

《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是明成祖朱棣御制的,其前20卷10余万字铸于这口"文皇御钟"内、外钟壁的主要部位之上。

有人说,永乐大钟是华严经一部,金刚经收口。也有人说,永乐大钟铸有华严经,故名华严钟。或者主观认为永乐大钟的铭文经咒均属于"华严宗",并认为这就是永乐大钟在后来被称为"华严钟"的理由。

但以上所列永乐大钟所有汉文、梵文经咒名称中,不仅没有《华严经》,也看不出与《华严经》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永乐年至万历年的100多年中,并没有将此钟称作"华严钟",而是称作"文皇旧钟""大铜钟""洪钟""万寿寺钟""万寿寺文皇御钟"等。因此可以看出,永乐大钟确实没有铸《华严经》。



永乐大钟

钟以载道,凡铸钟,必先进行内容设计,包括钟的定位、体量、铭文或纹饰、功能或作用、要反映或体现的内容、要达到或促成的社会效果等,都属于钟的内容设计范畴。

永乐大钟的内容设计主要体现在钟体铭文上。明成祖朱棣在永乐九年(1411年)为刊

印《金刚经》御制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序》；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四月十七日，朱棣又为《御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集注》作序。《金刚经》铸于永乐大钟的钟唇底口一周。

整个般若经类思想是万法皆空的“空论”。《金刚经》是般若经类的浓缩，《心经》又是《金刚经》的浓缩。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则铸在永乐大钟蒲牢西北侧，也是一个便于指认的部位。

明成祖朱棣还专为刊行《妙法莲华经》作过序。《妙法莲华经》是《法华经》中的一个重要的大乘佛学思想，就是给普通人以从善成佛的方便。《妙法莲华经》的全部铭文紧接着明成祖《诸佛名经》的诸神僧之名号，铸在永乐大钟内壁的中、下部。

以上是永乐大钟的主要部位或方便人们句读的部位所铭铸的重要经典。从中可以看出明成祖朱棣在钟上这些区域选择的这些重要经典是经过周密策划的，并形成了一种有机的组合：《法华经》《金刚经》等佛经的主要理论，同时也成为明成祖朱棣御制《诸佛名经》于大钟之上的理由和诠释。

永乐大钟的外观设计完全服从于内容设计，是永乐大钟铭文内容的具体表现形式。永乐大钟的外观设计有三个特点：一是悬挂结构(上下U形环)、蒲牢、钟唇、钟体内外壁全部铸满佛经，没有设计一般佛钟通常采用的具体蒲牢造型，也没有一般佛钟通常采用的莲花、袈裟纹(上四宫、下四宫等外观纹饰)浮雕；二是外形设计简洁、流畅，用若干环形线把钟体外壁、内壁划分成若干“铭文圈”，以“铭文圈”为基本造型单位，构成大钟的外观特色，起到方便经文排版布局和句读，增强佛经铭文感染力等效果；三是永乐大钟上各个佛经的布局安排、起讫部位十分考究缜密，一些重要佛经的起讫部位大多安排在钟体的东方，不仅如此，《诸佛名经》在钟体外壁各“铭文圈”的衔接部位以及在钟壁内外“三进三出”的出发点和回归点，大多也在各“铭文圈”的东方。

关于永乐大钟的重量，有的文献说是4.2万千克，也有的文献认为是4.35万千克。20世纪80年代，有关方面测算的是4.6万千克。永乐大钟的钟身内外很多部佛经上都出现过“八万四千”这几个字，且频率较高。由此可见，永乐大钟“重八万四千斤”的说法是有文化渊源的。

其实，人们测算的永乐大钟的重量包括了钟钮上部的上、下两个“U”形环悬挂结构重量，为1.8吨。而通行的称量大钟重量的标准是只计钟体和钟钮。永乐大钟的悬挂结构因为铸有梵文且浑然一体，就计在总重量中了。

如果把永乐大钟的钟体、钟钮和悬挂结构的重量加在一起，还真就是“八万四千斤”。

第三节　《永乐大典》下落之谜

明成祖朱棣除了派遣郑和下西洋之外，下令编纂《永乐大典》是他的又一大手笔。永乐三年(1403年)，高僧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带领三千多名文臣接手了这项任务，前后共耗时四年。按照朱棣的要求，大典共辑录图书七八千种，将中国古代典籍尽量收集齐全。

《永乐大典》的内容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囊括了我国大量的14世纪以前的文学、艺术、史地、哲学、宗教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永乐大典》正文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

目前，《永乐大典》散落在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单位和个人手中。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公私所藏《永乐大典》仅800余卷400册左右。国家图书馆目前拥有221册(包括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60册)。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已知和能见到的《永乐大典》加起来，还不到原书的4%，另外96%的《永乐大典》不知下落。

《永乐大典》修成之后，最初藏在南京的文渊阁。朱棣迁都北京之后，《永乐大典》也从南京迁移到了北京紫禁城里，并作为皇家藏书，秘不示人。

在整个明朝，即使是高层官员，也没有机会接触和阅读《永乐大典》，成了封建帝王个人的御用品。对于深藏禁宫的《永乐大典》，明朝史书中很少提及。即使有记载，也只是寥寥几句。

明末有位宦官名叫刘若愚，熟悉宫廷内情，写了本书叫《酌中志》，以记述明末宫闱旧闻秘事而著称。他在书中说道，他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听说关于《永乐大典》的记载，而且也不知道《永乐大典》储藏于何处。

《永乐大典》的下落在宫廷中成了一个秘闻，关于《永乐大典》的各种猜测以讹传讹，加上各种史书对《永乐大典》语焉不详的记载，使《永乐大典》的下落变的扑朔迷离，隐晦难觅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永乐大典》似乎已经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明朝灭亡后，清朝康熙年间的一天，徐乾学、高士奇等官员推开了北京南

池子大街的皇史宬大门。这是一座古老的皇家档案馆，建成于明朝嘉靖十五年。明清两代列朝皇帝实录、皇帝家谱等皇家档案就存放在这里特制的“金匮”中。让人意外的是，一直下落不明的《永乐大典》就安静地躺在这些“金匮”中。但据记载，这个时候《永乐大典》已经残缺不全了。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四库全书馆的时候，要利用《永乐大典》，对《永乐大典》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已经缺1000多册，合2422卷。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六月，《四库全书》修纂官黄寿龄在家感到坐立不安，他预感到很有可能要大难临头了。

作为《四库全书》修纂官，黄寿龄白天的工作是校阅《四库全书》。但是这天，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完成任务，只好将六册《四库全书》用包袱裹好，私自带出宫外。这天晚上，黄寿龄和仆人走到米市胡同时，黄寿龄突然感到腹痛难忍。仆人只好放下包袱，两人匆忙走向偏僻的角落。然而，当两人再次回到原地时，却意外地发现包袱已经不翼而飞。

消息很快传到乾隆皇帝那里，乾隆皇帝感到震怒，命令立即查询明确，并命令在城内大规模搜捕盗贼和《永乐大典》。

由于官府搜缉很紧，《永乐大典》是宫内之物，书店和纸铺都不敢收购，偷盗者无法脱手。一个月以后，这六册《永乐大典》在御河桥边被人拾到了。黄寿龄总算可以放下他那颗悬了许久的心，但却受到了罚俸三年的处分。

清朝光绪元年(1875年)重修翰林院衙门时，清点《大典》已不到5000册。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龢曾入翰林院检查，竟只存800册了。短短20年时间，从5000册锐减到800册，《永乐大典》以惊人的速度在流失。

据清人记载，《四库全书》修纂完之后，一些官员视《永乐大典》为多余之物，清政府对《永乐大典》的保管也大不如以前了。此后，《永乐大典》被束之高阁，无人过问。一些官员也开始趁机偷窃。

据清人缪荃孙记载，翰林院的一些官员偷书伎俩极为巧妙，他们一般选择在冬天进行偷窃。官员早上进翰林院时随带棉袍一件，不穿在身上，打成包袱形状如两本《永乐大典》大小。当夜晚降临之时，一些官员将两本《永乐大典》包入包袱里，却把原本包在包袱里的棉袍穿在身上。看守人员见到这些官员早上曾带包袱而来，晚上带包袱而去，也就不起疑心了。

据记载，光绪年间一位翰林侍读文廷式，一人就盗走100多本《永乐大典》。文廷式死后，这些书又被其后人卖给外国人或古董商。就这样，《永乐大

典》大量流失。目前,《永乐大典》散落在日本、英国、美国等几个国家。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文明古都烧杀掠抢。翰林院坐落在东交民巷,靠近使馆区,已经被沦为战场。侵略者对《永乐大典》肆意抢掠,甚至代替砖块构筑工事。在这场灾难过后,《永乐大典》几乎丧失殆尽,仅存的数百册也散落世界各地。

目前全世界所能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有一些共同特征:每本书的书后都注明了当时的重录官员,而这些官员全都是明朝嘉靖皇帝时期的官员。这就是说,目前世界上所有能见到的所有《永乐大典》都不是永乐年间编撰的。那么,《永乐大典》除了永乐年间的这个版本之外,到底还有几个版本呢?据史书记载,《永乐大典》修成之后,明朝各代帝王中查阅过《永乐大典》的却寥寥可数。

明世宗嘉靖皇帝似乎对《永乐大典》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嘉靖皇帝的案头常常放置几册《永乐大典》以便随时翻阅。嘉靖皇帝很想将《永乐大典》重录一部,多次同大学士徐阶谈过。但这个想法都因为工程过于浩大,重录难度太高,而被搁置下来。

据史书记载,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皇宫发生大火,火势连绵。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受到威胁,情况非常危急。大火消息传来,让嘉靖皇帝感到最为担心的就是《永乐大典》的安全。他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令左右登上文楼督促抢救《永乐大典》。幸亏抢运及时,《永乐大典》才能逃过这次浩劫。嘉靖皇帝因此心有余悸,决心将《永乐大典》重新抄录一部,分两处收藏,以备不测。

大火之后的第五年秋天,工程浩大的重录工作正式开始。重录官员选择了按照原本进行"对本抄写"这个最简单也最正确的方法。工作进行了整整六年,直到嘉靖皇帝去世,重录工作还在进行。新皇帝明穆宗继位之后,重录工作才完成。

据史书记载,重录的《永乐大典》在内容、格式、装帧方面与原本如出一辙。此后,《永乐大典》便有了两个版本。现在人们习惯于把永乐年间的第一个版本称为正本,把嘉靖年间的重录本称为副本。这就是说,国图收藏的、被八国联军毁掠的以及流失海外和国内陆续搜集的《永乐大典》残本均为嘉靖重录副本或其抄本。而《永乐大典》的正本至今一卷也没有发现,并且其下落也一直不见准确的记载。这就是说,《永乐大典》正本失踪了!

《永乐大典》正本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吗？如果存在，它到底在哪？如果已经不存在于世界上，它又是什么时候，被谁用什么方式毁灭的？对于正本的下落，为什么历代史书中不见任何准确记载？

清朝末年的一位学者缪荃孙提出了《永乐大典》正本毁于清乾清宫大火的说法。乾清宫在嘉庆二年(1797年)发生了一次大火，将整个乾清宫几乎彻底毁灭。

有学者对这种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乾隆九年至四十年间，清政府曾对宫中藏书清理过，所有善本典籍全部集中在一起，编成了《天禄琳琅书目》。《永乐大典》是书籍中的庞然大物，有一万多册，假如正本在乾清宫，是极容易被发现的，怎么可能不编入《天禄琳琅书目》呢？

关于正本失踪的第二种说法是毁于明亡之际，是被李自成焚毁了。但史料中并没有对此事的记载，而且连明朝太监都不知道《永乐大典》正本存放在哪里，怎么证明李自成烧的就是《永乐大典》呢？也只是一种猜测。

另有学者认为，《永乐大典》正本最后的出现时间是在嘉靖的丧葬期间。《永乐大典》副本抄完是在隆庆元年四月，而嘉靖已于上年十二月死亡。礼仪日程表明，嘉靖皇帝是在死后三个月才下葬，此时已经到了隆庆元年三月。而新皇帝表彰抄写人员的日期是在隆庆元年四月，但这并不是抄录完成的最后日期，应当在四月之前。可是却从此时起，《大典》正本的去处就音信渺然了。

中国古代皇朝修典既成，在大肆张扬进呈褒奖的同时，必然会记载该书典藏于何处，并在官修书目中着录，以彪炳皇恩浩荡。这已是历代皇帝修典的定式。《永乐大典》的重录却没有这样做，成为特例。

有学者认为，《永乐大典》正本的消失，带有明确的人为性质。而人为的焦点显然在嘉靖皇帝。他并不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但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珍爱《永乐大典》；他对《永乐大典》的重录倍加关注，却又给后人留下了暧昧的"两处收藏"。在他下葬之后，《永乐大典》正本也从此销声匿迹。他究竟把《永乐大典》正本带到哪去了呢？

对于中国古代帝王来说，死后要带走自己生前所喜爱的东西，无一例外地都会选择陪葬这种方式。而对于嘉靖皇帝的丧葬，令人立刻联想到他自己几乎经营了一生的地下皇宫——永陵。永陵是十三陵中最大的一座，它的地宫规模超过定陵，也很可能在长陵之上。

专家们猜测，《永乐大典》正本就在永陵地宫中。为了存放体积巨大的《永

乐大典》，永陵地宫也许会比定陵地宫多出一两个侧殿，这应该是保存《永乐大典》的书房。

当然，《永乐大典》正本是否做了嘉靖皇帝的陪葬物，在打开永陵地宫之前，只能是一个合理的推想。如果《永乐大典》正本确实保存在永陵地宫中，经过400多年的岁月，它们是否依然能保持完好？

这一切猜想在打开永陵地宫之前只能是一个理论上的假设。消失了几个世纪的《永乐大典》正本，也许还有更多未解的谜团，等待着人们去不断探寻。

第四节　大报恩寺塔之谜

大报恩寺塔位于南京城南的东长千里，现今的雨花路东侧。在朱棣建塔前，这里曾有阿育王佛塔。崇佛的梁武帝萧衍于大同八年（公元543年）对塔作了改造，复建长干寺，易名长干塔。宋天禧年间（1017—1022年），又改名为天禧寺，后建圣感塔。元朝元年间（1335—1341年），再改为天禧慈恩旌忠寺，元末时佛塔被毁。

从朱棣亲自拟就的《御制大报恩寺左碑》来看，朱棣还是考虑到这里的“佛缘”的。

报恩寺塔的建设周期很长，工程量惊人，前后花了19年时间。

朱棣在生前并没有看到此塔的建成，一直到他孙子朱瞻基当皇帝的宣德六年才完工。这么大的工程，需要的人力非同一般，据说共有十万人参与了建设。

参与建设的主要是两种人，一是士卒，二是民工。但从《明史》的记载来看，在现场的士卒确实有不少，但不一定是劳力，而是维持劳动秩序和安全保卫事务的。

民间传说，报恩寺塔为犯人所建。工程中的所谓民工，特别是做苦力活的人，都是囚犯。《明史·郑辰传》记载，建报恩寺时的工作条件异常艰苦，囚犯怨声起，传言发生民变，朱棣这才派郑辰前去查看。为了让囚犯卖力，朱棣下诏，原犯死罪者，寺塔修建完成之日，赦免其死刑。

除了犯人之外，修建寺塔的还有工匠，工匠是技术人员，下面具体做体力活的还有役夫。每一匠人配有五名役夫。匠人实行轮班制，三年一轮；烧琉璃

的匠人则为一年一班，一次至少要连续服役三个月。另外还有坐住制。

大报恩寺塔素有“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的美誉。

大报恩寺塔美在塔形，平面八角，高九层；塔的覆瓦和拱门都用五色琉璃构件，塔共用 2000 两黄金做成。飞马、飞羊、狮子、白象等图案，生动美观。全塔共悬挂风铃 152 个，塔内置油灯 146 盏，日夜通明，名为“长明灯”，每昼夜耗油达 32 千克。

大报恩寺塔贵在建筑所用琉璃构件。建塔琉璃的烧造有独特的方法。

琉璃以陶土为胎，经 1200℃上下的高温烧制后，表面涂刷铅釉，再经 800℃左右的低温烧制方成，属低温色釉。其以氧化铅或硝为助熔剂，以铁、铜、钴、锰的氧化物为着色剂，再配以石英制成。但具体怎么做，都使用了什么配方，据说已经失传了。

在宋朝《营造法式》和明代《天工开物》及一些文人笔记中均记载：从制坯到成品要经过 20 道左右的工序，但里面的“火候”很有讲究，如第一次烧时，有经验的匠人会把土坯烧得“生”些，以利色釉进入坯体。

制作琉璃的陶土的产地分布很广，明代以安徽当涂白土山产的白土质地最好，呈灰白色，烧成后呈白色。大报恩寺塔的琉璃构件即由此处的白土烧造。

当年朱棣在兴建大报恩寺塔时，召集了大量匠人，特别是琉璃匠人。在宝塔山外的今窑岗村一带设官窑，烧造建塔所需的大量琉璃构件。传说，当年共有 72 座窑场。在大报恩寺塔造好，这些窑场就废掉了。

1958 年时，有人在聚宝山窑址挖出了大量的琉璃构件，上面均有层数和左右上下位置的墨笔字样，专家断定为大报恩寺塔上的拱门构件。1959 年，在附近还发现了用于存放琉璃构件的库房。库房由大块的城砖砌成，打开发现里面有整齐的琉璃构件，有的重达一两百千克，两块便可装一小板车。挖了四米深、两米宽的豁口，仍不见穷尽。后来，挖出的部件被全部打碎。另外，人们还发现了半成品仓库。

1987 年，南京考古人员在窑址附近的一米多深的地下，又发现了埋藏的琉璃构件。南京在建设城南立交桥时，古窑址一带也发现了大量的琉璃构件。当时出土的构件上有墨汁标记，指明此构件的位置。

1840 年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强迫清政府在南京静海寺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就在这期间，听说大报恩寺塔内有

很多宝贝，英军遂先后多次前去抢劫，金佛、金饰等可以拿到的装饰器物、塔内摆设，都让他们搜刮去了。又听说物件表面镀金，有的英军拿出随身携带的刀子一块一块割“金皮”。后来遭中方强烈声讨，英军为此赔点款了事。

清朝末年，太平天国占领了南京。1856年秋天，太平军发生了内讧，洪秀全、杨秀清之间矛盾爆发。当时督师江西的北王韦昌辉接到天王洪秀全的密诏后，率兵三千连夜回天京诛杀杨秀清及其家眷。韦昌辉图谋不轨，有意扩大事态，株连杀戮杨部属2万余人，史称“天京事变”。

翼王石达开闻讯冒险赶回天京，指责韦昌辉的滥杀行径。韦昌辉杀心又起，决定谋害石达开。石达开见情况不妙，连夜逃往安徽的安庆，调集部队讨伐韦昌辉，要求洪秀全诛杀韦昌辉“以谢天下”。同年十月初五，洪秀全下诏讨韦，处死了韦昌辉。

大报恩寺塔就是在石、韦对峙中被毁掉的。当时，韦昌辉在城内害怕石达开利用寺塔之高向城内开炮，遂下令将塔炸毁。大报恩寺塔就这样从世人的视野中消失了。

第五节　明故宫未解之谜

明故宫，这座神奇的宫殿隐藏着众多的未解之谜。早在600多年前，从朱元璋给明故宫选址开始，这里就迷雾重重、暗藏玄机。迷信风水的朱元璋违背古制，没有取“天下之中”建宫，而决定将皇宫建于城垣东隅，后来明故宫又出现“前昂后洼”，犯了风水说的“凶相”，加上宫中连连出现命案悬案，成了一座“凶宅”。

1368年前，朱元璋是“吴王”时，攻下集庆后，把“吴王府”搬进了元朝统治江南的“行御史台”衙门旧址（今内桥王府园一带）。一开始，朱元璋并没有扩大“行御史台”面积，只是修了修瓦。但随着身份地位的提高，他的妻子也越来越多，并且生下了26个儿子，10多个女儿。这么多妻儿，再加上佣人家仆，使得“行御史台”人满为患。

朱元璋开始考虑兴建宫室。朱元璋是一个信风水、性情诡异的人，他选宫址也是按中国风水学原理进行的。南京的紫金山就像一条匍匐的龙，龙头就在燕雀湖（今前湖）。而城南的三山，从上往下看就像一只蹲着的老虎。

朱元璋为了占据“龙头”，于是下令调集几十万民工开始填湖。可当时的燕雀湖面积很大，而且地势低洼，填湖填了很久才填满。由于填湖工程太大，累死了不少民工，耗费的土石不计其数。

经过三个阶段的营建，明故宫终于建成了。只是，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等宫殿建在原先的燕雀湖中，重力太大又不均衡，导致了明朝宫殿严重前高后低。

宫城“前昂后洼”，对信风水的朱元璋来说是“凶兆”。但迁都未成，65 岁的朱元璋心灰意冷。当时的朱元璋已经意识到：王朝的兴衰成败自有天命。他只求老天能念他的一片赤诚之心，造福他的子孙后代。

朱元璋的猜忌心特别重，当年辅佐他夺天下的功臣，除了沐英等少数人之外，都成了刀下冤魂。朱元璋当政时，发生过两次杀人狂潮，一次是胡惟庸案，另一次是蓝玉案，两次杀戮一共有 10 万人死去。这些决策都是在奉天殿定的。朱元璋辞世当天，那些没有生养的妃子们都在后宫被勒令上吊而死。这批冤死的宫女、妃子至少有 43 人。

也许是杀戮太多，朱元璋当政时期，明故宫一带就陆续出现怪事。

洪武十五年(1382 年)以后，朱元璋的皇室家族屡屡出现神秘死亡事件。洪武十五年(1382 年)，身体一向很好的马皇后突然肚子疼，当时，朱元璋请来了太医，但马皇后拒绝吃药，不久就在坤宁宫去世，享年 56 岁。马皇后的死亡不可能是谋杀，她的死充满了神秘性。

在马皇后死后不久，太子朱标的长子朱雄英也夭折了，当时朱雄英只有五六岁，死因不明。紧接着，朱标的妻子常氏也突然抱病，并很快去世。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朱标去了一趟西安就染上了风寒，回到家后死在了东宫。从(1382 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10 年之内，朱元璋痛失了四位他非常喜爱的家人。

朱标去世后，朱元璋的二儿子朱樉也去世了；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朱元璋的三儿子也去世了。这年的农历六月初八，朱元璋感觉身体不适，初十就驾崩了。

朱元璋驾崩后，其孙朱允炆即位。但朱允炆刚登基几年，他的叔叔朱棣就起兵了。

在朱棣攻下南京明故宫时，宫内燃起了熊熊烈火，大火熄灭，明故宫内的奉天、华盖、谨身殿都被火烧了。

朱棣当上皇帝后，开了一个奸党分子名录，这个名录上有 29 人。由于朱棣大开杀戒，南京一度成为人间地狱，爆发了“壬午殉难”，共有 100 多名大臣先后被杀。

在朱棣夺得江山之前，姚广孝就劝诫朱棣，到了南京后不能杀方孝孺，杀了方孝孺就失去了人心。朱棣到南京后，对方孝孺一再忍让。有一天，他召方孝孺进宫，方孝孺披麻戴孝上朝了。方孝孺见到朱棣，就斥责他为什么造反，朱棣说是仿效周公辅助成王。方孝孺又问成王在哪里，朱棣回答说烧死了。方孝孺又问为何不辅助成王的弟弟或儿子……朱棣被问得火冒三丈，逼方孝孺写登基诏书，方孝孺写了“燕贼篡位”四个字，招来了杀身之祸，在奉天殿上，朱棣命人割了方孝孺的耳朵。而后，从耳朵一直割到嘴巴，血流不止。朱棣还不解气，命刽子手把方孝孺拖到午门杀了。

明朝中期前后，南京明故宫发生了大火灾，前朝三大殿、内花园等先后遭火而毁。这是南京明故宫遭受的第二次浩劫。

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后，小南明又迁都南京。但此时的明故宫已经破败不堪，奉天殿已经化为尘土。后来，清军占领了南京，清军将军、都统二署设在明故宫。他们在里面肆意折腾，明故宫就剩下大致轮廓了。

清朝末年，太平军进攻南京，与驻扎在明故宫的驻防清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明故宫成了双方交火的战场。后来太平军终于占领了南京，为了修建洪秀全的天王府，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来到临近的明故宫，他们就地取材，把明故宫能拆得动的、能搬得动的石材石料全部搬走了。

南京明故宫历经三次大浩劫之后，只剩下断垣残壁。如今南京明故宫公园内基本上是空旷一片；午朝门公园里仅有一块精美雕镂的大石壁，奉天殿前奉天门石柱础遗物和宫城东门、皇城西门、午门及其附近的城垣等极少一部分遗迹尚存。

第六节　宝梵壁画之谜

宝梵壁画存于遂宁蓬溪宝梵寺大雄宝殿内，共 87 幅，将近 200 平方米。这些壁画均以佛教故事为题材，所绘法像 103 人，或聆经说法，或穿针引线，或窃窃私语，各具神态，栩栩如生，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超凡的艺术魅力。

壁画笔力遒劲深厚，色彩鲜艳明丽，颇似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的笔意，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宝梵壁画至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但画壁及壁画用色毫无损伤，经久不衰。

然而，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信息不畅，宝梵壁画长期隐于川中一隅，鲜为世人所知。

从成南高速公路至蓬溪县入口，沿一条水泥乡道再行5千米，经古镇回龙场，便可见一森森古寺，这便是“仙画”所在地的宝梵寺。据明碑《宝梵寺修造记》称：之所以在此择地建寺，是因其地“幽胜”，可“藏焉修焉”。

宝梵寺原名“罗汉院”，始建于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属佛教“禅宗”“净土”派。“宝梵寺”名为宋英宗赵曙敕封，取意为“佛中之圣，梵中之宝”，后毁于战祸。到了明朝正统年间，才有僧人海舟、清澄二人广纳功果，相继带领弟子在原“罗汉院”的基础上续建庙宇，重振佛事。现存建筑中，除两侧廊庑改建于清代之外，中轴线上的天王殿、大雄殿、观音殿均是典型的明代建筑，尤其是重建于明景泰元年（1450年）的大雄殿，斗拱飞檐，玲珑剔透，建筑体貌庄严静穆，堪称“明代建筑佳构”。

据史料记载，明成化二年（1466年），僧人清澄、净元等请画工于大雄殿泥壁图画12铺，其上拱眼绘有佛像24尊，名曰《西方境》，共计104平方米。取材于唐玄奘译著《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住记》等梵典，描述的是诸罗汉及众仙佛共赴佛会的故事，因而《西方境》又称《罗汉图》。壁画现仅存10铺，空缺2铺，1铺为卷首，为后人毁损，1铺是卷尾。

在现存的10铺壁画中，尤以《地藏说法》最为精妙，画面高3.60米，宽3.18米，曾被收入《中国美术全集》。另外《议赴法会》《雷音供奉》《达摩朝贡》《准提接引》《南天仙子》《长眉问难》《罗汉聆经》（一、二）《功德圆满》等9铺，亦是匠心独运，情景交融，妙趣横生，堪称精品。

除大雄殿壁画外，宝梵寺还有从附近定静寺迁移的明代壁画《诸天朝贡》共4铺，计25平方米，陈列于观音殿内。此画作于明景泰二年（1451年），晚于大雄殿壁画15年，虽其品相略次于大雄殿壁画，但亦属珍贵文物。

宝梵壁画宝梵为何人所作，至今无考，流传甚广的说法有三个。

一是“明画”“唐风”说。宝梵壁画虽是明代作品，却颇具唐代风格，其格调尤似吴道子“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笔意神功，因而民间传闻为唐代画圣吴道子“显灵”宝梵所作的“仙画”。

二是神仙作画说。相传在重建宝梵寺时，寺中长老请来一位童颜鹤发的老人作画。这位老人整日闲游，迟迟不肯动笔。临到大雄殿佛像开光前一天，他才向长老要了几只扫帚，并将各色颜料配兑在一只木桶中，等到夜深人静时，老人潜入殿内，蘸色挥帚，四壁狂抹。有一个好奇的小和尚前去窥视，但见扫帚过处，法像跃然，五光十色，金碧辉煌，不禁大声叫好。老人闻声弃帚，破壁飞升而去。传说中"神仙老人"所破之壁至今尚存。

三是壁画神怪说。当地乡间盛传，自宝梵壁画作成之后，宝梵寺附近村民所养的鸡、鸭、鹅等家禽常常莫名其妙地"失踪"。有一天，村民们突然发现有一只小老虎正在扑杀鸡鸭，便呼唤邻里操起棍棒追撵。小老虎径直往寺内逃去，村民们追进寺内，四处寻找，却不见踪影，随后找进大雄殿，看见壁画上的那只侍虎正浑身冒汗，嘴角上还粘着带血的鸡毛，众人才恍然大悟，认定就是壁画上的侍虎显灵作怪。之后，又每每如此。于是，村民们在惊奇之余，便用铁钉钉住侍虎的眼睛，方才治住了灵怪。至今宝梵寺附近的村民谈及此事，仍眉飞色舞，泽泽乐道，把那奇异之事说得活灵活现。

第七节　豪侈的明中都

明中都城坐落在今安徽省凤阳县西北部淮河南岸的高地上，占地面积 50 多平方千米，它是明太祖朱元璋悉心营建的一座最为豪侈的都城，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豪华的都城之一。

洪武二年(1369 年)八月全国统一，朱元璋召集诸老臣议论建都之地。明太祖听了大臣们关于在长安、洛阳、汴梁、北平等地建都的意见后，于洪武二年(1369 年)九月下诏以临濠为中都，改临濠府为中立府，又因中都宫阙建在凤凰山之阳，故改名凤阳。

明中都的营建消耗巨大，建筑所用的木材，不仅在国内木材采伐，还遣使到附属国求大木。建筑墙体先用白玉石须弥座或条石作基础，上面再垒砌大城砖。而砌筑时则以石灰、桐油加糯米汁作浆，关键部位甚至用生铁溶灌。所有的木构建筑穷极侈丽，画绣的彩绘鲜艳夺目，所有的石构建筑华丽奇巧，雕镌的图案精美绝伦。

中都皇城是最里面的一道城，周长 3.68 千米，平面近方形，规模比北京故

宫大1万平方米。城墙高大，每边城墙开一道门，南为午门、北为玄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皇城之外有二道城禁垣，周长7.85千米，平面呈长方形，用砖石修垒，高2丈。每边城墙也各开一道门，南为承天门、北为北安门、东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两城的东、西华门和东、西安门均设在东西两墙的南部，使得宫阙在守卫上更加严密。

明中都的布局，严格遵循传统的对称原则，着重突出的是中轴线上宫阙的建筑布局。纵贯全城的中轴线，南起凤阳桥，跨涧水进中都城的洪武门，踏上洪武街，横穿云霁街，经大明门，穿过宽阔的凸字形广场，入禁垣的承天门，再经端门，过外金水桥，进皇城的午门，过内金水桥，入奉天门，穿过三殿，进后宫，出皇城的玄武门，经苑囿，越凤凰山巅，出禁垣的北安门，下凤凰山，上玄武街，直至中都城正北门(未建)。这条全长近7千米的轴线两侧规整对称地排列着许多建筑。

皇城内正殿左右为东、西二宫，两翼为文、武二楼和文华、武英二殿；后宫两侧序列六宫。皇城午门南面，左为中书省、太庙，右为大都督府、御史台、社稷坛。这种布局体现了几千年封建社会中皇权至上的传统，故比以前王朝宫殿安排的更为森严。

大明门广场东西两侧，左为城隍庙、中都国子学，右为功臣庙、历代帝王庙。广场前垂直于大明门的洪武街两旁为左、右千步廊。平行于大明门的云霁街东、西两端，遥相对称的是鼓楼和钟楼。这不仅进一步加强了从外城到禁垣之间在建筑上的层次和深度，而且把宫阙衬托得更加雄伟壮丽。

明中都竣工后的600年间，经历了巨变。到清代，康熙六年(1667年)，移凤阳县治于旧皇城内。乾隆二十五年(1775年)，撤禁垣、钟楼等取砖建凤阳府城。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焚烧龙兴寺、鼓楼等。明中都的大部分宫阙殿宇现已尽毁，仅存午门、西华门和长约1100米的城墙。

第八节　皇权的堡垒：紫禁城

1403年的大年初一，大明朝第三个皇帝永乐帝正式启用永乐作为自己的年号。这一年为永乐元年。

永乐元年，明朝的首都在今天的南京。明太祖朱元璋将都城定在这里，并

集中国两千年宫殿建筑之精华，建造了皇家宫殿。而此时的北京城在大明的版图上，还是朝廷的一个布政司，叫作北平。

永乐元年的农历正月十三，一个名叫李至刚的礼部尚书向永乐帝提出了一个建议。他建议永乐帝遵循太祖朱元璋的遗志，另设一个都城，把北平立为京都。永乐帝当即答应了下来，随即将北平升为京城的一道圣旨昭告了天下。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而一座伟大宫殿将由此诞生。

永乐三年(1403 年)，北京城里突然多了很多来自江浙等地的南方人。他们得到朝廷的应允迁至北京，即可获得五年免缴税赋的优待条件。这些人普遍比较富有，很快便在北京做起他们以往在南方所经营的生意。同时在北京的郊区也多了很多农民开始垦荒种地，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开始了。

永乐四年(1406 年)8 月一天的朝堂上，以丘福为首的一群大臣建议在北京修建一座新的宫殿，永乐帝接受了这个建议。永乐帝随即派他的心腹亲信们奔赴全国各地，为这项巨大工程做准备。他们中有工部尚书宋礼、吏部右侍郎师逵、户部左侍郎古朴。

这些人即将去往的地方是四川湖广等地的崇山峻岭，他们这次要去开采的是楠木。珍贵的楠木多生长在原始森林的险峻之处，那里常常有虎豹蛇蟒的出没。官员和百姓们冒着危险进山采木，结果很多人丢失了性命。采伐的木材从川贵湖北的崇山峻岭中，依靠天然的河流和修好的运河输送到了北京。

永乐时期为建造新的宫殿而进行的采木工作，据说持续了整整 13 年。开采修建宫殿的石料同样也很艰辛。

保和殿后紫禁城中最大的丹陛石，在明代是由一块完整的石头雕刻而成。据历史记载，这块石料和其他石头都来自于北京西南郊房山的大石窝和门头沟的青白口。这块石料的开采动用了 1 万多名民工和 6000 多名士兵，而运往京城则更为艰巨。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修路填坑，每隔 500 米左右掘一口井，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2 万民工和 1000 多头骡子用了 28 天时间才运到京城。那些同样被费尽心力运到紫禁城的巨石，大部分都被安放在故宫中轴线的御道上。

这次宫殿建设的备料过程长达近十年。在这十年中，北京逐渐成了大明王朝疆域内最热闹、最庞大的建筑工地。据说当年那些为这座宫殿付出辛劳的工匠，竟超过了百万人。

永乐四年(1406 年)，泰宁侯陈珪被任命为改造建设北京城及宫殿的总

指挥。朱棣在写给陈珪的一封诏书里说："要善待工地上的军人和民工，饮食和作息要有规律，不要过于劳累。你们要体谅我爱惜百姓的想法。"陈珪一直在北京监工，直到永乐十七年(1419年)去世，他没有等到紫禁城落成的那一天。

据历史记载，在参与这项工程的能工巧匠中，以老木匠金珩为首的20多人被同时提升为营缮所丞。负责石料制作的陆祥、负责工艺的蔡信等人，也都被史书记载了下来。

在紫禁城尚未建成之时，永乐帝的燕王府和紫禁城完工前的临时宫殿，就在今天的中南海的西北。从永乐七年(1409年)至宫殿建成后的永乐十九年(1421年)，永乐帝在北京度过了5年零8个月。这使得大明朝的决策、军事和行政系统逐渐北移。那个时期，北京逐渐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移民军户对郊区的屯田垦荒，使北京农业生产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北京对于这个王朝开始显得越来越重要。

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紫禁城终于建成了。整个宫殿建筑群由北往南延伸坐落在整个北京的中心地带，成为这个王朝新的神圣之地。

永乐十九年(1421年)，在紫禁城刚刚建成之后，百姓迎来了那一年的农历新年。这一天，永乐帝在新落成的宫殿里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朝贺仪式。他登上了高敞壮阔的奉天殿接受大臣们的跪拜。永乐帝和大臣们都为这座辉煌无比的宫殿群所振奋与鼓舞。

永乐十九年(1421年)5月9日，天气骤变雷鸣电闪，三大殿被雷火击中而焚毁了。永乐皇帝用近20年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而建成的三大殿，只存在了三个月就毁于天火。这对永乐帝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毁于天火的大明宫殿三大殿，在永乐时代没有再进行重修工作。之后的20年中，曾经辉煌如梦境一般的紫禁城中央地带，是一片焦黑的废墟。

十多年后的正统元年(1436年)，正统皇帝朱祁镇即位。他一登上皇位就下诏重修紫禁城。这一年的秋天，正统帝下诏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兵士、民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又过了五年，他正式下诏重修三大殿和乾清、坤宁二宫。下诏当日工程就正式动工。一年半之后，拖延了十几年的重建工作完成了，紫禁城又完好如初。

紫禁城的"紫"是指紫微星垣。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将天上的星宿分为三垣、二十八宿和其他星座。三垣是指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紫微垣是中

垣，又称紫微宫、紫宫。它在北斗星的东北方，古人认为那是天帝居住的地方。封建帝王以天帝之子自居，他们办理朝政与日常居住的地方也就成了天下的中心。又因皇宫是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最高级别的“禁区”，便有紫禁城的“禁”字来强调皇宫的无比尊严。

太微垣南有三颗星被人视为三座门，即端门、左掖门、右掖门；与此相应，紫禁城前面设立端门、午门，东西两侧设立左、右掖门。午门和太和门之间，有金水河蜿蜒穿过，象征着天宫中的银河。皇帝及皇后居住的乾清宫与坤宁宫，“乾”“坤”二字就意味着天地的意思。其东西两侧的日精门与月华门，则象征着日月争辉。东西六宫及其他诸宫殿也都分别象征着天上的十二星辰和各个星座。

有人说，紫禁城有 9999 间房。还有人说，紫禁城的房间应该有 9999 间半。紫禁城怎么会有半间房?

原来，半间是指文渊阁楼下西头的那一小间。实际上紫禁城所谓的半间房是根本不存在的。文渊阁西头这间的面积很小，仅有一座上下用的楼梯，但仍是一整间。据实地测量，紫禁城的房屋有 8600 余间。

来紫禁城参观的人，总要找找“冷宫”。紫禁城的“冷宫”在哪里，并无定所，但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冷宫即是乾清宫、长春宫；另一种说法认为“冷宫”无固定地址，关禁王妃、皇子的地方便俗称“冷宫”。

根据一些文献记载，明代被作为“冷宫”的地方有好几处。

明末天启皇帝时，成妃李氏因得罪了权势赫赫的太监魏忠贤，被从长春宫赶到了御花园西面的乾西，并一住就是四年。先后被幽居乾西的，还有定妃、嫔、恪嫔三人。这个“冷宫”在紫禁城内之西。

紫禁城各门匾中“门”字末笔直下至底没有向上的勾脚，为什么要写成这样呢?

原来“门”字的这种写法宋代就有了。据说宋偏都临安后，玉牒殿失火，殿门烧光。宰臣奏说，宫殿匾额中的“门”字末笔都有勾脚，带火笔，因此招火，将这些匾额全部烧掉方能免灾。从此以后，在书写所有宫殿的匾额时，“门”字末笔都直下，不勾脚。

第九节　智化寺：明朝木结构建筑奇葩

智化寺位于今北京东城区禄米仓胡同5号，始建于明正统八年（1443年）。它庄重典雅、用料独特的黑琉璃瓦顶，素雅清新的装饰彩绘，精美古朴的佛教艺术都是不可多得的瑰宝。

智化寺初兴建时是正统帝宠信的太监王振的家庙，因被赐名“报恩智化寺”而繁盛，繁盛时曾占地约2万平方米。目前东西两路已荡然无存，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保存基本完整，共四进院落，总长278.8米，宽44.5米，方圆12683.78平方米，是北京现存的唯一仍保持明朝风格的佛教寺庙。

智化寺坐北朝南，中轴线上依次分布有山门、智化门、智化殿、如来殿、大悲殿等主体建筑，智化门前是东西对称的钟楼、鼓楼；智化殿前是东西对称的大智殿与藏殿。整座寺庙是典型的明代歇山式风格建筑，堪称京城最大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

智化殿面南朝北，是智化寺的正殿。殿内正中和两山以前供有汉白玉石须弥座，中央供奉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两边供奉十八罗汉坐像，均为木质漆金，这些已荡然无存。

如来殿位于智化殿后面，是中轴线上最大的建筑。殿内供奉着如来本尊像，殿为上下两层，四面墙壁上除了有门窗的地方之外都饰满了佛龛，龛内置小漆金佛造像，相传有九千余尊，因此又称万佛阁。智化寺彩绘和雕塑艺术不仅表现出强烈的宗教色彩，又带有浓重的世俗社会气息。

万佛阁是智化寺的最高处，从远处的山门、钟鼓楼，到近处的智化殿、万佛阁，所有殿堂的屋顶全部铺装黑色的琉璃瓦，象征着神圣和庄严、权势和高贵，皇家寺院、敕建寺院主要使用黑琉璃瓦。黑色琉璃瓦屋顶正好与“智化”寺名相对应，前者以风降恶魔，后者以智度化众生。

藏殿是智化殿前的西配殿，因殿中不设法座，仅置转轮藏一具，故名“藏殿”。转轮藏为八角形，高四米多，下部为须弥石座，中部为经柜，上部为毗卢帽顶。石座转角处雕有“天龙八部”经柜角住上雕像、狮、四不像和菩萨、天王、韦驮与金刚，顶部则雕有大鹏金翅鸟、龙、龙女和毗卢佛。经柜本身为抽屉式，每面九层，每层五屉，上旨雕刻佛像。

智化寺从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建成一直到清康熙时期,寺中香火一直很兴盛。到了光绪年间智化寺由盛而衰。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侵入智化寺,拆毁墙垣,封闭佛殿。到民国年间,智化寺只有土地26亩、房屋199间、铜佛像7尊、泥像木像71尊、宝鼎1座、铜钟2口、铁钟一口、大小鼓7面、铛子1对、九音锣1副,铜钹和铸各一份,有僧8人。



智化寺万佛阁藻井

第十节　神秘的古堡

西大坪军堡位于今河北蔚县109国道边的一处山崖上,是一座堡垒式的夯土建筑,这座气势非凡的古堡已经历经了600多年的风雨。

西大坪军堡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在之后的200多年中,古堡里一直有明军驻扎守卫,是名副其实的军堡。

明朝初期的时候,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西大坪古堡的下面正是蔚州通往宣化府的一条大道,西大坪正处在“四十里平台”的边缘地带,下面就是河川区,在这里建堡能够扼守住下面的通商大道,所以其建的位置特别险要。

西大坪军堡不仅地势险要、垒墙坚固,而且设计精妙,全堡唯一的入口只能容纳两个人错身进出,一旦里面的人将这个入口封死,西大坪军堡便成了一座万夫莫开的堡垒。古堡内是一片平地,面积有三四百平方米,山崖上的一面有意洞开,以便观察敌情。建成600多年来,西大坪军堡并没有发生过惨烈的攻防战。

同蔚县的绝大多数古堡一样,尽管建堡的初衷是用于防御,但他们的垒墙都是夯土建成的。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在建古堡时十分艰难,在险要的地方建古堡必须要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古代的工具比较落后,工程量就相当浩大,这个古堡可能建了三至五年才完成。

古堡在蔚县并不少见,全县号称八百古堡,其中保存较好的有近200座。蔚县古堡与明长城都是为了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当时,一座古堡便是一个屯兵的堡垒。

蔚县属河北省张家口市，距离北京市区的直线距离约为160千米。几千年来，蔚县一直是由塞北进入华北平原的咽喉要道，战时为兵家必争之地。

从西大坪军堡驱车南行十多千米，有另一座出于军事目的而建造的堡垒——横涧堡。横涧堡建于洪武二年（1369年）。由于地处平原地区，它的堡墙比西大坪军堡更加高大，且拥有敌楼和马面（马面是指城墙上每隔一定距离便突出修建的矩形墩台，防守者用来从侧面抵御攻城的敌人）。正因为横涧堡易守难攻，建成600年后仍具有防御功能。

横涧堡也是夯土筑成的。夯土筑成的古堡坚固耐久，不仅可以抵御外敌，而且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霜雨雪仍傲然屹立。横涧堡至今仍住有村民。

北官堡是蔚县一个年代久远的古堡，始建于元代，北官堡和横涧堡的结构都是“堡中套堡”，内外层堡墙之间距离有100多米。小堡建于元朝，到了明朝，因为这里的人口不断增多，小堡里住不下人了，只好搬到堡外，为了保护这些住在小堡外的村民，人们又建了一层大堡，于是有了大堡套小堡的格局。

现在，蔚县的大多数古堡都住有居民，往往一个古堡里面便是一个完整的村庄。

蔚县的数百个古堡都有名字，其中最大气的一个名字要数“北方城”。北方城位于蔚县涌泉庄乡，实际上是一个被包在古堡里的小村庄。北方城比较完好地保存了蔚县古堡的典型结构——南北一条主街和三条横向的小街构成了一个“丰”字，正门开在南面，北面是不开门的，因为北面一向是防御的主方向。在北方城内的正北端有一座北极宫，也就是真武庙，这里是城堡中的最高点，有敌情时真武庙就成了前哨楼，村民们会在庙前日夜值勤，必要时将敲响大钟，召唤村民拿起简陋的武器自卫。

蔚县八百古堡告诉人们的并不仅仅是刀光与火光交错的历史，当人们漫步其间，看到和听到的还有几个世纪的兴衰往事。

第十一节　千根皇木埋藏西南之谜

唐、宋、明时期，三峡地区人口稀少，森林覆盖率高达80%。西南地区的木质好，以杉树、楠树等为主。据《北京紫禁城》记载，明朝永乐年间修建紫禁城，所用木料为产于西南山区的楠木。

因连年采伐，木材来源困难，后以杉木代楠木。

2010年初，四川省汉源县永利乡修建乡村公路时，工人开挖地基时挖出了4根木头。木头颜色已经变成浅灰色，直径约50厘米，长4米，枝丫修剪得整整齐齐，两头被削得尖尖的，很重。

研究人员经过鉴定后发现，四根木料中有三根的死亡时期距现在有500年左右，一根距现在有980年左右。也就是说，这些树木是在宋朝初期至明朝嘉靖年间被砍伐的。宋朝有文献记载，曾有人在这里采伐杉木板，遗留少量木屑。主要砍伐年代是明朝嘉靖年间左右，符合皇木砍伐的历史时代。

2010年5月底，研究人员在汉源县永利乡杉树村的四个发掘点雇请民工继续往下挖。往下挖了1米之后，挖出了一根1米多长的圆木和一块1米左右的木板。

连同以前发现的四根木料，这五根木料都有同样特征：一头是梢头，全部削成尖状，有明显斧削痕迹；一头是明显斧切或锯面，将这些圆木砍断。五根木料当中，长的有5米多，短的只有1米多，树种主要是冷杉、云杉。综合这些木料的砍伐时间及各种特征，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是被遗弃的皇木。在四川汉源及重庆涪陵、酉阳等地，至少埋藏了近千根这种被遗弃的皇木。

既然是皇木，为什么被大量遗弃在荒野中呢？专家认为，这反映了当时朝廷的奢侈。据清朝道光时期苗商李荣魁等抄录的《皇木案稿》记载，早在宋朝时期就有人在西南砍伐乔木，明朝后期和清朝前期曾多次砍伐采办。监造皇宫的人对木料的要求非常高，如有裂口、过细或长度不够，都可能被遗弃。因此，往往砍伐10根，真正运走作为皇宫用料的只有一两根，剩余的则随意丢弃在荒野中。

据《四川通史》的记载，明朝正德年间，朝廷曾派人在重庆府砍伐皇木。嘉靖年间，重庆夔州府（现奉节县）、铜梁县、重庆府一带砍伐皇木主要区域。万历年间，清朝康熙、乾隆年间，朝廷都曾在重庆涪陵、奉节、酉阳等地砍伐皇木，用来修建宫殿。另外，当时重庆的一些地方官为了讨皇帝欢心，也会进献皇木，特别是酉阳一带。嘉靖十七年，酉阳冉玄献大木20根，后来又有多次进献，皇帝非常高兴。

皇木的砍伐使重庆的森林遭到了破坏，覆盖面积大幅度减少。

据《重庆市志》记载，远古时代，重庆境内人烟稀少，原始森林茂密。汉唐时期，丘陵平坝原始森林逐渐被砍伐殆尽，但高山大岭、中低山区中仍有广袤

的原始森林。

宋朝以后，重庆的森林遭到砍伐，一些中低山区的林地向耕地转化。后至明清两朝，这种趋势一直没有放缓。民间曾出现"包青还山"的现象，即商人向农民承包一片森林，将树木砍光后，再把光秃秃的山岭还给农民。

在直接挖掘出这些皇木的四川省汉源县，现在也难以见到森林，一座座巍峨的高山上，只有低矮的灌木和草坪。数百年前挺拔的杉树、楠树已消失无踪，化成了一根根柱子和木屑。

第十二节　奇诡的天启大爆炸

明朝天启年间的一天上午九时左右，北京的天空十分明亮，突然从城的东北方至城西南传来一阵轰隆声，随后出现了一个特大的火球在空中滚动。天空中有丝状、潮状的五色乱云在四处横飞，有大而黑的蘑菇、灵芝状云柱直竖于城西南角，接着就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爆炸，方圆 10 多千米之内瞬间被夷为平地。

据当时的目击者说：爆炸当时本来天空晴朗，忽然就听到一声巨大的轰雷响起，声音震撼天地。从京城的西南角涌起一片遮天盖地的黑云。不多时，又是一声巨响。顿时天空变得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东至顺成门大街，北至刑部街，长一两千米，方圆六七千米，一万多间房屋建筑顿时变成一片瓦砾。两万多居民非死即伤，断臂者、折足者、破头者无数，尸骸遍地，一片狼藉，惨不忍睹，连牛马鸡犬都难逃一死。王恭厂一带地裂 40 米，火光腾空。东自通州，北至密云、昌平，到处雷声震耳，被损坏的房屋建筑无数。百姓有侥幸活命的，也都是披头散发，狼狈不堪，惊恐万分。不久，又见南方的天空中有一股气流直冲入云霄，天上的气团被绞得一团乱，演变成各种奇形怪状，有的像乱丝，有的像灵芝，五颜六色，千奇百怪，许久才渐渐散去。

爆炸当时，天启帝朱由校正在乾清宫用早膳。突然，他发现大殿摇晃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吓得不顾一切地往外逃。跑到门外，他又急忙拼命向交泰殿奔去，身边的侍卫们都惊得不知所措，只有一个贴身内侍紧紧跟着他跑。刚到建极殿旁，天上忽然飞下瓦片，正巧砸在这个内侍的脑袋上，内侍当场脑浆迸裂，倒地而亡。天启帝此时不顾一切地一口气跑到交泰殿。大殿的

一角放着一张大桌子，他连忙钻到桌子底下，才喘了口气，希望自己能逃过这一次劫难。

爆炸发生后，天启帝下旨从国库中拨出一万两黄金救济灾民。

这场大爆炸不像一般的炸药爆炸，在爆炸之前没有任何征兆。天启帝的司礼太监刘若愚在其所著的《明宫史》一书中，详尽地记述了这场巨大灾变。据他记载：5 月 2 日夜里，前门角楼出现“鬼火”，发出青色光芒，有好几百团之多，飘忽不定。不一会儿，鬼火合并成一个耀眼的大团。

另一本书记载：在事发之前，后宰门的火神庙中忽然传出音乐，一会儿声音细些，一会儿声音粗些。守门的内侍刚要进去查看，忽然有个大火球一样的东西腾空而起，顷刻东城发出震天的爆炸声，在爆炸中有许多人失踪。有一位新任总兵拜客走到元宏寺大街，只听一声巨响，他和他的七个随从连人带马消失得无影无踪。还有西会馆的塾师和学生一共 36 人，一声巨响之后，也没了踪迹。据说，承恩街上有一抬八人大轿正走着，巨响过后，轿中女客和 8 个轿夫都不知去向。更奇怪的是，在菜市口有个姓周的人正同 6 个人说话。巨响之后，他的头颅突然飞去，尸体倒在地上，而他身边的 6 个人却安然无恙。爆炸之时，许多大树被连根拔起，掉落在远处，石驸马大街有一尊千斤重的大石狮子，居然被一卷而起，落在 5 千米外的顺成门外。猪马牛羊、鸡鸭狗鹅更是纷纷被卷起到空中，又从天空中落下。据说在长安街一带，从天上落下了许多人头，德胜门一带落下的人的四肢最多。这一场碎尸雨，一直下了两个多小时。木头、石头、人头、人臂以及缺胳膊断腿的人、无头无脸的人，还有各种家禽的尸体，纷纷从天而降，真是骇人听闻。

据记载：这次遇难者，不论男女，不论死活，也不管是在家中还是在路上，很多人的衣服鞋帽都被刮去，全都一丝不挂。在元宏街上有一乘女轿经过，只听一声震响，轿顶被掀去，女客全身的衣服都被刮走，赤裸裸地仍旧坐在轿中，全身竟没有一丝伤处。他们的衣服全都飘到了西山，挂在树梢上。昌平区校场落的衣服堆成小山，其中器皿、衣服、首饰、银钱样样都有。

发生这次大爆炸的原因，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有人说明朝自永乐年起火器制造就有了很大发展，火药大都由王恭厂制造，可见王恭厂当时是作为工部制造、储存火药的火药库。有可能是火药库爆炸引起了这场灾难，后来又被人夸大的记述，所以出现了现在的描述。又有人认为，这个事件与不明飞行物有关。认为这是一个由反物质组成的陨石意外地闯入地球，才导致

了这场灾难。不过，仍有许多科学家持反对意见。如果是反物质制造的这次灾难，那么记载中的“不焚寸木”又怎么解释呢？看来谜底的彻底解开还需要时间。

第十三节 崇祯帝修建道观之谜

由于皇室侈靡无度，群臣倾轧不止，明朝很快就走上衰朽之路。明朝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上层社会竞相奢侈，并形成了风气，随之而来的就是官员的贪污受贿、多方掠取。成历帝时期，贪贿案件更是增多。贪赃有至数十万两者，一次行贿也有数万、数十万两者。皇室靡费掠取，官员贪贿成风，铸成兵虚财匮的败局。

万历四十年(1612 年)，明朝国库储藏税银已经空虚，京仓积米仅够两年支用。军政日益错暗，虚报战功，冒领粮饷，贿赂公行，克剥士兵，致使部队疏于训练、兵员减少、士兵贫困而兵力虚弱。不仅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加剧，而且同边疆少数民族特别是女真族的关系日趋恶化。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大举进犯辽东。明朝廷为了抵御女真族不得不扩大军费开支，在全国普遍加派赋税，平均每亩加征银九两，称为“辽饷”。后来不但辽饷征银不断增加，又增加了“剿饷”“练饷”两个项目，合称“三饷”。而这个时候，土地兼并早已盛行，社会贫富分化十分严重。一批批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沦为佃仆和流民，仅有小块土地的农民也不堪赋税重压。大多数农民一贫如洗，朝不保夕。遇到自然灾害更是极其悲惨。山西、陕西农民吃土块，河南农民吃雁粪求生。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起义终于爆发并愈演愈烈。明朝末年，小规模农民起义遍布全国。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李自成起义。

崇祯帝律己较严，自奉俭朴，17 年间勤于政事，未尝稍懈。崇祯帝就个人品行而言本来算不上“亡国之君”，却不幸遇上了“亡国之运”，而其能力有限，又缺乏“救亡之术”。其即位之初，明朝已是元气尽失，国脉垂绝，崇祯帝虽有志中兴，但秉性多疑，用人不专，刚愎自用，重典责下，急于求治，果于刑戮，喜怒无常，不辨是非。明朝内阁大学士共有 164 人，崇祯帝十七年就占了 50 人，更易频繁。崇祯帝在位期间共诛杀大学士 2 人、总督 7 人、巡抚 11 人，中下级官员更是诛戮相继。功勋才能之臣常不自保，获存者畏罪饰非不敢任事，庸佞

之徒却多得柄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明初强化君主专制独裁的最终恶果。

崇祯帝在义军四起的情况下，深感大势已去，便密令心腹太监林清德寻访深山幽谷建造归隐行宫，企图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林清德遍访北方名山大川，终于在今平山县西部选中了风景秀丽、易守难攻的天桂山。

天桂山集雄险奇秀于一山，融山、泉、林、洞于一区，有"北方桂林"的美誉。天桂山东西两端突出，中间凹陷，犹如坐北朝南的太师椅。天桂山分成三层，一层一个陡崖，高度都在100～150米，每层陡崖间又有坡度较缓的平台，好似天公造就的栈道。山上风景奇异，陡峰峭崖，雾锁云封，泉鸣瀑溅，碑碣夹道。

崇祯帝大兴土木，仿照皇宫制式建造气势恢宏的归隐行宫。然而，行宫尚未建好，李自成就攻进了北京，崇祯帝吊死在了煤山。林清德在绝望之中出家为道，将行宫改为青龙观。依照全真道的古制创建道院，上立玉帝樵阁，左右九天三宫殿，中修玄武行宫，前列廊庑，后依重崖，直侵云霞，下环钟鼓二楼，自称"北武当"。继林清德之后，其徒穆一铉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建成魁星阁、文昌殿、关圣殿，一二三道灵官阁等建筑，使青龙观规模日益宏大。

第十四节　朱氏皇族失踪之谜

明朝灭亡之际，数十万明朝朱氏皇族大部分在第一场劫难中被农民军屠杀了，另一部分又在抗清保国的战争中壮烈殉国了。除了这两部分之外，在这场空前浩劫中侥幸逃生的皇族成员，开始了艰难的生活。

据历史记载，在明末，有一部分皇族成员，如皇太子朱慈烺、崇祯三子定王朱慈炯、四子永王朱慈炤，秦王朱存枢、晋王朱求桂、代王朱传齐，先是被李自成农民军俘虏至北京。清军攻陷北京后，这部分被俘皇族在兵荒马乱中失踪，生死不明，成了历史疑案。

为了躲避清朝的迫害，一部皇分族成员在国破家亡之后，纷纷隐姓埋名，或窜伏山林，或辗转流徙，开始了艰难的逃亡生活。如出自宁藩的宗室八大山人，在明朝灭亡后，便自动放弃了朱姓，后来干脆出家当了和尚，只是把明朝灭亡的日期偷偷地组成花押签在他的画里，以志不忘自己是大明子孙。周藩分支安昌郡王朱肃渣在安昌沦陷后逃往浙东，投奔鲁监国以海。舟山失败，他战

死，其长子年幼，被母妃携带逃出，后为躲避清廷迫害来到杭州杭净寺，出家做了和尚，后来到松江一个荒野破庵中偷生。母妃临死时将王印交给儿子，庵中僧人走漏了消息，结果安昌王长子仍被官府抓捕处死，同庵僧人受牵连而死者数百人。

在广东梅县流传着一个故事，传说北京沦陷后，下落不明的太子朱慈烺与翰林院编修充东宫讲读的嘉应人李七淳一起潜回了李的家乡梅县。后为躲避清廷迫害，太子削发为僧，并在梅州阴那半山中人迹罕到之处建了一座庙，名叫"紫殿"，又叫"圣寿寺"，后来便老死在此深山中。他死后，被当地人尊为"太子菩萨"。《罪惟录·楚昭王桢传》也记载，楚藩分支祁阳王在明末楚藩沦陷后逃到福建。后福建沦陷，他与一个名叫严炜的书生一起更改姓名入瑶族以自保。《罪惟录》还记载，有某支宗室出生的诸生，明亡后绝望出家，初在无锡太子庵做和尚，后来又在界灯寺做住持，法号个纳，能诗会画，在当时颇有名气，但从不与人讲起旧时故事。还有一部分明朝宗室成员被迫投降了清朝，接受满人的统治，以使家族免遭绝嗣断代之劫。当年郑成功父子收复台湾后，优礼宗室，所以有大批宗室成员渡海来到台湾。这些宗室皇子王孙们受到郑氏父子的礼遇，在台湾留居几十年。但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清朝施琅攻陷台湾，郑氏政权降清，逃到这里的明朝宗室大都被俘，被迫接受清朝统治。据说当年施琅来到台湾后，立即收缴这些皇族宗室的谱牒和印信。清王朝没有再杀害这批明朝宗室遗民，而是将他们强迫内迁安置于山东、河南等地。这部分宗室后裔因此能够传递下来。

每当朝代更迭时，新建的王朝总要铲除前朝皇族。但没有哪一个政权像清朝一样，因为自己是异族入侵，做贼心虚，对明朝宗室实行血腥的屠杀政策。这给朱氏带来了比明末农民起义更残酷、更可怕的灾难。直到康熙时期，情况才稍有变化。

康熙七年(1668 年)，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才下了这样一道圣旨："诏故明宗室子孙众多，有窜伏山林者，令悉归田里；有改姓埋名者，姓氏皆复旧。"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三十八年(1699 年)康熙南巡时，又两次到南京拜祭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葬的孝陵，并下令求访明朝后裔，使奉守朱氏世祀。但因无法访察，没有结果。再到雍正二年(1724 年)，清世宗胤禛正式访查出明宗室后裔朱之琏，封为一等侯，入正白旗令世袭，以奉明孝陵的春秋祀事。至此，明宗室后裔才结束了逃亡生活，恢复了平民的身份。

第十五节　张居正死后遭抄家之谜

张居正是明朝最有权力、最具影响的内阁首辅。他协助10岁的万历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而被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之一。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万历帝对死去不久的张居正下毒手呢？

历史学家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这是君臣之间十年积怨的总清算。

在封建王朝里，君权和相权是一对相依相克的矛盾。君权过于弱小时，需要强大的相权来支撑；而过于强大的相权，则会弱化皇室，遭到帝王的忌恨。

张居正开始辅佐万历帝时，皇帝年仅10岁，为了稳定政权，万历帝母子都对张居正有所倚赖，尊重备至，言听计从。但是，张居正对万历帝管束过严、干涉过多，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已经开始了由亲近、尊重向着畏惧、厌恶的方向转变。

张居正以严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对待万历帝，每天布置功课，如果万历帝没有认真背诵或领会，就会遭到严厉的斥责。有一次，神宗读《论语・乡党》时，把"色勃如也"读成了"色背如也"。张居正当着众大臣的面厉声吆喝，吓得神宗连忙低头纠正。平时，如果万历帝背着张居正做了越制出轨的事，冯保就会吓唬他："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万历帝听了，很快就会收敛自己。

万历帝逐渐长大后，开始懂得了皇帝的权威和分量了。而张居正仍然把持朝政，甚至对他的宫闱生活也说三道四，这使得万历帝对张居正的态度向着仇恨方向迅速逆转。

其次，万历帝的贪财好利，推动了清算的进程。

《明史纪事本末》中记叙了万历帝查抄张居正荆州老宅之前与皇太后的一段对话。

这一年，万历帝的同母弟潞王已年满16岁，该议婚了，可操办婚礼的银子还有一多半没有着落，慈圣皇太后一想到此事就感到烦心。万历帝听了，满不在乎地说："这事您别着急，我有办法！现在朝中的这些官员都无耻极

了，他们一定是看冯公公、张太师权大，把好多钱财珠宝都作为礼物存放在这两家了。”

太后听了，心里有了些把握，跃跃欲试地说：“如果查抄他们的家，这些钱财就都到手了吗？”

万历帝回答：“这个冯保诡计多端，那些钱财恐怕都悄悄地转移了。”

正好这时候，云南道御史羊可立上了一道“已故大学士张居正隐占废辽府第田，乞严行查勘”的奏疏，已废辽王次妃王氏也奏称辽王府“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都说得有根有据。再加上冯保抄家，所得巨万。这位贪财好利的皇帝能不对张居正的家财动心吗？至此，张居正家厄运难逃。

此外，张居正一人独大，后继无人，也是他迅速、彻底败亡的一个原因。

第十六节　崇祯死前为何秘收魏忠贤遗骸

死前被公布罪状、发配凤阳，死后被碎尸万段、悬首示众，崇祯帝上台后对魏忠贤的这一系列处置，在给当时黑暗政坛带来些许新鲜空气的同时，也让他赢得了圣明之君的欢呼颂扬。然而，17 年之后，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崇祯帝却下密旨收葬魏忠贤的遗骸，墓址就选在魏忠贤生前早已看好的香山碧云寺。

崇祯帝在国破人亡的慌乱绝望中，为什么会突然改变自己打倒和否定魏忠贤的初衷，重新审视魏忠贤的价值和功绩，并出人意料地为其收集骸骨、修坟立碑呢？

天启帝朱由校临死前曾专门叮嘱崇祯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天启帝在生命最后时刻对魏忠贤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固然掺杂着个人私情，但最主要的是他认识到了魏忠贤在处理大事方面的清醒和果决，尤其是在维护大局、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的关键问题上，在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立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深明大义和远见卓识。

魏忠贤固然有为巩固个人权势，党同伐异、残忍歹毒的罪恶一面，但从他曾经力排众议、大胆起用辽阳战败后遭受谗言的熊廷弼，不徇私情、果断罢免宁锦一战中畏缩不出的袁崇焕，抛开私怨、违心推荐赵南星、孙承宗等一批能臣直臣等诸多方面，可以看出他还是心系国家、讲求原则的。魏忠贤主政期

间，国内形势良好，辽东局势平稳，这层能力、这种魄力、这份功绩，还是应该被认同和肯定的。

崇祯帝即位时，海内难民揭竿四起、关外清兵虎视眈眈，在这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朝廷迫切需要一位像魏忠贤这样富有处理军国大事经验和把握动荡时局能力的人来独当一面，虽然无法扭转国势日衰、积重难返的败亡趋势，但也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坍塌崩溃。但崇祯帝为了整饬内政和平息民愤，更是为了报仇雪恨和独掌大权，借着朝廷文武大臣的"倒魏"怒潮，迅速彻底肃清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

能够不动声色地一举铲除魏忠贤，一直是崇祯帝自我标榜的人生得意之作。然而，正是由于过分欣赏自己的才干，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却让他从自信变得自负，最后变得刚愎自用。魏忠贤死后，崇祯帝起用了倡导儒家思想的东林党人，但在国内动荡、边关危急的存亡之际，那些擅长空谈、治国乏术的文人儒将无所作为。杨鹤对民风彪悍的起义军实行"招安"，袁崇焕与狼子野心的皇太极私下"和谈"，无不表现出东林党人的庸俗、懦弱、酸腐和无能。

尽管崇祯帝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事必躬亲，但他既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加上他严苛、猜忌、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祯帝还频繁地调整官员，17 年间竟然换了 17 个刑部尚书和 50 个内阁大学士。这种让人噤若寒蝉、如履薄冰的高压态势，造成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无奈之下，崇祯帝只好培植私人势力，重新起用大批更加腐朽无能的太监，最终导致大明灭亡的悲剧。

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他在煤山上吊自杀殉国前的五天，崇祯帝在大势已去的绝望中，在听到太监曹化淳说的那句"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的话之后，终于领会到了皇兄临终前强调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深意所在。在幡然醒悟的同时，也让无力回天的崇祯帝在精神上彻底崩溃。收葬魏忠贤遗骸，既是对魏忠贤价值和功绩的重新肯定，也是对自己 17 年执政生涯的全盘否定。

第十九章　明代陵墓探秘

第一节　天人合一的“十三陵”

十三陵是明朝13个皇帝的陵墓，坐落在北京西北郊昌平区境内的燕山山麓。离京城约50千米，总面积为120多平方千米。这里从永乐七年（1409年）五月开始建长陵，到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葬入思陵为止的230多年，先后修建了13座皇帝陵墓、7座妃子墓、1座太监墓。共埋葬了13位皇帝、23位皇后、2位太子、30多名妃嫔、1位太监。它是当今世界上保存完整的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明朝的16位皇帝中除了有2位葬在别处、1位下落不明之外，其余的13位都葬在这里。

明十三陵规模宏伟壮丽。陵墓分布在盆地的东、北、西三面，南面两边有龙山、虎山把守陵门。十三座陵墓呈扇形排列，各以一座山峰为背景，各由一组建筑组成。陵区前矗立着晶莹光洁、典雅严谨的石牌坊。进入牌坊不远就是陵园正门，称大宫门，附近有碑亭和华表。门后为一条长达7千米的神道，两旁有石兽、石人。石兽有24座，共12对。其中，有狮子、獬豸、骆驼、象、麒麟、马六种，每种四只，各二坐二立；石人六对，分勋臣、文臣、武臣三种，都是立像。它们用整块白石雕成，神态逼真，雄壮生动。

永乐帝朱棣的长陵是十三陵中规模最大的皇帝陵。嘉靖帝的永陵和万历帝的定陵是他们生前亲自经营30多年的寿陵，所以规制恢宏豪华。洪熙帝献陵、宣德帝景陵、正统帝裕陵、成化帝茂陵、弘治帝泰陵、正德帝康陵、隆庆帝昭陵、泰昌帝庆陵、天启帝德陵，都是皇帝死后才动工兴建的，修建时间不过半年，与长陵、永陵和定陵的规模相去甚远。崇祯帝因为是亡国之君，没有正式建陵，他的陵寝是由亡妃田氏的墓穴改建而成的，规制极小。即使如此，建造一座陵寝也要役工数万，耗银一二百万两。

十三陵除神道共享之外，各陵都是前为祭享区，后为墓冢区。祭享区前有

正门“祾恩门”，或在其前再加一道陵门，中为陵殿，称“祾恩殿”，殿前左右分列东、西配殿和焚帛炉。祾恩门前左右分列神厨、神库、宰牲亭等建筑。墓冢区在内红门以内，其布局为圆形、长圆形或长方形的坟丘，周围有城墙环绕，称为“宝山城”或“宝城”，宝城前设方城明楼，有甬道可通前后。有些陵仿照孝陵的形制在宝山与方城明楼之间设有小院，称为“哑巴院”，或更设一座琉璃照壁作为幕障。方城明楼之前多设有五供石桌及二柱门，目的在于增加地下寝宫前的屏障层次。在每座陵墓的陵门前都有一座碑亭，碑文记载皇帝生前的功绩。

明十三陵的陵区建筑的整体性特别突出。明十三陵各陵虽各有自己的享殿、明楼、宝城，自成独立单位，但陵区之内，长陵神道作为各陵共享的“总神道”出现，共享的石牌坊、石刻群，加上各陵尊卑有序的布葬方式，使陵区的建筑紧密相连，各陵总合形成了一个整体。

明十三陵的陵寝建筑制度独具风貌。明各皇陵为前方（方形院落）后圆（圆形宝城）布局。宝顶、明楼、享殿沿中轴线纵向排列的崭新陵园布局方式，陵前的神道采用多次转折的曲路形制。室内明间、次间各设板门一道，梢间封以墙体。十三陵台陵明楼内圣号碑的设置，突出了该建筑的标示作用；棂星、宝城马道的设置便于陵园的巡守；方城前石供案及棂星门的设置，则增加了陵寝的纪念气氛，也为空旷的方城前院补充了点缀物。

明十三陵自然环境具有四面青山环抱，中间明堂开阔，水流屈曲横过的特点，而各陵所在位置又都背山面水，处于左右护山的环抱之中，显示出了皇帝陵寝肃穆庄严的恢宏气势。

明十三陵无论是从建筑形式，还是建筑结构，或建筑艺术上看，都是明代建筑的实物历史。

第二节　明皇陵的典范：长陵

明长陵是明成祖朱棣和皇后徐氏死后的栖身之地，是明十三陵中最具代表性的皇陵。长陵的陵宫建筑平面为前方后圆的布局，其前面的方形部分由前后相连的三进院落组成。

第一进院落前设陵门一座，为单檐歇山顶的宫门式建筑，面阔五间，檐下额枋、飞子、檐椽及单昂三踩式斗拱均系琉璃构件；其下辟有三个红券门。陵



明长陵

门之前建有月台，左右建有随墙式角门。院内，原来建有神厨（居左）、神库（居右）各五间，神厨前面建有一座碑亭。神厨、神库均被毁于清朝中期，只剩下碑亭。

第二进院落，前面设一座殿门，名为祾恩门。祾恩门始于嘉靖十七年（1538 年），是世宗朱厚熜亲易佳名。其中“祾”字取“祭而受福”之意，“恩”字取“罔极之恩”的意思，长陵祾恩门为单檐歇山顶形制，面阔 5 间（通阔 31.14 米），进深 2 间（通深 14.37 米），正脊顶部距地面高 14.57 米。檐下斗拱为单翘重昂七踩式，其平身科斗拱耍头的后尾作斜起的杆状。

第三进院落，前设红券门制如陵门。院内沿中轴线方向建有两柱牌楼门和石几筵。

长陵的祾恩殿是明朝帝陵中唯一保存至今的陵殿，堪称我国古代木构建筑中的珍贵遗物。

祾恩殿仿制明朝皇宫金銮殿修建，面阔 9 间（6.56 米），进深 5 间，殿顶为古建中等级最高的重檐庑殿式，覆以黄色琉璃瓦饰。正脊至台基地面高 25.1 米。上檐饰重翘重昂九踩斗拱，下檐饰单翘重昂七踩鎏金斗拱。六排柱前后廊式的柱网排列方式规整大方。殿内“金砖”铺地，殿下有 3 层汉白玉石栏杆围绕的须弥座式台基和一层小台基，总高 3.215 米。台基前出三层月台。每层月台前各设三出踏跺，古称“三出陛”。

祾恩殿的梁、柱、枋、檩、鎏金斗拱等大小木构件，均为名贵的优质楠木加工而成。各构件在殿内部分(除天花外)无油漆彩画，显得质朴无华。支撑殿宇的60根楠木大柱用材粗壮，是世上不可多得的奇材佳木。特别是林立殿内的32根重檐金柱，高12.58米，底径均在一米左右。

祾恩殿从结构上看，属于叠梁式构架体系，不推山。襻间斗拱按照"檩、垫、彷"的组合方式由垫板代替。整体结构更趋简化，节点更趋牢固。

明朝从孝陵以后，陵寝祭殿有享殿、陵殿、献殿、寝殿、香殿等不同称呼。殿内日常陈设有神榻(灵座、龛帐)、帝后神牌、册宝、衣冠、御座、香案以及各种乐器。朝廷遣官致祭时，殿内再增置陈设祭品用的正案、从案、三牲案匣等。这些陈设说明，明朝陵殿具有供上陵朝拜举行大规模祭献活动和平时司香火、四时供献、朔望朝陵等日常祭祀的双重功能。它兼有西汉陵寝寝殿、便殿和唐、宋陵寝上下二宫祭祀用殿的功用。

第三节　中国建筑杰作：定陵

辉煌、壮丽的定陵，由一块块雕刻精美的巨石组合而成的华丽壮观的地下宫殿。它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与艺术之精髓，是中国建筑史上一部杰作。

修建定陵的建筑物料主要是城砖、巨石、楠木和琉璃制品。由于陵墓规模宏大，工艺要求十分精细，所以对建筑物料的选验也格外严格。

定陵用料最多的是城砖，其产地主要是山东临清。临清地处黄河下游，又是京杭大运河的所经之地，土质优良，交通便利，是制砖和运输最为理想的地方。自黄土高原流失下来的黏土经过千里浪淘淤积到临清以后，已经变得质纯无沙，细腻无比。制砖工人首先将泥土挖出来，经过冬季冷冻，到春天时化开晾晒，然后再经过滤、长期浆泡、摔打、制坯等多道工序，最后才烧制成砖。这种砖长0.49米，宽0.24米，厚0.12米，重24千克，抗压系数大，质量极好。为便于检验，每块砖上都有窑户、作头匠人、年月等标记。如某块砖查验不合格者，一看标记便知出自何窑何人之手。因为此砖色灰稍白，故称"白城砖"。当时虽然没有大的工程项目，但早在万历二年(1574年)已开始谕令临清各窑每年为皇家烧造白城砖120万块。除了临清之外，武清也曾烧制白城砖。自

定陵动工后，两地的烧造数量又有大幅度增加。

除了白城砖以外，还有供殿堂铺地用的方砖，它只产在江南苏州，其烧造工艺比白城砖更复杂。泥土必须久经浆泡、筛罗，犹如河中淘金，故有“金砖”之称。其质地之细腻，砖面之光滑，为世间少有。

砖料的运输多采用囚犯专职从事。关于这种运输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永乐七年（1409 年）。当时永乐帝多次出征漠北，俘虏了大量的瓦剌军人，他们被带到关内之后，大多做搬运之类的苦力。城砖的运输便是一项重要内容。除此之外，来往于大运河中的粮船、商船也义务为工地带运。在当时的京杭大运河内，无论是专职为皇家运粮的漕船，还是商贾私船，只要通过苏州和临清，都要带运一定数量的砖料。到达京东通州以后，再由车户走旱路运往天寿山。万历十年（1582 年）十二月，工部郎中何起鸣、陈请在夏季水涨季节，将砖料直接运往小汤山以南或沙河朝宗桥以东。如此一来，船队运输就从京杭大运河的北端一直伸延到了沙河巩华城下。

定陵的兴建给京杭大运河上的船工和往来商贾带来沉重的负担，从而引起这些人的怨恨与不满，纷纷要求停止无偿运输城砖。万历十五年（1587 年），工部上奏万历皇帝请求船只减免载砖事宜，万历皇帝没有同意。定陵完工后，这种载砖方式仍没有取消，并一直为后来的大清帝国所沿用。

定陵所用的巨石大部分来自房山县大石窝，主要有青白石、白石、汉白玉等数种。在几十万块大石中，最重的可达上百吨，如此大的巨石给运输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为巨石来自大石窝，只能采取旱路运输。永陵修建时，巨石全由旱冰船进行人工拽运。其方法是每隔一里凿一口深井，冬天到来时将水打出，泼在路面冻成冰被，巨石沿冰路滑行，到达天寿山，以这样的方式从大石窝往京师运送长 10 米、宽 3.3 米、厚 1.65 米的一块巨石，需要 2 万名民夫，用时 28 天，耗银 11 万两。如果其他季节全由人工运往天寿山，其人力、时间、耗资还需再加一倍。嘉靖十六年（1537 年），工部尚书毛伯温针对旱冰船曳运耗财、费时、费力，又受季节和气温限制的局限性，特地令工匠试制出八轮马车。此车不仅可以用骡马代替人力，节省财力和时间，而且安全可靠。到万历年间，工部郎中贺盛瑞又在八轮大车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制出 16 轮大车，运输效率进一步提高。尽管如此，其开采运输之艰难，仍为世之罕见。

定陵大殿多采用金丝楠木，主要产地在湖广、云贵和四川诸省。此木料质地坚硬，耐腐蚀且有香味，是明代皇家建造宫殿的主要用料。皇宫大殿的主要

木料大多来自这些地方。楠木的贵重除了这些特点以外，主要还在于它的稀少和成长的缓慢。在朝廷大量采伐之初，这种树木零星地散见于原始森林，随着采伐量的逐渐增加，能够利用的楠木大都只在悬崖绝壁，人迹罕至的地方。定陵所用木料大都在此种地段开采，这些地方不仅难于攀登，而且有毒蛇猛兽、瘴气蚊虫等，砍伐难度相当高。

陵园所用的楠材大木共计1万余根，最粗的直径可达1.4米以上，要采伐一根大木所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当楠木被砍倒之后，伐木工便沿着行进路线先修路，然后由人工将巨木拖到江河之滨，等到水涨季节，将木掀于江河，让其漂流而下。在这漩涡急流、惊涛骇浪之中，又不知有多少人丧生。

定陵所用的琉璃制品，比其他陵墓的数量都要多。城墙与殿宇除了常用的琉璃瓦、脊兽等以外，陵门、享殿等重要建筑全部用带有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龟蛇等图案的琉璃砖进行装饰，比其他陵园更加瑰丽和华美。

这些琉璃制品主要产在京师。制作琉璃时，先把陶料粉碎，经过筛罗、和泥、制坯、烘干、上釉，最后以高温烧制而成。现在北京的琉璃厂，早在元代就是窑址，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以前，又在此处设厂，专为皇家烧造琉璃制品。

定陵除了所有宝城的垛口、明楼的女儿墙全用花斑石砌成以外，明楼的地面也用花斑石铺砌。为了坚固，砌石夹缝中还浇灌了铁汁。

明定陵建成后的地上建筑，除了部分地段的神路以外，其主体建筑均在大峪山与蟒山两山主峰之间的中轴连线上。定陵神路起于七孔桥总神路以北100米处，然后蜿蜒伸向西北，跨过三孔桥，穿越金水桥，直抵定陵陵园前的无字碑，全长3千米，路宽7米，中间铺青石板，两侧砌条石为边。

无字碑是置于金水桥后第一道陵门前的巨型石碑，螭首龟趺，通碑无字。明十三陵诸陵前都有碑亭及螭首龟趺碑，但除了神道上永乐帝的“神功圣德碑”外，其余各碑均无一字。无字碑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谜团，即使明、清遗老也难以破解。

据史料记载，原长、献、景、裕、茂、泰、康七陵门前并没有碑亭和碑，到嘉靖时才逐一建成。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曾请嘉靖帝撰写七碑之文，但正迷恋酒色、沉浸于修道成仙的嘉靖却无心思和才华撰写。自此，十三陵前的碑文便空了下来。事实上，明朝中期以后，皇帝多好嬉戏，懒于动笔费神，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感到江河日下、帝国飘摇，其“功德”已经不能直言了。

定陵无字碑初建时置于亭内，亭呈方形，每边长11米。清初被八旗军所

毁，但石碑仍然完好无损。

据《帝陵图说》记载，定陵有朱门三道。外罗城墙门是定陵的第一道门，重檐黄瓦，雄伟壮阔。墙上镶有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等图像，登高观之，山明水净，花艳叶翠，龙飞凤舞，马跃麟腾，构成了一幅风情画廊。

第二道门是祾恩门。祾恩门实际上是一座大殿，共由五间组成，清初毁于八旗军之手，乾隆时重修，在原来的基座上缩为三间。宫墙以西与第二道门之间，构成陵园的第一个院落。

进入祾恩门之后是陵园的第二个院落。院落正中为祾恩殿，是为祭祀陵寝的宫殿，这是陵园前部的中心建筑。祾恩殿原为七间，亦毁于清初。乾隆时期重修时在原来的基座上缩小为五间，现仅存殿座及石栏板。

定陵祾恩殿与永陵祾恩殿大小相同，座前亦有月台，月台两侧各有石阶一道，台前有石阶三道。阶中丹陛雕龙云纹，刀法凌厉形象逼真，堪称石刻艺术之精品。

祾恩殿之后是棂星门，形状像牌楼，有“牌楼门”之称。门两侧各树一根长方形汉白玉柱，柱顶雕石兽，两柱之间为门楼，楼上覆盖黄瓦。

明楼与宝城看似分离，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明楼建于宝城前的方城上，方城两侧与宝城城墙相接。方城正中是明楼，明楼全部为砖石结构。楼上额枋正中榜书涂金“定陵”二字。明楼四周为平台，内竖石碑一座，碑额刻篆书“大明”，碑身则用楷书雕刻“神宗显皇帝之陵”七字。碑座上窄下宽，四周雕云龙纹饰。

最显赫的宝城是陵园的坟冢部分。它由城墙围成圆圈形，城墙外侧置垛口、内置矮墙，顶部铺砖为道。如此建造除了追求逼真的艺术效果以外，还有在墙上屯兵、对付外敌入侵的考虑。每隔一定距离，就会在城墙外侧设石螭首伸于墙外。每逢雨季，城墙上的雨水便可通过螭首之口流出，以保持城墙的干燥。城墙外侧底部还设置了散水道，将水排入下水沟中。宝城内用黄土填实，其中心点用黄土加白灰夯实隆起，形成坚固的宝顶。宝城之内遍植苍松翠柏，在保持古代礼仪的同时，亦有皇帝及朱家江山万年长存之意。

除了主体建筑外，还有服务于陵寝的附属建筑。定陵金水桥以南为神宫监，是提督太监的衙署。监东为神马房，豢养马匹供陵园使用。金水桥北与神宫监隔神路相对者为祠祭署，专为料理祭祀事宜。饲祭署西南为宰牲亭，为上供宰杀猪羊所用。外罗城以内两侧各建朝房数十间，为祭陵官员休息之舍。

用于生产供品的果园置于昌平城西门外御路以南；榛厂则设在密云县深山；负责陵园守卫的卫署设在昌平城内。

定陵于万历十八年(1590 年)六月全部建成。整个工程总耗银 800 万两，相当于明朝两年的财政收入。

第四节 诡异的明泰陵

明泰陵位于长陵西北 3.5 千米的笔架山，是弘治帝朱祐樘与皇后张氏的合葬墓。

弘治帝是明代中叶唯一的较为励精图治的皇帝。他即位后，勤于理政，选用贤臣，在生活上也能注意节俭，不近声色，体恤群臣和百姓。由于弘治帝一朝削弱了太监乱政的现象，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挽救危机的治国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出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史称其时为“弘治中兴”。弘治十八年(1505 年)五月七日，弘治帝逝于乾清宫，享年 36 岁，谥号“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弘治帝去世之后，弘治帝开始筹划孝宗的泰陵陵事。当时的礼部左侍郎李杰、钦天监监副倪谦和司礼监太监戴义在考察了各处后，向弘治帝推荐了施家台。工科右给事中许天锡也向弘治帝提议，派廷臣中精通风水术的人，前去复视一次。于是弘治帝派人前往施家台考察，最后确定在那里营建孝宗陵寝。

泰陵于弘治十八年六月五日正式兴工。当时动用了各种工匠及官军上万人。4 个月后，玄宫落成，弘治帝正式葬入陵内。又过了 6 个月，陵园的地面建筑也全部告成。整个陵寝建筑包括“金井宝山城、明楼、琉璃照壁各一所，圣号石碑一通，罗城周围为丈一百四十有二，一字门三座，香殿一座为室五，左右厢、纸炉各两座，宫门一座为室三，神厨、奉祀房、火房各一所，桥五座，神宫监、神马房、果园各一所”。

虽然动用了大量的人力，也经过仔细的筹划，但泰陵在修建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各种意料不到的情况。据祝允明的《九朝野记》和孙绪的《无用闲谈》记载，泰陵营建中在开挖玄宫金井时，曾有泉水涌出，水孔如巨杯，仰喷不止。吏部主事杨子器亲眼看到，如实上奏朝廷。在古代的风水观念中，金井出水，被视为不祥。这样一来，泰陵非改址不可。当时的督工太监李兴非常受弘治帝

宠信，见有人对他主管的修陵事提出了意见，十分气恼。于是偷偷命人堵住泉眼，上疏说杨子器"诽谤狂妄"，弘治帝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杨子器关进了锦衣卫大狱。

但有大臣上疏说："子器此奏甚有益，盖泰陵有水，通国皆云。使此时不言，万一梓宫葬后有言者，欲开则泄气，不开则抱恨终天。今视水有无，此疑可释。"弘治帝觉得有理，于是命司礼监太监萧敬押解杨子器前往泰陵，一同察看验证。此时李兴早已堵住泉眼，回宫后，萧敬禀报了泰陵金井无水的情况。太皇太后王氏（宪宗皇后）在宫内听说了这件事，传旨："无水则已，何必罪人！"杨子器才官复原职，避免了一场杀身大祸。

历经几百年的风雨侵蚀和历史上的人为破坏，泰陵的损坏程度已十分严重，泰陵在清康熙时有的建筑即已残坏。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陵园建筑曾经修葺。自乾隆年间以来300余年，泰陵基本处于自然状态。风侵雪蚀和人为破坏使该陵寝破败不堪。陵寝标志性建筑明楼城墙已凹凸不平，楼顶瓦片残缺不全；祾恩殿遗址石条风化严重。

第五节　万历怪异葬式之谜

万历皇帝朱翊钧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是明穆宗朱载垕的第三子。1572年，朱翊钧10岁时开始当皇帝，到1620年病死，在位长达48年。他先后有孝端和孝靖两位皇后，定陵是他与两位皇后的合葬陵。

半个多世纪前，我国考古工作者对定陵进行了发掘。当时，发掘人员小心打开棺椁后，发现万历帝的尸骨被放置在一条锦被上，锦被两边上折，盖住尸体。尸体头西脚东仰卧，肌肉已经腐烂，仅剩下骨架。万历帝的面向上，头顶微向右偏，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头右侧，左臂下垂，略向内弯，手放在腹部。手中拿念珠一串。右腿稍弯曲，左腿直伸，两脚向外撇开。

孝端皇后尸体被放置在织金妆花缎被上，被两侧上折，盖住尸体。尸体已经腐烂，骨架头西脚东，面向右侧卧，左臂下垂，手放在腰部。右臂向下直伸。足部交叠，左足在上，右足在下。

孝靖皇后尸体也是被放在织锦被上，被两侧上折，盖住尸体。尸体已腐烂，仅剩骨架，脚东放置。面稍向右侧卧，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头下。左臂下

垂，手放在身上腰部。

万历帝的尸骨姿态太怪异了，与传统的“仰身直肢葬”完全不符。为何万历帝在棺椁内会屈肢侧卧，难道被人动过？专家很是疑惑。

从帝、后骨架情况看，三人葬式稍异，显然不像普通人的葬式。他们的骨架头部均为向右侧卧，左手都放于腰部。万历帝和孝靖皇后的右手向上弯曲，放于头部，孝端皇后的右手则为下垂式。万历帝的右腿弯曲，左腿直伸，孝靖皇后两腿弯曲，孝端皇后两腿平放足部交叉。有专家推断，万历帝的原葬姿势应为罕见的“侧卧式”。

专家分析，孝靖皇后骨架的情况应与原葬式相似，而万历帝与孝端皇后则可能有出入。因为人死后入葬，不可能故意摆成一腿弯曲、一腿直伸状。显然，万历帝的葬式不是原状。孝端皇后虽是两腿平放，但其头部向右侧卧，脊椎亦向右侧弯曲，两腿平放与其不相符。其原状应为侧卧式。万历帝头部、脊椎情况与孝端后相类似。

尸体如果平放，一般晃动也不会有大变动，只有侧卧式，碰撞时易变形。如果向右侧卧，必然倒向左侧，所以万历帝左腿直伸。孝端皇后左足压右足，根据二人骨架情况分析，原葬式应为向右侧卧。万历帝应为双腿弯曲式。只是因为晃动和碰撞而改变了原葬姿势。而孝端皇后的右臂下垂姿式尚待研究，如果原葬式是下垂式，一般情况下，手臂应贴近身体。而孝端皇后的右臂是向外撇，如与万历帝和孝靖皇后一样放于头部，因碰撞右臂发生变化，就有可能是现在的姿势。

根据史书记载，当年万历帝下葬时原葬式确实可能变动过。当时棺椁是从百里之遥的京城靠人工抬运到山陵，沿途颠簸。葬万历帝及孝端皇后时仅抬杠军夫多达 8600 人。一路上绳索常有损坏，不断更换。棺椁到巩华城时（今沙河），抬棺椁的木杠有断裂声，右边一角曾坠地。因此，可以想象尸体姿势有变化是完全可能的。

根据现有的考古发掘发现，中国古代土葬尸体葬式一般有仰身直肢葬、屈肢葬、俯身葬等姿态。万历帝的“侧卧式”殓葬姿势为“七斗星葬式”，他的身体侧卧，双腿微曲如睡眠状，其形极像北斗七星。

在过去，“北斗七星”被认为是极星，指向正北，位于天空中心。在星宿中属紫薇垣。古代把紫薇、太微、天市称为三个星区。紫薇垣是以北斗星为中心与周围各星组成的星区，是帝星所在。所以极星北斗又被认为是天帝居住的

地方。封建帝王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上天派到人间的主宰，视皇位为“天位”，皇帝死了就是“升天”了。

怪异的葬姿还可能与风水说有关。

过去风水家认为，北斗七星具有避邪功效，它的形状恰似一个巨大的聚气的S形。古代人认为，北斗七星的七个星代表了七种场。皇帝选陵址要选能“聚气藏风”的地方，选择的标准是山环水抱，因山环水抱必有气。在风水学中，用“曲则有情”来形容水和路的吉祥。山脉的起伏呈S形，河流则更明显，总是蜿蜒曲折。

皇帝入葬地宫，从隧道门经明楼后进入地宫，其路线也是S形。这种S形葬式取其能够“聚气”，有了生气，就有了万物，预示着子孙万代繁衍旺盛。

万历帝的怪异葬姿也有可能缘于释迦牟尼“涅槃”的姿势。

相传佛祖释迦牟尼80岁时，在两株莎罗树下，头朝北，面向西，右手支头，左手放置身上，双足合并，作侧卧姿势进入涅槃。

万历帝和两位皇后的尸体姿势极像释迦牟尼“涅槃”的姿势。因为万历帝和两位皇后在生前非常信仰佛教，他认为信仰佛教有助于“护国佑民”。

从定陵出土的文物中证明了他是一个佛教徒：在帝、后服饰上有很多佛教内容的纹饰。孝靖皇后的尸体最上层覆盖的是一床“经被”；上面有朱书经文，字迹已模糊。但中部的“南无阿弥”四字和右下部的“华严”二字均能看出。在万历帝的棺内有一件龙袍，其前后胸方补内为正面龙戏珠，龙首顶部绛一金“佛”字。

孝端皇后棺内有一件夹衣，方补内饰“佛”字，佛字下部饰莲花纹；背部在“佛”字上下两侧各绣一凤。

万历帝手中拿着一串佛珠，由此可以想象他信佛的程度。不仅生前信，而且死后念念不忘。

万历帝的怪异葬式到底是源于天象，还是源于佛教，目前学术界没有定论。但根据其陵墓北斗七星状布局，源于天象的说法理由更充分一些。20世纪90年代时，有关方面对南京明孝陵考察时，发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区布局竟然是“北斗七星”布局，这或许给明代帝王棺椁内的怪异葬式提供了一个佐证。

第六节　静江王空陵之谜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为了巩固明朝的统治,采取了“夹辅王室”的政策,首封十大藩王,其中特封了他的侄孙朱守谦为靖江王,辖守岭南夷越之地。

靖江王世代相袭,到清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攻克桂林时,靖江王及其王国280年的历史随之覆灭,共传11代14位藩王。除了第一代和最后两代藩王葬于外地之外,其他11位王都葬于尧山。

尧山是桂林最高、最大的山,也是桂林唯一的大土山。冈峦起伏,气势磅礴,号称“始安原脉”。他们将王陵选在此地,渴望死后继续拥有无上的权力,在另一个世界里保护自己的子孙永远主宰着帝国的统治。王陵的地面建筑全部仿照王府建造,每一个陵墓都建的和王府一样富丽堂皇、气势非凡,就像藩王的一个行宫。

靖江王墓群沿尧山西麓分布,南北长15千米、东西宽7千米,总面积达100多平方千米。葬有11位王、11位王妃、4位次妃、40多位王子(辅国将军)及数百位宗室、宫人等。

靖江王墓群有两个中心。第二代王朱赞仪至第十二代王朱履焘属一脉相承的正支,因此都安葬于尧山南部挂子山一带,他们的子孙也大多葬于附近。第十一代王朱任晟是以支系进封的,故其陵墓远离正支所在的挂子山,葬于北部的天赐田下,其子孙也大多葬于附近。

靖江王墓群依其地面规制及死者身份可分为六类。

第一类是王陵,共10座,级别最高,墓园面积从300多亩(1亩约合666.7平方米)到数亩不等,布局一般为长方形,两道围墙,三券陵门(外围墙)、三开间中门(内围墙)、五开间享殿与高大的宝城(墓冢)处于同一轴线,以神道相通,神道两侧序列守陵狮、墓表和狻猊、獬豸、狴犴、麒麟、武士控马、大象、秉笏文臣、男侍、女侍等石作仪仗,一般为11对,有些王陵在秉笏文臣后面还立有神道碑,有些在陵门内或外建有厢房。

第二类是次妃墓,共4座,级别次于王陵,墓园布局与王陵相仿,但面积和建筑略小,石像生少2对。

第三类是未袭而卒的世子墓和别子辅国将军墓，级别低于次妃墓，石像生只有 7 对或更少。

第四类是奉国将军墓，墓园面积、石像生少于辅国将军墓。

第五类是中尉墓，分为镇国中尉墓、辅国中尉墓、奉国中尉墓三级，墓园面积、石像生依次减少，一般只有一道围墙和墓碑，无享堂和石像生。

第六类是县君、乡君等女性宗室墓及靖江王宫媵墓，级别最低，无围墙和石像生，仅有墓冢和墓碑。

根据史料记载，靖江王墓及次妃墓都是由礼部和广西布政司委官依制营造。但因埋葬时间的早晚而在规制、规模上有所变化，总体上是规制由繁变简、规模由大变小、制作由粗变精。其中最早的第二代悼僖王陵及第三代庄简王陵的茔地面积分别为 315 亩、87 亩，均超过亲王茔地 50 亩的规定，且墓冢高大，石像生粗犷雄浑。弘治至隆庆时期营造的昭和王陵、端懿王陵、安肃王陵、恭惠王陵的茔地则为 43 亩至 22 亩，石雕精巧华丽。万历、崇祯时期营造的康僖王陵、温裕王陵、宪定王陵、荣穆王陵的茔地缩小到十亩以下，石雕精致细腻，置放拥挤。其余四类墓则由靖江王府或墓主家人建造，也因时间早晚而呈现相似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靖江王府以及明朝由盛而衰的真实反映。

在王陵的地宫里，都有丰富的陪葬品。这些陵墓在明朝时都由护陵军校守卫，清朝至民国也都受到了官府的保护。

1937 年，因时局动荡，靖江王陵基本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地，盗匪纷纷乘机作乱。这时，桂系军阀李品仙率部驻防桂林东郊的尧山一带，李品仙喜欢收集古董文物，王陵埋藏的奇珍异宝早已让他垂涎三尺。

李品仙以军事演习的幌子，调拨人马把陵寝区凡是有石人石兽的王陵、次妃陵和将军墓都打开一个盗洞，士兵们沿着盗洞进入地宫。他们劈开棺椁，把壁龛内的珠宝箱全部取走，有的士兵甚至当场撬开箱子，把小铜锁丢弃在现场，地宫里一片狼藉。

李品仙几乎盗窃了所有的陵墓，将地上的文物和地下的珍宝掠夺一空，其价值几何已无人知晓。

1983 年，考古发工作者发现了一座地面建筑全毁、仅存宝城封土的奇异陵墓。此墓坐北朝南，祠在左、墓在右，宝城前的中轴线上原有享殿、中门、陵门，享殿的左右各有配殿，神道对列华表、翁仲、石兽，外围墙的大门前左右则与奉

祠共立一对守门石狮。可惜的是，这些石雕皆于1959年兴建水利时毁作石料。

三米深的封土下面是拱券砖结构的地宫，左为男宫，右为女宫，各有前、中、玄(棺)，平面各70平方米，地铺长方形的青砖，宫壁是三层错缝方块裙石，上面是大青砖拱券，拱券砖厚达11层，都由交错灌浆的大青砖砌成，坚硬如钢筋。在男宫玄室的棺床前置有长命灯的大油缸。灯油已干涸，缸底放着一件石凿的钟形灯具。

奇怪的是，棺床上是空的，在左边壁第一个壁龛内却放置了一只藤箱，箱内遗物已腐朽。女宫的玄室也是空的，但壁龛内发现了黑釉陶梅瓶一对，棺床前则供有钟、碗、锅、壶及漆器的碗、盒各一套，黑釉陶质镂空器座一对，器座上的托物已不见踪影。男女两玄室均未发现墓志铭。

实际上，这是一座早期的王、妃合葬墓。因没有墓主的骨骸、棺木，只有藤箱和首饰入葬，可以推断这是一座衣冠冢。

有人认为，这是明末第十三任王朱亨嘉或第十四任王朱亨歅的陵寝。理由是崇祯皇帝煤山自缢后，朱亨嘉在靖江王府自立为“监国”。他兵败梧州之后，在福建被南明唐王处死。朱亨歅袭封为靖江王，清军攻破桂林城后，被缢死于西门外民房中。此墓有可能就是他们其中一人的衣冠冢。

专家经过考证认为，这座墓的地宫为前、中、玄三室，壁有裙石、棺床为石作，这些特征正是明靖江藩王早期的陵墓建筑；随葬黑釉陶梅瓶的习俗，也是靖江王墓早期陪葬品所为；地面建筑与庄严的奉祠同一外垣，择正统的坐北朝南，且奉祠主殿为七开间，如同亲王规制，这正是靖江王早期的待遇，只是墓前的享殿为三开间，犹如将军规制，这一切奇异的现象，只是反映了明早期第一代被废藩王的经历，他就是藩王朱守谦。

第七节 万贵妃墓的劫难

明成化帝朱见深，原名朱见浚，是英宗朱祁镇之子。成化帝生性懦弱，什么事都依赖从小照顾自己长大的万氏。

朱见深18岁即位时，万氏已经35岁了，她依然风情不减，而且更加懂得迎合帝意。

因为深得成化帝喜爱，成化帝几次想立万氏为皇后，但遇到很大的阻力。臣子一致认为，举国上下都不会同意一个大皇帝 18 岁的随侍宫女来母仪天下。因此，万氏到死也只是得了一个贵妃的封号，可在成化帝的心中，万氏的地位与皇后是一样的。

成化二十三年，59 岁的万贵妃病死，成化帝朱见深悲痛万分，为她辍朝七日，并在十三陵陵区为她修建了一座规模巨大的陵墓。这就是后来被人们所熟知的万娘坟。

在今天定陵西南 2 千米处的苏山脚下，有一占地约 2 万平方米的陵园，即是万贵妃墓。墓碑雕云凤纹，中间一个“万”字符，且寄吉祥之意。万娘坟坐西北朝东南，整体布局为前方后圆。方形院落面宽 197.8 米，进深 138.5 米。园寝围墙用绿色琉璃筒瓦，黄色琉璃滴水。

1923 年，当地土匪侯现文领 18 人对德陵和东井的娘娘坟进行盗掘，由于人少墓大未能成功。事发后，侯现文被抓进监狱，终了一生。1944 年秋，长陵园村的程老六拉起百余人的队伍，占山为王。

在一天深夜，程老六将队伍偷偷拉到万贵妃墓前，开始分头盗掘。经过三个昼夜的刨、挖、凿、炸，终于将墓顶打透，万贵妃的随葬品被抢劫一空。

他们又连夜运回长陵村分赃。当兵的每人珠宝 20 件，黄金 1 两。当官的每人分一个金罐或相当于一个金罐的器物。余下的无数珍宝自然由程老六独吞。

盗墓后第三天，程老六举行大婚，所用车辆浩浩荡荡，塞满了长陵园村，宰杀猪羊不计其数，大摆宴席几日，当地几个村的百姓闻所未闻、无比震惊。筵席之上，程老六的新娘子头戴万贵妃墓中盗出的金顶凤冠，趾高气扬、走路一扭一扭的、连说话也拿腔拿调，俨然一副皇后气派！这场可耻的闹剧在当地引起了极大轰动。

几个月后，程老六和国民党六十军的警备部队发生混战，激战中程老六被打死在工部厂村的河套里。其妻妾家产连同无数珍宝被国民党警备部队瓜分一空。

万贵妃陵墓被盗走的珍宝下场令人心痛不已，大都流失散落于民间和海外，去向不明。

第八节　上金贝古墓主人之谜

闽东上金贝古墓长约27米，宽约9.7米，占地面积约261平方米。墓里还有一地宫(安放舍利，即出家人尸骨的地方)，宽1.3米，长3.2米，约一成年人高，地宫的底座由两大花岗石铺设而成，四周还有排水沟。

上金贝古墓主体建筑前为祭亭，其后为圈椅状主陵，主陵内为一印状舍利塔。

就整体而言，它是目前福建省发现的规模最大、墓形制最罕见的“僧人墓”。奇怪的是，距离宁德不远的福州闽侯雪峰寺是福建地区著名的佛教中心，那里高僧云集，但那里的塔陵不仅制作比较粗糙，而且规模远没有宁德上金贝古墓那么大。而且，这个古墓的墓碑有碑亭罩着，连瓦片都是花岗石雕刻的，路面也都是用花岗石铺成的，其规格很高，做工考究。

专家们认为，上金贝古墓除了形制奇特、规模超大、彰显着皇家气派之外，其间所用的构件不仅精致豪华，而且寓意深刻，还饱含时代特征。

根据上金贝古墓的须弥座、莲花花饰等构件，可判断古墓的年代应为明朝中叶以前。上金贝古墓的建筑构件与明孝陵建筑构件有很多相似之处。上金贝古墓塔的底座与明孝陵方城底座的云纹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上金贝古墓塔的花纹菱形与明孝陵方城下部的菱形图案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上金贝寺左视角度下祭祀外间龙刻石件与明孝陵享殿遗址上的左视角度下的龙刻石件极为相像……

明史专家认为，古墓舍利塔的莲花基座造型与安徽凤阳明皇陵及淮安盱眙明祖陵的莲花座造型完全一致，这种造型在明朝只有朱家可以使用，可以肯定墓主人是朱家的。

上金贝古墓的石材建筑中有龙刻构件或叫螭首，这实在是不同寻常。龙刻构件是皇帝及其皇家专用的。一般人则不能使用，即使是宰相或大将军也不能僭越此类规制和擅用这类图饰。而宁德上金贝古墓建筑中恰恰有龙刻构件，这说明它与皇帝或皇家有关。

明清帝陵与皇宫的正殿正门前面不远处往往有一条河，名为金水河。巧合的是，在上金贝古墓前的一条涧溪，当地人们都称它为金水河。

明孝陵、明祖陵、明故宫和北京故宫等建筑前都有金水河，尽管这些金水河都很小、很窄，但它们上面都建有精美的石拱桥，名为金水桥。而上金贝古墓前面的溪涧叫金水河，而且它的上面还曾有一座桥，叫金水桥，后来它被山洪大爆发冲毁了。当地有许多老人反映，以前金水河上至少存在过三座金水桥。

墓的整体宏伟壮观，格局非同一般。墓葬坐北朝南，临海据山，龙珠高照，双鲤朝天。三进的布局，九级的台阶，丈八高的拜亭，三丈六阔的墓坪，处处体现出一种缩小了的皇家气派。

第一进是高大的拜亭与宽阔的墓坪，以及两边厢没有尾巴的龙头龙身与裙摆。这象征着墓主人虽不在位，但依旧是皇宫内院的主子与群龙之首之意。

第二进的两边厢是"双鲤朝天"。鲤鱼，象征着众臣。"天"即"天子"之意，象征着皇帝。所雕刻的鲤鱼尾朝天，头向地，成跪拜状，寓意众臣臣服与朝拜皇帝。

第三进是奇特的圆形圈椅状主陵，象征着龙椅。龙椅前圆形印状舍利塔则象征着玉玺。

墓顶上的一颗由莲花座托着的火龙珠，看上去会使人联想起整座墓形犹如一个"炆"字。据史料记载，建文帝朱允炆五行缺火，所以专家们推测，墓顶采用一颗"火龙珠"罩顶。同时，这一颗"火龙珠"又是墓主朱允炆的象征，"莲花座托着火龙珠"则象征着仙逝后的墓主朱允炆已升入天界，龙归沧海。

考古专家认为，古墓前的金水河、金水桥、古墓建筑的龙刻构件、怪异的墓制、宏大的规模，综合种种考古信息和文献资料，可以推断这座墓的主人是大明第二位皇帝——建文帝。

第九节　紫帽铁灶山古墓之谜

在福建省晋江市紫帽镇铁灶山深处有一座豪华古墓，这是一座沉寂了数百年的古墓，墓道左侧依次排列有栩栩如生的文臣、石虎、石马、石羊、石望柱底座。在墓道的右侧则只剩下了武将、石马底座各一个。

这些"石像生"雕工精细，姿态逼真，并具有明代典型的服饰特征和雕刻风格。早些年已有部分"石像生"被人盗走。这座墓葬由于早年曾被盗墓者盗掘

过，如今不仅墓主尸骨早已荡然无存，也找不到任何有文字记载的实物，难以确定墓主身份。

泉州考古专家认为，墓主可能做过布政使一类的大官。从墓室中出土的陶烛台、香炉、罐、瓶与以往闽南地区发现的明墓冥器的种类、釉色、质地、形状、大小都较为相似。石马、石虎腹部以下与石座连为一体，这和明代同期泉州古墓前的石马、石虎雕刻手法如出一辙。

从石像生的种类和数量上看，墓中这位官员至少是二品官。根据大明洪武三年(1370年)制定的法令，三品以下的官员墓前是没有石人的，而这座古墓的墓前有着文臣武将的石翁仲各一个。

当地的志书记载："史朝宜，字直之，朝宾从弟。嘉靖癸丑进士……升广东按察使，晋湖广右布政。"布政使在明代是正二品官，这说明了史朝宜生活的年代和官职基本上都与这座墓主的身份相符。

志书中还记载，史朝宜的墓就在"三十三都"的云台赤崎山的平原上，其墓志铭为明代尚书黄光昇撰写。铁灶山古墓所在的村落在明代属于"三十三都"。

从以上记载可初步判断，此墓为明代做过布政使的泉州人史朝宜之墓，距今有500年左右的历史。

史朝宜的祖先从浙江宁波到福建泉州定居。在做淮安山阳县令时，因田土多荒，他便从江南、湖北买入大量粮米，救活了不少百姓。当时，曾认严嵩为义父的赵文华在巡视东南防倭事宜时，向沿途的郡邑大肆索贿。史朝宜却不买赵文华的账。后来，海南珠崖一带遭受倭寇入侵，史朝宜又被派往当地做官。他到任后，肃清吏治，杜绝陋习，安抚百姓，广兴文教，是海南设置知州以来政绩最好的一任地方官。

三年任职期满，史朝宜改任广东按察使，其后又被升任湖广右布政。终其一生，史朝宜被称为清高而有名望、不贪图富贵的好官。

第十节　七星巨棺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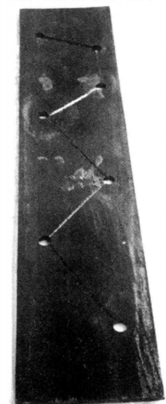
2008年10月15日，广西上思县城附近的一处工地上，正在取土的挖掘机突然碰到了一块硬东西。很快，失去支撑的巨石滚下断面。人们仔细打量这

块滚下来的石头，却发现这并不是一块天然巨石，这块“巨石”中居然包裹着棺木。在刚才挖掘的地方还悬着一块更大的巨石。

滚下来的巨棺比一般的棺材大很多，重量超过了一吨。而悬在断面上的二号棺可能更重。从现场可以看到一些夯窝的痕迹，说明它做的时候是一层层夯上去的。

巨棺外面包裹着一层精心夯筑的三合土，这使得一号棺在翻滚中只留下了轻微的“蹭伤”。

用三合土作墓是明代中期开始流行的一种墓葬形式，它在东南沿海南京、湖南、江西、广东等地流行。三合土的主要成分是石灰、粗砂和糯米。造墓时，先夯制棺底，然后迅速放入木棺，并在模具内夯打出四壁，最后制作棺盖，密封全部完成。经过一段时间风干硬化，整个棺椁将保持极高的强度和密封性。这样的墓葬能很好地保护尸体和陪葬品。



棺盖上的七星图案

有人推测这可能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因为按照这里的风俗习惯，只有夫妻合葬才能够并排而葬的。这类墓葬的主人，一般是士大夫或巨富阶层。巨棺的主人显然拥有不俗的经济实力。巨棺的主人究竟是什么人？墓地周围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两口三合土棺被搬进了室内。在人们搬运一号棺时，棺内不断流出了一种茶色液体，看上去并不黏稠，也没有异味。一号棺中不明棺液的流出让人们产生了期待：棺木内会不会有保存完好的古尸呢？

当把一号棺打开以后，人们闻到了从内棺椁里面飘出来的樟木的香味，棺盖几乎没有糟朽，这说明整个内棺保存非常的好。当内棺棺盖打开之后，发现竟然是一副黑色木棺，内棺的表面发出了耀眼的光亮。但当打开棺盖时，里面并没有完好的尸体，只有一具十分凌乱的骨骸。

专家们对内棺进行了清理，找到了墓主人的头骨。根据颅骨和髋骨的特征，专家们认定墓主

人是一位老年女性。内棺中的陪葬品并不多，最醒目的是墓主人身上的一件金色花纹的纺织品。这是一件纱质外衣，其表面与壮族的服饰有所不同，没有发现壮族所特有的服饰的排扣的风格在里面。

专家还在一号棺的底部发现了三枚开元通宝钱币和一把折扇，以及女主人的耳环、发簪等物品，没有任何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物品。当人们清洗那块垫在墓主人身下的木板时，发现上面有北斗七星的图案。它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呢？

随后，专家们对二号棺进行了开启。二号棺的高度达到了 1.4 米，体量比一号棺大很多。打开樟木棺盖之后，又出现了第二层黑色木棺。把这具内棺开启后，人们发现尸体上面盖的纺织品还发出一种比较特殊的黄色。墓主人仅仅留下了完整的骨架。只是由于二号棺发掘和搬运平稳，整个骨骸还保持着当初下葬时的姿势。从骨架上看，墓主人身高 1.6 米左右。

二号棺中的纺织品已经全部灰化，稍一接触就可能折断。专家们将墓主人的遗骨连同身下的垫板送往医院进行了一次全身 X 光检查。X 光片显示，除了发簪以外，墓主人头部下方还有多枚钱币。其中的一枚稍大一些，似乎是在墓主人口中。专家们认为这应该是一枚特制的压胜钱，之前在一号棺中也有发现，并不算奇怪。而稍小的那一枚可能和一号棺中的一样，也是开元通宝。

专家们把所有的片子按照从头到脚的顺序依次排列起来之后，发现墓主人身下一共有 7 枚钱币，它们连在一起就是一个北斗七星。而这和一号棺中垫在女主人身下的那块北斗七星板几乎一样。也就是说，男主人身下同样有这样一块北斗七星板，而七枚钱币正是放在他身下代表七星的那七个圆孔上。专家们从男主人腿部和脚下各取出两枚钱币，发现这是乾元重宝。

他的发簪表明了他所生活的时代是明代中晚期。专家将目标锁定在了明末清初的南明政权。崇祯十七年(1644 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尽，大明宗室的其他成员和他们的拥戴者在南方建立了南明政权。

根据当地县志的记载，曾任广西左江道的黄其晟追随永历帝一路逃亡。在清兵的追击之下，这支逃亡队伍不断缩小，许多人不得已潜入尚未被清政府控制的南方山区隐匿下来，而黄其晟则隐居于上思。如果真是这样，他很可能就是二号棺中那位男主人。

专家通过对一号棺女主人的骨骸进一步鉴定，发现这位女主人死亡时的

年龄在六七十岁。然而，之前二号棺男主人的X光片显示，他的年龄在五十岁左右。显然，她比丈夫长寿许多。两只巨棺的下葬时间至少相差十年以上。根据头围和股骨的长度，专家推算出这位老太太当年身高大约1.6米。

技术人员对一号棺中发现的纺织品做了进一步清洗，从它的胸口处发现了一块刺绣，上面有一只展翅飞翔的鸟类图案。这个类似飞鸟的图案宽度约为30厘米，造型非常特别，而本地壮族的妇女服饰一般不在衣服上面刺绣动物的图案。那只飞鸟状图案跟古代官服的补子有点相像。

明清两朝的官服，胸口和背部都有一个特别的装饰：叫作补子，按照规制：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依品级而不同，有严格的规范。而夫人们的命服上也会装饰和丈夫同一品级的官补，以示荣耀。一号棺女主人外衣上的飞鸟图案与文官官补上的刺绣惊人的相似。

所有这些发现表明，那具三合土棺里的男性墓主人可能是黄其晟。忠于前朝的黄其晟夫妇在改朝换代之后隐居他乡，而在他们死后，遵从家乡风俗和明代旧礼将自己更彻底地隐藏了起来。

第十一节　长枪客不朽之谜

2000年8月的一天，上海松江华阳五队的一些农民在平整土地时，无意中用挖土机在竹林里挖出了一具尸体。这具尸体穿的是古代服装，看起来像是刚死不久。死者是名男性，保存得相当完整。

上海市松江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很快赶来，初步认定这可能是一座古墓。古墓中出现如此完整的尸体，令在场的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了了解清楚古尸身上的随葬品，工作人员将它翻了过来，发现尸身非常冰凉。

工作人员在尸体的衣服里找到了一个戒牒。戒牒是颁发给佛教徒、僧侣或佛家弟子使用的一种身份证明。根据戒牒来看，戒牒持有者名叫杨福信，戒牒是明代正统四年(1439年)颁发的，距今已有500多年。除此之外，在这具尸体的身上再也找不到其他的文字证明或者印章。初步测定，他的年龄为75～80岁。

工作人员在现场还找到了一些随葬品。其中，有武士木俑和一杆铁头枪。枪头像平头铲一样，很小。

武术研究者认为，这杆枪并非兵器。因为在元朝，统治者对于本族人提倡骑马、摔跤、练武，但对汉族人则采取禁武政策。于是汉族人只能在私下习武，在公开的场合则以武打戏掩人耳目。随葬的枪说明杨福信生前爱武，还有可能以武打戏谋生。

古尸研究专家发现杨福信的皮肤湿润、柔软有弹性，有些关节居然还能活动。杨福信的手掌比较大，特别是手掌的骨骼比一般人要大。这一特征进一步说明杨福信生前很可能会武。因为长年习武，尤其是练掌的人，大量的练习会使手掌的肌肉发达，也能刺激骨骼增长得更快。结果是手掌比较大，明显与常人不同。

在我国古代，江湖中流传颇广的一种防腐秘术是主动服毒。在人临终前的几个月里坚持小剂量服用砒霜和水银等毒物，身体里积累的毒素就能在死后起到防腐的作用。

专家经过对杨福信的内脏器官以及毛发进行化学分析，发现他体内的重金属和正常人无异，属于正常范围。看来，杨福信没有主动服毒。

专家通过解剖发现，杨福信体内的组织细胞已经出现了自溶现象。他的自溶现象很充分，符合正常的自然规律。也就是说，他的遗体并不特殊。

专家们利用了各种仪器对杨福信的尸体进行了各种检测，但依然没有找到他尸身保持完好的原因。因此人们就把考虑的范围从尸身本身转移到了杨福信的墓上。

他的墓室采用的是浇浆结构。这种墓室的四壁用青砖砌起，棺椁放入后，再把三合土浆浇筑在砖墙与棺椁之间。古人用浇浆法给棺材包裹上了一个结实的密封层。这里的浇浆使用了一种特殊物质——明矾。明矾很黏且很致密，可以被用作混凝剂，防止浇浆开裂，从而加强密封性。由于墓室密封、恒温、缺氧，细菌无法繁殖，这就为保存尸体创造了条件。

这座墓刚被发现时，棺木里面都是水。根据记载，当时并没有下雨。有人猜测，里面的水是古人特制的防腐剂，尸体泡在里面不会腐烂。但中国人没有把自己的家属泡在水里面的习惯；另外，棺材里还有一些干燥剂。这两者是矛盾的。

当棺木被取出来后，人们意外地发现，墓底部的处理相对简单，三合土浆比棺木四周和顶部薄许多。因为中国人有入土为安的观念，如果把四面八方用浇浆浇起来，死者就出不去了，所以故意将墓底部的三合土浆做得比较薄。

松江一带河道纵横，地下水位较高。特意做薄的底部使得地下水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从下面一点点地渗透进去，形成棺液。在此之前，因为墓室密封缺氧，尸体已经停止腐败，后来棺液的浸泡正好帮助它保持了湿润。正是封闭的环境与干净的地下水，才造就了他的不腐之身。